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三卷

资本论

第一卷

(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翻译)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曹 歌

封面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01-017048-0

I. ①马… II. ①中… III. ①马恩著作-全集 IV. ①A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1607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四十三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12月第2版 201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35.5

字数:957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01-017048-0

ISBN 978-7-01-017048-0 定价:8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9 787010 170480 >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7. 引文的出处中标有[P.]、[B.]、[M.]、[L.]、[Zh.]者,分别为马克思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伦敦笔记》(1850—1853年)和《引文笔记》(1859年)的外文缩写符号,符号后面的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分别指笔记本的编号和页码。

前 言

本卷收入的是《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约·鲁瓦译,全文经作者修订)。它由法国莫里斯·拉沙特尔出版社从1872年9月至1875年11月出版,编成44个分册分9辑发行(每辑包括5个分册,最后一辑是4个分册),1876年初合订为一卷。

马克思非常关心《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早在《资本论》第一卷还在写作的时候,马克思就曾想到把它译成法文,以便在罗曼语各国传播自己的科学理论。从1865年起,马克思积极物色译者和出版者,先后通过不同途径与多位译者商谈翻译事宜,甚至还打算亲赴巴黎,解决翻译和出版问题。马克思在1867年说过,他打算通过《资本论》的法译本来“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见马克思1867年5月1日给路德维希·毕希纳的信)。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马克思深刻总结巴黎公社经验,高度评价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但也深感法国缺乏“理论基础和实际的健全思想”(见马克思1874年5月18日给库格曼的信)。马克思加紧落实《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几经周折,终于确定了译者、出版者和出版条件。在商谈出版方式时,马克思表示赞同《资本论》法译本以分册的形式出版,认为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手中。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对于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和推动法

国和罗曼语国家的工人运动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恩格斯在 1887 年为《论住宅问题》一书所写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主义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上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1873 年）翻译的。由当时以翻译费尔巴哈著作而知名的约瑟夫·鲁瓦担任翻译。他的翻译工作是严肃认真的，但译得比较拘谨、呆板。马克思怕读者不易读懂，影响对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把握，所以不得不亲自修改译文。马克思在《致读者》（即《法文版跋》）中说：“约·鲁瓦先生保证尽可能准确地、甚至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正由于他那样认真，我不得不对译文作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见本卷第 841 页）

马克思在校订过程中，感到原来德文版中有些地方在理论内容上还需要做补充和修改，而有些地方则需要增补新的历史材料和注释。因此，他不但仔细修改译文，而且往往整段整段地重新改写。所以，法文版《资本论》并不完全是德文第二版的翻版，而是经作者亲自修订过的版本，反映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见本卷第 841 页）。

马克思所做的修改是多方面的。从框架结构上看，马克思对全书的篇章结构做了新的划分。这种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发展过程。《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1867 年）全卷只分六章。德文第二版（1872—1873 年）改为七篇二十五章（这种篇章结构一直保持到《资本论》第一卷通行版本第四

版)。法文版进一步改为八篇三十三章。

法文版比德文第二版多出一篇、八章。德文版的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在法文版中改为两篇，即第七篇《资本的积累》和第八篇《原始积累》；法文版多出的八章分别是：德文版第二篇第四章的三节，即《资本的总公式》、《总公式的矛盾》、《劳动力的买和卖》在法文版中改成了三章，即第四、五、六章；德文版第七篇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在法文版中改为第八篇《原始积累》，其中的七节在法文版中改为七章。第一节《原始积累的秘密》、第二节《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第三节《15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第四节《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第五节《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第六节《工业资本家的产生》、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在法文版中相应地改为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章。

法文版的篇、章、节的名称也做了不少改动。比较重要的改动有：第一卷德文版的总标题《资本的生产过程》在法文版中改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第一章第一节《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在法文版中改为《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价值实体。价值量）》。马克思在此处加进“交换价值”，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并列提出，强调了价值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联系；第三节《价值形式或交换形式》在法文版中改为《价值形式》，这一节的（A）项（3）《等价形式》，在法文版中改成了《等价形式及其特点》，并分别标明等价形式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德文版第三篇第五章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在法文版中改为第三篇第七章《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德文版第四篇第十三章第一节《机器的发展》，在法文版中改为第十五章

第一节《机器和机器生产的发展》；德文版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法文版中改为《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研究》；德文版第七篇的开头，在法文版中加了一个导言；德文版的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在法文版中改为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商品生产所有权如何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权》。

德文版标题中的“过程”在法文版中全部改掉。如德文版中的《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章《交换过程》、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在法文版中分别改为《第一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第二章《交换》、第七章《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七篇《资本的积累》。马克思尽量避免使用“过程”这个词，是因为他考虑到，当时法语中还没有相应的词。因此，他在法文版第三篇第七章谈到“劳动过程”时，专门为“过程”一词加了一个脚注，使法国读者能够理解这个词的来源和含义。（见本卷第 180 页）

从内容上看，马克思在法文版正文中作了许多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修改和补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谈到《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14 页）这里最后那句话“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法文版改为“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见本卷第 17 页）。马克思的这一改动对于理解“生产方式”的多重涵义具有重要意义。

在德文版中,马克思在考察商品的价值时,使用了“价值对象性”这样的术语。“对象性”是黑格尔的用语,一般读者不容易理解。在法文版中,马克思说到“价值对象性”时,有的地方用“现实性”来代替“对象性”,有的地方则干脆把“对象性”去掉,直接写“价值”二字。

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句名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页)后来,马克思在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中把“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改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00页)。法文版《资本论》对这句话又做了进一步修改,改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生产关系”(见本卷第75页)。马克思的这个改动进一步强调了物质生产力的第一性作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对重农学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中,首次试图画出一幅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再生产的图画。他们的论述在许多方面比他们的继承者的论述更接近于真理。”(见本卷第627页)马克思在1877年3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此作了说明:“我是把重农学派作为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有系统的(不像配第等只是偶然的)解释者来看待的,当然,我不想把自己的这种态度直接告诉人们。如果一下子公开表明这种态度,那么,在我有机会阐明自己的观点之前,那些拙劣之徒就会把它接过去,同时加以歪曲。正因为如此,我在寄给你的评述中没有谈及这一点。但是,在批驳杜林时

也许可以引用《资本论》的下述两段话。我引用的是法文版,因为这里不像在德文原文中那样纯粹采用暗示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一篇第二章《交换过程》中,对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做了总结性说明:“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06页)在法文版中,这句话改为“可见,随着劳动产品向商品的普遍转化的完成,一种商品向货币的转化也就完成了。”(见本卷第81页)法文版加上“普遍”二字,其意义在于说明:商品早就存在,有商品也就有货币。但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只有到了一定时期,商品的价值形式和货币才取得完成的形态,一种商品才固定为货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一篇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的第一节《价值尺度》中,分析价值量和价格的关系时指出:“商品的价值量表现出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22页)法文版把这句话改为:“价值量表现出一种生产关系,表现着某种商品和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份额之间的内在联系。”(见本卷第96页)马克思的这个改动表明,他透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从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中揭示了事物的本质,提出了价值量表现一种社会关系的命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二篇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第一节(法文版第四章),分析了“资本的总公式”。他用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 $G-W-G$ 同资本流通的公式 $G-W-G'$ 相对比,得出了资本的本质。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他对资本的特征做了概括:“因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

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81页)法文版把这句重要的话改为:“因此,价值成了递增的价值,成了能够发芽、成长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见本卷第152页)同德文版相比,法文版更通俗易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价值增殖”这个专门术语,马克思在法文版第二十四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一个脚注中,补写了一句话作为说明:“我们认为,‘valorisation’这个术语最准确地反映了使价值成为它自身的增殖手段的运动。”(见本卷第623页)所以,用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定义资本,最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四篇第九章(法文版第十一章)考察了“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分析了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剥削的剩余价值量,同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可变资本的多少、工人的人数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剩余价值规律。关于第一个规律,德文版是这样表述的:“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说,是由同一个资本家同时剥削的劳动力的数目与单个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之间的复比决定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52页)在这段话中,马克思讲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这是容易明白的,因为可变资本多时,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就多,剩余价值率高时,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量也多;反之亦然。但是另一方面,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由同一资本家同时剥削的劳动力数目与单个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之间的复比决定的,则不太好理解。法文版对“复比”的表述做了修改:“因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规律:可变资本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量,等于这个预付资本的价值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说,等于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乘以该劳动力受剥削

的程度,再乘以同时使用的劳动力总数。”(见本卷第 316 页)这样修改以后,意思就更加清楚易懂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四篇第十三章(法文版第十五章)考察了资产阶级的所谓“补偿理论”。这种理论以表面现象作依据,认为被新技术和机器所排挤的工人,会由于采用新技术和机器本身所节省的资本而全部重新被雇用,从而减少失业。马克思在法文版中补充了这样的论述:在使用机器的扩大再生产中,资本不再以最初的水平与劳动力相交换,因为可变资本现在已经转化为不变资本。由于雇用熟练技能的工人,工人的数目在绝对减少。解雇的工人的工资额现在分解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熟练技能工人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此外,机器还可以长期使用,不用替换。马克思认为,机器使受支配的劳动力的数目增加了,而所谓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实际上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最可怕的灾难。(参看本卷第 461—462 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五篇第十四章(法文版第十六章)从社会生产的意义上深入考察了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在法文版中丰富了“总体工人”、“结合劳动者”的内涵,提出“集体劳动者”概念。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说明从事一个产品生产的所有工人是一个整体,因此是指在协作和分工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一个企业的全体工作人员。结合的总体工人构成工场手工业中的活的机构,是由从事局部工作的工人组合在一起构成的一个新质的表现。这种组合符合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局部工人的结合使劳动效率大大提高。结合使资本获得更大生产力,同时也使劳动者个人的生产力减少。马克思由此指出,协作和机器是怎样通过社会工人排挤单个工人的。机器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工人或者说结合劳动人员的构成。分工大大扩展了。结合的总体工人或社会的劳

动成员是进一步分工的产物。在德文版中马克思使用“总体工人”概念仅仅与分工的作用相联系，而在法文版中，马克思在规范生产劳动时，着眼于生产的总结构，把“总体工人”的概念扩大到生产的结果即产品，同时强调了包括所有附属职能在内的总劳动过程。这个拓展的意义在于突出了生产劳动的社会内容，从而不同于主要从分工和生产技术上所做的考察。

马克思在法文版第十四章的末尾增加了对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的诡辩论的批判。（见本卷第 541—543 页）穆勒的理论当时在资产阶级理论界颇有影响，有必要对其进行批判，马克思主要批判了穆勒关于利润来源以及社会生产的历史形成的观点。恩格斯在 1873 年 12 月 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关于穆勒的评语写得最好。”恩格斯后来在整理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时，按照马克思生前的意见，收进了这些内容，并在脚注中注明这些内容是从法文版翻译过来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592 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六篇第二十章（法文版第二十二章）考察了工资的国民差异。他写道，强度较大和效率较高的国民工作日在世界市场上得到较高的货币表现。因此，劳动的绝对货币价格在一个国家可以比较高，虽然工资与剩余价值相比较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645 页）在法文版中，马克思扩充了这一段论述，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第一，“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通常的平均的强度……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见本卷第 590 页）；第二，在国际范围内，价值规律的应用发生了变化，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劳动的普遍的通常强度是这个

阶梯的计量单位”(见本卷第 591 页);第三,“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见本卷第 591 页)。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国际价值的观点。后来恩格斯在编辑出版德文第三版、第四版时基本上采用了法文版这些论述。

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所做的修改最多。马克思在关于“斯密教条”、所谓“劳动基金”、资本积累和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资本集中概念的确立、资本积累对于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等问题上增补了许多重要内容。

马克思在德文第二版第七篇第二十二章(法文版第二十四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第二节《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中,批判了著名的“斯密教条”。他在法文版中明确指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时,必须先扣除资本家消费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马克思提出“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概念,认为,剩余价值有一部分要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其余部分才用来雇用工人和购买生产资料,即转化为资本,这样一来有关论述就更加严密了。

马克思在德文第二版第七篇第二十二章(法文版第二十四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第五节对“所谓劳动基金”做了评述,但是没有充分展开,基本论点集中在第一段中。在法文版中,马克思对这一节做了全面的改写,把这些基本论点扩展成了各个独立的段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美国版〈编辑说明〉》中曾主张这一节的基本部分应按照法文版修改。但是德文第三版、第四版没有吸收法文版的这些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第七篇第二十五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定义做了新的表述。在德文

第二版中，马克思是把它作为不变资本部分和可变资本部分之间的构成，作为投资在生产资料和劳动资料上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的，而没有把它明确说成是资本的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法文版中，马克思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角度来考察，即从它的价值关系方面和从它的技术和物质构成方面来考察。他明确指出：“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来决定的。前一种资本构成是价值构成，后一种资本构成是技术构成。最后，为了表明二者之间的密切的相互关系，我们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因而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见本卷第 653 页）马克思还第一次阐述了“资本有机构成”这一经济范畴的规律性，分析了资本在量的构成和质的构成上的辩证统一。他强调了在积累增长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的规律性。他指出，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为了避免发生误解，他又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绝不排斥它的绝对的增加。（参看本卷第 666 页）这些论述后来被吸收进了德文第三版、第四版中。

马克思在法文版中明确区分了“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这两个概念。马克思在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已经使用“资本积聚”概念，此外在论述有关分工的场合也使用过这样的概念。而“资本集中”最初并不是作为同“资本积聚”完全不同的范畴来使用的，而是作为描述资本主义生产的诸多结果中的一个现象来使用的，或者是作为小资本家被大资本家吞并而产生的大规模资本来使用的。马

克思在德文第二版中曾使用“积聚”这个概念来说明各分散的资本的相互吸引，马克思写道：“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21—722页）而在法文版这个地方，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使用了“集中”这个概念：“这个对立的运动不再是与积累等同的积聚，而是根本不同的过程，是把不同的积累和积聚点结合在一起的吸引，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数量较多的资本合并为数量较少的资本，总之，这是本来意义的集中。”（见本卷第668页）在法文版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区分“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这两个概念，对于资本积累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法文版的这些论述，被吸收进了《资本论》德文第四版中。

马克思在法文版中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问题的，做了许多重要补充，说明了周期性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并作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将会缩短的预见（见本卷第680页）。这方面有些论述没有收入德文第四版中。此外，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英国群众运动的发展和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增补了许多关于爱尔兰农村无产阶级的状况的新材料（见本卷第760—764页）。

马克思在法文版中，把第八篇《原始积累》作为单独的一篇从资本积累部分中分出来，使之成为全卷最后一篇。这具有重要理论意义。马克思在论述原始积累的秘密时做了多处修改，其中特别是对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问题做了补充说明。在德文版中这段话是：“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

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23页)这段话在法文版中改成:“……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因此,英国必然在我们的概述中占主要的地位。但是西欧的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见本卷第770—771页)后面追加的这句“西欧的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表示,马克思把对农民土地的剥夺限定在西欧,因为当时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东方各国还存在着农村公社制度。马克思曾应俄国“革命的社会党人”维·伊·查苏利奇的请求,就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前景发表看法,他在1881年3月8日给她的回信中就是以《资本论》法文版中的这段话作为回答的。这段话仅见于法文版,而后来的德文版都没有吸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法文版第三十二章)中谈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和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问题:“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74页)法文版把“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改为“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改为“重新

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见本卷第 827 页)。

在法文版中,马克思还根据资本主义现实情况的发展,把一些新现象和新材料补充进来。例如对国债制度和现代税收制度在原始积累中的作用做了详细补充,这些内容有的被收入了《资本论》德文第四版中。

马克思在修订了《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以后,每当再出版《资本论》其他版本,他总是要求人们认真参考法文版中的修改,甚至亲自写出按照法文版修改的具体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几个重要版本都吸收了法文版的成果。

德文第三版(1883 年)。《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是根据德文第二版翻译的。马克思校订法译本时,发现德文第二版的某些部分还要彻底修改。他原想把正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有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补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资料充实进去,然后再出第三版。马克思直到逝世前几个月,仍在进行第三版的准备工作,遗憾的是,他生前未能实现这个愿望。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已做了修改,并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一个法文本,其中准确地标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恩格斯根据这些材料对第二版做了修改,于 1883 年在汉堡出版了第三版并撰写了新版序言。

英文版(1887 年)。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还在排印的时候,恩格斯就曾筹划出英文版。1877 年,马克思获知他的友人想在美国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他写信给阿道夫·左尔格,告诉他在翻译时除根据德文第二版外,还必须参考法文版。后来马克思又给左尔格寄去一份美国版用的《编辑说明》,其中逐项罗列出了哪些地方应按法文版修改。后来美国出版计划没有实现。马

克思逝世后,赛米尔·穆尔和爱德华·艾威林在恩格斯的指导下翻译《资本论》。英文版以德文第三版为依据,其中已包含了法文版的内容。恩格斯在校订英译文时,又参考了法文版,并且参考了马克思原先为美国版编写的《编辑说明》。英文版不但在内容上反映了法文版的一部分修改,而且篇章结构也是按照法文版划分的,即将德文第二版的七篇二十五章改为八篇三十三章。经恩格斯审定的英文版于1887年1月出版。

俄文版(1872年)。俄文版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外文版本,于1872年4月8日在彼得堡出版。后来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同马克思讨论出版第二版,马克思在1878年11月15日给他的信中说:“关于《资本论》第二版,我要提出下列意见:(1)我希望分章——以及分节——按法文版处理。(2)译者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尽管在译成法文时,我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述“简化”,特别是在第一章中)。”丹尼尔逊的计划后来未能实现。

德文第四版(1890年)。这是恩格斯在世时修改和审定的最后一个德文版本,也是最完善的一个德文版本。1889年9月,恩格斯着手修订工作时,他再次对照了法文版,并且又一次参考了马克思为美国版编写的《编辑说明》,把法文版中的一些修订补充到德文版中去。德文第四版成为全世界通行的版本。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几个主要版本都与法文版有关。但是,这些版本又都不完全等同于法文版,有的地方甚至存在明显差别,因此,《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对于帮助全面了解《资本论》版本演变的历史、深入理解和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也有重要的价值。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译本在 1983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中译本是根据拉沙特尔出版社出版的法文本原文翻译的。这次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时,我们又根据以原文发表这一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部分第 7 卷(1989 年)对译文重新作了修订。

目 录

前言	1—16
致莫里斯·拉沙特尔公民	13
致马克思公民	14—15
第一版序言	16—20

第 一 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第 一 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23—77
1. 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价值 实体。价值量)	23
2. 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	32
3. 价值形式	38
A. 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39
(a) 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39

(b) 相对价值形式	40
(1) 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40
(2) 相对价值的量的规定性	44
(c) 等价形式及其特点	46
(d) 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	52
B.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54
(a)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	54
(b) 特殊等价形式	56
(c)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56
C. 一般价值形式	57
(a) 价值形式的性质的变化	57
(b)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发展关系	60
(c) 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	61
D. 货币形式	62
4.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64
第二章 交换	78—87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88—141
1. 价值尺度	88
2. 流通手段	98
(a) 商品的形态变化	98
(b) 货币的流通	109
(c) 铸币或硬币——价值符号	119
3. 货币	124
(a) 货币贮藏	124
(b) 支付手段	129
(c) 普遍货币	138

第 二 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 资本的总公式	143—153
第五章 资本总公式的矛盾	154—165
第六章 劳动力的买和卖	166—177

第 三 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七章 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生产	179—201
1. 使用价值的生产	179
2. 剩余价值的生产	188
第八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202—214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	215—234
1.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215
2. 产品价值在同一产品的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224
3. 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227
4. 纯产品	233
第十章 工作日	235—314
1. 工作日的界限	235
2. 贪求剩余劳动的资本。领主和工厂主	240
3. 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的工作日	249
4. 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263
5. 14 世纪中叶至 17 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271

6.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
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285
7.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
影响 309

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315—324

第 四 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二章 相对剩余价值 325—334

第十三章 协作 335—349

第十四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350—385

1. 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350

2. 局部劳动者及其工具 353

3. 工场手工业的整个机构。它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
手工业和系列的工场手工业 356

4. 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366

5. 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375

第十五章 机器和大工业 386—532

1. 机器和机器生产的发展 386

2. 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 402

3. 机器工业对劳动者的直接的反作用 410

(a) 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410

(b) 工作日的延长 419

(c) 劳动的强化 426

4. 工厂 437

5. 劳动者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447
6. 补偿理论	459
7. 工厂对工人的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	469
8. 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483
(a) 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483
(b) 工厂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485
(c) 现代工场手工业	487
(d) 现代家庭劳动	490
(e) 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	495
9. 工厂立法	507
10. 大工业和农业	530

第五篇

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研究

第十六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533—543
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间量的比例的变化	544—555
1. 已定：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强度不变。生产率可变	544
2. 已定：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生产率不变。劳动强度可变	549
3. 已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不变。劳动持续时间可变	550
4. 已定：劳动持续时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552
第十八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556—559

第六篇

工 资

第十九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561—570
---------------------------	---------

第二十章 计时工资	571—579
第二十一章 计件工资	580—589
第二十二章 国民工资率的差异	590—595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

导 言	597—598
第二十三章 简单再生产	599—613
第二十四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614—652
1. 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商品生产所有权如何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权	614
2. 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623
3. 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627
4. 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率。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636
5. 所谓劳动基金	648
第二十五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653—766
1. 资本构成不变, 积累的增长导致工资率的提高	653
2. 资本构成在积累的增进中的一系列变化和资本中与劳动力相交换的那一部分的相对减少	663
3.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671
4. 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687
5. 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696
(a) 1846—1866 年的英格兰	696

(b)报酬微薄的产业阶层	703
(c)流动人口。矿工.....	713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丰厚的部分的影响	717
(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721
(f)爱尔兰.....	750

第 八 篇

原 始 积 累

第二十六章 原始积累的秘密	767—771
第二十七章 对农村居民的剥夺	772—792
第二十八章 15 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 关于工资的法律	793—802
第二十九章 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803—805
第三十章 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 市场的形成	806—811
第三十一章 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812—824
第三十二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825—828
第三十三章 现代殖民理论.....	829—840
致读者	841
德文第二版跋摘录	842—848
注释	851—910
人名索引	911—954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955—959
文献索引	960—1024
报刊索引	1025—1030
名目索引	1031—1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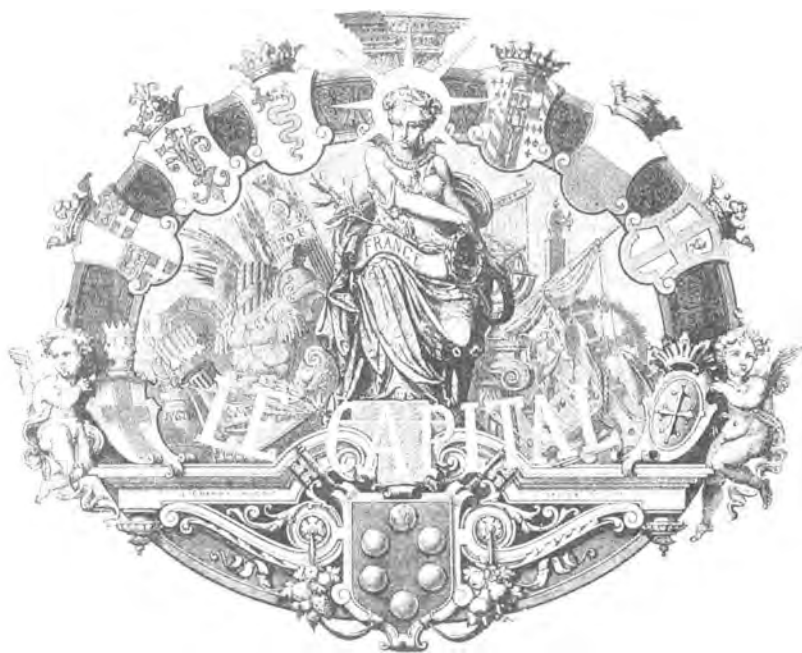
插 图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封面	3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扉页	5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刊印的马克思像	7
马克思 1872 年 3 月 18 日给《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者拉沙特尔的信 ..	9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目录	11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第 13 页	25

卡·马克思
资 本 论

巴黎 1872—1875 年

KARL MARX



PARIS

ÉDITEURS, MAURICE LACHATRE ET C^{IE}

38, BOULEVARD DE MONTMARTRE, 38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封面

LE CAPITAL

PAR

KARL MARX

TRADUCTION DE M. J. ROY, ENTièrement RÉVISÉE PAR L'AUTE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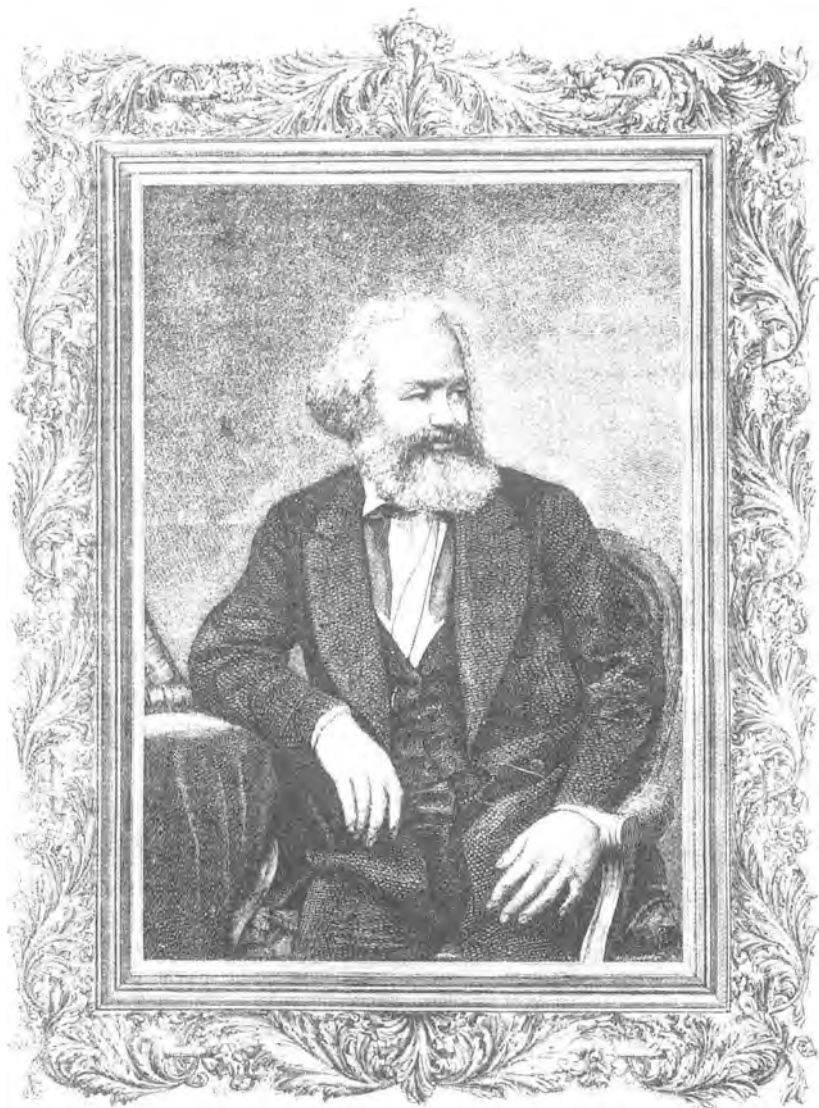


PARIS

ÉDITEURS, MAURICE LACHATRE ET C^{IE}

38, BOULEVARD DE SÉBASTOPOÛL, 38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扉页



Karl Marx.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刊印的马克思像

Londres 18 Mars 1872.

Au citoyen Maurice La Chatre.

Cher citoyen,

J'apprends à votre idée de publier la traduction de *Das Kapital* en livraisons périodiques. Sous cette forme l'ouvrage sera plus accessible à la classe ouvrière et pour moi cette considération l'emporte sur toute autre.

Voilà le beau côté de votre idée, mais en voici le revers: la méthode canalisée que j'ai employée et qui n'avait pas encore été appliquée aux sujets économiques, est si assez ardue la lecture des premiers chapitres, et il y a à craindre que le public français toujours impatient de conclure, averti de connaître le rapport 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avec les questions immédiates qui le passionnent, ne se rebute parce qu'il n'aura pu tout d'abord passer outre.

C'est là un désavantage contre lequel je ne puis rien si ce n'est toutefois prévenir et prémunir les lecteurs sérieux de vérité. Il n'y a pas de route royale pour la science et ceux qui seulement ont chance d'arriver à ses sommets lumineux qui ne craignent pas de se fatiguer à gravir ses sentiers escarpés.

Recevez, cher citoyen, l'assurance de mes sentiments dévoués

Karl Marx.

马克思 1872 年 3 月 18 日给《资本论》第一卷
法文版出版者拉沙特尔的信



	Pages		Pages
PRÉFACE.....	9	CHAPITRE XVIII. — FORMULES DIVERSES POUR LE TAUX DE LA PLUS-VALUE.....	229
LIVRE PREMIER. — Développement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13	SIXIÈME SECTION. — La salaire.....	231
PREMIÈRE SECTION. — Marchandises et monnaies.....	13	CHAPITRE XIX. — TRANSFORMATION DE LA VALEUR OU DU PRIX DE LA FORCE OUVRIÈRE EN SALAIRE.....	231
CHAPITRE PREMIER. — LA MARCHANDISE.....	13	CHAPITRE XX. — LE SALAIRE AU TEMPS.....	235
CHAPITRE II. — DES ÉCHANGES.....	24	CHAPITRE XXI. — LE SALAIRE AUX PIÈCES.....	239
CHAPITRE III. — LA MONNAIE OU LA CIRCULATION DES MARCHANDISES.....	39	CHAPITRE XXII. — DIFFÉRENCE DANS LE TAUX DES SALAIRES NATIONAUX.....	243
DEUXIÈME SECTION. — Transformation de l'argent en capital.....	62	SEPTIÈME SECTION. — Accumulation du capital.....	246
CHAPITRE IV. — FORMULE GÉNÉRALE DU CAPITAL.....	62	CHAPITRE XXIII. — RÉPRODUCTION SIMPLÉ.....	247
CHAPITRE V. — CONTRADICTIONS DE LA FORMULE GÉNÉRALE.....	66	CHAPITRE XXIV. — TRANSFORMATION DE LA PLUS-VALUE EN CAPITAL.....	254
CHAPITRE VI. — ACHAT ET VENTE DE LA FORCE DE TRAVAIL.....	71	CHAPITRE XXV. — LOI GÉNÉRALE DE L'ACCUMULATION CAPITALISTE.....	269
TROISIÈME SECTION. — Production de la plus-value absolue.....	76	HUITIÈME SECTION. — L'accumulation primitive.....	314
CHAPITRE VII. — PRODUCTION DE VALEURS D'USAGE ET PRODUCTION DE LA PLUS-VALUE.....	76	CHAPITRE XXVI. — LE SECRET DE L'ACCUMULATION PRIMITIVE.....	314
CHAPITRE VIII. — CAPITAL CONSTANT ET CAPITAL VARIABLE.....	85	CHAPITRE XXVII. — L'EXPROPRIATION DE LA POPULATION CAMPAGNARDE.....	316
CHAPITRE IX. — LE TAUX DE LA PLUS-VALUE.....	91	CHAPITRE XXVIII. — LÉGISLATION SANGUINAIRE CONTRE LES EXPROPRIÉS À PARTIR DE LA FIN DU QUINZIÈME SIÈCLE. — LOIS SUR LES SALAIRES.....	325
CHAPITRE X. — LA JOURNÉE DE TRAVAIL.....	99	CHAPITRE XXIX. — GÉNÈSE DU FERMIER CAPITALISTE.....	330
CHAPITRE XI. — TAUX ET MASSE DE LA PLUS-VALUE.....	131	CHAPITRE XXX. — RÉACTION DE LA RÉVOLUTION AGRICOLE SUR L'INDUSTRIE. — ÉTABLISSEMENT DU MARCHÉ INTÉRIEUR POUR LE CAPITAL INDUSTRIEL.....	332
QUATRIÈME SECTION. — Production de la plus-value relative.....	135	CHAPITRE XXXI. — GÉNÈSE DU CAPITALISTE INDUSTRIEL.....	335
CHAPITRE XII. — LA PLUS-VALUE RELATIVE.....	135	CHAPITRE XXXII. — TENDANCE HISTORIQUE DE L'ACCUMULATION CAPITALISTE.....	341
CHAPITRE XIII. — COOPÉRATION.....	140	CHAPITRE XXXIII. — LA THÉORIE MODERNE DE LA COLONISATION.....	343
CHAPITRE XIV. — DIVISION DU TRAVAIL ET MANUFACTURE.....	146	AVIS AU LECTEUR.....	348
CHAPITRE XV. — MACHINISME ET GRANDE INDUSTRIE.....	161	EXTRAITS DE LA POSTFACE DE LA SECONDE ÉDITION ALLEMANDE.....	358
CINQUIÈME SECTION. — 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a production de la plus-value.....	219	ERRATA.....	351
CHAPITRE XVI. — PLUS-VALUE ABSOLUE ET PLUS-VALUE RELATIVE.....	219		
CHAPITRE XVII. — VARIATIONS DANS LE RAPPORT DE GRANDEUR DE LA PLUS-VALUE AVEC LA VALEUR DE LA FORCE OUVRIÈRE.....	224		

FIN DE LA TABLE DES MATIÈRES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目录

致莫里斯·拉沙特尔公民

亲爱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

致马克思公民

亲爱的先生：

在德国，您的著作《资本论》在工人阶级中间激起了巨大的共鸣，因此法国的一家出版社想到要在本国翻译出版这部杰出的著作，这是很自然的。

俄国在翻译这部重要著作方面确实走在法国的前面；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的国家甚至能够根据尚未在德国出版的德文第二版的手稿来翻译这部著作，而且我们的译文是经著者校订的。

法国将在向其他国家人民传播您的学说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因为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总之，在一切有进步人士渴望了解并传播那些必将在旧大陆和新大陆支配现代社会的原理的地方，都将根据我们的译本来翻译这部著作。

我们采用分册（每册 10 生丁）出版的方式将有这样的好处：由于穷人们只能为知识花费极少的钱，这种办法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得到您的著作。您期望这部著作到达所有人手里的目的就可以实现。

您担心读者会在前几章枯燥无味的经济学问题面前望而却步，我们以后就会知道这种担心是否有道理。

我们应当期望，那些以研究经济学说为主要目的而订阅您的著作的人，在阅读时不会由于您使用的分析方法而中途停步；每个人都

会明白，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前几章必须进行抽象推理，这是分析那些人们关心的迫切问题所不可缺少的前提。而在以后各章中论述的社会问题，只能逐步地得到解决；所有读者都会跟随您——我确信这一点——，一直达到您的非凡理论的结论。

亲爱的先生，请接受我对您的热爱。

莫里斯·拉沙特尔

第一版序言

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 1859 年发表的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的续篇。这两部著作的出版相隔很久，是我多年的疾病造成的。

为了使本书得到必要的补充，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概述了前书的内容。¹我确实认为，在概述中必须改变我原来的叙述方案。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而前书已经全面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例如，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删去了；²但是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种理论的历史的新资料。

在一切科学中，开头都是困难的。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颇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阐述得明白易懂，使所有的读者都能理解。⁽¹⁾

实现在货币形式上的价值形式，是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

(1) 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也包含着严重的错误。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命题，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几乎都是逐字地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大概是出于宣传上的目的。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他所得出的实际的结果，这同我没有关系。³

来人类智慧探索这方面秘密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复杂的和隐藏着更深刻意义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研究有机体比研究它的构成要素——细胞要容易些。另一方面,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抽象是唯一可以当做分析工具的力量。而对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也必然是琐事,但这是微生物学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阅读这部著作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为了认识自然过程,或者是在现象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时观察这些现象,或者是在尽可能保证现象按自身规律性展开的条件下从事实验。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英国是这种生产的典型地点。因此,我从这个国家借用了主要的事实和实例作为阐述我的理论的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沉溺于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的乐观想法中,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⁴

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较充分或较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表现出来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向那些就工业规模来说跟在后面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些考虑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英国那样的法律的抗衡作

用,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整个西欧大陆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我们还不得不忍受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陈旧的生产方式还在苟延残喘,而且与这种生产方式相伴随的还有它所产生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的统计相比确实很贫乏。⁵然而它还是揭开了帷幕的一角,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建立定期的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发掘真相,如果能为这种高尚的职务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公共卫生的报告人、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和无私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用云彩遮住身体来追捕妖怪。我们却钻入云中遮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再幻想了。正像 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⁶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 世纪美国南北战争⁷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社会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在一定的时期,这种变革必然会波及大陆。在那时,它在进展过程中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法定的障碍。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关于大工厂的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可以而且应该从另一个国家的历史中获得教益。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支配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

是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不曾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①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不管个人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比它在其他研究领域内遇到的敌人多得多。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⁸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条信纲⁹中的三十八条信纲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旧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但在这方面，一定的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对此我只要向读者指出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¹⁰《就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团的信函往来》就足够了。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化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合众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

^① 此处的德文原文是“der 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即“经济的社会形态”。——编者注

关系的变化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种标志并不意味着明天就会出现奇迹。这种标志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开始出现一种预感: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第二册)和**资本在其发展进程中所采取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¹¹

任何真正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¹²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第一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1. 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或价值本身（价值实体。价值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¹⁾。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物。这些需要的性质如何，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²⁾ 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这些需要如何得到

(1)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3页。¹³

(2) “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尼古拉斯·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2、3页）

满足,是对象作为生活资料来直接满足,还是对象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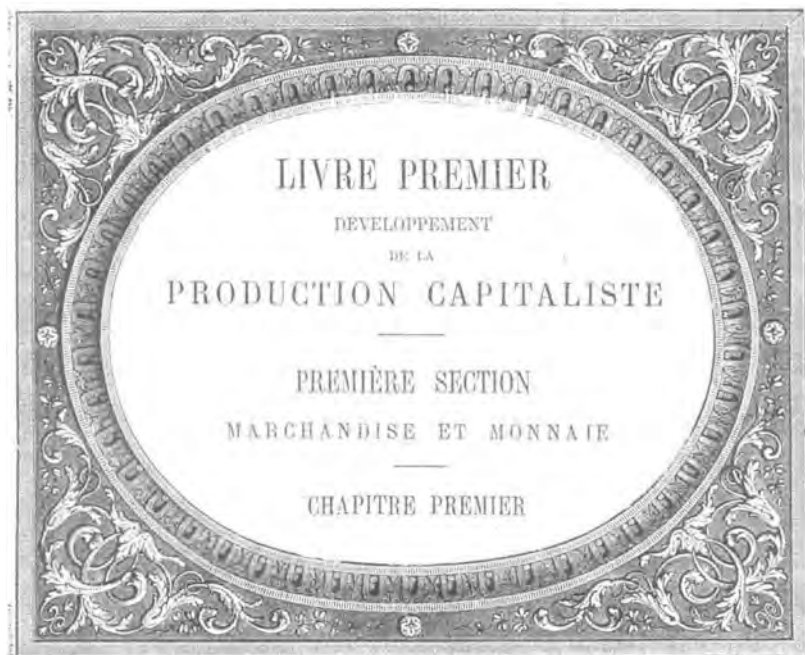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多种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同时发现物的多种用途,是历史的事情。⁽³⁾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的这些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⁴⁾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模糊而不确定的东西。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赋予商品体以这种性质的,不是人为了取得它的有用性质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在谈到使用价值时,总是指一定的量而言,如一打表,一米布,一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⁵⁾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的物质。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3) “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用语),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样的性质,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同上,第6页)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在通过它发现了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

(4) “物的自然价值产生于它能满足需要,或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约翰·洛克:《略论降低利息的后果》(1691年)。在17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 worth 表示使用价值,用 value 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耳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曼语源的词表示被反映的东西。

(5)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推托不知道法律”。——按照经济法的拟制¹⁴,每个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



LA MARCHANDISE

I

Les deux facteurs de la marchandise : Valeur d'usage et valeur d'échange ou valeur proprement dite
(Substance de la valeur, Grandeur de la valeur)

La richesse des sociétés dans lesquelles règne le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s'annonce comme une « immense accumulation de marchandises ¹. » L'analyse de la marchandise, forme élémentaire de cette richesse, sera par conséquent le point de départ de nos recherches.

La marchandise est d'abord un objet extérieur, une chose qui par ses propriétés satisfait des besoins humains de n'importe quelle espèce. Que ces besoins aient pour origine l'estomac ou la fantaisie, leur nature ne change rien à l'affaire ². Il ne s'agit pas non plus ici de savoir comment ces besoins sont satisfaits, soit immédiatement, si l'objet est un

moyen de subsistance, soit par une voie détournée, si c'est un moyen de production.

Chaque chose utile, comme le fer, le papier, etc.,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sous un double point de vue, celui de la qualité et celui de la quantité. Chacune est un ensemble de propriétés diverses et peut par conséquent être utile par différents côtés. Découvrir ces côtés divers et en même temps les divers usages des choses est une œuvre de l'histoire ³. Telle est la découverte de mesures sociales pour la quantité des choses utiles. La diversité de ces mesures des marchandises a pour origine en partie la nature variée des objets à mesurer, en partie la convention.

L'utilité d'une chose fait de cette chose une va-

1. Karl Marx : «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 Berlin, 1849, p. 4.

2. « La désir implique le besoin ; c'est l'appétit de l'esprit, lequel lui est aussi naturel que la faim l'est au corps. C'est de là que la plupart des choses tirent leur valeur. » Nicholas Barbon : « A Discourse on coinage the new money lighter, in answer to Mr. Locke's considerations, etc. » London, 1696, p. 2 et 3.

3. « Les choses ont une vertu intrinsèque (virtue), telle est chez Barbon la désignation spécifique pour valeur d'usage qui en tout lieu ont la même qualité, comme l'aimant par exemple attire le fer (l. c. p. 16). La propriété qu'a l'aimant d'attirer le fer ne devient utile que lorsque par son moyen on est découvert la polarité magnétique. »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量的关系,表现为不同种使用价值彼此相交换的比例⁽⁶⁾,即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的关系。因此,交换价值好像是一种任意的、纯粹相对的东西;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经院学派所说的形容词的矛盾^①。⁽⁷⁾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某种特殊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但是,它的交换价值,无论采用何种表现方式,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不变的。因此,它必定有一种与这些不同的表现相区别的内容。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公斤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公斤铁里面,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二者中的每一个作为交换价值,都必定能不依赖另一个而化为第三种东西。

(6) “价值就是一物和另一物、一定量的这种产品和一定量的别种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889页)

(7)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具有内在的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6页);或者像巴特勒所说:

“物的价值

正好和它会换来的东西相等。”¹⁵

① 形容词的矛盾的原文是“*contradictio in adjecto*”,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矛盾。——编者注

用一个初级几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测量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对它们来说是共同的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某种天然属性,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属性等等。商品的天然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但是,另一方面很清楚,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时被抽象掉了,而一切商品交换关系的特点正是这种抽象。在交换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或者像老巴尔本说的:

“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⁸⁾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

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不知不觉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赋予劳动产品以这种价值的一切物质要素和形式要素也就同时消失了。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或任何一定的生产

(8) “只要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巴尔本补充说,“价值 100 镑的铅或铁与价值 100 镑的银和金具有相等的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 年伦敦版第 7 页和第 53 页)

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特殊的有用性质的消失,包含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这些劳动相互区别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因此,留下来的只是这些劳动的共同性质;这些劳动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化为与人类劳动力耗费的特殊形式无关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中的每一个和另一个都完全相同。它们都具有同一的幽灵般的现实性。所有这些物变成了同一的升华物,同一的无差别的劳动的样品。它们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这个共同的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

因此,在商品交换关系或商品的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某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商品的价值;而使用价值或某种物品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

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创造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做尺度。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商品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是同一的力量的耗费。因此,体现在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只是当做唯一的力量,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单个劳动力,同任何另一个单个劳动力是相同的,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的力量的性质,作为这种力量起作用,就是说,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一定社会的正常的条件下，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劳动所需要的时间。在英国使用蒸汽织布机¹⁶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并且只提供以前价值的一半。

可见，只是在一定社会内生产物品所必要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决定该物品的价值量。⁽⁹⁾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做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¹⁰⁾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

显然，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而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纯粹的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八蒲式耳小麦，在相反的场所只表现为四蒲式耳。

(9) “当有用物互相交换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劳动量。”(《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伦敦版第36页)上一世纪的这部值得注意的匿名著作没有注明出版日期。但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出，该书是在乔治二世时代，大约1739年或1740年出版的。

(10) “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893页)

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表层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是值得怀疑的。¹⁷至于金刚石,就更可以这样说了。厄什韦葛说过,到1823年,巴西金刚石矿80年的总产量的价格还赶不上巴西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一年半平均产量的价格,¹⁸虽然前者代表的劳动多得多,从而价值也多得多。如果发现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实现为更大量的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转化为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于砖的价值。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

现在我们知道:价值实体就是劳动;劳动量的尺度就是劳动持续时间。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这就使一个物可以对人有用而不必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例如,空气、天然草地、处女地等等。一个物可以有,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就只是个人的使用价值。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有用物。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白白耗费了,因此不创造价值。

2. 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

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我们看到,一旦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表现为价值本身,那么,这种劳动的一切特点也就消失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明确指出的。⁽¹¹⁾这一点是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我们就拿两种商品如1件上衣和10米麻布来说,假定前者的价值比后者的价值大一倍。所以,如果10米麻布 $=x$,那么1件上衣 $=2x$ 。

上衣是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使用价值。上衣产生于一种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表现为自己产品的有用性或使用价值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两种不同的有用物,同样,生产上衣的裁缝劳动和生产麻布的织工劳动也不相同。如果这些物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从而不是不同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它们就根本不能作为商品来互相对立。上衣不会与上衣交换,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用价值交换。

与各种使用价值的总和相对应的有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社会分工。没有这种分工就没有商品生

(11)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13等页。¹⁹

产,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对社会分工是不可缺少的。在古代印度公社²⁰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因此而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熟悉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由于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而产生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表现为可以互相交换的商品。

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特殊的有用劳动或有特殊目的的生产活动。各种使用价值只有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一切生产者都必定是商人的社会里,作为自由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对上衣来说,无论是裁缝自己穿还是他的顾客穿,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场合,它都是起使用价值的作用。同样,上衣和生产上衣的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因为裁缝劳动成为专门职业,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环节就有所改变。自从人有了穿衣的需要,人已经缝了几千年的衣服,但并没有人因此而成为裁缝。但是,麻布、上衣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旨在使自然物质适合于人类需要的特殊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劳动就它生产使用价值,就它是有用劳动而言,它与一切社会形式无关,是人类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永恒的必然性,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的中介。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即种种商品体,是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下物质,剩下某种天然存在的、完全不依赖人的东西。

人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¹²⁾不仅如此,他在这种单纯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²¹

现在,我们放下作为使用物品的商品,来考察商品价值。

我们曾假定,上衣的价值比麻布大一倍。但这只是量的差别,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要记住的是,假如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米麻布的价值大一倍,那么,20米麻布就等于1件上衣。作为价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实体的物,是同种劳动的客观表现。但缝衣和织布是不同质的劳动。然而在有些社会状态下,同一个人时而是裁缝时而是织工,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劳动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还不是不同的人的固定职能,正如我们的裁缝今天缝上衣和明天缝裤子只是他个人劳动的变化一样。其次,一看就知道,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劳动需求方向的改变,总有一定部分的人类劳动时而采取缝的形式,时而采取织的形式。无论劳动形式的这种变换引起什么

(12) “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自然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观念时发现的唯一要素;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通过金属原子的排列来制造金属,^①也是价值(指使用价值,尽管韦里在这里同重农学派论战时自己也不清楚说的是哪一种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彼得罗·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1771年初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22页)

① 此处的意大利原文是“ovvero alcuni pezzetti di metallo si organizzino a formare una ripetizione”,即“或一些金属片被装配成钟表”。——编者注

样的摩擦,这种变换是必定要发生的。

归根结底,如果把生产活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是人的力量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的,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人类劳动力的运动在不同的生产活动中只是改变形式,它当然必须有一定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仅仅是人类劳动,是一般的人的力量的耗费。正如在市民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¹³⁾,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具有的简单的力量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复杂劳动(熟练劳动)只是简单劳动的乘方或不如说是自乘的简单劳动,因此,一定量的复杂劳动等于更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会按某种比例把它还原为简单劳动的产品,因而它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¹⁴⁾各种劳动化为当做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不知道的情况下由社会确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这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可见,我们在价值分析中应该把各种劳动力当做简单劳动力。

因此,正如在麻布和上衣的价值中,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差别被消除一样,在这些价值所代表的劳动中,劳动的有用形式即缝衣和织布的区别也消失了。既然使用价值麻布和上衣是特殊的生产活动同纱

(13) 参看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250页第190节。

(14) 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这个工作日物化成的商品价值。在我们叙述的这个阶段,工资这个范畴根本还不存在。

和呢绒的结合,而这些物的价值,不过是同种劳动的纯粹的结晶,凝固在这些价值中的劳动,同纱和呢绒也就不再有生产上的关系,而只是表示同样的人的力量的耗费。正是由于织和缝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形成麻布和上衣;但是,它们只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的人类劳动的质才形成麻布和上衣的价值。

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一般的价值,而且是一定量的价值。我们曾假定,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米麻布的价值大一倍。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产后者所要耗费劳动力的时间必须比生产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劳动生产什么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在一定的比例上,一切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

如果生产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不变,上衣的价值量就同上衣的数量一起增加。如果一件上衣代表 x 个工作日,两件上衣就代表 $2x$ 个工作日,依此类推。但是,如果我们假定生产一件上衣的必要劳动的持续时间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那么在前一种场合,一件上衣就具有以前两件上衣的价值,在后一种场合,两件上衣就只有以前一件上衣的价值。虽然在这两种场合,上衣的效用和从前一样,而生产上衣的有用劳动的质也和从前一样。但生产上衣所耗费的劳动量有了变化。

更多的使用价值显然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可能同时下降。这种矛盾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

有用劳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这种生产力的变化从来不会直接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具体的有用劳动,它不再同抽去了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不管劳动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同样的时间内执行职能的同一劳动总是凝固为同一价值。但它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在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在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任何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反之亦然。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即使严格地说在商品中不存在两种劳动,但是,随着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看做它的产品,或者把这个商品的价值看做它的纯客观表现,同一种劳动在商品中就同自身相对立着。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的力量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而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的力量在某种由特殊目的决定的生产形式上的耗费,而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做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的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¹⁵⁾

(15) 为了证明“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现实的尺度”,亚·斯密写道:“劳动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劳动者来说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在他所能具有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和幸福”(《国富论》第1卷第5章)。一方面,亚·斯密在这里(不是在每一处)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价值混为一

现在,价值实体和价值量已经被规定,剩下的事情是要分析价值形式。

3. 价值形式

商品是以铁、麻布、羊毛等等使用价值或商品材料的形式出现的。这不过是它们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同时是两个东西,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只有表现为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才能进入流通。(16)

商品的价值所具有的现实性不同于福斯泰夫的情妇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中连一个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商品的价值

谈,因而他力图证明,等量的劳动总是具有同样的价值。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劳动就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论,确实只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但他把这种耗费又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做正常的生命活动。诚然,他看到的是现代雇佣工人。——我们已经提到的亚·斯密的那位前辈的说法要恰当得多。他说:“某人制造这种必需品用了一个星期……而拿另一种物与他进行交换的人要确切地估计出什么是真正的等值物,最好计算出什么东西会花费自己同样多的劳动时间。这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物上用去的劳动,同另一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另一物上用去的劳动相交换。”(《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第39页)

(16) 少数经济学家,例如赛·贝利,曾力图分析价值形式,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总是把价值形式同价值混为一谈,其次,是因为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性。“对量的支配……构成价值。”(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11页)

只具有纯粹的社会现实性,而它们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能获得这种现实性,那么很明显,这种社会的现实性只能在社会交换中,在商品同商品的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价值最初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的形式。

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特殊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现在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就是要指明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到一目了然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解除和消失。

商品之间只有价值关系,而没有其它关系。显然,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因此,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

A. 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 或 x 量商品 A 值 y 量商品 B。

(20 米麻布 = 1 件上衣, 或 20 米麻布值 1 件上衣。)

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很困难。

(a) 价值表现的两极: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两个不同种的商品 A 和 B, 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 在这

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

相对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联系、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端或两极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20 米麻布=20 米麻布**,这个等式只是说,20 米麻布无非是 20 米麻布,也就是说,无非是一定量的使用价值。因此,麻布的价值只能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即相对地表现出来。因此,这就要求这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另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提供材料。

诚然,**20 米麻布=1 件上衣,或 20 米麻布值 1 件上衣**,这种表现也包含着相反的关系:**1 件上衣=20 米麻布,或 1 件上衣值 20 米麻布**。但是,要相对地表现上衣的价值,我就必须把等式倒过来,而一旦我这样做,麻布就代替它成为等价物了。可见,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不能同时具有这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

(b) 相对价值形式

(1) 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包含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首先必须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人们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定

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的物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的物只有在那时才具有同一的名称，并成为可通约的。

不论 20 米麻布 = 1 件上衣，或 = 20 件上衣，或 = x 件上衣，也就是说，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是包含这样的意思：上衣和麻布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麻布 = 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

但是，等同的质即同一的本质由此已经得到证实的这两个商品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这里，只有麻布的价值得到表现。是怎样表现的呢？是通过把另一种不同的商品上衣，也就是说，一种能代替它或者可以同它相交换的物当做它的等价物。首先很清楚，上衣只是作为价值存在的形式进入这个关系，因为它只有表现价值，才能在另一个商品面前充当价值。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价值在这里显示出来了，或得到了不同的表现，事实上，如果麻布本身不是价值，上衣能够和麻布相等或成为它的等价物吗？

我们来借用一个化学上的类比。丁酸同甲酸丙酯是外表上和物理、化学性质上不同的物体。但它们包含着同样的元素——碳、氢、氧。而且，它们包含的这些元素的比例相同即 $C_4H_8O_2$ 。现在，假如把甲酸丙酯看做与丁酸相等，或者说使甲酸丙酯成为等价物，那么，在这个关系中，甲酸丙酯只是 $C_4H_8O_2$ 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甲酸丙酯和丁酸共有的实体的存在形式。可见，甲酸丙酯充当丁酸的等价物的等式是把丁酸的实体表现为和它的物体形态完全不同的某种东西的比较笨拙的方式。

如果我们说，一切商品作为价值只是结晶的人类劳动，那么，我们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但是，它们仍然只具有唯一的形

式,即有用物的自然形式。在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这时起,它的价值性质就显露出来并表现为决定它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的固有的属性。

如果把上衣当做麻布的等价物,那么,前者包含的劳动就被看做与后者包含的劳动相等。固然,缝与织不同。但是,把缝看做与织相等,实际上就是把缝化为它与织确实共有的东西,化为它的人类劳动的性质。这就是以间接的方式表明,织就它织出价值而论,和缝衣毫无区别,也就是说,是抽象人类劳动。因此,这个等式表现了构成麻布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

然而,只把构成麻布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表现出来,是不够的。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只是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这样,表现麻布价值所必需的条件就好像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应该把它表现为抽象人类劳动的纯粹的凝结,因为商品作为价值没有其他的现实性。另一方面这种凝结必须具有和麻布本身明显不同的物的形式,而这种凝结既属于麻布,又是麻布和另一个商品所共有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确实看到,上衣一旦被当做等价物,就不再需要身份证来证明它的价值性质了。在这种作用中它自身的存在形式变成了价值的存在形式;然而,上衣,作为商品体的上衣,只是使用价值;一件上衣同任何一块麻布一样,不表现价值。这只是证明,上衣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比在这种关系之外,多一层意义;正像许多穿着镶有饰带的衣服的大人物一旦去掉饰带,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一样。

在上衣的生产上,人的力量的确是以特殊的形式被耗费的。因此,上衣中积累了人类劳动。从这方面看,上衣是价值承担者,虽然

上衣的这种性质无论把它磨得多旧也看不出来。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没有别的意思,即使上衣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充满价值的灵魂。这是事情的纯理论方面。事实上,如果价值不同时采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就不能在它的外部关系中表示价值。例如,如果在 B 看来,陛下不具有 A 的仪表, B 就不会把 A 当做陛下。大概就是这个原因,随着国王的每次更换,陛下总要改变容貌、头发和其他许多东西。

可见,使上衣成为麻布的等价物的关系把上衣形式变成了麻布的价值形式或把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上衣的使用价值上,作为使用价值,麻布是在感觉上与上衣不同的物;作为价值,它却是与上衣等同的东西,因而看起来就像上衣,上衣与麻布的等价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它的价值属性通过它和上衣相等表现出来,正像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²²相似表现出来一样。

我们看到,一当麻布与别的商品即上衣交往时,商品价值的分析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就由麻布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为了说明它的价值是具有抽象属性的人类劳动的产物,它就说,上衣只要与它相等,从而是价值,就和麻布一样是由同一劳动构成的。为了说明它的高尚的价值现实性不同于它的浆硬的纤维状物体,它就说,价值看起来像上衣,因此它自己作为价值物,就同上衣相像,正如两个鸡蛋相像一样。顺便指出,除希伯来语以外,商品语言中也还有其他许多确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达商品 B 同商品 A 相等是商品 A 自己的价值表现,德文“Wertsein”[价值,价值存在]就不如罗曼语的动词 *valere, valer* 以及法语的 *valoir* [值] 表达得确切。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²³

可见,通过价值关系,商品 B 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 A 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 B 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 A 的价值的镜子。⁽¹⁷⁾在商品 B 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 A 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

(2) 相对价值的量的规定性

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包含着一定量劳动的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 15 蒲式耳小麦、100 磅咖啡等等。因而,价值形式不只是一要表现价值一般,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因此,在商品 A 和商品 B 的价值关系中,商品 B 不仅从质的角度被看做同商品 A 相等,而且一定量的商品 B 与既定量的商品 A 相等。

20 米麻布=1 件上衣,或 20 米麻布值 1 件上衣这一等式的前提是:这两个商品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用同样的时间生产出来;但是,这个时间对于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随着生产它们的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这种变化对价值量的相对表现的影响。

1. 麻布的价值起了变化,上衣的价值不变⁽¹⁸⁾。——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种植亚麻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增加一倍,那么麻布的价值也就增大一倍。这时不是 20 米麻布=1 件上衣,而是 20 米麻布=2 件上衣,因为现在 1 件上衣包含的劳动少了一半。相反地,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时间由于织机改良而减少一半,那么,麻布

(17) 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认为自我不需要任何东西就可以确证,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和认识自己的。因此,对他说来,这整个的另一个人就是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

(18) 价值一词在这里像前面好几处地方一样用来指价值量。

的价值也就以同样的比例减少。这时,20米麻布 $=\frac{1}{2}$ 件上衣。可见,在商品B的价值不变时,商品A的相对价值即它表现在商品B上的价值的增减,与商品A的价值成正比。

II. 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时间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米麻布 $=1$ 件上衣,而是20米麻布 $=\frac{1}{2}$ 件上衣。相反地,如果上衣的价值减少一半,那么,20米麻布 $=2$ 件上衣。因此,在商品A的价值不变时,它的相对的、表现在商品B上的价值的增减,与商品B的价值变化成反比。

如果我们把I、II类的各种情形比较一下,那么很明显,相对价值量的同一变化可以由完全相反的原因造成。所以,20米麻布 $=1$ 件上衣变为:20米麻布 $=2$ 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增加一倍,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减少一半;20米麻布 $=\frac{1}{2}$ 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减少一半,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增加一倍。

III. 如果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劳动量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时发生变化呢?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两种商品的价值发生什么变动,依旧是20米麻布 $=1$ 件上衣。只有把它们同价值不变的第三种商品比较,才会发现它们的价值的变化。如果所有商品的价值都按同一比例同时增减,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保持不变。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变化可以由以下这个事实看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现在提供的商品量都比过去多些或少些。

IV. 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它们的价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时发生变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等等。这类情况的一切可能的组合对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影响,用I、II、III类的情况很容易估计出来。

可见,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上。即使商品的价值不变,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不变,最后,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可以同时发生变化,而不需要完全一致。(19)

(c) 等价形式及其特点

我们说过,当商品 A(麻布)通过不同种商品 B(上衣)的使用价值表现自己的价值时,它就使商品 B 取得一种独特的价值形式,即等价形式。商品麻布通过另一种商品即处于自然形式的上衣与它相等的关系显示出它自身的价值性质。因此,麻布是通过另一种商品上衣能与它直接交换来表明它自身具有价值的。

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同一单位即人类劳动的可以互相代替的相同的表现。因此,一种商品一旦具有一种使它表现为价值的形式,它就可以同另一种商品交换。

(19) 在一篇主要是反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到:“你们只要承认在生产 A 的必要劳动始终不变的情况下,A 由于同它相交换的 B 提高而降低,那么,你们的一般价值原理就破产了。——如果承认,因为与 B 相对而言,A 的价值提高,所以与 A 相对而言,B 的价值就降低,那么,李嘉图关于商品的价值总是取决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这个大原理的基础就被他自己破坏了;因为既然 A 的费用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它与同它相交换的 B 相对而言的价值,而且也改变了 B 与 A 的价值相对而言的价值,虽然生产 B 所需要的劳动量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那么,不仅把用于商品的劳动量当做商品价值尺度的学说要破产,而且断言生产费用调节价值的学说也要破产。”(约·布罗德赫斯特《政治经济学》1842 年伦敦版第 11、14 页)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也可以说:看看 $\frac{10}{20}$ 、 $\frac{10}{50}$ 、 $\frac{10}{100}$ 这些分数吧。10 这个数字没有变,但它的比例值由于分母的量的增加却不断下降。可见,整数的大小决定于它所包含的单位数这个大原理破产了。

一种商品作为任何另一种商品的等价物可以直接与之交换,这就是说:它在价值关系中占有的地位使它的自然形式成为另一种商品的价值形式。它不需要具有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形式就可以对另一种商品表现为价值,作为价值发生作用,因而可以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因此,等价形式对于一种商品来说,是它能够与另一种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

如果一种商品例如上衣成了另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等价物,因而获得了能够与麻布直接交换的特殊的属性,那么,这根本没有表明这种交换的比例。既然麻布的价值量已定,这个比例就取决于上衣的价值量。在价值关系中,不管是上衣充当等价物,麻布充当相对价值,还是相反,交换的比例始终不变。这两种商品各自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的相对持续时间来计量的,因而是与价值形式完全无关的规定。

价值处于相对形式上的商品总是表现为价值量,相反,等价物就完全不是这样,它在等式中总是表现为有用物的单纯的量。例如,40米麻布值什么呢?2件上衣。因为上衣这种商品在这里起着等价物的作用,从而为麻布的价值提供价值体,所以,一定量的上衣也就足以表现属于麻布的价值量。因此,两件上衣能够表现40米麻布的价值量,但是两件上衣绝不能表现它们自己的价值量。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始终只表现为某有用物的单纯的量,对这一事实的肤浅了解,使贝利同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后继者都犯了错误。他们在价值表现中看到的只是一种量的关系。但是,一种商品在等价形式中表现为某种物质的单纯的量,这恰恰是因为它的价值量没有得到表现。

现在,等价形式包含的矛盾要求我们深入地研究一下它的特点。

等价形式的第一个特点: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

现形式。

商品的自然形式成为商品的价值形式。但是实际上,对商品 B(上衣、小麦或铁等等)来说,这种转换只有在另一种商品 A(麻布等等)与它发生的价值关系中,而且只有在这种价值关系中才能发生。孤立地看,例如上衣只是有用物即使用价值,和麻布完全一样;它的形式只是某类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但是,因为任何商品都不能作为等价物同自己发生关系,也不能使自己的自然形式成为自己的价值形式,所以它必须把另一商品当做等价物,从而使另一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它的价值形式。

为了使读者能直接弄清楚前面所说的内容,我们可以用衡量作为物质即使用价值的商品的尺度做例子。塔糖是物体,所以是重的,因而有重量;但是我们单从外表上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出塔糖的重量。现在我们拿一些不同的已知重量的铁块来。铁的物质形式,就其自身来说,同塔糖的物质形式一样,不是重的表现形式。要表现塔糖是重的,我们就要使它和铁发生重量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铁充当一种只代表重而不代表别的东西的物体。因此,被用来计量糖的重量的铁的量,对糖这种物质来说,只是一种表现重的形式。铁只是在糖或其他任何要测定重量的物体从这一角度同它发生关系的时候,才起这种作用。如果两种物都没有重,它们就不能发生这种关系,因此一种物就不能成为另一种物的重的表现。如果把二者放在天平上,我们就会在实际上看到,当做有重的物,它们是相同的,因而在一定的比例上也具有同样的重量。铁这个物体作为重量尺度,对于塔糖来说,只代表重,同样,在我们的价值表现中,上衣这个物体对于麻布来说,也只代表价值。

但是,类比只能到此为止。在塔糖的重量表现中,铁代表两个物

体共有的自然性质，即它们的重，而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商品体上衣代表这两种物的超自然性质，即它们的价值，一种带有纯粹社会印记的性质。

既然相对形式把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价值表现为某种与自己的物体和自己的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表现为与上衣相同的东西，它就说明在这种表现中隐藏着一种社会关系。

等价形式却相反。等价形式恰恰在于：商品体例如上衣这个物本身就表现价值，因而天然就具有价值形式。当然，只是在另一种商品麻布把它当做等价物而和它发生关系时，才是这样。⁽²⁰⁾但是，正如一物的物质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外部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上衣似乎也不是从麻布的价值关系中，而是从自然中获取等价形式，获取能够直接交换的属性，就像它从自然中获取重的属性或保暖的属性一样。从这里就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在这种形式以货币这种完成的形态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个方面。然后，他在暗地里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银，并以一再满足的心情反复列举各种曾经充当过商品等价物的商品，企图以此来消除金银的神秘性质。他没有料到，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如 20 米麻布 = 1 件上衣，就已经包含了等价形式的谜，而他正是应该在这个简单形式中寻求谜的解开。

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

在商品价值的表现中，等价物的物体总是表现为抽象人类劳动

(20) 在另一类想象中，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自认为是他的臣民并以此作为他们行动的依据。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

的物化；又总是某种特殊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的产品。因此，这种具体劳动在这里只是用来表现抽象劳动，例如，如果上衣只是一种抽象劳动的实现，那么，在上衣内实现的裁缝的劳动就只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实现形式。在人们通过上衣表现麻布的价值时，裁缝劳动的有用性不在于造了上衣，或者按照德国谚语的说法造了人，而在于造了一种可以使人看到价值的物体，即与实现在麻布价值内的劳动毫无区别的那种劳动的样品。要成为这样一面反映价值的镜子，裁缝劳动本身就必须只是反映人类劳动的这种属性。

织布和缝衣这两种生产活动形式都需要耗费人的力量。因此，二者都具有成为人类劳动的共同属性，而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在价值的生产上，就可以只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并不神秘；但是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上事情却反过来了。例如，为了表明织不是作为织，而是作为一般人类劳动形成麻布的价值，我们就要把制造上衣即麻布的等价物的另一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与织相对立。因此，裁缝劳动就变成了它自己的抽象性质的简单表现。

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既然生产等价物的具体劳动，在我们的例子中是裁缝的劳动，只是当做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它就具有与别种劳动即麻布中包含的劳动等同的形式，因而，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变成了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正因为这样，它才实现在一种能与别种商品直接交换的产品上。

如果我们回顾下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研究过的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点就会更容易了解。这位思想家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以及其他许多形式：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首先,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即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别的某种商品来表现的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

“5 张床=1 间屋”“无异于”:

“5 张床=若干货币”。

其次,他看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本身,要求屋必须从质的角度来看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比较。他说:“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对价值形式进行分析。他又说:“实际上,这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彼此通约的”,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在质上等同。把这些物等同起来,不能不违反事物的性质;“把它们等同起来只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²⁴

可见,亚里士多德自己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他的分析,这就是缺乏价值概念。这种等同的“某种东西”,也就是屋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东西,对床来说屋就代表一种等同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类劳动。

但是,亚里士多德不能从商品的价值形式看出,一切劳动在这里都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而是等同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

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生产者和商品交换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他的天才。只是他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状态,使他不能发现这种关系的实际内容。

(d) 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

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包含在它与任何一个不同种商品的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商品 A 的价值,通过商品 B 能与 A 直接交换的属性而在质上得到表现,通过一定量的 B 随时可以与既定量的 A 相交换而在量上得到表现。换句话说,一个商品的价值就是通过它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得到表现的。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如果孤立地考察它,它就绝没有这种形式。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原来的说法就没有害处,而只有简便的好处。

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通过交换关系被表现出来的方式产生。但是,这正是重商主义者和他们的现代狂热鼓吹者费里埃、加尼耳之流⁽²¹⁾的错觉²⁵,也是他们的反对者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巴师

(21) 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察)《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

夏之流的错觉²⁶。重商主义者强调价值表现的质的方面,从而强调在货币形式上明确实现的商品等价形式,相反地,必须以任何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则专门强调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价值和价值量只存在于它们的由交换关系引起的表现中,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只存在于每日行情表中。苏格兰人麦克劳德,由于他的职责是用尽可能博学的外衣来粉饰伦巴特街——伦敦各大银行所在的大街——的杂乱的经济偏见,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义者和开明的自由贸易贩子之间的一个成功的综合²⁷。

更仔细地考察一下 A 在 B 中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一关系中商品 A 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 B 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态。这样,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 A 只是直接当做使用价值,而表现价值的 B 则相反,它只是直接当做交换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对立,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

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但是,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只是一定的时代,也就是生产使用物品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这些物固有的性质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普遍转化为商品。

一旦劳动产品的价值取得与它的自然形式相对立的交换价值形式,从而表现为包含这种对立的统一体,它就取得了商品形式。由此可见,商品价值采取的简单形式也就是劳动产品表现为商品的最初的形式,因此,商品形式的发展也是同价值形式的发展一

致的。

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这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达到价格形式。

实际上,简单形式只是使一种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并使这种商品同任何另一种商品发生交换关系,而不是表现它同一切商品的质的等同和量的比例。只要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在这种简单形式中,另一种商品就获得了简单等价形式。所以,例如在麻布的相对价值表现中,上衣只是对麻布这一种商品来说,具有等价形式,即表明它能直接交换的形式。

然而简单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诚然,简单价值形式只是把商品 A 的价值表现在一个别种商品上。但是这后一个商品完全可以是任意一种商品,上衣、铁或小麦等等。因此,随着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发生种种不同的价值关系,这种商品的价值也就有种种不同的表现。这样,商品的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可以任意延长的简单表现的系列。

B.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z 量商品 A = u 量商品 B, 或 = v 量商品 C, 或 = x 量商品 E, 或 = 其他

20 米麻布 = 1 件上衣, 或 = 10 磅茶叶, 或 = 40 磅咖啡, 或 = 2 盎司金, 或 = $\frac{1}{2}$ 吨铁, 或 = 其他

(a)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

现在,一个商品例如麻布的价值表现在其他无数的元素上。麻

布价值反映在每一个其他的商品体中,就像反映在一面镜子中一样。(22)

其他任何一种劳动,不管它具有怎样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缝、播种、开采铁或金等等,现在都与凝固在麻布价值中,从而表现出它的人类劳动性质的劳动等同。总和的相对价值形式使一种商品和一切商品发生社会关系。同时,商品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表明,商品价值无差别地获得了使用价值的一切特殊形式。

在第一种形式即 20 米麻布=1 件上衣中,这两个商品能以一定的量的比例相交换,可能是偶然的事情。

相反地,在第二种形式中,这种外表所隐藏的东西马上就显露出来了。麻布的价值无论是表现在上衣、咖啡、铁上,还是表现在属于极其不同的交换者的无数商品上,总是不变的。显然,不是交换调节商品的价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价值量调节商品的交换比例。

(22) 因此,如果麻布的价值用上衣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上衣价值,如果麻布的价值用谷物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谷物价值,依此类推。每一个这种表现都意味着,在这些不同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的是麻布的价值。

“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示该商品的交换关系,所以根据它用来比较的商品,我们可以说它的谷物价值、上衣价值;因此,有千万种价值,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它们都同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 年伦敦版第 39 页)这部在英国曾经轰动一时的匿名著作的作者赛·贝利以为,只要这样指出同一商品价值具有种种不同的相对表现,就消除了一切绝对的价值概念。虽然他眼光短浅,但有时却揭露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李嘉图学派²⁸例如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攻击贝利时流露的愤激情绪,就证明了这一点。

(b) 特殊等价形式

每一种商品,上衣、小麦、茶叶、铁等等,都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充当等价物。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自然形式,现在都成为一个特殊等价形式,与其他许多特殊等价形式并列。同样,种种不同的商品体中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有用劳动,现在只是纯粹的人类劳动的同样多种的特殊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

(c)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首先,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项的系列永无止境。每当一种新的商品提供一种新的表现材料时,以每一次价值比较作为一个环节的锁链就会延长。此外,像必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如果推广这种形式,把它用于任何一种商品,那么,最后就可以得到和商品同样多种的、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的缺点反映在与它相适应的等价形式中。因为每一个商品的自然形式在这里都是一个特殊的等价形式,与无数别的特殊等价形式并列,所以只存在着不完全的等价形式,其中每一个都排斥另一个。同样,每个等价物中包含的有用的、具体的劳动,都只是人类劳动的特殊的形式,也就是说,人类劳动的不充分的表现。诚然,这种劳动在这些特殊形式的总和中,获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总和的表现形式。但是这里还缺少形式和表现的统一性。

总和的或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只是由简单的相对表现的总和,或第一种形式的等式的总和构成,例如:

20 米麻布 = 1 件上衣,

20 米麻布 = 10 磅茶叶,等等。

但是每一个这样的等式倒转过来也包含着一个同一的等式：

1 件上衣 = 20 米麻布，

10 磅茶叶 = 20 米麻布，等等。

事实上，如果麻布所有者把麻布同其他许多商品交换，从而把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同样多种的项上，那么，其他商品的所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们的商品同麻布交换，从而把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唯一的、同一个项即麻布上。——因此，把 20 米麻布 = 1 件上衣，或 = 10 磅茶叶，或 = 其他等等这个系列倒转过来，也就是说，把不言明地已经包含在这个系列中的相反关系表示出来，我们就得到：

C. 一般价值形式

$$\begin{array}{l}
 1 \text{ 件上衣} = \\
 10 \text{ 磅茶叶} = \\
 40 \text{ 磅咖啡} = \\
 2 \text{ 盎司金} = \\
 \frac{1}{2} \text{ 吨铁} = \\
 x \text{ 量商品 A} = \\
 \text{等等}
 \end{array}
 \left. \vphantom{\begin{array}{l} 1 \text{ 件上衣} \\ 10 \text{ 磅茶叶} \\ 40 \text{ 磅咖啡} \\ 2 \text{ 盎司金} \\ \frac{1}{2} \text{ 吨铁} \\ x \text{ 量商品 A} \\ \text{等等} \end{array}} \right\} 20 \text{ 米麻布}$$

(a) 价值形式的性质的变化

现在，商品价值的表现：1. 是简单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唯一的商品上；2. 是统一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同一的商品上。它们的价值形式是简单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

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二者都只是使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为

一种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或物质不同的东西。第一种形式提供的等式是：1 件上衣 = 20 米麻布，10 磅茶叶 = $\frac{1}{2}$ 吨铁，等等。上衣的价值表现为与麻布等同，茶叶的价值表现为与铁等同，等等；但是上衣和茶叶各自的这种价值表现是不相同的，正如麻布和铁不相同一样。很明显，这种形式实际上只是在原始时代，也就是在劳动产品只是通过偶然的、个别的交换而转化为商品的时代才出现。

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更完全地表现了一种商品例如上衣的价值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的区别。因为上衣的价值现在是在一切可能的形式上与它的自然形式相对立，上衣的价值现在与麻布等同，与茶叶等同，与铁等同，与一切东西等同，只是不与上衣等同。另一方面，这种形式使商品的任何共同的价值表现都成为不可能，因为在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其他一切商品充当它的等价物，因而不能表现自身的价值。这种扩大的价值形式，在现实中是在某种劳动产品例如牲畜不再是偶然地而已经按照习惯同其他不同的商品交换的时候，才出现的。

相反地，在一般的相对价值表现中，每一种商品，上衣、咖啡、铁等等，都具有一种唯一的、同一的价值形式，例如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麻布形式。每一种商品的价值由于和麻布相似，现在不仅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相区别，而且与其他一切使用价值相区别，正因为这样才表现为一切商品共有的、无差别的性质。这种形式是使商品作为交换价值互相对立从而使商品彼此间作为价值发生关系的最早的形式。

前两种形式表现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或者是通过一个不同种的商品，或者是通过许多种其他商品构成的系列。在每种情况下，使自己取得一个价值形式可以说是每个个别商品的私事，它完成这件事情是不用其他商品帮助的。对它来说，其他商品只是起着被动的

等价物的作用。相反地,一般相对价值形式的产生只是商品总体共同活动的结果。一个商品所以获得一般的价值表现,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同时也用同一个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而每一种新出现的商品都要这样做。而且,很显然,从价值观点来看是单纯社会物的商品,也只能通过它们的一切相互关系的系列才能表现这种社会存在;因而它们的价值形式必须是社会公认的形式。

现在,成为共同的等价物的商品的自然形式,麻布,是价值的正式形式。这样,商品彼此不仅表现为在质上等同,而且还表现为在价值量上有差别。反映在同一面镜子即麻布上的价值量可以互相反映。

例如,10 磅茶叶=20 米麻布,40 磅咖啡=20 米麻布。因此,10 磅茶叶=40 磅咖啡,或者说,一磅咖啡所包含的劳动,只等于一磅茶叶所包含的 $\frac{1}{4}$ 。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给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印上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现在,麻布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因此,它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它的社会形式。织,这种生产麻布的私人劳动,由此也就获得了社会劳动的性质,即与其他一切劳动等同的形式。构成一般价值形式的无数等式,使实现在麻布中的劳动,同包含在依次与它比较的每个商品中的劳动相等,从而使织成为人类劳动的一般表现形式。这样,实现在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不仅消极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使实在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和有用属性消失的抽象;它自身的积极的性质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把一切实在劳动化为它们共有的人类劳动的性质,化为同样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人类的性质或者一般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

(b)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发展关系

等价形式同相对价值形式是同时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必须指出，等价形式的发展只是相对价值形式发展的表现和结果。主动性是从后者产生的。

一个商品的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任何另一个商品成为偶然的等价物。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一个商品的价值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的表现，给其他一切商品印上了种种不同的特殊等价物的形式。最后，一种特殊的商品获得一般等价形式，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使它成为它们的一般相对价值形式的材料。

价值形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两极即相对价值和等价形式之间的对立，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第一种形式， $20 \text{ 米麻布} = 1 \text{ 件上衣}$ 就已经包含着这种对立，但没有使这种对立固定下来。在这个等式中，其中的一个项，麻布，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与它相对立的项，上衣，处于等价形式。如果把这个等式倒过来读，麻布和上衣只不过是改变了地位，但是，等式的形式仍然不变。要在这里把两项的对立固定下来是困难的。

在第二种形式中，一种商品可以完全展开它的相对价值，获得总和的相对价值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与它相对立，处于等价形式。

在这里，不能再颠倒等式的两项，除非完全改变等式的性质，使它从总和的价值形式转化为一般的价值形式。

最后，后面一种形式，即第三种形式，赋予了商品总体以一般的和单一的相对价值表现，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除了一个唯一的例外，它把一切商品都从等价形式中排除了。因此，一个商品即麻布处于

能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都不是处于这种形式。⁽²³⁾

因此,在第三种形式中,商品世界具有社会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只是因为商品世界中的一切商品都从等价形式中或者说从能够直接交换的形式中被排除了。相反,执行一般等价物职能的商品如麻布就不能采取一般相对价值形式,否则它必须自己给自己充当等价物。如果它给自己充当等价物,我们得到的就是 20 米麻布 = 20 米麻布,这是一个既不表现价值也不表现价值量的同义反复。要表现一般等价物的相对价值,我们就必须把第三种形式倒过来读。一般等价物没有任何与其他商品共同的相对形式,它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在其他一切商品的无限的系列上。因此,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第二种形式,现在表现为一般等价物借以表示它自身的价值的特殊形式。

(c) 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

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另一方面,一个商品处于这种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因为它自身被其他一切商品当做等价物排挤出来。从赋予一种特殊的商品以

(23) 从一般的能直接交换的形式绝不可能一眼看出,它是一种在自身包含着对立的两极形式,是同相反的形式即不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分不开的,就像一块磁铁的阳极同阴极分不开一样。因此,设想能够使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就像设想能够同时把一切天主教徒都变成教皇一样。实际上,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和一般等价形式是商品的同一个社会关系的对立的、互为前提而又互相排斥的两极。

商品的这种不能直接交换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做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的现实生产形式的主要缺点之一。为了克服这个障碍,人们做出了许多徒劳的、空想的努力。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²⁹,在蒲鲁东以前,就已经有布雷、格雷等人进行过这种尝试。³⁰

这种排他的性质的时候起,相对形式就获得了固定性,固定在唯一的物品上,并取得了社会的真实性。

由于等价形式同这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在社会中逐渐地合而为一,这种独特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在第二种形式中充当麻布的各种特殊等价物,而在第三种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对价值共同用麻布来表现的各个商品中间,金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因此,我们在第三种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就得到:

D. 货币^①形式⁽²⁴⁾

20 米麻布 =	2 盎司金
1 件上衣 =	
10 磅茶叶 =	
40 磅咖啡 =	
$\frac{1}{2}$ 吨铁 =	
x 量商品 A =	
其他 =	

(24) 把德语“Geld, Geldform”准确地翻译成法语有困难。“forme argent”这个词组可以用于一切商品,但不能用于贵金属。例如,不能说“银(argent)”^①

① 此处原文是 Forme monnaie ou argent。马克思使用了 monnaie 和 argent 这两个词来表示货币,因为在法语中 argent 兼有银和货币的含义。马克思为此加了一个脚注。在本书中,我们将这两个词均译为货币。——编者注

在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第二种形式过渡到第三种形式的时候,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相反,第四种形式除了现在只是金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而外,与第三种形式毫无区别。唯一的进步在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最终地同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

金在其他商品面前充当货币,只是因为它以前在它们面前就充当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过去就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偶然地在个别的交换行为中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与其他等价物并列起特殊等价物的作用。渐渐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旦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才同第三种形式区别开来,或者说,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

一种商品(如麻布)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就是价格形式。因此,麻布的价格形式是:

$$20 \text{ 米麻布} = 2 \text{ 盎司金},$$

如果2盎司金的铸币名称是2镑,那就是:

$$20 \text{ 米麻布} = 2 \text{ 镑}。$$

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充分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也就是说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难。第三种形式化为扩大的价

的货币形式(*forme argent*)”或“金成为货币(*argent*)”,否则,就会使读者产生某些思想混乱。现在,词组“*forme monnaie*”又有另一个缺点,这是因为法语的“*monnaie*”一词通常是指铸币。我们按照不同情况交替使用“*forme monnaie*”和“*forme argent*”,二者含义相同。

值形式即第二种形式，而第二种形式的构成要素是第一种形式：

20 米麻布 = 1 件上衣，或者 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

因此，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²⁵⁾

4.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平凡的、简单的东西。相反，我们的分析却表明，商品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

(25)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成功地从它对商品、特别是对这种商品的价值分析中推导出使商品成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这是它的主要缺点之一。正是它的最优秀的代表，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当做某种无差别的、或与商品本身的性质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因为作为量的价值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现实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现实的生产方式获得了历史的性质，即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如果人们错误地把这种形式看做是一切社会中一切生产的自然的永恒的形式，那么，就必然看不到价值形式，进而看不到商品形式以及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的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的方面。这就说明为什么经济学家在用劳动持续时间作为衡量价值量的尺度这一点上完全一致，而在货币上，也就是说，在一般等价物的固定形式上，他们的意见却各不相同，充满矛盾。在涉及到如银行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于是，我们看到他们无止境地谈论货币定义，反复念叨与此有关的陈词滥调。——我断然指出，我们理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从威廉·配第开始的全部这样的经济学；它和只满足于现象的庸俗经济学相反，力图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全部现实的、内在的生产关系中去，而庸俗经济学则为了自身的需要，为了把极为粗浅的现象庸俗化，一再反复咀嚼前人已经提供的材料，并且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热衷于建立自己的世界即最美好的世界的幻想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的诡辩。就商品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的属性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这个角度来考察,它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的活动改变自然提供的物质,使它们变成有用的东西。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同时既是可感觉的,又是不可感觉的,³¹它不再满足于用脚站在地上;可以说,它在其他商品面前用木脑袋倒立着、醉心于比它自己跳起舞来还要奇怪的狂想。³²

因此,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决定价值的性质。第一,因为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首先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器官、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决定价值量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劳动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消费资料所必要的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文明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²⁶⁾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

可是,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

(26) 在古日耳曼人中,一英亩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英亩又叫做 *Tagewerk* [一日的工作], *Mannewerk* [一人的工作] 等等 (*jurnale* 或 *jurnalis*, *terra jurnalis* 或 *diurnalis*)。而且,在法国的某些地区今天还用“*journal*”作为土地的单位。

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用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之间的体现他们的劳动的社会性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正因为如此,这些产品变成了商品,也就是说,变成了既是可感觉的又是不可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可感觉的形式。必须补充说,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个外界对象射入另一对象即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但是,价值形式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要找到一个比喻,我们就必须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寻找。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这可以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拜物教是同这种生产方式分不开的。

一般说来,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劳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首先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并间接地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作为价值取得等价的单一形式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不同于它们的作为有用物的多种形式的物质存在。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在交换已经相当广泛和重要的时候开始扩大，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这些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生产它们时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满足社会需要，并因而表现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表现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只是由于每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其他一切种类的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也就是说，被看做与它们相等，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彼此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的力量的耗费、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而只有交换才能完成这一还原，使极其不同的劳动产品相互处于同等的条件下。

私人劳动的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以实际交易即产品交换赋予这些劳动的形式，反映在生产者的头脑中。当生产者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作为价值互相对立并发生关系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把这些产品单纯看做隐藏着同种人类劳动的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认为他们的不同产品相等，因此也就确认他们的不同的劳动相等。他们这样做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²⁷⁾。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³³。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象形文字。只是在后来，人们才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自己创造的社

(27) 因此，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221页），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

会产品的秘密。而有用物转化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社会的产物。

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纯粹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使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性质、产品本身的性质的幻象。仅仅对于这种特殊的生产形式即商品生产来说，下述情况才是合理的：极其不同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就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这种独特的社会性质采取一种客体的形式，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形式，这一事实对受商品生产的机制和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价值性质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不变的和自然的，就像空气的气态在空气的化学元素发现以前或以后没有变化一样。

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们在交换中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就是说，产品在他们之间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种比例由于习惯而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似乎这些物具有按一定比例进行交换的属性，正如化学物质会按固定的比例化合一样。

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在它们确定为价值量时才表现出来的。这些价值量不以生产者的意志和设想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因此，在这些生产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真理：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错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比例尺度。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起决定作用，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会使人感到它的存在

一样。⁽²⁸⁾因此,价值量由劳动的持续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表明,价值量并不像表面上可以看到的那样是偶然决定的,但是,这一发现并没有消除那种把这个量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劳动产品本身之间的量的关系的形式。

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已经决定着商品流通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在的含义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是完全不变的)以前,就具有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商品价值的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已经获得的固定的形式,商品的货币形式,只是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小麦、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做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虚假和荒唐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金或银(这都是一回事)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思维形式,因为它们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的

(28)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不过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03页,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

生产形式,我们就会看到,在当前时期使劳动产品模糊不清的一切神秘性都立即消失了。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²⁹⁾,那么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

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制家具,做工具,驯动物,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以及其他类似的琐事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做消除疲劳的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也就是说,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分配自己从事各种工作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笔和墨水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把他每天的全部活动记录下来。他的财产清册里详细地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不同的劳动方式,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是如此简单明了,连博德里亚尔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

(29) 李嘉图本人也有他的鲁滨逊故事³⁴。在他看来,原始的猎人和原始的渔夫是按照鱼和野味的价值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交换鱼和野味的商人。在这里他犯了奇特的时代错误,他竟让猎人和渔夫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³⁵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³⁶。

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其他一切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而正因为社会建立在人身依附的基础上，所以一切社会关系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同的劳动及其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以劳役、实物税和实物贡赋的形式出现。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的共性，它的抽象性质——也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徭役劳动者都无须请教像亚当·斯密那样的人就清楚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人们在这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他们各自的劳动中的社会关系清楚地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的社会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自然形式。⁽³⁰⁾ 这里有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牲畜、粮食、麻

(30) 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公有制的原始形式是斯拉夫人特有的形式，或者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深入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就会证明，从这些形式中怎样产生出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人的私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³⁷

布、亚麻、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劳动的不同产品，而不是互相交换的商品。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织、缝等等，一开始就具有社会职能的形式，因为它们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像商品生产一样，有它自己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每个成员的劳动持续时间，是由随季节而改变的自然条件以及年龄性别上的差异来调节的。在这里，用劳动时间来计量个人劳动力的耗费，直接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质，因为个人劳动力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发挥作用的。

最后，让我们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同一的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我们关于鲁滨逊的劳动所谈到的一切，在这里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专有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联合劳动者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物。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仍然是社会的；但另一部分用于消费，因此必须在所有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和劳动者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为了把这种情况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劳动者得到的份额同他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在社会中的分配，精确地调节着各种职能同各种需要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计量每个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所占的份额，同时也计量每个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消费部分中所占的份额。在这里，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对他们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有用物品的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对于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因而生产者之间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于比较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并

在这种物的外壳下把他们的私人劳动作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加以比较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它的资产阶级的类型,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补充。在古亚细亚的,一般说来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³⁸下,产品转化为商品,只起从属的作用,但是随着共同体接近于解体,这种作用越来越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³⁹,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有机体在生产方面比资产阶级社会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可以说历史尚未割断把他同原始部落的天然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脐带——尚未成熟为基础,或者以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条件为基础。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是这些古老的社会有机体的特征,因而也给整个物质生活领域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狭隘性,生产力的这一低级发展阶段观念地反映在古代各民族的宗教中。总之,只有当劳动条件和实际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⁴⁰。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社会生活只有当它一旦表现为自由联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时,它才会把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在社会上有一系列的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只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的产物。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³¹⁾(虽然分析不充

(31) 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揭示了价值的真正内容,他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如何进行自己的分析的例证。他说:“既然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准确的。”(斯帕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

分),但它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

第2卷第267页)富兰克林认为,物具有价值就像物体具有重量一样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他看来,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能最准确地估计这一价值。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既然他认为“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准确的”,他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否则,他就应该说:因为长靴或鞋子同桌子的交换只不过是制鞋业和细木制造业的交换,所以,用细木工的劳动可以最精确地估计长靴的价值!由于他一般地使用劳动这个词,他就抽象掉了不同劳动的有用性质和具体形式。

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人们将在本书第三册和第四册中看到。⁴¹至于价值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明确而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作了这种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质的方面,有时从量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同样也很清楚,所有这些财富只是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第4、5部分1826年巴黎版第35、36页)我们只指出,李嘉图赋予德斯杜特的话以更深刻的思想。一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例如劳动)的价值,以便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

李嘉图把德斯杜特的话理解为: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经常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因此,最后他不禁愣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

劳动持续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量呢？有一些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它们属于生产及其关系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生产及其关系的社会时期，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却完全同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是自然必然性。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生产以前的社会生产形式，就像教父⁴²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³²⁾，这是丝毫不值得奇怪的。

(32) “经济学家们⁴³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版第113页⁴⁴）最滑稽可笑的是巴师夏，他竟认为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如果人们几百年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社会的物质基础，就像资产阶级经济构成当代社会的基础一样。也许巴师夏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掠夺制度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既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么，像巴师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就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对我的指责。⁴⁵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⁴⁶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个观点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但有一点很清楚：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当时的经济条件表明，为什么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而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例如，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属性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大部分经济学家产生了幻觉,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们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长时期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只不过是计算在某个物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方式,它就例如像汇率一样不包含物质要素。

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产品所具有的最普遍、最简单的经济形式是商品形式,所有的人都很熟悉这种形式,谁也没有从中看出什么诡诈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他比较复杂的经济形式。例如,重商主义体系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货币形式赋予贵金属的拜物教性质中来的。而大力夸耀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不倦地重复对重商主义拜物教的乏味的嘲笑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不也同样受到了假象的欺骗吗?它的头一个教条不就是:物(例如劳动工具)按其本性是资本,如果要想揭示它们的纯社会性质,那就是犯了违犯自然罪。最后,在许多方面非常卓越的重农学派,不也是认为地租不是从人那里取走的贡赋,相反,是自然本身给予所有者的礼物吗?但是,我们不想涉及以后的问题,仅仅再举一个关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

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很感兴趣;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物,对使用价值毫不计较。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彼此之间作为买卖的物所发生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是相互把对方看做交换价值。难道你们不认为经济学家下面所说的是商品内心的话吗?经济学家说:

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另一方面,人人都知道,唐·吉珂德由于相信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而付出了代价。

“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³³⁾“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珍珠或金刚石作为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³⁴⁾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可是那些发现或发明这类化学物质并吹嘘自己看问题深刻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在这里为他们的这种意见作证的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实现。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善良的道勃雷和他对巡丁西可尔的教导⁴⁸: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³⁵⁾(莎士比亚)

(33)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16页。

(34)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1825年伦敦版第165页。⁴⁷

(35)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和赛·贝利责备李嘉图,说他把纯粹相对的交流价值转化为某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珍珠、金刚石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盖的真实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主义者对贝利的答复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任何说明。

第二章

交 换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互相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和管理人，也就是商品占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换句话说，用强力把它拿走。⁽³⁶⁾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的意志也是另一方的意志，每一方通过共同的意志行为，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不过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³⁷⁾在这里，人们之间相互发

(36) 在以虔诚著称的12世纪，商品行列里常常出现一些极妙之物。当时一位法国诗人所列举的朗迪市场⁴⁹上的商品中，除衣料、鞋子、皮革、农具等物以外，还有“淫荡的女人”。

(37) 很多人⁵⁰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产生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们的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即这种生产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们又把这种从现实社会中提取出来的理想当做改造这个社会 and 它的法的支点。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化合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亲和性”和“自然

生关系,只是因为使一定的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他们彼此只是作为他们所占有的商品的代表而存在。而且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在不同情况下扮演的各种角色不过是人们彼此之间保持着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

交换者与他的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对商品来说,每个别的商品只是它本身的价值表现形式。商品生性放荡而且厚颜无耻,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哪怕这个商品生得像马立托奈斯一样丑。商品所缺乏的评价其同类的具体方面的感官,由交换者用他自己的五种和五种以上的感官补足并发展了。商品对交换者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商品对他来说,只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价值的承担者,对别人有用,从而是交换手段。⁽³⁸⁾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其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他的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表现为价值。

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化合,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那么这个人对于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⁴²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

(38) “因为每种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从这两方面看,鞋都是使用价值,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

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被确认是使用价值;因为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也就是说,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来换取另一个具有能够满足他的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交换对于他只是个人的事情。另一方面,他想通过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来使他的商品作为价值实现,而不问他自己的商品对于这另一个商品的占有者是不是有使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社会的行为。但是,同一行为不可能同时对于一切交换者只是个人的行为,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行为。

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对每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每个别人的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特殊等价物,因而他的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但因为一切交换者都这样做,所以没有一种商品是一般等价物,商品的相对价值也就不具有使商品作为价值量互相比较的一般形式。总之,它们并不是作为商品,而只是作为产品或使用价值彼此对立着。

我们的交换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像浮士德那样想的:起初是行动⁵¹。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他们的天然本能只是要证实商品本性所产生的规律。他们只有使他们的商品同任何另一个在它们面前表现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比较,才能使他们的商品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相比较。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个一般等价物只能是社会的活动的结果。因此,一个特殊商品由于其他商品的共同行动而分离出来,被用来表现这些商品各自

的价值。于是这一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为具有社会效力的等价形式。从此,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排挤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这种商品就成为货币。

“他们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权柄授予那只兽。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启示录》⁵²)

货币是在交换中自然形成的结晶,在交换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转化为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使劳动产品越来越具有商品的性质,同时使商品本性中包含着的对立,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也发展起来。交易的需要本身迫使人们赋予这一对立以躯体,要求产生一种可以感觉到的价值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向商品的普遍转化的完成,一种商品向货币的转化也就完成了。⁽³⁹⁾

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价值表现一方面具有简单相对形式,另一方面还不具有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 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 。直接的交换形式是 x 量使用物品 $A = y$ 量使用物品 B 。⁽⁴⁰⁾ 在这里, A 物和 B 物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只是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使用物品一旦在量上超过它的生产者的需要,对于生产者来说就不再

(39) 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点来评价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既想使商品生产永恒化,又想废除“货币和商品的对立”,就是说废除货币本身,因为货币只是存在于这种对立中。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61 页及以下几页。⁵³

(40) 只要不是两种不同的使用物品相交换,而是像在野蛮人中间看到的那样,把一堆混杂的东西当做第三种东西的等价物,那么,连直接的产品交换还处于它的初期阶段。

是使用价值,而在一定情况下,就会作为交换价值来使用。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这种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做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当做独立的人来发生关系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独立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²⁰,还是像秘鲁的印加国⁵⁴,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品。它们交换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的占有者决定把它们互相让渡的意志行为。同时,对别人的使用物品的需要渐渐增多和固定下来。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的事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使用物品是有意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也就是说,它们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交换价值明显地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它们相互交换的比例开始由它们的生产本身来调节。习惯把它们作为价值量固定下来。

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每个商品对于它的占有者来说直接就是交换手段,而对于它的非占有者来说,它只是在对他成为使用价值的情况下才是等价物。因此,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的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随着逐渐进入交换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这种形式就越来越成为必要的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如果不同商品的主人不把他们的不同商品作为价值与同一个第三个商品相交换、相比较,商品占有者就决不能拿自己的物品同其他种种物品相交换、相比较。这第三个商品由于成为其他商品的等价物,就直接取得一般的或社会的等价形式,虽然是在

狭小的范围内。这种一般等价形式同引起这个形式的瞬息间的社会接触一起产生和消失。这种形式迅速地、交替地和这个或那个商品结合在一起。但是,一旦交换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种形式就专门固定在一个特殊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由偶然情况决定的;但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最先表现出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或者固定在本地可以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物品或者更确切地说使用物品上。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和一切所有物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社会接触,因而促使他们进行产品交换。人们过去常常把作为奴隶的人本身当做原始的货币材料,但是从来没有把土地当做这种材料。这种想法只有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才会产生。它出现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而只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即1789年法国革命时期,有人才试图在大范围内,在全国范围内来实现它。⁵⁵

随着交换日益突破纯粹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代表一般人类劳动,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

“银和金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就是银和金”⁽⁴¹⁾,这句话指出了这些金属的自然属性和货币职能之间的一致。⁽⁴²⁾但至此我们只知道货币的一种职能:它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商品价值量

(41)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35页。⁵⁶“贵金属……天然就是货币。”(加利阿尼《货币论》,见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137页)

(42) 详见我的上述著作中《贵金属》一章。⁵⁷

借以取得社会表现的材料。一种物质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质的,才能成为价值的适当的表现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类劳动的具体形象。另一方面,因为价值只是在量上不同,所以货币商品必须只能有纯粹量的差别,必须能够随意分割,又能够把它的各部分合并起来。大家都知道,金和银天然具有这一切属性。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用做奢侈品的原料,可以镶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种由它的独特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

因为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货币在它们面前充当一般商品,而它们在货币面前只代表特殊商品。(43)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形式只是一切种类的商品的价值关系在一种唯一的商品上的反映。因此,只有在那些把商品的完成的形态当出发点然后由此开始分析商品的人看来,“货币本身是商品”才是一种发现。(44)对于交换运动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运动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独特的价值形式。有人由于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曾误认为银和金是纯粹想

(43) “货币是一般商品。”(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1771年初版第16页)

(44) “我们可以统称为贵金属的银和金本身,是价值时涨时落的商品。当重量较小的贵金属可以购买数量较大的本国商品时,贵金属的价值较高。”(《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一个商人著,1695年伦敦版第7页)“银和金,已铸币的或者未铸币的,虽然被用做计量一切物的尺度,但是它们和酒、油、烟、呢绒和布一样,也是商品。”(《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1689年伦敦版第2页)“金和银不能被排除在商品之外。”(《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1677年伦敦版第4页)

象的价值。⁽⁴⁵⁾由于货币在它的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以为货币只是一种单纯符号。

另一方面,这种误解确实使人预感到,在外在物的表面下,货币实际上掩盖着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只有作为生产它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⁴⁶⁾才是价

(45) “金银在成为货币以前,作为金属就具有价值。”(加利阿尼《货币论》,见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洛克说:“由于银具有适于作货币的质,人们就一致同意给银一种想象的价值。”与此相反,罗说:“不同的国家怎能给某物以一种想象的价值……或者说,这种想象的价值怎能保持下去呢?”但是他本人根本不理解这个问题,因为他在另一个地方是这样说的:“银按照它具有的使用价值即它的实际价值进行交换;由于它被采用为货币,又取得一个追加价值。”(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欧·德尔编《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第470页)

(46) “货币是它(商品)的符号。”(韦·德·福尔邦奈《商业学入门》1766年菜顿新版第2卷第143页)“货币作为符号被商品吸引。”(同上,第155页)“货币是某种物的符号,并且代表这种物。”(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货币不是单纯的符号,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它不代表价值,它是价值的等价物。”(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910页)法学家早在经济学家⁴³以前,就宣扬货币是单纯符号、贵金属价值纯属想象的概念。这些法学家是王权的仆从和献媚者,他们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一直以罗马帝国的传统和《学说汇纂》⁵⁸中关于货币作用的概念,作为国王伪造铸币的权的依据。这些法学家的优秀学生,菲力浦六世(瓦卢瓦的)⁵⁹在1346年的一项法令中说:“无论何人不得亦不应怀疑,唯朕有权……处理铸币事宜,决定铸币之制造、品位与储存,颁布有关铸币之命令,并遵照符合朕意之办法及价格将铸币付诸流通。”货币价值由皇帝下令规定,是罗马法的定则。当时明文禁止把货币当做商品。“任何人均不得购买货币,货币为公共使用而设,不应成为商品。”⁶⁰对于这个问题,乔·弗·帕尼尼《试论物品的合理价格。1751年》(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文集·现代部分》第2卷)作了很好的说明。特别在这一著作的第二部分,帕尼尼同法学家们展开了论战。

值。但是，当人们只把物在特殊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特殊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所具有的物的性质看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使这些性质具有了被所谓人们的普遍同意所认可的约定俗成的虚构的意义。这是 18 世纪流行的说明方法；人们既不能解释社会关系的谜一般的形态的起源，也不能解释这些形态的发展，于是他们避开这些形态，声称这些形态是人类的发明，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前面已经指出，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并没有表示出该商品的价值总量。即使我们知道金是货币，也就是说它可以同一切商品交换，我们并不因此就知道例如 10 磅金的价值是多少。货币同任何商品一样，只能相对地通过别的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量。它本身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且是通过每个要求相同的劳动持续时间的别种商品的量表现出来的。⁽⁴⁷⁾ 金的相对价值量是在金的产地通过最初的交换固定的。当它作为货币进入流通时，它的价值已经是既定的了。还在 17 世纪最后几年，人们已经知道货币是商品；但是，货币分析仅仅跨出了第一步。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一种商品怎样、为什么成为货币。⁽⁴⁸⁾

(47) “假定有人从秘鲁的银矿开采一盎司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他生产一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么，其中的一个就是另一个的自然价格；假定现在由于开采更富的新矿，获得两盎司银像以前获得一盎司银花费一样多，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在一蒲式耳谷物值 10 先令，而它以前值 5 先令。”（威廉·配第《赋税论》1667 年伦敦版第 31 页）

(48) 罗雪尔教授先生首先教训我们说：“错误的货币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多一些，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少一些。”接着他杂乱无章地开列了一份关于货币性质的著作的目录，从这个书目丝毫也不能了解真实

我们已经看到,在 x 量商品 $A=y$ 量商品 B 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似乎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似乎这种形式是它天然具有的社会属性。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直到它确立起来的时候为止。当一般等价形式专门同一种特殊商品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确立起来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互相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起中介作用的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似乎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它们自己的价值表现并固定在一个与它们并存、在它们之外的商品体中。这些简单的物,即银和金,一从地底下出来,就立即表现为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

的货币学说史。最后他训诫说:“不能否认,大部分现代国民经济学家对于使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那些特点(无非是多一些或少一些吗?)是注意得不够的……就这一点说,加尼耳之流的半重商主义的反动就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了。”(威廉·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207页及以下几页)多一些——少一些——太少——就这一点说——不是完全!多么清楚而又明确思想和语言!而罗雪尔先生还谦逊地把这类教授式的折中主义空谈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的解剖生理学的方法”!不过有一个发现要归功于他,那就是:货币是“一种快意的商品”。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1. 价值尺度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金是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

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全部商品提供一种把它们的价值表现为同名、同质并且在量上可以比较的量的材料。这样,金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正是由于这个职能,金这个等价商品才成为货币。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商品作为价值是物化的劳动,从而它们之间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并把这个独特的商品变成货币,也就是把这个独特的商品变成它们共同的尺度。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价值的内在尺度即劳动持续时间必然采取的形式。⁽⁴⁹⁾

(49) 为什么货币不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以一张纸币代表 x 个劳动小时,这个问题可简单归结为:为什么一旦存在商品生产,劳动产品就必须采取商品形式?或者说,为什么私人劳动不能直接看成是社会劳动,即它自身的对立面。我在别处曾详细地谈到在当前的生产条件下实行“劳动货币”或“劳动券”这种空想。(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61页及以下几页⁶¹)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券”⁶²,同戏票一样,不是货

一个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 x 量商品 $A=y$ 量货币商品，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现在，要用社会公认的形式表现铁的价值，只要有 1 吨铁=2 盎司金这样一个等式就够了。这个等式不需要再成为其他一切商品的等式系列中的一环，因为金这个等价商品已经具有货币的性质。因此，现在商品的一般相对价值形式又重新获得了相对价值的最初的样子，即简单的相对价值形式。

货币商品本身没有价格。货币商品要参加其他一切商品所共有的相对价值形式，就必须充当自己的等价物。相反，第二个形式，即商品价值通过无限的等式系列表现出来的形式，对货币来说却成了它的相对价值的唯一形式。然而，这个系列已经存在于商品的价格中。把一份行情表上的价目倒过来读，就可以看出货币的价值量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商品上。

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像不同于商品体或商品的自然形式的一般价值形式一样，是某种观念的东西。铁、麻布、小麦等等的价值虽然看不见，但是存在于这些物的本身中；它们的价值通过它们同金相等，同金发生一种可以说只是存在于商品头脑中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因此，交换者为了向外界表明商品的价格，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借给商品，或者给它们挂上一张纸条。⁽⁵⁰⁾

币。欧文首先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在他那里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欧文既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50) 野蛮人或半野蛮人以另外的方式使用舌头。例如帕里船长在谈到巴芬湾西岸居民的情况时说：“在这种场合（在交换产品时）他们把提供给他们的东西用舌头舔两次，似乎认为这样做过之后就达成了正式协定。”⁶³ 东部爱

既然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仅仅是观念的，所以要表现商品的价值，只需要用观念的金或者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金。

每一个商人都清楚地知道，当他给予商品价值以价格形式或想象的金的形式时，他远没有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金，而为了用金估量数百万的商品价值，他不需要丝毫实在的金。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当做观念的货币来使用。这种情况引起了种种最荒谬的学说。⁽⁵¹⁾但是，尽管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只是观念地执行职能，因而用于这一目的的金只是想象的金，商品的价格仍然完全取决于货币材料。例如，一吨铁所包含的价值，即人类劳动量，是在想象中由耗费等量劳动的货币商品量表现出来的。所以，一吨铁的价值，根据充当价值尺度的是金、银还是铜，表现为完全不同的价格，或者说，通过不同数量的铜、银或金表现出来。因此，如果两个不同的商品，例如金和银，同时充当价值尺度，一切商品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价格表现，即金价格和银价格；只要金和银的价值比例不变，例如保持 1:15，那么这两种价格就可以安然并存。但是，这种价值比例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商品的金价格和银价格之间的比例，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价值尺度的职能同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不

斯基摩人在接受人们卖给他们的物品的时候也总是用舌头舔这些物品。既然在北方把舌头当做占有的器官，那么，在南方把肚子当做积累财富的器官就不足为奇了，卡弗尔人就是按照肥胖程度和肚子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的。这些卡弗尔人真是聪明极了，因为在 1864 年英国官方卫生报告对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人明显地缺乏脂肪⁶⁴表示同情的时候，在同一年，一个叫哈维（不是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的医生靠一种能使资产阶级和贵族消除过剩脂肪的妙方走了运。

(51) 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一节。⁶⁵

相容的。(52)

凡是价格已经确定的商品都表现为这样的形式： a 量商品 $A = x$ 量金； b 量商品 $B = z$ 量金； c 量商品 $C = y$ 量金，等等，在这里， a, b, c 代表商品 A, B, C 的一定量， x, z, y 代表金的一定量。 x, z, y 作为同名量，或者说作为同一个东西即金的不同量，互相比较和互相计量，由此就产生出技术上的必要性，即让它们同一个固定的、确定为计量单位的金量发生关系。这个计量单位本身通过进一步分成等分而发展成为标准。金、银、铜在变成货币以前，在重量计量方面就已经具有这种标准，例如，以磅为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分成盎司等等，又

(52) “在银和金依法同时充当货币即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想把它们当做同一物质看待，总是徒劳的。如果假定同量劳动固定不变地物化在金银的同一比例中，这实际上就是假定银和金是同一物质，而一定量价值较低的金属，即银，是一定量金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分数。从爱德华三世起到乔治二世时期，英国币制史经历了一连串的混乱，其原因是法定的银和金的比价同它们的实际价值的变动不断发生冲突。有时金的估价高了，有时银的估价高了。估价过低的金属退出流通，被熔化和输出。于是两种金属的比价再由法律加以改变，但新的名义价值很快又像旧的那样同实际的比价发生冲突。

现代，由于印度和中国需要银，同银相比，金的价值暂时略微低落，结果在法国大规模地发生了上述现象：银被输出，在流通中被金所取代。1855年、1856年和1857年，输入法国的金比从法国输出的金多了4 158万镑，而从法国输出的银比输入法国的银多了34 704 000镑。在像法国这样一些国家里，两种金属都是法定的价值尺度，两者都被强制流通，于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用银或金来支付，在这里价值增大的金属实际上有贴水，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用估价过高的金属来计量自己的价格，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凡有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同上，第52、53页⁶⁶）

合成英担等等。⁽⁵³⁾因此,在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的名称。

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金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作为一般等价物,它是价值尺度;作为固定的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商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转化为想象的金量;作为价格标准,它用固定的并分成等分的金量计量这些金量。商品通过价值尺度表现它们自己的价值,相反,价格标准只是用一个金量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而不是用一个金量的重量计量另一个金量的价值。对于价格标准来说,只要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为计量单位就够了。在这里,正如在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计量单位的固定性是绝对必要的。因此,计量单位和这种单位的更细的等分越是不变,价格标准就越是能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能。另一方面,金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本身是劳动产品,也就是说,是可变的价值。

首先很明显,金的价值变动丝毫不会改变金执行价格标准的职能。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不同的金量之间的比例总是不变。哪怕金的价值跌落 100%,12 盎司金的价值仍然是 1 盎司金的 12 倍,在价格上问题只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间的比例。另一方面,鉴于 1 盎司金绝不会因为它的价值涨落而改变它的重量,因此它的等分的重量也不会改变,所以,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金作为固定的价格标准总是起同样的作用。

(53) 英国的货币计量单位一盎司金不能分成等分,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的铸币本来只适用银,因此,一盎司银分成的铸币总是一个整数;但是,后来在只适用于银的铸币制度中采用了金,因此,一盎司金铸成的金币就不能是一个整数了。”(麦克拉伦《通货简史》1858 年伦敦版第 16 页)

金的价值变动也不会妨碍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这种变动会同时影响一切商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相互间的价值的相对量不变。⁽⁵⁴⁾

商品用金来估价只是以下面一点为前提:在一定的时代,生产一定量的金要耗费一定量的劳动。至于商品价格的变动,它是由前面阐述的简单相对价值规律来调节的。

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表示商品价值的提高,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表示货币价值的降低。反过来,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表示商品价值的降低,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表示货币价值的提高。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货币价值的提高会引起商品价格的相应的降低,货币价值的降低会引起商品价格的相应的提高。这只适用于价值不变的商品。例如,某些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同时按同一比例提高和降低,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不会改变,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比货币价值增加得慢些或者增加得快些,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的提高或降低的程度就由这些商品的价值变动和货币的价值变动之间的差额来决定。余此类推。

现在我们反过来考察价格形式。

我们看到,金属重量的惯用的标准及其名称和金属重量的更细的等分也充当价格标准。但是,某些历史情况引起了变化,这些情况是:

1. 外国货币流入较不发达的民族,例如在古罗马,金币和银币是作为外国商品流通的。这些外国货币的名称与本地的重量名称是不同的。
2. 财富的增长使比较贵重的金属代替不大贵重的金属行使价值尺度

(54) “银可以不断改变价值,但仍然可以充当价值尺度,就像它完全没有变化一样。”(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9页)

的职能。铜为银所代替,银为金所代替,尽管这个顺序是同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⁶⁷相抵触的。例如,镑原来是真正一磅重的银的货币名称。当金代替银作为价值尺度时,这个名称就依照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可能用来称呼 $\frac{1}{15}$ 磅的金等等。现在,作为货币名称的镑就和作为金的通常重量名称的磅分开了。⁽⁵⁵⁾ 3. 几百年来大大小小的君主不断伪造货币,使铸币原来的重量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名称。⁽⁵⁶⁾

这些历史的进化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的分离成为民族的习惯。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需要社会公认,因此最终就由法律来规定这种货币标准。一定重量的贵金属,如一盎司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法定的教名,如利弗尔、埃巨等等。这种在当时被用做真正的计量单位的等分又分为新的等分,并具有法定的名称,如先令、便士等等。⁽⁵⁷⁾ 一定的金属重量仍旧是金属货币的标准。改变的只是分法和名称。

(55) “那些现今只具有观念的名称的铸币在一切民族中都是最古老的铸币;曾经有一个时期,它们全都是实在的(后一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它们是实在的,所以它们才被用做计算货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53页)

(56) 例如,现在的英镑差不多只有原来重量的 $\frac{1}{4}$,苏格兰镑在1707年合并⁶⁸以前只有原来重量的 $\frac{1}{36}$,法国的利弗尔只有原来重量的 $\frac{1}{74}$,西班牙的马拉维第还不到原来重量的 $\frac{1}{1000}$,葡萄牙的瑞斯所占的比例更是小得多。⁶⁹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在《家常话》中对英国货币计量单位1镑只有 $\frac{1}{4}$ 盎司金感到惊奇,他针对这种情况说:“这是伪造尺度,不是确立标准。”他在货币标准的这种假名上,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看出了文明的伪造之手。

(57) 在不同的国家,价格的法定标准自然是不同的。例如在英国,作为金属重量的盎司分为用金衡制表示的本尼威特、格令和克拉;但是盎司作为货币计量尺度则分为 $3\frac{7}{8}$ 索维林,一索维林分为20先令,一先令分为12便士,因而成色为22开的100个金镑(1200盎司)=4672索维林10先令。

现在,商品在观念上转化成的价格或金量,用金标准的货币名称来表现了。因此,英国人不说1夸特小麦等于1盎司金,而说等于3镑17先令 $10\frac{1}{2}$ 便士。商品用自己的货币名称说明自己值多少,每当需要把一物当做价值,从而用货币形式来确定时,货币就充当计算货币。(58)

一物的名称对于该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由于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金的重量的等分,这些神秘记号中隐藏的含义所引起的困难和混乱就更严重了。(59)另一方面,价值为了同形形色色的商品体区别开来,必然要采用这种不可捉摸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60)

(58) “有人问阿那卡西斯,希腊人为什么要用货币?他回答说,为了计算。”(阿泰纳奥斯《哲人宴》第1部第4册)

(59) 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具有和商品价格相同的名称,并按照这些名称所表示的计量单位例如盎司的等分被铸成货币,因而1盎司金和1吨铁的价值同样都可表现为3镑17先令 $10\frac{1}{2}$ 便士,人们称这些表现为货币价格。于是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想法,以为金可以用它自身来估价,无须同任何其他商品相比较,它和一切其他商品不同,它从国家取得固定的价格。确定一定重量的金的计算货币名称被误认为确定这个重量的价值。⁷⁰英国文献中有许许多多的著作充满了这类误解。海峡彼岸的某些作者受到了同一些错误见解的感染。

(60)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一节(第53页及以下几页⁶⁵)。关于提高或降低“货币价格”的各种幻想,无非是要国家把已经为一定的金银重量规定的法定名称授予较大的重量或较小的重量,也就是说,例如 $\frac{1}{4}$ 盎司的金不是分成20先令,而是分成40先令。如果这种种幻想所抱的目的,不是为了采取一些拙劣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公私债权人,而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奇迹疗法”,那么配第在《货币略论。致哈利法克斯侯爵》(1682年)中,就已经对这些幻想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而他的直接继承人达德利·诺思爵士和约翰·洛克只能冲淡和削弱他的论述,更不用说以后的人了。配第说:

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因此,商品同在它的价格上表现出来的那个货币量等价,不过是同义反复⁽⁶¹⁾,因为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总是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虽然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反过来说,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假定1夸特小麦和2盎司金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而2镑是2盎司金的名称。那么,2镑就是1夸特小麦的价值的货币表现,或者说它的价格。如果现在情况许可把1夸特小麦标价为3镑,或者迫使把1夸特小麦的价格降到1镑,那么,1镑和3镑就是使小麦价值变小或增大的表现,但是1镑和3镑仍然是小麦的价格,因为第一,它们是小麦的货币形式;第二,它们是小麦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在生产条件不变或者劳动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再生产1夸特小麦仍需要耗费同样多的劳动。这一事实既不以小麦生产者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其他商品占有者的意志为转移。因而,价值量表现出一种生产关系,表现着某种商品和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份额之间的内在联系。随着价值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有用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但是,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本身,也可以表现商品的让渡在一定条件下偶然地带来的较大的量或较小的量。因此,在商品价格和它的价值量之间就可能出现偏差,即量的差额,而这种可能性已经包

“如果这样一类公告就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十倍,这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统治者不早发布这样的公告呢!”(同上,第36页)

(61) “否则必须承认,一百万货币的价值大于等值的商品的价值”(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919页),因此也必须承认,“某一价值大于相等的另一价值”。

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这种含糊不清的性质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正是这种形式的优点,因为它使这种形式适合于这样一种生产制度,在这种生产制度下,规则只是通过平均地互相补偿、互相抵消和互相破坏的非规则性的盲目作用而成为规律。

价格形式不仅允许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也就是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掩盖一个绝对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再表现价值。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名誉、良心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出卖,通过赋予它们的价格而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又能掩盖虽然是间接的但却是实在的价值关系。

同相对价值形式本身一样,价格通过下列方式来表现一种商品如一吨铁的价值:一定量的等价物,如一盎司金,能直接与铁交换,但不能反过来,铁不能直接与金交换。

在价格中,也就是在商品的货币名称中,商品同金的等价提前了,但是并没有完成。商品要实际上起交换价值的作用,就必须抛弃自己的自然形体,从只是想象的金转化为实在的金,诚然,商品实现这种变体,同黑格尔的“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⁷¹相比,同螃蟹脱壳相比,同教父圣哲罗姆⁽⁶²⁾解脱原罪相比,是“更为困难的”。

(62) 圣哲罗姆在青年时代很费力地克制物质欲念,因为美女的形象不断地扰乱他的想象。在老年时代,他也很费力地克制精神欲念。例如他说:“我想象处于最高审判者之前。”“你是谁?”“我是一个基督徒。”最高审判者大发雷霆:“你撒谎,你只是一个西塞罗信徒!”⁷²

商品除了有例如铁这种实在的形态以外,还可以在它的价格上有观念的形态或想象的金的形态,但它不能同时既是实在的铁,又是实在的金。要赋予商品以价格,只需要宣布纯粹想象的金属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须为实在的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占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如果铁的占有者向巴黎的某种时髦商品的占有者炫耀说铁的价格已经是货币形式了,后者就会像圣彼得在天堂听了但丁讲述信仰要义之后那样回答说:

Assai bene è trascorsa

D'esta moneta già la lega e'l peso,

Ma dimmi se tu l'hai nella tua borsa.⁽⁶³⁾

价格形式包含着商品为取得货币而让渡的可能性和这种让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金所以充当观念的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已作为货币商品处在市场上。因此,在金的纯粹观念的价值尺度外表下已经隐藏着实在的货币,铿锵作响的硬币。

2. 流通手段

(a) 商品的形态变化

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只有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才能实现。商品的发展使商品表现为二重性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

(63) “这个铸币经过检验,重量成色完全合格。但告诉我,你钱袋里有吗?”⁷³

换价值。这种发展并没有消除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唯一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

交换使商品从把它们当做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做使用价值的人手里。一种有用劳动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的产品。这是社会的物质循环。商品一旦到达它充当使用价值的地方,就从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但是,这种物质循环只有通过商品的一系列的形式变换或形态变化才能完成。我们现在就来考察商品的这种形式变换或形态变化。

理解运动的这种形态学方面比较困难,因为商品的任何形式变换都是通过两种商品的交换实现的。例如,一个商品为了取得它的货币形式而失去其有用形式。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是由于商品同金的交换。两个商品的简单交换,这是很清楚的事实;但对此需要更详细地考察。

金是一极,一切有用商品是对极,双方都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但这种对立的统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现在两极上,商品的有用形式是商品的实在形式,而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是以商品价格通过想象的金观念地表现出来。相反,金的金属的自然形式是金的可以普遍交换的形式,是它的价值形式,而它的使用价值只是观念地表现在充当它的等价物的一系列商品上。可是,当商品同金交换时,它同时就把它的有用形式变成价值形式。而当金同商品交换时,它同样也把自己的价值形式变成有用形式。

现在,在作了这些初步考察之后,让我们回到市场这个舞台上。我们随同任何一个交换者,比如我们的老朋友织麻布者到市场上去。

他的商品即 20 米麻布的价格是规定了的,假定是两镑。他把麻布换成两镑,接着,这个守旧的人又用这两镑换一本价格相等的圣经。麻布——对于他来说只是商品,只是价值承担者——被转让出去,换取了金,而麻布的这种价值形态又被让渡出去,换取了另一种商品圣经,而圣经就作为使用物品来到织布者的家里,使纯朴的灵魂得到安慰。

可见,交换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⁶⁴⁾商品的这两种形态变化,从商品占有者的角度来看,同时是两种行为,一种是卖,把商品换成货币;一种是买,把货币换成商品,这两种行为的统一就是:为买而卖。

这件事情对织麻布者产生的结果是,现在他占有的不是麻布,而是圣经;不是他原来的商品,而是另外一种价值相等而用处不同的商品。他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他的其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他看来,这种卖和买的运动最终不过是一种商品为另一种商品所代替,或者说交换产品。

因此,商品的交换包含着下列的形式变换:

商品—货币—商品

$M-A-M$

从纯粹的物质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导致 $M-M$,即商品换商品,导致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结果一经达到,这种现象也就消失了。

现在我们要分别考察商品必须经历的两个相继的形态变化。

$M-A$ 。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

(64) “赫拉克利特说:……火变成万物,万物又变成火。就像商品变成金和金变成商品一样。”(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222页)⁷⁴

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这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⁷⁵。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商品并不会摔坏,但商品占有者将被剥夺。社会分工使商品占有者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同时又使他的生产能力成为单方面的了。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或一般等价物。然而,这个产品只有转化为货币才能取得这种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口袋里。为了把货币吸引出来,商品首先应当对于买者是使用价值,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创造了自然形成的生产有机体,它的纤维在既是生产者又是交换者的人的背后交织在一起,而且继续交织下去。商品可能是要满足或者甚至引起新的需要的一种新的劳动的产品。一种局部的劳动,昨天还是一种行业的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个整体,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做完成的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尽管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已经成熟。

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竞争的产品所代替。即使某种劳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劳动,明显地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这也绝不能恰好使他的20米麻布使用价值得到了保证。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因而是无用的了。但我们假定他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已经得到了证明,因而商品会把货币吸引出来。但现在要问:它能吸引多少货币呢?当然,答案已经由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数预示了。我们把卖者的缺点、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计算错误撇开,因为这种错误在市场上马上可以得到无情的纠正。假定他生产自己的产品只耗费社会必要时间。因此,商品的价格只

是所有同种商品平均需要的劳动量的货币名称。但是，在我们的织麻布者不知道并且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的情况下，织麻布所采用的旧的方法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昨天生产一米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了；货币所有者会迫不及待地用我们这位朋友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这一点。我们这位朋友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织麻布者。

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耗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体现着白白耗费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米两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全部麻布，这就证明，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社会劳动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一个个别的织布者为生产他个人的产品所用的劳动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一样。这正像一句德国俗语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the course of true love runs never smooth”⁽⁶⁵⁾。社会生产有机体的分散的肢体——*membra disjecta*⁷⁷——产生于分工，不管是考察它的各个肢体的职能本身还是考察这些肢体的比例关系，它总是带有自发的、偶然的印记。所以我们的交换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所造成的关系完全不受他们的意志的支配，从而人与人的互相独立要以物所强加的相互依赖的体系作为必不可少的补充。

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必然使它转化为货币。同时，分工使这种变体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应当从整体上考察现象，因此假定这种现象是正常进行的。其实，只要商品不是

(65) “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莎士比亚)⁷⁶。

绝对卖不出去,那么不管它的出售价格如何,商品的形式变换就总会发生。

因此,在交换中一目了然的现象是商品和金,例如 20 米麻布和两镑转手了,换位了。但是商品同什么交换呢?同它的交换价值形态或一般等价形态交换。金又同什么交换呢?同它的使用价值的一种特殊形态交换。金为什么对麻布表现为货币呢?因为麻布的货币名称即它的价格两镑已经使麻布同作为货币的金发生关系。商品是在让渡的时候,就是说,是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确实把仅仅体现在商品价格中的金吸引出来的时候蜕去它的原有形式的。

商品价格的实现,或商品的仅仅是观念的价值形式的实现,同时就是货币的仅仅是观念的使用价值的相反的实现。商品转化为货币,同时就是货币转化为商品。单独的一次交易包含有两极:从商品占有者这一极看,是卖;从金的占有者这对立的一极看,是买。或者说,卖就是买, $M-A$ 同时就是 $A-M$ 。(66)

到这里,我们还只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即交换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只是由于提供出自己的劳动产品,才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因此,一个交换者要对另一个交换者表现为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做到:或者是他的劳动产品天然具有货币形式,即他的劳动产品本身是金、银等等,总之,是货币材料;或者他的商品已经蜕皮,已经售出,因而已经蜕掉它原来的形式。金要执行货币的职能,自然就必须在某个地点进入商品市场。金就在它的产地进入市场,在那里,金作为直接的劳动产品与另一种价值相同的产品交换。

(66) “每次卖都是买”(魁奈医生《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170页),或者像魁奈在他的《一般原理》中所说:“卖就是买。”⁷⁸

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它就总是代表已经实现了的商品价格。⁽⁶⁷⁾撇开金在产地同商品的交换不说,金在每个既是生产者又是交换者的人手里都是卖的产物,或他的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 $M-A$ 的产物。⁽⁶⁸⁾金成为观念的货币或价值尺度,是因为商品都用金来表现它们的价值,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想象的价值形态而与它们的有用产品的自然形态相对立。金由于商品的全面让渡而成为实在的货币。这个运动把全部商品变成金,从而不仅在想象中而且在现实中把金变成全部商品的转化形态。这样,商品的有用形态以及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的最后痕迹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同一社会劳动的单一的无差别的样品。从一块货币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因此,货币可以是粪土,虽然粪土并不是货币。

现在,假定我们的织麻布者让渡他的商品而取得的两个金币是一夸特小麦的转化形态,卖麻布 $M-A$ 同时就是买麻布 $A-M$ 。一当麻布已经卖出,这个商品就开始了一个以卖麻布的对立面即买圣经结束的运动;一当麻布已经买进,这个商品就结束了一个以买麻布的对立面即卖小麦开始的运动。 $M-A$ (麻布—货币),即 $M-A-M$ (麻布—货币—圣经)这一运动的始段,同时就是 $A-M$ (货币—麻布),即另一运动 $M-A-M$ (小麦—货币—麻布)的终段。一个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同时总是另一个商品的完全相反的第二形态变化,即从货币形式又转化为商品形式。⁽⁶⁹⁾

(67) “一个商品的价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的价格来支付。”(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德尔编《重农学派》第2部第554页)

(68) “要有货币,就得先卖。”(同上,第543页)

(69) 在这里,像前面说过的,金或银的生产者是例外,他们卖自己的产品,用不着先买。

A—M。第二形态变化或最终的形态变化。——买。

货币是具有绝对可让渡性质的商品，因为它是一切其他商品普遍让渡的产物。货币把一切价格倒过来读，从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产品体上，即为货币本身转化为使用价值而献身的材料上。同时，价格，即商品向货币送去的秋波，表明货币可以转化的限度，即表明货币本身的量。商品在变成货币后就消失了，从个人所有的货币上既看不出它究竟怎样落到此人的手中，也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来的。货币没有臭味⁷⁹，不可能嗅出它是从哪里来的。一方面，它代表已经卖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买到的商品。⁽⁷⁰⁾

A—M，即买，同时就是卖，即 M—A，一个商品的后一形态变化，同时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态变化。对我们的织麻布者来说，他的商品的生命旅程是以他把两镑又转化为圣经而结束的。但卖圣经的人则把这笔钱用来买烧酒。

A—M，即 M—A—M（麻布—货币—圣经）的终段，同时就是 M—A，即 M—A—M（圣经—货币—烧酒）的始段。

因为既是生产者又是交换者的人由于社会分工的限制只制造一种特殊的产品，所以他常常是大批地卖。另一方面，他的不同的和不断再生出的需要，又迫使他把这样得到的货币用于较多次的买上。卖一次就是各次不同的买的开端。这样，一个商品的最终的形态变化，就是其他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的总和。

现在，我们来考察总形态变化，即 M—A 和 A—M 这两个运动的统一。这两个运动是通过交换者的二次方向相反的交易即卖和买

(70) “货币在我们手中代表我们要买的东西，它也代表我们取得货币时卖出的东西。”(同上，第 586 页)

完成的,这两次交易使交换者具有了二重性,既是卖者,又是买者。在商品的每一次形态变化中,商品的两种形式即商品和货币同时存在着,虽然是在对立的两极上,同样,在卖和买的每次交易中,交换者的两种形式即卖者和买者也互相对立着。正像同一个商品例如麻布要依次经过两个相反的转化,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由货币转化为商品一样,它的占有者在市场上也要依次扮演卖者和买者的角色。可见,这两种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由交换者交替扮演的。

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包含四个项。商品和货币,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这就是二次互相对立的两极。但是,交换者之一首先扮演卖者的角色,即商品占有者的角色,而后再扮演买者的角色,即货币占有者的角色。因此,只有三个登场人物⁽⁷¹⁾。第一个形态变化的终项即货币,同时是第二个形态变化的起点。同样,第一幕中的卖者,成了第二幕中的买者,这里又有第三个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同他对立着。

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运动组成一个循环:商品形式,商品形式在货币中的消失,商品形式的复归。

这个循环以商品形式开始和结束。在起点上,商品形式附在一个对产品的占有者来说是非使用价值的产品上,在终点上,商品形式则附在另一个对产品的占有者来说是使用价值的产品上。我们还看到,货币在这里也起着双重的作用。在第一个形态变化中,货币作为别人口袋里具有坚硬的、铿锵作响的现实性的商品价值形态与商品相对立。商品一变成货币蛹,货币就不再是坚实的结晶。货币不过

(71) “这样,就有四个项和三个契约当事人,其中有一个人出现两次。”(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908页)

是商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商品的必然会消失并转化为使用价值的等价形式。

组成一个商品的循环运动的两个形态变化,同时是其他两个商品的相反的局部形态变化。

例如麻布的第一个形态变化(麻布—货币),是小麦的第二个和最后一个形态变化(小麦—货币—麻布)。麻布的最后一个形态变化(货币—圣经)是圣经的第一个形态变化(圣经—货币)。可见,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交错在一起。所有这些循环的总体构成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在实质上不同于直接的产品交换。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上面说过的过程,就会对这一点确信无疑。织麻布者确实拿麻布换了圣经,拿自己的商品换了别人的商品;但这种现象只有对于他才是真实的。宁愿要生暖的饮料而不要冰冷的圣物的圣经出卖者,不会想到拿他的圣经同麻布相交换;织麻布者也许丝毫不会想到同他的麻布相交换的是小麦,如此等等。

B的商品替换了A的商品;但A和B并不是互相交换自己的商品。A同B确实也可能彼此购买,但这是特殊的情况,绝不是流通的一般条件必然产生的关系。相反,流通扩大了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的领域,使生产者摆脱掉那些与他们的产品的直接交换分不开的地方限制和个人限制。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本身造成了一整套不以流通的当事人为转移并不受他们控制的社会关系。例如,织布者能卖出麻布,只是因为农民已经卖了小麦;嗜酒者能卖出圣经,只是因为织布者已经卖了麻布;酿酒者能卖出酿造之水,只是因为另一个人已经卖了永生之水⁸⁰,如此等等。

因此,与直接的交换不同,流通在产品换位和转手之后并没有结

束。货币尽管最终从一个商品的每一次形态变化系列中退出来,但它并不消失,它不断地奔向商品空出来的流通位置。例如,在麻布的总形态变化即麻布—货币—圣经中,先是麻布退出流通,货币补上它的位置,然后是圣经退出流通,货币又补上圣经的位置,如此等等。但是,当一个交换者的商品代替另一个交换者的商品时,货币总是留在第三人手中。流通通过一切毛孔把货币像汗一样渗出来。

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的相互关系来看,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来看,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买,另一个人就不能卖。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间歇期,而这个间歇期可长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是卖又是买,因而也就可以同它的补充的形态变化相分离。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即具有这样一种形式的商品,这种形式使它无论什么时候再出现在市场上总是会在那里受到人们的欢迎。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

流通能够炸毁时间、空间以及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产品交换设下的障碍。但是为什么会炸毁这些障碍呢?在物物交换中,一个人要能让渡自己的产品,就必须有另一个人同时让渡他自己的产品。流通使这两个行为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导致了卖和买之间的

对立。我在卖了以后并不一定要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并向曾经是我的买者的同一个人买。固然，买是卖的必不可少的补充，但是，买和卖的统一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事实。如果商品形态变化的这两个互相补充的阶段的分离持续下去，如果卖和买之间的分裂达到严重的程度，它们的内在联系就会通过一次危机表现出来。商品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社会劳动的矛盾，具体的劳动只是当做抽象的劳动的矛盾，商品性质的这些内在的矛盾在流通中取得了它们的运动形式。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具备各种条件，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条件还不存在。⁽⁷²⁾

(b) 货币的流通

M—A—M 这一运动，或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就是循环，即同一个价值在经历了形态变化以后又回到它的最初的形式，商品形式。相反，一当它的流通过程完成，它的货币形式也就消失。只要它

(72) 参看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74—76 页⁸¹对詹姆斯·穆勒的评论。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的辩护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两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但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程度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流行着拿浅显的普通道理来大肆吹嘘的风气。例如，让·巴·萨伊由于知道商品就是产品，就断然否定危机。⁸²

以这种等价物的形式停留在它的卖者手中,它就没有超出流通的前半段。一当卖者以买来完成卖,货币就会再从他的手里离开。因此,商品流通赋予货币的运动,就不是循环的运动。商品流通使货币离开它的占有者,不会再把它引回到它的占有者手中。诚然,如果织麻布者在卖了20米麻布,又买了圣经之后,重新出卖麻布,货币就会回到他的手中。但是,货币不是来自最初的20米麻布的流通。货币的复归要求一个新商品的同一循环运动的重新进行或重复,并且同以前一样以同一结果而告终。因此,商品流通赋予货币的运动,使货币不断地离开它的出发点,使它不间断地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我们把这称之为货币流通(currency)。

货币流通是同一个运动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商品总是在卖者方面,货币总是作为购买手段在买者方面。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它的职能就是实现商品的价格。而货币在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把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同时自己也从买者手里离开,到了卖者手里,以便再去同另一个商品重复同样的过程。

乍一看,货币的单方面的运动不是表现为起源于商品的双方面的运动。流通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外观。诚然,在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中,商品的运动同商品借以换位的货币的运动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商品的第二个形态变化是在商品不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情况下进行的。当商品开始它的流通的这一补充的运动时,它已经蜕掉了它的自然躯体,具有了金的灵魂。因此,运动的连续性完全落在货币上。似乎正是货币使本身不能运动的商品流通起来,使商品从把它们当做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做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并且总是朝着同货币本身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货币不断使商品离开流通领域,同时不断去占据商品的位置,并离开自己的位置。因此,

虽然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的结果。(73)

另一方面,货币所以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只因为货币是商品的已实现的价值形式。因此,货币的运动,实际上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运动。因而这种运动也必然明显地反映在货币流通上。例如,麻布就是先把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它的第一形态变化(M—A)的终极,即货币形式,是它的第二形态变化即它再转化为有用商品圣经(A—M)的始极。但这两个形式变换的每一个都是通过商品和货币的交换,通过二者互相变换位置而实现的。同一些金币,在第一个行为中同麻布交换位置,在第二个行为中同圣经交换位置。这些货币变换位置两次。麻布的第一形态变化使这些货币进入织布者的口袋里,麻布的第二形态变化又使这些货币从那里出来。这样,同一个商品的两个互相对立的形式变换就反映在同一些货币的两次方向相反的位置变换上。

如果商品只经历局部形态变化,只经历一次运动,即从一极来看的卖,从另一极来看的买,那么同一些货币就只变换位置一次。货币的第二次位置变换总是表明商品的第二次形态变化,即商品从它的货币形式再回到它的有用形式。同一些货币反复不断地变换位置,不仅反映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的系列,而且反映这类形态变化的交错联系。(74)

每一个商品进行第一次形式变换,即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就退出

(73) “它〈货币〉除了产品赋予它的运动之外,没有别的运动。”(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885页)

(74) 必须指出,正文中的论述只涉及简单流通形式,这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唯一形式。

流通,不断地为其他商品所取代。相反,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却总是留在流通领域,不断地在那里流动。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领域能吸收多少货币量。

在一个国家里,每天都发生多少不等的、同时发生的、互相并行的卖,或不同商品的局部形态变化。这些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它们的价格上,也就是表现在想象的金量上。因此,向市场提供的一切商品的流通所需要的金量,是由它们的价格总额决定的。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这个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会同金(货币材料)的价值一起变动,金的价值降低,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提高;金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降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引起流通的货币量的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都是由货币本身引起的,但显然不是由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是由它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引起的。在这些场合首先是货币价值发生变化。然后是商品价格同货币价值成反比例地变化,而最后是流通货币量同商品价格成正比例地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流通有一个口,金(或一切其他货币材料)作为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因此,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之前,金本身的价值是既定的。如果金的价值现在发生变化,比如说降低了,那么,这首先会在金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贵金属产地表现出来。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了,而许多其他商品还继续按照已变得虚幻的旧有的货币金属的价值来估价。这种情况能够延续多长时间,要看世界市场的发展程度。可是,一个商品通过它同另一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会逐渐地对别一种商品发生影响;商品的金价格或银价格会逐渐同商

品的比较价值保持平衡,直到最后所有的商品价值都根据货币金属的新价值来估价。随着这个运动,贵金属不断增加,它们是由于代替那些同它们交换的商品而流进来的。因此,商品改订价格普遍到什么程度,因而价格普遍提高到什么程度,市场上可供支配的实现商品价格所需要的金属数量也就会增加到同样的程度。由于对发现新的金银矿以后出现的事实做了片面的考察,在17世纪,特别是在18世纪,有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有更大的量的金银作为流通手段执行了职能。在下面的考察中假设金的价值是既定的,实际上在确定价格的一瞬间,金的价值确实也是既定的。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流通的金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如果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既定的,显然,商品价格总额就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1夸特小麦要值2镑,100夸特就值200镑,依此类推,因此,在小麦出售时与小麦换位的金量必须同小麦量一起增加。

假设商品量已定,商品价格的波动就能影响流通货币量。流通货币量随着待实现的价格总额的增减而增减,为此,不需要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上涨或跌落。只要若干主要商品的价格上涨或跌落,就足以影响待实现的价格总额。无论商品价格的变动是反映实际的价值变动,或者只是由于市场的波动,流通货币量所受的影响都是相同的。

假定有若干互不相干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彼此并行的卖,或者说局部形态变化,例如有1夸特小麦、20米麻布、1本圣经、4桶烧酒同时出售。如果每种商品的价格都是2镑,它们的价格总额就是8镑,那么,为了实现这些价格,就必须把8镑投入流通。相反,如果同一些商品构成我们上面所说的形态变化系列:1夸特小麦—2镑—

20 米麻布—2 镑—1 本圣经—2 镑—4 桶烧酒—2 镑,那么,这同一个 2 镑就可以使这些不同的商品按上述指定的次序流通,依次实现它们的价格,最后停留在酿酒者手中。这样,这 2 镑完成了 4 次流通。

2 镑的这种反复四次的位置变换是以烧酒的第一形态变化结束的小麦、麻布和圣经的互相交错的总形态变化的结果。⁽⁷⁵⁾ 形成这个系列的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运动,是依次发生的,而不是同时发生的。这些运动需要或长或短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货币流通的速度是以同一些货币在一定时间内的流通次数来计量的。假定 4 种商品的流通过程持续 1 天。这样,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为 8 镑,每一货币 1 天的流通次数是 4 次,流通的货币量是 2 镑,于是我们得出:

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名货币在一定时间内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

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在一定的时间内,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一方面包含许多单独的卖(或买),即局部的和同时发生的形态变化,其中货币只变换位置一次或只流通一次。另一方面是许多互相平行或互相交错的具有多少不等的分支的形态变化系列,其中同一些货币流通的次数多少不等。构成流通中货币总额的个别货币在执行职能时的活动程度极其不同,但是,每种名称的货币总量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着一定的价格总额。因此,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就可以得到确定。

货币量,例如在一定时刻投入流通的货币量,当然是由一起出卖的商品总价格决定的。但是在流通过程本身中,每一货币可以说都对相邻的货币承担责任。如果一个货币加快流通速度,另一个货币就会

(75) “正是产品使它(货币)运动,使它流通……它运动的速度可以补充它的数量。必要时,它会一刻不停地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 年巴黎版第 915、916 页)

放慢流通速度,甚至完全退出流通领域,因为流通领域只能吸收这样一个金量,这个金量乘以它的平均流通次数,等于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因此,货币的流通次数增加,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减少;货币的流通次数减少,货币量就会增加。如果货币的平均速度一定,能够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量也是一定的。例如只要把一定量1镑的银行券投入流通,就可以从流通中取回等量的金镑。——这是一切银行都很熟悉的手法。

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从商品流通得到它的动力和方向,所以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只是反映商品形式变换的速度,反映形态变化系列相互间的不断交错,反映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领域并同样迅速地为新商品所代替。因此,在货币的加速的流通中表现出来的是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的流水般的统一,即由商品的使用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再由价值形态转化为使用形态,或者说,作为由同一些交换者依次完成的两个行为的卖和买的统一。相反,货币流通的减缓则表现这两个现象的分离和独立为互相对立的双方的趋势,表现形式变换的中断,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中断。至于这种中断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金属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76)

(76) “因为货币是买和卖的共同的尺度,所以每一个要卖东西而找不到买主的人,就以为国内缺乏货币是他的商品卖不出去的原因;因此到处都叫嚷缺乏货币。然而这是一个大错误……那些叫嚷缺乏货币的人究竟要什么呢?……租地农民抱怨,他以为如果国内有较多的货币,他的货物就可以卖到好价钱。看来,他要的不是货币,而是他的谷物和牲畜没有卖到的好价钱……为什么他卖不到好价钱呢?……1. 或者是因为国内谷物和牲畜太多,到市场上来的人大多数都像他那样要卖,但只有少数人要买;2. 或者是因为通常的出口停滞……3. 或者是因为消费缩减,例如,人们由于贫困,不能再花

可见,在一定时期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方面取决于一切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商品形态变化的相对速度。但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又决定于每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比例和不同的方向变动,因此,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以及这个价格总额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在这里,我们只举出价格史上最重要的几种组合。

在价格不变时,由于流通商品量增加,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减低,或者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反之,由于商品量减少,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增加,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流通商品量的减少同商品价格的上涨保持相同的比例,或流通的商品量不变,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同价格的上涨一样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减少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比价格的上涨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下降时,如果商品量的增加同商品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同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流通手段量就会依然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增加或货币流通速

费过去那样多的生活费用。可见,有助于租地农民出售货物的,不是增加货币,而是消除这三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原因。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同样缺少货币,就是说,因为市场停滞,他们要交易的货物没有销路……没有比财富不断转手更能使国家繁荣的了。”(散见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11—15页)

赫伦施万德的骗术总括起来就是:由商品性质产生并在商品流通中必然表现出来的对抗,通过把更大量的货币投入流通就可以消除。认为流通手段不足造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减缓或停滞,是一种错觉,但决不能由此而说,法律限制所造成的流通手段的真正不足,也不会引起停滞。

度的减低比商品价格的跌落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

各种因素的变动可以互相抵消,所以尽管这些因素不断变动,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从而流通的货币量可以依然不变。因此,如果我们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那么我们就发现:除了几乎总是由工业危机和商业危机引起的,以及偶尔由贵金属本身的价值变动引起的强烈的周期震动时期以外,偏离平均水平的程度,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小得多。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⁷⁷⁾,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贵金属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

(77) “推动一国商业,需要一定数量和比例的货币,过多或过少都对商业有害。这正像在小零售业中要有一定量的法寻(里亚)来把银币换开和结算用最小的银币也无法处理的账目……贸易所需要的法寻量的比例,必须按照商人的人数、他们交换的次数,尤其是按照最小的银币的价值来计算;同样,我国商业所需要的货币(银或金)的比例,必须按照交换的次数和要实现的支付额的大小来计算。”(威廉·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17页)

阿·杨格在他的《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112页及以下几页)中维护受到詹·斯图亚特等人攻击的休谟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价格取决于货币量”。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9页上⁸³曾经指出,亚·斯密把流通的铸币量这个问题悄悄地抹掉了。但这句话只是对于亚·斯密专门论述货币问题的那些地方才是适用的。例如,在批评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斯密说出了正确的看法:“每一个国家的铸币量取决于该国流通的商品的价值……每一个国家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要求有一定量的货币来使货物流通,并把它们分配给它们的消费者,但不能使用比这更多的货币。流通的渠道必然会吸收一个使自己达到饱和的数量,但绝不会容纳更多的数量。”

同样,亚·斯密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曾专门颂扬分工。但后来,在最后一篇论述国家收入的源泉时,他又重复他的老师亚·弗格森的话,谴责了分工。(《国富论》第3卷第4篇第1章)

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贵金属量⁽⁷⁸⁾,这种错觉最初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商品堆的可除部分同金属堆的可除部分相交换。⁽⁷⁹⁾

(78) “在每一个国家,随着民间的金银量的增加,货物的价格必定上涨;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金银减少,那么一切货物的价格也必将随着货币的减少而相应地跌落。”(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5页)把范德林特的著作同休谟的《论述》仔细对照后,我丝毫不怀疑,休谟知道并且利用了他的先驱者的这部著作。流通手段量决定价格的想法,巴尔本以及在他以前的其他许多著作家就曾提出过。范德林特说:“贸易的绝对自由不会造成任何不便,相反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现金减少时(这是禁令所要防止的),获得货币的其他国家的一切货物价格必然会随着该国货币的增加而上涨……我国的工业产品就会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从而又造成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差额,这样,货币就会流回我国。”(同上,第[43、]44页)

(79) 不言而喻,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构成全部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的一个要素。但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彼此不可通约的一堆使用价值能够同一个国家现有的金或银的总量相交换。如果把全部商品化为一个唯一的总商品,每一个商品只是它的可除部分,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荒唐的等式:总商品 = x 英担金,商品 A = 总商品的可除部分 = x 英担金的同一可除部分。孟德斯鸠十分天真地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现有的金银量同现有的商品总量相比较,那么每个单个产品或商品一定可以同一定量[……]的货币相比较。我们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种产品或一种商品,或者说,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买,而且它像货币那样可以分割,这个商品的一定部分就会相当于货币量的一定部分;这个商品总量的一半相当于货币总量的一半,等等。商品价格的决定总是基本上取决于商品总量和货币符号总量之间的比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集》第3卷第12、13页)关于李嘉图和他的学生詹姆斯·穆勒、奥弗斯顿勋爵等人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参看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0—146页、第150页及以下几页。⁸⁴ 约·斯·穆勒先生凭他惯用的折中逻辑,懂得既要赞成他父亲詹姆斯·穆勒的见解,又要赞成相反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1版序言⁸⁵中,以当代的亚当·斯密自居,如果把该书的正文同

(c) 铸币或硬币——价值符号

铸币产生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例如,按照法定的标准在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名称中表现出来的金重量,必须在市场上作为同名的金块或铸币同商品相对立。正像确立价格标准一样,铸造硬币也是国家的事。金银作为铸币穿着不同的国家制服,但它们在世界上又脱掉这些制服。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或民族领域,同商品流通的普遍领域是分开的。

因此,金币和金条本来只有形状上的差别,金始终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⁸⁰⁾但是,铸币一离开造币厂就走上了通向熔炉

这篇序言比较一下,真不知道究竟应当赞扬这个人的天真,还是赞扬那些诚心诚意地承认他是当代亚当·斯密的公众的天真。其实他同亚当·斯密的相像,就像卡尔斯的威廉斯·卡尔斯将军同威灵顿公爵的相像一样。⁸⁶约·斯·穆勒先生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的既不广也不深的独创研究,在1844年他出版的小册子《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里全部包括了。洛克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他关于贵金属没有价值的理论和贵金属价值只取决于贵金属量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他说:“人们一致同意赋予金银一个想象的价值……在这些金属中所看到的内在价值无非是它们的量。”(《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洛克著作集》1777年版第2卷第15页)

(80) 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去探讨造币税之类的细节。但是,为了驳斥献媚者亚当·弥勒对“英国政府免费造币的慷慨精神”的赞扬⁸⁷,我引用达德利·诺思爵士的一段评论:“金银像其他的商品一样,有它的来潮和退潮。只要从西班牙运到一批金银……就被送往伦敦塔去铸造。不久又会需要金条和银条,以便再输出。如果金条和银条都没有了,而且都是都用来造币了,那怎么办呢?那

的道路。金币或银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的磨损得少。例如,1基尼在它的历程中每走一步就会失去它的某些重量,但会保留其名称。因此,名称和材料、金属实体和货币名称开始分离。同名的硬币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因为重量不同了。由价格标准标明的金的重量不再存在于流通的金中,因此,金不再是它必须实现其价格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中世纪和直到18世纪为止的近代的铸币史就是一部这样混乱的历史。流通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金币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重量的象征。这种倾向甚至为现代的法律所承认,这些法律规定,硬币磨损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货资格。

既然货币流通使硬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硬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铜记号等等来代替硬币执行铸币的职能。铸造重量极小的金币或银币在技术上有困难,较贱的金属充当价值尺度并且在它们被一种贵金属赶下宝座之前曾一直作为货币流通,这种情况历史地说明了铜记号等等的象征性的货币作用。这些较贱的金属在铸币流通最快即极小额的买卖不断重复进行的流通领域中代替了金。为了不让金的这些侍从篡夺金的位置,法律规定了一个必须接受的用它们来支付的比例。不同种铸币流通的各种特殊领域当然是互相交错的。例如,在支付金币的尾数时出现了辅币;金不断地进入零售流

就把铸币再熔化;这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所有者对造币不用花费分文。人们嘲笑说这是国家为了喂驴子而支付捆草料的费用。如果商人(诺思本人是查理二世时代的一个大商人)必须支付造币费,他就不会不假思索地把他的银送到伦敦塔去了,而且铸币总是会比未铸的金属有更高的价值。”(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18页)

通,但是又因与辅币兑换而从那里不断地被抛出来。(81)

银记号或铜记号的金属实体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它们在流通中比金币磨损得还要快。因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的重量完全无关,就是说,与价值完全无关。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仍然代替金币执行职能。因此,金的铸币职能同它的金属价值完全分离,这是它的流通本身的磨损造成的现象。因此,金在这种职能上可以被相对来说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例如纸币来代替。在金属记号上,纯粹象征的性质还在一定的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质就明白地表现出来了。我们看到,困难的只是第一步。

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自发地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一系列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不知道的。不妨顺便提一下,如果说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那么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就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82)

(81) “如果银币从来不超过小额支付所需的数量,它就不可能积累到足以进行巨额支付的数量……用金进行巨额支付,也必然意味着用金进行零售贸易。金币的所有者,拿金币进行小额购买时,除得到所买的商品外,还可找回银币。这样,那些本来会在零售贸易那里积累的银币余额,就会分散到总流通中去。但如果银的数量多到不用金就可以进行小额支付,那么,零售商人从小额购买中就只能得到银,而这些银就必然会在他的手中积累起来。”(大卫·布坎南《大不列颠赋税和商业政策的研究》1844年爱丁堡版第248—249页)

(82) 某日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咸丰]上了一个奏折,其暗中的目的是要把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⁸⁸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⁸⁹。

国家把印有一镑、五镑等等铸币名称的纸票投入流通过程。只要这些纸票确实是代替同名的金的重量来流通，它们的运动就只反映现实货币流通的规律。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充当金或银的代表这种作用中产生，而且这一规律十分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必须同它象征地代表的实际流通的金（或银）的数量成比例。诚然，流通领域所能吸收的金量经常变动，时常高于或低于一定的平均水平；但是它在每一个国家绝不会降到由经验确定的最低限量以下。这个最低限量不断更新它的组成部分，就是说，有另一些硬币来回运动，进入这个量又离开这个量，这种情况当然丝毫不会影响这个量的比例和它在流通领域内的不断流动。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妨碍用纸做的象征来代替这个最低限量。相反，如果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经饱和，以至于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贵金属的极限，那么，商品价格的最小的变动就会使流通渠道泛滥。那时一切限度都消失了。⁹¹

我们撇开信用扫地的情况不谈，假定纸币超过它的法定的比例。纸币在商品流通中仍然只代表流通按照其内在规律所需要的，因而是仅仅可以被代表的金量。例如，如果纸币总量是它应有的量的二倍，代表 $\frac{1}{4}$ 盎司金的一镑纸票只代表 $\frac{1}{8}$ 盎司金，那么结果就无异于金在它作为价格标准的职能上发生了变化。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的关系只不过是：在

卡·阿贝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47页及以下几页）关于金币在流通中的磨损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经理曾在上院（银行条例委员会）上作证说：“每年都有一批新的 *souverains*（不是政治上的君主，而是金镑的名称索维林⁹⁰）变得过轻。在一年中以法定重量流通的一批索维林，经过磨损，到下一年放在天平上就重量不足了。”

商品价格上观念地表现的同一个金量,由纸币象征地体现出来。因此,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83)

也许人们要问,为什么金可以用没有价值的东西即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呢?但是,只有当金仅仅执行铸币或流通手段的职能时,金才可以被代替。当然,就个别金币或银币来说,这种职能的独立性质并没有实现,虽然磨损了的硬币的继续流通已表明这种职能已经独立出来。每一金块只有在流通时才是流通手段。最低限度的金量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它可以为纸币所代替。这个金量经常处在流通领域中,不断地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从而只是作为这种职能的承担者而存在。因此,它的流动只表示形态变化 $M-A-M$ 的对立运动的不断互相转化。在这种形态变化中,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商品对立,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在这里,一个商品为另一个商品所取代使货币不断地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这个金量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它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反映,只是作为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84) 但

(83) 甚至最优秀的著作家,对于货币的性质及其各种职能的理解也是很模糊的。例如,富拉顿下面的一段话就是证明:“就我们的国内交换来说,通常由金币和银币执行的各种货币职能,同样可以有效地由不能兑现的纸币来执行,而这种纸币除依法获得的人为的约定的价值外,没有任何别的价值。我想,这个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只要纸币发行量保持在应有的限度内,这种价值就可以认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一切优点,甚至使价值标准成为多余。”(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21页)这就是说,由于货币商品在流通中可以被单纯的价值符号代替,它的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作用就成为多余的了!

(84) 由于金银作为铸币或只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变成了它们自己的符号,于是尼古拉斯·巴尔本就推论说,政府有权“提高货币价值”,就是说,可以

是,货币符号需要得到社会的公认,而它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作为铸币执行的职能才能独立。

3. 货 币

以上我们从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个方面考察了贵金属。第一个职能,它是作为观念货币完成的;在第二个职能中,它可以由符号来体现。但是在有些职能中,它必须以其金属体表现为商品的实际等价物或表现为货币商品。另外还有一种职能,它可以亲自执行,或者通过代表来执行,但是它在这里在普通商品面前始终表现为它们的价值的唯一合适的化身。在所有这些场合,我们认为,贵金属同它的价值尺度职能和铸币职能相反,执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的职能。

(a) 货 币 贮 藏

两种对立的商品形态变化的循环运动,或卖与买的不息转换,表现在不停的货币流通上,或表现在货币作为流通的永动机的职能上。

替名叫法郎的一定的银量起一个较大量的名称——埃巨,这样就可以用法郎当埃巨来偿还债务。“货币因经过许许多多人的手而磨损和减轻……在市场上,人们注意的只是货币的名称和通用与否,而不是银的量。金属只是由于国家的权威而成为货币。”(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29、30、25页)

只要形态变化系列一中断,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货币就会停止流动,或者如布阿吉尔贝尔所说的,由动的东西转化为不动的东西⁹²,由铸币转化为货币。

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即转化成金蛹或银蛹的商品固定下来并加以保存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⁸⁵⁾从此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在货币流通中被有意地保留下来的货币,可以说硬化为贮藏货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

特别是在流通初期,只是把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与商品货币相交换。这样,金和银自然就成为这种多余部分或财富的社会表现。在有些民族中,传统的生产方式直接满足着狭小范围的固定需要,在这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在这些民族那里,流通不发达,贮藏货币很多。在亚洲人那里,特别是在印度人那里,情况就是这样。老范德林特以为价格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贵金属的丰裕程度,他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商品这样便宜?他回答说:因为印度人埋藏货币。他指出,从1602年到1734年,他们埋藏的银值15 000万镑,这些银最先是从美洲运到欧洲去的。⁽⁸⁶⁾从1856年到1866年这10年间,英国输往印度和中国的银(输到中国的银大部分又流入印度)值12 000万镑,这些银原先是用澳大利亚的金换来的。

随着商品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储备货币。

(85) “货币财富无非是……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财富。”(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德尔编《重农学派》第2部第573页)“产品形式上的价值只是改变形式而已。”(同上,第486页)

(86) “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使他们所有的货物和产品保持如此低廉的价格。”(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95、96页)

这是“社会的抵押品”⁹³，物的神经⁽⁸⁷⁾⁹⁴。事实上，生产者的需要不断更新，并且必须不断购买别人的商品，而他生产和出售自己的商品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取决于许许多多的偶然性。他要买而不卖，就必须在以前曾经卖而不买。这种做法要普遍实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贵金属在它的产地直接同其他商品交换。在那里就是卖（商品占有者方面）而不买（金银占有者方面）。⁽⁸⁸⁾而以后的没有继之以买的卖，不过是使贵金属分配给一切交换者。因此，在交易的各个点上，有不同数量的金银贮藏。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做交换价值来保持和保存，或把交换价值当做商品来保持和保存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社会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形式——的权力也增大了。

“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寄自牙买加的信》，1503年）

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出卖，没有什么东西不能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没有什么东西能抗拒这种炼金术，连圣徒的遗骨也是如此，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更精致的圣物了。⁽⁸⁹⁾

(87) “货币是一种抵押品。”（约翰·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

(88) 严格地说，买要以下面一点为前提：交换者手中的金或银不是他直接制造的产品，而是出售他的商品的产物。

(89) 法国笃信基督教的国王亨利三世，抢劫了修道院、寺庙等地的圣物，以便把它们变成银。大家知道，福基斯人抢劫德尔斐神庙的财宝曾在希腊史上

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等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90)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落入任何人手中的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身经济组织和民间习俗的破坏因素,最活跃的瓦解因素。(91)

现代社会刚一诞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92),颂扬金是自己的圣杯⁹⁶,是自己的生活原则本身的光辉体现。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

起了什么作用。⁹⁵古代人把神庙看做商品之神的住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善于经商的民族腓尼基人,认为货币是万物的转换形态。因此,那些在阿斯塔尔塔女神节委身于外来人的少女把她们由于牺牲自己的贞洁而得到的钱献给女神,是很自然的事。

(90)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91) “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坏的东西,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做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92) “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阿泰纳奥斯《哲人宴》)

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该商品对这种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该商品占有者的社会财富。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尚处于野蛮状态的交换者,甚至西欧的农民,都不懂得把价值同它的形式区分开来。在他们看来,金银贮藏的增多就是价值的增多。当然,贵金属的价值在变动,这或者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变动,或者是由于商品的价值变动。但是一方面,这不会妨碍 200 盎司金始终比 100 盎司金包含的价值多,300 盎司金又比 200 盎司金包含的价值多等等,另一方面,这也不会妨碍货币的金属形式仍旧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从质或形式的角度来考察,货币作为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是无限的,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都有量的界限,因而只具有有限的购买力。货币的始终有限的量和货币的无限次方的质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夫斯式的劳动。他们同征服者一样:每一次新的征服只是导致一个新的国界。

要把贵金属作为货币,从而作为贮藏货币的要素保持和保存起来,就必须阻止它流通,不让它作为购买手段化为消费资料。因此,货币贮藏者为了这个偶像而牺牲自己的一切肉体的欲望。他比任何人都更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另一方面,他能够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产的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⁹³⁾

(93) “尽量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数,这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概括。”(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1771年初版第52[、53]页)

货币贮藏不仅具有一种自然形式,还有一种美的形式。这就是与社会财富一同增长的金银制品的积累。“让我们成为富人或外表像富人吧。”(狄德罗)⁹⁷这样,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日益扩大的贵金属市场,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人们在社会危机时期能得到供应的潜在源泉。

货币贮藏在金属流通的经济中执行着种种不同的职能。它的第一个职能是从支配铸币的流通条件中产生的。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经常变动,流通的铸币量也会增减。因此,这个量必须能伸缩。

一部分铸币必须时而离开流通,时而又进入流通。为了使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实际流通的金银量必须只占一个国家的现有的贵金属的一部分。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⁹⁴⁾

(b) 支付手段

在上面我们所考察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价值总是双

(94) “一个国家要进行贸易,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这个数量时而增多,时而减少……货币的这种涨落,无需政治家的任何协助,能够自行调节……两只吊桶交替工作:货币不足时,用金属块来铸造;金属块不足时,把货币熔化掉。”(达·诺思爵士《贸易论》[附言]第3页)长期在东印度公司⁹⁸任职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证实,在印度银饰品和银首饰仍然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利率高时,银饰品送往造币厂,利率低时,它又回到它的所有者手中。”(约·斯·穆勒的证词,1857年《银行法报告》第2101号)根据1864年关于印度金银输入和输出的议会文件⁹⁹,1863年金银入超19 367 764镑。在1864年以前的八年间,贵金属入超109 652 917镑。在本世纪中,印度铸造的货币超过了200 000 000镑。

重地表现出来,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货币。既是生产者又是交换者的人是作为互相对立的等价的物的代表来接触的。但是,随着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由于时间的间隔而分离开来的种种情况也发展起来。这里我们只举出其中一些最简单的情况也就够了。一种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长,另一种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短。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生产季节。一个商品的产地就是它的市场所在地,另一个商品要旅行到远方的市场去。因此,一个交换者可以在另一个交换者还不能买的时候就作为卖者出现。当同样一些交易总是在同一些人中间反复进行时,商品的买卖条件就会逐渐地按照商品的生产条件来调节。另一方面,某些种类的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权是让渡一定期限的,买者只是在期满时才真正取得了约定的使用价值。因而他先购买后支付。一个交换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交换者却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商品的形态变化在这里采取了新的形态,货币也就取得了一种新的职能。货币成了支付手段。

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角色在这里是从简单流通中产生的。简单流通形式的改变,在卖者和买者身上打上了这两个新烙印。最初,这些新的角色同旧的角色一样,是暂时的和由同一些演员交替扮演的角色,这些新的角色不再是那么温和,它们的对立能够更牢固地确立下来。⁽⁹⁵⁾这两种角色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在古代世界,阶级斗争的运动主要采取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断反复进行的斗争的形式,而在罗马则以负债平民的破产,沦为奴隶而告

(95) 下面一点可以说明 18 世纪初期英国的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英国商人中间盛行的那种残酷精神,是在任何其他社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论信贷和破产法》1707 年伦敦版第 2 页)

终。在中世纪，斗争以负债封建主的破产而告终。一旦作为这个债务人的支柱的经济基础崩溃，他就会失去政治权力。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这种货币关系在这两个时代只是在表面上反映更深刻的对抗。

现在我们回到商品流通中来。等价物——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这种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

其次，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移位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货币才作为支付手段进行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是因为流通运动停留在它的前半段。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卖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货币贮藏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以一般等价物形式保存商品，最后，欠债的买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则是为了能够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因此，商品转化为它的价值形态即货币，现在就成了既是生产者又是交换者的人不管其个人的需要和幻想如何所必须接受的社会必要性。

我们假定农民以 2 镑（这 2 镑也是 1 夸特小麦的价格）的价格向织麻布者买 20 米麻布，并在一个月以后进行支付。这个农民在他把自己的小麦转化为货币以前就把它转化成了麻布。因此，他在完成他的商品的第一个形态变化之前就完成了他的商品的最终形态变化。后来，他以 2 镑的价格卖掉小麦，在商定的日期把这 2 镑交给织麻布者。实在的货币在这里没有充当他把小麦换成麻布

的中介。买卖成交以后，货币反过来就成了他进行交易的关键，因为货币是他必须提供的价值的绝对形式，一般商品。至于织麻布者，他的商品已经流通并实现了自己的价格，但只是靠民法规定的权利实现的。麻布在转化为货币之前就进入了别人的消费。因此，他的麻布的第一形态变化暂时没有完成，只是在后来农民的债务到期以后才完成。⁽⁹⁶⁾

在一定的时期内到期的债务代表着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实现这一价格总额所必需的货币量，首先取决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第一，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例如 A 从他的债务人 B 那里得到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 C 等等；第二，实现各次支付的期限的间隔。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系列或事后进行的第一形态变化的系列，完全不同于我们前面分析的形态变化系列的交错。

卖者和买者的联系不仅是表现在流通手段的运动中，而且这种联系产生于货币流通本身。相反地，支付手段的运动则表现了先前存在的全部社会关系。

若干卖(或买)的同时并行，使流通手段量不再能靠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得到补偿，这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随着

(96) 从引自我先前在 1859 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如下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在本文中谈到相反的形式：“相反，在 A—M 过程中，货币可以在其使用价值实现之前，或者说，在商品让渡之前，作为购买手段转让出去，从而实现商品的价格。例如，通常的预付贷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国政府向印度农民购买鸦片时就是采取这种形式。但是，这里货币总是作为购买手段起作用，没有取得任何新的特殊形式……诚然，资本也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是这不属于简单流通的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 年柏林版第 119、120 页¹⁰⁰）

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消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例如中世纪里昂的转账处就是如此。只要把 A 对 B、B 对 C、C 对 A 等等所有的债权对照一下,就可以有一定的数额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消。这样需要偿付的只是结算差额。支付越集中,支付的差额相对地就越小,因而流通的支付手段量也相对地越小。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简单的流通手段,不是充当产品移位的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唯一实现,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工业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⁹⁷⁾的时刻爆发出来。

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支付的锁链和旨在使各种支付互相抵消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打乱的时候,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不再在它的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上执行职能。货币被要求以现金的形式出现,而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商品的有用性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他叫道,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像久渴的鹿蹄叫着渴求泉水一样,他们的灵魂也在大声召唤货币这唯一的

(97) 我们在这里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危机的一个阶段,应该把这种危机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一种货币危机可以是一种独立的现象,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轴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也是这种资本的范围:银行、交易所和金融。

财富。⁽⁹⁸⁾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之间的对立发展到了极端。货币的特殊种类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⁹⁹⁾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定时期内的流通货币的总额。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消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既执行流通手段职能又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二次或多次的使用。例如,一个农民卖自己的小麦得到起着流通手段作用的2镑。他在支付日把这2镑交给织麻布者。这时,这2镑执行着支付手段的职能。织麻布者拿现金去买圣经,这2镑在这种买中又重新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如此等等。

因此,即使货币流通速度、支付的节省程度和商品的价格是既定的,一定时期内例如一天内流通的商品量和流通的货币量也不再相符。货币在流通,而它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商品在流

(98) “由信用主义这样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就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惧,而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6页¹⁰¹)“穷人郁郁寡欢,担心富人没有钱雇用他们,然而提供食物和衣服的同一些土地和劳动力依然存在——正是这些,而不是货币,构成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3、4页)

(99) 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这种时机是如何被利用的:“一天(1839年),一位西蒂区的老银行家在他的房间里同他的一个朋友谈话,他坐在写字桌前,揭开桌盖,取出成捆的钞票。他扬扬得意地说,这是60万镑,收回这些钞票,是为了使货币形势紧张(银根吃紧),在下午3点钟以后,再把它们全部投放出去。”([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版第81页)1864年4月24日,半官方报纸《观察家报》报道:“现在流传着一种很奇怪的谣言,说已经有一种制造银行券恐慌的手段。不论采用这类诡计看来是多么值得怀疑,但是这种谣言广为流传,确实值得一提。”

通,而它的货币等价物只有在将来才出现。另一方面,每天订立的债务和到期的债务完全不是可通约的量。(100)

信用货币是直接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让渡给别人而流通。随着信用制度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货币取得了各种特殊的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往来于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中去。(101)

(100) “某日签订的买卖总额不会影响该日流通的货币量,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它会变为各种各样的票据,用来取得将来在或远或近的某日进入流通的货币量。——今天开的票据或今天提供的信贷无论在数目、总额或期限上都不必同明天或后天开的票据或提供的信贷有什么关系;相反地,许多今天的票据和信贷到期时会同以前在许多完全不定的日期的支付相抵;因此,以12个月、6个月、3个月或1个月为期的票据往往凑在一起,在同一日进入待实现的支付总额。”(《通货论评述。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年爱丁堡版,散见第29、30页)

(101) 为了举例说明在真正的商业活动中所用的现金是多么少,我们在这里列出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莫里逊—狄龙公司]的全年收支表。1856年该公司的交易额达好几百万镑,现在折合成100万镑计算。

收 入	(单位:镑)	支 出	(单位:镑)
定期支付的银行家和商人的票据	533 596	定期支付的票据	302 674
见票即付的银行支票等	357 715	伦敦各银行支票	663 672
地方银行券	9 627	英格兰银行券	22 743
英格兰银行券	68 554	金	9 427
金	28 089	银和铜	1 484
银和铜	1 486		
邮汇	933		
总计:	1 000 000	总计:	1 000 000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8年7月第71页)

商品生产越是发展和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越不是会局限于产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¹⁰²⁾迄今为止以实物支付的地租、赋税等等从此就以货币支付。这种转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的一般状态,可以由例如罗马帝国两次企图用货币征收一切赋税都告失败来证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农民极端贫困,这种受到布阿吉尔贝尔、沃邦元帅等人如此有力地斥责的现象,不仅是由重税引起的,而且是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造成的。⁽¹⁰³⁾在亚洲,地租是赋税的主要因素,是以实物支付的。这种建立在停滞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地租形式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方式。这是土耳其帝国自身得以维持的秘密之一。如果欧洲给与日本的自由贸易使日本把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日本的模范的农业就会崩溃,因为这种农业的经济条件非常狭隘,不能抗拒这种变革。

在每个国家,都规定若干进行大规模支付的总期限。这些期限中有一些纯粹是约定俗成的,但这些期限一般说来是以同季节等的定期变化有关的再生产的周期循环运动为基础的。这些总期限还调节着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产生的支付时期,如地租、房租、赋税等等。这些分散在一国各个地方的支付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货币

(102) “交易的性质在这里改变了,现在不是以商品换商品,而是出售和支付,一切交易都建立在货币价格的基础上。”(〔丹·笛福〕《论公共信贷》1710年伦敦第3版第8页)

(103) “货币成了万物的刽子手。”理财术是“一个蒸馏器,它使多得惊人的货物和商品蒸发,以便取得这种致命的膏汁”。“货币向全人类宣战。”(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德尔编《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413、417、[418、]419页)

量,会引起周期性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乱。(104)

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的规律中可以看出,一切周期性的支付(不问其起因如何)所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与支付期限的长短成反比。(105) 102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执行的职能必然要求积累支付期到来时所需的金额。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消灭了作为致富的固有形式的货币贮藏,把它变成了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形式。

(104) 克雷格先生对 1826 年的议会调查委员会说:“1824 年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一,在爱丁堡,需要如此大量的钞票,以致到上午 11 点钟,我们手里连一张钞票也没有了,我们到一家一家银行去商借,但是都没有借到,许多交易都只好凭纸条付款。但是到了下午 3 点钟,所有的钞票都回到了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些钞票只不过转转手而已。”“在苏格兰,虽然钞票的实际平均流通量还不到 300 万镑,但是到了一年的若干支付期限,银行家手里所有的钞票(共约 700 万镑)都要动用。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只是履行一种单一的特殊的职能,这个职能一经完成,它们立刻又各自回到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约翰·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 年伦敦第 2 版第 86[、87]页注)为了便于了解上述情况,这里要补充说一下,在富拉顿时代,苏格兰银行支付存款不用支票,而只用钞票。

(105) “如果一年必须有 4 000 万,那么这 600 万(金)对于贸易的流通和周转是否够用呢?”——配第以他惯用的巧妙方法回答说:“是够用的,如果周转期很短,例如只有一个星期,像贫苦的工人和手工业者每星期六收付货币那样,那么,有 100 万的 $\frac{40}{52}$ 的货币就可以达到目的。如果周转期是一季,按照我们交租纳税的习惯,那就要有 1 000 万。因此,假定支付总起来说是从 1 个星期到 13 个星期之间兑现,那么就需要 1 000 万加上 $\frac{40}{52}$, 其半数就是 500 万又 $\frac{1}{2}$, 就是说,我们有 500 万又 $\frac{1}{2}$ 就够了。”(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 年》1691 年伦敦版第 13、14 页¹⁰³)

(c) 普遍货币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铸币、辅币、价格标准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条块的形式。在各国之间的贸易中,商品的价值普遍地得到实现。同样,商品的价值形态在这里也作为普遍货币——詹姆斯·斯图亚特把它称之为世界货币(money of the world),亚当·斯密继他之后把它称之为大商业共和国货币,——与商品相对立。正是在世界市场上,而且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执行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一般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货币的存在方式在这里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106)

普遍货币执行三种职能即支付手段的职能、购买手段的职能和一般财富(universal wealth)的社会材料的职能。在涉及到平

(106) 因此,法律规定国家银行只能贮藏那种在国内执行货币职能的贵金属,是荒唐的。例如,英格兰银行自己故意制造的那些困难,是众所周知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1844年的银行法¹⁰⁴中,力图摆脱这种困境,办法是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以银块作准备金的银行券,但银储备不得超过金储备的 $\frac{1}{4}$ 。在这种情况下,银的价值每次都按照它在伦敦市场上的金价格来估价。——关于金银相对价值发生变动的几个大的历史时代,可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36页及以下几页。¹⁰⁵

衡国际差额时，第一种职能起着主要作用。由此产生重商主义体系的口号——贸易差额！⁽¹⁰⁷⁾金银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遭到破坏的时候。最后，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形式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但这种转移由于市场的偶然性或者由于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不能以商品形式得到实现。⁽¹⁰⁸⁾

每个国家，为了国外贸易，需要有准备金，为了国内的流通，也需要有准备金。因此，这些准备金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和国内支付手段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普遍货币

(107) 重商主义体系认为，国际贸易的目的无非是通过金银来结算贸易顺差，而重商主义体系的反对者又完全误解了普遍货币的职能。我曾经以李嘉图为例子来说明，对贵金属的国际运动的错误理解，不过是反映了对调节国内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同上，第150页¹⁰⁶）他的错误教条是：“除了由于流通手段过剩以外，决不会有贸易逆差……铸币的输出是由它的价格低引起的，这不是贸易逆差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¹⁰⁷这个教条我们在巴尔本那里已经见过：“贸易差额，如果它存在的话，不是货币从一国输往别国的原因；它是由各国的金银块价值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59页）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文献。这门科学的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中，称赞巴尔本的这种先见之明，但十分小心地避而不谈“通货原理”¹⁰⁸的荒谬前提在巴尔本那里所表现的素朴形式。这篇书目没有批判性，甚至是不正直的，这种情况在他叙述货币学说史的几章中尤为突出，因为在这里，麦克库洛赫向奥弗斯顿勋爵（前银行家劳埃德）大献殷勤，把他捧为“银行界公认的领袖”¹⁰⁹。

(108) 例如，在提供外援，为进行战争或为恢复银行现金支付而举债等情况下，价值的货币形式是必不可少的。

的职能。⁽¹⁰⁹⁾在后一种职能上,始终需要物质货币,即金和银;因此,詹姆斯·斯图亚特为了把金银和它们的仅仅是地方的代表区别开来,就明确地指出金银是世界货币。¹¹⁰

金银的流动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银从产地分散到整个世界市场,在那里,在不同程度上为不同国家所吸收,以便进入国内流通渠道,补偿磨损了的铸币,供给奢侈品的材料,并且在最后凝固为贮藏货币。⁽¹¹⁰⁾这第一种流动方向是由商品直接在金银的产地同金银相交换的那些国家造成的。同时,贵金属不断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这是一个随着汇率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运动。⁽¹¹¹⁾

生产高度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¹¹²⁾除了某些

(109) “准备金能够很好地了结一切国际贸易事务,而无须求助于一般流通,要证明这点,我想再也没有比下面这个例子更有说服力了:法国在遭到外国侵略的打击后刚刚开始恢复,就能够轻易地在 27 个月内偿付了同盟国加在它身上的近 2 000 万的战争赔款,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但是却并没有引起国内贸易的混乱,也没有引起汇率的任何急剧的波动。”(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 年伦敦第 2 版第 141 页)

(110) “货币根据各国的需要在各国间分配……因为它总是被产品所吸引。”(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 年巴黎版第 916 页)“不断提供银和金的矿山足以向每个国家提供所需要的数量。”(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 年伦敦版第 40 页)

(111) “汇率每周都会涨落,在一年的某些时间内达到的比率对一国不利,而在另一些时间内又对它有利。”(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 年伦敦版第 39 页)

(112) 一旦加上兑换银行券的基金的职能,这些不同的职能彼此就会发生危险的冲突。

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113)

(113) “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要的货币是死资本,不会给拥有这些货币的国家带来任何利润。”(约翰·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上等餐具,金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想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高的地方去生息。”(威廉·配第《货币略论》第39页)“货币不过是政治躯体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的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脂肪使肌肉的动作滑润,在缺乏食物时维持躯体,使肌肤丰满,身体美化;同样,货币使国家的活动敏捷,在国内歉收时用来从国外进口食物,清偿债务……使一切美化;当然配第最后讽刺说,特别是使那班富有货币的人美化。”(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91年伦敦版第14[、15]页¹⁰³)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

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资本只是在商品生产和贸易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才出现的。两大陆的贸易和市场的建立在 16 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史。

如果撇开使用价值的交换,也就是说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方面,只考察商品流通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最后的产物。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

如果从历史上研究资本的起源,我们就会看到,资本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¹⁾

(1) 以人身的统治关系和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地产权力和非人身的货币权力之间的对立,可以用两句法国谚语明白表示出来:“没有一块土地没有领主”,“货币没有主人”。

然而,我们不需要回顾过去,只要观察今天眼前发生的事情就足够了。现在每一个新资本仍然以货币形式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货币市场上,经过特殊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 $M-A-M$, 商品转化为货币, 货币再转化为商品, 为买而卖。但除这一形式外, 我们还看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式 $A-M-A$ (货币—商品—货币), 货币转化为商品, 商品再转化为货币, 为卖而买。一切在运动中通过这后一种流通的货币都转化为资本, 成为资本, 而且按使命来说, 已经是资本。

现在我们较仔细地研究一下 $A-M-A$ 这个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一样, 它也经过两个对立阶段。在第一阶段 $A-M$ (买) 上, 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 $M-A$ (卖) 上, 商品转化为货币。这两个阶段的统一是通过这样一个运动表现出来的: 货币和商品交换, 同一商品再和货币交换, 即为卖而买; 或者, 如果不管买和卖的形式上的区别, 那就是用货币购买商品, 又用商品购买货币⁽²⁾。

这个运动的结果, 是货币和货币交换, $A-A$ 。假如我用 100 镑买进 2 000 磅棉花, 然后又把 2 000 磅棉花按 110 镑卖出, 结果我就是用 100 镑交换 110 镑, 用货币交换货币。

很清楚, 如果通过流通过程 $A-M-A$ 这样一个圈子去交换数量相等的货币, 比如说, 100 镑和 100 镑交换, 那么这个流通过程就

(2) “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 用商品购买货币。”(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 德尔编《重农学派》第 2 部第 543 页)

是荒唐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更好些，他把 100 镑稳稳当当地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另一方面，不论商人把他用 100 镑买来的棉花卖 110 镑，还是被迫以 100 镑，甚至以 50 镑出手，他的货币总是经过一种独特和新奇的运动，这种运动根本不同于例如在农民手中的货币的运动——出售小麦和购买衣服。因此，首先我们应该说明 $A-M-A$ 和 $M-A-M$ 这两种循环形式的具有特征意义的区别。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这种形式上的区别后面的实际上的区别。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

这两种运动都分成同样两个对立阶段： $M-A$ （卖）和 $A-M$ （买）。在其中每一个阶段上，都是同样的两个物的要素即商品和货币互相对立，都是扮演同样两种经济角色的两个人即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每一个运动都是同样的对立阶段即买和卖的统一，这种统一每次都是通过三个契约当事人的登场而实现的：一个只是卖，一个只是买，一个既买又卖。

但是， $M-A-M$ 和 $A-M-A$ 这两个运动的区别首先就在于同样对立的阶段具有相反的次序。简单流通以卖开始，以买结束；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以买开始，以卖结束。作为运动的起点和复归点的，在前一场合是商品，在后一场合是货币。充当中介的，在前一形式是货币，在后一形式则是商品。

在 $M-A-M$ 这个流通中，货币最后转化为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于是，货币就最终花掉了。而在 $A-M-A$ 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花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

出去。(3)

在 M—A—M 形式中,同一块货币两次变换位置。卖者从买者那里得到货币,又把它付给另一个卖者。整个运动以交出商品收入货币开始,以交出货币得到商品告终。在 A—M—A 形式中,情形则相反。在这里,两次变换位置的,不是同一块货币,而是同一件商品。买者从卖者手里得到商品,又把商品交到另一个买者手里。在简单流通中,同一块货币的两次变换位置,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最终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在这里,同一件商品的两次变换位置,则使货币又流回到它最初的起点。

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同商品是否贱买贵卖没有关系。后者只影响流回的货币额的大小。只要买进的商品再被卖掉,就是说,只要 A—M—A 的循环全部完成,就发生货币流回的现象。可见,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和单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之间,存在着可以感觉到的区别。

一旦出卖一种商品所得到的货币又被用去购买另一种商品, M—A—M 的循环就全部结束。如果货币又流回到起点,那只是由于循环的整个过程的更新。假如我把一夸特小麦卖了三镑,然后用这三镑买了衣服,对我来说,这三镑就是最终花掉了。我和这三镑再没有任何关系。它在衣商的口袋里了。即使我又卖了一夸特小麦,我所得到的货币并不是第一次交易的结果,而是这一交易重复的结果。一旦我结束了这第二次交易,又买了东西,货币就又离开我。因此,在 M—A—M 这个流通中,货币的支出和货币的流回没有任何

(3) “如果购买一物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叫做预付货币;如果购买一物不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可以说是花掉了。”(《詹·斯图亚特著作集》,由其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1805年伦敦版第1卷第274页)

关系。在 A—M—A 这个流通中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如果货币没有流回，活动就失败了，运动就中断或没有完成，因为它的第二阶段，即作为买的完成的卖没有实现。

在 M—A—M 循环中，起点是一种商品，终点是另一种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转入消费。因此，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要，是使用价值。相反，A—M—A 循环是从货币出发，又返回货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

在简单流通中，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者都是商品。它们还是价值相等的商品。但它们同时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如小麦和上衣。这一运动的结果是产品交换，是体现着社会劳动的不同物质的变换。相反，A—M—A 这个流通乍一看来似乎是无内容的，因为是同义反复。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者都是货币。它们并不是作为使用价值在质上互相区别，因为货币正是商品的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商品的一切特殊使用价值都已消失。先用 100 镑交换成棉花，然后又用这些棉花交换成 100 镑，就是说，货币兜了一个圈子又交换成货币，同样的东西又交换成同样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既愚蠢又无用的活动。⁽⁴⁾ 一个货币额作为价值的代表，和另一个货

(4) 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驳重商主义者说：“人们不会用货币去交换货币。”（《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德尔编《重农学派》第 2 部第 486 页）有一本专门论述贸易和投机的著作写道：“一切贸易都是不同种物品的交换；而利益（商人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而产生的。用一磅面包交换一磅面包，这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因此，贸易同赌博相比形成有利的对照，因为赌博只是用货币交换货币。”（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解释》1841 年伦敦版）虽然柯贝特不知道，A—A，货币交换货币，不仅是商业资本，而且是一切资本特有的流通形式，但他承认，投机这种特殊贸易的形式是赌博的形式；但是后来出现了麦克库洛赫，他发现，为卖而买就是投机，这样，投机

币额只能有量的区别。A—M—A 运动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它的两极都是货币,从而没有质的区别而仅仅有量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用 100 镑买的棉花卖 100 镑+10 镑,即 110 镑。因此,这个运动的完整形式是 A—M—A'。其中的 A'=A+ΔA,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余额。我把这个余额或增长额叫做剩余价值(英文叫做 surplus value)。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

诚然,在 M—A—M 如小麦—货币—上衣这个流通中,两极 M 和 M 也可能是不等的价值。农民卖小麦的价钱可能高于小麦的价值,或者他买上衣的价钱可能低于上衣的价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骗。但是这种已经交换的价值上的差异,对这种流通形式来说完全是偶然的。这种流通形式的两极的等价是这种流通的正常的性质。相反,这种等价会使 A—M—A 运动完全丧失意义。

为购买其他商品而出卖商品的过程的更新或重复,在流通以外,会遇到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的界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同一的物,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这个过程的两极的同一性本身使这种运动没有止境。诚然,A 变成了 A+ΔA,100

和贸易的区别就消失了。“任何交易,只要一个人购买产品是为了再卖出去,实际上就是投机。”(麦克库洛赫《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1847 年伦敦版第 1058 页)平托,这个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平达,更是无比天真,他说:“贸易是一种赌博(这句话是从洛克那里抄袭来的),不过从乞丐那儿是赢不到任何东西的。如果有人在这段时间内赢了所有的人的所有的钱,那他只有心甘情愿地把赢得的绝大部分钱退回去,才能再赌。”(平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 年阿姆斯特丹版第 231 页)

镑变成了 100 镑 + 10 镑。但是从质的方面来看,110 镑和 100 镑一样,都是货币。而从量的方面来看,第一个价值额和第二个价值额一样,也是有限的价值额。如果把这 100 镑当做货币用掉,那它的作用马上就改变了。它就不再执行资本的职能了。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来,那它就凝固为贮藏货币,即使藏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增加分毫。因此,如果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价值增殖,那么 110 镑和 100 镑一样也需要增殖。

诚然,原预付价值和它在流通中所增殖的剩余价值在一瞬间是有区别的,但这个区别马上又消失了。流通终了时,不是 100 镑原价值在一边,10 镑剩余价值在另一边。得到的结果是一个 110 镑的价值。这个价值和原先的 100 镑处于同样的形式和条件下,准备开始同样的运动。⁽⁵⁾每一次为卖而买的循环 A—M—A 的终项,成为同样的新循环的始项。简单流通——为买而卖——只是达到流通以外的目的,即占有使用价值,占有满足一定需要的物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⁶⁾

(5) “资本分为两部分,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所获得的增殖……但在实践中这种利润又被合并到资本上,并和资本一起投入周转中。”(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 年巴黎版第 99 页)

(6) 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他从经济出发。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样的使用价值构成的;因为满足优裕生活所必需的物的量不是无限的。但是还有另一种谋生术,把它叫做货殖是很适当、很贴切的。由于货殖,财富和财产的界限看来就不存在了。商品交易<“η καπηλική”,按字面意义是零售贸易,亚里士多德采用这个形式,是因为在这个形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

作为这一运动的代表,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A—M—A'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的、内在的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决定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识和意志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⁷⁾,而只是谋取新的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交换价值追逐狂⁽⁸⁾,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

值)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货殖范围,因为在这里,交换只限于买者和卖者需要的物品。”接着他又说,商品交易的最初形式是物物交换,但是随着它的扩大,产生了货币。随着货币的发明,交换必然发展成为商品交易,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本身就是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这和那种具有很快就可以达到的外在目的的技术是不同的。同样,货殖按其性质来说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它所追求的是绝对财富。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前者的目的是与货币不同的东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由于把这两种形式混为一谈,有人就以为,无限地获取和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最终目的。”(散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1篇第8、9章)

(7) “虽然商人并不轻视已经获得的利润,但他的目光却总是盯着未来的利润。”(安·詹诺韦西《市民经济学讲义》(1765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8卷第139页)

(8) “这种不可遏止的追逐利润的狂热,这种可诅咒的求金欲,始终是资本家的特点。”(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伦敦版第163页)当然,这句名言并不妨碍麦克库洛赫之流,在理论上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例如在考察市场过剩问题时,还是把资本家变成了善良的市民,好像他关心的只是使用价值,好像他真正像狼一般贪求的,只是鸡蛋、棉花、帽子、皮靴以及其他各种极为平常的物品。

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只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却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认为把货币从流通的风险中拯救出来⁽⁹⁾,就可以获得价值的永恒的生命,而更加精明的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却达到了这一目的。⁽¹⁰⁾

商品的价值在简单流通中所采取的独立形式,即货币形式,只是充当产品交换的中介,运动一结束就消失。相反,在 $A-M-A'$ 流通中,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作为价值本身的不同形式执行职能,货币是价值的一般形式,商品是价值的特殊形式,也可以说是隐蔽的形式。⁽¹¹⁾ 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如果停留在价值交替表现的这些形式中的这一或那一种形式上,就会得出两个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¹²⁾ 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表现为具有自己的生命的自动的实体,这个实体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形式,也改变着自己的量,而且作为原价值自发地生产出新的增长额,即剩余价值,最后自行增殖起来。总之,似乎价值因为是价值,就获得了生出价值、产仔,或者至少生金蛋的神秘能力。

由于变为资本的价值不断改变形式和量,因此它首先需要—

(9) “ $\Sigma\omega\zeta\epsilon\upsilon\nu$ ”,拯救,是希腊人用来表示货币贮藏的一种特别用语。同样,英语“to save”也是既有“拯救”,又有“储蓄”的意思。

(10) “事物在直进中没有无限性,在循环中却有。”(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3卷1803年米兰版第165页])

(11) “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些物质的价值。”(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129页)

(12) “用于生产目的的货币(通货!)就是资本。”(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年伦敦版第1卷第1章[第55页])“资本就是商品。”(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4页)

能够确定它同自身的同一性的形式。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它在货币形式上开始、结束并重新开始自行增殖的过程。它以前是 100 镑,现在是 110 镑,等等。但货币本身在这里只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为价值有两种形式。如果撇开商品形式,货币就不能成为资本。同一商品两次变换了位置,第一次是在它取代预付货币的买中,第二次是在货币重新流回的卖中;正是这两次位置变换促使货币流回它的起点,而且流回的货币比投入流通的货币还多。因此,货币在这里不像在货币贮藏的情况下那样,采取一种与商品相敌对的立场。资本家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外表如何,气味如何,“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而且是造出货币的奇妙手段。

我们看到,在简单流通中,商品和以货币形式与商品相对立的商品价值之间的形式上的分离完成了。现在,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不仅如此,它不是表示商品关系,而可以说是同它自身发生私自关系。价值在自身中把原价值同剩余价值区别开来,就像上帝在自身中区分出圣父和圣子,二者只是一个人,而且年龄相同一样。这是因为预付的 100 镑只是由于有了 10 镑剩余价值才成为资本,而它一旦成为资本,一旦父亲生了儿子,儿子又生了父亲,一切区别就消失了,而唯一的存在物就是 110 镑。

因此,价值成了递增的价值,成了能够发芽、成长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它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离开流通,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¹³⁾

(13) “资本……是不断增大的永久的价值。”(西尔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 1 卷第 88、89 页)

$A-A'$ ，生出货币的货币，产仔的货币——**money which begets money**¹¹¹——资本的最初解释者重商主义者就是这样来描绘资本的。

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 $A-M-A'$ ，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之间，即在流通领域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最后，对生息资本来说， $A-M-A'$ 的形式简化为这种形式的没有中项的两极，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 $A-A'$ ，表现为等于更多货币的货币，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因此， $A-M-A'$ 事实上是在流通中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

第五章

资本总公式的矛盾

货币转变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资本流通和简单流通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同样两个对立阶段,卖和买的次序相反。但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区别,为什么能够使这些现象的性质发生如此神奇的变化呢?

不仅如此。这些互相补充的阶段只是对一起交易的三个“贸易伙伴”中的一个人来说,才是颠倒的。作为资本家,我从 A 手里购买商品,再把商品卖给 B;作为简单的交换者,我把商品卖给 B,然后从 A 手里购买商品。对 A 和 B 来说,这个区别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是作为买者或卖者。在他们面前,我自己或者是简单的货币所有者,或者是简单的商品所有者。而实际上,在这两个交易序列中,对于一个人我总是买者,对于另一个人我总是卖者;对前者来说我是货币,对后者来说我是商品,不论对于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我都不是资本,不是资本家,不是高于货币或商品的什么东西的代表。对我来说,向 A 购买商品和把商品卖给 B,构成一个序列。但是这两个项之间的联系,只有对我来说才是存在的。A 并不关心我同 B 的交易,B 并不关心我同 A 的交易。假如我想向他们说明我把这二项的次序颠倒

过来而作出的特殊功绩,他们就会向我指出,是我把次序本身弄错了,整个交易不是由买开始和由卖结束,而是恰恰相反。实际上,我的第一个行为买,在 A 看来是卖,我的第二个行为卖,在 B 看来是买。A 和 B 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还会说,这整个交易不过是在耍把戏。今后前者可以直接把商品卖给后者,后者可以直接向前者购买商品。这样,一切可以化为普通流通的一个单方面的行为:从 A 看来只是卖,从 B 看来只是买。可见,我们把这个流通连续发生的阶段的次序颠倒过来,并没有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而我们必须考察的是:这个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否允许进入这一领域的价值发生增殖,也就是说,是否允许剩余价值形成。

我们拿表现为单纯的商品交换形式的流通现象来说。每当两个既是生产者又是交换者的人彼此购买对方的商品,并到支付日结算债务差额时,就出现这种现象。在这里,货币只是观念地充当计算货币,它把商品的价值表现为商品价格。就使用价值来看,我们的交换者显然都能得到好处。双方都是让渡对自己没有用的产品,而得到他们需要的其他产品。不仅如此,卖葡萄酒买小麦的 A,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大概会比 B 酿出更多的葡萄酒,而种植小麦的 B,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大概会比 A 生产出更多的小麦。可见,与两人不进行交换而每人都不得不得为自己生产这两种消费物品相比,用同样的交换价值,前者能得到更多的小麦,后者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可以说,“交换是一种双方都得到好处的交易”(14)。就交换价值来看,情况就不同了。

(14) “交换是一种奇妙的交易,交换双方总是(!)得到好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68页)该书后来也以《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名称出版。

“一个有许多葡萄酒而没有小麦的人，同一个有许多小麦而没有葡萄酒的人进行交易，在他们之间，价值 50 的小麦和价值 50 的葡萄酒相交换了。这种交换不论对哪一方来说都不是财富的增多，因为每一方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价值，是和他在交换以前握有的价值相等的。”⁽¹⁵⁾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充当商品的中介，以及买和卖的行为因此而分离开来，这对事情毫无影响。⁽¹⁶⁾ 商品的价值不是流通的结果，它在商品进入流通以前就表现为商品价格。⁽¹⁷⁾

如果把不是从流通的内在规律中产生的偶然情况撇开，那么，在这种流通中发生的，除了一种有用产品被另一种有用产品代替以外，只是商品的形态变化，即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同一价值，即同量的物化社会劳动，总是在同一个交换者手里，虽然这个价值交替地表现为他自己的产品的形态、货币的形态和别人的产品的形态。这种形式变换并不引起价值量的改变。商品价值所经历的唯一变化，只限于它的货币形式的变换。起初，这个货币形式是待售商品的价格，然后是在这个价格中表现出来的同一个货币额，最后是等价商品的价格。这种形式变换，像一张 100 法郎的钞票换成 4 个路易、4 个 100 苏的硬币和 5 法郎一样，对价值量并没有影响。既然流通对商品价值来说只包含形式变换，那么，流通的结果就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甚至，庸俗经济学，每当它想从总体上研究现象的时候，也假定供求是平衡的，就是说，假定供求对价值的影响是完全不存在的。因

(15) 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德尔编《重农学派》第 2 部第 544 页。

(16) “这两个价值中有一个是货币，还是两个都是普通商品，这件事本身是毫无关系的。”（同上，第 543 页）

(17) “不是契约当事人决定价值；价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 年巴黎版第 906 页）

此,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换价值上,双方都不能得到利益。相反地,在这里可以使用一句名言:“在平等的地方,没有利益可言。”⁽¹⁸⁾诚然,商品可以按照和自己的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出售,但这种偏离是违反商品交换规律的。⁽¹⁹⁾商品交换就其正常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不是赢利的手段。⁽²⁰⁾

因此,那些试图把商品流通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人,几乎总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弄混了、混淆了。例如,孔狄亚克就是一个见证,这位著作家说:

“认为在交换中是等量的价值交换等量的价值,那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契约当事人每一方总是用较小的价值去换取较大的价值。如果真的总是等量的价值交换,那契约当事人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到利益。但双方都得到利益,或都应该得到利益,为什么呢?物只有和我们的需要相关的价值。某物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了,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少了,或者相反……不能设想,我们会把自己消费所必需的物拿去卖。我们是要把剩余物,把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拿去卖,以取得自己需要的东西……人们自然会认为,只要每个被交换的物在价值上等于同一货币量,那就是等量的价值交换等量的价值。但还必须考虑到另一方面;试问:我们双方不是都用剩余物来交换需要物吗?”⁽²¹⁾

(18) 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4卷第244页。

(19) “当某种外部情况使价格降低或提高时,交换就会对一方不利,于是平等被破坏了,但这种破坏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交换造成的。”(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904页)

(20) “交换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它是在两个相等的价值之间订立的。因此,它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所付和所得是相等的。”(勒特罗纳,同上,第903[、904]页)

(21) 孔狄亚克《商业和政府》(1776年),载于德尔和莫利纳里编《政治经济学文集》1847年巴黎版第267[、291]页。

我们看到,孔狄亚克不但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在一起,而且十分幼稚地设想,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必须自己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而只把超出自己需要的余额即剩余物投入流通。⁽²²⁾然而,当现代经济学家要说明交换的发达形态即贸易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时候……他们便经常重复孔狄亚克的论据。例如,有人说:

“贸易使产品增添价值,因为这些产品在消费者手里比在生产者手里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严格说来,贸易应看做是一种生产活动。”⁽²³⁾

但是,人们购买商品不是付两次钱:一次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一次是为了它的交换价值。如果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买者比对卖者更有用,那么商品的货币形式对卖者比对买者就更有用。不然他何必出卖商品呢?因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例如,买者把针织品商人的袜子转化为货币,严格来说,就是完成一种生产活动。

假如互相交换的是价值相等的商品,或价值相等的商品和货币,就是说,是等价物,那么很明显,任何人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都不会大于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剩余价值形成。尽管纯粹形式上的流通只容许有等价物的交换,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事情并不是纯粹地进行的。因此,我们假定有非等价物的交换。

在任何情形下,在市场上,只是交换者与交换者相对立,他们彼

(22) 勒特罗纳在回答他的朋友孔狄亚克时说得很有理:“在发达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剩余的东西。”同时他还讽刺地解释说:“假如交换双方都以同样少的东西换得同样多的东西,那么他们得到的也就同样多。”因为孔狄亚克对交换价值的性质一无所知,所以,威廉·罗雪尔教授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幼稚概念的导师。见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

(23) 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纽约版第175页。

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它使交换者处于互相依赖的关系中,因此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他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别人需要的物品。除了商品的有用性的区别以外,商品之间就只有一种区别,即商品的自然形式和它的价值形式即货币之间的区别。同样,交换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卖者即商品所有者和买者即货币所有者之间的区别。

假定卖者享有某种无法说明的神秘的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例如把价值只有 100 的商品卖 110,即加价 10%。这样,卖者就得到剩余价值 10。但是,他当了卖者以后,又成为买者。现在第三个交换者作为卖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贵卖 10%的特权。我们那位交换者一方面赚得了 10,但是另一方面又失去 10。⁽²⁴⁾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全体交换者都高于商品价值 10%互相出卖商品,这与他们把商品按其实际价值出售完全一样。商品的这种普遍加价,其结果就像例如用银代替金来计量商品价值一样。商品的货币名称即名义价格上涨了,但商品间的价值比例仍然不变。

我们再反过来,假定买者享有某种特权,可以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在这里,不用说,买者还要成为卖者。他在成为买者以前,就曾经是卖者。他在卖时就已经失去了 10%,虽然他在买时赚得 10%,结果一切照旧。⁽²⁵⁾

(24) “靠提高产品的名义价值…… 卖者不会致富…… 因为他们作为卖者所得的利益,在他们作为买者时恰恰又失掉了。”〔约·格雷〕《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1797 年伦敦版第 66 页)

(25) “假如有人不得不把价值 24 利弗尔的产品卖 18 利弗尔,那么,当他用这笔钱再去购买时,这 18 利弗尔同样能买到 24 利弗尔的东西。”(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 年巴黎版第 897 页)

因此,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转化为资本,既不是由于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也不是由于买者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²⁶⁾

即使加进一些毫不相干的因素,问题也绝不会变简单些。例如,托伦斯说:

“有效的需求在于,不管交换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消费者能够和愿意〈1〉付给商品的部分,大于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²⁷⁾

在流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是作为卖者和买者相对立。说生产者得到剩余价值是由于消费者付的钱超过了商品的价值,那不过是把交换者作为卖者享有贵卖的特权这个命题加以伪装罢了。卖者自己生产了商品,或代表它的生产者,同样,买者也是自己生产了已表现为货币的商品,或代表它的生产者。因此,两极都是生产者。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买,一个是卖。商品占有者在生产者的名义下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在消费者的名义下对商品付出高价,这并不能使我们在解决问题时前进一步。⁽²⁸⁾

因此,坚持剩余价值来源于名义上的加价或卖者享有贵卖商品的特权这一错觉的代表者,不得不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或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从我们上面达到的观点来看,即从简单流通的观点来

(26) “因此,任何一个卖者通常不能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他购买其他卖者的商品时通常也必须付出高价。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个消费者通常不能以低价购买商品,否则他也必须降低他出售的商品的价格。”(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德尔编《重农学派》第2部第555页)

(27) 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349页。

(28) “利润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想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消费者又是谁呢?”(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83页)

看,还不能说明存在着这样一个阶级。但是,我们先假定有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不断用来购买的货币,必然是不断地、白白地、不经过交换、自发地或依靠一种既得的权利,从生产者的钱柜里流到这个阶级的钱柜里的。把商品高于价值卖给这个阶级,不过是收回一部分失去的货币罢了。⁽²⁹⁾例如,小亚细亚的城市每年向古罗马交纳贡款,就是如此。罗马则用这些货币购买小亚细亚城市的商品,而且按高价购买。小亚细亚人欺骗了罗马人,通过贸易收回一部分征服者勒索的贡款,但是,最后受骗的还是小亚细亚人。他们的商品仍旧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支付的。这绝不是发财致富或创造剩余价值的方法。

所以,我们还是不得不留在卖者也是买者、买者也是卖者的商品交换范围里。我们陷入困境,也许是因为我们把流通当事人变成人格化的范畴,而没有考虑到他们的个人性质。假定交换者 A 非常狡猾,总是使他的同行 B 或 C 受骗,而 B 和 C 无论如何也报复不了。A 把价值 40 镑的葡萄酒卖给 B,换回价值 50 镑的小麦。他把货币变成了更多的货币,把自己的商品变成了资本。我们仔细地来看一下。在交换以前, A 手中有价值 40 镑的葡萄酒, B 手中有价值 50 镑的小麦,总价值是 90 镑。在交换以后,总价值不变。流通中的价值没有增大一个原子,只是它在 A 和 B 之间的分配改

(29) “假如一个人的商品没有买者,那么马尔萨斯先生是否会劝他把钱付给别人,让别人用这笔钱购买他的商品呢?”一个很气愤的李嘉图的信徒这样质问从经济学的观点并不十分赞美^①纯买者阶级,即消费者阶级的马尔萨斯及其门徒查默斯牧师。见《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 年伦敦版第 55 页。

^① 此处的“并不十分赞美”德文第 1 版至第 4 版为“赞美”。——编者注

变了。如果 A 不加掩饰地从 B 那里偷去 10 镑,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显然,流通中的价值总量不管其分配情况怎样变化都不会增大,正像一个犹太人把安女王时代的一里亚当做一基尼来卖,不会使本国的贵金属量增大一样。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自己来发财致富。(30)

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31) 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32)

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时要把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暂时搁在一边。

A—M—A' 的形式,为贵卖而买,在商业资本的运动中表现得最明显。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完全是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但是,因为

(30)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虽然是(或许正因为是)研究院院士¹¹²,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说,资本家赚得利润,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一切商品”。他们卖给谁呢?“首先是卖给他们自己。”(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239页)

(31) “两个相等的价值相交换,既不增大也不减少社会上现有价值的量。两个不相等的价值相交换……同样也改变不了社会价值的总额,虽然它用从一个人手中取走的财富增添了另一个人手中的财富。”(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第2卷第443、444页)这个论点是萨伊几乎逐字逐句地从重农学派那里抄袭来的,当然他并不关心从这个论点会得出什么结论。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他是怎样利用当时已经过时的重农学派的著作,来增加自己的“价值”的。萨伊先生最著名的论点:“产品只能用产品来购买”,用重农学派的原话来说就是:“产品只有用产品来支付”(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899页)。

(32) “交换不会给产品以任何价值。”(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168页)

不能从流通本身来说明货币转化为资本,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所以只要是等价物相交换,商业资本看来是不可能存在的。⁽³³⁾商业资本看来只能由作为中介寄生在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人对他们双方榨取的双重利润中产生。富兰克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³⁴⁾

关于商业资本所说的一切,更加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在第一种场合,两极,即投入市场的货币和从市场流回的或多或少增加了的货币,至少还以买和卖,以流通运动本身为中介。在第二种场合,A—M—A'形式简化成没有中项的两极 A—A',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流通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

“货殖是一种二重性的科学,一方面它和商业有关,另一方面它和理财术有关;从后者的角度来看,它是必要的,值得称赞的;从以流通为基础的前者的角度来看,它理应受到谴责(因为它不以物的本性为基础,而以互相欺骗为基础)。所以,高利贷者受人憎恨完全理所当然,因为在这里,货币本身成为赢利的手段,没有用于发明它的时候的用途。货币的用途是为了有利于商品交换,但利息却使货币生出更多的货币。它的名称(τόκος,生育出来的东西,产生出来的东西)就是由此而来的,因为孩子和父母是相像的。在所有的赢利方式中,这个方式是最违反自然的。”⁽³⁵⁾

(33) “在不变的等价交换支配下,商业是不可能的。”(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67页)“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基于下述事实:物品的价值不等于人们在买卖中为该物品提供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5、]96页)

(34) 《本杰明·富兰克林全集》,斯帕克斯编第2卷《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1836年波士顿版第376页]。

(3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0页。

在我们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是派生的形式,同时我们要说明,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基本形式(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形式)的资本。

上面已经说明,投入流通的价值总额不能在流通中增加,因此,在流通之外必然会发生某种情况使剩余价值能够形成。⁽³⁶⁾但是,剩余价值能不能从流通以外的什么地方产生呢?流通归根结底是既是生产者又是交换者的人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在流通以外,只有交换者和他自己的商品,后者包含着他自己的、按一定社会规律计量的劳动量。这个劳动表现为产品的价值,而这个价值表现为计算货币,因此劳动就表现为一个价格,例如10镑。但是,他的劳动不能实现为产品的价值加上超过这个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不能实现为一个等于10镑又等于11镑的价格,也就是说,不能实现为一个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生产者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不能创造出自行增大的价值。他能够通过新的劳动给原有价值添加新价值,从而使商品的价值增大,例如把皮子制成皮靴就是这样。这时,同一个材料由于吸收了更多的劳动,也就有了更大的价值。因此,皮靴的价值大于皮子的价值,但是皮子的价值仍然和从前一样。它没有在制作皮靴时添加剩余价值。可见,既是生产者又是交换者的人在流通领域以外,不同其他交换者接触,就完全不能使价值增殖,或使价值具有产生剩余价值的属性。但是,如果不能使价值增殖或使价值具有产生剩余价值的属性,那么,他的货币或商品就不能转化为资本。

(36) “在通常的市场条件下,利润不是由交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么,在这种交易以后也不会有。”(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84页)

这样,就得到一个双重的结果。

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流通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³⁷⁾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蛹的货币占有者,首先必须按商品的公平的价值购买商品,然后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最后,他必须取出比他预付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从货币占有者变为资本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¹¹³

(37) 根据以上说明,读者可以知道,这里的意思不过是,即使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值与商品价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做纯粹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以商品交换为基础从整体上考察资本形成的现象,而不被那些只能使问题复杂化的偶然情况所干扰。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绝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消,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使平均价格成为市场价格的内在基准。这个基准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认清这一点是符合工业家的利益的话,他就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么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像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

第六章

劳动力的买和卖

货币由于价值的增加必然转化为资本，而价值的增加不可能从这个货币本身产生。如果货币充当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那么它只是实现它所购买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

它如果保留原样，保留自己原来的形式，它就可以说是价值化石了。⁽³⁸⁾

因此， $A-M-A'$ ，即货币转化为商品，同一商品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变化，必须从商品中产生。但是，这种变化不可能发生在第二个行为 $M-A'$ 即商品的再度出卖上，因为这一行为只是使商品从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现在，如果我们考察第一个行为 $A-M$ ，即买，那么我们会看到交换是在等价物之间进行的，从而商品具有的交换价值不多于转化为该商品的货币。最后我们只能这样假定，即变化来自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来自于商品的使用或消费。但是，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交换价值的变化，交换价值的增大。为了能够从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取得交换价值，货币占有者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

(38) “在货币形式上……资本是不产生利润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267页)

品,它的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交换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消费就是劳动的实现,从而是价值的创造。

我们的货币占有者确实市场上找到了这种具有独特属性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我们应该把劳动能力或劳动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身中存在的、他生产有用物时必须使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但是,要使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就必须具备各种先决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引起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会引起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被它自己的占有者提供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因此,劳动力占有者必须能够支配劳动力,也就是说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³⁹⁾货币占有者和他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相同的交换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买,一个卖,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

这种关系要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始终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转化为奴隶,从商人转化为商品。他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就必须让买者只是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这样,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⁴⁰⁾

(39) 在历史学家¹¹⁴那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错误和荒谬的论断:在古典古代,资本就有了充分的发展,“所缺少的只是自由工人和信用事业”。蒙森先生的《罗马史》也充满了类似的混乱。

(40) 各种立法都规定了劳动契约的最长期限。在自由劳动的民族里,一切法典都规定了解除契约的条件。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墨西哥(美国南北战争⁷前,从墨西哥夺去的领土也是这样,库扎政变¹¹⁵前多瑙河地区的情况,如果说

货币占有者要找到购买劳动力机会的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实现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机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做商品提供和出卖。

一个人要出卖与他的劳动力不同的商品，他自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例如没有皮革，他就不能做皮靴。此外，他还需要有生活资料。任何人，即使是未来音乐的创作家，都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也不能靠尚未生产好的使用价值过活。今天，就像人从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第一天起一样，人在他生产以前和生产期间不能不消费。如果产品是商品，它就必须卖掉，以便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劳动者。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从二方面来看的：一方面，劳动者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任意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可以说自由得一无所有，完全失去了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劳动者处在流通领域中呢？对这个问题货币占

不是名义上那么也至少在实际上是这样做），奴隶制采取债役这种隐蔽的形式。因为债务要以劳役偿还，而且要世代相传，所以不仅劳动者个人，而且连他的家族都成为别人及其家族的财产。胡阿雷斯在墨西哥废除了抵债劳役¹¹⁶。所谓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颁布一道敕令，又把它恢复了。华盛顿的众议院一针见血地谴责这个敕令是恢复墨西哥的奴隶制的敕令。

“我可以把我的体力上和智力上的技能和活动能力在限定的时期内让渡给别人使用，因为在这个界限以内，它们同我的存在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只保持着一种外在的关系。如果我把我的在劳动中实现的全部时间和我的全部生产活动都让渡给别人，那么，我就把这里面所包含的实体，就是说我的普遍的活动和我的人身，变成别人的财产了。”（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104页第67节）

有者不感兴趣,在他看来,劳动市场只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货币占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没有任何自然的根据,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劳动产品要转化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例如,劳动产品只要用于直接满足它的生产者的需要,就不能成为商品。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不属于单纯的商品分析的范围。即使绝大多数产品被生产者自己消费,没有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能够产生。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产品要成为商品,需要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发展阶段是可以与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并存的。

另一方面,产品交换必须已经具有商品流通的形式,货币才能够登上舞台。货币的各种职能,即单纯的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储备金等等,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相对来说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

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并不等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遇到在那里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整个新世界。资本从一开始就标志着社会生产的一个时代。⁽⁴¹⁾

现在应该进一步考察劳动力。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这个商品也具有价值。⁽⁴²⁾这个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作为价值,劳动力代表在它身上实现的社会劳动量。但是,实际上它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力量或能力而存在。假设个人已经存在,他就要通过再生产或维持自身来生产自己的活的力量。他要维持自己,保存自己,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发挥劳动力的人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劳动力是通过在外部表现出来而实现的。它在劳动中得到表现和确认,而这种劳动本身又需要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消耗越大,补偿费用也越大。⁽⁴³⁾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

(41) 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具有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式。

(42) “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他的力量的使用所付的报酬。”(托·霍布斯《利维坦》,载于莫尔斯沃思编《托马斯·霍布斯英文著作集》1839—1844年伦敦版第3卷第76页)

(43) 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劳动比奴隶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更微薄”。参看泰·蒙森《罗马史》1856年版第810页。

健康条件下重新开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他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

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自然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每个国家的雇佣阶级的起源，这个阶级形成的历史环境会长期地、极大地影响这个阶级的生活习惯和要求，从而影响这个阶级的生活需要⁽⁴⁴⁾。因此，劳动力从价值观点来看包含着一个道德的和历史的要素，这使它和其他商品区别开来。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生活资料的必要范围是一定的。

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因此，要使人们随时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们（这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所要求的），他们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⁴⁵⁾。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劳动者的补充者即劳动者子女的生活资料，使这种独特的交换者的种族在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⁴⁶⁾

另一方面，为改变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种类劳动的技能、准

(44) 威·托·桑顿的著作《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对这个问题有详细、有趣的论述。

(45) 配第。117

(46) “劳动的自然价格由生活必需的物品的量构成。这个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气候和习惯，为维持劳动者并使他有可能抚养一个有足够人数的家庭，以保证市场上需求的劳动者的数量不致减少所必需的。”(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1815年伦敦版第62页)劳动一词在这里错误地当做劳动力一词来使用。

确性和熟练程度,也就是说使它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所花费的商品等价物的量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商品总和中。

劳动力的价值等于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的价值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随着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改变而相应地改变。

一部分生活资料,如食品、燃料等等,每天都由于消费而毁灭,因而每天都必须有补充。另一些生活资料,如衣服、家具等等,消耗较慢,只是经过较长的时期才需要替换。有些商品要每天购买或支付,有些商品要每星期、每个季度购买或支付,如此等等。但不管这些支出在一年当中怎样分配,都必须由每天的平均收入来补偿。假如生产劳动力每天所需要的商品量=A,每星期所需要的商品量=B,每季度所需要的商品量=C,其他等等,那么这些商品每天的平均需要量= $\frac{365A+52B+4C}{365}$,等等。

平均日所需要的这个商品量的价值只代表生产这些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总额。我们假定这个劳动总额是6小时,那么每天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是半个工作日。生产劳动力每天所需要的这个劳动量,决定劳动力的日价值。假定6小时即半个劳动日平均生产的金量是3先令或1埃巨⁽⁴⁷⁾,那么1埃巨的价格就表现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如果劳动力所有者按每天1埃巨出卖劳动力,那么他就是按劳动力的公平的价值出售,而且根据我们的假定,正在把自己的埃巨转化为

(47) 1个德国埃巨等于3个英国先令。

资本的货币占有者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并支付这个价值的。

劳动力价格一旦降到生理上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是说,一旦降到这样一个商品量的价值,这个商品量如果再减少就会危及劳动者的生命,劳动力的价格就达到了它的最低限度。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那时劳动力仅仅是勉强维持。但是,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认为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规定是粗暴的,并且像罗西那样为之叹息,那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极其廉价的感伤主义:

“在考察劳动能力时,撇开生产过程中维持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那就是考察一种臆想的东西。谁谈劳动,谈劳动能力,同时也就是谈劳动者和生活资料,劳动者和工资。”⁽⁴⁸⁾

真是荒谬已极。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大家都知道,要有消化过程,光有健全的胃是不够的。谁谈劳动能力,谁就不会撇开维持劳动能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价值正是表现在劳动能力的价值上。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劳动者不但不引以为自豪反而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它的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于是,他就和西斯蒙第一样发现了: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⁴⁹⁾

在买者和卖者缔结契约时,由于被让渡的商品的特性,它的使用价值还没有在实际上转到买者手中。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

(48) 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第370〔、371〕页。

(49)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114页。

它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为它的生产要求耗费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它的应用,而这种应用自然只能在以后发生。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或力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换句话说,它的出售和它的利用并不是同时的。但是,对于这类通过出售在形式上让渡使用价值,而实际上并没有同时向买者转让使用价值的商品来说,买者的货币几乎总是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就是说,卖者在它的商品充当使用价值的或长或短的期限以后才能得到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劳动力按契约规定的一定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是在每周的周末。⁽⁵⁰⁾因此,到处都是劳动者把他的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劳动者在得到他的力的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力,总之,到处都是劳动者给资本家以信贷。⁽⁵¹⁾这种信贷不是什么空虚的幻想,这不仅为工资在资本家破产时受到损失所证明,而且也为一系列远非偶然的影响所证明。⁽⁵²⁾但是,无论货币执行购

(50) “一切劳动都是在它结束以后付给报酬的。”(《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第104页)“商业信用必定是从这样的时刻开始的,那时工人,生产的最初的创造者,有可能依靠自己的积蓄等待一两个星期、一个月、一个季度等等,再领取自己劳动的工资。”(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50页)

(51) 施托尔希说,“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但是,他又狡猾地补充说,他们除了会“失掉自己的工资,不冒任何风险……工人没有付出任何物质的东西”。(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36、]37页)

(52) 举个例子。在伦敦有两种面包房:一种是按面包的实际价值出售的即**全价面包房**。一种是低于这个价值出售的即**低价面包房**。后者占面包房总数的 $\frac{3}{4}$ 以上。(政府调查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关于《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第32[-34]页)这些**低价面包房**所出售的面包,几乎无例外地都掺了明矾、肥皂、石灰、白垩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一些富有营养的而又合乎

买手段还是支付手段的职能,这种情况丝毫不会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劳动力的价格同房屋的租金一样,已由契约确定下来,虽然它要在以后才实现。劳动力已经卖出,虽然报酬要在以后才得到。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暂且假定,劳动力占有者出卖劳动力时就立即得到了契约所规定的价格。

现在我们知道,付给劳动力这种独特商品的占有者的价值是

卫生的成分。(见上述蓝皮书¹⁰和《1855年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哈索尔医生《揭穿了掺假行为》1861年伦敦第2版)约翰·戈登爵士对1855年委员会说:“由于这种掺假,每天靠两磅面包度日的穷人,现在连他们所必需的 $\frac{1}{4}$ 的养料都得不到,且不说这种食品对他们的健康的危害了。”特里门希尔(《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第48页)认为,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明明知道掺假,可是还得忍受这一类东西,其原因就在于,对工人阶级来说,“面包房或零售店爱给他们什么样的面包,他们就得买什么样的面包,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是在劳动周的周末才得到报酬,所以,他们也只有“在周末才能支付全家一星期消费的面包钱”。特里门希尔还引用了一些证词:“众所周知,用这种混合物制成的面包是特意为这种主顾做的。”“在英格兰(特别是苏格兰)的许多农业区,工资是每两周、甚至每个月发一次。农业工人在得到支付以前不得不赊购商品。一切商品对他都是高价出售,他实际上已被盘剥他的店铺束缚住了。例如,在威尔特郡的霍宁舍姆,每月发一次工资,工人购买8磅面粉要付2先令4便士,而同样数量的面粉在别的地方则只要1先令10便士。”(《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4年版第264页)“1853年,佩斯利和基尔马诺克(苏格兰西部)的印染工人,通过一次罢工迫使他们的雇主把支付期从一个月缩短为两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31日》第34页)我们以英国许多煤矿主采取的方法为例,说明工人给资本家的信贷使工人受剥削的情况。由于资本家每月对劳动者只支付一次,因此,在这期间资本家就向他们提供预支,而预支往往就是劳动者不得不以高于市场价格支付的商品(实工资制)。“煤矿主惯用的一种办法就是,每月给他们的工人发一次工资,而在这一个月的每个周末给工人预支一次。预支是在店铺,即属于老板的零售店进行的。工人一手拿到钱,另一手又把钱花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8页第192号)

怎样决定的。劳动力占有者在交换中向买者提供的使用价值，在他的力的使用本身即消费中才表现出来。完成这个过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货币占有者在商品市场上买来并且按公平的价格支付的。劳动力的消费，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力的消费，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个现代社会的奥秘，一定会暴露出来。

实现劳动力的买卖的商品流通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¹¹⁸。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¹¹⁹。自由！因为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的活动并没有受到强制，相反地，他们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都是作为拥有同样权利的自由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自由的结果。平等！因为每一个人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¹²⁰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在各自的家中为各自劳动，同时又是为着全体有利的事业、共同的利益而劳动。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本概念、思想观点、观察方法和判断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

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劳动者,尾随于后。一个高视阔步,踌躇满志;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七章

使用价值的生产和 剩余价值的生产

1. 使用价值的生产

劳动力的使用或利用就是劳动。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要生产出商品,他的劳动就必须是有用的,也就是说,必须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因此,资本家要工人生产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特殊的物品。虽然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生产的性质改变了。所以,我们首先要考察有用劳动的一般运动而撇开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个或那个阶段给这个运动打上的各种特殊的印记。

劳动首先是发生在人和自然之间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相对立。为了占有物质，赋予物质以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人就使他身上的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能力发挥出来。在这里，我们不谈劳动的尚未脱离纯粹本能形式的原始状态。我们的出发点是专属于人的劳动形式。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许多建筑师相形见绌。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蜂箱里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质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而且这种服从不是暂时的。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持久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只能从持续紧张的意志中产生。而且，劳动的目的和方式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感觉到劳动是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自由活动，总之，劳动越是不吸引人，就越需要这种注意力。

劳动过程⁽¹⁾分解为下列简单要素：1. 人本身的活动或劳动本

(1) 德语是 Arbeits-Process(劳动过程)。“procès”这个词表示一种从其全部现实条件上来考察的发展过程，很久以前就成了全欧洲的科学用语。法语中最初是小心翼翼地以拉丁文形式——processus 引进这个词的。后来它失去了学究的伪装，进入了化学、物理学等等的著作，也进入了某些形而上学的著作。最后，它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法语词。顺便指出，德国人同法国人一样，在日常用语中是在法律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

身;2.劳动对象;3.劳动资料。

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一开始给人提供现成的食物⁽²⁾,同样,它也是未经人的协助就存在在那里的劳动的一般对象。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自然赋予的劳动对象。通过渔业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都是这样。已经被以前的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例如洗过的矿石,我们称为原料。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通过劳动已经发生某种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

劳动资料是人置于自己和他的劳动对象之间作为自己的活动的传导者的物或物的综合体。人利用某些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按照自己的目的使这些物作为力量作用于其他的物。⁽³⁾如果我们不谈现成的生活资料的获取——例如采集果实,在这种场合,人的器官是他的工具——那么我们会看到,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他的劳动对象,而是他的劳动资料。这样,他把外在物变成为他自身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¹²¹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土地供给他用来磨、切、压、投

(2) “土地的自然产品,数量很小,并且完全不取决于人,自然提供这点产品,正像给一个青年一点钱,使他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一样。”(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16页)

(3) “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它们的互相作用,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382页)

等等的石块。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得先要有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⁴⁾。劳动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不能没有经过加工的资料。在最古老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我们看到,除了经过加工的贝壳、石块、木头和骨头外,被驯服和被饲养的动物,也就是已经被劳动改变的动物,在原始的劳动资料中起着主要的作用。⁽⁵⁾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在某几种动物那里已处于萌芽状态,但是毕竟是人类劳动独有的特征。因此,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¹²³,制造工具的动物。骨化石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物种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古代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研究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⁶⁾劳动资料不仅是劳动者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但是,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接收和保存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形成生产的脉管系统,如瓶、篮、罐、壶)更能显示一个经济时代的特性。后者只是在化学工业中才起较重要的作用。

(4) 加尼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15年巴黎版)一般说来是贫乏的,但针对重农学派,却恰当地列举了一系列构成真正的农业的前提的劳动。

(5) 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¹²²)一书中,很好地说明了被饲养的动物对于文化初期的重要性。

(6) 在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时,真正的奢侈品在一切商品中意义最小。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在凡是提到物质生产,即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的地方,都表现出了极度的无知,但是,根据与所谓的历史研究毫无共同之处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研究的结果,史前时期是按照制造武器和工具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作为中介、导体把人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的物以外,劳动资料还包括各种不直接加入劳动行为的物质条件,这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没有它们劳动就不能完全地进行。土地又是这类一般的工具,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提供展开活动的场所。在这类已经由先前的劳动创造的劳动资料中,有厂房、工地、运河、道路等等。

可见,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所要求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也就是消失在使用价值即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中。劳动通过与劳动对象的结合物化了,而物质被加工了。在劳动者那里是运动的东西,现在在产品中表现为静的属性。工人织了布,产品就是布。

如果整个运动从其结果即产品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都表现为生产资料⁽⁷⁾,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⁸⁾

如果说一个使用价值是一个劳动过程的产品,那么另一些使用价值,先前劳动的产品本身,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

在采掘工业——采矿业、狩猎业、捕鱼业等等——中,甚至在还只限于开垦处女地的农业中,劳动对象完全是由自然提供的;其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对象,例如,农业中的种子就是这样。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做自然的产物,在其现实的形式上,它们不仅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也是许多世纪以

(7) 例如,把尚未捕获的鱼叫做渔业的生产资料,好像是奇谈怪论。但是至今还没有发明一种技术,能在没有鱼的水中捕鱼。

(8) 只要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劳动的这个定义就完全不够了。

来在人类劳动的控制、干预下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工具,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原料可以构成产品的主要实体,也可以只是以辅助材料的形式进入产品。辅助材料或者被劳动资料消费,例如煤被蒸汽机消费,机油被轮子消费,干草被挽马消费;或者加在原料上,使原料发生变化,例如氯加在未经漂白的麻布上,煤加在铁上,染料加在羊毛上;或者帮助劳动本身的进行,例如用于劳动场所的照明和取暖的材料。在真正的化学工业中,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在那里被使用的任何材料都不会作为产品的实体重新出现。⁽⁹⁾

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多种用途,所以同一产品能够成为各种不同的操作的原料。例如,谷物是磨面者、制淀粉者、酿酒者和畜牧业者等等的原料;作为种子,它又是自身生产的原料。同样,煤作为采矿工业的产品出来,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采矿工业。

在同一操作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料,又充当原料。例如,在牲畜饲养业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料的手段。

一种已经具有可供消费的形式的产品,又能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料,例如葡萄是葡萄酒的原料。也有这样一些劳动,它们的产品只能用作原料。在这种情况下,产品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只能叫做半成品,也许叫做系列产品或序列产品更合适些,例如棉花、线、白布等

(9) 施托尔希把真正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区别开来,把前者叫做“*matière*”,把后者叫做“*matériaux*”¹²⁴;舍尔比利埃把辅助材料叫做“*matières instrumentales*”¹²⁵。

等。这种最初的原料虽然本身已经是产品,但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加工阶段,在这些加工阶段中,它不断改变形态,始终作为原料起作用,直到最后的操作把它当做消费资料或劳动资料排出来。

可见,一个使用价值是产品、原料还是劳动资料,这要看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而它的地位的改变会改变它的规定。

因此,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操作的一切使用价值,也就丧失它的产品性质,只是作为活劳动的因素起作用。纺纱者只是把纱锭看做他的劳动的手段,把亚麻看做他的劳动的对象。当然,没有工具和材料是不能纺纱的。因此,在纺纱开始时,不言而喻地已经有了这两种产品。但是,在这一行为中,亚麻和纱锭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正如在摄取营养的行为中,面包是农民、磨面者、面包师等等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一样。相反,生产资料在劳动开始以后显示出它的产品性质,仅仅是由于它有缺点。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使人不愉快地想起它们的制造者。好的产品却不会使人想起给予它这些有用属性的劳动。

机器不在劳动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因素的破坏作用而损坏。铁会生锈,木会腐朽,未加工的羊毛会受到虫蛀。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可能的有用性转化为现实的有用性。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变成劳动的器官,被赋予活力以执行它们特有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新产品的形成要素被消费掉。

因此,如果说,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而且是劳动过程的存在条件,那么只有把它们投入劳动过程,使之与活劳动相接触,这些过去劳动的结果才能够得到保存和利用。

劳动消费它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因而是消费行为。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做个人的享受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做劳动的职能手段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已经是产品，劳动就是为创造产品而消费产品，或者说，是把产品当做新产品的生产资料来使用。但是，最初发生在人和土地——这种土地是人在自身之外发现的东西——之间的劳动过程从来也没有停止使用这样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要素和人类劳动的结合。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分析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以生产使用价值、使外在物适合于需要为目的的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与它的任何社会形式无关，倒不如说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考察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有用劳动的结果，我们看不出劳动是在什么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一块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这是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来的⁽¹⁰⁾。

(10)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托伦斯上校用一种“高度”逻辑的方法在野蛮人用的石头上发现了**资本的起源**。“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70、71页）可能也是由于那第一根棍子（古法语中的 *estoc*、德语中的 *stock*），英语中的 *stock* 成了资本的同义词。

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我们离开他时，他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进行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客观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主观的因素即劳动力。他用内行的精于计算的眼光物色到了他的特殊行业（如纺纱、制靴等等）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于是，我们的资本家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显然，劳动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同样，制靴或纺纱的特定方法也不会因资本家的插手就突然发生变化。劳动力的买者在市场上找到什么样的劳动力就得使用什么样的劳动力，因而劳动在还没有资本家的时期是怎样的，劳动力的买者就得采用怎样的劳动。由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引起的生产方式本身的深刻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因而要以后才来考察。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细心地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只受到同它的使用不可分割的那种损坏。

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资本家租用一天的一匹马的劳动力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买者使用；劳动力的占有者提供他的劳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力的有用性即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做生命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产品的消极要素。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劳动过程只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商品即劳动力，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

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活动。因此，这个活动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发酵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¹¹⁾

2. 剩余价值的生产

产品——资本家的所有物——是一种使用价值，如棉纱、麻布、皮靴等等。虽然例如皮靴在某种意义上会使世界进步，而我们的资本家肯定也是一位进步派，但是他制造皮靴并不是因为爱皮靴。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绝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使用价值在这里只是价值的承担者。但是，对我们的资本家来说，问题首先是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有用物，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其次，他要使这个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买它们他已经花费了他的宝贵货币——的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有用物，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

(11) “产品在转化为资本以前就被占有了；这种转化并没有使它们摆脱那种占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4页）“无产者为换取一定量的粮食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就完全放弃了对产品的任何分享。产品的占有还是和以前一样，并不因上述的契约而发生变化。产品完全归提供原料和粮食的资本家所有。这是占有规律的严格结果，相反地，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己产品拥有专有权。”（同上，第58页）“当工人是为工资而劳动时，资本家不仅是资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也是劳动的所有者。如果人们像通常那样，把用来支付工资的东西也包括在资本的概念中，那么把资本和劳动分开来谈就是荒谬的。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一词包括资本和劳动两者。”（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0、71页）

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事实上只是从使用价值这一个方面考察了商品生产。但是，正如商品是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一样，商品生产也必定同时是使用价值的形成和价值的形成。

现在我们就从价值的角度来考察生产。

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时间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计算我们的资本家所生产的产品例如 10 磅棉纱所包含的劳动。

生产棉纱，首先要有原料，例如 10 磅棉花。而棉花的价值是多少，现在用不着探究，因为资本家已经在市场上按照棉花的价值例如 10 先令把它购买了。在棉花的价格中，生产棉花所需要的劳动已经表现为平均社会劳动。我们再假定，纱锭——它代表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劳动资料——的磨损达到 2 先令。如果 12 先令的金额是 24 个劳动小时的产物，那么可以得出，2 个工作日实现在棉纱中。

棉花改变了它的形状，纱锭的一个份额由于磨损而消失了，但我们不应该受这种情况的迷惑。如果 40 磅棉纱的价值 = 40 磅棉花的价值 + 1 个纱锭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这个等式两边的产品需要同样的劳动时间，那么按照交换的一般规律，10 磅棉纱就是 10 磅棉花和 $\frac{1}{4}$ 个纱锭的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劳动时间一次体现在棉纱中，另一次体现在棉花和纱锭中。纱锭和棉花不再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而是在纺纱过程中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改变了它们的使用形式，使它们转化为棉纱；这种情况不会影响到它们的价值，就像它们通过简单的交换而换成等价物棉纱一样。

生产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包括生产棉纱的原料即棉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重新生产出已经磨损掉的纱锭所需要的时间也是

如此。(12)

因此,在计算棉纱的价值,即生产棉纱所需要的时间时,必须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劳动,首先是生产棉花和纱锭的劳动,然后是生产棉纱的劳动,——看成是同一个操作的前后相继的各个阶段。棉纱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都是过去的劳动。至于生产棉纱的各种形成要素所需要的劳动是在最后一道操作即纺纱中耗费的时间以前完成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如果建筑一座房屋需要例如 30 个工作日,那么,尽管第 30 个工作日比第一个工作日晚 29 天进入生产,但体现在这座房屋中的劳动的总量不会有所改变。同样,包含在纺纱的原料和工具中的劳动时间,也必须看成是在这个操作本身的过程中耗费的。

当然,这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生产资料必须实际上用来生产使用价值,在我们的场合是生产出棉纱。对于价值说来,它由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承担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必须由一种使用价值来承担。第二,不言而喻,人们只使用正常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如果纺 1 磅纱平均有 1 磅棉花就够了,那么,就只有 1 磅棉花的价值被算入 1 磅棉纱的价值。如果资本家异想天开,要使用金锭,那么在棉纱的价值中也只能计算生产铁制工具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

现在,我们知道了棉花和纱锭的磨损赋予棉纱的价值。这一部分价值等于 12 先令,等于 2 个工作日的化身。因此,现在要探究的是纺纱工人的劳动加在产品上的价值是多少。

(12) “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并入进行这种劳动必不可少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第 1 章第 16 页)

这种劳动现在呈现出新的外表。首先,这是纺纱技艺。如果其他一切情况不变,那么,劳动的价值越大,棉纱的价值也就越大。纺纱工人的劳动由于它的目的、技术工艺、产品的性质和特殊的生产资料而不同于其他生产劳动。用纺纱工人所使用的棉花和纱锭不能制造线膛炮。但是,纺纱工人的劳动作为价值源泉来说,却和炮膛工人的劳动毫无区别,或者不如说,同植棉者和纱锭制造者的劳动,即实现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毫无区别。如果这些不同有用形式的劳动不具有同一的本质,那么它们就不能构成实现在产品中的总劳动的在质上无差别的各个部分,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就不再构成棉纱总价值的组成部分。因为在这里重要的不再是劳动的质,而是劳动的量;只有劳动的量进入计算。我们假定纺纱劳动是简单平均劳动。以后我们会知道,相反的假定也不会对问题有丝毫影响。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静的形式。例如一劳动小时,即纺纱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时内的耗费,表现为一定量的棉纱。

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棉花转化为棉纱的过程中,消耗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在正常的即平均的社会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劳动小时内 A 磅棉花应该转化为 B 磅棉纱,那么,只有把 $12 \times A$ 磅棉花转化为 $12 \times B$ 磅棉纱的工作日,才当做 12 小时工作日。因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被算入价值形成。

我们将看到,现在不仅劳动的作用,而且生产资料和产品的作用也改变了。原料只是吸收一定量的劳动。确实,这种吸收使它转化为棉纱,因为工人的活的力量耗费在纺纱的形式中了。而产品棉纱只是棉花所吸收的劳动量的测量器:——如果把 $1\frac{2}{3}$ 磅棉花纺成棉纱需要 1 小时,那么 10 磅棉纱就表示 6 个劳动小时。由经验确定的一定的产品量,现在只不过代表凝固的劳动量,——一小时、两小时、

一天的社会劳动的化身。

在这里,劳动是纺纱劳动、它的原料是棉花、它的产品是棉纱这种情况,是没有关系的,正如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原料即产品这种情况没有关系一样。如果工人不是在纺纱厂做工,而是在煤矿做工,自然界就会给他提供劳动对象。但是,从矿床中采出来的一定量的煤,例如一英担,依然代表一定量被吸收的劳动。

在劳动力出卖时,曾假定它的日价值=3先令,——体现着6个劳动小时的量,——因此,为生产出每天维持劳动者所必需的平均生活资料量需要劳动6个小时。既然我们的纺纱工人在1小时内把 $1\frac{2}{3}$ 磅棉花转化为 $1\frac{2}{3}$ 磅棉纱,他在6小时内就会把10磅棉花转化为10磅棉纱⁽¹³⁾。因此,在纺纱过程中,棉花吸收了6个劳动小时。同一劳动时间凝固为3先令金额。这样,纺纱工人就给棉花加上了3先令的价值。

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产品的总价值。10磅棉纱包含着 $2\frac{1}{2}$ 个工作日;棉花和纱锭包含2个工作日; $\frac{1}{2}$ 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吸收的。同一劳动量凝固为15先令金额。因此,15先令价格表示10磅棉纱的确切价值;1先令6便士价格表示1磅棉纱的确切价值。

我们的资本家愣住了。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预付的价值没有增殖,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因此,货币没有转化为资本。这10磅棉纱的价格是15先令,而在市场上为购买产品的各种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所花掉的也是15先令:10先令购买棉花,2先令购买所消耗的纱锭,3先令购买劳动力。棉纱的价值已经膨胀这一点无济于事,因为棉纱的价值只是以前分配在这些因素上

(13) 这里的数字完全是随意假设的。

的价值的总和,把这些价值相加不能使它们增加。⁽¹⁴⁾所有这些价值现在集中在一个物上面,但是,在资本家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 15 先令分开来进行三次购买以前,这些价值就已经集中在一个 15 先令的货币额上了。

这种结果是不足为奇的。一磅棉纱的价值是 1 先令 6 便士,因此,我们的资本家在市场上买 10 磅棉纱就得付出 15 先令。不管他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房屋,还是自己花钱让人建造一座房屋,无论哪一种做法都不会使置备房屋的货币增加。

熟悉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家也许会叫起来说:他预付自己货币的意图是要使货币增多。但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图铺成的¹²⁶;谁也不能禁止他抱有不经过生产而赚钱的意图。⁽¹⁵⁾他发誓说人们再也抓不住他的把柄了;以后他要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商品,不再自己制造。但是,如果他的所有资本家弟兄都这样做,他又怎能在市场上找到商品呢?而他又不能拿货币当饭吃。因此,他开始向我们说教:要人们想到他的节欲,他本来可以把他的 15 先令挥

(14) 这是重农学派关于一切非农业劳动的非生产性的学说借以建立起来的根本命题,这个命题对于专业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容反驳的。“把许多其他东西的价值加在一个物上(例如,把织工的消费加在麻布上),也就是说,把若干价值一层层地堆积在一个价值上,这种办法使价值有了相应的增加……‘加’这个词完美地表达了劳动力的产品价格形成的方式;这种价格不过是许多被消耗的、加在一起的价值的总和;但是‘加’并不意味着‘乘’。”(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1章第599页)

(15) 例如,在1844—1847年,他从生产中抽出了一部分自己的资本,拿来在铁路股票上投机。又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关闭了工厂,把工人抛向街头,自己到利物浦交易所去进行原棉投机买卖。

霍掉；他没有这样做，他生产地消费它们，把它们制成了棉纱。这是真的，但是他因此得到的是棉纱而不是后悔。他决不应该再去分享货币贮藏者的命运，后者已经向我们表明，禁欲会得到什么结果。

而且，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会丧失他的权利。不管他禁欲的功劳有多大，也没有资金可以用做禁欲的报偿，因为退出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正好等于进入生产过程的价值的总和。他应该以“德有德报”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然而资本家不这样，他纠缠不休。棉纱对他没有用处，他生产棉纱是为了出售。好，那就让他出售吧！或者更简单一些，让他以后只生产自己的消费所需要的东西吧：他的家庭医生麦克库洛赫已经给他开了这服防止流行性生产过剩的灵丹妙药。他强硬起来。难道工人光用一双手就能凭空进行建筑，凭空生产出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市民社会的大多数人一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这个社会，特别是对由他预付生活资料的工人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但是，工人不是把他的棉花和纱锭转化为棉纱，从而也为他提供了服务吗？而且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服务。⁽¹⁶⁾ 服务无非是某种使

(16) “你尽可以让别人为你歌功颂德……但是谁取得的比他供给的更多或更好，谁就是高利贷者。这不是为邻人服务，而是损害邻人，就像偷盗者和抢劫者一样。一切名为对邻人服务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务和行善。奸夫和淫妇也是互相提供服务和互相得到极大的满足的。骑士帮助杀人放火犯拦路行抢，打家劫舍，也是对他的重大服务。罗马教徒没有把我们全部淹死、烧死、杀死、囚死，而是让一些人活着，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然后把他们驱逐，也是对我们的重大服务。魔鬼对为他服务的人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务……总之，世上到处都是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务和行善。”（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

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¹⁷⁾然而这里谈的是交换价值。他付给工人3先令价值,工人还给他一个完全相当的等价物,即加在棉花上的3先令价值,工人以价值偿还了价值。我们这位朋友刚才还以资本自傲,现在却突然采取像普通工人那样的谦逊态度。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他的监视和监督的劳动不是也形成价值吗?他的工厂的经理和监工耸肩膀了。这时他狡猾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他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嘲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这些教授为此得到了报酬,这是他们的职业。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如果说他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并不总是很好地考虑,那么他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却始终是一清二楚的。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看。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因为每天生产这个力需要半个工作日,也就是说,每天维持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要花费半个工作日。但是,劳动力包含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完成的现实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劳动力的维持费决定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劳动力的耗费构成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只要半个工作日就够了,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不能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具有的价值和劳动力能够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制造

(17) “‘服务’这个范畴对于像让·巴·萨伊和弗·巴师夏那样的经济学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难了解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4页¹²⁷)

棉纱或皮靴的能力,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耗费,才能生产出价值。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有用性,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资本家要求劳动力提供的独特的服务。在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占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操作或劳动一整天,也就是说,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但也决没有损害卖者的权利。

我们的资本家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¹²⁸。因此,工人在工场中遇到的,不是6小时而是12小时工作日所必需的生产资料。既然10磅棉花吸收6个劳动小时,转化为10磅棉纱,那么20磅棉花就会吸收12个劳动小时,转化为20磅棉纱。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延长了的劳动的产品。20磅棉纱包含5个工作日,其中4个工作日实现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纱锭中,1个工作日是在纺纱操作中被棉花吸收的。5个工作日的货币表现是30先令。因此这就是20磅棉纱的价格。1磅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1先令6便士。但是,在操作中所使用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而棉纱的价值达到30先令。产品的价值比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增长了 $\frac{1}{9}$ 。因此,预付的27先令转化为30先令。这27先令生出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交换规律得到了严格的遵守,等价物换等价物。在市场上,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购买。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买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消费(同时是商品的生产)提供的产品是20磅棉纱,价值30先令。于是,作为买者离开了市场的资本家又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上来。他卖棉纱是1先令6便士一磅,既不比它的价值贵,也不比它的价值贱。然而他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比原先投入流通的货币多3先令。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这个过程,既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又不在流通领域中进行。流通是一个中介。劳动力只有在市场上被出售,才能在生产领域中被剥削。在生产领域中,它成了剩余价值的源泉,所以,“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¹²⁹。

当资本家把货币转化为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要素,而后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物质要素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过去的、死的、已经转化为物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增大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就像魔鬼附身一样开始去劳动。

因此,剩余价值的生产只不过是超过一定点继续延长的价值生产。如果劳动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生产;如果劳动过程超过这一限度,那就是剩余价值生产。

现在我们把价值生产和使用价值生产比较一下。构成使用价值生产的是有用劳动的运动。在这里,劳动过程表现出质的方面。这是一种以满足一定的需要为目的、因而借助适合于这一目的的生产资料、使用特殊的方法并最终生产出有用产品的活动。相反,作为价值生产,同一过程只表现出量的方面。在这里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

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者有用地消耗自己的活的力量力的时期。生产资料现在作为单纯吸收劳动的手段执行职能,本身只表现为实现在这些手段上的劳动量。无论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或者是由劳动力加进去的劳动,都只能按照它的持续时间计算;它等于若干小时、若干日等等。

其次,劳动只是在生产使用价值的时间是社会必要时间的限度内才被计算。这个条件有几个不同的方面。劳动力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如果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纺纱机是纺纱的正常工具,那就不能让工人使用手摇纺车。其次,他所用的棉花也应该是质量好的棉花,而不应该是经常断头的坏棉花。否则,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者生产一磅棉纱所耗费的时间就会多于必要的时间,而这些超过的时间并不创造价值或货币。不过,劳动的物质因素是否具有正常性质要取决于资本家,而不是取决于工人。再一方面,劳动力本身的正常性质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而我们的资本家在市场上也十分注意要买到这样的劳动力。其次,这种劳动力必须以通常的紧张程度执行职能。因此,资本家也不安地注视着工人,不让他放慢工作,丢失时间。他购买的这个劳动力有一定的期限;他要得到属于他的东西。他不愿意被盗窃。最后,生产资料必须以正常的方式被消费,因为工具和原料的浪费表示已经物化的劳动的无益耗费,因而这种劳动在产品中不被计算,不会给产品加进价值。⁽¹⁸⁾

(18) 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按照古代人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同性畜作为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工具作为无声的工具相区别。¹³⁰但奴隶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他任性地虐待、毁坏它们,以

我们看到,我们在开始研究时通过分析商品所发现的有用劳动和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商品生产的两个方面的区别了。一旦商品生产不再仅仅表现为有用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统一,而且还表现为有用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统一,商品生产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

我们在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曾经假定,资本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平均劳动。在相反的假定下,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例如,我们假定:同纺纱工人的劳动相比,珠宝细工的劳动是高次方的劳动,前者是简单劳动,后者是培养训练较为困难而在同一时间内能创造出较多价值的复杂劳动。但是,不管这两种劳动有多大差别,珠宝细

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劳动工具,因为粗糙和笨重使得这些工具很难被损坏。因此,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墨西哥湾沿岸各蓄奴州一直使用古代中国式的犁。这种犁像猪和鼯鼠那样掘地,但不能把地犁出沟来,不能把土翻过来。参看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6页及以下几页。奥姆斯特德在他的《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第46、47页]中也谈到:“我看到了这里使用的工具,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工具交给他雇用的工人使用;因为这种工具异常笨重,使用起来至少要比我们使用的工具多费百分之十的劲。然而人们却使我相信,必须给奴隶使用这种工具,因为给他们较轻便的或不太笨重的工具,是不经济的。我们经常让工人使用的并为我们带来优厚利益的那些工具,在弗吉尼亚的麦田里用不上一天就会损坏,尽管那里的土地比我们的土地松软,而且没有那么多石块。当我问为什么农庄都普遍地用骡子代替马的时候,我听到的第一个、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马受不住黑人的经常不断的虐待。马总是会被累垮,或者变成残废,而骡子即使挨鞭子,饿一两次,也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骡子在照料不周或劳累过度时,也不会受凉生病。我用不着走远,只要从我执笔写作的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看到虐待牲畜的情形,而在北方,如果这样虐待牲畜,几乎每个农场主都会马上把工人解雇的。”

工为他的主人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补偿自己的工资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同以前一样,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时间的延长,不管是纺纱工人的劳动,还是珠宝细工的劳动。(19)

另一方面,当问题涉及到价值生产时,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一日复杂劳动化为两日简单劳动。(20) 如果某些有修养的经济学家反对这种“武断的言论”,那么用一句德国谚语来

(19) 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常常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人们往往以此美化下述残酷的现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例如农业工人,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在这里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我们可以看到,同种劳动会轮流变换位置。例如,在劳动者体质孱弱并被工业制度搞得相当衰竭的地方,需要很多力气的真正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相当轻巧的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如瓦匠的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级得多。另一方面,剪毛工人的劳动虽然体力消耗大,而且很不卫生,但仍被看做简单劳动。而且,不要以为所谓的高级“熟练”劳动在国民劳动中占着相当大的数量。据兰格计算,英格兰(包括威尔士)有1100多万居民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700万,其中要减去100万贵族和100万贫民、流浪汉、罪犯、娼妓等,还有400万中等阶级,其中包括小食利者、官吏、作家、艺术家、教员等等。为了凑足这400万的数目,除银行家、金融家等等之外,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靠简单劳动为生的1100万了。(赛·兰格《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散见第49—52页])“除自己的普通劳动外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增补卷)1824年版)

(20) “当人们说到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必定指一定种类的劳动……别种劳动对这种劳动的比例,是容易确定的。”(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22、23页)

说,他们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他们指责这是分析的诡计,但他们所指责的恰恰是在世界各地每个角落里天天都在发生的过程。极其不同的商品价值到处都无差别地表现为货币,即表现为一定量的金或银。因此,这些价值所代表的不同种的劳动,已经按不同的比例化为唯一的、同种的普通劳动即生产金银的劳动的一定量。

第八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

工人由于加进新的劳动量而给劳动对象加进了新价值,不管他的劳动的有用性质如何。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成了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包含在棉纱的价值中。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种转移是在劳动过程中、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因而劳动是这种转化的中介。然而它是怎样实现的呢?

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劳动两次:一次给棉花加进新价值;另一次保存棉花的旧价值,或者同样也完全可以说,把他所使用的纱锭和加工的棉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棉纱上。他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很明显,这种结果的二重性只能产生于他的劳动的二重性。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

每个工人怎样加进劳动,从而加进价值呢?难道不是以特殊的有用劳动的形式,并且只是以这种形式加进价值吗?纺纱工人只有

通过纺纱,织布工人只有通过织布,铁匠只有通过打铁,才能加进劳动。恰恰是这种织布、纺纱等等的形式,总之,是劳动力支出的特殊的生产形式,把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棉纱和织机,铁和铁砧变成了一种产品、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²¹⁾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获得新的形式。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生产一个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包含着生产那些已消费在这个物品的生产中的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生产已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算入了新产品中。

因此,劳动者保存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把它作为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去,并不是由于他们加进一般劳动,而是由于这种追加劳动的有用性质,由于它的生产形式。劳动就它是有用劳动,生产活动来说,只要同生产资料接触,就使死的复活,使它们成为自己的运动的因素,并且同它们结合起来形成产品。

如果工人的特殊的生产劳动不是纺纱,他就不能纺出棉纱,因而也就不能把棉花和纱锭的价值转移到棉纱上。不过,如果这个工人改行当木匠,他仍然会用一个工作日把价值加到材料上。

可见,加进价值的劳动不是他自己的作为织工劳动或木匠劳动的劳动,而是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劳动;他加进一定的价值量,并不是因为他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有用性质,而是因为他的劳动持续了一定的时间。因此,纺纱工人的劳动,就它的抽象的一般的属性来说,作为人的生命力的耗费,把新价值加到棉花和纱锭的价值上;而就它的具体的特殊的属性来说,从它作为纺纱的有用属性来说,把这些生

(21) “劳动创造一种新物来代替被消灭的物。”(《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13页)

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从而把这些价值保存在产品中。由此就产生了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所得出的结果的二重性。

新价值的加进,是由于单纯的追加,由于新的劳动量;生产资料的旧价值在产品中保存,是由于加进的劳动的质。同一劳动由于它的二重性造成的这种二重作用,清楚地表现在不同的现象上。

假定由于某种发明,纺纱工人6小时纺的棉花同过去36小时纺的棉花一样多。作为有用的生产活动,他的劳动的能力增加为6倍,他的劳动的产品也增加为6倍,不是6磅棉纱而是36磅棉纱。但是,现在36磅棉花吸收的劳动时间只和过去6磅棉花吸收的劳动时间一样多。加在36磅棉花上的劳动只是用旧方法时所需要的劳动的 $\frac{1}{6}$,因此,加进的新价值也只是用旧方法时的 $\frac{1}{6}$ 。另一方面,现在在产品36磅棉纱中包含6倍的棉花价值。纺纱6小时,保存并转移到产品上去的原料价值是过去的6倍,虽然加到同量原料上的新价值小 $\frac{5}{6}$ 。这说明,在同一行为中,劳动保存价值的属性和创造价值的属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纺同量的棉花所需要的劳动越多,加到棉花上的新价值就越大;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纺的棉花磅数越多,保存在产品内的旧价值就越大。

相反,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因而纺纱工人把一磅棉花转化为棉纱总是需要相同的时间。但是假定棉花的交换价值变了,一磅棉花的价格提高到原来的6倍,或降低为原来的 $\frac{1}{6}$ 。在这两种情况下,纺纱工人都是把同一劳动量,因而也是把同一价值加到同量的棉花上;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同量的棉纱。然而,他从棉花转移到棉纱上即产品上的价值,在一种情况下是原来的 $\frac{1}{6}$,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原来的6倍。当劳动工具涨价或跌价,而它始终发挥相同的效用时,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纺纱的技术条件不变,而且它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也不变,那么纺纱工人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就仍旧消费价值始终不变的一定数量的原料和机器。在这种情况下,纺纱工人保存在产品中的价值就同他加进的新价值成正比。他两星期加进的劳动比一星期多一倍,因而价值也多一倍;同时,他消耗的材料和机器也多一倍;因而,他在两星期的产品中保存的价值比在一星期的产品中多一倍。在不变条件下,工人加进的价值越多,他保存的价值就越多。但是,他能保存更多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加进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他在不变的和不以他自己的劳动为转移的条件下加进这个价值。

当然,从某种相对的意义可以说,工人总是按照他加进的新价值的比例保存旧价值。不管棉花价格提高或降低一先令,它的保存在一小时产品中的价值总是不会变成保存在两小时产品中的价值。同样,如果纺纱工人的劳动的生产率发生了变化,提高了或者降低了,那么,他例如一个小时纺的棉花就会比过去增多或减少,因而他保存在一个小时产品中的棉花价值也会增多或减少。但是不管怎样,他两个劳动小时保存的价值总是一个劳动小时的两倍。

把纯粹象征性的表现——符号撇开,价值只是存在于某种有用物中,存在于某种物中。(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不过是这种力的外在的物质表现。)因此,如果使用价值丧失,交换价值也就丧失。生产资料在丧失自己的使用价值的同时并不丧失价值,因为劳动过程使他们丧失自己原来的有用形式,实际上只是为了在产品上赋予它们一种新的有用形式。虽然价值存在于某种有用物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商品的形态变化向我们表明,这种物是哪一种是没有关系的。由此可见,在劳动过程中,产品只是随着生产资料丧失它的有用性并同时丧失它的价值而逐步地吸

收生产资料的价值。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只是它作为生产资料而丧失的价值。但是在这方面,劳动的各种物质因素的情况是不同的。

为发动机器而燃烧的煤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润滑轮轴而上的油等等也是这样。染料和其他辅助材料消失了,但是又在产品的属性中表现出来。原料形成产品的实体,但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可见,原料和辅助材料丧失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时所具有的形态。真正的工具却不是这样。某种工具、机器、厂房、容器等等,只有在它们保持自己原来的形态时才能在劳动中发挥作用。它们在生前,在劳动过程中,与产品相对保持着自己固有的形态,它们在死后也保持着这种形态。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们帮助下生产的产品总是分开而存在的,与产品无关。如果我们考察劳动工具从它进入工作场所那天起到被扔进废品库那天止发挥作用的整个时期,就会看到,在这个时期中,它的使用价值已经完全被劳动消耗了,因此它的价值也完全转移到产品上去了。例如,一台纺纱机的寿命为10年,在它发挥作用的10年中,它的全部价值就并到10年的产品上去。因此,这样一种工具的生存期,包括若干不断重新用它来反复进行的操作。劳动工具同人的情况一样。每人每天都死掉生命的24小时。但仅仅从人的外表看不出,他已经死掉了生命的多少天。然而,这并不妨碍保险公司从人的平均寿命中得出非常准确、非常有利(这重要得多)的结论。同样,根据经验可以知道,一种劳动工具,例如针织机器,平均能用多少时间。假定它的有用性在劳动过程中只能持续6天,那么它平均每日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 $\frac{1}{6}$,因而把它的交换价值的 $\frac{1}{6}$ 转给每天的产品。一切劳动工具每天的损耗,劳动工具每天往产品的价值上转移多少自己的价值,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计算的。

在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绝不会

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消耗而丧失的价值。如果生产资料没有价值可以丧失,就是说,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只是充当有用物的形成要素,而不是充当价值的形成要素。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水、风、矿脉中的铁、原始森林中的树木等等,都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遇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假定一台机器值1 000镑,并且在1 000天内损耗掉;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的价值每天有 $\frac{1}{1\,000}$ 转移到它的日产品上;但是,尽管机器的生命力日益减弱,整个机器仍然不断地在劳动过程中起作用。因此,尽管某个劳动因素全部进入使用价值的生产,但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形成。这样,这两个过程的区别就反映在物质因素上,因为在同一操作中,同一生产资料全部被算做前一个过程的要素,而又只是部分地被算做后一过程的要素。(22)

(22) 这里不包括维修工具、机器、建筑物等等的劳动。正在修理中的机器不是充当劳动资料,而是充当劳动对象。不是用它来劳动,而是对它本身进行加工,以便修复它的使用价值。我们可以认为,这种修理劳动总是包括在生产工具所必要的劳动中。正文中所说的那种损耗是任何医生都不能医治的,它逐渐导致死亡。“这种损耗有时是不可能补偿的,就刀来说,它会使刀最后弄到这种地步,连磨刀匠也会说,这把刀不值得再磨了。”我们在正文中看到,例如机器是全部进入每一个生产操作,但只是部分进入同时进行的价值形成。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下述概念的混乱了:“李嘉图先生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织袜机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在例如一双袜子的价值内。可是生产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能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织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4页)这位作者,这位极端自负的自命不凡的人,在论战中,只有就下而这一点来说是对的;无论李嘉图,还是在他以前或以后的任何其他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劳动的两个方面准确地区分开来,自然更没有对这两方面在价值形成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作出分析。

相反,一种生产资料尽管只是部分地进入使用价值的生产,却能够全部进入价值形成。假定在纺纱操作中,每天115磅棉花中有15磅损失了,也就是说,没有变成棉纱,而是变成了英国人所说的飞花。如果这 $\frac{15}{100}$ 的损失是正常的,在生产中平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15磅棉花虽然不是棉纱的要素,但同形成棉纱实体的100磅棉花一样,也加入棉纱的价值中。为了生产100磅棉纱,15磅棉花必须化为飞花。正因为这种损失是生产的条件,损失的棉花才会把自己的价值转给棉纱。劳动的一切排泄物都是这样,当然只有在这些排泄物不再形成新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再形成新的使用价值的情况下才是这样。例如我们在曼彻斯特的大机器制造厂内可以看到,被庞大的机器像刨花一样削下的铁屑堆积如山,傍晚被运到炼铁厂去,第二天变成铁锭再运回来。

生产资料只有丧失掉它们存在于旧的有用形式中的价值,才把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它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能丧失的最大限度的价值量,显然是以它们进入操作时原有的价值量为限,或者说,是以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为限。因此,生产资料加到产品上的价值绝不可能大于它们自己具有的价值。不管一种原料,一种机器,一种生产资料的有用性如何,如果它值150镑,比方说,耗费500个工作日,那么它加到在它协助下制造的总产品上去的价值就绝不会大于150镑。它的价值不是由它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的劳动决定的,而是由它作为产品被生产出来的劳动决定的。它在使用它的操作中只是作为使用价值即作为具有有用属性的物起作用;如果它在进入这个操作之前没有价值,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23)

(23) 我们可以由此对让·巴·萨伊的高明的见解进行判断了:他想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价值在劳动中所提供的生产服务,引出剩

当生产劳动把生产资料转化为新产品的形成要素时,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就经过某种轮回。它从已消耗的躯体转到新形成的躯体。但是这种转生是在现实的劳动背后发生的。劳动者不保存旧价值,就不能加进新劳动,因而就不能创造新价值,因为他必须在有用的形式上加进这种劳动;而他并不把产品变为新产品的生产资料,从而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他就不能在有用的形式上加进劳动。可见,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具有的属性;这是一种自然恩惠,这种自然恩惠不费工人什么,但对资本家却大有好处;资本家由于这种自然恩惠而能够保存他的资本的现有价值。(24)

余价值(利息、利润、地租)。决不轻易放过机会把拼凑得很精巧的辩护思想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罗雪尔教授则对此喊道:“让·巴·萨伊在《论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四章中非常正确地指出,‘榨油机所生产的价值扣除一切费用后,还留下一同制造榨油机本身所费的劳动有本质区别的新东西’。”(《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页注)非常正确!榨油机所生产的“油”同制造榨油机所费的劳动是很不相同的。罗雪尔先生所说的“东西”是指“油”,因为“油”有价值;但“自然界”有石油,尽管相对来说不很多,他从这一点得出了另一个教条:“它(自然界!)几乎完全不生产交换价值。”罗雪尔先生的自然界及其交换价值,就像一个承认自己生过一个只有“一点点大的”孩子的姑娘一样。这位严肃的学者还趁另一次机会说道:“李嘉图学派通常把资本包括在劳动概念内,把它叫做积累的劳动,这是不高明的(!),因为毫无疑问,资本占有者不单纯是(!)生产和保存它,而且显然做了更多的(!)事情。”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他节制了自己可能的享受,为此(!),比如说,他希望并要求得到利息。”罗雪尔先生称为“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法”的这种方法是多么高明啊!这种方法把纯粹的意愿变成了价值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24) “在农场主使用的一切工具中,人类劳动是他用来补偿自己资本的最可靠的东西。其他两类东西,一类是役畜,另一类是犁、车、镐、铲等等,没有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就毫无用处。”(埃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原系1795年11月向最尊敬的威廉·皮特提出的报告》1800年伦敦版第10页)

当生意兴隆的时候,资本家埋头赚取剩余价值,觉察不到劳动的这种无偿的恩惠。但当劳动过程被迫中断的时候,例如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资本家对此就有切肤之感了。(25)

就生产资料来说,被消耗的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消费这种使用价值,制成产品。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没有被消费(26),因而也不可能再生产出来。这个价值被保存下来,但不是因为在劳动过程中对这个价值本身进行了操作,而是因为这个价值原先借以存在的那个对象只是为了获得一种新的有用形式才消失。因此,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确切地说,不是再生产出来。成为产品的东西是旧交换价值借以再现的新使用价值。(27)

(25) 有一个工厂主,他的纺纱厂共雇用 800 个工人,每周平均消耗 150 包东印度棉花或约 130 包美国棉花。他在 1862 年 11 月 26 日的《泰晤士报》上曾为了他的工厂每年停工的花费向公众诉苦。他估计这笔花费达 6 000 镑。在这些费用中,有许多项目同我们这里无关,如地租、税款、保险费以及按年雇用的人员——经理、会计、工程师的薪金等等。然后,依他计算,为了购买工厂有时取暖和开动蒸汽机所用的煤共需 150 镑。此外还要支付临时必须雇用的工人的工资。最后,机器的费用为 1 200 镑,因为“天气和自然的腐蚀力并不因蒸汽机停止运转就不再发挥作用”。他强调说,他的估计之所以没有大大超出 1 200 镑这样一个数目,是因为他的全部机器已经很破旧了。

(26) “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中,商品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下价值没有被消费掉。”(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 年安多弗—纽约版第 296 页)

(27) 在一本也许已经出到 20 版的美国教科书中,有这样的话:“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该书在乏味地罗列了一切可能在产品中再现自己价值的生产成分之后,得出结论说:“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则作为它们给予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新力量再现出来,从而形成新的资本,再用于生产过程。”(弗·

生产的主观因素,即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却不是这样。当劳动通过它的目的所赋予它的形式而把生产资料的价值保存并转移到产品上去的时候,它的运动每时每刻都创造出追加的价值,创造出新价值。假设生产在劳动者生产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日价值的等价物以后就停下来,例如,他劳动6小时加进3先令价值。这个价值是产品价值超过其中由生产资料价值构成的部分而形成的余额。它是生产出来的唯一的真正的价值,是唯一在产品价值形成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产品价值部分。它补偿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预付的,后来由劳动者在生活资料上花费的货币。就已花费的3先令来说,这3先令的新价值表现为简单再生产;但这个价值是真正再生产出来的,不像生产资料的价值是表面上再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一个价值用另一个价值来补偿是通过新的创造来实现的。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劳动持续时间会越过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仅仅被再生产出来并被加到劳动对象上这一点而继续下去。再生产出这一等价物,6小时就够了,但是操作却持续12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这样,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就不仅再生产出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它的被消耗掉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

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32页)我们撇开所有其他的奇怪说法不谈,只须指出,在人的新力量中再现的,并不是面包的价格,而是形成面包的血液的实体。相反,作为这个力量的价值再现的,也并不是生活资料,而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样一些生活资料,如果它的价格减少一半,仍然产生同样多的肌肉、骨骼等等,总之,仍然产生同等的力量,但不是同等价值的力量。“价值”和“力量”之间的这种混淆,以及全部伪善的含糊其词,目的是要掩盖这样一种徒劳的企图:用预付价值的单纯再现来解释剩余价值。

我们叙述了劳动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剩余价值形成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产品的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就是由于剩余价值而增大了的资本超过预付资本而形成的余额。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过是资本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存在形式。

可见,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工具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们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相反,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会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们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同一些要素,从使用价值生产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形成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

不变资本这个概念决不排斥它的组成部分发生价值变动。假定1磅棉花今天值 $\frac{1}{2}$ 先令,明天由于棉花歉收而涨到1先令。仍在加工中的原有的棉花,是按 $\frac{1}{2}$ 先令的价格买进的;但现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却是1先令。已经纺完,也许已经变成棉纱在市场上流通的棉花,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同样也比它原来的价值大一倍。然而我们知道,这种价值变动是同棉花通过纺纱本身得到的价值的增殖没有关系的。如果原有的棉花还没有进入加工过程,它现在也能按1先令而不是按 $\frac{1}{2}$ 先令再卖出去。棉花受到的加工越少,这种结果就越可靠。因此,当发生类似的价值激变时,投机的规律是:在加工最少的

原料上进行投机,在棉布上不如在棉纱上,在棉纱上不如在棉花上。在这里,价值变化是发生在生产棉花的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棉花作为生产资料,从而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过程中。价值固然是由凝固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但这个量本身是社会地决定的。如果生产一个物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改变了,例如,同一数量的棉花在歉收时比在丰收时代表大得多的劳动量,那么,始终被看做本类商品的一个样品⁽²⁸⁾的原有商品,就会直接由此受到影响,因为它的价值总是由社会必要劳动计量的,也就是由社会现有条件下的必要劳动计量的。

同原料的价值一样,已经用于生产的劳动工具即机器、厂房等等的价值,也可以发生变动,因此它们转给产品的那部分价值也会发生变动。例如,由于一种新发明,这种机器可由较少的劳动耗费再生产出来,那么同种的旧机器就要或多或少地贬值,因而转移到产品上去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但是在这种场合同以前一样,价值变动也是在机器作为工具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以外发生的。机器在这个过程中转移的价值绝不会大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生产资料价值的变动虽然也会对生产资料产生影响,甚至在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以后也是如此,但不会改变它的不变资本的性质。同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的变动也不会影响它们在职能上的区别。假定劳动的技术条件可以大大革新,例如过去10个工人用10件价值很小的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1个工人用1台昂贵的机器就能加工100倍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不

(28) “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893页)

变资本即被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大大增加了,而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则大大减少了。但是,这种变动只改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量的关系,或者说,只改变总资本分为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的比例,而不影响它们的职能上的区别。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

1.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预付资本 C 在生产过程中生出的剩余价值, 首先表现为产品价值超过产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的余额。

资本 C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出的货币额 c (不变资本), 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 v (可变资本)。因此, 最初是 $C = c + v$, 或者举例来说, 预付资本 500 镑 = $\overbrace{410}^c$ 镑 + $\underbrace{90}_v$ 镑。在生产操作结束时得到商品, 它的价值 = $\overbrace{c}^c + \underbrace{v}_v + \underbrace{p}_p$ (p 是剩余价值), 例如, $\overbrace{410}^c$ 镑 + $\underbrace{90}_v$ 镑 + $\underbrace{90}_p$ 镑, 原来的资本 C 变为 C' , 由 500 镑变为 590 镑。二者的差额 = p , 即 90 镑剩余价值。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 所以, 说产品价值超过产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 等于预付资本的增殖额, 或等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 实际上是同义反复。

然而, 对这个同义反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这里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 是产品形成过程中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由劳动工具构成的那部分被使用的不变资本只是把自

己价值的一部分转给产品,而其余的部分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形式中。既然这后一部分在价值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所以必须把它完全抽去。即使把它计算进去,也不会引起任何改变。假定 $c=410$ 镑,由原料 312 镑、辅助材料 44 镑和磨损的机器 54 镑组成,而实际使用的全部机器的价值达到 1 054 镑。我们只把机器因执行职能而失掉的并因而转给产品的 54 镑价值,算做预付。如果我们把仍然保留在原来形式(如蒸汽机等等)中的 1 000 镑计算进去,就必须在预付价值和得到的产品这两边都加上 1 000 镑。⁽²⁹⁾ 这样,一边就是 1 500 镑,另一边就是 1 590 镑,剩余价值仍然是 90 镑。因此,我们谈到为生产价值(这正是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问题)而预付的不变资本时,总只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料的价值。

根据这样的假定,我们再回头来谈 $C=c+v$ 这个公式,这个公式现在转化为 $C'=\widehat{c+v}+p$,因此, C 转化为 C' 。我们知道,不变资本的价值只是再现在产品中。可见,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实际新生产的价值,是和得到的产品价值不同的。因此,它不像乍一看来那样,仿佛是 $c+v+p$,或 $\overset{c}{410}$ 镑 + $\overset{v}{90}$ 镑 + $\overset{p}{90}$ 镑,而是 $v+p$,或 $\overset{v}{90}$ 镑 + $\overset{p}{90}$ 镑,不是 590 镑,而是 180 镑。如果不变资本 $c=0$,换句话说,如果有这样一些产业部门,它们的资本家可以不使用任何由劳动创造的生产资料,既不使用原料、辅助材料,也不使用工具,而只是使用劳动力和自然提供的材料,那么,就不会有不变价值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去。产品价值的这个要素,即我们例子中的 410 镑,就会消失,但是

(29) “如果我们把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算做预付资本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在年终时把这种资本的残余价值算做年收入的一部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 年伦敦第 2 版第 269 页)

包含 90 镑剩余价值在内的已生产出来的 180 镑的价值仍然会同 c 代表无限量的价值时一样大。现在, $C = \overbrace{0} + v = v$, 而 C' (由于包含剩余价值而增大了的资本) $= v + p$; $C' - C$ 仍然 $= p$ 。相反, 如果 $p = 0$, 换句话说, 假定劳动力(其价值是以可变资本预付的)只是生产了自己的等价物, 那么 $C = c + v$, C' (产品价值) $= c + v + 0$, 因此, $C = C'$ 。预付资本没有增殖。

我们已经知道, 剩余价值只是 v (转变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 发生价值变化的结果, 因此, $v + p = v + \Delta v$ (v 加 v 的增长额)。但是这种价值变化的现实性质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 这是因为: 由于资本可变要素的增加, 全部预付资本也增加了。全部预付资本以前是 500, 现在变成了 590。可见, 纯粹的分析要求把产品价值中只是再现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抽去, 就是说, 要求假定不变资本 $c = 0$ 。为此, 这样就要运用数学上运算变量和常量时总是要用到的一条定律, 就是常量只通过加或减同变量发生联系的定律。

另一个困难是由可变资本的原有形式产生的。比如在上述例子中, $C' = 410$ 镑不变资本, 90 镑可变资本和 90 镑剩余价值。90 镑是已知量, 是不变量, 把它当做可变量似乎是不合理的。但 $\overset{v}{90}$ 镑或 90 镑可变资本, 只是这个价值所经过的过程的符号。首先, 两个不变价值互相交换, 90 镑资本交换同样值 90 镑的劳动力。但是, 在生产过程中, 预付的 90 镑不是为劳动力的价值所代替, 而是为劳动力的运动所代替, 死劳动为活劳动所代替, 静止量为流动量所代替, 不变量为可变量所代替。结果是 v 的再生产加 v 的增长额。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 这全部进程是转变为劳动力的那个资本价值的自发的、自动的运动。整个过程及其结果都要归因于这个价值。因此, 如果说表示一个会增殖的价值的“90 镑可变资

本”这个说法看来是矛盾的，那么它只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

乍一看来，假定不变资本等于0是很奇怪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这样做。例如，有人要计算英国棉纺织业的利润，他首先就会扣除付给美国、印度、埃及等国的棉花价格，就是说，使在产品价值中只是再现出来的那部分资本=0。

当然，不仅剩余价值同直接产生它并由它来表示其价值变化的那部分资本的比率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因此我们将在第三册¹³¹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要使资本的一部分转变为劳动力而增殖，就必须使资本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料。要使可变资本起作用，就必须根据企业的一定的技术性质，按相应的比例来预付不变资本。在一切化学操作中固然需要蒸馏器及其他容器，但并不能由此说，在分析时不能把这些器具抽去。如果对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就其本身进行考察，那么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这些物质代表，就只是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力即价值创造者得以固定在上面。因此，这种物质的性质和价值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无论它是棉花还是铁都一样。它只须有足够的量，以便能吸收生产过程中要消耗的劳动。只要有了足够的量，不管它的价值提高或是降低，或者像处女地和大海那样没有价值，都不会影响价值创造和价值量的变化。⁽³⁰⁾

这样，我们先假定不变资本部分等于零。于是，预付资本就从 $c+v$ 简化为 v ，产品价值 $c+v+p$ 就简化为生产出来的价值 $v+p$ 。

(30) 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¹³²，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使劳动力转变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变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

假定生产出来的价值=180 镑,代表整个生产过程期间流动的劳动;我们从中扣除 90 镑可变资本的价值,就可得到 90 镑剩余价值。这 90 镑在这里表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可变资本增殖的比率,显然由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来决定,用 $\frac{p}{v}$ 来表示。在上述例子中,它是 $\frac{90}{90}=100\%$ 。我们把这种相对量称为剩余价值率。(31)

我们已经知道,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定生产操作所需要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为维持自己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为他是在自发的社会分工的环境下进行生产,所以他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是在其价值同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的某种特殊的商品形式上,或者说,同他用来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的价值相等的某种特殊的商品形式(如棉纱)上生产出他自己的生活的资料。他为此耗费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不同的,这取决于他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是取决于每天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即使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只是为自己劳动,在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但是,因为工人在生产自己的劳动力的日价值(如 3 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价值的等价物,因而只是用一个价值来补偿另一个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实际不过是简单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

(31) 人们还称之为利润率、利息率等等(英语是 **rate of profit** 等等)。读者在第三册中会看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动称为**必要劳动**⁽³²⁾：这种劳动对劳动者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的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家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劳动者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的基础。

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社会具有的各种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区别开来的，只是强迫直接生产者、工人进行剩余劳动并向他们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³³⁾

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个

(32) 我们在本书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劳动时间”，指生产某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现在起，我们也用这个词指生产独特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当然有一些不便之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避免。例如，我们可以用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作一比较。

(33) 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¹³³真是可笑透顶！他发现，剩余价值或纯产品的形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今日的节俭和节制，这就使资本家可以“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明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省和节制”。（《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78页）是节制劳动呢？还是节省尚不存在的剩余产品呢？罗雪尔之流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经创造出来的一切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过得去的理由，看成剩余价值存在的理由，显然，这里的原因除了天真无知之外，还由于他们害怕作出任何诚实的分析，担心会无意中得出使警察不满的结论。

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 $\frac{P}{v}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现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已实现的劳动的形式,另一种是处在运动中的劳动的形式。

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劳动者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34)

按照我们的假定,产品的价值 = $\overset{v}{410}$ 镑 + $\overset{c}{90}$ 镑 + $\overset{p}{90}$ 镑,预付资本 = 500 镑。因为剩余价值 = 90,预付资本 = 500,所以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人们就说:剩余价值率(人们把它同利润率混为一谈) = 18%。这样一个比较低的数字是会使凯里先生及其他同类的和谐论者感动的。但实际上剩余价值率不是 $= \frac{P}{C}$ 或 $\frac{P}{c+v}$,而是 $\frac{P}{v}$,也就是说,不是 $\frac{90}{500}$,而是 $\frac{90}{90} = 100\%$,比表面的剥削程度的 5 倍还要多。虽然我们在这个场合不知道工作日的绝对量,不知道操作期间(日、周等等),也不知道 90 镑可变资本同时推动的劳动者人数,但剩余价值率 $\frac{P}{v}$ 由于可以转化为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就精确地向我们表明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比率。这个比率为 100%。因此,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

总之,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就是这样。我们把全部产品价值拿来,使其中只是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零;余下的价值额就是在商品生产中实际生产出来的唯一的价值。如果剩余价值已定,我们

(34) 剩余价值率虽然是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但并不是剥削的绝对量的表现。例如,如果必要劳动 = 5 小时,剩余劳动 = 5 小时,那么剥削程度 = 100%,剥削的绝对量是 5 小时。相反,如果必要劳动 = 6 小时,剩余劳动 = 6 小时,剥削程度不变,也就是 100%,但剥削量却增加了 20%,由 5 小时增加到 6 小时。

从这个总额中减去剩余价值,就可得出可变资本。如果可变资本已定,而我们要求出剩余价值,那就得从这个总额中减去可变资本。如果这二者已定,那就只须进行最后的运算,计算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 $\frac{p}{v}$ 。

这种方法虽然很简单,但举几个例子使读者能够熟练应用是适当的。

首先我们到一家纺纱厂去。下面的材料是 1871 年的材料,是一个工厂主自己提供给我的。该厂使用 10 000 个纱锭,用美国棉花纺 32 支纱,每个纱锭一周生产 1 磅棉纱。飞花占 6%。因此,每周有 10 600 磅棉花被加工成 10 000 磅棉纱和 600 磅飞花。1871 年 4 月,这种棉花每磅花费 $7\frac{3}{4}$ 便士,因此 10 600 磅棉花约为 342 镑。10 000 个纱锭(包括粗纺机和蒸汽机在内),按每个花费 1 镑计算,共为 10 000 镑。它们的损耗率是 10% = 1 000 镑,或每周 20 镑。厂房的租金是 300 镑或每周 6 镑。煤每周 11 吨(每小时 1 马力用煤 4 磅,100 马力(按示功器)1 周 60 小时⁽³⁵⁾的用煤量,外加房屋取暖用煤),每吨按 8 先令 6 便士计算,每周约花费 4 镑 10 先令;煤气每周 1 镑,机油每周 4 镑 10 先令,所有辅助材料共需 10 镑。因此,不变价值部分是 378 镑。因为这个不变价值部分在每周的价值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所以我们假定它等于零。

工人的工资每周是 52 镑;棉纱的价格是每磅 $12\frac{1}{4}$ 便士,10 000 磅是 510 镑。因此,每周生产出来的价值 = 510 镑 - 378 镑 = 132 镑。如果我们现在从中减去可变资本(工人的工资) = 52 镑,那么剩

(35) 这里要指出一点,英国的旧马力是根据汽缸的直径计算的,而新马力则是根据示功器指示的实际马力计算的。¹³⁴

下的就是剩余价值 80 镑。因此, 剩余价值率 $= \frac{80}{52} = 152\frac{11}{13}\%$ 。因此, 在 10 小时的平均工作日内, 必要劳动 $= 3\frac{31}{33}$ 小时, 剩余劳动 $= 6\frac{2}{33}$ 小时。

如下的计算确实不完备, 因为其中缺乏若干材料, 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却是足够了。我们借用杰科布论述谷物法的著作 (1815 年)¹³⁵ 中的事实。每夸特 (8 蒲式耳) 小麦的价格是 80 先令, 每英亩平均收小麦 22 蒲式耳, 所以从每英亩得到的是 11 镑。

每英亩的价值生产

种子(小麦)	1 镑 9 先令	什一税、国税	1 镑 1 先令
肥料	2 镑 10 先令	地租	1 镑 8 先令
工资	3 镑 10 先令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利息	1 镑 2 先令
总计	7 镑 9 先令	总计	3 镑 11 先令

在这里(始终假定产品的价格=它的价值), 剩余价值是分为利润、利息、什一税等等不同项目的。这些项目与我们无关, 因此, 我们把它们加在一起, 于是就得到剩余价值 3 镑 11 先令。我们把买种子和肥料的 3 镑 19 先令作为不变资本部分, 使它等于零。预付的可变资本就是 3 镑 10 先令, 代替它而被生产出来的新价值是 3 镑 10 先令 + 3 镑 11 先令。剩余价值率 $\frac{p}{v}$ 等于 $\frac{3 \text{ 镑 } 11 \text{ 先令}}{3 \text{ 镑 } 10 \text{ 先令}} = 100\%$ 以上。因此, 劳动者用他的工作日的一半以上生产剩余价值, 这些剩余价值被各种人用各种借口瓜分掉。⁽³⁶⁾

(36) 这些数字只能作为例解, 因为这里假定价格=价值。但是, 我们在第三册中会看到, 即使拿平均价格来说, 也不会这样简单地得出这个等式。¹³⁶

2. 产品价值在同一产品的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谈资本家是怎样使货币成为资本的那个例子。他的纺纱工人的必要劳动是6小时,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因此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是100%。

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产品是20磅棉纱,价值30先令。这个价值至少有 $\frac{8}{10}$ 或24先令是由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只是再现的价值(20磅棉花20先令,纱锭4先令)构成的;换句话说,棉纱价值的 $\frac{8}{10}$ 是由不变资本构成的。其余的 $\frac{2}{10}$ 是在纺纱过程中产生的6先令新价值,其中一半补偿预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也就是3先令可变资本,另一半形成3先令剩余价值。可见,这20磅棉纱的总价值是依下列方式构成的:

$$30 \text{ 先令棉纱价值} = \overset{c}{24} \text{ 先令} + \overset{v}{3} \text{ 先令} + \overset{p}{3} \text{ 先令}$$

因为这个总价值表现在产品20磅棉纱上,所以这个价值的各个不同的要素也可以表现在产品的相应部分上。

如果说30先令存在于20磅棉纱中,那么,这个价值的 $\frac{8}{10}$ 或其不变部分24先令,就存在于 $\frac{8}{10}$ 的产品或16磅棉纱中。在这当中,13 $\frac{1}{3}$ 磅代表原料的价值,即纺掉的20磅棉花的价值20先令,2 $\frac{2}{3}$ 磅代表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工具纱锭等等的价值4先令。

虽然13 $\frac{1}{3}$ 磅棉纱中只包含价值13 $\frac{1}{3}$ 先令的13 $\frac{1}{3}$ 磅棉花;但它们的追加价值6 $\frac{2}{3}$ 先令形成其余6 $\frac{2}{3}$ 磅棉纱中包含的棉花的等价物。这样,13 $\frac{1}{3}$ 磅棉纱代表总产品20磅棉纱中包含的全部棉花,代表总

产品的原料,此外再也不代表别的东西。因此就好像总产品中的全部棉花都塞到 $13\frac{1}{3}$ 磅棉纱中,而其余的 $6\frac{2}{3}$ 磅棉纱则丝毫不包含棉花了。另一方面,在这 $13\frac{1}{3}$ 磅棉纱中,在我们的场合既不包含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的一个原子,也不包含纺纱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的一个原子。

同样,由不变资本余额=4先令构成的其余 $2\frac{2}{3}$ 磅棉纱,只是代表整个生产过程中所用掉的辅助材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

因此, $\frac{8}{10}$ 的产品或 16 磅棉纱,虽然从作为使用价值来看,它们同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也是纺纱工人劳动的创造物,但在这全部产品中丝毫不包含纺纱操作期间吸收的劳动。好像这 $\frac{8}{10}$ 的棉纱没有劳动的中介就转化为棉纱了,好像它们的棉纱形态纯粹是一种幻象。其实,当资本家按 24 先令把这些棉纱卖出,又用 24 先令买回生产资料时就会表明,这 16 磅棉纱不过是化了装的棉花、纱锭、煤炭等等。另一方面,其余 $\frac{2}{10}$ 的产品或 4 磅棉纱,现在只是代表 12 个小时操作中生产的 6 先令新价值。它们包含的已用掉的原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已经被剔除了,同前 16 磅棉纱合并在一起了。现在,物化在产品 20 磅棉纱中的纺纱工人的劳动都集中在 4 磅棉纱即 $\frac{2}{10}$ 的产品上。好像这 4 磅棉纱是纺纱工人凭空纺成的,好像所用的棉花和纱锭是无偿的,未经人类加工的,因而不会把任何价值加到产品中去。最后,在这凝结着 12 小时纺纱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的 4 磅棉纱中,一半只代表所使用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即预付的 3 先令可变资本,另一半只代表 3 先令剩余价值。

因为纺纱工人的 12 个劳动小时物化在 6 先令价值中,所以 30 先令的棉纱价值就代表 60 个劳动小时。它们存在于 20 磅棉纱内,其中 $\frac{8}{10}$ 或 16 磅棉纱是纺纱操作以前的 48 个劳动小时的化身,也就

是包含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的化身，而 $\frac{2}{10}$ 或4磅棉纱则是纺纱操作中消耗的12个劳动小时的化身。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棉纱的总价值怎样等于棉纱生产中创造的价值加棉纱的生产资料中原先已有的价值之和。现在我们又看到，价值在职能上不同的要素，怎样能够表现在产品的相应部分上。

我们以上把产品——生产的结果——分解成几个量。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或不变资本部分。另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必要劳动，或可变资本部分。最后一个量只代表同一过程中加进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这种分解很简单，但又很重要，这一点在以后把它应用到复杂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上时就可以看出。

这是把某一时期如一天内得到的总产品分解成各个部分，分别代表总产品价值的不同要素；如果让各个部分产品代表工作日的各个部分的产物，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在前一场合我们考察的是作为既定物的总产品，在后一场合我们是从总产品的发展阶段来研究总产品。

纺纱工人12小时生产20磅棉纱，因此1小时生产 $1\frac{2}{3}$ 磅，8小时生产 $13\frac{1}{3}$ 磅，也就是生产一个部分产品，其价值等于整个工作日纺掉的棉花的总价值。同样，往后的1小时36分生产的部分产品等于 $2\frac{2}{3}$ 磅棉纱，因而代表12个劳动小时所用掉的劳动工具的价值；同样，纺纱工人在往后的75分钟时间内生产出值3先令的2磅棉纱，——这个价值等于他在6小时必要劳动中创造的全部价值。在最后的75分钟时间内，他又生产2磅棉纱，其价值等于他半天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这是英国工厂主自己常用的计算方法；例如他会说，他在最初8小时或 $\frac{2}{3}$ 的工作日中补偿他的棉花的费用。我们知道，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其实它就是第一个公式，不过把空间

变成了时间；从完成的产品各部分并列存在的空间变成了这些产品各部分依次出现的时间。但是，伴随这个公式也可能产生一系列野蛮而怪诞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些实际上关心价值的增殖过程，但在理论上又有意曲解这一过程的意义的那些人的头脑中会产生这种想法。这些人可能这样想：我们的纺纱工人例如在他的工作日的最初8小时是生产补偿棉花的价值，往后的1小时36分是生产或补偿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再往后的1小时12分是生产或补偿工资，而只有那非常著名的“最后一小时”才是献给工厂主生产剩余价值的。这样一来，纺纱工人就得创造双重奇迹：一方面，他在用棉花、纱锭、蒸汽机、煤炭、机油等等纺纱的时候同时又生产这些东西；另一方面，他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五个工作日。就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原料和劳动工具需要4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而把它们转化为棉纱还需要1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对利润的贪欲使人很容易相信这种奇迹，并且总是找得到发空论的献媚者来证明这种奇迹的合理性。下面这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3. 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索·威·西尼耳，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选中了他，要他充当斗士去反对新颁布的工厂法¹³⁷和比工厂法更激进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工厂主以通常具有的实际经验看出，这位教授先生“还需要好好地最后雕琢一番”才能成为

一个完美无缺的学者。因此他们叫他到曼彻斯特来。而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曼彻斯特从工厂主那里学到的课业，加以润色，写成一本小册子：《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我们从下面一段话可以看出，这是一本很有趣的读物：

“按照现行法律，凡雇用不满18岁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超过 $11\frac{1}{2}$ 小时，就是说，一周的前5天每天劳动12小时，星期六劳动9小时。下面的分析（1）说明，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假定工厂主投资100 000镑，其中用在厂房和机器上的是80 000镑，用在原材料和工资上的是20 000镑。假定资本每年周转一次，总利润是15%，该厂全年的商品销售额应该是价值115 000镑。一个工作日是23个 $\frac{1}{2}$ 劳动小时，每个 $\frac{1}{2}$ 劳动小时生产115 000镑的 $\frac{5}{115}$ 或 $\frac{1}{23}$ 。在构成总额115 000镑的 $\frac{23}{23}$ 中， $\frac{20}{23}$ 即115 000镑中的100 000镑只是补偿资本， $\frac{1}{23}$ 即总利润（1）15 000镑中的5 000镑补偿工厂和机器的磨损。其余 $\frac{2}{23}$ 即每天最后两个 $\frac{1}{2}$ 小时生产10%的纯利润。因此，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厂不是劳动 $11\frac{1}{2}$ 小时，而是可以劳动13小时，那么，只要增加大约2 600镑流动资本，就能使纯利润增加一倍以上。另一方面，劳动时间每天缩短1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缩短 $1\frac{1}{2}$ 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37）

（37）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2、13页。我们且不谈那些和我们的目的无关的奇谈怪论。我们也不分析这样一种论断，例如，说工厂主把补偿磨损的机器等等的金额，即补偿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金额，算在总利润或纯利润里面，算在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利润里面。我们也不去谈这些数据是否正确。伦纳德·霍纳在《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1837年伦敦版）中已指明，这些数据除了供所谓“分析”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伦纳德·霍纳是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在1859年前，一直是工厂视察员——其实是工厂检查官。他将永远受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感谢。他终生不仅同恼怒的工厂主作斗争，而且同大臣作斗争，对于这些大臣来说，计算工厂主在下院的“票数”比计算“人手”在工厂内的劳动小时要重要得多。

且不说西尼耳说的内容如何荒唐，他的叙述方法也是混乱的。其实，他想说的是：

这位教授先生竟把这种东西叫做“分析”！如果他真的相信工厂主的怨言，认为劳动者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再生产或补偿建筑物、机器、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那么，任何分析都是多余的。他只须回答：“诸位先生！如果你们把劳动时间从 $11\frac{1}{2}$ 小时减为 10 小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天棉花、机器等等的消耗也会减少 $1\frac{1}{2}$ 小时。因此，你们正好得失相当。以后你们的工人用来再生产或补偿预付资本的时间也就会少 $1\frac{1}{2}$ 小时。”但是，如果西尼耳觉得对这些先生的话需要加以思考，作为内行认为必须作一番分析；他首先就得请求工厂主先生们，在专门涉及纯利润同工作日长度的关系的问题上，不要把机器、厂房、原料和劳动这些如此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而是要把包含在这些机器、原料等等中的不变资本放在一边，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放在另一边。如果他在这之后偶然发现，按照工厂主的计算，劳动者是用他的工作日的 $\frac{2}{23}$ 或 1 小时再生产或补偿工资，那么就on应该这样继续分析：

根据你们的说法，劳动者是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自己的工资，在

工厂主使工人每天劳动 $11\frac{1}{2}$ 小时或 23 个 $\frac{1}{2}$ 小时。正像一个工作日的情形一样，全年的劳动也是由 $11\frac{1}{2}$ 小时或 23 个 $\frac{1}{2}$ 小时（即 23 个 $\frac{1}{2}$ 小时乘以一年的工作日数）构成。按照这个假定，23 个 $\frac{1}{2}$ 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 115 000 镑； $\frac{1}{2}$ 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 $\frac{1}{23} \times 115\ 000$ 镑， $\frac{20}{2}$ 个劳动小时生产 $\frac{20}{23} \times 115\ 000$ 镑 = 100 000 镑，也就是说，它们只补偿预付资本。余下的 3 个 $\frac{1}{2}$ 劳动小时生产 $\frac{3}{23} \times 115\ 000$ 镑 = 15 000 镑，即总利润。在这 3 个 $\frac{1}{2}$ 劳动小时中， $\frac{1}{2}$ 个劳动小时生产 $\frac{1}{23} \times 115\ 000$ 镑 = 5 000 镑，即只补偿工厂和机器的损耗。最后的两个 $\frac{1}{2}$ 劳动小时，即最后一个劳动小时，生产 $\frac{2}{23} \times 115\ 000$ 镑 = 10 000 镑，即纯利润。在本文中，西尼耳把最后的 $\frac{2}{23}$ 的产品转化为工作日本身的各个部分。

最后一小时生产你们的剩余价值或纯利润。因为劳动者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同样的价值,所以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等于最后一小时的产品。其次,劳动者只有耗费劳动,才能生产价值,而他的劳动量是由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按照你们的说法,这种持续时间是每天 $11\frac{1}{2}$ 小时。他用这 $11\frac{1}{2}$ 小时的一部分来生产或补偿自己的工资,用另一部分来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在这个工作日内他再也没有做别的事情。既然按照你们的说法,劳动者的工资和他提供给你们们的剩余价值是同样大的价值,那么劳动者显然是在 $5\frac{3}{4}$ 小时内生产自己的工资,在其余 $5\frac{3}{4}$ 小时内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其次,因为两小时内生产出来的棉纱等于他的工资加上你们的纯利润,所以这个价值必须用 $11\frac{1}{2}$ 个劳动小时来计量,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必须用 $5\frac{3}{4}$ 个小时来计量,最后一小时的产品也必须用 $5\frac{3}{4}$ 个小时来计量。现在我们到了棘手的地方了:请注意!倒数第二个劳动小时同最初一个劳动小时一样,都是一个劳动小时。不多也不少。因此,纺纱工人怎么能在 1 个劳动小时内生产出代表 $5\frac{3}{4}$ 个劳动小时的价值呢?实际上,他并没有创造这样的奇迹。他在 1 个劳动小时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是一定量的棉纱。这些棉纱的价值要用 $5\frac{3}{4}$ 个劳动小时来计量,其中 $4\frac{3}{4}$ 小时未经他的协助就已包含在已消耗的生产资料棉花、机器等等内,而 $\frac{1}{4}$ 小时或 1 小时才是由他自己加进的。因为他的工资是在 $5\frac{3}{4}$ 小时内生产的,而他在 1 小时内生产的棉纱也包含同量劳动,所以,他在 $5\frac{3}{4}$ 小时纺纱劳动内生产的东​​西仅仅是他在 1 小时内生产的棉纱的等价物,这并不是什么魔法妖术。如果你们以为工人用了他的劳动时间的哪怕一个时间原子来再生产或补偿棉花、机器等等的价值,那你们就完全错了。由于他的劳动把棉花和纱锭变成棉纱,由于他纺纱,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就转移到棉纱上去。这种结果

是靠他的劳动的质,而不是靠他的劳动的量造成的。当然,他1小时转移的棉花等等的价值比 $\frac{1}{2}$ 小时多,但这只是因为他1小时纺掉的棉花比 $\frac{1}{2}$ 小时多。现在你们彻底明白了吧,你们所谓工人(他的工作日为 $11\frac{1}{2}$ 小时)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他的工资的价值,在最后一小时生产纯利润,只不过是说,他的2小时(不管是工作日的最初2小时或是最后2小时)的产品所体现的劳动小时,正好同他的整个工作日包含的劳动小时一样多。所谓工人在前 $5\frac{3}{4}$ 小时生产他的工资,在后 $5\frac{3}{4}$ 小时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又只不过是说,前 $5\frac{3}{4}$ 小时你们给了报酬,后 $5\frac{3}{4}$ 小时你们没有给报酬。这里我说劳动的报酬,而不说劳动力的报酬,是为了用你们的行话。如果现在你们看一看你们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和你们没有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的比率,你们就会发现,二者的比率是半天比半天,也就是100%,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利润率。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你们使你们的人手不是劳动 $11\frac{1}{2}$ 小时,而是劳动13小时,并且把这个余额也归入剩余劳动,那么剩余劳动就会从 $5\frac{3}{4}$ 小时增加到 $7\frac{1}{4}$ 小时,从而剩余价值率就会从100%增加到 $126\frac{2}{23}\%$ 。如果你们期望,加上 $1\frac{1}{2}$ 小时就能使你们的利润从100%增加到200%,甚至200%以上,即“增加一倍以上”,那未免太过分了。另一方面——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们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如果你们担心,工作日从 $11\frac{1}{2}$ 小时缩减为 $10\frac{1}{2}$ 小时会使你们的全部纯利润化为乌有,那又未免太悲观了。假设一切条件相同,即使剩余劳动从 $5\frac{3}{4}$ 小时降为 $4\frac{3}{4}$ 小时,仍然会得出一个很好的剩余价值率,即 $82\frac{14}{23}\%$ 。但是这个“最后一小时”——你们为它编造的故事比锡利亚信徒¹³⁸为世界末日编造的故事还要多——的神话是“十足的胡说”。失掉这最后一小时不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你们并不会丧失“纯利润”,而你们生产地消费的童男童

女也不会失去对你们所十分宝贵的“灵魂的纯洁”。⁽³⁸⁾当你们的“最

(38) 西尼耳证明,工厂主的纯利润、英国棉纺织业的存在和英国的市场都决定于“最后一个劳动小时”;而安德鲁·尤尔博士则又证明¹³⁹,如果不是让童工和不满 18 岁的青工在工厂的灼热的而不是道德的气氛里劳动到精疲力尽,而是提早一小时把他们赶到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外界去,他们就因懒惰和邪恶而使灵魂不能得救。从 1848 年起,工厂视察员在半年一次的报告中一直拿“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来嘲笑和激怒工厂主。例如,豪威耳先生在 1855 年 5 月 31 日的工厂视察报告中说:“假如下面这种巧妙的计算(他引证西尼耳)是正确的,联合王国的所有棉纺织厂从 1850 年起就已经赔本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 1855 年 4 月 30 日为止的半年》第 19 页)当 1848 年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⁴⁰时,工厂主强迫那些分散在多塞特和萨默塞特两郡交界处地方的一些劳动者在一份反对这项法案的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向你们请愿的人,作为父亲,认为增加一小时闲荡的时间,结果只会使我们的孩子道德败坏,因为懒惰是万恶之始。”关于这一点,1848 年 10 月 31 日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指出:“在这些敦厚善良的父母们的子女做工的麻纺厂里,空气中充满着棉纱及其他原料的尘埃和纤维碎屑,即使只在那里待上 10 分钟也是非常不愉快的;在那里不能不感到极度的痛苦,因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同时,由于机器飞速地转动,这种劳动本身需要全神贯注,不断地迅速运动,恰当地运用动作,这些儿童在这样的空气里除了吃饭时间外整整劳动 10 小时,现在还要他们的父母说自己的子女‘懒惰’,这未免太残酷了……这些儿童的劳动时间比附近农村里雇工的劳动时间还要长……所谓‘懒惰和邪恶’这种不断重复的说法,必须斥之为十足的假仁假义和最无耻的伪善……若干年以前,当有人在最高权威的批准下,十分自信地公开宣布工厂主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劳动,从而工作日缩短一小时就会消灭纯利润的时候,一部分公众曾对这种自信程度感到惊讶;当这部分公众看到这个理论从那时以来取得了何等程度的进步时恐怕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按照这一理论,充满善行的‘最后一小时’现在既包括道德也包括纯利润;因此,如果儿童的劳动减为整整 10 小时,儿童的道德会和他们的雇主的纯利润一道化为乌有,因为二者都取决于这致命的一小时。”(《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 年 10 月 31 日》第 101 页)接着,这份工厂视察员报告举出了一些实例,说明这些工厂主先生的“道德”和“善行”;这个报告详细地谈到了他们怎样施用阴谋、

后一小时”真的敲响的时候,请你们想起牛津的这位教授吧。好了,但愿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能更全面地了解诸位。再见!⁽³⁹⁾西尼耳是在1836年发现“最后一小时”的。8年以后,即1848年4月15日,官方经济科学的一位大官老爷詹姆斯·威尔逊在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上又老调重弹,以反对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

4. 纯 产 品

我们把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称为纯产品(剩余产品)。决定剩余价值率的,不是剩余价值同总额的比率,而是剩余价值同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比率,同样,决定纯产品的量的,也不是纯产品同

诡计、利诱、威胁、伪造等手段,迫使少数惶恐不安的工人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名,然后把这种请愿书冒充整个产业部门和一个或几个郡的请愿书提交议会。——无论是后来热心拥护立法限制工作日而值得赞扬的西尼耳本人,还是先后反对他的人,都不知道怎样说明这一“独创的发现”的谬误推理,这个事实最能说明所谓经济“科学”的现状。他们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得不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

(39) 这位教授先生总算从这次曼彻斯特出色的远征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在《关于工厂法的书信》中,全部纯利润,即“利润”、“利息”和甚至“更多的东西”取决于工人的一小时无酬劳动!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为取悦牛津的大学生和“有教养的阶级”而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还反对李嘉图提出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论点,“发现”利润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利息来源于资本家的节欲。这一派胡言本身是陈旧的,但“节欲”这个词是新鲜的。罗雪尔先生把这个词正确地译成德文的“Enthaltung”。但他的不大懂拉丁文的同胞维尔特们、舒尔采们以及别的米歇尔们却把这个词变成了僧侣用语。节欲(Enthaltung)变成了禁欲(Entsagung)。

总额的余下部分的比率,而是纯产品同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的比率。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富的增加的程度不是由总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纯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⁴⁰⁾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即工作日。

(40) “对于一个拥有 20 000 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 2 000 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低于 2 000 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 100 个工人还是雇 1 000 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 10 000 镑还是卖 20 000 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 只要这个国家的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 1 000 万还是有 1 200 万,都是无关紧要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第 416 页)早在李嘉图之前,有一位纯产品的狂热的崇拜者阿瑟·杨格——他还是一个喜欢空谈而缺乏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名声和他的功绩适成反比——就曾说过:“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如果像古罗马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处呢? 除了繁殖人口别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有用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1774 年伦敦版第 47 页)。霍普金斯十分正确地指出:“奇怪的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纯收入说成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因为纯产品会使工人阶级有活干。但是很明显,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并不因为它是纯的”(托·霍普金斯《论地租》1828 年伦敦版第 126 页)。

第十章

工 作 日

1. 工作日的界限

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这种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如果劳动者平均一天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 6 小时,那么劳动者平均每天就要劳动 6 小时来逐日生产他的劳动力,或者说,再生产他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值。这样,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是 6 小时;在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已定量。但是由此还不能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量。

我们用 a————b 线表示必要劳动时间的持续或长度,假定是 6 小时。再假定劳动分别超过 ab 线 1 小时、3 小时、6 小时不等,我们就得到三条不同的线:



这三条线表示三种不同的工作日:七小时工作日、九小时工作日和十二

小时工作日。延长线 bc 表示剩余劳动的长度。因为工作日等于 $ab+bc$ ，即 ac ，所以它随着可变量 bc 一同变化。因为 ab 是已定的，所以 bc 与 ab 之比总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个比例在工作日 I 中是 ab 的 $\frac{1}{6}$ ，在工作日 II 中是 $\frac{3}{6}$ ，在工作日 III 中是 $\frac{6}{6}$ 。最后，因为 $\frac{\text{剩余劳动时间}}{\text{必要劳动时间}}$ 这个比率决定剩余价值率，所以已知这两段线之比，就可以知道剩余价值率。就上述三种不同的工作日来说，剩余价值率分别等于 $16\frac{2}{3}\%$ 、 50% 和 100% 。但是，仅仅知道剩余价值率，却不能反过来断定工作日的量。例如，假定剩余价值率是 100% ，可是工作日可以是 8 小时、10 小时、12 小时等等。这个剩余价值率表明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同样大的；但并不表明每一部分各有多大。

所以，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的一部分当然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⁴¹⁾

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不过它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当然，假定延长线 bc 或剩余劳动 = 0，我们就得出一个最低界限，即工人为维持自身而在一天当中必须从事必要劳动的那部分时间。但是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产生，必要劳动就始终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绝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个一定的点。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首先是劳动力

(41) “工作日是个不定量，可长可短。”（《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1770 年伦敦版第 73 页）

的身体界限。一个人在 24 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像一匹马平均每天只能干 8 小时的活。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需要；人要吃饭、穿衣等等。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并不是唯一的界限。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劳动者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数量和性质由一般的文明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的变动不能超越自然和社会规定的界限所形成的范围。但是这些界限本身都有极大的弹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例如我们看到有 10 小时、12 小时、14 小时、16 小时、18 小时的工作日，也就是有各种各样长度的工作日。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因此，资本家有权要劳动者在全日内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⁴²⁾当然比一个自然日短。短多少呢？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自然倾向，一个唯一的动机；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量。⁽⁴³⁾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

(42) 这个问题比罗伯特·皮尔爵士向伯明翰商会提出的有名的问题“什么是一镑？”不知要重要多少。皮尔所以向“小先令派”¹⁴¹提出这样的问题，只是因为他和“小先令派”一样，不理解货币的本质。

(43) “资本家的任务是：靠所支出的资本来取得尽量多的劳动量。”（让·古·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 年巴黎第 2 版第 62 页）

的时间。⁽⁴⁴⁾如果雇佣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在偷窃了资本家。⁽⁴⁵⁾

可见，资本家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根据的。他和任何别的买者一样，力图从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取得尽量多的利益。但是，突然传来了在旋风般的生产中一直沉默的劳动者的声音：

我卖给你的商品和其他的普通商品不同，因为它的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才购买它。在你是资本的增加，在我则是劳动的过多的支出。你和我在市场上只知道一个规律，即商品交换的规律。商品不归让渡商品的卖者消费，而归获得商品的买者消费。因此，我的劳动力归你使用。但是我必须依靠每天出卖劳动力的价格来逐日再生产和重新出卖劳动力。撇开由于年龄和其他自然原因造成的损耗不说，我明天得像今天一样健康有力和精神饱满，以便以同样的体力重新开始劳动。你经常向我宣讲“节俭”和“节制”的福音。好！我愿意做个有理智的、聪明的管理人，爱惜我唯一的财产——劳动力，不让它有任何荒唐的浪费。我每天只想在它的正常耐力和合理的发展所容许的限度内使它运动，转变为劳动，简言之，使用它。你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就能在一天内使用掉我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的量。你在劳动上这样赚得的，正是我在实体上损失的。使用我的劳动力和劫

(44) “每天损失一个劳动小时，会给一个商业国家造成莫大的损害。”“我们王国的劳动贫民大量地消费奢侈品；制造业中的平民尤其如此；他们同时还消费自己的时间——这是各种消费中最有害的一种消费。”（[约翰·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7页和第153页）

(45) “贪婪的齐嵩鬼不放心地监视着自由短工，只要他休息一下，就硬说是偷窃了他。”（尼·兰盖《民法论》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466页）

掠我的劳动力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在平均劳动量适当的情况下一个工人的一般寿命为 30 年,那你每天支付给我的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应当是它的总价值的 $\frac{1}{365 \times 30}$ 或 $\frac{1}{10\,950}$ 。但是如果你要在 10 年内就消费尽我的劳动力,可是每天支付给我的仍然是我的劳动力总价值的 $\frac{1}{10\,950}$,而不是 $\frac{1}{3\,650}$,那就只支付了我的劳动力日价值的 $\frac{1}{3}$,因而每天就偷走了我的商品的 $\frac{2}{3}$ 。你使用三天的劳动力,只付给一天的代价。你违反了我们的契约和交换规律。因此,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我这样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为在交易中是没有温情可言的¹⁴²。你可能是一个模范公民,也许还是保护动物协会的会员,甚至还享有德高望重的名声,这都无关紧要。在我面前你所代表的那个东西的胸膛是空空的。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跳动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¹⁴³,因为我和任何别的卖者一样,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价值。(46)

我们看到,撇开弹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和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买者对它的消费并不是无限的,而且劳动者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的长度以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

(46) 1860—1861 年,伦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 9 小时,当时他们的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同我们这位劳动者的辩护词几乎完全一样。声明讥讽地影射了最贪婪的建筑业老板莫·佩托爵士。后来这位建筑业老板由于惨重破产而出了名,但在此之前他一直享有德高望重的名声。

在这两种平等的权利之间,哪一种起决定作用呢?是力量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长期斗争,这是资本家和劳动者,也就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2. 贪求剩余劳动的资本。领主和工厂主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⁴⁷⁾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⁴⁸⁾,这都无关紧要。在深入研究以前,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个事实。如果一个社会形态是这样的,即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一定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至于说到通过金银的生产谋取特殊形式的交换价值,那么我们在古代就已经看到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

(47) “那些劳动的人……实际上既养活那些称为富人的领年金者,也养活自己。”(埃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2[、3]页)

(48) 尼布尔在他的《罗马史》中非常天真地指出:“像伊特鲁里亚人的那种建筑,虽然仅存遗迹,但仍令人惊异;这样的建筑,毋庸讳言,在小国是以奴隶主和奴隶的存在为前提的。”西斯蒙第说得深刻得多:“布鲁塞尔的花边”是以资本家和雇工的存在为前提的。

在那里,劳动直到累死为止,已经成了法律。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的记载就可以知道。⁽⁴⁹⁾但是在古代世界,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它们的产品的外销因此而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的野蛮之上,再加上可怕的过度劳动这个文明的产物。当美国南部各州的生产主要以满足直接需要为目的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精于计算的那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了。农奴,例如多瑙河两公国的农奴,也有类似的情形。

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英国工厂中的剩余劳动和多瑙河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农奴制度使后者具有独立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组成,自由劳动者每周为资本家提供 6×6 小时即36小时的剩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3天,又为资本家白白地劳动3天,完全一样。但是这种情形是觉察不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表示同样的关系,例如说工人在每分钟内为资本家劳动30秒,为自己劳动30秒等等。而徭役劳动就不是

(49) “这些不幸者(在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之间的金矿中做工的人)不仅总是肮脏不堪,而且不得不赤身露体,谁看到他们,都不能不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在这种地方,对于老弱病残和妇女没有任何的照顾和怜悯。所有的人都在皮鞭的逼迫下不断地做工,直到死亡才结束他们的痛苦和贫困生活。”(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史学丛书》第3卷第13章)

这样。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他为领主所完成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他在自己的地里完成必要劳动,在主人的领地里完成剩余劳动。所以,这两部分劳动时间是各自独立的。在徭役劳动形式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截然分开。这种形式上的差别,显然丝毫不会改变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量的比率。每周三天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叫徭役劳动还是叫做利润,都是劳动者自己的无代价的三天劳动。不过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领主的贪欲则简单地表现为追求徭役的天数。⁽⁵⁰⁾

在多瑙河两公国,徭役劳动是同实物地租和其他的租税结合在一起的,但徭役劳动是交纳给统治阶级的最主要的贡赋。在这种条件下,徭役劳动很少是由农奴制产生的,相反,农奴制倒多半是由徭役劳动产生的。罗马尼亚各州的情形就是这样。那里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但这种公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和印度的形式。一部分土地是私田,由公社成员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是公有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这种共同劳动的产品,一部分作为储备基金用于防灾备荒和应付其他意外情况,一部分作为公共储备用于战争和宗教方面的开支以及公社的其他开支。久而久之,军队和教会方面身居要职者侵占了公有地,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有地上的劳动。农民,即自由耕作者在公社土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社土地掠夺者而进行的徭役劳动。农奴制关系就是从这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当世界的解放者,神圣的俄罗斯借口废除农奴制把它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时候才得到法律上的承认。1831年俄国将军基谢廖夫頒

(50) 以下所述,是指罗马尼亚各州在克里木战争后发生政变¹¹⁵以前的情形。

布的徭役劳动法,是由领主们口授的。俄罗斯由此一举征服了多瑙河两公国的贵族,并博得了整个欧洲的自由派白痴们的喝彩。

按照这个称为组织规程¹⁴⁴的徭役劳动法,瓦拉几亚的每个农民除交纳详细规定的大量实物贡赋之外,还必须为所谓土地所有者完成:1. 十二个一般工作日;2. 一个田间工作日;3. 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一年共 14 日。不过,如果人们具有经济学上的深刻的洞察力,人们就会注意到,这里说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而是生产某种平均日产品所必要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塞克洛普在 24 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因此,“组织规程”本身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12 个工作日应该理解为 36 日体力劳动的产品,一个田间工作日应理解为 3 日,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也应理解为 3 日。合计是 42 日徭役。此外还要加上所谓 **Jobagie**, 就是为地主完成临时的农活所服的劳役。每个村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徭役。每个瓦拉几亚的农民估计要担负 14 日这种额外徭役劳动。这样,前面规定的 42 日徭役再加上这 14 日徭役每年就有 56 个工作日。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不好,每年只有 210 日可以从事农活。其中有 40 日是星期天和节日,平均还有 30 日坏天气,加起来就去掉了 70 日。剩下的只有 140 个工作日。徭役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是 $\frac{56}{84}$ 或 $66\frac{2}{3}\%$, 这表明剩余价值率比英国工厂工人和农业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率要小得多。但这只是法定的徭役劳动。“组织规程”比英国的工厂立法有更多的“自由主义”精神,易于让人规避它自己的规定。它除了把 12 日变成 56 日之外,又把 56 日徭役中每日的名义上的劳动定额规定得非拖到以后的日子去完成不可。例如一日的锄草定额,特别是玉米地的锄草定额,实际上要加倍的时间才能完成。某些农活的法定的一日劳动

定额,甚至可以解释成所谓这一日常常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10月为止。对于摩尔多瓦,规定更加苛刻。因此,有一个为胜利所陶醉的领主喊道:

“组织规程规定的12日徭役,等于一年365日!”⁽⁵¹⁾

如果说多瑙河两公国组织规程通过一项项条文表明了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并使之合法化,那么,英国的工厂法则以消极的方式表现了同样的病态。这些法律以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的名义,公开地对工作日强加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制地进行限制,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一种盲目的贪欲一方面使地力枯竭,另一方面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种衰退。⁽⁵²⁾

(51) 详见埃·雷尼奥《多瑙河两公国政治社会史》1855年巴黎版。

(52) “一般说来,一个生物体超过它的同类的平均长度,这在某种限度内表示这个生物体的强健。如果人的正常发育由于自然条件或社会条件而受到妨害,人体就会缩小。在欧洲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里,自从实行这种制度以来,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长降低了,一般说来,他们已经不太适合服役了。法国在革命(1789年)以前,步兵身长的最低标准是165厘米,1818年(根据3月10日的法令)是157厘米,根据1832年3月21日的法令只有156厘米。在法国,应征者平均有一半以上因身长不够和体质孱弱而被淘汰。在萨克森,1780年军人的身长标准是178厘米,目前是155厘米。在普鲁士目前是157厘米。根据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刊载的迈耶尔博士的报告,普鲁士按9年平均计算,每1000个应征者当中有716人不合格:其中317人因身长不够,399人因体质孱弱,等等。1858年,柏林就没有征足兵额,差156人。”(尤·冯·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17、118页)

现行的 1850 年工厂法¹⁴⁵规定,一周平均每个工作日为 10 小时,即一周的前 5 天为 12 小时,从早晨 6 时至晚上 6 时,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和一小时午饭时间,做工时间净剩 $10\frac{1}{2}$ 小时;星期六为 8 小时,从早晨 6 时至午后 2 时,其中有半小时早饭时间。每周净剩 60 小时,前 5 天为 $10\frac{1}{2}$ 小时,星期六为 $7\frac{1}{2}$ 小时。⁽⁵³⁾¹⁴⁶ 为了监督这项法律的执行,任命了专门的官员,即工厂视察员,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根据议会的命令每半年公布一次。这些报告不断地提供关于资本家贪欲程度的官方统计材料。

让我们听一听这些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吧。⁽⁵⁴⁾

“进行欺骗的工厂主在早晨 6 点前 1 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晚上 6 点过 1 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规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 5 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前后各侵占 10 分钟。星期六下午到 2 点过 1 刻才收工。这样他就赚到:

(53) 关于 1850 年工厂法的历史,将在本章以后的段落叙述。

(54) 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 1845 年这段时期,我只在某些地方提到,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请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 年莱比锡版)。1845 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 20 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 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特别谈到了 1862 年尚未实施工厂法的那些工业部门的情形,其中有些部门直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工厂法。因此,恩格斯所描写的状况在这些部门内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我所举的例子主要属于 1848 年以后的自由贸易时期,也就是不学无术而又夸夸其谈的自由贸易贩子们神话般地吹嘘的那个极乐时期。——这里所以把英国摆在首要地位,只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代表,而且只有英国才有不断公布的官方统计材料供我们研究。

早 6 时前·····	15 分钟	5 日共计：300 分钟
晚 6 时后·····	15 分钟	
早饭·····	10 分钟	
午饭·····	20 分钟	
	60 分钟	
星 期 六		
早 6 时前·····	15 分钟	1 周利润共计：340 分钟
早饭·····	10 分钟	
下午 2 时后·····	15 分钟	
	40 分钟	

就是说,5 小时 40 分钟,每年以 50 个劳动周计算(除掉 2 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 27 个工作日。”⁽⁵⁵⁾

“如果每个工作日比标准时间延长 5 分钟,一年就等于 $2\frac{1}{2}$ 个工作日。”⁽⁵⁶⁾
“这里捞一点时间,那里捞一点时间,一天多出一小时,一年 12 个月就变成 13 个月了。”⁽⁵⁷⁾

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甚至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资本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工厂视察员关于 1857—1858 年的危机时期报告证明了这一点:

“在生意这样不景气的时候还有过度劳动现象,人们也许会认为是矛盾的;可是恰恰是生意不景气刺激了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去犯法。他们这样就保证自己能取得额外利润。”伦纳德·霍纳说:“我的管区有 122 家工厂倒闭,143 家停

(55) 《工厂视察员伦·霍纳先生的建议》,载于《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 1859 年 8 月 9 日刊印)第 4、5 页。

(56)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 1856 年[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第 35 页。

(5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 年 4 月 30 日》第 9、10 页。

工,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开工不足,但是就在这个时期,劳动仍然超过法定的界限。”(58)豪威耳先生也这样说:“虽然大多数工厂由于营业不振只开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样仍旧接到同样多的控告,说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工人每天被夺去半小时或3刻钟。”(59)

在1861年至1865年的可怕的棉业危机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不过规模比较小。(60)

“如果我们在吃饭时间或者在其他非法定时间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就借口说这些人怎么也不愿意离开工厂,要他们停止工作(擦洗机器等等),就得使用强制办法,特别是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但是,如果机器停转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只是因为从早晨6时至晚上6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内没有拨出时间让他们干这类事情。”(61)

(58) 同上,第10页。

(59) 同上,第25页。

(60)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1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见附录2:《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7、52、53页。1863年的下半年违法事件又增多,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7页。

(6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23页。根据工厂主在法庭上的供词,他们的“人手”狂热地反对工厂劳动的任何中断,关于这一点,有下列奇闻为证。1836年6月初,迪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利附近有8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迫使5个12—15岁的儿童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做“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30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这些被告先生保证(他们这些贵格会会士都是谨小慎微的信教者,是不发誓的),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本来允许这些可怜的孩子睡4个小时,但是这些固执的孩子偏偏不肯睡!这几位贵格会会士先生被判处罚金20镑。德莱登对这些贵格会会士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⁶²⁾“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么，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会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⁶³⁾

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劳动者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时间⁽⁶⁴⁾，“夺走几分钟时间”⁽⁶⁵⁾，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⁶⁶⁾。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让工人在法定时间之外多干10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1000镑放进了我的口袋。”⁽⁶⁷⁾“时间的原

有先见之明，他写道：

“狐狸装出一副
道貌岸然的面孔，
它不敢发誓，
一味妖言惑众，
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
佯做忏悔者的神情，
它想破戒，
不先祈祷一番，不成！”¹⁴⁷

(6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34页。

(63) 同上，第35页。

(64) 同上，第48页。

(65) 同上。

(66) 同上。

(67) 同上，第48页。

子就是利润的要素!”⁽⁶⁸⁾

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全日工”——全天劳动的工人——和“半日工”⁽⁶⁹⁾——13岁以下的只准劳动6小时的童工——的区分了。在这里劳动者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¹⁴⁸

3. 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 英国工业部门的工作日

以上我们考察了一些部门中过度劳动的情况,在这些部门中,资本的残酷的压榨,同西班牙人对美洲红种人的暴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⁷⁰⁾,这迫使资本受到法律的约束。现在来看看另外一些生产部门,在那里,直到今天,或者昨天还在毫无拘束地剥削劳动力。

“1860年1月14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丁汉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

(6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56页。

(69) 这个术语无论在工厂或工厂报告中,都得到了正式的承认。

(70) 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说道:“工厂主贪得无厌,他们追逐利润时犯下的暴行,同西班牙人征服美洲追逐黄金时犯下的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114页)这本书的理论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一种,在当时有它独到之处,特别是关于商业危机的论述。至于历史部分,则是无耻地从莫·伊登爵士的《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中抄来的。

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瘦骨嶙峋，身躯萎缩，神态呆痴，全身麻木僵硬，使人一看就不寒而栗……马利特先生和别的工厂主起来抗议讨论这类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种制度，正像蒙塔古·瓦尔皮牧师所描写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在社会、肉体、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奴隶制……如果一个城市竟举行公众集会，请求把成年人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8小时，那我们将作何感想呢！……我们抨击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贩卖人肉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纱和硬领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更可恶吗？”⁽⁷¹⁾

斯塔福德郡的陶器业，在最近22年来，曾三度成为议会调查的对象。调查的结果，见斯克里文先生1841年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和奉枢密院¹⁴⁹医官命令公布的格林豪医生1860年的报告（《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第1部分第102—113页）以及朗格先生1863年的报告，载于1863年6月15日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¹⁵⁰在这里，我们只要从1860年和1863年的报告中摘录一些在工厂劳动的儿童本人的证词就够了。根据儿童的情况也就可以推知成年人的情况，特别是妇女和少女的情况。同这一工业部门比较起来，棉纺业之类的部门还算是很卫生很愉快的职业呢。⁽⁷²⁾

威廉·伍德，9岁，“从7岁零10个月就开始做工”。一直是“运模子”（把已经入模的坯子搬到干燥房，再把空模搬回来）。他每周天天早晨不到6点上工，晚上将近9点下工。“我每周天天都干到晚上9点钟。例如最近七八个星期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个7岁的孩子竟劳动15小时！——约·默里，12岁，他说：

(71) 1860年1月17日的伦敦《每日电讯》。

(72) 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49—251页。¹⁵¹

“我干的是运模子和转辘轳。我早晨6点钟上工,有时4点钟上工。昨天,我干了一整夜,一直干到今天早晨6点钟。我一直没有睡觉。有八九个孩子和我一样昨天都干了一整夜。我一个星期挣3先令6便士(4法郎40生丁)。我整整干了一夜,也没有多得到一个钱。上星期我就整整干了两夜。”

——弗尼霍夫,10岁,他说:

“我不总是能够得到一小时的吃午饭时间,而往往只有半小时,每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这样。”⁽⁷³⁾

格林豪医生指出,在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和在沃尔斯坦顿这两个陶业区,人的寿命特别短。20岁以上的男子从事陶业生产的,在斯托克区虽然只占36.6%,在沃尔斯坦顿只占30.4%,但是在斯托克区的陶工中死于胸腔病的占一半以上,在沃尔斯坦顿区约占 $\frac{2}{5}$ 。

在汉利行医的布思罗伊德医生说:

“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

另一个医生麦克贝恩先生也说:

“我在陶工中间行医25年了,我发觉这个阶级在身高和体重方面显著退化。”

以上这些证词是从格林豪医生1860年的报告⁽⁷⁴⁾中摘录的。下面我们从几个调查委员1863年的报告中摘录几段。北斯塔福德郡医院主任医生J.T.阿利奇在证词中说: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道德上和身体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形的。他们未老先衰,寿

(7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附录第16、17、18页。

(74) 《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第103、104、105页。

命不长,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还有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癧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这个地区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

该医院外科医生查理·帕森斯先生在给调查委员朗格的信中写道:

“我所能说的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并没有什么统计材料作根据。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每当我看到这些从事过度劳动以满足父母和雇主的贪心并因而牺牲了健康的不幸孩子们的时候,我的愤慨一波又一波地涌上心头。”

他列举陶工患病的种种原因,最后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时间过长”。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希望:

“一个在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卓越地位的行业,不能再容忍这种可耻的现象:它依靠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但伴随而来的是,工人身体退化,遭受种种折磨,早期死亡。”⁽⁷⁵⁾

这里所说的英格兰陶器业的情况,也适用于苏格兰的陶器业。⁽⁷⁶⁾

火柴制造业是从1833年发明用木梗涂磷的办法之后出现的。自1845年起,它在英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并由伦敦人口稠密的地区传到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诺里奇、纽卡斯尔、格拉斯哥等地,它同时也使牙关锁闭症蔓延到各地。维也纳的一位医生还在1845年就发现这种病是火柴工人的职业病。

(75)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第22[、24]页和第XI页。

(76) 同上,第22页和第XLVII页。

工人中有一半是 13 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 18 岁的少年。谁都知道,这种制造业有害健康,令人生厌,所以只有工人阶级中那些最不幸的人,才肯把“衣衫褴褛、饿得半死、坠落的孩子”⁽⁷⁷⁾送去干这种活。在委员怀特 1863 年听证的证人当中,有 270 人不满 18 岁,40 人不满 10 岁,12 人只有 8 岁,5 人只有 6 岁,工作日从 12 到 14 或 15 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如果但丁还在,他会发现,他的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中的情景。

在壁纸工厂中,粗糙的壁纸用机器印刷,精致的壁纸用手工印刷。生产的旺季是从 10 月初到第二年 4 月底。在这段时期内,劳动往往从早晨 6 时一直持续到晚上 10 时,甚至到深夜,中间几乎没有休息。

让我们来听一听这几个人的证词。——耶·李奇说:

“去年(1862 年)冬天,19 个女孩子中,有 6 个因为劳动过度,害了病,不能上工。为了不让她们打瞌睡,我必须去推她们。”——威·达菲说:“孩子们往往疲倦得睁不开眼睛,其实,我们自己往往也是如此。”——约·莱特伯恩说:“我 13 岁……去年冬天我们干到晚上 9 点,前年冬天干到晚上 10 点。去年冬天我的脚有伤,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疼得哭起来。”——乔·阿斯普登说:“我这个孩子 7 岁的时候,下雪天我就常常背着他上下工,他常常要做 16 个钟头的工!……当他在机器旁干活的时候,我往往得跪下来喂他饭,因为他不能离开机器,也不能把机器停下来。”——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股东兼经理斯密斯说:“我们(他是指那些为“我们”做工的“人手”⁽⁷⁸⁾)一直做工,中间不停下来吃饭,所以一天 $10\frac{1}{2}$ 小时的活动到下午 4 点半就干完了,剩下的时间都是额外时

(77) 同上,第 LIV 页。

(78) 在英国工厂主高雅的谈吐中工人被称做“hands”,字面上的意思是“mains”(人手)。我们在英文引文中遇到这个字的时候都把它译作“bras”(手臂)。

间(79)。〈难道这位斯密斯先生在这 $10\frac{1}{2}$ 小时内也不吃一顿饭吗?〉我们〈那位勤劳的斯密斯〉很少在晚上 6 点以前停工〈他是指停止消费“我们这些人身机器”〉,所以我们〈又是克里斯平¹⁵²〉实际上整年都有额外时间…… 在过去 18 个月当中,无论孩子或成年人〈152 个儿童和 18 岁以下的少年,140 个成年人〉平均每周至少要干 7 天零 5 小时即 $78\frac{1}{2}$ 小时,在今年〈1863 年〉5 月 2 日以前的 6 周内,平均时间更长了,每周达 8 天即 84 小时!”

还是这位斯密斯先生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补充说:“机器劳动是轻松的。”采用手工印刷的工厂主却说:“手工劳动比机器劳动要合乎卫生。”但是工厂主先生们全部激烈地反对至少在吃饭时间使机器停下来的建议。巴勒区一家壁纸厂的经理奥特利先生说道:

“要是法律准许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 6 点到晚上 9 点,我们倒很满意,可是工厂法规定的时间是从早晨 6 点到晚上 6 点,这对我们可不合适…… 在午饭时间我们的机器总是停下来〈何等宽宏大量!〉。这种间断在纸张和颜料方面所造成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接着他摆出一副老好人的样子说:“但是,我可以理解,这种损失并不是大家所喜欢的。”

委员会的报告坦率地认为,担心减少一些他人劳动的时间就会丧失利润,这不能成为“充足的理由”,让 13 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 18 岁的少年在长达 12—16 小时的时间内被剥夺掉吃午饭的时间,或者像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上油等等那样,把午饭仅仅当做劳动工具的辅助材料在生产过程进行中加给他们。(80)

(79) 不要把这种时间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剩余劳动时间。这些先生把 $10\frac{1}{2}$ 小时的劳动看做正常工作日,因而其中包含正常的剩余劳动。在此之外是“额外劳动时间”,它的报酬稍高一些。往后我们就会知道,在所谓正常日中使用劳动力,报酬是低于价值的。

(80)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 年》,证词第 123、124、125、140 页和第 LXIV 页。

在英国,没有一个工业部门像面包业(刚刚兴起的机制面包业不算在内)那样,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如此古老的、只有从罗马帝国时代的诗人作品里才可以看到的生产方式。不过,前面已经说过,资本起初并不关心它所占有的劳动种类的技术性质。起初,它是遇到什么样的劳动就采用什么样的劳动。

面包掺假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在伦敦尤为厉害。这种现象最先是由下院“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1855—1856年)和哈索尔医生《揭穿了掺假行为》一书揭发出来的⁽⁸¹⁾。揭发的结果是1860年8月6日颁布了“防止饮食品掺假”法,这是一项无效的法律,因为它对每个企图靠买卖假货赚正当钱的自由贸易论者是极端宽容的。⁽⁸²⁾委员会本身也相当坦率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事实上,这种“诡辩”比普罗塔哥拉¹⁵⁴更会颠倒黑白,比埃利亚派¹⁵⁵更能当面证明一切都只不过是假象。⁽⁸³⁾

(81) 把明矾磨成细粉,或与盐混合,这是一种常见的商品,名为“面包素”。¹⁵³

(82) 大家知道,煤烟是碳的一种高效形态,可作肥料,资本主义的烟囱扫除业者都是把煤烟卖给英格兰租地农民。1862年,一个英国陪审员审理了这样一件案子:卖者瞒着买者在煤烟中掺了90%的灰尘和沙,这样的煤烟究竟算是“商业上”的“真正的”煤烟呢,还是“法律上”的“掺假的”煤烟。身为“商业之友”的陪审员判决说,这是商业上的“真正的”煤烟。租地农民的起诉被驳回,并且还要支付诉讼费用。

(83) 法国化学家舍伐利埃在一篇论商品掺假的文章中说,他所检查过的600多种商品中,很多商品都有10、20甚至30种掺假的方法。他又说,很多掺假方法他还不知道,而且他知道的也并没有全部列举出来。他指出,糖有6种掺假方法,橄榄油有9种,黄油有10种,盐有12种,牛奶有19种,面包有20种,烧酒有23种,面粉有24种,巧克力有28种,葡萄酒有30种,咖啡有32种,等等。甚至仁慈的上帝也不能逃脱这种命运。见鲁瓦尔·德卡尔《论伪造圣物》1856年巴黎版。

不管怎样,委员会把公众的目光引向了他们“每日的面包”,从而引向了面包业。与此同时,伦敦面包工人在群众大会上和在向议会的请愿中,发出了反对过度劳动等等的呼声。这种呼声如此急迫,以致当局把我们上面屡次提到的1863年委员会的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先生任命为皇家调查专员,以便就此事进行调查。他的报告⁽⁸⁴⁾和列举的证词激动了公众,不过不是激动了公众的心,而是激动了公众的胃。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蜘蛛网、死蟑螂、发霉的酵母和脓血,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因此,不管“贸易自由”多么神圣,这个“自由”的面包业终于受到国家视察员的监督(1863年议会会议快结束时),同时,这次会议通过的法令还禁止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在晚上9点至第二天早晨5点这段时间内做工。这项最后的条款用大量文字说明了这个诚实的、宗法式的行业中滥用劳力的情形。

“伦敦的面包工人通常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他先发面,这是一种极费力气的活。根据面团的数量和精粗程度,需要半小时到三刻钟。然后他躺在那块兼作发面盆盖子的面板上,拿一袋面枕在头下,再拿一个空面袋盖在身上,睡两个来小时。随后他一连紧张地忙上5个小时,把面揉好,称好,做成面包的样子,放到炉里去烤,再从炉里取出,等等。烤炉房的温度通常有75度到90度,如果地方狭小,温度还要高些。制作面包的各道工序完成以后,分送面包的工作又开始了。工人中的一大部分人,刚刚结束了上述繁重的夜间劳动,又要在白天提着篮子或推着车子挨户送面包,有时,他们还要再在烤炉房里干些别的

(84)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以及《第2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

活。根据季节和生产规模的不同,劳动在下午1点到4点之间结束,而另一部分工人则在烤炉房里一直忙到晚上。”⁽⁸⁵⁾

在伦敦社交季节,“全价”面包房(以正常价格出售面包的面包房)的工人通常是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8点,中间几乎没有休息。然后他们就运送面包,或有时在烤炉房烤面包干,一直干到下午4点、5点、6点甚至7点。活全干完了以后可以睡6个小时左右,有时只睡5个或4个小时。到了星期五,总是提前上工,通常是从晚上10点开始,不停地烤制面包或发送面包,一直忙到星期六晚上8点,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一直干到星期日早晨4点或5点。就连接“正常价格”出售面包的第一流面包房,到了星期天,也要为第二天做4—5小时的准备工作。在“卖低价面包的老板”那里(前面已经说过,这种人在伦敦面包业主中占 $\frac{3}{4}$),面包工人的劳动时间更长,不过几乎全是在烤炉房里做工,因为他们的老板除把面包供应一些零售商外,只在自己的店铺里出售。每当临近“周末”,就是说从星期四起,晚上10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或深夜以后。⁽⁸⁶⁾

至于这些“卖低价面包的老板”,连他们自己都承认,正是工人的“无酬劳动”使他们能够竞争⁽⁸⁷⁾。而“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则向调查委员会揭发说,他的“卖低价面包”的竞争者盗窃别人的劳动,并在面包中掺假。他大声说:

“他们所以走运,全靠欺骗公众,他们从工人那里榨取18小时的劳动,而只

(85)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第1号报告》1862年伦敦版第VI、VII页。

(86) 同上,第LXXI页。

(87) 乔治·里德《面包业的历史》1848年伦敦版第16页。

给 12 小时的工资。”⁽⁸⁸⁾

面包掺假和卖低价面包的面包业主阶层的形成这两种现象,在英国开始于 18 世纪初,但只是在这一行业的行会性质消失而以面粉厂厂主面目出现的资本家使面包房老板完全听命于自己之后才发展起来。⁽⁸⁹⁾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为无限度地延长白天和夜间劳动奠定了基础,虽然夜间劳动甚至在伦敦也只是在 1824 年才真正站稳脚跟。⁽⁹⁰⁾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委员会的报告把面包工人列为短命的工人;这些工人即使幸运地逃脱了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通常都难免的夭折,也很少活到 42 岁。可是,这个行业的求职者却非常之多。就伦敦来说,这种“劳动力”的来源是苏格兰、英格兰西部农业区以及德国。

1858—1860 年,爱尔兰的面包工人自己筹款组织了多次群众大会,为反对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进行鼓动。公众出于爱尔兰人容易激动的天性,热情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工人一边,例如在都柏林 1860 年的五月大会上就是这样。由于这一运动,只做日工的规定在弗克斯福德、基尔肯尼、克郎梅尔、沃特福德等地真正地得到执行。

“在众所周知的、工人苦不堪言的利默里克,由于面包房老板,特别是面包房

(88) 《第 1 号报告。证词部分》。“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奇斯曼的证词。

(89) 乔治·里德,同上。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打入各种行业的代理商或商人还被官方认为是社会之害。例如在萨默塞特郡,在治安法官季度法庭开庭期间,大陪审团¹⁵⁶曾向下院递送一份“呈文”,其中说:“布莱克韦尔商馆中的这些代理商是社会之害,他们危害呢绒和服装业,必须予以铲除。”(《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1685 年伦敦版第 7 页)

(90)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第 1 号报告》第 VIII 页。

兼磨坊老板的反抗,运动遭到了失败。利默里克的先例对恩尼斯和蒂珀雷里两郡产生了影响。在公众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最强烈的科克郡,老板们用解雇工人的办法把运动压了下去。在都柏林,老板们进行了最坚决的反抗,他们用迫害领导运动的工人的办法,迫使其余的工人让步,同意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⁹¹⁾

在爱尔兰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政府所属的委员会,竟痛切地规劝都柏林、利默里克、科克等地那些铁石心肠的面包房老板:

“委员会认为,劳动时间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若有违反,必受惩罚。老板们用解雇来威胁工人,迫使他们违背宗教信仰,违反国家法律,冒犯社会舆论(这些全是指星期日劳动),这样老板们就挑起劳资之间的仇恨,提供了危害宗教、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先例……委员会认为,把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掠夺,是对劳动者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践踏,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使劳动者不能履行他作为一个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所应尽的家庭义务。12小时以上的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早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时候,失去家长的照料和扶持。”⁽⁹²⁾

以上是爱尔兰的情形。在海峡彼岸的苏格兰,农业劳动者(即庄稼汉)揭露,他在最恶劣的天气里,每天要劳动13—14小时,星期日还要从事4小时的额外劳动(这还是在信守安息日¹⁵⁷的国家里呢!)。⁽⁹³⁾就在这个时候,伦敦一个大陪审团面前站着三个铁路员工:一个乘务员,一个司机,一个信号员。一次车祸把100名旅客送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几个铁路员工的疏忽大意是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在陪审员面前异口同声地说,10—12年以前,他们每天只劳动8小时。

(91) 《1861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

(92) 同上。

(93) 1866年1月5日,农业劳动者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拉斯韦德举行群众大会。(见1866年1月13日《工人辩护士报》)自1865年底以来,在农业劳动者——最初在苏格兰——中成立了一个工联,这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的事件。

但是在最近5—6年内,劳动时间延长到了14、18甚至20小时,而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例如在旅行季节,他们往往要连续劳动40—50小时。可是他们都是些普通人,并不是百眼巨人。他们的劳动力到一定时候就不中用了。他们浑身麻木,头发昏,眼发花。但是最可尊敬的不列颠陪审团对他们的回答,是定为“过失杀人罪”,交付下一次巡回审判庭审理,而只在一项仁慈的附录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资本家先生们,这些铁路大亨们,将来在购买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时大方些,在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时“节制”一些。(94)

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种各样的劳动者,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在地狱中向奥德赛拥去的被杀者的鬼魂¹⁵⁸还多。不用打开他们腋下夹着的蓝皮书,我们就可以一眼看出过度劳动的痕迹。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的对照表明,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94) 见1866年1月21日《雷诺新闻》。这家周报每周都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如《可怕的横祸》、《惊人的惨剧》等等,报道一连串新发生的铁路惨祸。北斯塔福德郡铁路线上的一个工人对此议论说:“谁都知道,司机和司炉稍一失神,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拼命延长劳动时间,不让有片刻休息,那又怎能不造成这样的后果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例子:上星期一,有一个司炉一清早就上工,干了14小时50分钟才下工。他还没有来得及喝口茶,就又被叫去做工了。就这样他一连做工29小时15分钟。这一周的其余几天,他的工作情形是这样:星期三15小时,星期四15小时35分,星期五 $14\frac{1}{2}$ 小时,星期六14小时10分,一周共工作88小时40分。不难设想,当他只得到6个工作日的工资时会感到多么惊异。这个人是个新手,他问什么叫一个工作日。得到的回答是:13个小时算一个工作日,也就是说,78小时算一周。而多做的10小时30分钟又怎么算呢?争吵了很久,最后才给他加了10个便士(1法郎)。”(1866年2月4日《雷诺新闻》)

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活活累死”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妮·沃克利是怎样死的。她在一家由芳名爱利莎的老板娘经营的很有声望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这里又碰到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类老故事了。(95)年轻的女工平均每天劳动 $16\frac{1}{2}$ 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30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衰弱的“劳动力”。当时正是忙季的最高潮。为了迎贺刚从国外进口的威尔士亲王夫人,女工们要为高贵的夫人小姐们在转眼之间就变出参加舞会的服装来。玛丽·安妮·沃克利同其他60个少女一起连续干了 $26\frac{1}{2}$ 小时。这些少女30人挤在一间房子内,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 $\frac{1}{3}$,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96)

(95) 参看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53、254页。151

(96) 卫生局的莱瑟比医生当时说:“成年人的寝室至少要有300立方英尺空气,而起居室至少要有500立方英尺。”伦敦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理查森说:“各种女缝纫工——女时装工、女服装工,都有三种灾难,这就是劳动过度,空气不足,营养不够或消化不良。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对于妇女无论如何要比男子更为适宜。这种行业的不幸,特别在伦敦,在于它被26个资本家所垄断,这些资本家利用资本所产生的权势,靠浪费劳动力来节约费用。在缝纫业各部门中都感受到了资本家的这种权力,如果一个女服装工揽到了一些顾客,那么由于竞争,她必须在家里拼死命地干,才能把顾客维持住,而且她必然要让她的工人同样从事过度的劳动。如果她抢不到生意,或者不能再独立经营下去,她就到一家裁缝店去做工,在那里,活并不轻,但是收入有保障。处于这样的地位,她就变成了纯粹的奴隶,随着社会的动荡而漂泊不定;她时而待在家里的小房间里挨饿或近乎挨饿;时而又要在时装店里一昼夜劳动15、16甚至18小时,而她们劳动的场所空气闷得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她们吃下的东西,哪怕吃得还不坏,由于缺乏新鲜空气,也消化不了。这些人中每天都有人成为肺病的牺牲者,从而使肺病的王国得以永存;因为这种疾病就是由于空气不良而引起的。”(理查森医生《活活累死》,载于1863年7月《社会科学评论》)

这还是伦敦一家最好的时装店。玛丽·安妮·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而使老板娘爱丽莎大为吃惊的是，她竟没有来得及缝完礼服的最后一针。医生基斯先生被请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直率地向验尸陪审团作证说：

“玛丽·安妮·沃克利致死的原因，是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长，以及寝室太小又不通风。”

为了教医生讲话得体，验尸陪审团却说：

“死者是中风死的，但是也有理由担心，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过度等等，可能加速了她的死亡。”

自由贸易论者科布顿和布莱特的机关报《晨星报》叫喊道：“我们的白奴是劳动的牺牲者，劳动把他们引向坟墓，他们无声无息地憔悴而死了。”⁽⁹⁷⁾

(97) 见 1863 年 6 月 23 日《晨星报》。《泰晤士报》曾利用这件事反对布莱特等人而为美国奴隶主辩护。该报写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折磨来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击那些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度的劳动。”（1863 年 7 月 2 日《泰晤士报》）托利党的报纸《旗帜报》也同样地申斥纽曼·霍尔牧师说：“你把奴隶主开除教籍，可是却同那些心安理得地用养一只狗的钱驱使伦敦公共马车夫和售票员等等每天劳动 16 小时的正人君子在一起祈祷。”最后，天才崇拜的发明者，预言家托马斯·卡莱尔先生发言了。关于这位先生，还在 1850 年我就写过：“天才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崇拜。”¹⁵⁹ 这位卡莱尔先生在一篇蹩脚的寓言中把现代史上的唯一重大事件，美国南北战争⁷，说成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北方的彼得拼命要打破南方保罗的头，因为北方的彼得逐日雇用工人，而南方的保罗却终生雇用。（《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特》。载于 1863 年 8 月《麦克米伦杂志》）这样，托利党说出了博爱的最后一言：还是奴隶制！

“累死——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在时装店是如此,在任何行业中都是如此。我们试以铁匠为例。如果可以相信诗人的话,那么世界上再没有像铁匠那样强健、那样快活的人了。他大清早就起来,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叮叮当地打起铁来。他比谁都吃得多,喝得足,睡得好。单就身体条件来说,如果劳动适度,铁匠的情况确实是属于最好的了。但是,我们到城里去,看看这些健壮汉子所担负的劳动重担,看看他们在我国的死亡表上所占据的位置吧。在马里勒本区(伦敦最大的市区之一),铁匠每年的死亡率为 $\frac{31}{1\,000}$,比英国成年男子的平均死亡率高 $\frac{11}{1\,000}$ 。打铁几乎是人的天生的技能,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是由于过度劳动才成为毁灭人的职业,他每天能打这么多锤,迈这么多步,呼吸这么多次,干这么多活,平均能活50年。现在强迫他每天多打这么多锤,多迈这么多步,多呼吸这么多次,而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他的生命力每天多耗费 $\frac{1}{4}$ 。他尽力做了,结果怎样呢?结果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多干了 $\frac{1}{4}$ 的活,但是他活不到50岁,他37岁就死了。”(98)

4. 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看,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存在,只是为了在吮吸每一滴劳动的同时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劳动量。如果它们不执行这种职能,它们单纯的存在就给资本家造成消极的损失,因为生产资料在整个闲置期间代表无用的预付资本;一旦它们在中断期间要求追加开支以便恢复生产,这种损失就成为积极的损失。把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即延长到夜间,只是一种缓和的办法,只能大致满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从身体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为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就

(98) 理查森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社会科学评论》。

要求白天被使用的劳动力和夜里被使用的劳动力换班工作。换班有各种办法,例如可以使一部分员工这个星期做日班,下个星期做夜班,等等。大家知道,这种换班制度,在早期的英国棉纺织业部门是很盛行的,今天,在莫斯科的纺纱厂中也很流行。这种日夜连续不停的生产过程,直到今天还存在于大不列颠的许多依然“自由”的工业部门中,其中如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炼铁厂、锻冶厂、压延厂以及其他金属工厂。在这里,生产过程除了每周工作日的时间,在大多数工厂还包括星期日的的时间。工厂的人员中有男有女,有成年人,有男有女。儿童和少年从8岁(有时是6岁)直到18岁年龄不等。⁽⁹⁹⁾在某些部门中,男工、妇女和少女夜间混在一起做工。⁽¹⁰⁰⁾

我们且不说夜工的一般害处。⁽¹⁰¹⁾昼夜24小时不断的操作过

(99)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IV、V、VI、VII页。

(100) “在斯塔福德郡和南威尔士,少女和妇女不但白天而且夜里都在煤矿和焦炭堆上做工。送交议会的报告经常指出,这种做法带来尽人皆知的严重弊端。这些妇女同男子一道做工,从衣服上很难区别出来;她们浑身是污泥和煤炭。这种不适于妇女的职业几乎必然使妇女丧失自尊心,因而使她们品行堕落。”(《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94号第XXVI页,参看《第4号报告》(1865年)第61号第XIII页)玻璃厂的情况也是如此。

(101) 有一个雇儿童做夜工的钢厂老板说:“做夜工的少年在白天既不能睡觉,也得不到一点正规的休息,他们只好在白天到处游荡,看来这是很自然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63号第XIII页)一位医生谈到日光对身体的维护和发育的重要性时说道:“日光还直接影响身体的各部组织,使其强健而富有弹性。动物的肌肉缺少适量的光照就会松软,失去弹力,神经也会因缺乏刺激而失去应有的紧张度,各个部分的发育就会受到阻碍……至于儿童,经常有充足的阳光,并且每天有一部分时间受到日光的直接照射,对于他们的健康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日光可以促使食物变成良好的成形血液,并使新形成的纤维组织强固起来。它还可以刺激视觉器官,从而加强大脑各部分的机能的活动。”这一段话摘自伍斯特总医院主任医生威·斯特兰奇先生论述“健康”的

程,为打破名义上的工作日界限提供了一直期待的、绝好的机会。例如,在上述那些劳动十分繁重的工业部门中,每个劳动者公认的工作日至多为12小时,无论夜工或日工都是如此。但是在很多场合,那种超出这一界限的过度劳动,用英国官方报告的话来说,“实在可怕”。⁽¹⁰²⁾报告说:

“任何人想到证词中提到的9—12岁儿童所担负的劳动量,都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再也不能容许父母和雇主这样滥用权力。”⁽¹⁰³⁾

“儿童昼夜轮班做工的办法,无论在忙时或平时,都会使工作日极度延长。这种延长在许多场合不仅骇人听闻,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时难免有的儿童因某种原因不能上工接班。这时,一个或几个该下工的儿童就得留下来填补空位。这个办法是人人皆知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压延厂的经理,没有上工的儿童由谁代替,他竟回答说:‘我知道,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上述事实。”⁽¹⁰⁴⁾

“有一个压延厂,每个工人的名义上的工作日是 $11\frac{1}{2}$ 小时。有一个儿童,每星期至少有4个夜晚要干到第二天晚上8点半,这样一直继续了6个月。另一个儿童,9岁时,有时一连做3班,每班12小时,10岁时,有时一连干两天两夜。第三个儿童,今年10岁,每星期有三天都是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夜间12点,在其余几天干到晚上9点。第四个儿童,今年13岁,整个星期都是从下午6点干到第二天中午12点,有时接连做3班,从星期一早晨一直干到星期二夜晚。第五个儿童,今年12岁,在斯泰夫利铸铁厂做工,他一连14天都是从早晨

著作(1864年)¹⁶⁰。这位医生在给调查委员怀特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从前在兰开夏郡有机会观察过夜工对工厂儿童的影响。和某些雇主通常的说法相反,我肯定认为,这种劳动使孩子的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同上,第284号第55页)这类事物能够成为认真争论的对象,真是一件大好事。这就再好不过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是怎样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首领及其仆从们的大脑机能。

(102) 同上,第57号第XII页。

(103) 同上,第4号报告(1865年)第58号第XII页。

(104) 同上。

6点干到夜间12点,他已经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9岁的乔治·阿林斯沃思说:“我是上星期五来的。我们应当在第二天清早3点上工。所以我就留在这里过夜。我家离这里有5英里路。我睡在地板上,铺一条皮围裙,盖一件短外衣。以后的两天我早晨6点上工。唉!这个地方真热!在这儿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高炉上做工。那是在乡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厂,在那里,星期六也是清早3点上工,不过好歹还能回家睡觉,因为离家不远。在别的日子,我早晨6点上工,到晚上6点或者7点下工。”如此等等。(105)

(105) 同上,第XIII页。当然,这些“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必然会像他们和一位调查委员进行下述谈话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耶利米·海恩斯,12岁,他说:“4的4倍是8,而4个4是16……国王是有一切黄金和金钱的人。我们有个国王,据说她是个女王,他们叫她亚历山德拉公主。据说她嫁给了女王的儿子。公主是男人。”威廉·特纳,12岁,他说:“我不是住在英国。我想,是有这么一个国家,但以前根本不知道。”约翰·莫里斯,14岁,他说:“听说上帝造了世界,又听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一个人活着;听说,这个人是一只小鸟。”威廉·斯密斯,15岁,他说:“上帝造了男人,男人造了女人。”爱德华·泰勒,15岁,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伦敦。”亨利·马修曼,17岁,他说:“我有时到教堂去。他们讲道时提到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其他的名字我都说不上来了,就连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他不是被杀死的,而是像平常人那样死去的。他和别人有些不同,因为他有些信教,别人不信。”(同上,第74号第XV页)“魔鬼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基督是坏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第55页第278号)在上述金属工厂中实行的制度,在玻璃厂和造纸厂也很盛行。在用机器生产的造纸厂中,除了挑选破布以外,所有其他工序照例都实行夜工。有的地方借助于换班制,通常从星期日晚上起直到下星期六午夜12点止,整个星期当中始终都有夜工。日班每星期有5天做12小时,有1天做18小时。夜班每星期有5夜做12小时,有1夜做6小时。有的地方是每班工人一连做24小时,隔一天一换班。其中一班在星期一做6小时,不过到星期六要做18小时以补足24小时。有的地方实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制度,例如所有在造纸机上工作的工人,一星期中每天都做15—16小时。调查委员洛德说:这种制度看来兼有十二小时换班制和二十四小时换班制的一切害处。在这种夜班制度下做工的,有13岁以下的儿童,有18岁以下的少年,还有妇女。在实行十二小时换班制的情况下,有时接班的人没有来,他们就不得不连干两班,

现在我们来听听资本自己是怎样解释这种 24 小时连续不断的劳动。当然,对于这种制度的极端形式,对于这种制度的滥用,即把工作日延长到骇人听闻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是避而不谈的。它所谈的只是这种制度的正常形式。

内勒—维克斯公司炼钢厂老板,雇有 600—700 人,其中只有 10% 未满 18 岁,这些未满 18 岁的工人当中又只有 20 个男孩是做夜班的。这个公司说:

“这些男孩根本不感到酷热难熬。温度大约介于华氏 86°—90°之间。在锻冶车间和压轧车间,人手分昼夜两班劳动,其他各车间就只有日班,从早晨 6 点到晚上 6 点。锻冶车间的劳动是从 12 点到 12 点。有一些人只做夜工,不换班,也就是说,从来不做日工。我们没有发现日工和夜工对健康(内勒—维克斯公司老板的健康吗?)有什么不同的影响。而且,休息时间固定不变比昼夜改变恐怕要睡得好些……约有 20 个少年和成年人一起做夜班……不叫 18 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我们就应付不下去。我们最反对的是增加生产费用……熟练的工头和有知识的‘人手’不容易找,而少年工要多少有多少……当然,我们使用的少年工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限制夜工同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106)

约翰·布朗公司钢铁厂有 3 000 名成年男工和少年工,一部分重活是“昼夜换班”的,该公司的 J.埃利斯先生说,在劳动繁重的制钢

于 24 小时。证人的证词说明,男孩和女孩经常要加班加点,往往是连续干 24 小时,甚至 36 小时。在抛光车间,有 12 岁的小姑娘,她们整月都是每天工作 14 小时,只有二三次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此外没有任何正规的休息时间。有些工厂完全取消了夜工,可是法定时间以外的劳动却长得可怕,而且“往往是发生在那些最脏最热最单调的工序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4 号报告》1865 年 XXXVIII 和 XXXIX 页)。

(106)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4 号报告》1865 年第 79 号第 XVI 页。

厂,少年工占工人的 $\frac{1}{3}$ 或一半。在他们公司里,18岁以下的少年工有500名,其中约 $\frac{1}{3}$ 即170名不满13岁。关于拟议中的法律修正案,埃利斯先生说:

“禁止未满18岁的人在24小时内劳动12小时以上,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但是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划一条线来阻止我们雇用12岁以上的少年做夜工。他以同样的口吻补充说,我们宁可接受禁止雇用未满13岁甚至14岁的少年做夜工的法律,而不愿接受不让我们已有的少年做夜工的禁令。做日班的少年也必须轮换做夜班,因为成年男工不能老是做夜班;这会毁掉他们的健康。不过我们认为,做一星期夜工,又做一星期日工,不会有什么害处。〈而内勒—维克斯公司为了维护自己工厂实行的连续做夜工的制度却表示了相反的意见。〉我们看到,轮换做夜工的人同专做日工的人同样健康……我们反对禁止18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因为这会增加费用。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多么无耻的坦率!〉我们认为,为此增加的费用,会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能力,如果适当地考虑到企业的成效的话。〈多么拐弯抹角!〉这里劳力很少,进行这种调整,就会使劳力不够用。〈这就是说,埃利斯—布朗公司就会陷入不得不如数支付劳动力价值的幸不幸境地。〉”(107)

卡姆梅尔公司的“塞克洛普”钢铁厂同上述约翰·布朗公司的管理方法相同。该厂的经理曾把他的一份书面证词亲手递交给政府委员怀特,后来他表示要求修改,但是把证词退给他以后,他又觉得最好还是把这个手稿隐藏起来。但怀特先生的记忆力很强。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塞克洛普公司看来,禁止儿童和少年做夜工是“行不通的事情;这无异于让他们的工厂停工”,虽然在他们工厂的人员中未满18岁的少年占6%弱,未满13岁的只占1%!(108)

关于这个问题,阿特克利夫的炼铜、压延、锻铁工厂,桑德森兄弟

(107) 同上,第80号。

(108) 同上,第82号。

钢铁公司的 E.F. 桑德森先生说：

“禁止未满 18 岁的少年做夜工会引起很大的困难。主要的困难是，用成年男工代替少年工必然使费用增加。增加多少，我说不上，但是看来不会增加到使工厂主能够提高钢的价格，因此，全部损失就落在工厂主身上，因为成年男工〈多么缺乏牺牲精神！〉当然会拒绝承担这种损失。”

桑德森先生不知道他究竟付给儿童多少工资，不过，

“大概每人每周得到 4—5 先令……少年工干的活，一般地说来〈当然不总是这种情况〉，有少年工的力气就足够用了，用成年男工的较大力气是得不偿失，只有在很少的场合，如金属制件很重时，使用这种较大的力气才合算。此外，儿童应当从小就开始学手艺。只许少年做日工，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少年不能在白天学手艺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这样一来，成年男工一周做日工，一周做夜工，就会有一半时间和同班的少年工分开，从而把他们从少年工那里得到的利益丧失一半。成年男工教少年工学手艺，就算做少年工劳动报酬的一部分，这就使成年男工能够得到廉价的少年劳动。所以，只准少年做日工，就会使每个成年男工的利益丧失一半。”

（换句话说，桑德森公司的先生们就得自己掏腰包，而不能再用少年工的夜间劳动来支付成年男工的这部分工资了。这样一来，桑德森公司的利润就会减少一些，而这就是桑德森公司所谓少年工不能在白天学手艺的好理由。）⁽¹⁰⁹⁾ 此外，现在同少年工换班的成年男

(109) “在我们这个激烈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不能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黑格尔《哲学全书》，第 1 部《逻辑学》，1840 年柏林版第 249 页）

工就得担负起全部的夜工，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总之，困难是太大了，也许会使夜工完全停下来。——E.F.桑德森说：“至于说到钢的生产本身，那倒不会有什么差别。但是！”但是桑德森公司不单是生产钢而已。生产钢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借口。熔炉、轧钢设备等等，厂房、机器、铁、煤等等，除了变成钢，还有别的任务。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吮吸剩余劳动，而24小时吮吸的剩余劳动当然比12小时多。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桑德森家族有了它们也就有了一种抵押权，可以在一天全部24小时内支配一定数量人手的劳动时间；而它们吮吸劳动的职能一旦中断，它们也就丧失了资本的性质，从而给桑德森公司造成纯粹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非常贵重的机器有一半时间停着不用，那就会造成损失。并且，为了生产在目前这种制度下所能生产的同样数量的产品，就得把厂房和机器增加一倍，而这就会使费用增加一倍。”

其他资本家都只准在白天开工，他们的机器、厂房、原料到夜间就停着不用，可是为什么这个桑德森公司偏偏要求享受榨取夜间劳动的特权呢？E.F.桑德森代表桑德森家族回答说：

“是的，凡是只在白天开工的工厂，都会遭受到这种由于机器停着不用而造成的损失。但是我们使用熔炉，损失就更大。如果熔炉不停火，就会浪费燃料（现在却是浪费劳动者的生命材料），如果熔炉停火，就要重新生火并等待烧到必要的热度，这就损失了时间（而损失的睡眠时间，甚至是8岁孩子的睡眠时间，正是桑德森家族捞到的劳动时间），而且一冷一热会使熔炉受到损害（而昼夜换班劳动却不会使这些熔炉受到损害了）”。⁽¹¹⁰⁾

⁽¹¹⁰⁾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85号。好心肠的玻璃厂老板也有类似的忧虑，他们认为“规定童工的正规吃饭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熔炉由此失散的一定热量对他们来说是纯粹的损失”。他们的忧虑对调查委员

5. 14 世纪中叶至 17 世纪末叶 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可以在多长的时间内消费劳动力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以

怀特没有产生影响。怀特完全不像尤尔、西尼耳等人以及他们的庸俗的德国剽窃者罗雪尔等人那样，为资本家花费他们的货币时的“节制”、“禁欲”和“节俭”以及他们对他人的生命的跋扈木儿式的“浪费”而大为感动，他回答说：“定出正规的吃饭时间会比现在多浪费一些热量，但是这种浪费同现在各玻璃厂中正在发育的儿童由于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吃顿饭和没有时间进行消化而给王国造成的生命力的浪费相比较，即使折合成货币价值，也是算不了什么的”（同上，第 XI.V 页）。这还是在进步年 1865 年！¹⁶¹且不说在制造玻璃瓶和燧石玻璃的工厂中做工的儿童搬运时要费多少气力，在他们不停地干活的过程中，6 小时就得走 15—20 英里路！而劳动往往要不间断地持续 14—15 小时！在许多这种玻璃厂，像在莫斯科的纺纱厂那样，盛行六小时换班制。“在一周的劳动时间中，六小时已经是最长的休息时间了。而其中还包括往返工厂、盥洗、穿衣、吃饭所需要的时间。这样一算，剩下的休息时间就极少了。如果不牺牲些睡眠时间，那就没有时间游戏和呼吸点新鲜空气，而对于在如此高温下担负如此繁重劳动的儿童来说，睡眠又是绝对不可少的……但是就连短短的睡眠也睡不稳，在夜间他们担心睡过时间，在白天又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怀特先生曾列举事实，说明有个少年连续做了 36 小时工，有些 12 岁的男孩一直干到夜里 2 点钟，然后睡到早晨 5 点钟（只睡 3 个小时！），就又开始更紧张的工作！总报告起草人特里门希尔和塔夫内尔说：“男女童工和女工在日班或夜班中所担负的劳动量是惊人的。”（同上，第 XI.III 页和第 XI.IV 页）可是标榜自己是禁欲的玻璃业资本家也许正喝醉了酒，在深夜里东倒西歪地从俱乐部走回家去，一边走一边像个傻瓜似地哼着：“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¹⁶²

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 24 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休息时间,劳动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而喻,劳动者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理所当然都是属于资本和资本化的劳动时间。至于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和亲戚朋友交往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¹⁵⁷的国家里)⁽¹¹¹⁾,——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劳动者就被降低到单纯的工具的地位,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变成了使精疲力竭的有机体能继续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几

(111) 例如,在英格兰农村,有的地区直到目前为止,工人还常常因为在安息日在自己房前的园圃里干点活,褻渎了安息日而受到监禁的处罚。但是同样是工人如果在星期日不去金属厂、造纸厂或玻璃厂干活,那么即使是出于宗教的虔诚,也要按违反契约论处。如果对于安息日的褻渎是为了资本家上帝的利益而发生的,正统教徒的议会就置之不理了。伦敦鱼店和家禽店的短工,在一份要求废除星期日劳动的呈文(1863年8月)中说,他们在一星期的前6天,每天平均劳动15小时,星期日劳动8—10小时。从这份呈文还可以看出,这种对安息日的褻渎正是埃克塞特会堂¹⁶³的饕餮而伪善的贵族所鼓励的。这些如此热心“追求肉体享受”,如此珍惜自己生命的“圣徒”,是通过他们容忍第三者的过度劳动、贫困和饥饿来表明自己的基督徒精神的。美餐对他们(劳动者)是非常有害的。

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者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身体上和道德上正常的活动和发展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¹¹²⁾它靠缩短劳动者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劳动者的生产时间。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包含再生产雇佣工人或延续雇佣工人阶级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既然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的寿命,那么,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就必须更加迅速地得到补偿,同时,劳动力的再生产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像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

奴隶主买一个劳动者就像买一头牛一样。他失去奴隶,就是失去一笔资本,必须再花一笔钱到奴隶市场上去买,才能得到弥补。但是,“尽管佐治亚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州的沼泽地对人体组织具有致命的危害,这种对人的生命的破坏,总不会大到连靠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人口众多的储

(112) “我们在以前的报告中曾提到,许多有经验的工厂主确认,过度的劳动小时……无疑会过早地耗尽人的劳动力。”(同上,第64号第XIII页)

备区也补充不了的程度。当经济上的考虑使奴隶主的利益同保存奴隶相一致时,这种考虑还可以成为奴隶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种保证,但在实行奴隶贸易以后,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却成了灭绝奴隶的原因,因为奴隶一旦可以由外地的黑人来补充,他们的寿命也就不如他们的生产率重要了。因此,在奴隶制国家,有一句格言: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耕作的年利润往往与种植园的总资本相等,正是在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正是这个几世纪以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农业,曾吞没了几百万非洲人。拿现在的古巴来说,那里的收入总是以百万计算,种植园主俨然就是王公,但是我们看到,那里的奴隶阶级饮食最坏,受尽欺凌,甚至每年都有一大批人直接由于劳动过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长期折磨而丧命”(113)。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⁴试把奴隶贸易换成劳动市场,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换成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区,把非洲换成德国再看看吧!众所周知,过度劳动使伦敦的制糖工人不断丧生,可是伦敦的劳动市场总是挤满了志愿到制糖厂去送死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我们已经看到,陶器业是受害者最多的行业之一。但是陶工是不是因此就缺少呢?普通工人出身的、现代陶器业的创始人乔赛亚·韦奇伍德,1785年曾向下院说,陶器业有15 000到20 000人。⁽¹¹⁴⁾到了1861年,单是分散在大不列颠各城市的陶器业人口就有101 302人。

“棉纺织业有90年的历史……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噬了九代纺织工人。”⁽¹¹⁵⁾

诚然,在某些热病式的繁荣时期,劳动市场上曾严重缺乏劳动

(113) 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110、111页。

(114) 约翰·华德《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城》1843年伦敦版第42页。

(115) 1863年4月27日费伦德在下院的演说。

力。例如 1834 年就是这样。当时工厂主先生们向济贫法委员会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并表示“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116)。这是他们的原话。

“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同意下,向曼彻斯特派遣了代理人。农业劳动者的名单造好以后交给了代理人。工厂主们纷纷赶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这些家庭从英国南部运出来。这些人体包裹就像一包包货物一样,挂上签条,通过运河或用货车运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在工业区到处流浪,迷了路,濒于饿死的境地。下院几乎不相信: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贩卖人肉的行当竟如此盛行,曼彻斯特的代理人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就像把黑人经常不断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种植园主一样…… 1860 年,棉纺织业空前繁荣,人手又不够了。工厂主们向人肉贩子求援,于是这些人便到多塞特郡的沙丘地带、德文郡的高地、威尔特郡的平原去搜罗,但过剩的人口已经被吸收光了。”

《贝里卫报》抱怨说,英法通商条约签订以后,本来还会吸收 1 万人,而且很快还需要 3 万—4 万人。但是从事人肉买卖的大小代理人 1860 年在农业区几乎没有搜罗到什么,于是

“工厂主派了代表去求见济贫法委员会主席维利尔斯先生,请求他再次准许贫民习艺所¹⁶⁴的穷孩子和孤儿进工厂去做工”(117)。

(116) “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这是棉纺织厂主们的原话。”(同上)

(117) 同上。尽管维利尔斯先生有良好的愿望,但“根据法律”他不得不拒绝工厂主们的要求。可是由于地方贫民管理局甘愿效劳,这些先生们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先生硬说,这一次,这种“根据法律”把孤儿和贫民的孩子当做学徒看待的制度,没有带来以前的弊病(关于这些“弊病”,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过确实在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在那些从苏格兰农业区被送到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少女和年轻妇女身上,这种制度是被滥用了……”——工厂主根据这个制度同济贫院当局订立了有一定期限的契约。工厂主供给这些儿童衣食住,还给一点补贴。1860 年是英国棉纺织业最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资本的暂时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先天不足,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未成熟就被摘掉。⁽¹¹⁸⁾另一方面,经验向有头脑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是昨天

繁荣的一年,而且工资也很高,因为对劳动的大量的需求遇到了各种困难,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农业区的人口空前大量地迁往澳洲和美洲了;同时英格兰某些农业区的人口,部分是由于生育力受到极大限制,部分是由于可利用的人口早已被人肉贩子搜罗走而大大减少了。如果注意到这些事实,再来听听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就会感到奇怪了。他说:“但是这种劳动(济贫院儿童的劳动)只有在找不到别的劳动时才有人去找,因为这是一种昂贵的劳动。一个13岁的少年每周的普通工资大约是4先令(5法郎);但是要供给50个或100个这样的少年的衣食住,再加上医药补助费和一定的监管费,此外再加上少量的补贴,这样每人每周4先令是不够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27页)雷德格雷夫先生忘记说明,既然工厂主以每人4先令的费用都无法把50个或100个孩子放在一起养活和监管,那么工人自己又怎能靠自己孩子的4先令工资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避免从正文中引出错误的结论,在这里我还应当指出,英国棉纺织业自从施行1850年工厂法¹⁴⁵,因而对劳动时间等进行调整以来,已应看做是英国的模范工业。英国棉纺织业工人的处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大陆上的命运相同的伙伴好些。“普鲁士的工厂工人每星期至少比他们的英国对手多劳动10小时,而如果他们是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织机工作,那么连这个追加劳动时间的界限也突破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103页)上面提到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在1851年工业博览会以后,曾到大陆上,特别是到法国和普鲁士调查工厂状况。关于普鲁士的工厂工人,他说:“他们得到的工资仅够购买简单的食品和少量他们习惯用的生活舒适品……与他们的英国对手相比,他们生活更苦,劳动更重”(《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31日》第85页)。

(118) “从事过度劳动的人死得惊人地快;但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补充上,人物频频更换,但舞台上并没有因而发生任何变化。”(《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55页]爱·吉·韦克菲尔德著)

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地从根本上摧残了人的实体和力量;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新的成分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劳动者,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生存)起着巨大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¹¹⁹⁾。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运动中不理睬人类在未来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绝的前途,就像它不理睬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投机生意中,每个人都知道灾难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灾难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¹⁶⁵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劳动者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¹²⁰⁾人们为资本所造成的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¹²¹⁾不过总的

(119) 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这个报告谈到农业劳动者。“人们认为萨瑟兰郡是一个有很大改进的郡,但最近的调查发现,在这个曾经以出美男子和勇敢士兵而闻名的地方,居民已退化成瘦弱的种族了。尽管这个地区背山临海,环境极其有益于健康,但儿童的面容异常消瘦苍白,竟同在伦敦小巷的污秽空气中才能遇到的那种面容一样。”(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第74、75页)他们实际上同那些和小偷、娼妓挤住在格拉斯哥的“小街陋巷”的3万个“英武的山地居民”相似。

(120) “尽管居民的健康是国民资本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恐怕必须承认,资本家根本不想保持和珍惜这个财富。工厂主关心劳动者的健康状况是被迫的。”(《泰晤士报》1861年11月5日)“西区的男人成了全人类的织工,劳动者的健康被断送了,如果不是发生了反作用,再过二代这个种族就会退化。儿童劳动的时间受到了限制,等等。”(《户籍总署署长报告》1861年10月)

(121) 歌德语。¹⁶⁶

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资本家起作用。(122)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斗争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14世纪起一直到18世纪中叶的劳工法(123)。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当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正在发展,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劳动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

(122) 例如,我们看到,1863年初,在斯塔福德郡拥有大规模陶器厂的26家公司,其中包括乔·韦奇伍德父子公司,提出呈文,请求国家进行强制干涉。他们说,同“别的资本家的竞争使他们不能自愿地限制儿童的劳动时间等等”。——“因此,虽然我们对上述弊病深恶痛绝,但依靠工厂主之间的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制止这种弊病……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确信,制定一种强制的法律是必要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第322页)——最近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在热病式的繁荣时期,棉价很高,于是布莱克本的棉织业主们达成协议,在一定时期内缩短自己工厂的劳动时间。这个期限大约到1871年11月底为止。然而兼营纺和织的富裕厂主利用这个协议所造成的生产缩减的机会,拼命扩大自己的营业,从而靠牺牲小厂主获得了大量利润。这些小厂主迫于困难就向工厂工人呼吁,要他们大力鼓吹九小时工作日,并答应为此给以资助!

(123) 在英国,这些劳工法(在法国、尼德兰等国同时也有这种法令)是在1813年,在生产关系早已使它们失效以后,才正式废除的。

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¹⁶⁷。因此,从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资本借助国家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19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颁布的12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法定的界限,在17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¹²⁴⁾

第一个“劳工法”(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即]1349年)的颁布,其直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为这种法律在这个借口不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了几百年——是鼠疫猖獗¹⁶⁸,人口大大减少,用一个托利党著作家的话来说,当时“要用合理的价格(即能保证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劳动量的价格)雇用工人,已经困难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¹²⁵⁾。因此,在法律上强制地规定了合理工资,同样

(124) “12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中每天不得劳动10小时以上。”(《马萨诸塞州普通法》第60章第3节。这些法令是1836—1858年颁布的。)
“在所有棉纺织厂、毛织厂、丝织厂、造纸厂、玻璃厂、亚麻厂和铁工厂实行的每天10小时劳动,应视为法定的日劳动量。又规定,对于不论在任何工厂做工的未成年人,今后皆不得迫使他们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或每周劳动60小时以上;其次,本州任何工厂今后皆不得雇用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当工人。”(《新泽西州。限制工作日的长度的法令》第1、2节。1851年3月18日法令)
“12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不论在任何工厂,每天不得劳动11小时以上,并且不得在早晨5点以前和晚上7点半以后做工。”(《罗得岛州修订条例》第139章第23节。1857年7月1日)

(125) 《自由贸易的诡辩》1850年伦敦第7版第205页。这位托利党人还承认:“议会通过的不利于工人而有利于雇主的关于调整工资的法令,维持了很长的时期,达464年之久。人口增长了。这些法令现在变成多余和累赘了。”(同上,第206页)

也强制地规定了工作日界限。后面这一点,即我们在这里唯一关心的一点,在1496年(亨利七世时期)的法令中又提到了。依照法令(虽然始终没有实行),所有手艺人 and 农业劳动者的工作日,从3月到9月,应该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7—8点,其中吃饭时间是早饭1小时,午饭 $1\frac{1}{2}$ 小时,4点钟左右的小餐 $\frac{1}{2}$ 小时,正好比现行工厂法规定的吃饭时间多一倍。⁽¹²⁶⁾冬季,是从早晨5点干到天黑,中间的休息时间不变。1562年的伊丽莎白法令,没有触动“按日领工资或按周领工资”的所有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不过它设法把夏季的休息时间限制为 $2\frac{1}{2}$ 小时,冬季限制为2小时。午饭时间只有1小时,“ $\frac{1}{2}$ 小时午睡制”只准在5月中至8月中这段时间内实行。矿工1小时扣工资1便士(10生丁)。但实际上,劳动者的待遇要比法令规定的好得多。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劳动者(严格地说,当时是指农业工人)一天做工10小时,一星期吃饭20次,就是说,平日每天3次,星期天两次。可见,只要他们星期五晚上节食,午饭时间不像现在这样用两小时即从11时到1时,而用一个半小时,从而劳动增加 $\frac{1}{10}$,消费减少 $\frac{1}{20}$,那么,上述税收的 $\frac{1}{10}$ 就可以筹集出来了。”⁽¹²⁷⁾

安德鲁·尤尔博士抨击1833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倒退

(126) 关于这项法令,约·威德公正地指出:“从1496年的法令可以看出,当时的饮食费等于工人收入的 $\frac{1}{3}$,等于农业劳动者收入的一半。这说明,当时的劳动者比现在的劳动者有更大的独立性,因为现在无论哪个行业的工人的饮食费在他们工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大得多。”(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版第24、25、577页)有人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现在的食品和衣服的比价和那时的比价不同造成的,但只要略为看一下弗利特伍德主教的《行情表》(1707年伦敦第1版及1745年伦敦第2版),这种意见就不攻自破了。

(127) 威·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1691年伦敦版第10页¹⁰³。

到黑暗时代,不是说得很公平吗?当然,劳工法中列举的并为配第所提到的各项规定对学徒也是适用的。至于直至17世纪末儿童劳动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从下面的怨言中可以看出:

“我们英国少年在当学徒以前,什么都不干,因此,他们当然需要7年这样长的时间,才能训练成为熟练的工人。”

相反地,德国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儿童在摇篮里就至少“受到一点职业训练”(128)。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直到大工业时代以前,英国资本还不能靠支付劳动力一星期的价值而占有工人的整个星期,只有农业

(128) 《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89年伦敦版第13页。为了辉格党和资产者的利益,麦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他宣称:“让儿童过早地从事劳动的做法,在17世纪十分盛行,这从当时的工业状况来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棉织业的中心诺里奇,6岁的儿童就被看做是有劳动能力的。当时有许多著作家,其中包括有些被认为是心地非常正直的著作家,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谈到,单是在这座城市,男女童工一年所创造的财富就比他们的生活费要多12 000镑。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得越仔细,就越有理由驳斥那种认为我们时代充满了新的社会弊病的见解。新东西不过是发现这些弊病的智慧和医治这些弊病的人道精神”(《英国史》第1卷第417页)。麦考莱本来还可以告诉我们:17世纪的“心地非常正直”的商业之友,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叙述荷兰的一所济贫院曾怎样雇用一个4岁的儿童做工,而且这种“应用于实际的道德”的例子,直到亚·斯密时代为止,在一切麦考莱式人道主义者的著作中都有过。诚然,随着工场手工业代替了手工业,剥削儿童的踪迹也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剥削在一定程度上从来就存在于农民中间,并且农民身上的枷锁越沉重,这种剥削就越厉害。资本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但事实本身却像双头婴儿一样,是极为罕见的。因此,独具慧眼的“商业之友”就以“惊喜若狂”的心情把这些事实当做特别值得惊异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垂教同时代的和后代的人们。这位喜欢献媚和爱说漂亮话的苏格兰人麦考莱还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退步,但看到的只是进步。”这是什么眼睛,尤其是,这是什么耳朵!

劳动者是例外。当时工人靠四天的工资可以生活一星期,从这一事实出发,他们根本得不出其余两天也要为资本家做工的结论。

英国有一派经济学家为了替资本效劳,猛烈攻击劳动者顽固不化;另一派经济学家则为劳动者辩护。例如,让我们听听波斯尔思韦特(当时他编的商业辞典,就像现在麦克库洛赫和麦格雷戈的同类著作一样受到好评)和前面引述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之间的争论吧⁽¹²⁹⁾。

波斯尔思韦特说道:

“我在结束这简短的评述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从某些人那里听来的这样一种陈腐论调:如果工人做5天工就足够维持生活,他就不想做满6天工。他们因此做出结论说,必须用税收或任何其他办法提高那些甚至是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来迫使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每星期不间断地劳动6天。请原谅,我的见解和这些要本王国的劳动人口永远做奴隶的大政治家们不同。他们忘记了这样一句谚语:只管干活不玩耍,头脑迟钝人变傻。难道英国人没有因为他们的富有独创性和多才多艺的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一向为不列颠的商品争得普遍声誉而感到自豪吗?这是怎样得来的呢?不就是由于我们的劳动大众善于用愉快的和独特的方式来休息娱乐吗?如果硬要他们终年劳碌,每星期干满6天,而且老是干同样的活,那他们的富有创造力的头脑不会退化吗?他们不会变为笨拙的迟钝的人吗?我们的工人由于这种长期的奴隶制,不是会

(129) 非难工人阶级最凶的就是本文提到的《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对我国工厂中的劳动价格的影响》(1770年伦敦版)的匿名作者。他早在另一部著作《论赋税》(1765年伦敦版)中就进行了这样的非难。站在这一方的,还有蹩脚的统计家普隆涅斯-阿瑟·杨格。为工人辩护的,首推: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神学博士纳撒尼尔·福斯特牧师《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普赖斯博士,还有波斯尔思韦特(对自己的《工商业大辞典》一书的增补以及他的《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1759年伦敦第2版)。至于事实本身,当时的许多别的著作家都是确认的,例如乔赛亚·塔克尔就是如此。

丧失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保持自己的声誉吗？还能指望受着这种残酷折磨的动物有什么熟练的技艺吗？……他们中间许多人4天干的活，抵得上法国人干5—6天。但是，如果英国人被迫像牲畜一样干活，恐怕他们就会退化，落在法国人后面。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素以勇敢闻名，我们不是常说，这是因为一方面有美味的英国牛排和布丁来果腹，另一方面有立宪的自由精神吗？我国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以有高超的才能、精力和技巧，怎能说不是因为他们享有可以随意消遣娱乐的自由呢？但愿他们永远不会丧失这种特权，不会失去成为他们劳动技巧和英勇精神的来源的优越生活！”⁽¹³⁰⁾

关于这个问题，《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却回答说：

“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说，其余6天属于劳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意思是说属于资本），所以强制实行上帝的这一诫命¹⁶⁹，绝不能说是残忍的行为。人一般说来天生是好逸恶劳的，我们从我国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行为就不幸地体验到这一点。除非生活资料涨价，不然他们每周平均顶多干4天活……假定1蒲式耳小麦代表一个劳动者的全部生活资料，价格为5先令，劳动者干一天活挣1先令。这样，他一周只需要劳动5天；如果1蒲式耳小麦为4先令，他就只需要劳动4天……但是本王国的工资比生活资料的价格高得多，因此工场手工业工人劳动4天，就可以有余钱维持一周其余几天的闲适生活……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进行6天适度的劳动并不是什么奴隶制。我国农业工人就是一周干6天活的，看来他们是劳动者中最幸福的人⁽¹³¹⁾；荷兰人在手工工场每周也是劳动这么多天，而且看来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劳动，只要不是中间插了许多假日的话⁽¹³²⁾……但是我们的工场手工业工人却有一种成见，好像他们作为英国人生来就有一种特权，应该比欧洲任何一国的工人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使我们的土

(130) 波斯尔思韦特《工商业大辞典》，《第一篇绪论》第14页。

(131) [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他自己在第96页上就说明，还在1770年，英国农民的“幸福”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劳动力总是紧张到极点；他们的生活坏得不能再坏，他们的劳动重得不能再重。”

(132) 新教几乎把所有传统的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由此它在资本的产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

兵勇敢起来,就这点说,它可能有些好处;但是工场手工业工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越小,他们本身和国家得到的好处就越大。工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独立。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概占总人口 $\frac{7}{8}$ 的人只有一点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商业国家里,怂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险的⁽¹³³⁾。只有我们的工业贫民情愿做6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4天工所得的工资,情况才能根本好转。”⁽¹³⁴⁾

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财产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资本的忠实的捍卫者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劳动者,一句话,即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在这种习艺所里,人们每天劳动14小时,因此,除去吃饭时间,剩下的劳动时间是整整12小时。⁽¹³⁵⁾

在1770年的“模范的习艺所”,即恐怖之所,12小时工作日就是理想,就是顶点了!而经过了63年,到了1833年,当英国议会把四种工业部门的13—18岁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整整12小时的时候,似乎英国工业的末日就到来了!1852年,当路易·波拿巴为了争取资产阶级,打算修改法定的工作日时,法国工人大众异口同声地高呼:“把工作日缩短为12小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我们的唯

(133) 《论手工业和商业》散见于第15—57页等处。

(134) 同上,第69页。早在1734年,杰科布·范德林特就说过,资本家抱怨工人懒惰,其秘密只是想用同样的工资使4个工作日变成6个工作日。

(135) 同上,第260页:“这种理想的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而不应当成为贫民收容所。在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贫民们每天应该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12小时。”他说:“法国人嘲笑我们的狂热的自由思想。”(同上,第78页)

一福利!”⁽¹³⁶⁾在苏黎世,10岁以下的儿童的劳动限制为12小时;在阿尔高州,13—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2年从 $12\frac{1}{2}$ 小时减为12小时;在奥地利,14—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0年也缩短为12小时。⁽¹³⁷⁾如果麦考莱还在的话,一定会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大叫“1770年以来的巨大进步”!

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1770年还只是资本灵魂的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的庞大的“习艺所”矗立起来了;它叫做工厂,但理想在现实面前却大为逊色了。

6.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

(13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80页)法国1850年9月5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1848年3月2日法令的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在这项法令颁布以前,法国的工作日是不受限制的。工厂的工作日长达14、15小时或者还要多些。见布朗基先生的《1848年法国的工人阶级》。这位布朗基先生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位革命家,他曾受政府的委托调查过劳动者的状况。

(137) 比利时在调整工作日方面也显示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英国驻布鲁塞尔的全权大使霍华德·德·沃尔登勋爵,1862年5月12日向外交部报告说:“罗日埃大臣对我说,无论是普遍的法令还是地方性的规章,都没有使儿童劳动受到什么限制;近3年来,政府在每次会议上都想向两院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但总是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人们猜忌不安,唯恐出现一种同劳动完全自由的原则相抵触的法令!”那些所谓的“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不过是以暧昧的形式重复本国资产阶级提出的这些口号。

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12小时自然日的界限。⁽¹³⁸⁾而大工业的诞生,在18世纪最后30多年引起了激烈的动荡。这些动荡像雪崩一样摧毁了一切自然和习俗、年龄和性别、昼和夜所造成的障碍。甚至在旧法规中按农民的习惯规定的关于昼夜的简单概念,也变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致一位英国法官还在1860年为了对昼和夜作出“有判决力的”解释,就不得不使出学究式的聪明。资本则狂欢痛饮来庆祝胜利⁽¹³⁹⁾。

被生产的轰隆声震晕了的工人阶级一旦稍稍清醒过来,就开始进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业的诞生地英国。但是30年来,工人所争得的让步完全是有名无实的。从1802年到1833年,议会颁布了5个劳动法¹⁷⁰,但是它没有批准一文钱来实施这些法令。⁽¹⁴⁰⁾因此,这

(138) “无论哪一阶级的人,如果每天必须劳作12小时,那确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把吃饭和往返工厂的时间都计算在内,实际上这就在一天24小时中占去14小时……我想,即使不谈健康问题,单从道德观点来看,谁也不会否认,从13岁这么小的年龄开始(而在“自由的”工业部门甚至是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就不断地把劳动阶级的时间全部侵吞,这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可怕的弊端。为了公共道德,为了培育出健壮的、能干的居民,为了使广大人民能有合理的生活享受,应当坚决要求在一切产业部门中把每个工作日的一部分留出来作为休息和余暇时间。”(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41年12月31日》)

(139) 见《1860年春季开庭期贝尔法斯特法庭庭长约·哈·奥特韦先生的判决》。

(140) 很能说明路易-菲力浦这个资产者国王的政府的特点的是,他在位时颁布的唯一的工厂法,即1841年3月22日法令,从来就没有兑现过。而且这个法令也只是涉及儿童劳动。它规定8—12岁的儿童劳动8小时,12—16岁的儿童劳动12小时,等等,并且还附有许多例外,以致竟准许8岁的儿童做夜工。在一个连每只老鼠都要受警察监视的国家里,对这项法令的监督和推行却寄托在“商业之友”的善良愿望上。只是从1853年起,才仅仅在北部省设置了一个领薪水的政府视察员。同样能很好说明法国社会发展的特点的是,路易-菲力浦的法令在1848年革命前竟是无所不包的法国立法工厂中独一无二的工厂法。

些法令始终是一纸空文。

“事实是，在 1833 年的法令¹³⁷以前，人们任意让儿童和少年整夜、整日或整昼夜从事劳动。”⁽¹⁴¹⁾

现代工业中的正常工作日，只是从 1833 年颁布了有关棉、毛、麻、丝等工厂的工厂法起才出现的。1833 年到 1864 年的英国工厂立法史，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征。

1833 年的法令规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应从早晨 5 点半开始，到晚上 8 点半结束。在这 15 小时的界限内，在白天的任何时间使用少年（从 13 岁到 18 岁）做工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除某些特别规定的情况外，同一个少年一天之内做工不得超过 12 小时。”法令的第 6 节规定：“在限制的劳动时间内，每人每天至少应有 $1\frac{1}{2}$ 小时的吃饭时间”。除开下面要谈到的例外情况，禁止雇用未满 9 岁的儿童；9 岁至 13 岁的儿童的劳动每天限制为 8 小时。禁止 9 岁至 18 岁的少年做夜工，也就是在该法令所说的晚上 8 点半至早晨 5 点半之间做工。

立法者根本不想触犯资本榨取成年劳动力的自由，即他们所说的劳动自由，于是想出一种别出心裁的制度来防止工厂法在这方面造成可怕的后果。

1833 年 6 月 28 日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 1 号报告说道：

“现时工厂制度的最大弊病，在于它必然要根据成年人工作日的长度来决定儿童工作日的长度。克服这种弊病的最好方案，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而不是缩短成年人的劳动时间，否则，造成的弊病会比要消除的弊病更大。”¹⁷¹

(14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 年 4 月 30 日》第 50 页。

这个方案于是就以换班制度(“System of Relays”;在英语和法语中,Relays 都指到驿站换马)的名义实施了。例如,9岁到13岁的儿童分成两班,一班从早晨5点半到午后1点半,另一班从午后1点半到晚上8点半,等等。

工厂主先生们极端厚颜无耻地无视最近22年来所公布的一切有关儿童劳动的法律,为了奖赏他们,如今又给他们吞服的药丸涂上一层金色。议会决定,未满11岁的儿童从1834年3月1日起,未满12岁的儿童从1835年3月1日起,未满13岁的儿童从1836年3月1日起,在工厂劳动不应超过8小时。这种对“资本”如此宽厚的“自由主义”理应得到更多的赞赏,因为法尔医生、安·卡莱尔爵士、本·布罗迪爵士、查·贝尔爵士、格思里先生等等,一句话,当时伦敦最著名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在下院作证时都曾经说过,“危险在于迟缓!”¹⁷²关于这个问题,法尔医生说得更尖锐:

“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早死,立法是必要的。我们谈到的这种形式(工厂流行的形式)无疑应看做是引起早死的最残酷的方法之一。”⁽¹⁴²⁾

同一个“经过改革”的议会,一方面出于对工厂主先生们的温情,迫使未满13岁的儿童在几年内继续在工厂地狱里每周劳动72小时;另一方面却在那也是一点一滴地给予自由的解放法令¹⁷⁴中,一开始就禁止种植园主强迫任何黑奴每周劳动45小时以上。

但是资本对于这些让步丝毫无动于衷,它开始进行热烈的鼓动,掀起一个持续了好几年的新的运动。这里涉及的是什么问题呢?是

(142) “Legislation is equally necessar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eath, in any form in which it can be prematurely inflicted, and certainly *this* must be viewed as a *most cruel mode*, of inflicting it.”¹⁷³

关于规定儿童的年龄标准问题,因为法律规定,儿童每天做工不得超过8小时,并且要受到义务教育。资本主义人类学规定,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至多到11岁就结束了。工厂法完全生效的日期——不祥的1836年——越接近,工厂主就越猖狂。他们确实把政府吓住了,于是政府在1835年建议把儿童时期的界限从13岁降为12岁。但这时外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带有威胁性。下院没有勇气这样做了。它拒绝把13岁的儿童扔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¹⁷⁵下每天被压榨8小时以上。1833年的法令完全生效了。直到1844年6月它一直没有变动。

在工厂劳动先是局部后是全部受到这项法令约束的十年间,工厂视察员的官方报告充满了关于这项法令无法实施的抱怨。1833年的法令规定,在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半这十五小时内,每个“儿童”和“少年”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中断和停止他的十二小时或八小时劳动,完全由资本家先生们去决定,并且他们还可以为不同的人规定不同的吃饭时间,这样一来,这班先生很快就发明了一种新的“换班制度”,让驿马不是在固定的驿站换班,而是在新的驿站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套上跑下去。我们不来进一步思考这个制度的妙处,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但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制度完全取消了工厂法,既没有遵守它的精神,也没有遵守它的条文。既然每个儿童和少年的账册如此复杂,工厂视察员有什么办法迫使工厂主遵守法定的劳动时间和吃饭时间呢?以前那种残酷的不法行为又在许多工厂中不受惩罚地盛行起来。工厂视察员在同内务大臣的一次会见(1844年)时证明说,在新实行的换班制度下不可能有任何监督。⁽¹⁴³⁾但这时情况毕竟有了很大变化。特别

(14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31日》第6页。

是从 1838 年以来，工厂工人把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⁴⁰当做自己经济上联合的口号，正像他们把宪章¹⁷⁶当做自己政治上联合的口号一样。甚至一部分按照 1833 年法令来经营工厂的工厂主，也一再上书议会，控告某些“口是心非的弟兄”进行不道德的“竞争”，因为这些人由于更加厚颜无耻或拥有较有利的地方条件就违反法律。此外，尽管个别工厂主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工厂主阶级的政治领袖们却要求它对工人采取另一种态度和使用另一种语言。事实上，为了在刚刚开始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中取得胜利，工厂主阶级需要工人的支持。因此，他们不仅答应“把面包的配给量加大一倍”¹⁷⁷，而且答应在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¹⁷⁸内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⁴⁴⁾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反对那种只以实行 1833 年法令为目的的措施，那是十分严重的失策。最后，狂怒的贵族由于自己的最神圣的利益即地租受到威胁，也用博爱家的口吻大骂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的“可耻行为”⁽¹⁴⁵⁾。

于是就出现了 1844 年 6 月的补充工厂法。它从同年 10 月 1 日开始生效。它又把另一类劳动者，即 18 岁以上的妇女，置于法律保护之下。她们在各方面都受到与少年工相同的待遇，她们的劳动时间限制为 12 小时，禁止做夜工，等等。立法第一次被迫对成年人的劳动也进行直接的正式的监督。1844—1845 年的工厂报告讽刺地说：

(14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 年 10 月 31 日》第 98 页。

(145) 伦纳德·霍纳在正式报告中也使用了“可耻行为”一语。（《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 年 10 月 31 日》第 7 页）

“就我们所知，成年妇女还从未抱怨过这种侵犯她们权利的行为。”⁽¹⁴⁶⁾

13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每天 $6\frac{1}{2}$ 小时，在有些情况下是7小时。⁽¹⁴⁷⁾

为了防止滥用“虚假的换班制度”，法律又规定了包括下列内容的重要的细则：

“儿童和少年的工作日，应该从有任何一个儿童或少年早晨在工厂里开始劳动的时候算起”。

按照这个规定，如果A是从早晨8点开始劳动，B是从10点开始劳动，那么，B的工作日仍然要和A的工作日一样，应在同一时间结束。

“开工时间应以某个公共时钟为准，例如，以附近的铁路时钟为准，工厂的钟要和这个铁路时钟保持一致。工厂主必须在工厂张贴大字印刷的时间表，说明上工、下工、休息的时间。12点以前上工的儿童不得在下午1点钟以后又让做工。这样，下午班就不能再有上午班的儿童。受法律保护的全体劳动者都要有 $1\frac{1}{2}$ 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应在同一时间吃饭，其中至少有1小时应在下午3点以前。儿童或少年至少应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否则不得让他们在下午1点以前做工5小时以上。儿童、少年和妇女不得留在某种劳动过程正在进行的厂房中吃饭，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绝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

(14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5页。

(147) 法令允许使用儿童劳动10小时，只要他们不是天天做工，而是隔一天做一天工。总的说来，这项条款始终没有发生过效力。

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的各阶级之间的社会斗争的结果。它们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工厂的成年男工的工作日实际上也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因为在大工业的大多数生产过程中不能没有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协作。在 1844—1847 年期间，受工厂立法约束的一切工业部门，都普遍一致地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日。

但是，工厂主如果没有得到某种“退步”作补偿，是不会容忍这种“进步”的。在他们的敦促下，下院把可以雇用的儿童的最低年龄从 9 岁减为 8 岁，以保证资本按照天意和法律得到“工厂儿童的追加供给”。⁽¹⁴⁸⁾

1846—1847 年在英国经济史上划了一个时代。谷物法¹⁷⁹废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进口税取消了，自由贸易被宣布为贸易立法的指针！一句话，千年王国出现了。另一方面，宪章运动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在这期间达到了顶点。它们在渴望报仇的托利党人那里找到了同盟者。尽管以布莱特和科布顿为首的言而无信的自由贸易派疯狂反抗，曾经是长期斗争目标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终于由议会通过了。

1847 年 6 月 8 日的新工厂法规定，从 1847 年 7 月 1 日起，“少年”（从 13 岁到 18 岁）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 11 小时，而从 1848 年 5 月 1 日起，最终限制为 10 小时。在其他方面，这个法令只是 1833 年和 1844 年的法令的修正补充。

资本先发制人，想使这个法令在 1848 年 5 月 1 日不能实行。而

(148) “由于儿童的劳动时间的缩短会引起他们被雇用的人数的增加，有人就认为，这种增长了的需求可由 8—9 岁的儿童的追加供给来满足。”（同上，第 13 页）

且,似乎由于取得经验教训而获得教益的劳动者自己应当按照主人的计划来帮助破坏自己的事情。时机是选择得很巧妙的。

“必须记住,由于 1846—1847 年爆发了可怕的危机,很多工厂缩短了劳动时间,另一些工厂完全停工,到处都是极度的贫困。很多工人生活拮据,负有债务。因此,一切现象表明,他们宁愿增加劳动时间,以便弥补过去的亏损,偿还债务,或者从当铺赎回自己的家具,或者把卖掉的东西再补充进来,或者为自己和家属添置新衣。”⁽¹⁴⁹⁾

工厂主先生们普遍把工资降低了 10%,企图以此来助长这种状况的自然作用。而这就是所谓向自由贸易新纪元的献礼。后来,工作日缩短为 11 小时,工资又降低 $8\frac{1}{3}\%$,最后工作日缩短为 10 小时,工资降低 15%。因此,凡是在情况允许的地方,工资至少降低了 25%。⁽¹⁵⁰⁾在这样有利的时机下,就在工人中间展开了废除 1847 年法令的鼓动。欺骗、诱惑、威胁的手段全都用了,但都是枉费心机。虽然在工人中间征集到了半打请愿书,诉说“他们深受这个法令的压迫”,但是在口头询问这些请愿者的时候,他们说是被迫签名的。“他们是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的压迫。”⁽¹⁵¹⁾工厂主们既然无法使工人说出他们工厂主想说的话,于是自己就以工人的名义在报刊上和议会里大叫大嚷。他们指责工厂视察员是一种革命委员¹⁸⁰,想靠残酷无情地牺牲不幸的劳动者,来实现他们的人道主义的奇想。但是

(149)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 年 10 月 31 日》第 16 页。

(150) “我发现,每周领取 10 先令的人因为工资普遍减少 10% 而少得 1 先令,又因为工作时间缩短而少得 1 先令 6 便士,总共少得 2 先令 6 便士,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坚决拥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同上)

(151) “当我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时候,我就说我做了一件坏事。——那你为什么还要签名呢?——因为拒绝签名就会被解雇。——请愿者觉得自己确实‘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的压迫。”(同上,第 102 页)

这一招也没有得逞。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本人以及通过他的助手在兰开夏郡询问了很多证人,在被询问的工人中,赞成十小时工作日的将近 70%,赞成十一小时的人数不多,赞成原来的十二小时的只占极少数。(152)

另一个友好的花招是使成年男工劳动 12—15 小时,然后宣布这是无产阶级内心愿望的最好的表达。但是“残酷无情的”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马上又出现了。大多数超过法定时间劳动的工人声称:

“他们宁愿劳动 10 小时而少拿些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纺纱工人被迫去做零工,如果他们拒绝延长劳动时间,别人马上就会把他们挤走。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把劳动时间延长一些,或者流落街头。”(153)

资本的试验气球爆裂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于 1848 年 5 月 1 日生效。但这时,宪章派也失败了。他们的领袖被关进监狱,他们的组织被遭到破坏。宪章派的失败已经动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信心。¹⁸¹不久,巴黎的六月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¹⁸²使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统治阶级的一切派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护关税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和反对派,教士和自由思想者,年轻的娼妇和年老的修女——都在同一面旗帜下联合

(152) 同上,第 17 页。在霍纳先生的管区,曾询问了 181 个工厂的 10 270 个成年男工。他们的证词都载于截至 1848 年 10 月为止的半年工厂视察员报告的附录中,这些证词在其他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153) 同上。见《附录》中列举的伦纳德·霍纳本人收集的第 69、70、71、72、92、93 号证词,以及助理视察员 A 收集的第 51、52、58、59、60、62、70 号证词。有一个工厂主自己讲出了全部真相。见该报告第 265 号以后的第 14 号。

起来了！而他们的战斗口号就是：拯救金钱、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工人阶级被宣布有罪，被剥夺公民权，受到“嫌疑犯处治法”¹⁸³的迫害。工厂主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进行公开的反叛，不仅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而且反对 1833 年以来力图对劳动力的“自由”榨取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这是一次缩小型的维护奴隶制的叛乱⁷，这次叛乱蛮横无耻，疯狂已极，异常恐怖，持续了两年多，而这样做是十分便宜的，因为叛乱的资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进行冒险。

为了便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必须记住：1833 年、1844 年和 1847 年三个工厂法，凡是在后者没有对前者进行修改的地方，都保留了法律效力；这三个法令都没有限制 18 岁以上的男工的工作日；从 1833 年以来，早晨 5 点半至晚上 8 点半这 15 小时的时间始终是法定“日”，在这个界限以内，少年和妇女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起先劳动 12 小时，后来劳动 10 小时。

某些地方的工厂主开始把他们雇用的少年工和女工解雇一部分，有时甚至解雇一半，同时却把几乎已经绝迹的夜工在成年男工当中恢复了。他们叫嚷说，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使他们别无出路！⁽¹⁵⁴⁾

第二个攻击目标是法定的吃饭时间，让我们听听工厂视察员是怎样说的：

“自从工作日限制为 10 小时以来，工厂主们就说（虽然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所说的），如果劳动是从早晨 9 点到晚上 7 点，那么他们在早晨 9 点以前拿出 1 小时，在晚上 7 点以后拿出半小时，总共用 $1\frac{1}{2}$ 小时作为吃饭时间，这也就是充分地执行法令的规定了。现在，在某些场合，他们准许有半小时

(15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 年 10 月 31 日》第 133、134 页。

的午饭时间,但是他们坚持说,他们没有义务把这 $1\frac{1}{2}$ 小时的任何部分包括在十小时工作日之内。”(155)

因此,工厂主先生们硬说,1844年法令关于吃饭时间的十分详细的规定,只是允许工人在进厂以前和离厂以后,即在自己家里吃饭喝水!工人为什么不应当在早晨9点以前吃午饭呢?但是皇家法官裁决说,法律规定的吃饭时间

“必须安排在实际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内。让工人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连续不停地劳动10小时是不合法的”(156)。

经过这几场愉快的示威后,资本采取了与1844年法令条文相适应的因而是合法的步骤来进行反叛。

诚然,1844年的法令规定,上午12点以前做工的8—13岁的儿童不准在下午1点以后又让做工。但是在中午12点或下午开始做工的儿童 $6\frac{1}{2}$ 小时劳动,法令却未作任何规定。因此,可以使中午12点开始做工的8岁儿童在12点至1点之间干1小时,在下午2点至4点之间干2小时,在5点至晚上8点半之间干 $3\frac{1}{2}$ 小时,总共是法定的 $6\frac{1}{2}$ 小时!甚至还有更妙的办法。为了使儿童的劳动同干到晚上8点半的成年男工的劳动配合起来,工厂主只要在下午2点以前不给儿童活干,就可以使他们在工厂中连续不停地干到晚上8点半!

“现在人们公开承认,由于工厂主拼命使机器开动10小时以上,在所有的少年和妇女都离开工厂以后,8—13岁的男儿童留下来和成年男工一起干到晚上8点半,这种办法已在英国实行。”(157)

(15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47页。

(15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0页。

(157) 同上,第142页。

工人和工厂视察员从道德和卫生的角度提出抗议,但资本却像夏洛克那样想:

“我的行为没有越轨,我要求我的权利!
那就是我的契约上规定的罚金和抵押品。”¹⁸⁴

事实上,1850年7月26日向下院提出的统计材料表明,尽管有各种抗议,到1850年7月15日为止,还有257家工厂的3742个儿童受着这种新“办法”的折磨。⁽¹⁵⁸⁾不仅如此!资本的山猫眼睛发现,1844年的法令规定,在上午连续劳动5小时至少要有30分钟的吃饭时间,但是关于下午的劳动却没有任何类似的规定。因此,资本要求而且确实也迫使8岁的童工不仅从下午2点一直拼命干到晚上8点半,而且还要挨饿。

夏洛克说:

“对了,他的胸部,
契约上是这么说的!”^{(159) 184}

这种死抠限制儿童劳动的法令条文的做法,只是为了对限制少年和妇女的劳动的这同一条法令进行公开的反叛作准备。我们记

(15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31日》第5、6页。

(159) 资本无论在其不发达的形式上或发达的形式上,性质都是一样的。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不久,奴隶主在新墨西哥这一领地强制推行一项法案,其中写道:“只要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工人就成为他的(资本家的)货币”。在罗马的贵族中也流行过这种看法。他们借给平民债务人的钱,通过生活资料,转化为不幸的债务人的血和肉。因此,这种“血和肉”是“他们的货币”。由此就产生了夏洛克式的十二表法¹⁸⁵!当然兰盖关于贵族债权人时常在台伯河彼岸用煮熟了的债务人的肉来大办筵席的臆说¹⁸⁶,和道默关于基督教圣餐的臆说¹⁸⁷,我们就不去说了。

得，废除虚假的换班制度是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工厂主开始反叛这个法令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声明说，1844 年法令禁止在使用少年和妇女时任意让他们在一天的任何时间停止和重新开始劳动，这些条款

“在劳动时间限制为 12 小时的时候比较地说还是无所谓的，而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情况下，它们就是难以忍受的了。”⁽¹⁶⁰⁾

因此，他们用最冷静的态度向视察员宣称，他们将不理睬法律的条文，他们打算自行恢复旧的制度。⁽¹⁶¹⁾而且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听了不良劝告的工人本身的利益，

“能对他们支付较高的工资”。“这是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下保持大不列颠的工业优势的唯一办法。”⁽¹⁶²⁾“在换班制度下要发现违法情况也许有些困难，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为使工厂视察员及其助手省掉一些小小的麻烦，就应当把这个国家的巨大的工厂利益看成是次要的东西吗？”⁽¹⁶³⁾

当然，所有这些遁词都无济于事。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诉讼。但是工厂主的请愿书立即像雪片似地飞向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以致他在 1848 年 8 月 5 日的通令中晓谕视察员：

“只要还没有证实换班制度被滥用来使少年和妇女劳动 10 小时以上，就不要按违背法令条文来追究。”

在这以后，工厂视察员詹·斯图亚特就准许苏格兰全境实行所

(16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 年 10 月 31 日》第 133 页。

(161) 例如，慈善家阿什沃思在写给伦纳德·霍纳的一封渗透着贵格会教义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

(162) 同上，第 138 页。

(163) 同上，第 140 页。

谓换班制度，于是这种制度比以前更加盛行起来。而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则声明，内务大臣没有权力自作主张中止法律的实施，并且继续向法庭控告那些叛乱者。

但是，既然郡治安法官⁽¹⁶⁴⁾宣判资本家无罪，那传讯又有什么用处呢？在这些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举一个例子。克肖—利斯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格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保持缄默。几个月以后，一个叫鲁宾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埃斯克里格如果不是他的星期五，那也是他的亲戚——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格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传到斯托克波特市法院出庭。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主，首席法官便是那位善于发明的埃斯克里格。埃斯克里格宣判鲁宾逊无罪，并且说，对鲁宾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格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¹⁶⁵⁾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¹⁶⁶⁾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叫道：

“对于这种审判把戏实有整顿的必要……或者是使法律适应这种宣判，

(164) 这些“郡治安法官”，即被威·科贝特称为“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是由各郡绅士组成的不领薪水的治安法官。事实上，他们形成统治阶级的世袭法庭¹⁸⁸。

(16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21、22页。参看该报告第4、5页上类似的例子。

(166) 根据[威廉]四世元年和二年法令，即叫做约翰·霍布蒙斯爵士工厂法的第39章第10节，在与工厂法有关的问题上，任何一个棉纺织厂厂主及其父子兄弟一律不得担任治安法官的职务。

或者是让一个犯错误较少、能使判决适应法律的法院去执行。……在所有这些场合，多么需要领薪水的法官啊！”(167)

皇家法官宣布工厂主对 1844 年法令的解释是荒谬的，但是社会的救主们却置之不理。伦纳德·霍纳报告说：

“我在 7 个审判区中提出 10 件诉讼，试图强制人们执行法律，可是只有一件诉讼得到治安法官的支持，我认为再对违法行为提出诉讼是徒劳无益的。法令中规定劳动时间要整齐划一的那一部分条文在兰开夏郡已经不发生效力。我和我的助手没有任何办法能使自己确信，在实行所谓换班制度的工厂里，少年和妇女不是劳动 10 小时以上。1849 年 4 月底，在我的管区里已经有 118 家工厂采用这种方法，近来这种工厂的数目还在急剧增加。一般说来，现在工厂的劳动是 $13\frac{1}{2}$ 小时，从早晨 6 点到晚上 7 点半；也有劳动 15 小时的，从早晨 5 点半到晚上 8 点半。”(168)

还在 1848 年 12 月，伦纳德·霍纳就列举出 65 个工厂主和 29 个工厂监工，说他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换班制度下，任何监督制度都不能阻止过度劳动的广泛流行。(169) 同一批儿童和少年时而由纺纱车间调到织布车间，时而由这个工厂调到那个工厂。(170) 这样一种制度怎能加以监督呢，

“它滥用换班之名，把‘人手’像纸牌一样按无限多样的方式混杂起来，并且天天变更各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以致同组的全体‘人手’永远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工！”(171)

(167) 同上。

(16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 年 4 月 30 日》第 5 页。

(169)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 年 10 月 31 日》第 6 页。

(17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 年 4 月 30 日》第 21 页。

(17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 年 12 月 1 日》第 95 页。

撇开换班制度所造成的过度劳动不说,这种所谓换班制度是资本幻想的产物,连傅立叶关于“短时工作”¹⁸⁹的幽默描写都相形见绌,所不同的只是,这种制度把劳动的吸引力转化成了资本的吸引力。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工厂主所制定的方案,看看被诚实和公正的报纸誉为“在相当精细和适当的安排下才能做出的事物”的典范的这种组织就够了。劳动人员有时被分为12—14个类别,各类别本身的组成部分不断改变。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资本一会儿把工人拉来干30分钟,一会儿拉来干1小时,然后又把他推开,接着又把他拉来,然后再把他推开,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地把他赶来赶去,但是在他未做满10小时之前,决不把他放掉。就像在舞台上一样,同样一些人物要在各幕戏的各个场次轮流出场。但是也正像演员在整个戏的演出中是属于舞台一样,现在,工人在15小时之内是属于工厂,其中还不包括上下工走路的时间。于是,休息时间变成了强制闲逛的时间,它把少年男工赶进酒店,把少年女工赶进妓院。资本家力图不增加人员而使自己的机器开动12小时或15小时,为此他们每天都想出新招,这就使工人有时不得不把时间浪费掉,有时又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把饭吞下去。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期间,工厂主到处大喊大叫,说工人歹徒们请愿的目的是想用10小时的劳动取得12小时的工资。现在他们是反过来了。他们剥削12小时或15小时,而只支付10小时的工资!⁽¹⁷²⁾这就是工厂主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解释!正是这些假献殷勤、满嘴博爱的自由

(172)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6页,以及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和桑德斯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中对“换班制度”的详细剖析。还可参看阿什顿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牧师于1849年4月为反对“换班制度”而向女王呈交的请愿书。

贸易论者，在宣传反对谷物法的整整十年中，一分一毫地算给工人听，说如果可以自由输入粮食使英国工业获得新的发展，那么只要实行十小时的劳动就足以使资本家发财致富了。⁽¹⁷³⁾

资本进行了两年的叛乱终于取得了胜利：英国四个高等法院之一，财务法院，于1850年2月8日判决一件案子时宣布，虽然工厂主违反了1844年法令的精神，但是这个法令本身的某些词句使法令变成了荒谬的东西。“这种判决就是废除了十小时的工作日法。”⁽¹⁷⁴⁾很多以前不敢对少年和女工实行换班制度的工厂主，现在都双手抓住换班制度不放了。⁽¹⁷⁵⁾

但是，资本的表面上的最后胜利立即引起了反应。在此以前，劳动者虽然不断地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一直采取守势。现在他们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表示抗议。他们提出：“所谓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只是一场骗局，只是议会的欺诈行为，根本就未存在过！”工厂视察员急切地警告政府说，阶级对抗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一些工厂主自己也抱怨起来：

“由于治安法官的互相矛盾的判决，各地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在约克郡是一种法律，在兰开夏郡又是一种法律，在兰开夏郡的某一教区是一种法律，在邻近的教区又是一种法律。大城市的工厂主可以逃避法律，其他工厂主的情况则不相同，他们找不到必要的人手来实行换班制度，更不必说把工人从一个工

(173) 例如可参看罗·海·格雷格《工厂问题。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37年版。

(174) 弗·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载于卡尔·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13页¹⁹⁰)。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所“高等”法院又发现，由于语义含糊，取缔海盗船只武装的法律竟成了正好相反的东西。

(17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第44页]。

厂调到另一个工厂，如此等等。”

但是，平等地剥削劳动力不正是资本的首要的权利吗？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被议会在 1850 年 8 月 5 日新的补充工厂法中固定下来。“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 5 天从 10 小时延长为 $10\frac{1}{2}$ 小时，星期六限制为 $7\frac{1}{2}$ 小时。劳动时间应从早晨 6 点至晚上 6 点⁽¹⁷⁶⁾，其中休息 $1\frac{1}{2}$ 小时作为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应当统一，并且要符合 1844 年的规定等等。这样，换班制度就永远结束了。⁽¹⁷⁷⁾关于儿童劳动，1844 年的法令仍然有效。

有一类工厂主，这一次也和以往一样，保全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儿童的特殊的领主权。他们是丝厂厂主。1833 年他们曾咄咄逼人地喊叫：“如果剥夺他们让各种年龄的儿童每天劳动 10 小时的自由，那就等于让他们的工厂停工。”他们说，他们无法买到足够数量的 11 岁以上的儿童。他们强行取得了想要取得的特权。后来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借口纯系捏造⁽¹⁷⁸⁾，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整整 10 年内，每天用 10 小时从那些必须靠人放到高高的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¹⁷⁹⁾1844 年的法令虽然“剥夺了”他们让不满 11 岁的儿童每天劳动 $6\frac{1}{2}$ 小时以上的“自由”，但是使他们有特权让 11—13 岁的儿童每天劳动 10 小时，不许他们的牺牲者接受其他工

(176) 在冬季，这段时间可以改为早晨 7 点至晚上 7 点。

(177) “现行法律〈1850 年〉是一种妥协，其结果是被雇用的工人放弃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利益，而得到的好处是，凡在劳动时间上受到限制的人都能以统一的时间上工和下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 年 4 月 30 日》第 14 页）

(17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 年 9 月 30 日》第 13 页。

(179) 同上。

厂的儿童可以受到的义务教育。这一次的借口是：

“细巧的织物需要灵巧的手指，而这只有年幼时进工厂才能做到。”⁽¹⁸⁰⁾

儿童们由于细巧的丝织物而被大批杀戮，正如俄国南部的牛羊由于身上的皮和油而被屠宰一样。最后，1844年准许的这种特权，到1850年又受到了限制而只适用于缫丝厂了；但是，为了补偿资本失掉这种“自由”而遭到的损失，11—13岁儿童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延长到 $10\frac{1}{2}$ 小时。新的借口又是什么呢？“因为丝厂的劳动比其他工厂轻，对健康损害较少。”⁽¹⁸¹⁾后来，官方医生的调查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丝业区的平均死亡率异常高，人口中妇女部分的平均死亡率甚至比兰开夏郡棉纺织业区还高”。⁽¹⁸²⁾

(18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31日》第20页。

(18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6页。

(182) 同上，第27页。一般说来，工厂法影响所及的劳动居民的体格都大大增强了。但是在格林豪医生的正式报告中仍然可以看到下列统计表：

在工业中做工的成年男子的百分比	每10万个男子中死于肺病的人数	地区名称	每10万个妇女中死于肺病的人数	在工业中做工的成年妇女的百分比	职业类别
14.9	598	威根	644	18.0	棉业
42.6	708	布莱克本	734	34.9	同上
37.3	547	哈利法克斯	564	20.4	毛业
41.9	611	布拉德福德	603	30.0	同上
31.0	691	麦克尔斯菲尔德	804	26.0	丝业
14.9	588	利克	705	17.2	同上
36.6	721	特伦特河畔斯托克	665	19.3	瓦器业
30.4	726	沃尔斯坦顿	727	13.9	同上
—	305	8个农业区	340		

尽管工厂视察员每半年提出一次抗议,但是这种特权至今依然存在。(183)

1850年的法令只是把“少年和妇女”的劳动时间从15小时改为12小时,即从早晨5点半至晚上8点半改为从早晨6点至晚上6点。它并没有改善儿童的状况。他们照旧可以在开工前半小时和完工后 $2\frac{1}{2}$ 小时内被使用,尽管他们劳动的总时间不得超过 $6\frac{1}{2}$ 小时。在讨论法案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曾向议会提出统计材料,说明这种反常现象造成了可耻的滥用。但是毫无效果。因为在这些做法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企图,就是想借助于儿童在繁荣年代重新把成年男工的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以后3年的经验表明,这种企图由于成年男工的反抗必定遭到失败。(184)因此,1850年法令终于在1853年作了补充:禁止“在少年和妇女早晨上工前和晚上下工后使用童工”。从那时起,除了少数例外情况,1850年的工厂法把受它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的工作日都纳入法律限制之内了。(185)从第一

(183) 大家知道,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曾多么不愿意放弃丝织业的保护关税。过去他们从限制法国进口货的保护关税中得到了好处,现在他们则从他们工厂中做工的儿童的不受保护的状态中得到好处。

(18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4月30日》第30页。

(185) 在1859年和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的鼎盛时期,有些工厂主企图以额外时间付高工资为诱饵,促使成年男纺工等延长工作日。纺工们向雇主提出意见书,这才罢休。意见书中写道:“坦白地说,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只要我们每周被关在工厂中的时间仍比别的工人几乎多两天(20小时),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国家的奴隶,并且我们责备自己竟容忍一种对我们自己的和我们后代的身心有害的制度长期存在下去……所以,我们都郑重通知,从新年起,我们每周劳动将绝不多于60小时,从6点至6点,其中还包括法定的 $1\frac{1}{2}$ 小时的休息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

个工厂法颁布以来，到这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186)

1845年公布的印染工厂法，使立法第一次超出了它原有的范围。资本容许这种新的“狂暴行为”时的不悦心情，贯穿法令的每一行！这个法令把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日限制为16小时，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并且没有规定任何法定的吃饭时间。它容许人们任意使13岁以上的男工日夜劳动，(187)这是议会的一次流产。(188)

但是，原则战胜了，它在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的大工业部门中最终胜利了。1853—1860年时期这些部门的惊人发展，以及同时出现的劳动者体力和精神的复活，连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连那些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这些法律限制下的工厂与那些仍旧是“自由的”剥削部门所形成的对照。(189)“政治经济学”上的伪善者现在也宣称，认识在法律上规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们这门“科学”的特别的新发现。(190)不难了解，在工厂大亨们被迫服从不可避免的东西并

(186) 关于利用这个法律的词句来破坏法律的手法，参看议会报告《工厂法》(1859年8月9日)，以及该报告所载伦纳德·霍纳《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察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议》。

(187) “在最近半年(1857年)里，我的管区的8岁和8岁以上的儿童事实上都被迫从早上6点累死累活地干到晚上9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10月31日》第39页)

(188) “‘印染工厂法’关于劳动保护以及教育的规定被认为是一次流产。”(《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2页)

(189) 例如，埃·波特尔1863年3月24日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就是这样说的。《泰晤士报》提醒他不要忘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工厂主叛乱。

(190) 同图克一起编写并出版《价格史》的威·纽马奇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难道怯懦地向舆论让步也是科学上的进步么？

且同已经产生的后果和解之后,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那些与斗争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为加强。这就是从 1860 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

染厂和漂白厂⁽¹⁹¹⁾在 1860 年,花边厂和织袜厂在 1861 年分别受 1850 年工厂法的约束。由于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1 号报告,一切瓦器业(不仅是陶器业)、火柴厂、雷管厂、弹药厂、壁纸厂以及许多统称为最后整饰的作业,都遭受同样的命运。1863 年,露天漂白厂⁽¹⁹²⁾和面包房也受到两个专门法令的约束,前一个法令禁止在夜间(从晚上 8

(191) 1860 年颁布的关于漂白厂和染厂的法令规定,从 1861 年 8 月 1 日起,工作日暂时缩短为 12 小时,从 1862 年 8 月 1 日起,最后缩短为 10 小时,也就是说,平日为 $10\frac{1}{2}$ 小时,星期六为 $7\frac{1}{2}$ 小时。但是不祥的 1862 年一到来,旧把戏又重演了。工厂主先生们向议会一再请愿,要求把准许少年和妇女劳动 12 小时的规定仅仅再延长一年……他们说,在现今的营业状况下(棉荒时期),如果允许工人每天劳动 12 小时,赚得尽可能多的工资,那对他们将是十分有利的……下院准备通过一项关于这方面的法案。由于苏格兰漂白厂工人的鼓动,这项法案被撤销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 年 10 月 31 日》第 14、15 页) 盗用工人名义说话的资本遭到工人回击后,又借助法学家的眼镜发现,1860 年的法令和议会的一切有关“劳动保护”的法令一样,措词含糊,从中能找到这样的借口:该法令的有效范围不包括“轧光工”和“整理工”。英国的审判权始终为资本效劳,它通过高等民事法院的判决批准了这种强词夺理的解释。“这个判决引起工人极大的不满,并且深为遗憾的是,立法的确切意图,竟由于字义不明而化为泡影。”(《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 年 10 月 31 日》第 18 页)

(192) “露天漂白业者”撒谎说,他们没有使用妇女做夜工,以此逃避了 1860 年漂白工厂法。但谎言被工厂视察员揭穿了,同时,工人的请愿书使议会一想到“露天漂白厂”便产生的凉爽的感觉消失了。在这些露天漂白厂里,干燥室的温度高达华氏 90° — 100° ,其中做工的主要是少女。“冷却”这个词已经成了她们从干燥室偶尔跑到户外喘口气的专门用语。“在干燥室里有 15 个少女,

点至早晨6点)使用儿童、少年和妇女做工,后一个法令禁止在晚上9点至早晨5点使用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以后的各次建议,英国一切重要工业部门,除农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以外,都有被夺去“自由”的危险,关于这些建议我们以后还要谈到。(193)

烘烤麻布的温度是80°—90°,烘烤细麻布的温度是100°和100°以上。一间约有10平方英尺的小屋,中间放着密闭火炉,12个少女在那里把细麻布等熨平。少女们围着发出炽热的火炉,细麻布很快就被烘干,然后由她们熨平。这些‘人手’的劳动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在忙的时候,他们要接连许多天干到晚上9点或12点。”(同上,第56页)一个医生说:“没有规定专门的时间让人们凉快一下,不过当温度高得实在受不了,或者女工的手被汗水弄脏了,便允许她们出去2分钟……我在这些女工中行医的经验使我断定,她们的健康状况比纺织女工坏得多(而资本在递交给议会的请愿书中,竟用鲁本斯的风格把她们描画成面色红润,两颊丰满的弗朗德勒妇人!)。她们中间最常见的病是:肺病、支气管炎、子宫病、恶性歇斯底里和风湿症。我认为,造成所有这些病症的原因,就是她们的工作室温度太高以及她们缺少足够的合适的衣服,不能在冬季外出时抵御寒冷潮湿空气的袭击。”(同上,第56、57页)关于后来才从快活的露天漂白业者那里争得来的1863年的法令,工厂视察员指出:“这个法令看起来是保护工人的,但它不仅没有保护工人,而且按照法令的规定,只有当儿童和妇女在晚上8点以后被当场发现做工时才应受到保护,即使在这种场合,因法令所规定的证明方法有种种保留条件,几乎不可能有人会受到处罚。”(同上,第52页)“作为一个具有人道的和教育的目的的法令来说,该法令是彻底失败了。允许同样也可以说强迫妇女和儿童每天劳动14小时,或许还要劳动更长的时间,并且不管包括休息时间还是不包括休息时间,不管他们的年龄、性别如何,不管漂白厂邻近地区的家庭有怎样的社会习惯,这能说是人道的吗?”(《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

(193) 自从1866年我写这些话以来,新的倒退又发生了。在那些被威胁要受到工厂立法约束的工业部门中,资本家利用了他们在议会中的一切影响以保卫他们无限制地剥削劳动力的“公民权”。当然,他们在格莱斯顿的自由党内阁中找到了甘愿效劳的奴仆。

7.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 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晌

读者会记得,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从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现实目的。读者会记得,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阐明的观点看来,只有独立的、不受法律监护的劳动者才能作为商品占有者与资本家缔结契约。因此,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的概述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另一方面是儿童和身体上以及法律上未成年的人的劳动,那么我们只是把前者看做剥削劳动的特殊领域,把后者看做这种剥削的特殊的例子。但是,即使暂不涉及以后的阐述,仅仅根据事实的说明,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革命的工业部门中,即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棉、毛、麻、丝等纺织业中,资本不断地、无情地延长工作日的欲望首先得到了满足。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的相应的改变⁽¹⁹⁴⁾,是造成这种无限度违反法令的行为的首要原因,而这种无限度违反法令的行为继而会要求社会干预以恢复平衡,社会干预本身则会限制和统一规定工作日及合法的休息时间。因此,这种干预在19世纪上半叶只是作为例外

(194) “这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行为,是它们当时所处地位的结果。”(《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3页)

情况由法律规定的。(195)但是,当这种干预刚刚征服了新生产方式的已有领域时,它却发现,不仅许多别的生产部门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陈旧的经营方式的手工工场,如玻璃作坊、陶器作坊等以及老式的手工业,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劳动,如制钉业等(196),也都像工厂本身一样早已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渐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像英国这样在立法上仿效罗马决疑论的方式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劳动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称为工厂。(197)

第二,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劳动者,“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持续的和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198)英国的

(195) “一种行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受工厂视察制度的保护,这个行业中的劳动才能受到限制;这就是使用水力或蒸汽力,并且加工某种特定的纤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

(196) 关于这类行业的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

(197) “最近这次会议(1864年)通过的法令涉及许多工艺极其不同的行业。使用蒸汽力开动机器,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企业在法律上被当做工厂的必要条件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

(198) 在比利时这个大陆自由主义的乐园,连这种运动的影子都没有。甚至那里的煤矿和金属矿山,各种年龄的男女劳动者都被完全“自由地”消费着,而没有任何时间限制。那里所雇用的每1000人中,有733个男人,83个妇女,135个16岁以下的男孩,49个16岁以下的女孩。在炼铁厂每1000人中,

工厂工人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¹⁹⁹⁾所以,工厂哲学家尤尔博士宣称,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²⁰⁰⁾

法国在英国后面慢慢地跟了上来。在那里,十二小时工作日法律⁽²⁰¹⁾曾需要由二月革命¹⁹¹(1848年)来催生,但是它比自己的英国原版更不完备得多。虽然如此,法国的革命方法还是显示了它的独特的优点。它一下子就给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无区别地规定了同样的工作日界限,而英国立法却时而在这一点上,时而在那一点上被

有688个男人,149个妇女,98个16岁以下的男孩,85个16岁以下的女孩。此外,对成熟的或未成熟的劳动力虽然都剥削得很厉害,但工资很低,每日平均的工资,男人为2先令8便士,妇女为1先令8便士,少年为1先令 $2\frac{1}{2}$ 便士。因此,与1850年相比,1863年比利时输出的煤、铁等等的数量和价值几乎增加了一倍。

(199) 本世纪头10年刚刚结束,罗伯特·欧文就不仅在理论上主张限制工作日的必要性,而且在实际上在新拉纳克他自己的工厂内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这正同他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一样,同他创办的工人合作企业一样,被讥笑为共产主义的空想。现在,第一个空想成了国家的法律,第二个空想成了一切工厂法中的正式用语,第三个空想甚至成了进行反动欺骗的外衣。

(200) 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39、40、76、77等页。

(201) 1855年巴黎国际统计会议的报告说,法国的法律把工厂和作坊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但它不是把这一劳动限制在固定的钟点内,而只是规定儿童在早晨5点至晚上9点这段时间内做工。因此一部分工厂主就利用这一不幸的沉默给予他们的权利,让劳动者每天(也许除开星期日)不停地劳动。他们为此使用两班劳动者,每班在作坊内的劳动时间都不超过12小时,但企业的生产却昼夜不停。“法律得到了遵守,但这合乎人道吗?”除了做夜工对人的机体有破坏性的影响外,报告还着重指出,夜晚男女劳动者挤在同一个灯光暗淡的车间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迫向环境的压力屈服,并且极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202)另一方面,法国法律作为原则宣布的东西,在英国则只是以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名义争取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直到最近才作为普遍的权利提了出来。(203)

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土地遭到玷污,任何工人独立的愿望都处于瘫痪状态。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新的生命。南北战争⁷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¹⁹²(1866年8月)宣布:

“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工作日。我们誓以全力争取这一光荣的结果。”(204)

(202) “例如,在我这个地区内,在同一家企业中,同一个工厂主既是要受‘漂白厂和染厂法’约束的漂白业者和染色业者,又是要受‘印染工厂法’约束的印染业者,并且还是受‘工厂法’约束的上浆业者……”(贝克先生的报告,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0页)贝克先生在列举这些法令的各项条文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纠纷以后说:“可见,如果工厂主存心回避法律,那么要保证执行议会的这三个法令是多么困难。”不过这倒保证法学家先生有案子可办了。

(203) 因此,工厂视察员终于大胆地说出:“这种异议(资本对在法律上限制劳动时间的异议)必将在劳动权利的伟大原则面前屈服……到一定的时候,雇主使用工人劳动的权利就终止,工人就可以重新支配自己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页)

(204) “我们,敦刻尔克的劳动者,特此声明:现行制度所规定的劳动时间太长,没有给工人休息和受教育的时间,倒是把工人贬低到比在奴隶制下好不了多少的受奴役地位。因此我们通过决议:一个工作日有8小时就够了,

与此同时(1866年9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如下一项类似的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¹⁹³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自发地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绝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²⁰⁵⁾

必须承认,我们的劳动者在走出生产的温室时同他进入生产的温室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占有者与其他商品的占有者相对立,即作为商人与商人相对立。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所缔结的契约,好像是两个自由意志,即卖者的意志和买者的意志之间达成协议的结果。他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被允许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²⁰⁶⁾

而且法律上应该加以承认:我们呼吁报刊这个强有力的杠杆来支持我们……凡拒绝给予这种支持的人,将被看做是劳动改良和劳动者权利的敌人。”(纽约州敦刻尔克工人的决议,1866年)

(20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2页。

(206) “此外,这种诡计〈例如资本在1848—1850年采取的手法〉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一种经常有人提出的看法是多么错误,这种看法是:工人不需要任何保护,而应被看做是他们的唯一财产即他们双手的劳动和额头上的汗水的自由支配者。”(《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第45页)“自由劳动(如果还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使在自由的国家也需要法律的强有力的臂膀来保护。”(《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34页)“允许每天劳动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就等于强迫这样做。”(《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

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剥削”⁽²⁰⁷⁾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²⁰⁸⁾,工人必须团结一致,通过集体的努力,用阶级的力量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一个社会的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由的契约”把自己和后代卖给资本受奴役和送死。⁽²⁰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¹⁹⁶代替了“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劳动者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劳动者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²¹⁰⁾。多么大的变化啊!¹⁹⁷

(20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载于卡尔·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5页。¹⁹⁴

(208) 亨利希·海涅语。¹⁹⁵

(209) 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业部门,该法令使工人免于完全退化,并使他们的身体状况有了保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47—52页)“资本(在工厂中)超过限定时间仍使机器转动,就必定损害它所雇用的工人的健康和道德;而工人是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同上,第8页)

(210)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这就是工人自己的时间和雇主的时间之间的界限终于清楚了。工人现在知道,他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他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由于他预先准确地知道这一点,他就能依照自己的目的和计划事先安排自己的时间。”(同上,第52页)“工厂法使工人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从而赋予他们一种道义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有一天能掌握政治权力。”(同上,第47页)工厂视察员以有节制的讥讽和经过斟酌的语言暗示,现在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对资本家也并不是没有好处,它在某种程度上使资本家摆脱了他作为单纯的资本化身而自然带有的那种野蛮性,并给了他受少许教养的时间。从前,“雇主除了搞钱以外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被奴役者除了劳动以外也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同上,第48页)

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在这一章里，也同前面一样，劳动力的日价值，从而工人仅仅用于再生产或维持这个劳动力的工作日部分，被看做是不变的量。

假定一个平均劳动力的日价值等于 3 先令或 1 埃巨，为了再生产这个劳动力，一天必须花费 6 小时。因此，资本家为购买这样一个劳动力必须预付一埃巨。这一埃巨会给资本家带来多少剩余价值呢？这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如果剩余价值率是 50%，剩余价值就是代表 3 小时剩余劳动的半埃巨，如果剩余价值率是 100%，剩余价值就会提高到代表 6 小时的一埃巨。因此，如果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决定着**一个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可变资本是资本家同时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一个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乘以这些个别劳动力的数目；因此，可变资本的量与雇用的工人人数成正比。如果资本家每天要剥削 100 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 100 埃巨的资本，要剥削 n 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 n 埃巨的资本。

同样，如果 1 埃巨，即劳动力的价格，每天生产 1 埃巨的剩余价值，那么，100 埃巨的可变资本就生产 100 埃巨的剩余价值， n 埃巨的可变资本每天就生产 $1 \text{ 埃巨} \times n$ 的剩余价值。可见，可变资本所生

产的剩余价值量,是由它所支付的工人人数乘以一个工人一天所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来决定的。而这个量在单个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又取决于剩余价值率,换句话说,取决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同它的必要劳动之比。⁽²¹¹⁾因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规律:可变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这个预付资本的价值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说,等于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乘以该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再乘以同时使用的劳动力总数。

因此,如果我们用 P 表示剩余价值量,用 p 表示一个工人每天生产的剩余价值,用 v 表示支付给一个工人的可变资本,用 V 表示可变资本的总价值,用 f 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用 $\frac{t'}{t}$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表示剥削程度,用 n 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我们就得出:

$$P \begin{cases} = \frac{p}{v} \times V \\ = f \times \frac{t'}{t} \times n \end{cases}$$

但是,在积的诸因数的数值同时按反比例变化时这个积的数值不变。

因此,在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一种因素的减少可以由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来补偿。

如果可变资本或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按比例增加,那么剩余价值

(211) 在正文中不仅总是假定平均劳动力价值是不变的,而且还假定一个资本家所雇用的全部工人都是平均劳动力。存在这样一些例外情况,即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按照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但劳动力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不变的。

率的下降就不会影响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一个按剩余价值率 100% 剥削 100 个工人的 100 埃巨的可变资本, 生产 100 埃巨剩余价值。如果把剩余价值率减低一半, 那么, 只要同时把可变资本增加一倍, 剩余价值量就仍然不变。

反过来, 如果可变资本减少, 而剩余价值率按相反的比例提高, 剩余价值量也不会发生变化。假定这个资本家每天向 100 个工人支付 100 埃巨, 这些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为 6 小时, 而剩余劳动为 3 小时。100 埃巨预付资本按剩余价值率 50% 增殖, 生产出剩余价值 50 埃巨, 也就是 100×3 劳动小时 = 300 劳动小时。如果资本家现在把他的预付减少一半, 从 100 埃巨减到 50 埃巨, 也就是只雇用 50 个工人; 如果他同时能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一倍, 或者同样也可以说, 把剩余劳动从 3 小时延长到 6 小时, 那么他就总是能得到相同的剩余价值量, 因为 $50 \text{ 埃巨} \times \frac{100}{100} = 100 \text{ 埃巨} \times \frac{50}{100} = 50 \text{ 埃巨}$ 。如果用劳动小时计算, 我们就可以得到: $50 \text{ 个劳动力} \times 6 \text{ 小时} = 100 \text{ 个劳动力} \times 3 \text{ 小时} = 300 \text{ 小时}$ 。

可见, 可变资本的减少, 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按比例的提高来补偿, 或者说, 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 可以由他们的工作日的按比例的延长来补偿。因此在一定限度内, 资本所能剥削的劳动量, 并不取决于工人的人数。⁽²¹²⁾

但是, 这种补偿会遇到不能超越的界限。24 小时自然日总是大于平均工作日; 因此, 如果平均工人每小时生产 $\frac{1}{6}$ 埃巨, 平均工作日就永远不可能生产出 4 埃巨的日价值, 因为生产 4 埃巨价值需要 24

(212) 这个基本规律看来是庸俗经济学的先生们所不知道的。这些与阿基米德相反的新的阿基米德, 认为在需求和供给决定劳动的市场价格这一点上, 发现了一个不是使世界运动而是使世界静止的支点。¹⁹⁸

小时。至于剩余价值,它的界限就更狭窄了。如果工作日中为补偿每天工资的必要部分为6小时,那么自然日中就只剩下18小时,其中按照生物学规律的要求,有一部分要用于劳动力的休息。假定这种休息的最低限度是6小时,并把工作日延长到最大限度,即18小时,剩余劳动也只是12小时,因而只生产2埃巨价值。

一个按照剩余价值率100%(也就是12小时劳动,其中6小时为剩余劳动)使用500个工人的500埃巨可变资本,每天生产剩余价值500埃巨或 6×500 劳动小时。一个按剩余价值率200%(也就是18小时工作日)每天使用100个工人的100埃巨资本,只生产剩余价值200埃巨或 12×100 劳动小时。它的产品按总价值计算,永远不会达到平均每天400埃巨或 24×100 劳动小时。因此,只是在工作日的生理学的界限内,因而在工作日所包含的剩余劳动的生理学的界限内,可变资本的减少才能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来补偿,或者说,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才能靠提高剥削程度来补偿。

这个完全清楚的规律对于理解复杂的现象是重要的。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努力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我们在以后又会看到,资本同时力图把它的可变部分或它所剥削的工人人数减少到与企业规模相应的最低限度。一旦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因素中,一个因素的减少不能靠另一个因素的增加来补偿,这些趋势就会成为互相矛盾的趋势。

既然价值只是已实现的劳动,那么就很清楚,一个资本家让别人生产出来的价值量就只取决于他所推动的劳动量。他用同数工人所能推动的劳动量的多少,要看这些工人的工作日的长短。但是,在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已定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在工作日的界限和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已定的情况

下,一个资本家所实现的总价值量,其中包括剩余价值,就只是由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决定,而这个人数的本身又取决于资本家所预付的可变资本量。

因此,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成正比。但是,在不同的工业部门,总资本划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是极其不同的。在同类企业中,这种划分也随着劳动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结合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我们知道,不变资本的价值会再现在产品上,而加到生产资料上的价值只是来源于可变资本,即预付资本中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

但是,无论一定的资本是怎样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无论前者与后者之比是 2:1 或是 10:1 等等;无论生产资料的价值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值相比是提高,降低,还是不变,也不管是大是小,都无关紧要,都不会对所生产的价值量发生任何影响。如果把上面得出的规律应用于不同的工业部门,不管预付资本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划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如何,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规律:在不同产业部门的平均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的平均剥削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同所使用的资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正比,也就是说,同所使用的资本中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成正比。

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每个人都知道,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获得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像从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 $\frac{0}{0}$ 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一样。尽管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表述过这一规律,但是它却本能地坚持这一规律,因为这个规律是从价值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

结果。以后⁽²¹³⁾我们会看到,李嘉图学派²⁸是怎样被这块拦路石绊倒的。至于庸俗经济学,它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各处一样,大谈表面现象以反对现象的规律²⁰⁰。它与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论据”。²⁰¹

我们可以把社会总资本平均每天所推动的劳动看成唯一的工作日。例如,如果劳动者人数为100万,平均工作日为10小时,那么社会工作日就是1000万小时。在这个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条件还是由社会条件决定,只有劳动者人数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价值量才能增加。在这里,人口的增加形成社会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反之,在人口数量已定时,这种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长来决定。⁽²¹⁴⁾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这个规律只适用于以上所考察的剩余价值形式。

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价值额或货币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如果想成为资本家的人手中没有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就不可能发生这种转化。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生产剩余价值全年所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如果这个劳动力的占有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么只要他的劳动时间足以支付他的生活资料,比如说每天劳动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还要工人除这8小时外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

(213) 详见第四册。¹⁹⁹

(214) “劳动,作为社会的经济上的时间,表现为一个定量,比如说:100万人每人每天10小时,或1000万小时……资本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在一年的任何时期内,这个限度就是用在经济上的时间的实际长度。”(《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47、49页)

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获得财富;而获得财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不言而喻的目的。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同时也就把工人人数增加为原来的8倍。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参加劳动,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一个混合物,介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执行人格化资本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并监督他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²¹⁵⁾中世纪的行会力图防止师傅,即手工业行会头头转化为资本家,限定一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转化为资本家。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

(215) “租地农场主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如果他这样做,我认为他会受到损失。他的事务应该是全面照料;他必须监督打谷人、割草人、割麦人等等;他必须经常巡视自己的篱笆;他必须查看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如果他只局限在一处,那么就难免有疏忽。”(〔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12页)这本书非常有趣,从中可以研究“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或他明确地称之为“商人租地农场主”的起源,可以听到这种租地农场主在那些主要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小租地农民”面前是怎样自我吹嘘的。“资本家阶级最初是部分地、最后是完全地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理查·琼斯牧师《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3讲)

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引起质的区别。²⁰²(216)

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要变为资本家而必须能支配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必然引起国家对私人产业主的补助,——如柯尔培尔时代的法国和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若干邦就是这样——并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²¹⁷⁾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变成了劳动的主人,也就是说,资本达到了使运动中的劳动力或劳动者本身服从于资本的规律的目的。资本家监督工人精心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

其次,资本表现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的活动的制造者和利用者,作为劳动力的剥削者和剩余劳动的榨取者,资本主义制度在精力、效率方面并以其无限的力量,超过了以往一切直接以各种强制劳动制度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起初是在历史发展中的既有的技术条件下占有劳动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的任何变化

(216) 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²⁰³

(217) 马丁·路德把这种机构称为“垄断公司”²⁰⁴。

无关的。它今天在仍然采用原始工艺过程的面包业中和在自动化的棉纺业中同样有效。如果我们单从使用价值的观点来考察生产,那么生产资料在工人面前就不起资本的作用,而只是起到他的生产活动的单纯手段和原料的作用。例如在制革厂,工人是鞣皮,而不是鞣资本。

可是,只要我们从剩余价值的观点来考察生产,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而相反是生产资料使用劳动者了。不是劳动者把生产资料当做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劳动者当做自己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只是资本作为不断增殖的价值的运动。夜间停止不用、不吮吸活劳动的熔炉和厂房,对资本家说来是一种“纯粹的损失”。因此,熔炉和厂房就造成了要工人“做夜工的要求和权利”。关于这一点,现在无须多谈。我们只要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的这种作用的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奇异的倒置,是如何反映在资本老爷的意识中的。

在1848—186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时期,佩斯利的一家棉麻纺纱厂(卡莱尔父子公司,这是苏格兰西部资格最老、声誉最好的公司之一,它自1752年开办以来,世代由同一家族经营)的老板,这位非常有学识的绅士,在1849年4月25日《格拉斯哥每日邮报》上发表了一封信⁽²¹⁸⁾,标题是《换班制度》,其中有一段天真可笑的话:

“现在让我们看看,把劳动时间由12小时缩减到10小时会产生怎样的祸害……这些祸害给工厂主的特权和财产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如果他以前工

(21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59页。

作〈应当读作：让他的人手工作〉12小时，而现在工作不超过10小时，那就等于他的企业内每12台机器或12个纱锭缩减为10台机器或10个纱锭，如果工厂被卖掉，那它实际上就只能按10来计价。于是全国每家工厂的价值都会减少六分之一。”⁽²¹⁹⁾

我们看到，在这个苏格兰人的固执的头脑中，生产工具的价值完全同它们作为资本所具有的自行增殖或每天吞下一定量的无偿劳动的属性融合在一起了。卡莱尔公司的这位老板产生了幻想，甚至以为，在出卖工厂时，要支付给他的不仅是他的机器的价值，而且还有它们的价值增殖，不仅是包含在机器内的生产同种机器所必要的劳动，而且还有借助于机器每天从佩斯利的健壮的苏格兰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如果工作日缩短两小时，他的机器的出售价格就会减少。12台机器就只有10台的出售价格！

(219) 同上，第60页。工厂视察员斯图亚特本人是一个苏格兰人，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的视察方式所俘虏。他把这封信附在他的报告中，并明确地指出，这“是某一位采用换班制度的工厂主所写的最有用的一封信，它特别可以用来消除对这种制度的偏见和疑虑”。

第 四 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 十 二 章

相对剩余价值

以上我们把工作日中工人只是补偿资本家支付给他的价值的那一部分看做不变量,而在不变的生产条件下,它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在这个必要时间之外,劳动可以延长 2 小时、3 小时、4 小时、5 小时、6 小时等。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长度就根据这个延长的量变动。如果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变的,那么相反,整个工作日是可变的。

现在假定有一个工作日,它的界限以及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是已定的。例如 ac 线 a ————— b — c 代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 ab 段代表 10 小时必要劳动, bc 段代表 2 小时剩余劳动。现在,如果不延长 ac ,怎样才能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呢?

尽管 ac 的长度是固定的,看来 bc 仍然可以延长,即使不是越过它的固定点 c (同时也是工作日的终点)延长,至少也可以通过把它的起点 b 向 a 端推移而延长。假定在 a ————— b' — b — c 中, $b'b$ 等于 bc 的一半,即一个劳动小时。如果在 ac 中,

b 移到 b' , 剩余劳动就是 $b'c$, 即增加了一半, 从 2 小时增加到 3 小时, 虽然整个工作日仍旧只是 12 小时。但是, 如果必要劳动不从 ab 缩短到 ab' , 从 10 小时缩短到 9 小时, 要使剩余劳动这样从 bc 延长到 $b'c$, 从 2 小时延长到 3 小时是不可能的。必要劳动的缩短要与剩余劳动的延长相适应, 或者说, 工人实际上一直为自己耗费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 要转化为资本家耗费的劳动时间。工作日的界限没有改变, 所改变的只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

另一方面, 知道工作日的界限和劳动力的日价值, 也就可以确定剩余劳动的持续时间了。如果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5 先令(这是体现 10 小时劳动的金量), 那么工人每天就必须劳动 10 小时, 才能补偿资本家每天支付给他的劳动力的价值, 或者说, 才能生产出他每天必要生活资料的等价物。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 决定着他的劳动力的日价值⁽¹⁾, 而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则决定着每天的必要劳动的持续时间。从整个工作日中减去必要劳动时间, 就得到剩余劳动的量。12 小时减去 10 小时, 还剩 2 小时, 而在既定的条件下, 很难看出剩余劳动怎么能够延长到 2 小时以上。当然资本家可以不付给工人 5

(1) 每天平均工资的价值是由工人“为了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 年》1691 年伦敦版第 64 页)“劳动的价格总是由绝对的生活必需品构成的。……如果工人所得的工资不能依照他作为一个工人的低下的身份, 维持他们当中许多人注定会有的大家庭”, 那他就没有得到适当的工资。(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 15 页)“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 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 就一无所有……在一切劳动部门, 工人的工资都必定是, 而实际上也是限于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 年), 德尔编《全集》第 1 卷第 10 页)“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实际上等于劳动的生产费用。”(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 年伦敦版第 48 页注)

先令,而只付给 4 先令 6 便士,或者更少。再生产这 4 先令 6 便士价值,有 9 个劳动小时就够了,这样,剩余劳动就不是工作日的 $\frac{1}{6}$,而是 $\frac{1}{4}$ 了,剩余价值也就从 1 先令提高到 1 先令 6 便士了。但是这个结果的获得,只是由于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工人用他在 9 小时内生产的 4 先令 6 便士所能支配的生活资料比以前少 $\frac{1}{10}$,因此,他的劳动力只能有不完整的再生产。剩余劳动由于打破剩余劳动的正常界限 bc,由于盗窃了必要劳动时间而扩大了范围。

虽然这种方法在工资的实际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里它应该被排除,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商品,因而也包括劳动力在内,都是按其公平的价值买卖的。既然作了这样的假定,那么就不能通过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下的办法来缩短维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而只能靠减少这个价值本身来缩短这种必要劳动时间。在工作日界限已定的情况下,剩余劳动的延长必然是由于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不是相反,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是由于剩余劳动的延长。就我们的例子来说,劳动力的价值必须在实际上降低 $\frac{1}{10}$,必要劳动才能减少 $\frac{1}{10}$,从 10 小时减到 9 小时,从而剩余劳动从 2 小时延长到 3 小时。

劳动力的价值降低 $\frac{1}{10}$ 的前提是:同量的生活资料,从前用 10 小时生产出来,现在只需要用 9 小时就能生产出来。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不提高劳动生产力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鞋匠使用一定的手段,在十二小时内可以做一双皮靴。如果他要在同样的时间内做两双皮靴,他的劳动生产力就必须提高一倍。不改变他的劳动资料或他的劳动方法,或不同时改变这二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生产条件必须发生革命。

劳动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²⁾ 在研究由于延长劳动的持续时间而产生的剩余价值时,我们曾假定生产方式是既定的。但是,一旦问题涉及到要通过把必要劳动转化为剩余劳动来取得剩余价值,资本就不能只满足于单纯延长劳动的持续时间,而不触动传统的劳动过程。相反,这时它需要改造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即生产方式。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

我把通过单纯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相对量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要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扩展到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这些部门提供的或者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商品,或者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资料。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同时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相反,在那些既不提供生活资料也不提供生活资料的物质要素的产业部门里,生产率的提高丝毫也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变得便宜的商品只是按照该商品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例如,衬衫是一种必要生活资料,但只

(2) “改进手艺,不外是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比以前用更少的人或者(也就是)用更短的时间制成产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58,]159页)“生产费用的节约,不外是用于生产的劳动量的节约。”(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22页)

是许多种必要生活资料中的一种。这种商品变得便宜只会减少工人用在这种特殊物品上的支出。但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各种不同的产业部门的产品构成的,其中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价值作为一个相应部分进入劳动力的价值,而劳动力价值的全部减少是由所有这些特殊生产部门中的必要劳动的缩短的总和来计量的。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最终结果看成好像是直接结果和直接目的。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例如衬衫的价格降低的时候,他决不是必然抱有以此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并因而缩短工作日中工人为自己劳动的部分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³⁾ 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

我们在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趋势怎样表现为个别资本的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迫使资本家把它当做自己行动的动机。

实际上,对资本的内在本性的分析是对竞争进行科学分析的前提。同样,只有认识天体的实际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我们根据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已经取得的结果,要作如下的说明。

假定在通常的劳动条件下,在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制造价值为 12 先令的 12 件商品(任何种类的商品)。再假定这 12 先令价值的一半来自 12 小时劳动,而另一半价值来自 12 小时劳动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每件商品花费 1 先令或 12 便士,即 6 便士是原

(3) “如果工厂主通过机器的改良使他的产品增加一倍……他(最终)会获利,不过是由于他可以使工人的衣着更便宜……从而使工人在总产品中所得的份额更小。”(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 年爱丁堡版第 168[、169]页)

料的价值,6便士是劳动追加的价值。现在假定有一个资本家由于采用新的生产方法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因而在12小时中生产24件。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每件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到9便士,即6便士是原料的价值,3便士是付给最后的劳动的加工费。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一个工作日仍然只创造6先令价值,不过这6先令价值现在分散在增加了一倍的产品上。因此分摊在每件产品上的不是 $\frac{1}{12}$,而只是 $\frac{1}{24}$,不是6便士,而是3便士。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加到生产资料上的,不是一个劳动小时,而只是半个劳动小时。因此,每一件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少于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大宗同类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每件商品平均花费1先令,或者说,代表2小时社会劳动;由于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它只花费9便士,或者说,只包含 $1\frac{1}{2}$ 个劳动小时。

但是商品的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但它的社会价值不是由它在个别场合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而是由它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因此,如果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按这个商品的社会价值一先令出售,那么他的商品的售价就超出它的个别价值3便士,这样,他就实现了3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现在给他提供的产品比以前多一倍。因此,要卖掉这些产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销路或大一倍的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价格,才能在市场上获得较大的销路。因此资本家要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来出售商品,例如一件商品卖10便士。这样,他从每件产品上仍然赚得1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他赚到了这笔利润,不管他的商品是不是属于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因此,尽管有这

种情况,每个资本家还是在其利益的驱使下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商品的价格。

然而,甚至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的相应延长。⁽⁴⁾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10小时,或者说,劳动力的日价值是5先令;剩余劳动是2小时,每日生产的剩余价值是1先令。但我们的资本家现在是生产24件,每件卖10便士,或者说,一共卖20先令。因为他在生产资料上花费12先令,所以 $14\frac{2}{5}$ 件只是补偿预付的不变资本。因此,12小时劳动表现为其余的 $9\frac{3}{5}$ 件,其中6件代表必要劳动, $3\frac{3}{5}$ 件代表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在社会平均条件下是5:1,而现在是5:3。

用下列方法也可以得到同样结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产品价值对我们的资本家来说是20先令。其中12先令属于只是再现自己价值的生产资料。因此,剩下的8先令是12小时内生产的新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这个劳动量在平均条件下只表现为6先令。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被看做是复杂劳动,或者说,在一定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但是我们的资本家仍然用5先令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而这个劳动力的再生产现在只花费工人 $7\frac{1}{2}$ 小时,而不是10小时,因而剩余劳动就增加了 $2\frac{1}{2}$ 小时,剩余价值就从1先令增加到3先令。

可见,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他的竞争者在工人的工

(4) “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对劳动本身的支配。在他的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49、50页)

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他为自己个人所做的，就是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大规模地普遍地所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

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种情况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这是一个规律，因为它迫使他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这种情况又会使资本家的竞争者感到这是一个竞争的强制规律，因为它迫使这些竞争者采用新的生产方式。⁽⁵⁾因此，只有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属于生活资料即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那些商品的价格下降时，一般剩余价值率才会最终受到影响。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出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它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提高，随着劳动生产率降低而降低。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界限已定的社会平均工作日总是生产相同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始终表现为同一价格，例如 6 先令，不管这个价值额按何种比例分割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但是，如果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要生活资料便宜了，那么劳动力的日价值就会下降，例如从 5 先令下降到 3 先

(5) “如果我的邻人以少量的劳动生产出许多的东西，从而能卖得便宜，那我也就必须设法和他卖得一样便宜。所以每一种能用较少人手的劳动，从而用较低的费用就可以进行工作的技艺、交易手段、机器，都会在别人身上引起一种强制和竞争，使他们或者也采用同样的技艺、交易手段、机器，或者去发明类似的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处于同等的地位，谁也不能比邻人卖得便宜。”（《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1720 年伦敦版第 67 页）

令,剩余价值就增加2先令。再生产出劳动力,起初需要每天10小时,现在只需要6小时。有4个小时空了出来,可以并入剩余劳动的范围。因此,资本的不断倾向和趋势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商品的价格并从而降低劳动者的价格。(6)

商品的绝对价值本身,就其自身来考察,是资本家所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时可以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包含着预付价值的补偿。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和同一发展成反比,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价格下降,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这就解开了长时期以来的一个谜;人们不必再问,为什么一心想着交换价值的资本家不断地力求降低交换价值。

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魁奈医生用来为难他的论敌、而后者至今还没有回答的那个矛盾。魁奈说:

“你们认为,在手工业者的产品的制造中,只要不损害生产,越能节省费用或昂贵的劳动,这种节省就越有利,因为这会降低产品的价格。但是,你们又认为,由手工业者的劳动创造的财富的生产,在于增大他们产品的交换价值。”(7)

(6) “如果同时取消对工业的限制,劳动者的开支按怎样的比例减少,他的工资就会按怎样的比例减少。”(《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1753年伦敦版第7页)“商业的利益要求谷物和一切食品尽可能便宜;凡是会使谷物和食品昂贵的事,必然也会使劳动昂贵……凡工业不受限制的国家,生活资料的价格必然影响劳动的价格。如果生活必需品便宜了,劳动的价格必定下降。”(同上,第3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资按同一比例下降。虽然机器使生活必需品便宜了,但是也使劳动者便宜了。”(《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第27页)

(7) 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第188、189页(德尔编)。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节约劳动⁽⁸⁾,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减少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尽管工人由于他的增大的劳动生产率例如在一小时内会生产出等于过去 10 倍的商品,换句话说,他在每件商品上花费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 $\frac{1}{10}$,但这丝毫也不会阻止继续让他劳动 12 小时,并且在 12 小时内生产 1 200 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 120 件商品,或者甚至把他的工作日延长到 18 小时,让他生产 1 800 件商品。因此,在造诣颇深的麦克库洛赫、西尼耳这一类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在这一页可以读到,工人应当无限感谢资本,因为资本通过发展生产力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在下一页接着就会读到,工人为了表示这种感谢,以后必须劳动 15 小时,以代替原来的 10 小时。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商品价格没有降低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场合也可以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在下面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时,就可以看到。

(8) “这些投机家非常节约他们必须支付报酬的工人劳动。”(J.N.比多《大生产工具引起的工业技术和商业中的垄断》1828年巴黎版第13页)“企业主总是会绞尽脑汁节省时间和劳动。”(《杜格尔德·斯图亚特全集》,威·汉密尔顿爵士编,1855年爱丁堡版第8卷《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8页)“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劳动者的生产力提高到最大的程度。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而且几乎完全集中在提高这种生产力的手段上。”(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3讲)

第十三章

协 作

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只是在一个工场主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大规模进行的劳动过程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要求有广阔的市场的时候才开始的。许多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资本指挥下在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而工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起点。真正意义上的工场手工业在其初期,除了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很多而外,和中世纪的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规模。这种区别在开始时纯粹是量的区别。

雇用的工人人数丝毫不会改变剥削程度,即一定的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率。那些会影响生产方式的进一步的变化,看来不会影响作为价值创造者的劳动。这是由价值的性质得出来的。如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实现为6先令,那么100个工作日就实现为6先令 \times 100;起初产品体现了12个劳动小时,现在则体现了1200个劳动小时。因此,100个工人在单独劳动时所生产的价值同集合在同一资本的指挥下生产出来的价值相等。

不过,在一定限度内还是会发生变化。实现为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也就是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但是,只有同名称的

量之间才有平均量。在每个产业部门，个别工人，彼得或保罗，都同平均工人多少相偏离。这些个人偏离或者数学上人们所说的误差，只要把大量的工人放在一起计算就会互相抵消，归于消失。著名的诡辩家和献媚者埃德蒙·伯克甚至根据他当租地农场主的经验也懂得，只要有五个雇农“这样小的队伍”，劳动的所有个人差别就会消失，因此任意五个成年英国雇农在一起，和其他任何五个英国雇农一样，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同样多的劳动。⁽⁹⁾ 不管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只要同时雇用的工人达到相当多的人数，他们的工作日就是社会工作日，也就是平均工作日。假定每天劳动持续 12 小时。这样，12 个工人每天劳动 144 小时，虽然这 12 个工人中每个人的劳动都多少偏离平均劳动，因而做同一件工作所需的时间有多有少，但是他们的总计为 144 小时的集体工作日都具有社会平均性质。但是，对于雇用 12 个工人的资本家来说，工作日是 144 小时，每个工人的个人工作日只被看做是这个集体工作日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 12 个工人是在一个集体产品上协作，或者只是并列地完成同一件工作，这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情况与此相反，这 12 个工人分散为 6 个小业主雇用，那么每个业主能否从他的两个工人身上取得同一价值，从而实现一般剩余价值率，就纯粹是偶然的了。这里就会出现偏离。如

(9) “毫无疑问，由于体力、技巧和勤劳的差别，一个人的劳动价值同另一个人的劳动价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根据我的仔细观察，我完全可以肯定，任何五个人共同提供的劳动量和我所说的那种年龄的其他五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是相等的。这就是说，在这五个人中一人具备优等工人的一切特质，一人是劣等工人，其他三人是中等，在优等工人或劣等工人之间。所以，即使在五个人这样小的队伍中，也能发现任何五个人所能提供的全部总量。”（埃·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 年伦敦版第 16 页）还可参看凯特勒关于平均的个人的言论。²⁰⁵

果一个工人生产一种物品所花费的时间显著地超出社会必需的时间,因而他的个人必要劳动时间显著地偏离平均劳动时间,那么,他的劳动就不能当做平均劳动,他的劳动力就不能当做平均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就会低于正常价格出售,或者根本卖不出去。

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劳动熟练程度作为前提,以后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是知道如何衡量这个最低限度的劳动熟练程度的。不过这个最低限度会偏离平均水平,虽然劳动力必须按平均价值支付。因此,在6个小业主中间,有人赚到的会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率,有人赚到的会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这些差别就整个社会来说会互相抵消,但是就单个小业主来说却不是这样。因此,价值生产的规律只有对集体地使用许多工人,从而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资本家来说,才会得到充分的实现。⁽¹⁰⁾

即使操作方法不变,使用多数的人员也会在劳动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厂房、储藏原料和处在加工过程中的商品的仓库、工具、各种装置,总之,生产资料,现在是同时为许多工人提供服务:它们是被共同使用的。它们的交换价值之所以提高,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的有用服务更多,而是因为它们有了更大的规模。20个织布工人用20台织机劳动的房间,必然比一个织布者带两个帮工做工的房间大得多。但是,为20个织工建造10座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要比建造一座容纳20个人共同劳动的作坊花费更多的费用。大量积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不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有用效果成比例地增加。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比它们

(10) 罗雪尔教授先生发现了,教授夫人雇用的一个女裁缝两天内提供的劳动,比她雇用的两个女裁缝一天内提供的劳动要多。²⁰⁶ 这位教授先生不应该在婴儿室和在主要人物——资本家的情况下观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所代替的分散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小,而且分配在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产品量上。因此,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减少了,因而它转移到商品上的价值部分也减少了。其结果同人们用花费较少的方法生产出生产资料一样。生产资料使用方面的这种节约,只是由于共同消费它们。即使集合的工人并不是协作完成同一件工作,而是在同一作坊内并列地操作,这种生产资料也获得了使它们与分散的并且相对地说花费大的生产资料不同的社会劳动条件的性质。因此,劳动的物质资料在劳动本身之前获得了社会性质。

生产资料的节约要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的价格下降,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变剩余价值同预付资本,也就是同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之间的比例。后一点要到本书第三册²⁰⁷才来探讨。分析的进程要求把我们的对象这样分割开来,而这种分割也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条件表现为与劳动者相独立的东西,所以劳动条件的节约也表现为一种与劳动者无关、因而与提高劳动者的个人生产率的方法完全不同的东西。

当许多劳动者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为了共同的目的而一起劳动时,他们的劳动就采取了协作⁽¹¹⁾的形式。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力量的总和和本质的差别,同样,分散的工人的机械力量的总和,与这些工人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

(11) “Concours de forces”[“协力”]。(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80页)

(例如升高重物、转绞车、清除障碍物等)所发挥的机械力量有本质的差别。(12) 在这些场合,共同劳动的结果是个人劳动不可能达到的,或者只是在很长的时间或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是通过协作创造了一种只是作为集体力执行职能的新生产力。(13)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结合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工人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工人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总产品要多得多。(14) 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

(12) “有许多工作非常简单,不能分割开来,没有许多人手的协作就不能完成。例如,把一根大树干抬到车上……总之,凡是许多人手不同时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上互相帮助就不能完成的事情,都是这样。”(爱·吉·韦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第168页)

(13) “1吨重的东西,1个人举不起来,10个人必须竭尽全力才能举起来,而100个人只要每个人用1个小指头的力量就能举起来。”(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1页)

(14) “这时候(当同样数量的劳动者由一个租地农场主用在300英亩土地上,而不是由10个租地农场主各用在30英亩土地上的时候)也会因工人的相对人数较多而具有优越性。除了有实际经验的人,这种优越性是不容易被认识到的。人们自然会说:1:4等于3:12;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收获时期和许多其他类似的紧急工作上,如果同时使用许多人手,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更快。例如,在收获工作上,2人赶车,2人装车,2人传送,2人使耙,其余的人安排在禾堆上或谷仓内,他们一起干完的活要比同样多的人分散在各个农场里所干完的活多一倍。”(〔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7、8页)

是社会动物⁽¹⁵⁾。

尽管许多工人同时协同完成同一工作,但是每个人的个人劳动,作为集体劳动的一部分,仍可以代表劳动过程本身的不同阶段。由于协作,各个阶段的进程加快了。例如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必须通过的不同阶段。因此,集体劳动者例如用 24 只手传砖,比单个劳动者每人都用两只手搬着砖上下脚手架要快。⁽¹⁶⁾因此,劳动对象经过一定空间的时间缩短了。

只要协作者同时从各个方面在他们的劳动对象上工作,那么尽管他们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如果结合工作日为 144 个劳动小时的 12 个瓦工在一座建筑物的不同方面同时进行工作,那么,他们的工程的速度就会比一个瓦工于 12 天或干 144 个劳动小时快得多。因为集体劳动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这样,产品被空间分开的各个不同部分会在同时间内完成。

我们所提到的只是互相补充的工人做同一或同种工作的场合。这是最简单的协作形式,但会作为要素再现在最发达的形式中。

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协作者,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让他们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

(15) 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市民,即城市的居民²⁰⁸。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工具的制造者”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人的特征一样。

(16) 弗·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39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97、98页。

造产品所必要的时间。(17)

在许多生产部门都有特定的时间,即紧急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必须取得如期的结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劳动是否在一定的时间开始并在一定的时间结束。在这里,劳动必须完成的时间是由劳动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的,正像例如捕鲑鱼的情况一样。一个单独的工人在一个自然日中只能分割出一个工作日,例如 12 小时;但是,100 个工人的协作就能在一天内积聚 1 200 个劳动小时。因此,可以利用的时间的短促,能够由在紧要关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的劳动量来补偿。在这里,能否及时获得成果,取决于是否同时使用许多结合的工作日,成效的大小取决于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多少。(18) 由于缺少这样的协作,美国西部每年都要损失大量粮食,而在英国的统治已经破坏了旧的公社的东印度地区,每年都要损失大量棉花。(19)

(17) “如果问题是要完成一件复杂的劳动,那就必须同时做各种事情。一个人干这个,另一个人干那个,大家合起来将会取得一个[人]的努力所根本不能达到的结果。一人划船,另一人掌舵,第三人撒网或叉鱼,没有这种协力,捕鱼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 年巴黎版[第 78 页])

(18) “在紧要关头完成它们(农业劳动)是头等重要的事情。”(〔约·阿巴西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在农业上没有比时间因素更重要的因素了。”(李比希《农业的理论与实践》1856 年版第 23 页)

(19) “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也许中国和英国除外)都多的国家里,竟发生了另一种祸害: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很大一部分棉花无人收摘。另外一部分棉花在收摘时已经失去色泽和腐烂。由于在适当的季节缺少劳动者,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很大一部分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孟加拉公报。大陆新闻摘要双月刊》1861 年 7 月 22 日)

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某些事业例如排水、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从这一角度来看就需要协作。另一方面，协作在发展生产规模的同时也可以缩小劳动过程进行的空间。这种双重作用，节约非生产费用方面的非常有效的杠杆，仅仅是由于劳动者的集结、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操作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²⁰⁾

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为取得预期效果所必要的时间。不论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率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竞争心和使他们的精力振奋，是由于使许多工人的同种作业具有多面性和连续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工具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共同的目标下按照一致的计划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²¹⁾

(20) “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 500 英亩土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也许还要多），现在集中在 100 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虽然“同所使用的资本量和劳动量相比，空间是缩小了，但是同从前单个独立生产者占有的或耕种的生产领域相比，生产领域却是扩大了。”（理·琼斯《地租》，1831 年伦敦版第 191、199 页）

(21) “单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这些很小的力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总力量，比这些部分力量的总和要大，因此单是力量的结合就能减少时间和扩大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空间。”（乔·里·卡尔利为彼·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加的注释，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 15 卷第 176 页）

一般来说,人们不结合在一起就不能共同劳动。他们集结在一起就是他们进行协作的条件。同一个资本,同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同时使用雇佣工人,也就是同时购买他们的劳动力,雇佣工人就不能进行协作。因此,在工人集合在生产过程中以前,这些劳动力的总价值或工人一天、一周等等的一定量工资总额,必须已经集合在资本家的口袋里。一次支付 300 工人的报酬,即使支付的只是一天的报酬,也比全年一周一周地支付少量工人的报酬需要更多的资本支出。因此,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可以预付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的量,也就是取决于每一个资本家在多大规模上拥有供许多工人用的生活资料。

可变资本的情形是这样,不变资本的情形也是这样。例如,一个雇用 300 个工人的资本家在原料上的支出,是 30 个各雇用 10 个工人的资本家中的每一个人的支出的 30 倍。虽然共同使用的劳动工具的价值和量不会同雇用的工人人数成比例地增加,但是它们的增加还是很显著的。因此,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之间一切协作的物质条件。

我们已经看到(见第十一章),价值或货币的总额要转化为资本,必须达到一定的最低限额,这个最低限额要能够使它的占有者可以

注)“集体劳动所达到的结果是个别劳动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因此,随着人口的增加,结合劳动的产品会大大超过按照人口增加计算的简单相加的总额……在机械技术中,正如在科学工作中一样,今天一个人在一天中所能做的事情会多于单独的一个人在一生中所做的事情。数学家的全体等于部分之和的定理在我们这里不再适用了。劳动是人类生存的伟大支柱,关于劳动我们可以说,积累的努力的产品会大大超过个别的、分散的努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迈·托·萨德勒《人口的规律》1830 年伦敦版)

雇用足够数量的工人,以便靠这些工人使自己摆脱体力劳动。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行会师傅和小雇主就不可能被资本家所取代,生产本身就不可能采取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性质。个人手中的资本的最低限额现在表现为完全不同的样子;它是个别的和分散的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和结合劳动所必需的财富的积聚;它是生产方式将发生变化的物质基础。

在资本的开始阶段,它对劳动的指挥具有纯粹形式的性质和几乎是偶然的性质。这时,工人之所以在资本的命令下劳动,只是因为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了资本;他之所以为资本劳动,只是因为他没有为自己进行劳动所需的物质资料。但是,一旦雇佣工人之间有了协作,资本的指挥就发展成为劳动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

一切已经达到相当大规模的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这种指挥必须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和构成生产总体的各独立部分的个别运动之间的差别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独奏的音乐家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指挥、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而这种职能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则取得了特殊的性质。

资本必须增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的刺激因素,巨大的原动力;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抽取剩余价值⁽²²⁾,

(22) “利润……是经营的唯一目的。”(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11页)

也就是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对资本家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在资本家手中，管理不仅是一种由协作劳动过程或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产生的特殊职能，而且显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是建立在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基础上的一种职能。

其次，随着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者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监督和检查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是否适当的必要性也增加了。⁽²³⁾

最后，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个别职能之间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表现为资本家的计划，而他们的集合体的统一在实践中表现为资本家的权威，一种使他们的活动服从资本家的目的的他人的意志力量。

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对象，一方面是协作生产过程，另一方面是抽取剩余价值的过程，——那么，这种管理形式就必然是专制的。随着协作的发

(23) 英国一家庸人报纸《旁观者》1866年5月26日报道，在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第一个明显的结果便是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坏账以外，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该报又发现罗奇代尔合作实验²⁰⁹的根本缺点是：“这些实验表明，工人组合能够有成效地经营和管理一切产业部门的商店、工厂，同时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劳动者的状况，但是！它们却没有给资本家留下明显的位置。”多么可怕啊！

展,这种专制的特有的形式也发展了。

资本家从脱离体力劳动开始。然后,当他的资本增大,因而他所雇用的集体力量随着资本的增大而增大时,他就解除了自己对工人和工人小组进行直接而细心的监督的职能并把这种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当他处于工业大军的领导地位时,他就需要军官(经理、管理人)和军士(监督员、视察员、工长)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经济学家在拿独立的农民或独立的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作比较时,把这种监督工作算做非生产费用。⁽²⁴⁾但是,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却把从协作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同以这同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对抗性质为基础的管理和监督职能混为一谈。⁽²⁵⁾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指挥权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指挥战争和作出裁判是地产的属性一样。⁽²⁶⁾

当工人就自己的劳动力出售价格同资本家进行争议时,他是自

(24) 凯尔恩斯教授在指出对劳动的监督是北美南方各州奴隶制生产的一个主要条件以后,继续说道:“因为农民所有者(北方的)得到他的土地的全部产品,所以用不着其他的劳动刺激。在这里完全不需要监督。”(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8、49页)

(25) 在分析各种生产方式的典型的社会区别时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指出:“为什么大制造业企业破坏个人工业呢?难道不是因为前者更接近于奴隶制度的单纯性吗?”(《政治经济学原理》法译本1789年巴黎版第1卷第308、309页)

(26) 因此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本可以像证明资本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同样出色和以同一一些理由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²¹⁰

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他只能出卖他所占有的东西,出卖他个人的劳动力。这种关系,绝不因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1个劳动力而是100个劳动力,或者说,他不是和1个工人而是和100个互不相干的工人签订合同,而有所变化。资本家无须让这100个工人协作就能使用他们。因此,他支付的是100个人中每个人的独立的劳动力,而不是100个结合劳动力。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集体劳动者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而且是资本把他们置于这些条件下,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因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雇佣工人只有当他的劳动属于资本时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

古代的亚洲人、埃及人、伊特鲁里亚人等等的庞大建筑²¹¹,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作用。

“在过去的时代,这些亚洲国家除了民用的和军事的开支以外,还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可以用于华丽的或实用的建筑。这些国家可以支配几乎全部非农业人口的劳动,而对这些剩余生活资料的唯一支配权又完全属于君主和祭司,所以它们有能力兴建那些遍布全国的宏伟纪念物……在移动巨大的雕像和庞大的重物方面,当时的搬运本领令人惊讶,在这方面恣意滥用的几乎全是人的劳动。光有劳动者的人数和他们的努力的集中就够了。我们看到巨大的珊瑚礁从海底升起形成岛屿和陆地,虽然对此作出贡献的每一个珊瑚虫是渺小的、微弱的、不足道的。亚洲任何一个君主国的非农业劳动者,除了自己个人的体

力以外,很少能贡献什么,但是他们的数量就是他们的力量。由于存在着指挥这些群众的专制力量,就产生出这些巨大的建筑。正是由于劳动者赖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里,才使这一类事业成为可能。”⁽²⁷⁾

亚洲和埃及的国王或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脑等等的这种权力,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到单个资本家或者通过合资公司、股份公司²¹²而结合起来的资本家手里。

在人类文明初期,在狩猎民族中⁽²⁸⁾、在印度公社的农业等等中,我们所看到的协作,是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也是以每一个个人像一个蜜蜂依附于蜂群一样依附于自己的氏族或公社这一事实为基础的。这两点使得这种协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一般以奴隶制为基础。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则以自由劳动者、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为前提。在历史上,它是同农民的小块地耕作和独立的手工业的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²⁹⁾对农民的小块地耕作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不是表现为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形式,而协作本身倒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

(27) 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77、78页。欧洲各国的博物馆所搜集的古亚述、埃及等等的文物,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见证。

(28) 兰盖在他的著作《民法论》中把狩猎称为最初的协作形式,而把对人的狩猎(战争)称为最初的狩猎形式之一,这也许不是不对的。

(29) 小块地耕作和独立的手工业,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经营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共同体²¹³在其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正如协作发挥的集体的劳动力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方式。这是劳动过程由于从属于资本而经历的第一个转化的阶段。这种转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转化的基础,即在同一工场中同时雇用一定数量的雇佣工人,是同资本的存在本身一起出现的,是促使封建生产肌体瓦解的那些情况和运动的历史结果。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孤立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在资本手中,劳动的这种社会化之所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只是为了从这种劳动中剥削更多的利润。

在上面所考察的协作的基本形式中,协作是同大规模的生产相适应的。从这方面来看,这种协作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任何特殊时代的特点。它只是仍然保持手工业性质的初期工场手工业⁽³⁰⁾以及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适应的、仅仅在规模上而不是在方法上同小农业有区别的大农业的特点。简单协作今天在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生产部门,仍然是占统治的形式。

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方式。协作的初级形式包含着更复杂的形式的萌芽,因此,它不仅表现为这些复杂形式的要素之一,而且还作为特殊方式与这些复杂形式并存。

(30) “难道把许多人的技巧、勤劳和竞争心结合在同一个工作中不是使这一工作获得成功的办法吗?英国难道能用其他方法使自己的羊毛工场手工业达到这样完善的程度吗?”(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伦敦版第56页第521节)

第十四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1. 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以分工为基础的这种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 16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末叶。

工场手工业有双重的起源。

工场可以把不同种行业的手工业者联合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之下，产品必须经过这些手工业者之手才能最后制成。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锁匠、皮革匠、旋工、饰条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劳动的集体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同时协力地进行劳动。当然，一辆马车在制成以前是不能描金的。但是，如果同时制造许多辆马车，那么，当一部分马车正经历其他生产过程时，另一部分马车就可以不断地交给描金匠加工。到此为止，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专门从事马车制造的裁缝、皮革匠、

锁匠等等,逐渐地失去了全面地从事他们的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现在局限于一种特殊活动的技能,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起初,马车工场手工业是作为独立手工业的结合出现的。以后,马车生产逐渐地分成了各种特殊的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都结晶为一个劳动者的专门职能,全部操作由这些局部劳动者联合体来完成。同样,织物工场手工业以及一系列其他工场手工业,也是由不同的手工业集结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而产生的。(31)

但是,工场手工业也可能以完全相反的方式产生。许多制造同一个物品例如纸、铅字、针等等的工人,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这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每个这样的工人(可能带一两个帮工)都制造整个商品,顺序地完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仍然按照原有的方式进行劳动。但是外部情况很快促使人们按照另一种方式来利用集中在同一个场所的工人和他们同时进行的劳动。例如,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提供大量完成的商品这种情况,就是如此。于是劳动有了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工人按照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特殊的工人,全部操作由协作者同时并列地进行。这种最初是偶然产生的

(31) 一个较近的例子:“里昂和尼姆的丝纺织业完全是宗法式的;它雇用许多妇女和儿童,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累坏或者使他们堕落。它让这些妇女和儿童在优美的德龙、瓦尔、伊泽尔、沃克吕兹河流域养蚕、缫丝。它从来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工厂生产。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 这里分工的原则有其特点。虽然那里有缫丝女工、拈丝工、染色工、浆纱工以及织工;不过他们并没有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并不从属于同一个雇主;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阿·布朗基《工业经济学教程》,阿·布莱斯编注,1838—1839年巴黎版第79页)自从布朗基写了这段话以来,不同的独立的工人已经有一部分联合在工厂里了。

分工一再重复,显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并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工人的个人产品,转化为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工人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一个德国的行会造纸匠要依次完成的、互相连接的那些操作,在荷兰的造纸手工工场里变成了一个协作团体的各个成员平行地进行的局部操作。纽伦堡的行会制针匠是英国制针手工工场的基本要素。但是纽伦堡的一个制针匠要依次完成也许 20 种操作,而在英国制针手工工场中,20 个工人中每一个人却只从事一种操作²¹⁴,后来,这 20 种操作根据经验又被进一步划分和孤立。

可见,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方式,它由手工业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把这些手工业分解和简化,直至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控制了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它把同种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操作,使之孤立和独立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每一种操作成为局部劳动者的专门职能。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一种手工业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各种分开的不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出发点如何,它的最终形态总是一样的:一个以人为肢体的生产机构。

为了正确地评价工场手工业的分工,重要的是要把握住以下两点。首先,在这里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特殊阶段是同手工业者的手工活动分成各种不同手工操作完全一致的。不管操作是复杂还是简单,它仍然取决于工人使用工具时手的力量、熟练、速度和准确。手工业仍旧是基础。这种技术基础只允许在很狭隘的界限内分解操作。劳动对象所经过的每一个局部过程都必须能够作为手工劳动来

完成,而这个局部过程本身可以说又是一种独立的手工业。

正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旧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所以每一个工人终身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

第二,工场手工业分工是特殊种类的协作,它的优越性很多都是由协作的一般性质产生的,而不是由协作的这种特殊形式产生的。

2. 局部劳动者及其工具

现在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首先很清楚,局部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他终身所完成的这种唯一的简单操作的自动的专门器官,因而他花费的时间少于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集体劳动者,完全是由这些局部劳动者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工场手工业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它提高了劳动生产力。⁽³²⁾不仅如此,一当局部劳动成为专门的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如果不断地重复简单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生活和劳动,所以,这样获得的技术工艺,即人们所谓的手工业者的诀窍就能积累并传下去。⁽³³⁾工场手工

(32) “一种工场手工业越是分得细,它的所有各个部分操作越是分给不同的手工业者去完成,工作就完成得越好、越快,时间和劳动的损失就越少。”(《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第71页)

(33) “容易的劳动是留传下来的技能。”(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48页)

业再生产出它在中世纪城市里所遇到的那种手工业的分立,并把它发展到极端,从而生产出局部劳动者的技艺。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的倾向是把局部劳动转化为一个人终生的唯一职业,这符合以前社会的如下倾向:使手工业变成世袭职业,使它固定为种姓,或当特殊的历史条件产生与种姓制度不能相容的个人变化时,至少使它硬化为各种不同产业部门的行会。种姓和行会由以产生的自然规律,就是调节动植物分化为种和亚种的那个自然规律。不同的只是,在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时,种姓的世袭性和行会的排他性会当做社会法令来颁布。(34)

“达卡的麦斯林的薄纱的精细,科罗曼德尔的花布及其他布匹的色彩的华丽和耐久,始终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它们的生产并没有依靠资本、机器和分工或者任何一种使欧洲制造业获得很多益处的手段。织工是单独的个人,他是根据顾客的订货织布的。他使用的织机的结构非常简单,有时候只是用些木棍草草搭成的。这种织机甚至没有卷经线的装置,因此机身必须全部伸展开来,这样它就很笨重,很长,无法放在生产者的小屋中,因此生产者必须在露天劳动,一遇到坏天气,就只好停工。”(35)

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

(34) “手艺……在埃及也达到了很高的完善的程度。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里,手工业者根本不容许过问另一个市民阶级的事情,他只能从事本族依法应当世袭的职业。我们在其他民族中看到,手工业者把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过多的事情上。他们有时种地,有时经商,有时同时从事两三种手艺。在自由国家,他们通常都要出席民众大会。与此相反,在埃及,一个手工业者如果参与国事或同时从事几种手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劳动者专心从事自己的职业。此外,他们虽然继承了祖先的许多手艺,但仍然热衷于寻找新的改进。”(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1卷第74章)

(35) 休·默里、詹姆斯·威尔逊等著《英属印度古今历史概述》1832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449[、450]页。印度织机的经纱是垂直张开的。

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但是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劳动相比,一个印度织工的劳动是极复杂的劳动。

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流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业者整天不断地从事同一种操作,这些空隙就会缩小,或者说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是由于增加了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是提高了劳动强度,或者是由于减少了劳动力的非生产耗费。就是说,每次由静止到运动所需要的力量的额外消耗,为已经达到的正常速度在较长时间的持续所补偿。另一方面,不断从事单调的劳动,会妨碍精力的发挥和紧张程度,因为精力是在活动的变换中得到休息并显示出魅力的。

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工人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同类的工具,例如钻具、切削工具、凿具和锤具等,用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而同一种工具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又用于不同的操作。但是,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合适的因而是专门的形式,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是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给局部劳动带来的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于是,同种工具就失去了它们的共同形式。工具越来越细分为不同的种类,其中每一种具有适合于一种唯一用途的固定形式,而且只有在专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劳动工具的这种分化和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在伯明翰,人们生产出约 300 种锤,其中每一种锤只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分离的和专门的职

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³⁶⁾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应用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

局部劳动者及其工具构成工场手工业的简单要素。现在我们来考察工场手工业的整个机构。

3. 工场手工业的整个机构。它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系列的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有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形式虽然有时交错在一起,但仍然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类别,在工场手工业后来转化为使用机器的大工业时,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二重性起源于产品的性质。产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装配而成,或者是依次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

例如,机车是由5 000多个完全不同的部件组成的。但是它不能算做第一类真正工场手工业的样品,因为它是大工业的产物。钟表则不同,威廉·配第就已经用它来说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²¹⁵钟

(36) 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时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往往会发生变异,其原因也许在于:自然在这种场合并不如在这个器官只有一个职能时那样小心地预防每一个细小的与其原有形态的偏离。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可保持同样的形状而不会有什么不方便之处;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

表最初是纽伦堡手工业者的个人制品²¹⁶，后来转化为无数劳动者的社会产品。这些劳动者是：发条工、字盘工、游丝工、钻石工、棘轮掣子工、指针工、表壳工、螺丝工、镀金工。还有许多小类，例如制轮工（又分黄铜轮工和钢轮工）、韶轮工、上弦拨针机构工、装轮工（把各种轮安到轴上，并把它们抛光）、轴颈工、齿轮安装工（把各种齿轮和韶轮安装到机心中去）、切齿工（切轮齿，扩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纵机构工、摆轮工、擒纵调速器安装工、条合和棘爪安装工（发条匣的最后完成者）、钢抛光工、齿轮抛光工、螺丝抛光工、描字工、制盘工（把搪瓷涂到铜上）、表壳环制造工、装销钉工、表壳弹簧制造工、雕刻工、雕镂工、表壳抛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装配全表使其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装配工。只有钟表的少数几个零件要经过不同的人的手，所有这些分散的肢体⁷⁷只是在最终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机械整体的人的手中才第一次集合在一起。在这里，同在其他类似的制品上一样，成品和它的各种不同的要素的外在关系，使局部工人在同一个工场中的结合成为一种偶然的事情。局部劳动本身又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手工业进行，如在瓦特州和纳沙泰尔州就是这样；在日内瓦则有大钟表手工工场，也就是说，那里局部工人在一个资本指挥下进行直接的协作。但即使在日内瓦，指针盘、发条和表壳也很少是在手工工场内制造的。在这里，工场手工业生产，只有在例外的情形下才是有利的，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因为生产分为许多异质的过程，使人们不大可能共同使用劳动资料，还因为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的费用。⁽³⁷⁾

〔37〕 1854年日内瓦生产了8万只钟表，还不及纳沙泰尔州钟表产量的五分之一。仅在绍德封，在这个可以看作一家钟表手工工场的城市，每年的产量就比日内瓦高一倍。1850年至1861年，日内瓦提供了72万只钟表。见《女王

应该指出,这些在家里为一个资本家(工厂主、企业主)劳动的局部工人的地位,也是和为自己的顾客劳动的独立手工业者的地位完全不同的。(38)

第二类工场手工业,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它生产的产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例如,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要经过 72 个甚至 92 个工人之手,其中没有两个人是完成同一种操作的。

由于这种工场手工业把原来独立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它就缩短了各个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产品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同样,搬运劳动也减少了。(39) 这样,同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这种提高是由工场手工业的协作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要求不同的操作孤立起来,彼此互相独立。既然各个孤立的职能之间要建立和保持整体联系,劳动对象就得不断地从一个工人那里转到另一个工人那里,由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同机器工业相比,这种非生产费用的根源

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3 年第 6 号中《日内瓦钟表业的报告》。如果那些只是装配而成的制品的生产分为许多互不联系的特殊操作,本身很难使这类手工工场转化为大机器工业,那么在我们的例子即钟表生产中还有两种新的障碍:钟表的零件小巧精细,而且钟表是奢侈品,式样繁多,因此,例如伦敦最好的钟表公司,一年中生产的钟表未必有一打是相似的。采用机器卓有成效的瓦什隆—康斯坦丁钟表工厂,在大小和式样上至多也只生产三四个品种。

(38) 从钟表制造业这种混成工场手工业的典型例子,我们可以十分精确地研究上面提到的现象,即劳动工具的这种分化和专门化。

(39) “在人们彼此之间如此靠近的情形下,各种不同操作之间损失的时间必然会更少。”(《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 年伦敦版第 106 页)

是工场手工业的缺点之一。⁽⁴⁰⁾

劳动对象,例如造纸手工工场的破布或者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在获得自己的最后形态之前,要依次经过一系列操作。但是我们从作为总机构的手工工场可以看到,劳动对象是同时处在它的所有的发展阶段上的。一千只手都握有各种不同工具的集体劳动者布里亚雷^①同时切断针条、制作针头、磨尖、制作连接扣等等。各种不同的互相联系的操作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转化为空间上的同时进行,这种结合使得有可能大大增加一定时间内提供的商品量⁽⁴¹⁾。

虽然这种同时性是由劳动的协作形式产生的,但是工场手工业并没有停留在协作的先前存在的条件上,它通过把手工业的活动加以分解而创造出了新的协作条件。工场手工业只是在把工人永久固定在一种局部操作上时才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每个局部劳动者的局部产品同时只是成品的特殊的发展阶段,所以,一个工人或一组工人是给另一个工人或另一组工人提供原料。一个工人的劳动结果,成了另一个工人劳动的起点。在每一局部过程中,取得预期效果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根据经验确定的,工场手工业总机构只是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取得一定的结果这个条件下

(40) “工场手工业中各种不同劳动的分立,是使用手工劳动的必然结果,它大大增加了生产费用;因为主要的损失是从一个劳动过程到另一个过程的转移所使用的时间造成的。”(《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200页)

(41) “分工把工作分成各个可以同时进行的部分,也就节省了时间……由于单独的个人必须分别完成的各种不同的操作的同时进行,就有可能例如在从前切断或磨尖一枚针的时间内制造出许多枚针。”(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讲义》1855年爱丁堡版第319页)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有100个手臂和50个脑袋。——编者注

才发挥作用。只有这样,互相补充的不同劳动才能并存地、同时地、不间断地进行下去。很明显,各种劳动因而各个劳动者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互相依赖,迫使每个人在自己的职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时间,因此这里形成了在独立手工业中,甚至在简单协作中都没有的连续性、规则性、划一性,特别是劳动强度。⁽⁴²⁾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中表现为竞争的结果,因为肤浅地说,每一个个别生产者都必须按商品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而在工场手工业中,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⁴³⁾

但是,不同的操作需要不等的时间,因此在相等的时间内会提供不等量的局部产品。因此,要使同一个工人每天总是只从事同一种操作,不同的操作就必须使用不同比例数的工人。例如在活字铸造业中的比例是4个铸工、2个分切工和一个磨字工;一个铸工每小时能铸2 000个字,一个分切工能截开4 000个字,一个磨字工能磨8 000个字。²¹⁷在这里,又再现了最简单形式的协作原则:同时雇用一定数量工人从事同种工作;但现在这个原则表现为一种有机关系。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集体劳动者的不同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规定这些器官的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的相对人数或工人小组的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

(42) “每种工场手工业内手工业工人的种类越多……每种工作就越有秩序和规律;完成每种工作的时间必然较短,劳动也就必然减少。”(《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68页)

(43) 但是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在许多部门中只是不完善地达到这种结果,因为它不能可靠地控制生产过程的一般的化学条件和物理条件。

如果各个不同的局部劳动者小组之间的最合适的比例数，已由经验为一定的生产规模确定下来，那么，只有使每个特殊劳动者小组按倍数增加，才能扩大这个生产规模。⁽⁴⁴⁾此外，某些工作，不管规模大些或小些，都可以由同一个人来做。例如，监督的工作，把局部产品由一个生产阶段运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的工作等等，就是如此。因此，使这些职能独立，或者把它们交给特殊工人，只有在增加工场人员的情况下，才是有利的，但是这种增加必须在所有小组中按比例实行。

如果单独的小组是由同质的要素组成的，是由在同一局部职能上使用的工人组成的，那么它就构成总机构的一个特殊器官。但在某些手工工场，这种小组就是一个完全组织好了的集体劳动者，而总机构无非是由这些基本的生产有机体的重复或倍加形成。拿制瓶手工工场为例。这种工场分为三个本质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预备阶段：调制玻璃的配料，把石灰、砂等等混合在一起，并把这种混合物熔化为玻璃液。⁽⁴⁵⁾在这个第一阶段，同是把瓶从焙烧炉中取出、分类、包装等等的最后阶段一样，都使用了不同的局部工人。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是真正的玻璃生产即对玻璃液的加工。在玻璃炉的每一个炉口旁都有一个小组在工作。这种小组在英国叫做“炉口”，它由

(44) “既然经验根据每种工场手工业的产品的特殊性质，既表明了把生产分为多少局部操作最为有利，也表明了每一操作所必要的劳动者人数，那么一切不依照此数的准确倍数使用劳动者的企业，其生产就不那么经济……这就是某些工业企业规模巨大的原因之一。”（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2年伦敦第2版第22章）

(45) 在英国，熔炉是和对玻璃加工的玻璃炉分开的，但在比利时，同一个炉却用于两种操作。

一个制瓶工或精制工、一个吹气工、一个收集工、一个堆积工或研磨工和一个搬入工组成。这五个工人形成一个集体劳动力的五个不同器官。这个集体劳动力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即只有通过五个人的直接协作才能起作用。如果这个躯体少了一个成员，它就瘫痪了。同一个玻璃炉有好几个炉口，在英国有4—6个炉口，每个炉口都有一个盛玻璃液的土制坩埚，并且有一个同样由五个工人组成的小组。在这里，每个组的组织都以分工为基础，而各个同类小组之间的联系则是一种简单的协作，在这种协作下，生产资料之一即玻璃炉由于共同使用而得到更经济的利用。这种有4—6个小组的玻璃炉，构成一个小作坊；而一个玻璃手工工场有若干这样的作坊，还有生产的准备阶段和最后阶段所需的工人和原料。

最后，正如工场手工业部分地由不同手工业结合而成一样，工场手工业又能发展为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例如，英国的一定规模的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土制坩埚，因为产品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坩埚的质量。在这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反过来，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产品当做原料的工场手工业，或者同那些后来把它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结成一体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例如，我们看到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场手工业同磨玻璃业和铸铜业（为各种玻璃制品镶嵌金属）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不同的结合的工场手工业成了一个总工场手工业的多少分离的部门，同时又是各有分工的、互不依赖的生产过程。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人们很快就承认，减少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

动时间是工场手工业的原则,而且非常明确地宣布了这个看法。⁽⁴⁶⁾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机器的使用也就间或发展起来,特别是某些大规模的、需要耗费巨大力量的简单的最初的劳动。例如,在造纸手工工场很快就采用了粉碎磨来磨碎破布,在冶金业很快就采用了所谓的捣碎磨来捣碎矿石。⁽⁴⁷⁾²¹⁸罗马帝国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种类的生产机器的基本形式留传下来。⁽⁴⁸⁾²¹⁹手工业时期留下了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自鸣钟这些伟大的发明。但总的来说,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机器在分工之旁起着次要的作用。⁽⁴⁹⁾机器在17世纪的间或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当时的大数学家们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的支点和刺激。

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构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集体

(46) 参看威·配第、约·贝勒斯、安·耶伦顿的著作,《东印度贸易的利益》一书以及杰·范德林特的著作。

(47) 16世纪末,法国还使用捣臼和筛子来碎矿和洗矿。

(48) 从面粉磨的历史可以逐步探究出机器的全部发展。在英国,工厂现在还叫做 mill(磨房)。在德国,我们在本世纪最初三十年间的工艺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这同一名称 mühle[磨]不仅指一切用自然力推动的机器,甚至也指一切使用机器装置的手工工场。在法语中, moulin[磨]一词最初用于谷物的碾磨,后来用于表示一切由外力推动、给物体以强大压力的机器:制造火药的磨碎机,制纸用的木材粉碎机,鞣料粉碎机,缩绒机、拈线机,锻铁机,铸币机等等。

(49) 读者在本书第四册¹¹中将会更详细地看到,关于分工,亚·斯密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原理。但是由于他很重视分工,他不愧是一位描述工场手工业时期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机器只起了从属作用,这种说法在大工业初期遭到罗德戴尔的反驳,在往后的发展时期又遭到尤尔的反驳。亚·斯密还把大部分由工场手工业工人引起的工具的分化同机器的发明混为一谈。在机器的发明中,起作用的不是工场手工业工人,而是学者、手工业者甚至农民(如布林德利)等。²²⁰

劳动者。一种商品的生产者顺序地完成的、融合成他的劳动总体的各种操作,可以说要求商品生产者多才多艺。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须比较灵巧;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第三种操作中,他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个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备这些素质。在各种操作分离、孤立和独立之后,工人就按照每个人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建立,就会使只适宜于从事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发展起来。现在集体劳动者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只是使自己的所有器官个体化而成为特殊的劳动者或劳动者小组,让他们担任最适合这些器官的特性的职能。⁽⁵⁰⁾局部劳动者作为集体劳动者的一个肢体,他越是片面和不完全,他就越是完美无缺。⁽⁵¹⁾仅仅从事一种职能的习惯,使他转化为完成这种职能的准确无误的、自动的器官,而总机构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动作。⁽⁵²⁾因为集体劳动者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所以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也必须比较简单或比较复杂;从而必须具有

(50) “因为把工作分成许多不同的操作,其中每种操作都需要不同程度的体力和技能,所以手工工场主能够按照每种操作所需要的数量来购买技能和体力。如果全部工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那么同一个工人就必须有足够的技能来完成最细致的操作,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最繁重的操作。”(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2年伦敦第2版第19章)

(51) 例如,他的肌肉片面发展,他的骨骼畸形和弯曲等等。

(52) 一个玻璃手工工场的总经理威·马歇尔先生对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提出的“你们如何能使你们雇用的少年工人始终积极劳动?”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回答:“他们不可能忽略自己的工作;他们一开始干,就得干下去;他们只是一台机器的各个部分。”(《童工调查委员会。1865年第4号报告》第247页)

不同的价值。这样,工场手工业就创造出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工资的等级制度。如果单个劳动者只适应于一种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那么,不同的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和专业构成的等级制度。⁽⁵³⁾然而,每一个生产过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胜任的操作。现在,这一类操作断绝了同整个活动中比较重要的要素的流动的联系,硬化为专门职能。因此,工场手工业在它掌握的每种手工业中,造成了一类完全没有技术的工人,这些工人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无情地排斥的。如果说工场手工业靠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使独立的专长发展成技艺,那么它也创造出一种没有任何发展的专长。与等级制度的阶梯相并列,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后者说来完全不需要学习费用,而对前者说来,学习费用比手工业者要低。在这两种场合,劳动力的价值都降低了。⁽⁵⁴⁾但是,劳动过程的分解有时会产生出一些在手工业生产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很小作用的一般职能。由学习费用的减少或消失所引起的劳动力的相对贬值,会直接增加资本得到的剩余价值,因为凡是缩短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时间的事情,实际上都会扩大剩余劳动的领域。

(53) 尤尔博士在颂扬大工业时,比那些不像他那样有论战兴趣的前辈经济学家,甚至比他的同时代人,如拜比吉(他作为数学家和力学家虽然比尤尔高明,但他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观点去理解大工业的),更加突出了工场手工业的特点。尤尔说得好:“使劳动者适应于一种单独的操作是分工的实质。”他认为,这种分工是使“劳动适合于不同的个人才能”,最后,他把整个工场手工业制度说成是一种等级制度,是按不同熟练程度实行的分工。(散见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1卷第28—35页)

(54) “每一个手工业者通过在单项操作上的实践使自己日臻完善……成为更廉价的工人。”(同上,第28页)

4. 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 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我们已经看到,工场手工业是怎样从协作产生的;接着研究了它的简单要素即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最后考察了它的总机构。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

如果仅限于考察劳动本身,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工业、农业等大门,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大的生产部门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55)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领域或职业内的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在家庭内部,在扩大的家庭即氏族内部,由于年龄和性别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共同体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基础也扩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谈到,

(55) “分工开始于各种极其不同的职业的分离,一直发展到有许多劳动者来制造同一件产品,如在手工工场里那样。”(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1卷第173页)“在有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中,我们看到三种分工:第一种我们称之为一般的分工,它使生产者分为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这是与国民劳动的三个主要部门相适应的;第二种可以叫做特殊的分工,是每个劳动部门分为许多种……最后,第三种分工可以叫做分职或真正的分工,它发生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在大多数手工工场和作坊都有这种分工。”(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39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84、85页)

商品交换首先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共同体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因为在文明的初期，完全独立地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一经确立，它们各自的产品交换也就很快发展起来，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从而使它们转化为多少依赖于社会总生产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互不依赖的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相反，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离和解体，——这主要是同其他共同体的交换推动的，——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交换它们的产品才能保持联系。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⁵⁶⁾可以说，社会的经济史，都是在这种对立的运动中前进的。但是关于这种对立，我们不在这里多谈。

一定量同时使用的工人，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物质基础，同样，一定的人口数量和一定的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这种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工场内的密集。⁽⁵⁷⁾但是人口密度是一

(56)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最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的著作比《国富论》早出版 10 年，但是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它。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马尔萨斯的崇拜者甚至不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第一版，除了纯粹夸夸其谈的部分以外，只是抄袭斯图亚特以及华莱士和唐森的著作。

(57) “社会的交往，和劳动产品赖以增加的那种力量结合，都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 年伦敦版第 50 页）“当劳动者人数增加时，社会生产力便按工人人数的增加乘以分工的效果的复比例而增长。”（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 年伦敦版第 120 页）

种相对的东西。一个人口比较稀疏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⁵⁸⁾工场手工业分工只是在社会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时才产生,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反过来又会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这些工具的制造也日益分成不同的行业。⁽⁵⁹⁾

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到目前为止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这些行业就会立即分离并变成独立的行业。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被引进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其他的阶段就立即构成同数的不同行业。前面已经指出,在最终产品只是由异质的局部产品纯粹装配成的地方,生产这些局部产品的各种不同的局部劳动又可以分离并成为独立的手工业。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又分成不同的大部分是崭新的工场手工业。例如,18世纪上半叶,单在法国就织出了100多种不同的丝织品;例如,在阿维尼翁,法律曾规定“每个学徒始终只能从事一种制造业,学习一种织物的制造方法”。²²²把特殊生产部门固定在一个国家的特殊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

(58) 1861年以来,由于棉花需要量大增²²¹,印度某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靠缩小稻米的生产来扩大棉花的生产。结果是在国家的很大部分地区发生了饥荒,因为缺乏交通工具,使一个地区稻米的不足不能很快地由另一地区的供应来弥补。

(59) 例如,早在17世纪,织机梭的制造在荷兰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业部门。

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⁶⁰⁾最后,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殖民制度(它们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般存在条件的组成部分),为工场手工业时期提供了在社会内部进行分工的丰富材料。在这里,我们不去进一步论证,这种分工为什么不仅侵入经济领域,而且还侵入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到处引入专业化的发展,人的细分,以致亚·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曾经叫喊说:“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⁶¹⁾。

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在一种内在联系把不同的生产部门连接起来的地方,这种相似点无可争辩地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牧人生产毛皮,皮匠把毛皮转化为皮革,鞋匠把皮革变成皮靴。在这里,每个人所提供的是一种中间制品,而最后的完成的形态是他们的特殊劳动的集体产品。此外,还有供给牧人、皮匠和鞋匠以工具等等的各种劳动部门。人们很容易像亚·斯密那样,认为这种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区别只是主观的,也就是说,观察者在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场合一眼就可以同时看到各种各样局部劳动,而在社会分工的场合,各种局部劳动分散在广大的面上,每种特殊劳动都雇用大量的工人,因而使观察

(60) “英国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不是分成不同的部门,每一个部门固定在特殊地方,在那里只是或主要是生产一种东西:萨默塞特郡生产细呢,约克郡生产粗呢,埃克塞特生产双幅呢,萨德伯里生产细哔叽,诺里奇生产绉纱,肯德耳生产半毛织品,惠特尼生产毛毯如此等等。”(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伦敦版第56页第520节)

(61) 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67年爱丁堡版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5页]。

者不可能了解到这些局部劳动的全部联系。⁽⁶²⁾但是,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各自的产品都是商品。反过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局部劳动者不生产商品。⁽⁶³⁾转化为商品的只是他们的集体产品。⁽⁶⁴⁾社会内部的各种独立劳动的中介是它们的产品的买和卖;工场手工业内

(62)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所使用的工人总数必然不是很多,各个不同劳动部门所使用的工人往往可以聚集在一个工场内,观察者一眼就可看到。相反地,在那些目的在于为广大居民提供消费品的大工场手工业(!)中,各个劳动部门使用的工人如此之多,以致不可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工场内……分工就没有这样显眼,因而就不能被清楚地看到”(亚·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1章)。同一章有一段著名的话,开头是:“请看一看文明昌盛的国家最普通的手工业者或短工获得的财产”等等,接着列举了无数的行业,如果没有这些行业的协助,那么,“在文明国家,一个最下层的个人也不能有衣服和家具”。这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的注释(1705年第1版没有注释,1714年版附有注释)。

(63) “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劳动者只生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西劳动者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25页)这部出色著作的作者,就是前面引证过的托·霍吉斯金。

(64) 这一点在美国人那里已经得到了独特的证明。美国南北战争⁷时期,在华盛顿人们想出了许多新捐税,其中一种是对工业产品征收6%的税。人们问道:什么是工业产品呢?贤明的立法者回答说:一物“当它制成的时候,它就成了产品;当它准备出卖的时候,就是制成了。”从上千的事例中举一个例子来说。在纽约和费城的制造雨伞以及阳伞的手工业工场中,这些制品最初是作为一个整体制造出来的,虽然在实际上只是由完全异质的东西构成的混合物。后来,伞的各种不同组成部分成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同样多种的专门制造业的产品,也就是说,分工从它原来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变成了社会分工。因此,各种不同局部劳动的产品现在成了同样多种的商品进入制造雨伞以及阳伞的手工业工场,

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全部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集体劳动力来使用为条件。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在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

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必须满足一种特定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接成一个自发地形成它们彼此之间的比例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中,先是由实践而后是由思索确定的比例数,作为规则支配着从事每一种特殊职能的工人人数;在社会分工中,这个比例数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隐蔽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式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它为自己开辟道路并通过灾难来克服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

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变成了属于资本家的一个机构的单纯肢体;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在那里仅仅是被装配为一个整体。美国人把这种物品称为集合品,作为税的集合点,这种物品理应这样称呼。伞首先支付作为商品进入它的制作的每个部分的价格的6%的税,然后又支付它本身的总价格的6%的税。

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斗²²³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对工场手工业分工、劳动者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以及劳动者消极地服从资本赞扬备至,只要有人谈论生产过程的社会监督和社会调节,它就会大叫一声,昏厥过去!它把任何这一类企图都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权和独创性的权利。于是,这些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尖声叫喊说:“你们是否想把社会转化为一座工厂?”工厂制度只是对无产者才有好处!

如果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特点是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那么反过来我们又会在职业的分化自然地发展起来、随后固定下来、最后由法律加以认可的早期社会中,看到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在那些社会中还完全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⁶⁵⁾

例如,那些一直可以追溯到最遥远的时代而目前还部分地保存着的小的印度公社²⁰,就是建立在土地共同占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以及固定分工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分工在组成新公社时成为计划和略图。这种公社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它们的生产面积从一百英亩至几千英亩不等。产品的最大部分用于公社的直接消费,而不是商品,因此,生产同整个印度社会由交换引起的分工毫无

(65)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确立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30、131页²²⁴)

关系。只有产品的剩余部分才转化为商品,而且首先到了国家手中,从远古以来就有一定量的产品作为实物地租归国家所有。这些公社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形式。形式最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产品分配给公社成员,而每个家庭则从事家庭劳动,如纺纱、织布等等。除了这些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账员,登记农业账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项;第三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护送到另一村庄;一个边防人员,防止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师的资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银匠,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银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员。这十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负担。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公社。因此,整个公社是建立在系统的分工基础上的,但是它不可能是工场手工业意义上的分工,因为对铁匠、木匠等等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⁶⁶⁾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而每一个手工业者在他的家里,在他的工场内按照传统方式完成他职业范围内的一切操作,但是他是独立的,不承认任何权威。这些公社自给自足,

(66) 马克·威尔克斯中校《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1810—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118—120页。在乔治·坎伯尔所著《现代印度》1852年伦敦版中,可以看到对印度公社各种形式的出色描写。²²⁵

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⁶⁷⁾,这种公社的生产机体的简单性,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亚洲社会不发生变化的钥匙。这种不变性同亚洲各国的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激烈的改朝换代形成十分奇特的对照。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任何风暴所触动。

中世纪的行会规章通过严格限制一个行会师傅所能雇用的帮工的最高人数,有计划地阻止了行会师傅转化为资本家。此外,行会师傅只能在他自己的那个手工业中雇用帮工。同时,行会竭力抵制商人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唯一自由的资本形式的任何侵入。商人可以购买除劳动以外的任何商品。他只许充当产品的订购人。如果由于外部情况而必须进一步分工,现存的行会就分为几个亚种,或者在原有行会之外建立新的行会,但是各种手工业并不联合在一个工场内。因此,虽然行会组织造成的手工业的孤立和完善是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存在条件,但行会组织排斥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总的说来,劳动者和他的生产资料还是互相结合的,就像蜗牛和它的甲壳互相结合一样。因此,工场手工业的起码基础,也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形式还不具备。

社会分工,不论是否有商品交换,是极其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

(67) “从远古以来国内居民就在这种简单形式下……生活。各个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有时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而受到侵害,但是同一名称,同一边界,同一利益,甚至同一家族,会维持几百年之久。居民对王国的崩溃或分裂毫不在意;只要村社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权力转到谁的手里;他们的内部经济不会有丝毫变化。”(前爪哇副总督托·斯坦福·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

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

5. 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人数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也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但是,工场手工业所要求的分工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不断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需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

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不仅要增加工人人数,而且只能按倍数来增加,也就是说,按固定的比例一起增加工场所有各个小组的人数。其次,随着资本的可变部分的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即用在工具、用具、厂房等等上的预付,特别是用在原料(所需要的原料量的增加会比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快得多)上的预付也必须增加。劳动生产力越是由于分工而提高,劳动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越大。因此,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所强制的一个规律。⁽⁶⁸⁾

(68) “新的操作的细分所必需的资本现成地存在于社会中是不够的;这个资本还必须在企业主手中积累到足够的数量,使他们能够经营大规模的生产……分工越发展,要固定使用同数劳动者,就需要把越来越多的资本花费在原料、工具等等上面。”(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50、251页)“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离一样。”(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34页²²⁴)

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并由局部工人作为其肢体的劳动体,属于资本家;它只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表现为是从资本产生出来的。

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不仅使劳动者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还在工人自己中间造成了等级的划分。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工场手工业人为地加速了劳动者的片面技巧的发展,牺牲了生产者的全部禀赋和本能,从而使劳动者畸形化,把他变成某种怪物,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国²²⁶人们为了得到公牛的毛皮和油脂而屠宰公牛一样。

不仅劳动被分割、再分割并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一种专门操作的自动的工具⁽⁶⁹⁾,这样,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说成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²²⁷就实现了。⁽⁷⁰⁾

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物质生产资料,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工人的劳动力不出卖,就得不到任何真正的利用。为了能发挥作用,它需要一种社会环境,而这种环境只有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⁷¹⁾正像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³³一样,

(69) 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把工场手工业工人叫做“用于局部劳动的活的自动机”(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讲义》1855年爱丁堡版第318页)。

(70) 珊瑚的每一个个体实际上都是全群的一个胃脏。但是这个胃脏供给整个共同体以养料,而不是像罗马贵族那样从整个共同体汲取养料。

(71) “精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技艺的工人可以到处工作和谋生,而另一种工人(工场手工业工人)只不过是一种附属物,他一离开自己的同事,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独立性,因此他不得不接受人们认为强加于他是适宜的那种规章。”(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1卷第204页)

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

正如未开化的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做他的个人机智来施展一样,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小规模地发挥的知识、智慧和意志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72) 工场手工业分工使生产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最后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劳动者面前代表集体劳动者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劳动者残缺不全,直至使他成为自身的一个部分,大工业则把科学变成一种独立的劳动生产力,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73)

在工场手工业中,集体劳动者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劳动者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可以说,从工场手工业的角度来看,完美无缺的标准就是可以不动脑子,所以,不用费脑子就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74)

(72) 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83年法文版第2卷第135、136页。
“一人之所得,可以是他人之所失。”

(73) “有知识的人和劳动者彼此分离得很远,科学在劳动者手中不是有利于他发展自身的生产力,却几乎到处都与工人相对立……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威·汤普森《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第274页)

(74) 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83年法文版第2卷第134、135页。

事实上,在18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75)

亚·斯密说:

“大多数人的智力,必然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发展起来。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既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智力,也没有机会展开自己的想象力……他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钝以后继续说:

“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它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的活动,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品德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76)

为了救治由于分工而造成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亚·斯密建议实施义务国民教育,建议谨慎地并采用顺势疗法来管理国民教育。亚·斯密著作的法文译者和评注者热·加尔涅——他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天定的元老院议员——始终一贯地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国民教育是同分工的规律相矛盾的;实施国民教育会

(75) 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48页。

(76) 亚·斯密《国富论》第5篇第1章第2项。亚·弗格森曾说明分工的有害后果。作为弗格森的学生,他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亚·斯密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开头就专门把分工歌颂了一番,只是顺便地提到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他的著作的最后一篇,他重述了弗格森的见解。关于弗格森、亚·斯密、勒蒙泰和萨伊在批评分工问题上的历史关系,我在《哲学的贫困》等等中已经把必须说的话都说了,同时我第一次提到工场手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22页及以下几页)

“消灭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像其他一切分工一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⁷⁷⁾,随着社会(他非常正确地使用了社会这个词来表示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它们的国家)的日益富裕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确定。像其他任何分工一样,这种分工是过去进步的结果和未来进步的原因……政府应当反对这种分工并阻止它的自然进程吗?政府应当用一部分国家收入来试图使两类力求分开和分立的劳动混淆和混合起来吗?”⁽⁷⁸⁾

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萎缩,同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但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大大加深了这种分裂,同时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从生命的根源上侵袭着个人,所以工场手工业时期也首先提供了工业病理学的概念和材料。⁽⁷⁹⁾

“一个人如果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处死,如果他不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谋杀。对劳动的分割就是对民众的谋杀。”⁽⁸⁰⁾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也就是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的无意识

(77) 弗格森就说过:“在这个一切都分离的时代,思维艺术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

(78) 热·加尔涅的译本第5卷第2—5页。

(79) 帕多瓦临床医学教授拉马志尼1700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77年该书译成法文,1841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第7部分。古典作家》。自然,大工业时期使他的关于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1858年巴黎版和《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以及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的《论人类的退化》1868年埃朗根版。在1854年,技艺和手工业协会²²⁸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确实是十分重要的。

(80) 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19页。黑格尔对于分工持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法哲学》一书中说:“所谓有教养的人,首先是指那些能够做别人所能做的一切事情的人。”²²⁹

的创造物。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十分广泛的基础,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意识的、有组织的形式。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如何根据经验,所以说是背着当事人获得最有利的形式,但后来又如何像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统保持这种形式,而且有时还能把这种形式保持一个世纪以上。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现代工场手工业(我不是指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或者如在大城市产生的服装工场手工业那样,找到了虽然分散但却是现成的材料,只需要把它们集合起来;或者,分工的原则非常容易得到应用,只需要使工人专门适应于手工业如装订业的各种不同操作中的一种操作。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一个星期的经验,就能找到每一种职能所必需的工人的比例数。(81)

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的分解和解体,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组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这个特殊的劳动组织会提高劳动生产力。

资本主义形式的分工,——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分工不可能采取别的形式,——无非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方法,或者说,靠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增加人们称之为国民财富的资本的收益。它靠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为资本家发展集体劳动力。它创造出保证

(81) 有一种天真的信念,认为资本家在分工方面先验地运用了天才。这种信念只是在如罗雪尔先生那样的德国教授中间还存在着,在罗雪尔看来,分工是从资本家的奥林波斯山诸神式的脑袋中现成地跳出来的,因此他以“各种各样的工资”来酬谢资本家²³⁰。实行分工的程度取决于钱袋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天才的大小。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的新条件。因此，它既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然的阶段，又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出现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整个的社会分工⁽⁸²⁾，把社会分工只看成是用较少的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古典古代的著作家不是着重量和交换价值的观点，而只注重质和使用价值。⁽⁸³⁾在他们看来，社会生产部门的分离产生的结果只能是：产品制造得更好，人的不同志趣和才能为自己选择到适宜的活动范围⁽⁸⁴⁾，因为，如果人们不能限制自己，就做不出任何重要的事情⁽⁸⁵⁾。因此，产品和生产者由于分工而得到改善。他

(82) 亚·斯密的前辈，如配第和《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匿名作者[亨·马丁]，比他更深刻地指出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

(83) 在现代著作家中，只有18世纪的某些著作家如贝卡里亚和詹姆斯·哈里斯在分工问题上的见解几乎同古人一样。贝卡里亚写道：“每一个人根据切身经验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总是把手和智慧用于同种劳动和产品，他就能比那些各自生产自己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人更容易、更多、更好地把产品制造出来……因此，为了公共的和私人的利益，人就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切扎雷·贝卡里亚《社会经济原理》，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11卷第28页）詹姆斯·哈里斯，即后来的马姆兹伯里伯爵，在对自己的《关于幸福的对话》1772年伦敦版²³¹的一个附注中说道：“我用来证明社会是一种（建立在分工和分职的基础上的）自然物的全部论证都取自柏拉图《理想国》第二册”。

(84) 例如，《奥德赛》第14卷第228行：“不同的人喜欢从事不同的工作。”阿基洛库斯说过：“每个人都从事自己的工作，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满意。”²³²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

(85) “同时做许多事，什么也做不成。”²³³——雅典人作为商品生产者，感到自己比斯巴达人高明，因为后者在战时虽然会支配人，但不会支配钱。按照修昔的底斯的记载，伯里克利在号召雅典人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演说中说道：“自给自足的人宁可用自己的身体而不愿用钱来进行战争。”（修昔的底斯

们偶尔也提到产品数量的增加,但他们看到的只是使用价值即有用物品的更加丰富,而不是交换价值或商品价格的下降。柏拉图⁽⁸⁶⁾同色诺芬⁽⁸⁷⁾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前者认为分工是社会分为阶级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册第141篇)虽然如此,甚至在物质生产上,雅典人的理想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能力,因为“分工产生福利,但是自给自足还产生独立”。在这里应该注意到,在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²³⁴,没有地产的雅典人还不到5000人。

(86) 柏拉图从个人需要的多面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来说明共同体内部的分工。他的主要论点是:工人应当适应工作的要求,而不是工作应当适应工人的要求,如果工人同时从事好几种手艺,他就必然会顾此失彼。(《理想国》,拜特、奥雷利等人编,第2版第2篇)在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册第142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同其他任何一种行业一样,航海业是一种技艺,它不能当做副业来做;反过来,也不能在从事航海业的时候再做其他的职业。”柏拉图说,如果工作必须等待工人,那么生产的紧要时机往往就会被错过,产品就会被糟蹋。²³⁵在英国漂白业主反对工厂法规定全体工人在一定时间吃饭的抗议书中,又可以见到柏拉图的这个思想。他们的生产不能迁就工人,因为“加热、漂白、压平或染色等操作,中断一定的时间就会造成损失。规定全体工人在同一时间吃饭,有时会使贵重的产品因劳动过程未完成而遭受损坏。”哪儿没有柏拉图主义呀!

(87) 色诺芬说,得到波斯国王餐桌上的食物不仅十分光荣,而且这些食物比别的食物更可口得多。“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如同手艺一般在大城市里特别完善一样,伟大的国王的食物也是以完全特殊的方式制作的。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门、犁、床、桌子;常常还要造房子,如果这样就能足以维持他的生活,他就很满意了。一个从事这么多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甚至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另一个人做女鞋。为了生活,有的人只裁衣,有的人只拼接,有的人只缝纫。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烹调的手艺也是这样。”(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8卷第2章)²³⁶色诺芬在这里只注意使用价值的质量和达到这种质量的办法,虽然他清楚地知道,分工的规模取决于市场的大小。

的基础,后者则以他所特有的市民阶级的本能已经更加接近工场内部的分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²³⁷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至少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与柏拉图同时代的许多人,例如伊索克拉底⁽⁸⁸⁾,也把埃及看成是模范的产业国,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看来,它还保持着这种意义。⁽⁸⁹⁾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工场手工业的倾向的实现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虽然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已看到的,除了把劳动者分成等级以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具有压倒优势的影响,非熟练工人的人数仍然极其有限。虽然工场手工业使局部操作适应于它的活的劳动器官的年龄、体力和发育的不同程度,从而要求在生产上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剥削,但总的说来,这种倾向由于习惯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坏。虽然手工业活动的分解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费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价值,但较难的局部劳动仍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甚至在这种学习时间已成为多余的地方,劳动者用心良苦地把它保留下来。由于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工场手工业的集体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

(88) “他(布西里士)把所有的居民分成特殊的种姓……规定同一些人必须始终从事同一种职业,因为他知道,经常改变自己职业的人,是什么工作都精通不了的;而始终从事同一工作的人,却能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工艺和手工业方面,埃及人胜过自己的竞争者,尤其于名手胜过拙工。在维持君权和国家制度的机构方面,他们做得如此出色,以致谈到这个问题的最著名的哲学家总是把埃及国家制度看得高于其他国家制度。”(伊索克拉底《布西里士》第[7、]8章)

(89) 参看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

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我们的朋友尤尔叫喊说：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从而对机构越不适应。因此，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总机构造成巨大的损害。”⁽⁹⁰⁾

因此，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以不断听到关于劳动者缺乏纪律的怨言。⁽⁹¹⁾即使我们没有当时的著作家的记载，但从16世纪直到大工业时代，资本始终没有能够占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各种工场手工业生命短促，它们随着工人由国外迁入或迁往国外而由一国迁到另一国，这些最简单的事实就等于成千上万册的书。我们一再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在1770年呼吁说：“必须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秩序建立起来。”66年以后，安德鲁·尤尔博士也说道，“在以经院式的分工教条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还缺乏秩序，而阿克莱建立了秩序”。

同时，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行会以及这种手工业行会必然造成的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但是，一旦工场手工业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它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

工场手工业最完善的产物之一，是生产劳动工具以及生产当时在某些工场手工业中已经采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机械制造工场。尤尔说：

(90) 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30、]31页。

(91) 这句话，用在英国比用在法国恰当得多，用在法国比用在荷兰恰当。

“在机械的童年时期，机械制造工场展示了各种程度的分工，锉刀、钻具、旋床各有自己的具有相应熟练程度的工人。”²³⁸

作为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的这种工场，又生产出机器。机器的出现使手工劳动不再成为调节社会生产的原则。一方面，技术上不再有必要使劳动者终生适应于某种局部职能；另一方面，这个原则本身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

第十五章

机器和大工业

1. 机器和机器生产的发展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道：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⁹²⁾

但是，这并不是机械发明的目的。像其他一切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一样，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过是为了降低商品价格，缩短工人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只是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部分。这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的方法。

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力和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资料是工业革命的起点。因此，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化为机器，从而确定机器和手工工具之间的区别。这里只着重说明显著的特征：对于历史时代，正如对于地质时代一样，是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的。

数学家和力学家把工具称为简单的机器，把机器称为复杂的工

(92) 穆勒应该补充说：“任何不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因为机器无疑大大地增加了游惰者或者人们所说的体面人物的人数。

具。某些英国经济学家也重复这种说法。对于他们来说二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甚至把最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机器。⁽⁹³⁾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样改装和组合。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

另一些人认为,工具和机器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牲畜、水、风等等。⁽⁹⁴⁾按照这种说法,牛拉犁这种各个极不相同的生产时代所共有的工具是机器,而一个工人用手推动的、每分钟可织 96 000 个线圈的克劳生式回转织机不过是工具了。²⁴⁰而且,同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就成为机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那么,机器生产就应该先于手工业了。当 1735 年约翰·淮亚特宣布他的纺织机的发明,并由此开始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他只字未提这种机器将不用人而用驴去推动,尽管它真是用驴推动的。淮亚特的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不用手指纺纱”的机器。⁽⁹⁵⁾

(93) 例如见赫顿《数学教程》。239

(94) “根据这个观点,也可以在工具和机器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锹、锤、凿等等,以及螺旋装置和杠杆装置,这些装置无论怎样精巧,只要它们的唯一动力是人,所有这些就都应称为工具;而用畜力拉的犁,风磨、水磨等则应算做机器。”(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1843 年苏黎世版第 38 页)这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

(95) 在他以前,最早大概在意大利,就已经有人使用机器纺纱了,虽然当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 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资料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基础的形成史,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电磁机、热力机²⁴²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车的翼受气流推动等。

传动机构由平衡轮、蜗轮、齿轮、飞轮、驱动轴、各种各样的绳索、皮带、滑轮、杆、斜面、螺杆等等组成。它调节运动，分配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周运动或者把圆周运动变为垂直运动），把运动传送到工具机上。

机器的前两个部分实际上只是把运动传给这个最后部分，使它能够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并改变其形式。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工具机，那么再现在我们面前的，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不过，它们已经从人的手工工具变成一个机器的工具了。或者，整部机器只是旧手工工具多少改变了的翻版，如机械

难道不值得进行类似的研究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或精神观念的起源。如果抽掉这个物质基础，那么宗教史本身也就失去了标准。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内容和核心，比反过来说明现实生活条件如何逐步获得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而后这种方法是最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发展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²⁴¹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点中立刻显露出来。

织机⁽⁹⁶⁾；或者，装置在工具机机架上的工作器官原是老相识，如珍妮纺纱机上的锭子，织袜机上的针，锯木机上的锯条，切碎机上的刀等等。这些工具的大部分同这些工具作为工作器官而组成的机器的区别，甚至表现在它们的出生上：这些工具一般说来现在仍然由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而机器是机械工厂的产物，这些工具是后来安装在机器上的⁽⁹⁷⁾。

因此，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劳动者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一旦工具离开人的手并由一个机构来操作，工具机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即使人还是动力，这仍然是完成了一次革命。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他自己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在17世纪，在德国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同时踏两架纺车，²⁴⁵这种劳动太艰苦了。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锭纺车，但是，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像双头牛一样罕见。相反地，珍妮机²⁴⁶一开始就能用12—18个纱锭，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手工工具无法克服的器官的限制。

许多工具的结构本身就明显地表现出工人作为单纯动力和真正劳动力的执行者的双重作用。我们以纺车为例。在纺车的踏板上，脚只起动力的作用，而在纱锭上，手指则从事纺纱操作。正是工具的

(96) 在织机的最初的机械形式上，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旧织机的样子。在它的最近的现代形式中，这种相似之处消失了。²⁴³

(97) 只是在近20年来，在英国，这些机械工具才越来越多地用机器制造，但不是由生产工作机机身的那些工厂而是由别的工厂来制造。生产这些机械工具的机器，例如，有自动制造纱管的机器，装置梳毛刷的机器，制造走锭纺纱机纱锭和翼锭纺纱机纱锭的机器等等。²⁴⁴

这后一部分即手工操作器官，首先受到了工业革命的侵袭。工业革命除了使人从事监视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外，还使人发挥纯机械的动力作用。

还有一类工具，即只是用人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⁹⁸⁾、抽水、拉风箱、捣臼等等，也开始由牲畜、风、水⁽⁹⁹⁾代替工人作为动力。很多这样的工具，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大工业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工具甚至在它们的手工工具的原始形式上就已经是萌芽状态的机器了。

例如，1836—1837年荷兰人用来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制造的，不同的只是，它的活塞不是用人手来推动，而是用巨大的蒸汽机来推动。²⁵¹在英国，现在有时还把铁匠用的极不完善的普通风箱变成风泵，为此只需把风箱的把手同蒸汽机连接起来。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¹⁰⁰⁾，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

(98) 埃及的摩西说：“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²⁴⁷但是德国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的农奴主们，按照圣经的训诫，在使用农奴推磨时，却在农奴的脖子上套一块用大木板制成的枷锁，使农奴不能伸手把面粉放到嘴里。²⁴⁸

(99) 荷兰人一方面由于缺少活水，另一方面由于还要排掉过量的死水，不得不用风作为动力。荷兰人的风车是从德国得到的。在德国，这项发明曾在贵族、牧师和皇帝之间引起一场精彩的争论：在三者中，风究竟属于谁。²⁴⁹德国人说，空气对人进行奴役，而风却使荷兰自由，使荷兰人成为自己的土地的所有者。到1836年，荷兰仍然使用共有6万马力的12000台风车，防止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再度变为沼泽。²⁵⁰

(100) 虽然这种蒸汽机由于瓦特发明了所谓单向蒸汽机，而大大地改进了，但这种形式的蒸汽机仍然只是抽水的机器。²⁵²

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工具机的动力发生作用,人就可以被水、风、蒸汽等等代替,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纯粹是偶然的了。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是为人力而制造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今天,所有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并不以大规模应用为目标的机器,像缝纫机、揉面机等等,是视人作动力还是机械力作动力而按两种式样制造的。

因此,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代替使用一个工具的劳动者,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力具有什么形式。⁽¹⁰¹⁾但是这样的工具机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

为了扩大工作机规模和增加工作机上的工具数量,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发动机,而为了克服发动机的惯性力,就必须有比人力强大的动力,更不用说人是一种进行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一旦由人作为动力的机器代替了工具,用其他的自然力作为动力代替人也就迅速成为必要的了。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动力中,马力是最坏的一种;据说马有它自己的头脑,它的使用十分昂贵,而且在工厂内能使用的范围很有限。⁽¹⁰²⁾但在大工业的初期,马是常被使用的。当时的农

(101) “把所有这些简单的工具结合起来,由一个发动机来推动,便成为机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3年巴黎版)

(102) 1859年12月,约翰·查·摩尔顿在技艺协会²²⁸上宣读了一篇关于《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的论文。他说:“每一种有助于土地划一性的改良,都为生产纯机械力的蒸汽机的应用创造了便利条件……在有弯弯曲曲的灌木丛或其他障碍而影响划一动作的地方,就需要用马力。这种障碍正在一天天地

业家的怨言以及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马力”来表示机械力这件事，就是证明。风太不稳定，而且很难控制；此外，在大工业的发源地英国，甚至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普遍地用水作动力了。早在17世纪，就有人试用一架水车来推动两盘上磨，也就是两套磨。但是，沉重的传动机构造成了水力不足，这也是促使人们更深入地去研究摩擦规律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它的动力的作用是不均匀的，这又引出了飞轮的理论⁽¹⁰³⁾和应用。飞轮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这样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阿克莱的翼锭纺纱机最初是用水推动的。但几乎只是使用水这种动力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它不能随意增大，在缺乏时不能补充，有时完全枯竭，而且具有纯粹的地方性质。⁽¹⁰⁴⁾直到瓦特发明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

消失。在那些需要发挥较多的意志和较少的体力的操作上，唯一可以采用的，是每时每刻都由人的精神所支配的力，也就是人力。”接着，摩尔顿先生把蒸汽机、马力和人力都简化为蒸汽机所通用的计量单位，即简化为每分钟把33 000磅提高1英尺的力，并计算出1蒸汽马力的费用：用蒸汽机每小时为3便士，用马每小时为 $5\frac{1}{2}$ 便士。其次，为了保持马的健康，每天只能使用8小时。使用蒸汽力耕种一块土地，全年每7匹耕马中至少可以节省3匹，而且所花的费用不会超过被代替的马在三四个月（即它们干活的时间）内所花的费用。最后，在可以应用蒸汽力的农活上，蒸汽机比马干得更好。要完成1台蒸汽机的工作，必须用66个人，每小时总共花费15先令；要完成1匹马的工作，必须用32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8先令。

(103) 孚耳阿伯式，1625年。德库，1688年。²⁵³

(104) 现代涡轮机的发明，使过去在利用水作动力时所遇到的障碍得到了克服。²⁵⁴

的,不像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而不是分散在农村⁽¹⁰⁵⁾。它在技术上可得到普遍的应用,它的使用相对地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他在说明书中预见的用途,有一些(例如蒸汽锤)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采用。²⁵⁵但是他当时曾怀疑,蒸汽机能否应用到航海上。1851年,他的后继者,博尔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航海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一旦工具由人的手工工具转化为一个机械装置的工具,发动机就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工作机构的一个简单的器官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具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具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和复杂的装置。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生产机构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式:或者是若干同种机器的协作,或者是机器体系。在前一场合,整个制品是由同一台工具机完成的。工具机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这些操作原来是由一个手工业者用单一的工具(例如织布业者用自己的织布机)来完

(105) “在纺织工场手工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足以推动水车的落差的水流;虽然水磨的采用使家庭工业体系受到了第一次打击,但这些水磨必须建立在水流旁边,水磨和水磨之间又往往相距很远,所以,这种水磨与其说是城市体系,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直到蒸汽力代替水力以后,工厂才汇集在城市和有生产蒸汽所必需的足够数量的煤和水的地方。蒸汽机是工业城市之父。”(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6页)

成的,或者是由若干工人独立地或集中在一个手工工场里用各种工具来完成的。⁽¹⁰⁶⁾例如,在信封手工工场中,一个工人用折纸刀折纸,另一个工人涂胶水,第三个工人折边,预备印图样,第四个工人把图样印好,等等。每个信封,每经过一道局部操作,就要转一次手。今天,一台机器一下子完成所有这些操作,而且每小时制成3 000个甚至更多的信封。²⁵⁶ 1862年伦敦展出的一台美国纸袋制造机,可以切纸、涂胶水、折纸,每小时生产18 000个纸袋。²⁵⁷在工场手工业中分开和顺次进行的劳动过程,现在由一台由各种工具结合而成的机器来完成。

在工厂——这是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工场的固有的形式——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撇开工人不说,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在同一地点并同时发生作用的同种工具机的集结。这是工厂特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每台工具机都生产出成品,而这种工具机则是复杂的手工工具的简单再现或各种具有各自特殊职能的工具的结合。

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一起便组成织布工厂。但这里存在着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因为许多工具机,都是划一地并同时地从共同的原动机中得到搏动,这是通过传动机构传送来的,而传动机构对这些工具机来说也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因为它不过是分出一些特殊的分支同每个工具机相联结。正像许多工具组成一个工具机的器官一样,许多工具机组成同一个发动机构的同样的器官。

(106) 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看,织布不是简单的手工业劳动,而是复杂的手工业劳动,因此,机械织机是一种能完成很多种操作的机器。有人认为,现代机器起初掌握的是工场手工业分工所简化了的那些操作,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纺纱和织布分成了新的劳动种类,所使用的工具也改变和改良了,但劳动过程本身丝毫没有分开,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机器的起点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资料。

但是,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相结合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独立的机器。在这里,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但这种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各种工人的专门工具,例如,毛纺织手工工场中的弹毛工、梳毛工、起毛工、纺毛工等等所使用的工具,现在转化为各种专门的工具机,而每台工具机又在结合的机构的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器官。在最先采用机器体系的部门中,工场手工业本身为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划分,从而对生产过程的组织提供了一个轮廓。⁽¹⁰⁷⁾但是本质的区别立刻就表现出来了。在工场手工业中,每个局部过程必须是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的手工操作。如果说这里工人是适应这种操作的,那么这种操作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不存在了,它变成了客观的,也就是说,不以工人个人的能力为转移的原则;整个过程就其自身来考察,是分成它的各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各个阶段的。每个局

(107) 在大工业时代以前,毛纺织工场手工业是英国主要的工场手工业。所以,在18世纪上半叶,绝大部分实验都是在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中进行的。在毛纺织业上取得的经验为棉纺织业带来了好处,棉花的机械加工需要的准备工作不像羊毛那样费力;后来则相反,机械棉纺织业成了机械毛纺织业的基础。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某些独立的操作,直到最近才纳入工厂制度内,例如梳毛就是这样。“在精梳机,尤其是李斯特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机械力才广泛应用到梳毛过程上……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在梳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都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然宁可用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要少得多,所以谈不到大量雇用这些工人。”(《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

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相互连结,这个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来解决⁽¹⁰⁸⁾,当然,理论的方案仍然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每一台局部机器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时协调一致地工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在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使各个工人小组之间形成一定的比例数,同样,在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之间不断地交接工作,也在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之间形成一定的比例。结合工作机——现在是各种工具机和各组工具机的依次连结的体系——所完成的整个运动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运动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通过这一过程,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因此,如果说工场手工业的原则是分工形成的各特殊过程的分离,那么相反,工厂的原则则是这些过程本身的不间断的连续性。

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像织布业那样,以同种工具机的单纯协作为基础,还是像纺纱业那样,以不同种机器的结合为基础,只要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整个体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机来推动,虽然某些工具机在某些动作上还需要工人。例如,纺纱业中的某些动作就曾经需要工人,而这些动作今天已由自动走锭纺纱机来完成;在机器制造厂中某些动作也曾经需要工人,在那里,在滑动刀架还未转化为自动装置以前,工具机的某些部分必须像简单工具一样,要由工人操纵。当工具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

(108) “所以,自动体系的原则是:……把劳动过程分成它的各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1卷第30页)

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事后照料时,我们就有了真正的自动体系,不过,这个机器体系在细节方面还可以不断地改进。例如,断纱时使纺纱机自动停车的装置,梭中纬纱从梭子上脱落时使蒸汽织机立即停车的自动开关,都完全是现代的发明。现代造纸工厂可以说是生产的连续性和应用自动原则的范例。在纸张的生产上,我们可以详细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生产的社会条件同生产的技术工艺之间的关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手工业生产的典型,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向我们展示了真正的工场手工业,而现代英国则使我们看到了自动生产;在中国和印度,仍然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不同的原始形式。

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自动工具机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四肢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

在专门制造走锭纺纱机、蒸汽机等等的工人出现以前,走锭纺纱机、蒸汽机等就已经出现了。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伟大发明之所以能够得到应用,只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留下了大量的熟练的机械工人。这些工人中,一部分是各种职业的独立的手工业者,一部分是联合在按照分工的原则严格地组织起来的手工工场内的。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机器的需求的增加,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而分工在每一个这样的部门也相应地发展了。因此,工场手工业历史地形成了大工业的技术基础。

在引进工场手工业提供的机器的生产领域内,工场手工业由于它自己生产的机器而被大工业取代了。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

的物质基础上兴起的。它最初是在传统的形式中利用这个基础的，但是当它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时，就不得不变革这个基础并使之符合自己的原则。

正像工具机在它还要由人来作动力时始终是孱弱的一样，正像在蒸汽还没有代替传统的动力——牲畜、风甚至水以前，机器体系发展缓慢一样，当大工业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还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独立的手工业者和手工工场内的局部工人用来操纵他们的小工具的那种发达的肌肉、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时，大工业也就迟迟不前了。

且不说这种方法生产出的机器很昂贵，——这是工业资本家所关心的事情，——已经以机器生产的方式为基础的工业的发展，以及机器生产的方式在新的生产部门的采用，完全取决于一个唯一的条件，即专业工人增加的情况，这类工人的人数由于他们的工作带有半艺术性，只能缓慢地增加。

不仅如此，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甚至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也同自己的由手工业以及工场手工业提供的基础发生冲突。

发动机和传动机构的规模日益扩大；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手工业提供的型式并和它的纯粹的机械功能所决定的形式不相适应，⁽¹⁰⁹⁾

(109) 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²⁵⁸只要极其粗略地把现代织机和旧的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影响着它的新形式。但是，最好还是让我们回忆一下最初试制的火车头。这种火车头有两条腿，像马一样迈步。随着实际经验的长期积累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机器的形式才完全由力学原理决定，从而才完全摆脱了工具的传统形式。

工具机的种类越来越多,构造越来越复杂,工具和各个组成部分的数量、多样性和精密性所要求的数学规则性越来越严格;自动体系日益发展;难于加工的材料的应用,例如以铁代替木材;——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情况的变化而接连发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任务就会不断地碰到人身的限制。这些限制甚至工场手工业中的集体劳动者也不能摆脱。因为,例如现代印刷机、蒸汽织机和梳棉机这样的机器,就不是工场手工业所能制造的。

一个工业领域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工业领域类似的变革。我们首先在这样一些工业部门看到上述情况,这些工业部门虽然由于社会分工而分离,从而使它们的产品成为各自的独立的商品,但它们作为总过程的各个阶段却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必不可少的巨大规模进行。⁽¹¹⁰⁾工农业的革命,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正像以小农业及其必然的产物——家庭副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²⁵⁹(我借用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所拥有的交通运输手段,完全不能再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工人和劳动资料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需要,因而必须对这些交通运输工具实行变革一样,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快又转化为具有百倍增长的狂热的生产速度、不断把资本和劳动者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

(110) 直到最近,在18世纪发明的各种机器中,要算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在本质上变化最少。但是近20年来,由于另一个美国人,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埃默里先生作了一番简单而有效的改进,惠特尼的机器变得陈旧了。²⁵⁷

并创造出新的世界市场条件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撇开帆船制造业所发生的彻底变化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轮船、铁路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要求的。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劳动所不能胜任的。

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才能生产其他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19世纪最初三十几年大工业的发展,机器逐渐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

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必要条件,是要有能供给各种强度的力量同时又容易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但是,机器的某些部分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状,如直线、平面、圆、圆锥形和球形,也同时要用机器来生产。在本世纪初,亨利·莫兹利发明了滑动刀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刀架不久就改为自动式,从它最初使用的旋床上随后移到其他制造机器的机器上。²⁶⁰这种机械装置不仅代替了某种特殊工具,而且还代替了只有把工具的刃对准或加在劳动对象上才能制造出一定形状的人的手。这样就能

“制造出所需要的几何形状,而且精确、轻易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¹¹¹⁾

(111) 《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239页。该书在这里还说道:“不管旋床的这个附件多么简单,从外表上看多么不重要,但我们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对机器的改良和推广所产生的影响,不下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所产生的影响。采用这种附件的结果是,各种机器完善和便宜了,而且激励了创造发明的精神。”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机器制造业所采用的机器中构成它的真正工作器官的部分,那么,手工工具就再现出来了,不过规模十分庞大。例如,钻床的工作部分,是一个由蒸汽机推动的庞大钻头,没有这种钻头就不可能制造出大蒸汽机和水压机的圆筒。机械旋床是普通脚踏旋床的巨型翻版;刨床可以说是一个铁木匠,它加工铁所用的工具就是木匠加工木材的那些工具;伦敦造船厂切割覆盖轮船龙骨的铁板的工具是一把巨大的剃刀;蒸汽锤靠普通的锤头工作,但这种锤头重得连托尔神^①也举不起来。^{(112) 262}例如,内史密斯发明的这些蒸汽锤中,有一种重6吨多,从7英尺的高度垂直落在36吨重的铁砧上。它能够一下子把一块花岗石打得粉碎,也能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把钉子钉进柔软的木头里去。^{(113) 263}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科学来代替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过程的划分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创造了完全客观的或没有个性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在工厂里作为工人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中,集体劳动者排挤单个的劳动者还多少是偶然的現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谈的少数例外,则只有通过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的协作性质,在这里成了由劳动资料的性

(112) 在伦敦有一种锻造轮船蹼轮轴的机器叫“托尔”。这种机器锻造一个 $16\frac{1}{2}$ 吨重的轴,就像铁匠打一个马蹄铁那样轻松。²⁶¹

(113) 那些也能供手工业者在劳动中使用的木材加工机器,大部分是美国人的发明。

① 托尔神是北欧神话中的雷神。——编者注

质本身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2. 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

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等等,也不费分文。可是,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器官。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¹¹⁴⁾但是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巨大规模的设备。我们已经知道,工具并没有被机器排挤掉。它由人的手中的小工具,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发展成为由人创造的机构的工具。现有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

因此,机器工业把科学和巨大的自然力并入自身,因而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一方之所得是否是另一方之所失,使用机器所节约的劳动是否比制造和维修机器所花费的劳动更多,这一点并不清楚。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

(114) 科学根本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吞并他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精巧的机器的工厂主们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们对化学惊人地无知。

机器不创造价值,而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所以说,它自身的价值进入了产品的价值。机器不是使产品变便宜,而是使产品随着机器的价值相应地变贵。很明显,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相比是极为昂贵的。

首先应当指出,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创造产品的过程,但只是部分地进入创造产品价值的过程。它转移的价值,绝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给它的产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价值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要素的机器,有很大的差别。同一机器使用的时期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诚然,这一切也同样适用于任何其他劳动资料。但是,使用和磨损之间的这种差别,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为机器是由比较耐久的材料制成的,因此寿命较长;因为机器的使用要遵照精确的科学规律;最后,因为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广阔无比。

如果我们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费用,即不算由于它们的损耗和煤炭、机油等辅助材料的消费而平均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但是机器和工具的这种无偿服务是同它们各自规模的大小成比例的。只是在机器工业中,人才能做到让自己过去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115)

(115) 李嘉图有时很重视机器的这种作用(但他并不懂得这种作用,就像他不懂得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形成过程的一般区别一样),以致有时忘掉了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而把机器和自然力完全混为一谈。例如他说:“亚当·斯密从来没有低估自然力和机器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而是十分恰当地把它们加到有用物品上的价值的性质区别开来……由于它们做工不需要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知道,某些生产资料如建筑物等,由于共同使用而变得比较经济了,因而能够降低产品的价格。在机器工业中,不仅一个工作机的许多工具共同使用一个工作机的躯体,而且许多工作机共同使用同一个发动机和一部分传动机构。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在每天的损耗中失去的并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之间的差额已定,那么产品由于这种转移而变贵的程度就同产品的数量成反比。布莱克本的贝恩斯先生在 1857 年发表的一篇报告中计算过:

一机械马力²⁶⁵可以推动 450 个自动走锭纺纱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 200 个翼锭纺纱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 15 台织宽 40 英寸布的织布机以及整经等装置。²⁶⁶一蒸汽马力每天的费用及其所推动的机器的损耗,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分配在 450 个走锭纺纱机纱锭的产品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分配在 200 个翼锭纺纱机纱锭的产品上;在第三种情况下是分配在 15 台机械织机的产品上。可见,转给一盎司棉纱或一米布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值。前面举的蒸汽锤的例子也是这样。因为蒸汽锤每天的磨损和煤炭的消耗等等是分配在它每天锤打的巨量的铁上,所以每英担铁只吸收了很小一部分价值;但如果用这个庞大的工具来钉小钉子,那么分配在每英担上的价值显然就很大了。

如果工具数量已定,或者在涉及到力的时候,机器的规模已

费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就不会使交换价值有丝毫增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第 336、337 页)当然,李嘉图用这个见解反驳让·巴·萨伊是正确的,因为让·巴·萨伊认为,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资本家的利润部分的价值。²⁶⁴

定,那么机器的产品的数量就取决于它的作业的速度,例如取决于纱锭的转速或蒸汽锤每分钟锤击的次数。某些大蒸汽锤每分钟可锤70次;赖德的专利锻造机,用小蒸汽锤锻造纱锭,每分钟可锤700次。²⁶⁷

如果机器转给产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么这个价值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机器的最初价值的大小。⁽¹¹⁶⁾ 机器包含的劳动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务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而用机器生产机器,显然会使机器的价值同机器的规模和效率相对而言降低下来。

比较分析一下机器生产的商品和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说来,在机器生产中,产品中从劳动资料转来的这个价值部分相对增大了,但却绝对减少了。

换句话说,这个价值部分的量绝对减少了,但它同总产品(如一磅棉纱)的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¹¹⁷⁾

(116) 受资本主义观念束缚的读者,在这里当然会对没有谈到机器按其资本价值加到产品上的“利息”而感到惊讶。但是,很容易理解,机器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并不生产新价值,因而不可能加进称做“利息”的新价值。资本主义的计算方法,一看就是荒谬的,是和价值的形成规律相矛盾的。这一点在本书第三册中¹³¹将加以说明。

(117) 当机器排挤马和其他只是当做动力用的役畜时,机器所加入的这个价值组成部分,无论绝对地说或是相对地说都要减少。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²⁶⁸ 他是用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做人的助手和伙伴,后来冯·哈勒先生在他的《国家学的复兴》中也是这样看的。²⁶⁹ 毫无疑问,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思维方法的改变导致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²⁷⁰ 他在《方法论》中写道:“可以(用新的方法)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找到一种实践哲学来代

很明显,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么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就是说,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但是,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只要机器中实现的劳动,从而机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种差额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的程度来衡量的。根据贝恩斯先生的计算,由一蒸汽马力推动的450个走锭纺纱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需要两个半工人看管⁽¹¹⁸⁾;每个自动走锭纺纱机纱锭在一个十小时工作日里可纺出13盎司棉纱(平均纱支),因此两个半工人一星期可纺出 $365\frac{5}{8}$ 磅棉纱。可见,366磅棉花(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撇开棉屑不说)在转化为棉纱时,只吸收了150个劳动小时,或15个十小时工作日,而用纺车,一个手工纺工60小时纺13盎司棉纱,因此,同量的棉花就要吸收

替学校中所讲授的思辨哲学,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像了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火、水、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们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并且“促进人类生活的完善”。在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1691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笛卡儿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应用,开始使政治经济学摆脱了关于货币、商业等的古代的迷信观念和神话。但是,当时英国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做自己的哲学家,而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杰出的哲学家。

(118) 根据埃森商会的年度报告(1863年10月),1862年,克虏伯铸钢厂用161个熔炉、煅烧炉、渗碳炉,32台蒸汽机(约等于1800年曼彻斯特使用的蒸汽机总数)和14架蒸汽锤(合计代表1236马力),49个锻铁炉,203台工具机,约2400名工人,生产了1300万磅钢锭。在这里,一马力还摊不到两个工人。

2 700 个十小时工作日,或 27 000 个劳动小时。⁽¹¹⁹⁾在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这种旧方法被机器印花代替的地方,一台机器由一个成年男工看管,一小时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数量,等于过去 200 个成年工人印制的数量²⁷¹。⁽¹²⁰⁾在 1793 年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以前,轧除一磅棉花的棉籽平均要花一个工作日。由于有了他的发明,一个黑人妇女每天可以轧 100 磅棉花,而且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大有提高。²⁷²在印度,使用一种半机器式的工具——手工轧棉机,来从事这种操作。使用这种工具,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能轧 28 磅棉花。但使用几年前福布斯博士发明的手工轧棉机,两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可轧 250 磅棉花;²⁷³在用牛、水或蒸汽作动力的地方,只需要几个男女少年给机器添料。16 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拉,每天能完成以前 750 个人一个平均工作日的工作。⁽¹²¹⁾

我们已经知道,蒸汽犁在一小时内花费 3 便士或 $\frac{1}{4}$ 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 66 个耕作者在一小时内花费 15 先令所完成的工作。这里重要的是必须消除一种普遍存在的误解。这 15 先令绝不是这 66 个人一小时内消耗的全部劳动的货币表现。如果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为 100%,那么,这 66 个耕作者在一个集体劳动小时内就在产品中加进了 66 个劳动小时或 30 先令价值,而他们的工资只是这个价值的一半。可见,机器所代替的并不是他们的工具,而是他

(119) 据拜比吉的计算,在爪哇,几乎单是纺纱劳动就使棉花价值增加 117%。而同一时期(1832 年),英国精纺业的机器和纺纱劳动加进棉花的总价值约为原料价值的 33%。(《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第 165、166 页)

(120) 此外,机器印花还可以节省染料。

(121) 参看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 1861 年 4 月 19 日在技艺协会²²⁸上所作的报告。²⁷⁴

们的劳动。

因此,假定 150 个工人或代替他们的机器的价格是 3 000 镑,那么,这个货币量对于机器来说就体现着实现在机器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而对于工人来说则体现着他们的劳动中的有酬部分。因此,即使一部机器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相同,它所花费的劳动总是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122)

如果只把使用机器看做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就会遇到界限。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必须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家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因为资本家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因此,在资本家打算盘时支配他的是机器和机器所能代替的劳动力之间的价值差额。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不仅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生产部门,也是不同的。其次,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有时升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上,有时降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下。从所有这些情况中产生出来的结果是:机器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可能有很大的变动,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但是,对资本家来说,只有前一种差额才决定成本价格,而且竞争强制他重视这种差额。因此,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由于同样的原因,16 世纪和 17 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而 18 世纪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

在所有较老的文明国家,机器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

(122) “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因素(机器)所花的劳动,总是比被它们排挤的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第 40 页)

他部门的劳动过剩(李嘉图用的是 redundancy of labour),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

近几年来,在英国毛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童工显著减少,有的地方几乎完全被排挤掉了。为什么呢?

因为工厂法规定童工必须实行两班制,一班劳动 6 小时,另一班劳动 4 小时,或每班只劳动 5 小时。但是父母们不愿比以前出卖全日工更便宜地出卖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机器所代替。⁽¹²³⁾在矿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10 岁以下的)以前,²⁷⁵资本认为,让裸体的妇女、少女和男子混在一起下井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尤其是符合它的总账的,所以直到禁止使用妇女和儿童以后,资本才采用机器并废除了这种资本主义的婚姻。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对农业工人的称呼)所得到的只是他应得到的东西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使用机器反而会使产品变贵。⁽¹²⁴⁾在英

(123) “雇主使用两班 13 岁以下的童工完全出于必要……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 13 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不用雇用这样的童工了。我可以举一个劳动过程的例子来说明童工人数减少的情况: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六个或四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13 岁以上)去完成了……半日制促进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 年 10 月 31 日》)

(124) “只要劳动(他指的是工资)不上涨,机器就往往不会被采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第 479 页)

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¹²⁵⁾,因为马和机器的费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被抛入下层社会的妇女的费用,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为了几文钱而最无耻地浪费人力。

3. 机器工业对劳动者的直接的反作用

前面已经指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式。在考察人身材料怎样合并到机器体系之前,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种革命对工人的最直接的反作用。

(a) 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

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它使力气较小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能够得到使用。当资本占有机器以后,它的口号就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种减少人的劳动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转化为增加雇佣工人人数的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屈服于资本的棍棒。为资本进行的强制劳动,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也夺去了维持家庭的自由劳动的时间,而这种

(125) 见《在爱丁堡社会科学会议上的报告。1863年10月》。

家庭内的劳动正是家庭日常生活的经济支柱。(126)

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费用。机器把工人的家庭抛到劳动市场上,从而把一个劳动力的价值分到好几个劳动力身上了。因此,机器使这个劳动力贬值了。现在,例如一个出卖四个劳动力的工人家庭得到的收入可能比过去仅仅出卖家长的一个劳动力时多些,但是同样,四个工作日代替了一个工作日,这四个工作日的价格按照四个人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人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127)

(126) 在美国南北战争⁷引起的棉业危机期间,英国政府把爱德华·斯密斯医生派往兰开夏郡和柴郡等地,调查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他报告说:撇开工人被赶出工厂环境不说,从卫生方面来看,危机还有其他许多益处。现在,工人的妻子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而不必用戈弗雷强心剂²⁷⁶去毒害他们了。她们有时间学习烹调了。不幸的是,她们是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学到这种烹调术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为了自行增殖,是如何掠夺那种为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的。这一危机还被用来在某些学校里教女工学缝纫。为了使那些为全世界纺纱的女工学缝纫,竟需要有一次美国革命和一次世界危机!

(127) “由于男子日益为妇女代替,特别是成年人日益为儿童代替,劳动者人数大大增加了。三个每周工资为6—8先令的13岁的女孩,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18—45先令的成年男子。”(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伦敦版第147页注)因为某些家务事,如照料婴儿和喂奶等,不能完全不管,所以,被资本没收的母亲,必须多多少少雇用代替者。家务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劳动者的家庭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配制和消费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关于被官方政治经济学所隐瞒的这些事实,可以在工厂视察员和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报告》中,找到丰富的材料。

机器的资本主义的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契约。这个契约的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和工人二者都作为自由人，作为商人而互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但是，自从资本购买未成年人以后，这一切就都改变了。从前工人出卖他可以自由支配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¹²⁸⁾在实际上，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在形式上也往往同美国报纸上见到的对黑奴的需求相似。一个英国工厂视察员说：

“在我的管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里，地方报纸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广告写道：兹征求 12—20 名少年，外貌要 13 岁以上。工资每周 4 先令。报名处……”⁽¹²⁹⁾

上面强调的这句话，和工厂法的一项规定有关，这项规定说，未满 13 岁的儿童只能劳动 6 小时，年龄必须经过合格医生的证明。因

(128) 在英国工厂内，是成年男工迫使资本减少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与这个重大的事实相反，人们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中竟然还看到，某些父母，令人十分愤慨地像十足的奴隶贩子那样卑鄙地贩卖他们的孩子。可是，正如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伪善者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他们把这种兽行名之曰“劳动自由”。“儿童劳动被利用了……他们甚至仅仅为自己每天的面包而劳动。他们没有力量承受如此过度的沉重劳动，没有受过指导他们未来生活的教育，他们被抛入一种对身心有害的环境中。犹太历史学家在谈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么，耶路撒冷遭到了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公共经济概论》1833 年卡莱尔版第 56 页）佩诺医生在《米卢斯产业协会会报》（1837 年 5 月 31 日）中说：“贫困往往会使做父亲的产生一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打主意的丑恶念头。企业主经常被要求接受那些低于一般可以接受入厂的年龄的儿童到他们的工厂里做工。”

(129) 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 年 10 月 31 日》第 41 页。

此,工厂主需要外表看来已满 13 岁的儿童。英国近 20 年来的统计材料表明,工厂中雇用的未满 13 岁的儿童人数屡次大幅度地减少。根据工厂视察员的证词,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于合格医生庇护父母卑鄙的贩卖而造成的,他们为迎合资本家的剥削欲望而虚报儿童的年龄。在声名狼藉的伦敦贝特纳尔格林区,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都有公开的集市,9 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就在那里把自己出卖给伦敦的丝织厂主。一个儿童在他的证词中说:“一般的条件是,每周 1 先令 8 便士(归父母),2 便士归我自己,外加茶点费。”契约仅以一周为限。在集市的整个过程中,人们看到的情景和听到的语言确实令人愤慨。⁽¹³⁰⁾直到现在英国还有这样的事发生:贪图小利的妇女“把子女从贫民习艺所¹⁶⁴中领出来,以每周 2 先令 6 便士的价格出租给任何一个主顾”⁽¹³¹⁾。不顾法律的规定,至少还有 2 000 名儿童被自己的父母卖出去充当烟囱清扫机(虽然已经有机器可以代替他们)。⁽¹³²⁾

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的关系的变革,甚至使全部交易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这就为后来英国议会提供了国家干涉工厂制度的法律上的根据。每当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儿童劳动限制为 6 小时的时候,就总是可以听到工厂主的怨言。他们说:许多父母会把他们的孩子从受工厂法限制的工业部门中领出来,把他们卖给“劳动自由”还盛行的部门,即卖给那些迫使不满 13 岁的儿童像成年人一样从事劳动,因而出价较高的工业部门。但因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所以它以天赋“权利”的名义

(130)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5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第 81 页第 31 号。

(13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3 号报告》1864 年伦敦版第 53 页第 15 号。

(132) 同上,《第 5 号报告》第 22 页第 137 号。

要求在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

我们已经指出，机器起初使儿童、青少年像工人妻子一样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工厂内直接地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地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一点，就是劳动者的子女出生后头几年的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兰，有 16 个户籍区在 10 万个儿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数只是 9 085 人(其中有一个区只是 7 047 人)；24 个区是 10 000 人至 11 000 人；39 个区是 11 000 人至 12 000 人；48 个区是 12 000 人至 13 000 人；22 个区超过 20 000 人；25 个区超过 21 000 人；17 个区超过 22 000 人；11 个区超过 23 000 人；在胡、伍尔弗汉普顿、阿什顿安德莱恩和普雷斯頓等地超过 24 000 人；在诺丁汉、斯托克波特和布拉德福德等地超过 25 000 人；在威斯贝奇是 26 001 人；在曼彻斯特是 26 125 人。⁽¹³³⁾ 1861 年的一个官方医生调查报告指出：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当地的情况外，主要是由于母亲外出就业。这样，孩子就得不到照料并受到虐待，饮食不适或缺乏营养，有时被喂鸦片剂，遭到违反天性地厌恶自己

(133) 《公共卫生·第 6 号报告》1864 年伦敦版第 34 页。

在法国的工业城市中，不满一周岁的工人子女的死亡率为 20%—22%(鲁贝的数字)。1863 年米卢斯的工人子女的死亡率高达 33%，那里的死亡率总是超过 30%。

德维利耶先生在一篇向医学科学院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富裕家庭的子女的死亡率为 10%，纺织工人的子女的死亡率不低于 35%(布代先生在医学科学院 1866 年 11 月 27 日会议上的演说)。——《米卢斯产业协会会报》第 28 期确认了“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可怕的衰弱”。

孩子的母亲的遗弃。他们往往被饿死和毒死。⁽¹³⁴⁾在“妇女最少就业的农业区,死亡率则最低”⁽¹³⁵⁾。但是,1861年的调查委员会却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纯农业区,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因此,朱利安·汉特医生被派去就地研究这种现象。他的结论载于《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中。⁽¹³⁶⁾在此以前人们认为,疟疾和低洼的沼泽地区所特有的其他热病是造成儿童大批死亡的原因。但调查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把冬天是沼泽地夏天是贫瘠草地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谷物耕地,这是消灭疟疾的原因,但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¹³⁷⁾

汉特医生从这些地区的70个医生那里搜集了证词,他们“对这一点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事实上,随着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业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帮伙里一起劳动的已婚妇女,为了挣一些钱,被一个出租整个帮伙的叫做‘帮头’的人,交给租地农场主支配。这些流动的帮伙往往到离本村许多英里以外的地方去干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们,妇女们穿着短上衣和短裙,靴子,有时穿长裤,健壮有力,但由于放荡成性而败坏了,她们喜欢这

(134) “它(1861年的调查)……还证明,在上述情况下,一方面儿童由于母亲就业,无人照料和照顾不周而死亡,另一方面母亲自己也渐渐丧失了自然感情,以致她们对子女的死亡并不十分介意,有时甚至直接设法弄死他们。”(同上)

(135) 同上,第454页。

(136) 同上,第454—462页。《亨利·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英格兰某些农业区婴儿死亡率过高的报告》。

(137) 同上,第35、455、456页。

种忙碌的流浪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虑这会给她们家里瘦弱的子女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138)

在工厂区可以看到的各种现象，例如暗地杀害儿童和让儿童服鸦片剂，在这里又在更严重的程度上得到了再现。(139)

英国枢密院¹⁴⁹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每当谈到工业中雇用成年妇女（我是在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时，我就会感到深恶痛绝。”(140)

工厂视察员罗·贝克在一份官方报告中疾呼：

“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妇女在任何工厂里干活，对于英国的工厂区来说，确实会是一件幸事。”(141)

关于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弗·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及其他的著作家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因此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把正在发育的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坏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为了补救这种致命的荒废，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

(138) 同上，第 456 页。

(139) “在农业区，和在工厂区一样，成年男工和女工的鸦片消费量也日益增加。‘扩大鸦片剂的销路’，已成为许多批发商的努力目标。药商认为鸦片剂是主要商品。”(同上，第 459 页)服用鸦片剂的婴儿“萎缩成小老头或瘦得像小猴子”(同上，第 460 页)。这就是印度和中国对英国的可怕的报复。

(140) 同上，第 37 页。

(14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 年 10 月 31 日》第 59 页。这位工厂视察员以前是医生。

是生产地消费 14 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这种所谓的教育条款措辞草率；由于缺少任何行政监督，这种义务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对这个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阴谋诡计来回避实施这个法令；——这一切明显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

“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上关心儿童的教育，但实际上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口头上的目的。它只是规定儿童每天必须有若干小时（三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份签字的人那里得到证明书。”⁽¹⁴²⁾

在 1844 年的修正工厂法颁布以前，许多上学证明书由男教师或女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这证明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

“我访问一所这样的学校，教师的无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问他：‘先生，请问您识字吗？’他的回答是：‘唉，认识一点点’，为了申辩，他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负责看管学生’。”

在拟定 1844 年的法令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揭发了这种叫做学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学校发的证明书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取得的全部成果就是，从 1844 年起，教师必须在上学证明书上亲笔填写数字，并且必须亲笔签上自己的姓名⁽¹⁴³⁾。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了很多类似的情况。

“我们访问的第一所学校是由一个叫安·基林的夫人主办的。当我请她把她的姓拼读出来时，她马上就出了错。她先说了个 C，但马上改正说，她的姓

(142) 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 年 4 月 30 日》第 17 页。

(143) 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 年 10 月 31 日》第 18、19 页。

的第一个字母是K。然而,我查看她在上学证明书上的签字时,发现她的姓的写法不一,同时,她的笔迹证明,她根本没有教书的能力。她自己也承认,她不会填写名册……在另一所学校,我发现教室长15英尺宽10英尺,里面有75个儿童,不知在叽叽喳喳讲些什么。”(144)“然而,儿童只得到上学证明书而受不到教育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这些破屋陋舍。在许多有合格师资的学校,由于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儿童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教师也几乎是白费力气。教师的收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少得可怜,这些收入完全依靠儿童缴纳的便士,因此他尽可能把大量学生塞进一个教室里。此外,学校设备简陋,缺乏书籍和其他教具,沉闷难闻的空气对贫苦的儿童产生有害的影响。我到过很多这样的学校,看见一排一排的儿童无所事事;这就是所谓的上学,而这些儿童在官方的统计中算是受过教育的。”(145)

在苏格兰,工厂主竭力排斥那种必须上学的儿童。

“这足以证明,工厂主对教育条款是十分憎恶的。”(146)

这种情况在受一种特别工厂法限制的棉花、羊毛等印花厂中表现得荒诞离奇。按照这项法令的规定,

“每个儿童在到这种印花厂就业以前,必须在他就业第一天前的6个月内至少上学30天,并且不得少于150小时。他在印花厂就业期间,每过6个月仍须上学30天,而且是150小时。上学时间应在早晨8点至下午6点之间。每天上学的时数少于 $2\frac{1}{2}$ 小时或超过5小时,都不得算入150小时之内。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在30天内上下午都上学,每天5小时,30天期满,就达到规定的总数150小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读完了书,然后他们又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劳动6个月;到下一个上学期限,他们又去上学,直到又读完了书为止,以此类推……许多按规定上过150小时学的儿童,在印花厂呆了6个月以后再回到

(144) 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31、32页。

(145) 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4月30日》第17[、18]页。

(146) 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66页。

学校时,情形和刚上学时一样。他们自然又把前一次上学所学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一些棉布印花厂,上学的事完全取决于工厂的劳动需要。每6个月内所必须达到的时数是由每次3—4小时零碎凑成的,而且分散在这6个月内。例如,一天是从上午8点到11点上学,另一天是从下午1点到4点上学,儿童有些天不上学之后,接着又从下午3点到6点上学,连续上三四天或1个星期,然后又停3个星期或1个月。而当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零星日子里,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时,因此,儿童可说是被推来推去,从学校推到工厂,再从工厂推到学校,直到凑满150小时为止”(147)。

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仍在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148)

(b) 工作日的延长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么,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在它首先占领的工业部

(147) 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10月31日》第41—43页。在早就受真正意义上的工厂法(不应把它与印染工厂法混为一谈)约束的英国工业部门,实行教育条款的障碍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在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玻璃厂主J.格迪斯的观点依然十分盛行。他向调查委员会委员怀特表示了这种看法:“据我看来,近几年来一部分工人阶级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是一种祸害。这是特别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们成为过分独立的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53页)。

(148) “工厂主E.……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家庭人口多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阿什利勋爵3月15日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20页)

门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体现资本的特点的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别人劳动的贪欲。

首先,变成了机器的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劳动者而独立了。劳动资料现在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的力量,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自动机作为资本,在资本家身上体现为人。它燃烧着一种欲望,它要使具有弹性的人紧张起来,并粉碎他的一切反抗。⁽¹⁴⁹⁾

机器上的劳动看来很容易,妇女和儿童又比较温顺驯服,这些都助于自动机从事这种奴役性劳动。⁽¹⁵⁰⁾

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限越长,分担机器加进的价值的

(149) “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所能提供的力量。”(罗伯特·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第2版)

(150) 英国人喜欢把一个社会现实的存在理由同这个现实最初借以表现出来的历史条件混为一谈。他们往往认为,工厂劳动时间长的原因,只是因为机器制度初期,资本曾在贫民院和孤儿院对儿童进行了希律王式的大规模掠夺²⁷⁷,从而吞并了一种完全没有意志的人身材料。例如,身为英国工厂主的菲尔登就说过:“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全国各地提供了大量儿童,这使工厂主感到自己是独立的,于是就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的人身材料建立起一种习惯,后来也就能更加容易地把这种习惯强加在他们的邻人身上。”(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关于妇女劳动,工厂视察员桑德斯在1843年的工厂报告中说:“在女工中,有些人接连好多星期,除了少数几天以外,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深夜12点,中间有2小时的吃饭时间,因此,一星期当中有5天,都是每天24小时中只剩下6小时给她们上下班和睡觉。”

产品量就越大,归于每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而机器的有效寿命,显然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或每天劳动过程的长度乘以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日数。

机器的损耗绝不像在数学上那样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时间相一致。假定二者相一致,一台在 $7\frac{1}{2}$ 年内每天工作 16 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和同样一台在 15 年内每天只工作 8 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机器价值的再生产要比第二种情况下快一倍,而且资本家用这台机器在 $7\frac{1}{2}$ 年内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种情况下 15 年内才能吞下的剩余劳动。

机器的有形损耗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使用,就像铸币由于流通而磨损一样。另一方面是由于不使用,就像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受到自然作用的侵蚀。前一种损耗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151)

除此之外,机器还有所谓无形损耗。随着同样结构的机器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随着经过改良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152) 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现在其中的劳

(151) “机器搁置不用,是精密的可转动的金属部件遭受损坏的原因。”(尤尔《工厂哲学》1836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8 页)

(152) 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位曼彻斯特纺纱业主(1862 年 11 月 26 日《泰晤士报》)说:“它(即为机器磨损而作的扣除)也有这样的目的:当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新的机器代替而停止使用时,用来补偿这样不断造成的损失。”

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的再生产或经过改良的机器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了。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期越短,无形损耗的危险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长,这个再生产时期就越短。在某个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时,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的新方法会接连不断地出现⁽¹⁵³⁾。然后,不仅出现了个别部分或装置的改良,而且出现了对整个构造的改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机器的最初的生活期成了延长工作日的激烈时期。⁽¹⁵⁴⁾

在工作日已定和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剥削双倍的工人,就必须把投在厂房、机器、原料、辅助材料等等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增加一倍。但是,工作日的延长可以扩大生产的规模,而不必增加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固定资本部分。⁽¹⁵⁵⁾因此,不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获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开支减少了。当然,只要延长工作日,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它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预付资本部分所占的比重更

(153) “根据一般的估算,制造第一台新型机器的费用,是制造第二台的五倍。”(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3年巴黎版第349页)

(154) “几年来,网布的生产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良,以致一台保养得很好的原来价值1200英镑的机器,几年后就只能卖60英镑了……改良迅速地接连出现,以致机器在其制造者手中半途而废,因为成功的发明已使它们过时。”因此,在这个狂飙时期,网布厂主自然要使用两班工人,把劳动时间从原来的8小时延长到24小时。(同上,第377、378、379页)

(155) “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物和机器的开支,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材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64页)

大了。⁽¹⁵⁶⁾实际上,机器生产的发展使资本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一方面资本可以不断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英国棉纺织业巨头阿什沃思先生曾教训纳索·威·西尼耳教授说:

“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 12 便士(1 法郎 25 生丁)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 10 万镑²⁷⁸(25 万法郎)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¹⁵⁷⁾

请想一想吧!把一笔值 10 万镑的资本变成了——即使在一瞬间——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竟然擅自离开工厂,这简单是大逆不道!上面这位被阿什沃思教训过的西尼耳终于承认,投在机器上的固定资本部分的不断扩大,使工作日的不断延长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¹⁵⁸⁾

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日用商品的价格下降,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

(156) 本文谈到这点,只是为了叙述上的全面性,因为我要到第三册¹³¹才考察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

(157) 西尼耳《关于工厂法的书信》1837 年伦敦版第 14 页。

(158) “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劳动时间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随着机器等等规模的增大……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本带来利润的唯一手段”(同上,第 11、14 页)。“一个工厂,不管它的劳动时间长短,有许多开支是始终不变的,如建筑物租金、地方税和国税、火灾保险费、各种固定工人的工资、机器折旧费以及其他种种费用。这些开支同利润的比率,会随着生产规模的减小而按同一比例增大。”(《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 年 10 月 31 日》第 19 页)

偶尔被采用时，会把机器占有者使用的劳动变为高效率的劳动。这种高效率劳动的产品所具有的社会价值高于其个别价值，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收益中较小的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还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而资本家也就企图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蜜月时期。高额的利润激起了贪欲。

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述规律就得到了证实：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相反地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只是来源于资本的可变部分，而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分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现在很明显，不管机器生产怎样提高劳动生产力，靠减少必要劳动来增加剩余劳动，它只有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变为活劳动力的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即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不变的组成部分。但是，例如从两个工人身上榨不出从24个工人身上同样多的剩余价值。24个工人每人只要在12小时中提供一小时剩余劳动，他们总共就提供24小时剩余劳动，而两个工人的全部劳动在工作日的界限为12小时的情况下，只不过是24小时。可见，以增加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机器的利用，包含着一个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的利用使一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但同时却减少了另一个因素即工人人数。一旦所有同类商品的社会价值随着机器在一个工业部门普遍

应用而由机器生产的产品价值来规定,这个内在的矛盾就会表现出来;但正是这种矛盾⁽¹⁵⁹⁾本能地推动资本家拼命延长工作日,以便不仅增加相对剩余劳动,而且增加绝对剩余劳动,来弥补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

因此,资本手中的机器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它使劳动方式和集体劳动者的社会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一切抵抗,最后,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成为后备军,制造了过剩的工人人口⁽¹⁶⁰⁾,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由此产生了近代工业史上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奇妙地转变为把劳动者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变成可以自由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幻想过: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自己去完成它所担负的工作,就像代达罗斯^①的工艺品那样会自己动作,或者像武尔坎^②的鼎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么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¹⁶¹⁾

(159) 为什么资本家以及与资本家持相同看法的政治经济学意识不到这个矛盾,我们将在第三册头几篇中看到。

(160) 西斯蒙第和李嘉图的功绩是把机器不仅看做生产商品的手段,而且看做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

(161) 弗兰茨·比泽《亚里士多德的哲学》1842年柏林版第2卷第408页。

① 代达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编者注

② 武尔坎是古罗马人的火神和打铁业保护神。——编者注

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做是女奴隶解放的曙光和黄金时代的复兴！⁽¹⁶²⁾噢，这些异教徒！巴师夏先生继他的先师麦克库洛赫之后，发现这些人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例如，他们就不懂得，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机器那样延长工作日。他们辩护说，一些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些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大银行家”和“有势力的改良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基督教行善的本领。

(c) 劳动的强化⁽¹⁶³⁾

资本家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每日劳动的无限度的延长，使社会生命根源受到威胁，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从那时起，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劳动强化现象，就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首先涉及的是劳动的持续时间，而劳动

(162) “磨房姑娘啊！珍惜你们推磨的手，
安静地睡吧，不用管雄鸡向你们报晓！
女神已派水妖替你们效劳。
她们轻盈地跳到轮上。
轮轴转动了，石磨旋转着。
让我们像祖先一样地生活，不必再劳碌。
让我们享受女神赐给的恩惠吧！”
(安谛巴特洛斯)

(163) 我们用强化一词来表示使劳动更为紧张的方法。

的平均强度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们要考察一种量怎样转化为另一种量，即外延量怎样转化为内涵量。

显然，随着机器的进步和专门的机器工人阶级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自然也会增加。例如，英国工厂在半个世纪内，工作日的延长同劳动强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时并进的。但是很明显，在活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划一、有规律和日复一日地进行的情况下，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

自从工人阶级不断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行规定（首先为真正的工厂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国家禁止用累进增加劳动时间的方法来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

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力量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劳动时间生产出的交换价值，仍然和以前同样多，虽然这个交换价值实现在更多的产品上，因此单独地看，其中每个产品的价格下降了。

但是，一旦法律规定缩短工作日，情况就不同了。法律规定缩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动了机器体系的发展和费用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增加劳动消耗，更紧密地填满他的工作日的空隙，使劳动凝缩到不缩短工作日就不能达到的程度。

现在要从两个方面来计算劳动量，即一方面要根据劳动的持续

时间或劳动的外延量,另一方面要根据劳动的强度,也就是说压缩在一定时间,例如一小时内的劳动量。⁽¹⁶⁴⁾十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紧张的小时,同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松弛的小时相比,会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劳动,即更多的已耗费的活的生命力。因此,十小时工作日的一小时同十二小时工作日的 $1\frac{1}{5}$ 小时相比,会生产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 $3\frac{1}{3}$ 小时剩余劳动和 $6\frac{2}{3}$ 小时必要劳动,也会和从前4小时剩余劳动和8小时必要劳动一样,给资本家提供至少同样大的相对剩余价值量。

现在要问,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

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即任何动物力的作用能力都同它的作用时间成反比。在一定的限度内,在效力上的所得就是在持续时间上的所失。

在工场手工业中,例如,在机器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作用的陶器业中,工厂法的实行清楚地证明,单单缩短工作日,就惊人地增加了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效能。⁽¹⁶⁵⁾但是,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里,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这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因此,当1844年讨论把工作日缩减到12小时以下的问题时,工厂主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的监工在各个车间,都注意不让人手浪费时间”,“工人专心致志的程

(164) 不同种类的劳动由于它们本身的性质不同往往要求不同的劳动强度。这种差别,正如亚·斯密指出的,会因每种劳动的其他特点,而互相抵消。只有当劳动的外延量和劳动强度成为同一劳动量的彼此排斥的两种表现时,这种差别才会影响到劳动时间充当价值尺度的作用。

(165)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

度可以说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机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厂里，通过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来获得任何显著的成果，是荒谬的”⁽¹⁶⁶⁾。

这种说法被事实驳倒了。罗·加德纳先生从1844年4月20日起，在普雷斯顿他的两个大工厂里，把劳动时间由每天12小时改为11小时。大约一年的实验表明：

“花费同样多的开支，得到同量的产品，而工人11小时挣的工资，和以前12小时挣的同样多”⁽¹⁶⁷⁾。

我没有谈到纺纱间和梳棉间的实验，因为机器的速度在那里提高了2%。相反地，在织造各式各样细花时装布的织布间，物质生产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是：

“从1844年1月6日到4月20日，每天干12小时，每个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 $1\frac{1}{2}$ 便士，从4月20日到6月29日，每天干11小时，平均工资是10先令 $3\frac{1}{2}$ 便士。”⁽¹⁶⁸⁾

因此，11小时比以前12小时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完全是由于工人更持久、更划一的劳动和节约时间造成的。工人拿到同样的工资，并得到一小时的空闲时间；而资本家得到同量的产品，并节约了一小时煤气、煤炭等的消耗。在霍罗克斯先生和杰克逊先生的工厂

⁽¹⁶⁶⁾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和截至1845年4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第20、21页。

⁽¹⁶⁷⁾ 同上，第19页。因为生产一米布工人得到的工资和以前一样，所以他们的周工资额取决于生产的米数。

⁽¹⁶⁸⁾ 同上，第20页。

里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并且得到了同样的结果。(169)

一旦由法律缩短工作日,资本家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在每一时刻榨取比以前更多劳动的系统的手段。如果要使机器对它的人身奴仆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就必须改进机器,何况由于工作日的缩短,资本家也不得不把生产的各个发条上紧并节约生产费用。

蒸汽机的改进提高了活塞每分钟的冲击次数,同时由于力的巧妙的节省,用同一容量的发动机就能推动更大的机构,而耗煤量照旧不变。由于传动装置各器官的摩擦力减少了,各种大小轮轴、齿轮、滚筒的直径和重量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发动机的增大的推动力可以更迅速地被传送到工作机的各个部件上。机器本身也改进了。工具机的活动性和效能提高了,而它们的体积却缩小了(如现代蒸汽织机),或者工具机在增大机体的同时,扩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规模和数量(如纺织机),最后,这些工具不断发生细小的变化(如大约十五年前,自动走锭纺纱机的纱锭转速就提高了 $\frac{1}{5}$)。

英国在 1832 年开始把工作日缩短到 12 小时。在 1836 年,一个英国工厂主就说过:

“同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劳动者更加聚精会神,更多地活动。”(170)

1844 年,阿什利勋爵,即现在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下院所作的

(169) [同上,第 21 页]在上述实验中,精神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人对工厂视察员说:“我们更加振奋地工作,我们心中总是抱着晚上可以早一点下班的希望;全厂从最年轻的工人到最年老的工人,都充满了活泼愉快的精神,因此我们能够在劳动中彼此多帮助。”(同上)

(170) 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 年伦敦版第 32 页。

关于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发言中说出了下列事实：

“现在，在制造的各种操作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毫无疑问，机器体系完成了需要成百万人的肌肉才能完成的工作。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1815年，工人在12小时内来回看管两台纺40支纱的走锭纺纱机，等于步行8英里。1832年，等于步行20英里，并且往往还要多。⁽¹⁷¹⁾ 1825年，一个纺纱工人在12小时内，在每台走锭纺纱机上牵伸820次，在二台走锭纺纱机上的牵伸总数就是1640次。1832年，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在每台走锭纺纱机上牵伸2200次，合计是4400次；1844年，在每台走锭纺纱机上牵伸2400次，合计是4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要想估计一个工作日的疲劳程度还应该把工人必须完成的4000次或5000次向相反方向的转身动作以及不断为屈身和直立所做的努力计算进去⁽¹⁷²⁾……现在，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而且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需要付出更艰苦的劳动……在梳棉间，劳动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的活……织布间雇用的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000绞，1843年达到21000绞。1819年，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¹⁷³⁾

鉴于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劳动在1844年就已达到这样惊人的强度，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说工作日的进一步缩短必然会

(171) 工人所看管的走锭纺纱机交替地前进和后退，当机器前进的时候，纱束被牵伸，形成拉长的纱线，接头工必须利用移动台接近机架的瞬间把断纱接上或把乱纱切断。阿什利勋爵引用了专门派往曼彻斯特的一位数学家作出的计算。

(172) 这里指的是同时在两台位置相对的走锭纺纱机上操作的纺纱工人的劳动。

(173) 散见阿什利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

引起生产的相应的缩减,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这种看法表面上的正确性,在我们的无情的检查官、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当时对这个问题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由于产量由机器的速度来调节,工厂主所关心的必定是设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点,而又不违背下列条件:保护机器以免损坏得太快,保持产品的质量,使工人能够跟上机器的运转,而又不过分疲劳,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工厂主过分地加快了运转,这样,损坏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偿失,工厂主又不得不马上放慢机器的速度。因为精明能干的工厂主会找到正常的最高限度,所以我得出结论,11小时不可能生产出和12小时一样多的产品。同时我认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超过这个极限,他就不可能经常保持同样的劳动强度了。”(174)

因此,尽管有加德纳等人的实验,霍纳还是得出结论说:把工作日缩短到12小时以下,产品数量就一定会减少。(175)但是10年以后,霍纳自己引用他1845年的疑虑,来证明他当时还是多么不了解机器体系和人力所具有的弹性。这二者同样会由于工作日的强制缩短而紧张到极点。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1847年以后,英国毛、亚麻、丝、棉纺织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¹⁴⁰以来的时期。

“纱锭的转速,在翼锭纺纱机上每分钟增加了500转,在走锭纺纱机上每分钟增加了1000转,也就是说,翼锭纺纱机纱锭的转速在1839年是每分钟4500转,现在(1862年)是5000转,而走锭纺纱机纱锭的转速原来是每分钟5000转,现在是6000转;前者的转速增加了 $\frac{1}{10}$,后者的转速增加了 $\frac{1}{6}$ 。”(176)

(17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5年4月30日》第20页。

(175) 同上,第22页。

(17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62页。

1852年，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夫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内史密斯，在给伦纳德·霍纳的一封信中解释了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蒸汽马力仍然是按1828年的旧功率计算的⁽¹⁷⁷⁾，这种马力只是额定马力，只能当做实际马力的指数。他还说：

“毫无疑问，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只经过现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为每分钟220英尺的时候，提供50蒸汽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减少了……同一额定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锅炉容积的缩小和结构的改良等等，能比以前发出更大的推动力……因此，虽然同额定马力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和过去一样，但是同工作机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则减少了。”⁽¹⁷⁸⁾

1850年，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134 217额定马力，推动25 638 716个纱锭和301 445台织机。1856年，纱锭数是33 503 580个，织机数是369 205台。因此，根据1850年的基数来计算，1856年就需要175 000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只有161 435马力，也就是说，减少了1万多马力。⁽¹⁷⁹⁾

“1856年的最近的报告〈官方统计〉确证了下述事实：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

(177) 这种情形从1862年的《议会报告》起有了改变。这份报告已经不用额定蒸汽马力，而用现代蒸汽机和水车的实际马力。同样，线锭也不再和真正的纱锭混在一起了（在1839、1850、1856年的《报告》中是混在一起的）；其次，就毛纺织厂来说，“起毛机”的数目列举出来了，黄麻、大麻厂同亚麻厂区别开来了；最后，在报告中第一次收入了织袜业。

(17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4、20页。

(179) 同上，第14、15页。

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具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产品量大大增加了。”⁽¹⁸⁰⁾“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这种改进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一个已经缩短了两小时或 $\frac{1}{6}$ 的工作日内干的活，至少和以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干的活一样多。”⁽¹⁸¹⁾

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工厂的数目，从1838年到1850年间平均增加32个，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平均增加86个。²⁷⁹

从1848年到1856年8年间，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国工业有了这样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在1856年到1862年这以后的6年间，又被远远地超过了。例如丝织厂，1856年有1 093 799个锭子和9 260台织机；1862年有1 388 544个锭子和10 709台织机。但是，工人人数1856年是56 137人，1862年是52 429人。因此，锭子数增加了26.9%，织机增加了15.6%，而劳动者人数却同时减少了7%。精梳毛纺织厂使用的锭子，1850年是875 830个，1856年是1 324 549个（增加51.2%），1862年是1 289 172个（减少2.7%）。但是，1856年的数字把线锭计算在内，而1862年的数字没有把线锭计算在内，如果把线锭减去，那么，1856年以来锭子数是相当稳定的。相反地，1850年以来，在许多地方，锭子和织机的速度增加了1倍。精梳毛纺织厂的蒸汽织机，在1850年是32 617台，1856年是38 956台，1862年是43 048台。这种工厂的工人人数，在1850年是79 737人，1856年是87 794人，1862年是86 063人；但是其中14岁

(180) 同上，第20页。

(18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10页。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及以下几页。

以下的童工,1850年是9 956人,1856年是11 228人,1862年是13 178人。可见,同1856年比较起来,1862年虽然织机数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工人总数大大减少了,而被剥削的童工总数却增加了。(182)

1863年4月27日,议员费伦德在下院说:

“我受兰开夏郡和柴郡16个区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这里讲话。他们告诉我,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过去一个人带着助手,看管两台织机,现在没有助手,要看管三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四台织机等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12小时的劳动,现在压缩在不到10个劳动小时当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几年来工厂工人的辛劳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183)

因此,虽然工厂视察员不倦地、十分正当地颂扬1844年和1850年的工厂法的好处,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缩短工作日,已使劳动凝缩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工人的劳动力本身的地步。

“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和丝织厂等等里,机器的运转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184)

(18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00、[103、129、]130页。

(183) 现在,一个织布工人使用两台现代蒸汽织机,在每周60小时内,可生产出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某种布26匹,而使用旧式的蒸汽织机,只能生产4匹。19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布每匹的织造费就已由3法郎40生丁下降到52生丁。²⁸⁰

“30年前(1841年),棉纺厂的一个棉纺工人带2个助手,只看管两台共有300—324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现在,一个棉纺工人带5个助手要看管几台共有2 200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生产的纱至少比1841年多六倍。”(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载于1872年1月5日《技艺协会杂志》)

(18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5、26页。

毫无疑问(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体系的每一改进变成新的剥削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¹⁸⁵⁾另一方面,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在1833—1847年时期,即实行十二小时工作日时期,超过了实行工厂制度以来的最初半个世纪,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时期,而从1848年开始的十小时工作日时期又超过了1833—1847年时期,而且超过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¹⁸⁶⁾

(185) 1867年,在兰开夏郡的工厂工人中已经开始宣传八小时工作日了。

(186) 下面的一些数字可以说明1848年以来联合王国的真正的工厂的进步:

名 称	输 出 量			
	1848年	1851年	1860年	1865年
棉纺织厂				
棉纱(磅)	135 831 162	143 966 106	197 343 655	103 751 455
棉线(磅)		4 392 176	6 297 554	4 648 611
棉织品(码,1 码=0.914米)	1 091 373 930	1 543 161 789	2 776 218 427	2 015 237 851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磅)	11 722 182	18 841 326	31 210 612	36 777 334
麻织品(码)	88 901 519	129 106 753	143 996 773	247 012 329
丝织厂				
各种丝线(磅)	194 815	462 513	897 402	812 589
丝织品(码)		1 181 455	1 307 293	2 869 837
毛纺织厂				
毛纱(磅)		14 670 880	27 533 968	31 669 267
毛织品(码)		151 231 153	190 371 537	278 837 418

4. 工 厂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研究了工厂的躯体。即机器体系。后来我们

名 称	输 出 价 值 (镑)			
	1848 年	1851 年	1860 年	1865 年
棉纺织厂				
棉纱	5 927 831	6 634 026	9 870 875	10 351 049
棉织品	16 753 369	23 454 810	42 141 505	46 903 796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	493 449	951 426	1 801 272	2 505 497
麻织品	2 802 789	4 107 396	4 804 803	9 155 358
丝织厂				
各种丝线	77 789	196 380	826 107	768 064
丝织品		1 130 398	1 587 303	1 409 221
毛纺织厂				
毛纱	776 975	1 484 544	3 843 450	5 424 047
毛织品	5 733 828	8 377 183	12 156 998	20 102 259

(见蓝皮书¹⁰《联合王国简要统计—览》1861年和1866年伦敦版第8卷和第13卷)

1839年到1850年间,兰开夏郡的工厂总数只增加了4%,1850年到1856年间增加了19%,1856年到1862年间增加了33%;在两个11年中间,雇用的职工人数绝对地说增加了,相对地说减少了,也就是同生产和机器总数相比来说减少了。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63页。在兰开夏郡,棉纺织工厂占统治地位。它们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同类工厂中占45.2%,占联合王国的纱锭总数的83.3%,占蒸汽织机总数的81.4%,占动力总数的72.6%,占雇用职工总数的58.2%(同上,第62、63页),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它们在纺织业中相应的地位。

看到,在资本家手中,机器体系是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通过日益强化工人的劳动以便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生产越来越大的价值量,来增加剥削的人身材料和提高对它的剥削程度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处于最发达的形式上的工厂的整体。

尤尔博士,这位工厂的平达,给工厂下了两个定义。一方面他把工厂描写成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掌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

“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支配,从而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

这两个定义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个定义中,集体劳动者或社会劳动体是占支配地位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是集体劳动者或社会劳动体的**客体**;在后一个定义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劳动者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附属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第一个定义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应用,第二个定义表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特征,从而表明了现代工厂的特征。因此,尤尔喜欢把中心动力不仅描写成**自动机**[*automate*],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autocrate*]。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并给每个人分配必须承担的职务。”(187)

(187) 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19、20、26页。

使用工具的技巧,也同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由于工具的功能从人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因此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也就消失了。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¹⁸⁸⁾,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

就分工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而言,这种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化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并不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有组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他的助手,例如,纺纱工同接头工的联系代替了。

劳动者基本上分为两类,即操作工具机的劳动者(包括某些烧蒸汽锅炉的工人)和粗工(几乎完全是儿童,他们依附于前者)。所有为机器提供原料的“feeders”(添料工)或多或少地都算在这种粗工之内。除了这两类主要劳动者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的劳动者,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¹⁸⁹⁾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

(188) 同上,第20页。参看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40、141页²⁸¹。

(189) 英国的工厂立法把正文中提到的后一类劳动者明确地算做非工厂工人,排斥在工厂立法的作用范围以外;而议会发表的《报告》却也同样明确地不但把工程师、机械师等,而且把工厂管理人员、营业员、仓库管理员、外勤人员、包装工等,总而言之,把工厂主以外的一切人都列入工厂工人的范畴——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大机器所使用的工人的表面上的数字。

每个儿童都能轻而易举地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是一个由互相结合并同时动作的局部的机器构成的分阶段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工人分配到局部的机器和机组上去。但是,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¹⁹⁰⁾因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所以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期间所实行的换班制度,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最后,儿童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完全没有必要把使用机器变成一种特殊的劳动者的专门职业。⁽¹⁹¹⁾在工厂里,单纯的粗工干的活大部分可以用机器来代替,而且由于这种活十分简单,从事这种劳动的人员可以定期地迅速地更换。⁽¹⁹²⁾虽然从技术的观点来看,机器

(190) 尤尔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经理可以随意把工人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他还得意扬扬地叫嚷:“这样调换显然违背了让一个人做别针针头,另一个人磨别针针尖的那种分工的老规矩”²⁸²。他本应问问自己,为什么自动工厂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废除这个“老规矩”。

(191) 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例如美国南北战争⁷期间,工厂工人会破例地被资产者用来干最粗笨的活,如筑路等等。1862年及以后几年英国为失业的工厂工人设立的国家工场,和1848年法国的“国家工场”的区别在于:在后者,工人由国家出钱从事非生产劳动,在前者,工人则为市政当局的利益而从事生产劳动;同时使用这样的工人比使用正规工人更便宜,从而迫使他们和正规工人竞争。“棉纺厂工人的身体,看起来无疑是变好了,我认为……就男工而论,这是在户外从事公共工程的结果。”(这里指的是清理普雷斯顿沼泽的普雷斯顿的工人。)(《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59页)

(192) 例如:自从1844年的法律¹⁰⁴颁布以来,毛纺织厂就采用各种机械装置代替儿童劳动。当工厂主们使用的儿童必须上粗工学校时,力学中这个几乎尚未开拓的领域马上就有了显著的发展。

体系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这种旧制度仍然在工厂里延续着,首先是作为工场手工业遗留下来的传统,后来被资本当做剥削的系统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巩固和恢复。过去是终生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生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从自己的幼年开始就变成一部机器的一部分,而这部机器本身又是另一部机器的一部分。⁽¹⁹³⁾这样,不仅工人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了,而且工人对工厂的绝对依赖,从而对资本的依赖也完成了。在这里,像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劳动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生产率的增长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生产率的增长区别开来。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工人只是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并入死机构。

“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劳动;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

“自动走锭纺纱机是一种最危险的机器。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幼童身上,这是由于他们在纺机开动时爬到它下面去扫地造成的……如果能发明一种自动扫地机,那将是对我们的保护措施值得庆幸的贡献。”(《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63页)

(193) 因此,我们就可以来评价蒲鲁东的这种绝妙的看法;他认为机器不是劳动资料的综合,而是“一种把由于分工而分离的劳动的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的方法”。²²⁴此外,他还做出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和惊人的发现:“机器时代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制”。

地、无情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劳动者身上。”⁽¹⁹⁴⁾

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剥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¹⁹⁵⁾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趣味。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创造有用物,而且还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不是工人支配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支配工人。但是,只有机器才第一次使这种颠倒具有技术上的现实性。变成了自动机的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以资本即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的形式同工人相对立。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机器大工业最终完成了体力劳动同生产的智力的分离,并把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工人的技巧,在令人惊异的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大规模的社会劳动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科学、巨大的自然力、大规模的社会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构成主人的权力。在这位主人的头脑中,他对机器的垄断和机器的存在混在一起了。在他同人手发生冲突时,他就轻蔑地对他们说: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因为只要用最短的时间

(194)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²⁸³。甚至一个很普通的天性乐观的自由贸易论者莫利纳里先生也指出:“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运转15小时,比他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由于长期从事这种劳动,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损害。”(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概论》1846年巴黎版[第49页])

(195)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6页²⁸⁴。

和最少的训练,就可以获得这种劳动所需的全部技能。在生产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只需要6个月的训练,并且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学会。”(196)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集体劳动者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在工厂制度中,所谓的监督劳动以及把工人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达到了它们的最终发展阶段。

“主要困难不在于发明自动机器……困难主要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197)

资本家把资产阶级大力鼓吹的分权制²⁸⁵和十分迷恋的代议制抛到了一边,他在工厂法典中通过私人立法任意地确立了对人手的专制。尽管如此,这种法典只不过是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讽刺画。在这里,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狡猾,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

(196) 《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委员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后面可以看到,当“主人”感到他们的“活的”自动机有丧失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

(197) 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22、23页。了解阿克莱生平的人,决不会把“高尚”这个字眼加到这位天才的理发师头上。在18世纪的所有大发明家中,他无疑是偷盗别人发明的最大的贼。

他们更有利。(198)

(198) “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在工厂制度上暴露得十分明显。在这里，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2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10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把他的睡眠和吃饭都打断了。工厂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唐的东西，法院还是会劳动者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现在就履行它……这些劳动者注定了从9岁起无论肉体上和精神上都要受到这样的折磨，一直到死为止。”（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及以下几页²⁸⁴）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法院说的话”。一件事是1866年底在设菲尔德发生的。那里，一个工人同一家铁工厂订了两年合同。由于同工厂主吵了一次架，他离开了工厂，并表示决不再给这个工厂主干活了。结果他被控违反合同，判了两个月监禁。（要是工厂主违反合同，只能受民法制裁，只有罚款的危险。）两个月刑满出狱后，那个工厂主又要他按旧合同回厂工作。这个工人拒绝了，说他已经服了刑。工厂主又把他告了，法院又对他判刑，虽然其中一位法官希先生公开指责说，一个人为了同一过失或罪行，要一辈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处罚，这在法律上是荒谬的。作出这个判决的，不是“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①，不是外省的“乡下人”，而是伦敦的一个高等法院。——第二件事是1863年11月底在威尔特郡发生的。韦斯特伯里利这个地方的利奥韦呢绒厂主哈鲁普雇用的约30名蒸汽织机女工举行了一次罢工，因为这个哈鲁普有一个称心的习惯，对早晨迟到者要扣工资：迟到2分钟扣6便士，迟到3分钟扣1先令，迟到10分钟扣1先令6便士。这样一小时要扣12法郎 $\frac{1}{5}$ 生丁，一天就要扣112法郎50生丁，但是她们全年的平均工资每周从来没有超过12—14法郎。哈鲁普还配备了一个男孩吹上工哨。有时这个男孩在早晨6点以前就吹哨了，哨声一停，工人没有赶到，工厂就关上大门，门外的人都要罚款；因为厂里没有钟，不幸工人都受哈鲁普指使的小鬼的摆布。举行罢工的母亲们和少女们说，只要

① 威·科贝特称那些由各郡绅士组成的治安法官为“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编者注

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机器震耳欲聋的噪音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可怕的机器的四面八方的包围中所冒的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¹⁹⁹⁾

用钟来代替报时员，规定较合理的罚款，她们就愿意复工。哈鲁普以违反合同为理由把 19 个妇女和少女告到了治安法官那里。他们每人竟被判罚款 6 便士，诉讼费 2 先令，旁听者都目瞪口呆。哈鲁普离开法院时，一群人跟在他后面嘘叫。

工厂主惯用的一种伎俩是，借口工人提供给工厂主的产品质量不好而通过扣工资来惩罚工人。1866 年，这种方法引起了英国陶业区的总罢工。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63—1866）列举一些事例，说明工人做了工不仅得不到工资，反而由于罚款规定竟成了自己乐善好施的主人的债务人。最近的棉业危机也提供了很有教益的实例，说明工厂的慈善家们在扣工资方面是多么精明。工厂视察员罗·贝克说：“不久前，我本人不得不对一个棉纺织厂主起诉，因为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从他雇用的某些少年（13 岁以上的）工人身上扣 10 便士，作为他只花 6 便士领来的医生的年龄证明书的费用，按法律规定只准扣 3 便士，按照习惯是根本不扣的……另有一个工厂主，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又不触犯法律，在医生证明替他做工的穷孩子适于纺纱时，向他们每人收一先令，作为学会纺纱技术和秘诀的学费。因此，存在着暗流，不了解这种暗流，就不能了解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发生的像罢工（指 1863 年 6 月达温的机器织布工人的一次罢工）这样的非常现象。”（《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4 月 30 日》）（工厂报告记载的日期总是晚于它的正式日期）

(199) “关于操作危险机器的保护法起了有益的作用。

但是现在又有一些 20 年前所没有的造成事故的新根源，其中尤其是机器的转速的加快。现在，推动机轮、转轴、纱锭和织机的力量不断增加；接断头时，手指的动作必须更迅速更小心，因为稍一怠慢或疏忽，手指就会被轧断……很多事故都是因为工人急于干完自己的活造成的。必须记住，对工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他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就是说，不停地生产出纱和布来。每一分钟的停顿不仅是动力的损失，而且是产品的损失。因此，从金钱出发关心产品数量的监工督促工人使机器转动，而这对于按制品重量或件数计酬的工

集体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室中才得到促进并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保护措施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200)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²⁸⁶难道不对吗?(201)

人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虽然大多数工厂形式上禁止在机器转动时擦洗机器,但这种做法仍普遍存在。单是这个原因,最近6个月就造成了906起灾难性事故。虽然机器天天都擦洗,但是每星期五,特别是每星期六,被专门规定来做这件事,而这多半是在机器运转的时候进行……干这个活是没有报酬的,因此工人总想尽快地把它做完。所以,星期五发生的事故比前4天的平均数大约超过12%,星期六则比前5天的平均数多25%;但是,星期六的工作日只有 $7\frac{1}{2}$ 小时,如果把这一点也计算在内,那么,星期六的超过数字就在50%以上。”(《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1867年伦敦版第9、15、16、17页)

(200) 在第三册²⁰⁷第一篇里,我将叙述英国工厂主对工厂法中有关保护工人不受机器损害的条款所发动的进攻。在这里,只要引用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的正式报告中的一段话就够了:“我听过工厂主们抱着令人不能容忍的轻率态度谈论某些事故,例如,认为损失一个手指不过是区区小事。然而,一个工人的生活 and 前途都要靠他的手指,这种损失对他说来有致命的后果。当听到这种胡说八道的时候,我立刻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假定你们需要补充一个工人,但来了两个,他们在其他各方面都同样能干,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大拇指或食指,那么你们挑选哪一个呢?’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说,要那个十指俱全的人……这些工厂主先生们对他们所说的伪善立法抱有错误的偏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这些先生都是狡猾的同谋犯,他们对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热烈地欢呼并不是没有目的的!

(201) 在最早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里,过去的某些弊端已经消除。机器体系的进一步改进,到一定时候就要求改进厂房的结构,这对工人是有利的。(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09页)

5. 劳动者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工业资本的起源本身一起开始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²⁰²⁾但只是在采用机器后，劳动者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劳动者奋起反对被他看做资本的技术化身的这种特殊形式的工具。

17世纪，反对所谓 **Bandmühle** 或 **Mühlenstuhl** 即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这种机器是在德国发明的。意大利神父朗切洛蒂在一本写于1579年并于1636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书中说道：“大约50年以前，但泽人安东·弥勒在该城市看到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制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勒死或溺死。”²⁸⁷

1629年，在莱顿第一次采用了这种机器。花边工人的暴动迫使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机器。博克斯霍恩在谈到这件事时说道：“大约20年前，这个城市有人发明了一种织机，使用这种织机，在同样时间

(202) 参看约翰·霍顿《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进》1727年伦敦版，《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版，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不幸的是，业主和工人彼此处于一种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中。业主的一贯目的是要使自己的活尽可能廉价地得到完成；他们不惜使用各种诡计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工人同样也总想利用一切机会要求更高的工资”《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纳撒尼尔·福斯特牧师是这部对工人表示同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

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所织的还要多的东西。因此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直到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²⁰³⁾荷兰国会在1632、1639等年份对这种机器曾颁布过几道程度不同的禁令,最后,1661年12月5日法令才准许在一定条件下使用这种机器。

1676年织边机在科隆被禁止使用,同一时候它输入英国,也引起了织工的骚动。1685年2月19日,德皇颁布敕令,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1719年2月,查理六世重申1685年的敕令,而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到1765年才准许公开使用它。

这种轰动欧洲的机器,实际上是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先驱,因而也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序曲。一个毫无织布经验的少年,只要来回推动这种机器的摇杆,就能使整个机器及其全部织梭运动;改良后的这种机器能同时生产40—50条花边。

17世纪30年代末,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被民众捣毁。18世纪初在英国,水力锯木场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议会支持的民众反抗。1758年,埃弗里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10万名由它所造成的失业者焚毁了。5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发明的梳毛机和梳棉机²⁸⁸。19世纪最初15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即所谓鲁德运动²⁸⁹,为西德茅斯、卡斯尔雷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²⁹⁰提供了借口。

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不是

(203) 博克斯霍恩《政治原理》1663年版。

攻击物质生产资料而是攻击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方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204)

工场手工业工人是为了提高工资,而不是为了破坏工场手工业而进行斗争。阻碍建立工场手工业的,是行会师傅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不是雇佣工人。

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著作家认为,分工是补充工人不足的潜在手段,而不是排挤在业工人的手段。这个区别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我们说,现在英国 5 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 2 亿人,这当然不是说纺纱机排挤了这从来没有存在过的 2 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大量增加工人人口。反过来,我们说,在英国蒸汽织机把 80 万织工抛向街头,那么,这并不是说现有机器要由大量工人的手工劳动来代替,而是说大批过去被雇用的工人现在事实上已经被机器代替或排挤。

我们已经看到,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业仍然是工业的基础。

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工人的人数不能满足新的殖民地市场的需要,新生的大部分工场手工业充满了那些在封建制度没落的过程中被剥夺并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因此,当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工场内的协作和分工的积极方面,即工场的提高在业工人的生产效率的性质。(205)

(204) 在旧式的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有时还对机器采取粗暴的反抗形式,例如,1865 年在设菲尔德锉刀工人中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205)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也完全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机器的作用。“因此,我把机器看做(潜在地)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19 章)配第天真得多,他说,机器代替了“一夫多妻制”。这个

毫无疑问,早在大工业时期以前很久,在农业中实行的协作和劳动资料的集中,使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手段发生了巨大的、突然的和强烈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所引起的斗争最初主要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发生的,而不是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发生的;另一方面,就农民被农业生产资料(马、羊等等)排挤来说,那么在这里,正是直接的暴力行为使经济革命成为可能。农民被赶出土地,羊代替了他们。像在英国发生的那种用暴力大规模掠夺土地的现象,才首先为大农业开辟了活动场所。因此,农业的这个变革从一开始与其说具有经济革命的外观,不如说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观。

相反,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劳动者的竞争者。(206)从此,资本的收益,就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成为操纵局部工具的片面的技能。因此,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也就是对

观点至多只适用于美国的某些地方。另一方面,“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是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使用最多。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劳动”(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5页)。

(206) “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79页)

资本主义剥削的暂时需要来说成了无用的人口，他们或者在机器生产反对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或者大量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行业，从而使那里的劳动力的价格降低。

为了安慰陷于贫困的工人，人们向他们保证，他们的痛苦只是“短暂的不便”（“a temporary inconvenience”）；机器只是逐渐地占据一个生产领域，因此它的破坏作用的范围和强度会缩减。但是，这两个小小的安慰却互相抵消了。在机器的征服过程缓慢的地方，机器给被迫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征服过程迅速完成的地方，贫困急剧加深并造成严重的破坏。

历史上再没有比英国手工织布工人缓慢的毁灭过程更可悲的景象了，这个过程拖延了四十年之久，直到 1838 年才结束。在这些不幸的人中，许多人饿死了，许多人长期地每天靠 25 生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²⁰⁷⁾ 与此相反，在印度，从英国进口的用机器生产的白布导致了痉挛性危机的发生。东印度总督在他的 1834—1835 年度报告

(207) 1834 年济贫法²⁹¹实行以前，英国手工织布业和机器织布业间的竞争之所以拖延下去，是因为远远低于最低限额的工资得到了教会救济金的补充。“1827 年，牧师特纳先生是柴郡威尔姆斯托工业区的教区长。移民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和特纳先生的回答表明，手工劳动同机器的竞争是如何维持下来的。问：‘动力织机的使用排挤了手工织机的使用吗？’答：‘毫无疑问是这样；如果手工织布工人不能屈从于工资的降低，那就会比现在受到更大的排挤。’问：‘但是，他们在屈从后所得的工资是不足维持生活的，他们是否要求得到教会津贴来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呢？’答：‘是的，手工织机和动力织机的竞争，事实上是靠济贫费维持的。’可见，令人受辱的赤贫或向国外移民，这就是采用机器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他们从受人尊敬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手工业者被降低为靠低三下四地哀求别人施舍而包过活的穷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短暂的不便。”（《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 年伦敦版第 29 页）

中说：

“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诚然，一旦把这些织工送入天国⁽²⁰⁸⁾，织机带给他们的当然就只是“短暂的不便”了。此外，由于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机器的短暂的影响也就成为长期的了。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的性质，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²⁰⁹⁾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

劳动资料扼杀劳动者。当然，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传统的手工业操作或工场手工业操作发生冲突时，表现得最明显。但在大工业本身内，机器的不断改良和自动体系的发展也发生类似的作用。

“改良机器的一贯目的，是减少体力劳动，或者说，是通过以铁的装置代替人的装置的方法使工厂的生产链条增加某个环节。”⁽²¹⁰⁾“把蒸汽和水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为了节省动力，改进制

(208) 把某人送入天国——to launch somebody into eternity——这是英国报刊报道刽子手的英雄业绩时所使用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209) “使国家的收入(即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如李嘉图在同一个地方所说明的。在经济学家看来，他们的财富就是国家的财富)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和使劳动者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69页)“一切机械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实际上就是完全摆脱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粗工和非熟练工代替熟练工，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1卷第[34,]35页)

(21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3页。

品,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工、一个女工或一个男工,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这种改良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211)“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练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们总是尽快地把这种操作从过于灵巧和易于违犯各种规则的工人手中夺过来,把它交给一种非常规律地自动操作,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来进行。”(212)“在自动体系下,有才能的手工业者越来越受到单纯的机器看管者的排挤。”(213)“改良机器为取得一定成果不仅不需要雇用那么多成年工人,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练程度低的代替熟练程度高的,儿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这些变化都引起工资率的经常波动。”(214)“机器不断地把成年人抛出厂。”(215)

机器体系在缩短工作日的压力下的飞速发展向我们表明,由于实际经验的积累,由于机械手段的现有规模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弹性。在1860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这个全盛年,谁能料到在美国南北战争⁷的刺激下,机器的改良和手工劳动的相应被排挤竟会使这种工业发生变革呢?在这里,只要从英国工厂视察员关于这一问题的官方材料中引用几个例子就够了。曼彻斯特

(21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

(212) 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1卷第29页。“烧砖业所采用的机器的巨大好处在于:它使雇主可以完全不依赖熟练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30页第46号)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阿·斯特罗克先生就制造机器(火车头等)问题对皇家调查委员会说:“对昂贵的工人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减少了。在英国,采用改良工具使工场的生产率提高,而这些工具本身却是由低级的工人制造的。”以前,“必须用熟练劳动来生产机器的所有部件,现在生产这些部件是用不太熟练的劳动,但借助优良的工具……我所说的工具是指制造机器时所使用的机器。”(《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1867年伦敦版第[17862和]17863号)

(213) 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1卷第30页。

(214) 同上,第2卷第67页。

(215) 同上。

的一个工厂主说：

“我们过去用 75 台梳棉机，现在只用 12 台，产量和过去一样，质量也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 工资每星期节省 10 镑，飞花减少 10%。”

在曼彻斯特的一家纺纱厂内，由于加速运转和采用各种自动过程，工人人数在一个车间削减了 $\frac{1}{4}$ ，在另一个车间削减了 $\frac{1}{2}$ 以上。另一家纺纱厂主估计他削减了 10% 的“人手”。

曼彻斯特的吉尔摩公司纺纱厂主们说：

“我们估计，由于采用新机器，在我们的清棉间整整节省了 $\frac{1}{3}$ 的人手和工资…… 在前二道工序中节省了将近 $\frac{1}{3}$ 的工资和其他费用；在纺纱车间节省了将近 $\frac{1}{3}$ 的费用。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交给织布业主的纱的质量，由于采用新机器而大大改进了，因此织出的布比用旧机器纺的纱所织出的布又多又好。”(216)

关于这一点，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说道：

“在生产增加的同时，工人迅速减少；不久以前，毛纺织工厂又开始裁减人手，而且还在不断裁减；前几天，一位住在罗奇代尔附近的教员对我说，女子学校中人数大大减少，不仅是由于危机压力，而且是由于毛纺织工厂机器的改良，改良后平均裁减了 70 个半日工。”(217)

(21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10 月 31 日》第 108 页及以下几页。

(217) 同上，第 109 页。棉业危机时期机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国工厂主能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场。到 1866 年下半年，布匹几乎就卖不出去了。于是，商品开始运往印度和中国委托销售，这使商品充斥更加严重。1867 年初，工厂主采取了他们惯用的手段，即降低工资。工人起来反抗，并且宣称，唯一的出路是缩短劳动时间，每周工作四天（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在犹豫了一个时期以后，工业首领们不得不接受这些条件。有些地方工资降低 5%，有些地方没有降低。²⁹²

下表²⁹³说明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机械改良的总结果。

1856、1861、1868年联合王国棉纺织厂统计表

	工 厂 数		
	1856年	1861年	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2 046	2 715	2 405
苏格兰	152	163	131
爱尔兰	12	9	13
联合王国	2 210	2 887	2 549

	蒸汽织机台数		
	1856年	1861年	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275 590	368 125	344 719
苏格兰	21 624	30 110	31 864
爱尔兰	1 633	1 757	2 746
联合王国	298 847	399 992	379 329

	纱 锭 数		
	1856年	1861年	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25 818 576	28 352 125	30 478 228
苏格兰	2 041 129	1 915 398	1 397 546
爱尔兰	150 512	119 944	124 240
联合王国	28 010 217	30 387 467	32 000 014

	在 业 人 数		
	1856年	1861年	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341 170	407 598	357 052
苏格兰	34 698	41 237	39 809
爱尔兰	3 345	2 734	4 203
联合王国	379 213	451 569	401 064

可见,从1861年至1868年减少了338家棉纺织厂,这就是说,生产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机器集中在人数较少的资本家手中。机械织机减少了20 663台;但与此同时它们的产品增加了,可见,一台改良的织机现在提供的产品比一台旧式蒸汽织机要多。最后,纱锭增加了1 612 547个,而在业工人却减少了50 505人。因此,棉业危机压在工人身上的“暂时的”贫困,由于机器体系迅速不断的进步而加剧和持久了。

但是,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²¹⁸⁾用加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²⁹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²¹⁹⁾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

蒸汽锤的发明者内史密斯,在他向工联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谈到他由于1851年机器制造工人的长期大罢工而采用的机器改良时说:

“我们现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动工具机。一个机械工人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看管机器的出色劳动,这种活每一个男孩都能

(218) “在燧石玻璃和瓶玻璃业中,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等于一种慢性的罢工。”因此,主要操作靠机器完成的压制玻璃工场手工业就迅速发展起来。纽卡斯尔的一家公司,以前每年生产350 000磅吹制燧石玻璃,现在生产3 000 500磅压制玻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版第262、263页)

(219) 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1833年伦敦版第34、35页。²⁹⁵

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类工人，现在全部被排除了。从前我用四个男孩配一个机械工人。由于这些新的机械结合，我把成年男工从1500人减到750人。结果，我的利润大大增加。”²⁹⁶（220）

尤尔在谈到印花业中的一种印花机时说道：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们感到负担的劳动契约的条件），他们很快地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现在，各大工场都有四色和五色的印花机，使白布的印花工艺变得既简便又可靠。”

他在谈到由于一次罢工而直接引起的浆纱方面的一项发明时说道：

“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械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

他在谈到走锭纺纱机这个标志着机器体系的一个新时代的发明时说道：

“这个被工人们正确地称之为铁人的创造物的使命是恢复工业阶级中间的秩序。这个海格立斯式的纺纱人诞生的消息在反抗的人群中引起了恐慌，他还没有走出摇篮就把暴乱的许德拉扼杀了……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一旦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劳动的反叛之手就总是会就范的。”（221）

尤尔的著作虽然是在37年以前，也就是说在工厂制度还不很发达的年代出版的，但这部著作由于它包含的直率的昔尼克主义²⁹⁸并

（220） 费尔贝恩先生由于自己的机器制造厂发生罢工，在机器制造上发明了某些极重要的应用机器的方法。²⁹⁷

（221） 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141、142、140页。

天真地道出了资本先生们头脑中的荒谬的矛盾，仍不失为这个制度的精神的典型表现。例如，他先阐述了前面所引用的学说，即资本借助于受它供养的科学“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然后他又对某些好发议论的人的做法表示惊讶，他们

“竟非难机械物理学，指责它助长富有的资本家的野心，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222)

他到处宣扬机器的迅速发展对工人如何有利，然后又用威胁的口吻警告工人说，他们的反抗和罢工等等会加速机器的发展。他说：

“这种反叛表示了人们最可鄙的目光短浅，因为这种目光短浅竟使一个人自己成为自己的刽子手。”

与此相反，他在前几页曾说道：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厂制度的发展还要迅速得多，迄今为止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得多。”

十行以后他又宣称：

“对大不列颠城市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械的改良只是逐渐实现的，或者至少是逐步达到普遍使用的。”

他还说，指责机器排挤了成年工人，使对劳动的需求超过劳动的供给，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资，这是不公正的。“当然，对儿童的使用增加了，但是成年工人的收入因此也提高了。”另一方面，这位八面玲珑的安慰家又为儿童的低工资率辩护，他借口说，“这样就可以阻止父母们过早地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工厂”。尤尔的这个著作是一部维护无

(222) 尤尔，同上，第1卷第10页。

限制的工作日的辩护书。当立法规定 13 岁的儿童每天不得劳动 12 小时以上时,他这颗自由主义的心就回想起“过去的黑暗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去诱劝工厂工人感谢上帝,为什么要感谢上帝呢?因为上帝通过机器使他们“有了空闲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不朽利益”(223)。

6. 补偿理论

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整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机器在排挤在业工人的同时,必然游离出资本,使这些被排挤的工人在某种其他的工作中重新得到雇用。(224)

假定在一家壁纸工场,(225)它使用的资本是 6 000 镑,其中一半用于预付原料(厂房等撇开不谈),另一半用来支付 100 个工人的工资,每人每年 30 镑。在一定的時候,资本家解雇了 50 个工人而用一部价值 1 500 镑的机器来代替他们。

通过这种活动是否游离出任何资本呢?原来在总额 6 000 镑中,3 000 镑是不变资本,3 000 镑是可变资本。现在这个总额中,4 500 镑是不变资本(3 000 镑用于原料,1 500 镑用于机器),1 500 镑是可变资本,用来支付 50 个工人的工资。可变资本部分,从总资

(223) 尤尔,同上,第 2 卷第 143、5、6、68、67、33 页。

(224) 李嘉图起初也持这种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特有的科学的公正态度和热爱真理,断然收回了这种观点。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 31 章《论机器》。

(225) 注意,我是完全按照上述那些经济学家的方式举例的。

本的一半下降到总资本的 $\frac{1}{4}$ 。在这里,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也就是说,从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以后,这6 000 镑总资本再也不能雇用50个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这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也就减少一次。

为了使补偿理论家们满意,我们假定机器的价格低于被削减的工资总额,比如说,机器的费用不是1 500 镑而只是1 000 镑。

在我们的新的条件下,以前预付工资的1 500 镑现在分割如下:1 000 镑被束缚在机器形式上,500 镑从壁纸工厂的使用中游离出来,可以作为新资本执行职能。假定工资是相同的,在解雇50个工人的情况下,这500 镑资本就是一笔足以雇用约16个工人的基金,但实际雇用的大大少于16个工人,因为这500 镑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用在工具、原料等等上,总之,必须包含不能转化为工资的不变要素。

再假定制造机器会雇用人数较多的机械工人,这是不是应该算做对被抛向街头的壁纸工人的补偿呢?在任何情况下,制造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1 500 镑对被解雇的壁纸工人来说只代表他们的工资,而对机器来说则代表: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资;落到他们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其次,机器一经制成,在它报废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使追加机械工人人数持续地被雇用,壁纸工场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用机器排挤工人。

事实上,那些补偿论者津津乐道的并不是这类事情。他们所关心的是被解雇的工人的生活资料。机器把我们的50个工人从他们的1 500 镑工资中游离出来,同时也就把1 500 镑生活资料从他们的消费中游离出来。这是千真万确而又悲惨的事实。而那些大腹便便的

先生们却把割断工人同生活资料的联系叫做为工人提供可供支配的生活资料,即工人在别的产业部门就业的新的基金。可见,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Nominibus mollire licet mala**⁽²²⁶⁾。

按照这个理论,1 500 镑的生活资料,是一笔靠 50 个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劳动去增殖的资本。因此,一旦这 50 个人失业,这笔资本也就无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资场所”即同一些劳动者可以重新在生产上消费它的地方以前,它是不会安闲的。可见,资本和工人迟早总要重新会合,而到那时补偿就实现了。可见,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像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一样,也是暂时的。

执行资本职能并与机器所排挤的壁纸工人相对立的 1 500 镑,实际上并不代表这些壁纸工人日常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格,而是代表他们在这 1 500 镑转化成机器以前得到的工资。这个货币额本身只是代表他们一年所生产的壁纸的一部分,工人们以货币形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作为工资。他们用这笔钱(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产品的货币形式)购买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资本,而是商品,而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商品来说,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买者。机器把他们从购买手段中游离出来,于是就把他们从买者转化为非买者。因此他们作为消费者的需求也就中止了。

如果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的这种减少没有其他方面的需求的增加来补偿,生活资料的价格就会下降。这难道能够成为促使用于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资本去雇用我们的失业的壁纸工人,来充当追加工人的理由吗?恰恰相反,如果价格下降延续一段时间,这部分工人的工资就会开始减少。如果必要生活资料销售不畅越来越严重,用于生

(226) 好话能遮丑。²⁹⁹

产生活资料的资本的一部分就会游离出来,到别的地方去投资。在这个转移以及在这个转移所产生的价格下降的过程中,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同样要经历“短暂的不便”。可见,辩护士并没有证明机器由于剥夺了工人的生活资料,同时就把这些生活资料转化为这些工人的新的就业基金;相反,他用自己的供求规律证明了机器不仅打击了被它们所排挤的工人,而且也打击了为这些工人生产消费品的工人。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

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资本主义剥削支配的劳动力的数量。我们在第七篇将会看到,机器的这种作用,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最可怕的灾难。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暂时不谈。

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人,当然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业部门找职业。如果他们找到了职业,从而在和他们同他们一道成为可支配的生活资料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那么,这是由于在劳动市场上出现的新资本,而不是由于过去已经执行职能的并且现在转化成机器的资本。并且,即使如此,他们的就业机会也是毫无保障的。

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人,离开他们原来的职业就不值钱了,只能在低级的、工资微薄和由于劳动简单而始终充斥着求职者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227)

(227) 关于这个问题,一位李嘉图学派²⁸的人在反对让·巴·萨伊的胡言乱语时说道:“在分工发达的地方,工人的技艺只能在他学得这种技艺的那个特殊劳动部门应用;工人本身就是一种机器。因此,像鹦鹉那样喋喋不休地说,事物都有找到自己的水准的趋势,是最为荒唐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只要看看周围就可以发现,事物长时期都不能找到自己的水准;即使找到了,也比出发点的水准低。”(《论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2页)

其次，每个工业部门，例如壁纸业，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这些新人为该部门补充损耗的劳动力提供必要的人员，也为该部门正常发展所要求的额外劳动力提供必要的人员。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一直在业的工人从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中抛出来，这个由产业新兵组成的新的人流就会改变自己的目的地而逐渐地注入其他的部门，不过，原来的那些牺牲者却在过渡期间堕落丧亡。

机器对于它所带来的贫困是无罪的。在我们的社会条件下，它使工人和他的生活资料分离，这并不是它的过错。机器使它被使用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游手好闲的人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解雇的劳动者用的生活资料至少同以前一样多。

经济学家们正是在解释这一事实的时候显示出谄媚的本领。

在这些先生们看来，同机器在资产阶级的条件下的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

因为机器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在资本家手中使人成为受同一自然力奴役的工具；因为机器是缩短每天的劳动的可靠手段，而它在资本家手中却使每天的劳动延长；因为机器是增加生产者的财富的魔杖，而它在资本家手中却使生产者贫困化；因为……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坚定地宣称，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假象和空想，在现实中，因而从理论上来说，这些矛盾都是不存在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决不否认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来说，机器的资本主义的利用是唯一可能的利用。机器使用劳动者和劳动者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反对机器的应用，就是反对社

会进步。(228) 这个推论岂不是会使人们想起著名的杀人犯比尔·赛克斯的道理吗？他说道：

“陪审官先生们，这些行商的喉咙确实被割断了。事实如此，但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刀的过错。难道你们因为这种短暂的不便就要禁止用刀吗？请你们想一想！刀是手工业和农业的最有用的工具之一，刀在外科手术上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给人带来知识，在吃饭时是一位称心的伙伴。如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229)

虽然机器在开始应用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部门时不同程度地把工人排挤出去，但是它能引起其他生产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

因为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米蒸汽织机织出的布，总是比它的竞争对象手工产品便宜，所以我们显然可以得出这个规律：

如果机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生产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么，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

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用机器生产的物品总量远远超过以前由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提供的同种物品的总量。假定 400 万米机器纺织品代替了 100 万米手工纺织品。前者所包含的原料，例如羊毛，是后者的四倍。因此羊毛的生产也必须增长为原来的四倍。

(228) “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么，工人利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种成果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 年伦敦版第 166 页)

(229) “纺纱机的发明者毁灭了印度，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阿·梯也尔《财产论》。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把纺纱机和机械织机混淆起来了，“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

至于机器纺织所耗费的严格意义上的劳动资料,如机器、厂房、煤炭等,用于生产它们的劳动也会随着一个工人能够在相同的时间内平均提供的机器纺织品量和手工纺织品量之间的差额的增大而增加。但是,无论这种劳动增加多少,这种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减少相比,总是较小。

可见,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原料等等的其他部门必然增加它们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部门的工人的数量会增加多少呢?这些部门可能只是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持续时间。但是在劳动强度和劳动持续时间已定的情况下,一切就都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构成,也就是取决于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资本的可变部分随着机器生产越来越大规模地占领生产原料等等的工业部门而相对地缩小。

随着英国机器生产的进展,注定要落到煤矿和金属矿中去的劳动人数极大地增加起来。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³⁰⁰,煤矿工人共246 613人,其中20岁以下的73 546人,20岁以上的173 067人。在前一类中,5—10岁的835人,10—15岁的30 701人,15—19岁的42 010人。在铁、铜、铅、锡以及其他所有金属矿上就业的共319 222人。⁽²³⁰⁾

机器使一种专门制造机器的工人出现了。在英国,在1861年这种工人大约有7万人。⁽²³¹⁾我们已经知道,机器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占领这个生产部门。再拿原料来说⁽²³²⁾,毫无疑问,棉纺业的飞速发展

(230) 《1861年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II卷。

(231) 技师总数为3 329人。

(232) 因为铁是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所以这里应当指出,1861年英国(包括威尔士)的炼铁工人共有125 771人,其中男工123 430人,女工2 341人。男工中20岁以下的有30 810人,20岁以上的有92 620人。

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不仅大大促进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还促成了边疆蓄奴各州⁽²³³⁾的黑人饲养业。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697 000人,而到1861年有400万人³⁰¹。另一方面,同样明确的是,在英格兰,机械毛纺织工厂的兴旺,使耕地不断转化为牧羊场,从而引起了过剩的农业劳动者大量被驱逐。爱尔兰直到目前还在经历着这个痛苦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它的20年来已经减少了一半的人口继续减少到同爱尔兰大地主和英格兰毛纺织厂主先生们的需要相适应的较低程度。

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过的初期阶段或中间阶段,那么,这种机器制品作为要素进入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部门就会得到更充足的材料供给,从而吸收更多的劳动。在纺纱机发明以前,英国织工经常由于原料不足而无事可做。但现在机器纺纱业提供的棉纱又多又便宜,以致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个有4个成年人和两个充当络纱工的小孩的家庭,每天劳动10个小时,每周收入4镑;如果活非常忙,还能收入多些。⁽²³⁴⁾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纷纷拥向手工棉织业,直到这些被珍妮机²⁴⁶、走锭纺纱机和环锭纺纱机创造出来的80万织工最终又被蒸汽织机挤垮为止。同样,由于机器生产的衣料充足,男女裁缝和缝纫女工等等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缝纫机出现为止。

随着机器用相对少量的工人人数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劳动工具等等的数量不断增加,使用这些原料等等的生产部门也就越来越细分为许多不同的部门。因此,这里同真正的工场手工业相比,社会

(233) 人们把北部各州和南部各州之间实行奴隶制的州称为边疆蓄奴各州。这些州就像出口牲畜一样地向南部各州出售饲养的黑人。

(234) 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1833年伦敦版第24、27页。

分工获得了更强大的推动力。

机器体系首先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实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随着使资本家阶级及其食客致富的物质的增加,这些社会阶层也增加和扩大了。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日益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者人数的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会产品中有更大的部分转化为纯产品,而纯产品中又有更大的部分以多样和精致的形式提供给消费。换句话说,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235)

大工业造成的两大市场的新的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奢侈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在这种情况下,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236)

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以及生产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日益相对减少,使那些生产只有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如运河、船坞、隧道、桥梁等等)的长期企业发展起来了。

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从而一些新的劳动领域,或者直接在机器体系的基础上,或者由于机器体系在经济生活中引起的一般变革而出现了。不过,它们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很大的。它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它们对最粗笨的手工劳动的需求成正比。

(235) 弗·恩格斯在我们引用过的关于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生产奢侈品的工人大部分处于悲惨的境地。关于这个问题,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有大量新的例证。

(236)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商船上工作的海员有94 665人。

目前,这类工业主要有煤气厂、电报业、照相业、轮船业和铁路业。根据 1861 年的人口调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公国),煤气业(包括煤气厂、机器设备的生产、煤气公司的经理处等)有 15 211 人³⁰²,电报业有 2 399 人,照相业有 2 366 人,轮船业有 3 570 人,铁路业有 70 599 人³⁰³。这最后一类人员包括大约 28 000 个比较固定的掘土工人以及全部商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所以,这五种新工业总共有 94 145 人。

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率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服务,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车夫、厨师、使女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根据 1861 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 20 066 224 人,其中男子 9 770 259 人,妇女 10 289 965 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警察、神职人员、法官、军人、学者、艺术家等从事“意识形态”职业的人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红利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 800 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在生产、商业和金融等部门供职的资本家。在这 800 万人中有:

农业劳动者(包括牧人和住在农场主家里的 雇农与使女)	1 098 261 人
棉、毛、精梳毛、亚麻、大麻、丝纺织厂和机器 织花边业、机器织袜业工人	642 607 人 ⁽²³⁷⁾ 304
煤矿和金属矿工人	565 835 人

(237) 其中 13 岁以上的男子只有 177 596 人。³⁰⁵

所有冶金厂(炼铁厂、压延厂等)和各种金属

手工工场的雇佣工人 396 998 人(238) 306
 仆役阶级..... 1 208 648 人(239)

纺织厂的雇佣劳动者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 208 442人;纺织厂的雇佣劳动者和所有冶金厂、金属手工工场人员加在一起是1 039 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庭奴隶的人数。请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240)

7. 工厂对工人的排斥和吸引。 棉纺织业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上一切严肃的代表人物都承认,采用机器,对那些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工场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者来说是一个灾难。他们几乎全都为工厂工人的奴隶地位叹息。

但是,他们的主要论据是什么呢?这就是:机器在其采用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恐怖过去之后,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奴隶!是的,

(238) 其中妇女有 30 501 人。

(239) 其中男子有 137 447 人。在这 1 208 648 人中还没有把在旅馆和其他公共场所服务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内。从 1861 年到 1870 年,男仆役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增加到 267 671 人。1847 年看守狩猎场的人(在贵族的狩猎场)有 2 694 人,而 1869 年有 4 921 人。伦敦小市民家中使用的少女,有特别的名称,叫小奴隶(“[little]slavcys”)。

(240) “为富裕阶级服务的仆役在一个国家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标志着这个国家国民财富和文明的进步。”(罗·蒙·马丁《联合前后的爱尔兰》1848 年伦敦第 3 版第 179 页)

使政治经济学沉醉的美酒是这样—个慈善家的定理：

工人制度经过一个较迅速的过渡和发展时期之后，会让比它当初用强制失业制造的饥民更多的劳动者屈服于它的铁—般的桎梏。

加尼耳却是个例外，他认为机器的最终结果是雇佣工人人数减少，而靠这些雇佣工人养活的“正直的人们”的人数会增加，这些“正直的人们”可以任意发展傅立叶曾经辛辣地讽刺过的这种“能够完善的完善能力”。³⁰⁷加尼耳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了解得很少，但是他感到，如果机器的采用把就业工人挤垮，而机器的发展使劳动奴隶增加，机器便是一种非常不祥的东西。他的观点的愚昧，只有用他自己的话才能表达出来：

“注定要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减少，而管理劳动，安抚、宽慰和开导全体居民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他们占有因劳动费用减少、产品丰富和消费品价格低廉而产生的全部利益。人类沿着这个方向正在升入天才创造的至高领域，进入宗教的最深奥的境界，建立救世的道德（那就是占有全部利益等等）准则，制定保护自由（大概是注定要从事生产的阶级的自由）和权力、顺从和正义、义务和人道的法律”。⁽²⁴¹⁾

我们已经用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等等例子证明，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在生产极度扩展的同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不仅可能相对地减少，而且可能绝对地减少。

1860年，根据议会的命令对联合王国所有的工厂进行一次专门调查，在兰开夏郡、柴郡和约克郡工厂区中属工厂视察员罗·贝克管辖的地区，共有652家工厂，其中570家拥有：蒸汽织机85622台，纱锭（不包括并纱锭）6819146个，蒸汽机27439马力，水车1390

⁽²⁴¹⁾ 这段耸人听闻的胡话载于沙·加尼耳先生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224页，参看同书第212页。

马力,雇用人员 94 119 人。而到 1865 年,这些工厂拥有:织机 95 163 台,纱锭 7 025 031 个,动力 30 370 马力,其中蒸汽机 28 925 马力,水车 1 445 马力,雇用人员仅为 88 913 人。

可见,从 1860 年到 1865 年,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 11%,纱锭增加了 3%,蒸汽马力增加了 5%,而与此同时工人的人数却减少了 5.5%。(242)

从 1852 年到 1862 年期间,英国的毛纺织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挤了以前各个时期的劳动。”(243)

在某些场合,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加往往只是表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已经建立的工厂扩大了,而是由于尚未建立机器生产制度的部门逐渐和它合并。

“在 1838—1858 年期间,机械织机及其使用的工人的增加,完全是由于英国棉纺织工厂的扩大,而在另外一些工厂中,则是由于过去用人的肌肉力推动的织麻布机、织带机、织毯机等等现在采用了蒸汽力。”(244)

(24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 年 10 月 31 日》第 58 页及以下几页。但在这同时,110 家新的工厂即将投产,它们共拥有 11 625 台蒸汽织机,628 576 个纱锭以及 2 695 蒸汽马力和水力马力。

(24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 年 10 月 31 日》第 79 页。1871 年 12 月,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在布拉德福德新机械学会作的一次报告中说:“若干时间以来,使我惊讶的是,毛纺织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从前工厂里都是妇女和儿童,现在看来一切工作都由机器做了。一个工厂主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解释:‘在旧制度下,我雇用 63 个人;采用改良的机器之后,我把工人减少到 33 人,最近,由于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使我又能够把工人从 33 人减少到 13 人。’”

(24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 年 10 月 31 日》第 16 页。³⁰⁸

因此,在后一种场合,工厂工人的增加只是表明就业工人总数的减少。最后,在这里还完全撇开了这种情况,就是除金属工厂外,工厂人员绝大部分是由少年工人、儿童和妇女组成的。

尽管机器猛烈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劳动者,但随着新工厂的不断建立和原有工厂的不断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在某个工业部门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

假定在旧的生产方式下每周使用 500 镑资本,其中五分之二或 200 镑是不变部分,即预付在原料、工具等等上的部分,五分之三即 300 镑是可变部分,即预付在工资上的部分,例如每个工人 1 镑,一旦采用机器体系,这个资本的构成就发生变化:例如不变资本占 $\frac{4}{5}$ 即 400 镑,可以转化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只有 100 镑。这样,过去雇用的工人就有 $\frac{2}{3}$ 被解雇。如果新工厂经营得好,生产扩大,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把它的资本由 500 镑增加到 1 500 镑,那么现在就要雇用 300 个工人,和工业革命以前同样多。如果所使用的资本继续增加到 2 000 镑,那么就要雇用 400 个工人,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时多 $\frac{1}{3}$ 。这样,工人人数增加了 100 人,但是相对地,即同预付资本相比,却减少了 800 人,因为 2 000 镑资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应雇用 1 200 个工人,而不是 400 个工人。可见,就业工人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在机器体系中,工人人数绝对增加了,但相对于所使用的资本量和所生产的商品量而言却总是减少了。上面假定,总资本的增加不会引起资本的构成的改变,因为这种增加并没有改变生产条件。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机器体系的每一进步,预付在机器、原料等上的不变资本部分会增加,而用于支付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会减少,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下,改

良都不是这样经常进行,因而资本的构成也不是这样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也总是或多或少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因此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就增加。例如,在1835年,联合王国的棉、毛、精梳毛、亚麻、丝等纺织厂的工人总数只有354 684人,可是到1861年,仅机械织机占用的织工(8岁以上的各种年龄的男女)就有230 564人。³⁰⁹实际上,这种增加在英国是以80万手工织布工人被排挤为代价的,而且这里还没有提到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被排挤掉的那些手工织布工人。⁽²⁴⁵⁾

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靠牺牲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像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机器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基金,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特别有利的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重现。但是,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方式、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一般生产条件与大工业相适应,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

(245) “手工织布工人(织棉布或用其他物质掺上棉花来织布的工人)的痛苦,曾经是一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但是,虽然他们的苦难已被承认、被感叹,他们的状况的改善却仍要听天由命;也许可以相信,这种痛苦现在(20年后!)已近于消除,目前蒸汽织机的大量推广,极有可能促进了这一点。”(同上,第15页)

是它的限制。

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²⁴⁶⁾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改良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通过竞争使国外市场的当地的劳动力破产,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所需要的原料产地。例如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靛蓝等。⁽²⁴⁷⁾

由于大工业使它的所在地的一部分生产阶级过剩,所以它需要向国外移民和外国的殖民地化,而这些外国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英国的巨大的羊毛仓库。⁽²⁴⁸⁾

这样,一种由大工业中心强制推行的新的国际分工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另一部分的农业生产地区,而这后一部分则成为地道的

(246) 在第三册¹³¹中我们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

(247) 从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

1846年	34 540 143 磅
1860年	204 141 168 磅
1865年	445 947 600 磅

从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4 570 581 磅
1860年	20 214 173 磅
1863年	20 670 111 磅

(248) 从好望角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2 958 457 磅
1860年	16 574 345 磅
1865年	29 220 623 磅

从澳大利亚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21 789 346 磅
1860年	59 166 616 磅
1865年	109 734 261 磅

工业生产地区。(249)

这种革命是同农业中的各种变革齐头并进的,关于这些变革,我们在这里还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250)

(249) 1867年2月,英国下院根据格莱斯顿先生的要求,下令公布了一份关于1831年到1866年期间联合王国各种谷物输入的统计材料。现将该材料概括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特为单位的谷物(1夸特=12.699公斤)³¹⁰

1831年到1866年的几个五年期间

名 称	1831—1835	1836—1840	1841—1845	1846—1850
每年平均输入(夸特)	1 096 373	2 389 729	2 843 865	8 776 552
每年平均输出(夸特)	225 263	251 770	139 056	155 461
每年平均入超(夸特)	871 110	2 137 959	2 704 809	8 621 091
各个时期每年平均人口数(夸特)	24 621 107	25 929 507	27 262 559	27 797 598
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谷物等的数量超过本国产品的数量(夸特)	0.036	0.082	0.099	0.310
名 称	1851—1855	1856—1860	1861—1865	1866
每年平均输入(夸特)	8 345 237	10 913 612	15 009 871	16 457 340
每年平均输出(夸特)	307 491	341 150	302 754	216 218
每年平均入超(夸特)	8 037 746	10 572 462	14 707 117	16 241 122
各个时期每年平均人口数(夸特)	27 572 923	28 391 544	29 381 760	29 935 404
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谷物等的数量超过本国产品的数量(夸特)	0.291	0.372	0.501	0.543

(250) 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大工业特别是英国的大工业的产物。就美国目前的形式来说,它仍然应当看做是欧洲的殖民地。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以磅为单位)

1846年	401 949 393
1852年	765 630 544
1859年	961 707 264
1860年	1 115 890 608

工厂制度巨大的间隔性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终于被固定下来并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份额和个人的利润。这种份额和利润同他们的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因此,这就要看谁先使用改良最好的机器来代替工人,谁先采用最科学的生产方法。但这还不够,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他们努力通过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来降低商品的价格。(251)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谷物(以英担为单位)

	1850年	1862年
小麦	16 202 312	41 033 503
大麦	3 669 653	6 624 800
燕麦	3 174 801	4 426 994
黑麦	388 749	7 108
面粉	3 819 440	7 207 113
荞麦	1 054	19 571
玉蜀黍	5 473 161	11 694 818
Bere 或 Bigg (上等大麦)	2 039	7 675
豌豆	811 620	1 024 722
豆类	1 822 972	2 037 137
合计	35 365 801	74 083 441

(251) 1866年7月,被莱斯特的制鞋厂主抛向街头的工人(同盟歇业),给“英国抵制协会”发出一份呼吁书,其中说道:“大约20年前,英国的制鞋业由于采用钉鞋法代替缝鞋法而发生了变革。当时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这种新营业

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资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运动只是在工业循环的退潮时期和涨潮时期内实现。而且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拒之门外,而工厂的量的扩大则在把被逐出的工人吸收进来的同时,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交替地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随着这种排斥和吸引的运动而发生的是被招募来的人的年龄、性别和熟练程度不断变化。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经历的周折,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工厂工人经历的周折了。

从1770年到1815年,棉纺织业有5年处于不振或停滞状态。在这最初45年的时期,英国工厂主垄断了机器和世界市场。从1815年到1821年,不振。1822年和1823年,繁荣。1824年,废除

迅速推广开来。各商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看谁能够提供最雅致的商品。但不久就产生了一种不良的竞争,大家竞相在市场上廉价出售。有害的后果很快表现在工资的降低上,劳动的价格急剧下降,以致许多商店现在只付出原来工资的一半。然而,尽管工资越降越低,看来利润却随着工资率的每一变动而增加。”工厂主甚至利用工业的不利时期,通过过分降低工资,也就是直接盗窃劳动者的最必要的生活资料,来取得巨额利润。下面是考文垂丝织厂危机的例子:“根据我从工厂主和工人那里得到的材料来看,工资的降低无疑地超过了由于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或其他原因而需要降低的程度。多数织工的工资降低30%至40%。五年前,工人织一幅丝带可得6或7先令,现在只能得3先令3便士或3先令6便士;另一种劳动,从前得4先令和4先令3便士,现在只得2先令或2先令3便士。工资的降低超过了为刺激需求而必须降低的程度。实际上,就许多种丝带来说,在工资降低时,从来没有出现过商品价格的任何降低。”(弗·[戴·]朗格委员的报告,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1866年第5号报告》第114页第1号)

禁止结社法³¹¹，工厂普遍大扩展。1825年，危机³¹²。1826年，工人极端贫困，发生暴动。1827年，略有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和输出量大增。1829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1830年，市场商品充斥，境况艰难。1831年到1833年，连续不振；东印度公司对东亚（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工厂和机器大增，人手不足。新济贫法促进农业工人向工厂区流动。农业各郡的儿童被劫掠一空。白奴贸易。1835年，大繁荣。同时，手工织布工人饥饿待毙。1836年，大繁荣。1837年和1838年，衰退，不振状态和危机。1839年，复苏。1840年，严重萧条，发生暴动，军队出动干涉。1841年和1842年，工厂工人遭受极大的痛苦。1842年，曼彻斯特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能够废除谷物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他们的领袖被提交兰开斯特法庭。1843年，严重贫困。1844年，复苏。1845年，大繁荣。1846年，起初是继续高涨，最后是回落的征候。谷物法被废除。1847年，危机。为庆祝“大圆面包”（自由贸易派先生们在他们反对谷物法的宣传鼓动中许诺的巨大的面包）¹⁷⁷，工资普遍降低10%或10%以上。1848年，继续不振。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1849年，复苏。1850年，繁荣。1851年，商品降价，工资低微，罢工频繁。1852年，开始好转。罢工继续发生，工厂主以输入外国工人相威胁。1853年，输出增加。普雷斯顿罢工持续八个月，严重贫困。1854年，繁荣。1855年，市场商品充斥。破产消息从美国、加拿大和东亚纷纷传来。1856年，大繁荣。1857年，危机。1858年，好转。1859年，大繁荣，工厂增加。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达到顶点。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市场上商品过剩，直到1863年几乎还没有销完全部存货。英国同法国缔结贸易协定³¹³。工厂和机器激增。1861年，暂时的繁荣。出现回落。

美国南北战争。棉荒。1862年到1863年,完全崩溃。

棉荒的历史太有代表性了,我们不能不略为叙述一下。从1860年到1861年的市场的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对于工厂主来说,棉荒发生的正是时候,对于他们是有利的。这个事实已被曼彻斯特商会的报告所承认,帕麦斯顿勋爵和德比勋爵在议会中也宣布过,而且也为实际情况证明了。⁽²⁵²⁾当然,1861年联合王国的2 887家棉纺织厂中,有许多是小工厂。在这2 887家工厂中,有2 109家是属于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的管辖范围。根据他的报告,在这2 109家工厂中,使用还不到10蒸汽马力的有392家,占19%;使用10—20马力之间的有345家,占16%;使用20马力和20马力以上的有1 372家。⁽²⁵³⁾小工厂多半是在1858年以后的繁荣时期建立起来的织布厂,而且大部分是靠一些投机家分头出棉纱、出机器、出厂房建立起来的,交由以前的监工或其他没有资财的人经营。这些小工厂主几乎都破产了。虽然他们占工厂主总数的 $\frac{1}{3}$,但是他们工厂的资本相对地说只占投入棉纺织业的资本的极小的一部分。

至于危机的规模,据可靠估计,1862年10月有60.3%的纱锭和58%的织机停工。这仅仅是整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各个区的情况当然是很不同的。只有极少数的工厂开全工(每周60小时),其余工厂都有停工现象。

即使那些做全工并且照例拿计件工资的少数工人,由于次棉代替好棉,埃及棉代替海岛棉、苏拉特棉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以及苏拉特棉掺飞花代替纯棉,所得到的周工资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苏拉

(252) 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30页。

(253) 同上,第[18、]19页。

特棉纤维较短,会有脏物,棉纱易断,经纱上浆不用面粉而用各种重拼料,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减低了机器的速度,或者减少了一个织工所能看管的织机台数,增加了纠正机器差错所花的劳动,在减少产量的同时也减少了工资。使用苏拉特棉时,工人即使做全工也要遭受 20%、30% 或更多的损失。而多数工厂主又把计件工资率降低了 5%、7.5% 和 10%。

因此,那些每周只劳动 3 天、3 天半、4 天或者每天只劳动 6 小时的工人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1863 年时,在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之后,织布工人、纺纱工人等的周工资也只有 3 先令 4 便士、3 先令 10 便士、4 先令 6 便士、5 先令 1 便士等。⁽²⁵⁴⁾即使在这样悲惨的状况下,工厂主在寻找借口,克扣已经十分微薄的工资方面的创造精神却有增无减。工人往往还由于棉花不好和机器不完善等等所造成的商品的毛病而被罚款。如果工厂主还是工人住的小屋的房主,那他还要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一部分算做房租。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谈到走锭纺纱机的看管工(他们每人看管两台走锭纺纱机)时指出,他们做满 14 天全工,得到 8 先令 11 便士;从这个数中首先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无偿的馈赠送还工人,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 6 先令 11 便士。1862 年的最后几个月,织布工人周工资往往只有 2 先令 6 便士⁽²⁵⁵⁾。甚至工人只劳动很短的时间,也常常要从工资中扣除房租。⁽²⁵⁶⁾难怪在兰开夏郡的某些地方发生一种饥饿病! 但更为可怕的是:生产过程的变革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这就像解剖学家拿青蛙和其他动物做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

(25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10 月 31 日》第 41[-45,]51[、52]页。

(25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10 月 31 日》第 41、42 页。

(256) 同上,第 57 页。

值的生物体做实验。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我虽然列举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不断地进行实验，工厂的状况极不稳定……他们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他们的名义工资率相差15%，而过一两个星期竟降低50%至60%。”⁽²⁵⁷⁾

这些实验不仅靠牺牲工人很大一部分生活资料来进行，而且还以工人的全部五官受到痛苦为代价。

“清棉的工人告诉我，难忍的臭味熏得人恶心……在梳棉间和混棉间里，尘埃、脏东西刺激人的七窍，引起咳嗽和呼吸困难……由于纤维短，浆纱时使用大量的各种代用品来代替原来使用的面粉。这就引起织布工人恶心呕吐和消化不良。因为灰尘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拉特棉里的脏东西刺激皮肤，皮肤病也很流行。”

另一方面，面粉的代用品由于增加棉纱的重量而成为工厂主先生们的福尔土纳特的钱袋。^①这些代用品使“15磅原料在纺成纱后重20磅”⁽²⁵⁸⁾。工厂视察员1864年4月30日的报告中说：

“现在，工业上榨取利润的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 $5\frac{1}{4}$ 磅棉花和 $2\frac{3}{4}$ 磅浆料制成的。另一匹 $5\frac{1}{4}$ 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其他种类的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的布卖得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²⁵⁹⁾

(257) 同上，第50、51页。

(258) 同上，第62、63页。

(259)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30日》第27页。

① 福尔土纳特是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有一个神奇的取之不尽的钱袋和一顶隐身帽。——编者注

可是,工人们不只是苦于工厂主和市政当局的实验,不只是苦于失业和工资降低、贫困和救济以及上下两院的赞美词。

“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 25 年增多了。”(260)

可见,英国棉纺织工业在最初的 45 年中,即从 1770 年到 1815 年,只有 5 年是危机和停滞状态,但这 45 年是它垄断整个世界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即从 1815 年到 1863 年的 48 年间,只有 20 年是复苏和繁荣时期,却有 28 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从 1815 年到 1830 年,开始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从 1833 年起,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征服和扩大亚洲市场。³¹⁴ 谷物法废除之后,从 1846 年到 1863 年,有 8 年是活跃和繁荣时期,却有 9 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棉纺织业中的成年男工的状况,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也可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判断。(261)

(260) 引自博尔顿警察局长哈里斯的信,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 年 10 月 31 日》第 61 页。

(261) 1863 年春,棉纺织工人在要求成立移民协会的一份呼吁书中说:“工厂工人的大量移民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只有少数人才会否认。下列事实表明,经常不断地移民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平时的地位。这些事实就是:1814 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这只是数量的指数)是 17 665 378 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是 20 070 824 镑;1858 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是 182 221 681 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只是 43 001 322 镑;数量增加为十倍,而得到的等价物只增加一倍多一点。这种对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对于工厂工人极其有害的结果,是由各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造成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这个生产部门必须经常保持超过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工人,因为它如要不被消灭,就得不断扩大市场。在现有制度下,商业的周期性停滞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而这种停滞随时可能使我们棉纺织工厂停工。但是,人的创造精神并不因此就停歇下来。根据最低的估计,最近 25 年有 600 万

8. 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 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a) 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经营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它代替了一定数量的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据亚当·斯密说，在他那时候，10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48 000多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145 000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4台这样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60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300多万枚。(262)

如果一台单个的工具机代替了协作或工场手工业，那么，工具机本身又可以成为新的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手工业生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制度的过渡，只要水和蒸汽作为动力代替人的肌肉，工厂制度通常就会出现。小生产可以间或地、暂时地同机

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尽管如此，由于为了使产品便宜而不断排挤劳动者，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成年男工无法在工厂找到任何条件的任何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1、52页)在以后的某章中，我们会看到，在棉纺织业的大灾难中，工厂主先生们是怎样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借助国家权力，来力图阻止工厂工人移居国外。

(262)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108页第447号。

械动力结合起来,那或是靠租用蒸汽,如伯明翰的某些工场手工业,或是靠采用小型热力机²⁴²,如织布业等的某些部门。(263)

在考文垂的丝织业里,一种“小屋工厂”的实验曾自发地发展起来。由几排小屋围成的方形场地的中间,建起一座安装蒸汽机的所谓机器房,蒸汽机通过枢轴同各个小屋中的织机连接起来。蒸汽一律是租用的,例如每台织机交 $2\frac{1}{2}$ 先令。不管织机是否转动,蒸汽费都得按周支付。每个小屋有2—6台织机,这些机器有的是劳动者的,有的是赊购的,有的是租来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264)

在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并不要求大规模生产的场合,那些最近三十年间新兴的工业,例如信封制造业、钢笔尖制造业等等,通常都是先经过手工业状态,然后经过工场手工业生产这些短暂的过渡阶段才达到工厂制度。这种形态变化,在工场手工业制品不是通过连续阶段的操作,而是由许多各不相干的操作来生产的地方,最为困难。这种情形曾经是钢笔尖生产必须克服的障碍。但是大约20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一种自动机,可以一下子完成6种这类操作。

1820年手工业提供的第一批12打钢笔尖价格7镑4先令,1830年工场手工业提供的为8先令,而现在工厂提供给批发商的价

(263) 在美国,手工业在机器基础上的这种再现,是常见的事。手工业向工厂生产的进一步转变是必然的,因此同欧洲甚至同英国比较起来,那里的积聚一日千里地飞跃进展。

(264) 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64页。

格是 2—6 便士。(265) 315

(b) 工厂对于工场手工业 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以及大工业在农业中引起的相应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体系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终于在一切地方为自己开辟了道路。因此,机器时而占领旧的工场手工业的这个过程,时而又占领那个过程。机器的侵入在旧的工场手工业中引起了不断的变化,对旧的工场手工业的由分工产生并且几乎结晶化的组织起了溶解的作用。此外,集体劳动者或结合劳动人员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分工的计划把基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总之,就是放在使用英国人所谓的廉价劳动上。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结合的生产,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所谓家庭工业。这种所谓的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乡村小农业,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

(265) 吉洛特先生在伯明翰建立了第一座大规模的钢笔尖手工工场。早在 1851 年,该厂就能生产 18 000 多万枚笔尖,每年消费 120 吨钢板。伯明翰垄断着联合王国的这一行业,现在每年生产几十亿枚钢笔尖。根据 1861 年的调查,这一行业雇用的工人人数为 1 428 人,其中女工 1 268 人,年龄最小的只有 5 岁。

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现在它已经转化为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外部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大工场,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工业大军。例如,蒂利先生在爱尔兰的伦敦德里所开设的衬衫工厂,就雇用着 1 000 个真正的工厂工人和 9 000 个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266)

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对未成熟劳动者或简单地讲廉价劳动者的剥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因为工厂所拥有的技术基础,即用机器代替肌肉力,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大多数是不存在的;同时,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儿童的器官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有毒物质等等的侵害之下。而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这是因为:劳动者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在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不仅如此,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或者至少是同工场手工业进行竞争,极度贫困的工人不能得到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通风、光线等等,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牺牲者的最后避难所里,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生产第一次系统地发展和组织了生产资料的节约,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这种节约具有对抗性的双重性质。人们采用机器以及由机器引起的劳动的社会结合,以使用最低限量的支出来取得有用的效果。另一方面,费用的节约从工厂出现之日起就同时是通过对劳动力的最疯狂的浪费和对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正常条件的最无耻的剥夺来实现的。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领

(266)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2 号报告》1864 年版第 LXVIII 页第 415 号。

域中,大工业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费用的节约所具有的这种否定的和杀人的一面就越发达。

(c) 现代工场手工业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其实读者已经从工作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证。

伯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雇用3万个儿童和少年,此外还雇用大约1万名妇女,他们总是干着很重的活。这些人员分布在铸铜业、纽扣业、油漆业、珐琅业以及其他有害健康的行业中。⁽²⁶⁷⁾伦敦的各家书报印刷厂由于让成年和少年工人从事过度劳动而博得了屠宰场的美名。⁽²⁶⁸⁾在订书业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过度劳动和同样的牺牲品,主要是少女和儿童。在制绳业中,少年工人也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制盐、制蜡烛以及生产其他化工制品的工场中,他们还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动力的丝织业中,织机是由少年来推动的。这种活简直能累死人。⁽²⁶⁹⁾一种最肮脏、最丢脸、报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妇女来干的活是清理破布。我们知道,大不列颠不仅自己拥有无数的破布,而且还是全世界破布贸易的中心。破布从日本、遥远的南美各国和加那利群岛流进来。但是,它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破布用

(267) 甚至设菲尔德的锉刀业也雇用儿童!

(26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第6页第55、56号;第7页第59、60号。

(269) 同上,第114、115页第6—7号。调查委员正确地指出,如果在其他地方是机器代替人,那么在这里是少年代替了机器。

于做肥料、床垫、还可以当做造纸的原料。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的牺牲者。(270)

除金属矿和煤矿之外，英国还提供了另一类说明过度的、繁重的劳动以及那些从幼年起就被使用的工人在这种劳动中所受虐待的典型例子，这就是很少采用新发明的机器的砖瓦工场。从5月到9月，劳动是从早晨5点起到晚上8点止，如果是在户外晾干，则往往从早晨4点起到晚上9点止。早晨5点至晚上7点的工作日算是“缩短的”、“适度的”了。男女儿童从6岁起，甚至从4岁起就被使用。他们劳动的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甚至往往比成年人还要长。活很吃力，太阳的酷热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克斯利的一个制砖工场，一个24岁的姑娘每天制砖2000块，只有两个刚刚脱离童年的女孩子做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块。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50英尺深的土坑里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黏土，并把它运到210英尺远的地方去。

“通过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得无法无天，卑鄙下流和放荡成性……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每个成型工（他是熟练工人，又是一个制砖工人小组的头）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这一班7个人的吃和住。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成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这种小屋通常只有2个房间，至多有3个房间，他们统统睡在地上，窗户很少。他们劳累一天，浑身汗水，已经精疲力竭，哪还能讲究卫生、清洁和礼貌。这样的小屋多数都是混乱和肮脏的真正标本……这种制度的最大弊病就是雇用少女，干这种活往往使她们从

(270) 见关于破布贸易的报告以及《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附录第196—208页的大量资料。

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们身上披着几块肮脏的布片，裸露大腿，蓬头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耻。吃饭的时候，她们伸开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运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们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换一身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在这种环境中，酗酒极为流行，这是毫不奇怪的。最糟糕的是，制砖工人自暴自弃。一个比较好的工人曾对绍索菲尔兹的牧师说，先生，您感化一个制砖工人，那简直比感化魔鬼还难！”(271)

关于资本在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场)中节约劳动条件的方法，可以在《公共卫生报告》第4号(1861年)和第6号(1864年)中找到详细的官方材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绘，远远超过了小说家们所能够想象出来的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情景。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¹⁴⁹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4号报告(1861年)中曾指出，劳动者坚持的所谓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曾指出，当劳动者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现在，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27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工场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西蒙医生还列

(27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XVI[—XVIII]页第86—97号；第130[—133]页第39—71号。还可参看同书《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48、56页。

(272)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29、]31页。

出下面这张死亡统计表⁽²⁷³⁾：

各有关产业部门 雇用的不同年龄 的工人人数	在健康方面 互相比较的 几个产业部门	各有关产业部门 每 10 万人中的死亡率		
		25—35 岁	35—45 岁	45—55 岁
958 265	英格兰和威尔 士的农业	743	805	1 145
男 22 301 } 女 12 377 }	伦敦的裁缝业	958	1 262	2 093
13 803	伦敦的印刷业	894	1 747	2 367

(d) 现代家庭劳动

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所谓家庭劳动。为了对这个构成大工业基础的资本主义剥削领域有个简略的了解，只要看一看例如英格兰某些偏僻乡村经营的那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制钉业就够了。⁽²⁷⁴⁾我们将引用的例子是花边业和草辫业中没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竞争的部门。

在英国从事花边生产的共有 15 万人，其中受 1861 年工厂法约束的大约有 1 万人，其余的 14 万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男女少年和儿

(273) 同上，第 30 页。西蒙医生指出，伦敦 25—35 岁的裁缝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实际上还要高得多，因为他们的伦敦雇主从农村得到大量的 30 岁以下的青年学徒和“实习生”（即那些想提高自己手艺的人）。这些人在调查中算做伦敦人，他们使伦敦死亡率的计算基数增大了，但是并没有使伦敦死亡的人数相应增加，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要返回农村去，特别是在患重病的时候。

(274) 这里指的是用铁锤打成的钉子，而不是用机器制作的钉子。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3 号报告》第 XI、XIX 页第 125—130 号，第 52 页第 11 号，第 113、114 页第 487 号，第 137 页第 674 号。

童,其中男性很少。这些廉价的剥削材料的健康状况,可以从诺丁汉贫民诊所杜鲁门医生的下列统计材料中看出来。在 686 个患病的花边女工(大部分是 17 岁到 24 岁)中,患肺病的比率如下⁽²⁷⁵⁾:

1852 年每 45 人中有 1 人	1857 年每 13 人中有 1 人
1853 年每 28 人中有 1 人	1858 年每 15 人中有 1 人
1854 年每 17 人中有 1 人	1859 年每 9 人中有 1 人
1855 年每 18 人中有 1 人	1860 年每 8 人中有 1 人
1856 年每 15 人中有 1 人	1861 年每 8 人中有 1 人

肺病率的这种增长,一定会使最乐观的进步党人和厚颜无耻的自由贸易论贩子感到满意的。

受 1861 年工厂法约束的是采用机器生产的花边业。我们要在这里略加考察的部门(我们的考察仅限于所谓家庭工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花边整理(对机织花边进行最后加工,它又分成许多工种),另一类是手织花边。

花边整理当做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那些开设“老板娘家”的妇女也是贫穷的。劳动场所就是她们的私宅的一部分。她们从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揽订货,使用妇女、儿童和少女的劳动,其人数要看她们房间的大小和营业需要的变动情况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数有些工场是 20—40 人,有些工场是 10—20 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 6 岁,但有些儿童不满 5 岁就开始劳动了。劳动时间通常是从早晨 8 点到晚上 8 点,中间有 $1\frac{1}{2}$ 小时的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很不规则,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

(27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2 号报告》第 XXII 页第 166 号。

里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往往从早晨8点(有时是6点)干到夜里10、11或12点。

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规定占有500—600立方英尺的空间,在军医院里规定占有1200立方英尺。而在这样的简陋的小工房里,每人只有67—100立方英尺。同时煤气灯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为了保持花边的清洁,即使在冬天,儿童们也往往必须把鞋脱掉,哪怕地面上铺的是石板或砖块。

“在诺丁汉,常常可以看到15个至20个儿童像桶装的鲑鱼一样挤在一间也许不超过12英尺见方的小房间里,一天24小时内要干15小时,这种劳动由于单调乏味而令人厌倦,而且劳动条件对健康极为不利……甚至年龄最小的儿童干起活来也紧张得要命和迅速得惊人,他们的手指几乎不能放慢一点或稍停一下。如果有人向他们问话,他们也眼不离活,唯恐耽误了一分一秒。”

劳动的时间越长,老板娘不惜用“长棍”来维持生产的次数就越多。

“儿童们逐渐疲乏了。他们的劳动极费眼力,由于姿势持久不变而格外累人,当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快要结束时,他们在很长时间里都处于兴奋状态。这是真正的奴隶劳动。”⁽²⁷⁶⁾

如果妇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这个家,就是租来的一间房子,往往是一间阁楼)一道劳动,情况就更坏了。这种劳动在诺丁汉周围80英里的地区内都可见到。在商店干活的儿童,晚上9点或10点下工时,往往还要给他一捆活,让他带回家去干。资本主义的伪君子的代理人,他的雇佣奴才总要说:“这是给你母亲的”,但是他

⁽²⁷⁶⁾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XVIII、]XIX、XX、XXI页。

非常清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熬夜来帮着母亲干。(277)

手织花边业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两个农业区域。一个是霍尼顿花边业区,包括德文郡南海岸 20 英里至 30 英里宽的地带和北德文的少数地方;另一区域包括白金汉、贝德福德、北安普敦等郡的大部分,以及牛津郡和亨廷登郡的邻近地区。农业短工住的小屋通常就是工场。有些手工工场老板雇有 3 000 多个这样的家庭工人,几乎都是儿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边整理那里见到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只不过老板娘家被贫穷妇女用自己小屋开办的所谓花边学校代替了。在这些学校里劳动的儿童从 5 岁起(有时还要小)直到 12 岁或者 15 岁。在第一年,年龄最小的儿童每天劳动 4—8 小时,稍大一些就从早晨 6 点劳动到晚上 8 点或 10 点。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卧室,为了挡风,烟囱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在冬天也往往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和自己。有的地方,这些所谓教室像个小贮藏室,连火炉都没有。这些破旧的小屋异常拥挤,空气坏极了。此外,臭水沟、厕所、腐烂物以及经常堆在小屋门外的其他脏物也产生着有害的影响。一位工厂视察员说:

“关于占有空间的情况,我看到在一所花边学校里,有 18 个女孩和一个老板娘,每人占有 35 立方英尺的空间;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学校里,有 18 个人,每人占有 $24\frac{1}{2}$ 立方英尺。在这个行业中,竟雇用 2 岁到 2 岁半的儿童干活。”(278)

在白金汉和贝德福德这两个郡中不从事手织花边业的地方,草辫业就兴起了。这种行业扩展到赫特福德郡的大部分地区和埃塞克

(277) 同上,第 XXI,XXII 页。

(278) 同上,第 XXIX,XXX 页。

斯郡的西部和北部。1861年，从事草辫业和草帽业的共有48 043人，其中有各种年龄的男子3 815人，其余都是妇女，20岁以下的有14 913人，其中儿童近6 000人。在这里，“草辫学校”代替了花边学校。³¹⁶孩子们通常从4岁起，有时从更小的年龄起，就开始在这里编草辫。他们当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们自己都把初级小学称为“自然的学校”，来和这种吸血的场所相区别。他们到这种地方来劳动，只是为了完成他们的几乎要饿死的母亲指定他们完成的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2 782米。下工后，他们的母亲往往还要孩子在家里再劳动到夜里10、11以至12点。他们不断用嘴唇把麦秆润湿，因此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医生所综合的就这个问题受到咨询的伦敦医生们的共同意见，在卧室或工房中，每个人至少应占有300立方英尺的空间。但是，草辫学校里的空间比花边学校还要小，每个人只有 $12\frac{2}{3}$ 立方英尺、17立方英尺、 $18\frac{1}{2}$ 立方英尺，很少达到22立方英尺。调查委员怀特说：

“这些数字中的最小的数字，比一个装在每边各3英尺的箱子里的儿童所占的空间还要小一半。”

这就是孩子们在12岁或14岁以前的生活享受。饥饿的和由于贫困而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

“难怪在这样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堕落的现象……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许多妇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未到成熟年龄就有了，这种情况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统计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惊。”⁽²⁷⁹⁾

(279) 同上，第XL、XLI页。

但是,堪称基督教权威人士的蒙塔朗贝尔伯爵竟然声称,这些模范家庭的祖国就是英国这个欧洲的基督教模范国家!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工资一般都低得可怜(编草辫的儿童的最高工资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每周3先令),而由于实行实物或用商品来支付的工资制(这种制度在花边业区特别盛行),工资比它的名义数额就更低了。(280)

(c) 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 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

单靠滥用妇女和儿童,单靠残酷地掠夺一切正常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单靠残酷的过度劳动和夜间劳动来实现的劳动力的便化,终究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生理障碍,而用这些方法来实现的商品价格的降低和以这些方法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剥削,也要遇到这些障碍。达到这一点需要很长的时间;当达到这一点时,采用机器并把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迅速转化为工厂的时刻就来到了。

“服饰”的生产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最惊人的例证。根据皇家童工和女工调查委员会的分类,这一工业部门包括草帽业,女帽业,便帽业,衬衫业,裁缝业,女装剪裁业,女时装业,缝纫业,手套业,胸衣业和制鞋业,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附属行业,如领带和硬领业等等。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些工业部门中雇用的女工总计有586 298人,其中20岁以下的至少有115 242人,15岁以下的有16 560人。同一年,在联合王国,这类女工共有750 334人。同一时

(280)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版第185页。

期,威尔士和英格兰的制帽业、手套业、制鞋业及裁缝业雇用的男工有 437 969 人,其中 15 岁以下的有 14 964 人,15 岁至 20 岁的有 89 285 人,20 岁以上的有 333 117 人。属于这一领域的许多比较小的部门还没有统计在内。但是我们就现有的数字来看,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根据 1861 年的调查,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 1 024 267 人,也就是说,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相等。我们现在才开始明白,机器的魔力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和由于机器而成为可供支配的大量劳动者究竟做什么用了。从事服饰制品生产的有手工工场,它们只是把具有现成的分散的肢体⁷⁷的分工在手工工场内部再生产出来;还有较小的手工业师傅,不过他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个别消费者劳动,而是为手工工场和商店劳动,这样一来,往往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像制鞋业等等;最后,在最大的规模上从事这种生产的有所谓的家庭劳动者,他们成了手工工场、商店、甚至小作坊的外部的分支机构。⁽²⁸¹⁾

大量的劳动要素即原料、半成品等由机器生产供给,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摆布的人身材料则由机器生产和大农业排挤出来的工人供给。这一领域中的手工工场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资本家需要在自己手里拥有一支能适应需求的每一变动的后备军。⁽²⁸²⁾而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又作为基础与手工工场并存。

在这些劳动部门中所以能大量地生产剩余价值,同时能使产品

(281) 英国的女时装业大多是在雇主的作坊里进行生产的,工人一部分是住在那里的女工,一部分是住在外面的女工。

(282) 调查委员怀特视察了一个军服手工工场,该工场雇有 1 000—1 200 人,几乎全部是女性;他又视察了一个有 1 300 个工人的制鞋工场,其中几乎一半是少女和儿童。(《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2 号报告》第 XLVII 页第 319 号)

越来越便宜,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因为工资被降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而劳动时间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正是由于转化为商品的人的汗和血变得便宜,销售市场曾不断地扩大并且仍在一天天扩大,而对英国来说,盛行英国习俗和爱好的殖民地市场尤其是如此。最后,达到了这样一个必然的时刻:旧方法的基础即单纯对人身材料进行剥削,同时采用比较发展的分工,已经不再能适应日益扩大的市场和更加迅速地发展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了。采用机器的时刻来到了。同等地占领这一生产领域的大量的部门(如制帽业、制鞋业、缝纫业等)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机器,是缝纫机。

缝纫机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同所有在大工业时期征服新生产部门的机器的影响大体相似。年龄最小的儿童被排挤了。同家庭劳动者(其中很多人都是“穷人中的最穷者”)相比,机器劳动者的工资提高了。处境较好的手工业者的工资由于机器的竞争而降低了。机器劳动者完全是少女和年轻妇女。她们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并且把大批老年妇女和未成熟儿童从较轻的劳动中赶走。竞争扼杀了最弱的手工劳动者。最近16年来伦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增长,同机器缝纫业的扩大是齐头并进的。⁽²⁸³⁾使用缝纫机的新的女工,按照机器的轻重、大小及其性能,坐着或者站着,用手和脚或者单用手推动机器,她们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她们的劳动由于拖得很长(虽然大多比在旧制度下要短些)危害着她们的健康。在制帽业、胸衣业和制鞋业等行业中,本来已经很小很挤的工场,现在再塞进缝纫机,不卫生的情况自然就更严重了。

(283) 例如,在1864年2月26日结束的去一周死亡情况的官方报告中有5起饿死事件。同一天,《泰晤士报》又报道了一起饿死事件。

调查委员洛德说：

“一走进有 30 到 40 个机器工人挤在一起干活的这类工场，就感到实在难以忍受…… 由烧熨斗的煤气炉发出的温度高得可怕…… 即使在实行适度劳动时间，即从上午 8 点劳动到下午 6 点的工场里，每天照例还是有 3 个或者 4 个人晕倒。”⁽²⁸⁴⁾

缝纫机无差别地与一切社会的经营方式相适应。

例如，在劳动（主要通过简单协作）多半已经组织起来的女时装业中，缝纫机最初只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一个新因素。在制鞋业、裁缝业、衬衫业和许多其他协同生产服饰制品的行业中，有的地方缝纫机是真正的工厂的技术基础；有的地方是中间人从资本家兼企业主那里取得原料，在房间、阁楼里把 10—50 或者更多的雇佣工人聚集在缝纫机周围；有的地方则像机器尚未形成分阶段的体系而只能小范围使用时会发生的情形那样，是手工业者或家庭工人同自己的家人或少数帮工一起，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缝纫机。⁽²⁸⁵⁾ 在英国，现在盛行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资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用机器生产，然后把机器产品分给家庭劳动者大军去进一步加工。⁽²⁸⁶⁾

虽然缝纫机是在多种多样的社会结合中执行职能，但是，这种错

(284)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2 号报告》[1864 年版]第 LXVII 页第 406—409 号；第 84 页第 124 号；第 LXXIII 页第 441 号；第 68 页第 6 号；第 84 页第 126 号；第 78 页第 85 号；第 76 页第 69 号；第 LXXII 页第 483 号。

(285) 在手套业中，工人的状况和需要救济的贫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无法获得缝纫机，所以不存在这种情况。——英国人用需要救济的贫民来表示那些靠公共慈善事业救济的穷人。

(286) 同上，[第 83 页第 122[号]。租金率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伦敦的租金率非常高，因此，“旧的转包制度或家庭劳动在首都维持得最久，恢复得最早。”（同上，第 83 页）后面这句话只是就制鞋业而言。

综复杂的使用方式显然只是属于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越来越显示出把渗入了新的机器动因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转变为真正的工厂的必然趋势。

促成这一结局的,首先是缝纫机的技术性能,它的多种多样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产部门在同一个厂房和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联合起来;其次是,某些初步的操作,例如缝纫工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进行。

另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劳动者不可避免地遭到剥夺。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的不断增加——1864年,在莱斯特,仅制鞋业就已经使用了800台缝纫机——导致生产过剩,从而造成了市场停滞,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失业。所有这些原因迫使家庭劳动者出卖自己的缝纫机。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迫使急于打开销路的缝纫机生产者按周出租缝纫机,这就造成了把拥有机器的工人置于死地的竞争局面。⁽²⁸⁷⁾ 不仅如此,机器的不断改良和价格的日益降低,使现有的机器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这种机器中获利。

最后,用蒸汽机代替人,在这里也像一切类似的工业革命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蒸汽力的运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发生震动,机器损坏很快,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难,但经验很快就教会了人们克服这些障碍。例如,伦敦皮姆利科的军服厂,伦敦德里的蒂利—亨德森衬衫厂,利默里克的一家使用近1200人的泰特公司服装厂就是这样。

(287) 同上,第84页第124号。

如果说,一方面许多工具机在比较大的手工工场中的集中促进了蒸汽力的应用,那么另一方面,蒸汽同人的肌肉力量的竞争则加速了工人和工具机在大工厂的集中运动。

例如,英国生产服饰制品的庞大领域以及大部分其他行业,现在正经历着从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家庭劳动过渡到工厂制度的变革。但在这以前,所有这些旧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大工业的影响下完全变样、解体,变得畸形了,它们没有吸收工厂制度的积极发展因素,却老早就再现了工厂制度的可怕的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²⁸⁸⁾

这个工业革命的进程,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加速了。用法律来规定工作日,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迫使雇主增加机器的数量⁽²⁸⁹⁾,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²⁹⁰⁾。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集体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因此,集体生产资料的更大规模的集中就成为雇佣工人日益集结

(288) “向工厂制度过渡的趋势”(同上,第 LXVII 页)。“现在整个行业都处于过渡状态,并经历着花边业、织布业等已经历过的那种变化。”(同上,第 405 号)“一次完全的革命。”(同上,第 XLVI 页第 318 号)在 1840 年,织袜业还是手工操作。从 1846 年起,各种不同的机器被采用了,现在这些机器已用蒸汽推动。英国织袜业雇用的各种年龄(从 3 岁起)的男女工人总数,在 1862 年将近 12 万人。其中受到工厂法约束的,根据 1862 年 2 月 11 日的议会报告³¹⁷,只有 4 063 人。

(289) 例如,在陶器业中,“格拉斯哥不列颠陶器厂”的柯克伦公司报告说:“为了维持我们的产量,我们大规模地使用机器,这样,熟练工人就过剩了。每天都使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比使用旧方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 年 10 月 31 日》第 13 页)。“工厂法的作用是促进机器的进一步采用。”(同上,第 13、14 页)

(290) 例如,陶器业实行工厂法以后,手摇辘轳大部分被机动辘轳代替了。

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每当一种工场手工业受到工厂法威胁的时候,都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嚷:必须预付更大量的资本,才能在原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至于说家庭劳动以及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之间的中间形式的工场,它们在竞争战中的唯一的进攻和防御的武器,就是对廉价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剥削。一旦工作日和儿童劳动受到限制,它们也就被宣判死刑了。

工厂制度(特别是在这种制度受到法定工作日的约束以后)所要求的首要条件,就是生产结果必须符合严格的计算,也就是说,要能够保证在一定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其次,法定休息时间,要求劳动的周期的停顿不能损害已经开始的制品。当然,纯机械性质的操作同那些要经历某种化学和物理过程的操作(如陶器业、漂白业、面包业以及大部分金属加工业)相比,生产结果比较容易得到保证,劳动的中断也比较容易做到。

不受限制的工作日、夜工以及对人的生命的肆意糟蹋的成规,使任何障碍都被看做是事物的本性强行设置的永久的障碍,没有一种杀虫药消灭害虫能比工厂立法消灭这类“自然障碍”更有效。陶器业老板比任何人都更夸大这些“不可能性”。1864年,工厂法施行到他们身上,过了16个月以后,一切“不可能性”都消失了。工厂法所引起的各种改良,例如

“用压缩代替蒸发的改良方法,新的烘干炉的建成等等,都是制陶技术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上一世纪无法比拟的制陶技术上的进步……炉温大大降低了,而煤的消耗大大减少了,陶品制作得更快了”(291)。

同各种不祥的预言相反,提高的并不是陶制品的价格,而是产

(291) 同上,第96、127页。

量,结果从 1864 年 12 月到 1865 年 12 月的 12 个月中,陶制品出口的价值比前三年的平均出口价值超过了 138 628 镑。

在火柴业里,少年们甚至在吃中饭时也非得用火柴棍去浸蘸发热的磷混合溶液,这种溶液的有毒的气体直扑到他们脸上,这种情况过去被认为是自然规律。

1864 年工厂法使工厂不得不节省时间,结果促使一种浸蘸机问世,这种机器发出的气体不会扑到工人身上。(292)

目前还没有失去自己的自由的那些花边工场手工业部门还坚持认为,因为各种花边材料烘干时间长短不同,从 3 分钟到 1 小时或 1 小时以上不等,所以吃饭时间不能固定。对于这种说法,童工和女工调查委员会委员回答说:

“这里的情况和壁纸业的情况一样。这个部门的某些主要工厂主曾激烈地争辩说,由于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质和这些材料要经过的各道工序的差异,突然停下劳动去吃饭,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按照《工厂法扩充条例》(1864 年)第 6 节第 6 条的规定,自该法公布之日起给予他们 18 个月的期限,期满后,他们就必须遵行工厂法所规定的休息时间。”(293)

结果如何呢?议会刚批准这个法律,工厂主先生们就认识到,原来是他们错了:

“我们原来担心实行工厂法后会产生的种种弊端并没有出现。我们没有发现生产有任何瘫痪现象,实际上,我们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294)

(292) 火柴厂由于采用了这种机器和其他的机器,其中一个部门就用 32 个 14 岁至 17 岁的男女少年代替了 230 个青年。1865 年,由于蒸汽的应用,这种节省工人的做法又进了一步。

(29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2 号报告》1864 年版第 IX 页第 50 号。

(29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 年 10 月 31 日》第 22 页。

我们看到,英国议会(肯定不会有人责备它的冒险精神和卓绝的独创性)根据经验已经认识到,仅仅一项强制性的法律,就可以消除一切有碍于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所谓自然障碍。因此,当英国议会对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实行工厂法时,总要给予6到18个月的期限,在这段时期内,工厂主的事情就是扫除技术上的障碍。现代工艺学和米拉波异口同声地喊道:“不可能?永远别对我说这种蠢话!”

但是,工厂法在这样推动工场手工业制度转化为工厂制度所必需的物质要素发展的同时,又由于它的实施使资本支出扩大,从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295)

撇开用技术手段可以排除的纯技术上的障碍不说,对工作日的规定还遇到工人本身的不规则的生活习惯的障碍,这特别是发生在这样的地方,那里盛行计件工资,在一天或一星期中所旷费的时间可以由以后的过度劳动或做夜工来补偿,这种方法使成年工人变得野蛮,使他们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伙伴遭到毁灭。(296)

生命力耗费方面的这种毫无规则的情形,虽然是对单调乏味的

(295) “必要的改良在许多旧的手工工场中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要支出一大笔资本,而这是现在许多所有者的财力所不能胜任的…… 工厂法的施行必然会引起暂时的紊乱。这种紊乱的程度同需要革除的弊病的大小成正比。”(同上,第96、97页)

(296) 以高炉为例,“因为工人们习惯于在星期一不上工,有时星期二的一部分时间或者整天也不上工,所以,每到周末,劳动时间一般都要大大延长”(《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VI页)。“小师傅们的劳动时间一般是极不规则的。他们放过2天或者3天,以后就通宵劳动以弥补损失…… 如果他们有子女,还会让自己的子女来劳动。”(同上,第VII页)“上工时间没有规则的现象,由于人们可能并且习惯于靠过度劳动来弥补损失而得到了滋长。”(同上,第XVIII页)“在伯明翰,时间的损失令人吃惊…… 他们在一天里游游逛逛,在另一天里则像奴隶一样劳动。”(同上,第XI页)

苦役的一种自发的粗暴反应,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又是以劳动者的不受限制的剥削为前提的。

除了工业周期的一般的周期变动和每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市场波动外,还出现一种所谓旺季,这种旺季是由于赶时髦,由于航海季节的周期性,或者由于在最短期内必须完成的突然和意外的订货习惯(铁路和电报的发展使这种习惯变得更为经常了)而形成的。关于这种情况,伦敦的一个工厂主说:

“铁路系统扩展到全国各地,这使短期定货大为流行;买主现在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每隔 14 天来一次,到我们供货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购货。他们不再像往常那样从货栈里购买,而是发出必须立即交货的订单。前几年,我们总是可以在淡季预先准备好下一旺季的需要,而现在谁也不能预言将会需要什么。”(297)

在那些尚未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和手工工场里,在旺季,由于突如其来的订货,周期性地盛行着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

在向来就极不规则的家庭劳动领域里,工人的原料和工作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情绪,在这里,资本家不用去考虑投入厂房、机器等的资本的利用问题,而在劳动间断地进行的时候,他只是拿工人的生命去冒险。在这个领域里,他可以系统地招募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过度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被迫失去工作而陷于贫困。

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

(297)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4 号报告》第 XXXII 页。

“雇主们利用家庭劳动习以为常的不规则性，在要完成紧急的活计时，迫使家庭劳动延长到夜间 11 点、12 点、2 点，总之，就像实业家们所说的，延长到随便什么时间”，而劳动场所又是“臭气熏天，简直会使你晕倒。你可能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但不敢往里走。”⁽²⁹⁸⁾

有一个被询问的证人鞋匠说：

“我们的雇主真古怪，他们认为，让一个可怜的孩子在这半年累得要死，在另外半年又几乎被迫到处闲逛，这对孩子似乎没有什么害处。”⁽²⁹⁹⁾

这些由商业成规确立下来的习惯（“**usages which have grown with the growth of trade**”），同前面提到过的技术上的障碍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硬说成是生产上的自然障碍，这是棉纺织业巨头们在受到工厂法威胁时不断发出的抱怨。虽然他们的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但是经验已经揭露了他们的谎言。从此以后，成规中的这一切永久的障碍都被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看成是无聊的借口了。⁽³⁰⁰⁾

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极其认真的调查用事实证明：在某些工业中，规定工作日只不过是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³⁰¹⁾；这种规定，对于那种毫无意义的、害死人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相适应的、

(29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4 号报告》第 XXXV 页第 235 号和第 237 号。

(299) 同上，第 127[页]第 56 号。

(300) “至于因订货未能按时完成而造成的商业损失，我想起，这是 1832 年和 1833 年工厂主最喜欢列举的论据。现在蒸汽已把一切距离缩短了一半，并对交通进行了新的调整。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已提不出任何像过去那样有力的论据了。这类论调当时在实际考验面前就已经站不住脚，现在肯定也经不起再次考验。”（《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 年 10 月 31 日》第 54、55 页）

(30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3 号报告》第 XVIII 页第 118 号。

变化无常的赶时髦的风气⁽³⁰²⁾,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真正消除了季节性劳动的技术基础⁽³⁰³⁾;一切其他所谓不能控制的条件,也由于厂房的扩大、机器的增加、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³⁰⁴⁾以及工业中所有这些变化对批发商业制度产生的反作用而被消除了⁽³⁰⁵⁾。但是,正像资本通过自己代表的嘴承认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些措施,“只有在一项普遍适用的议会法令的压力下”⁽³⁰⁶⁾,

(302) 还在1699年,约翰·贝勒斯就指出:“时髦的变化无常,使贫苦的穷人增加。它有两害处:1. 帮工在冬季由于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贫困,因为衣料商人和织布厂老板在春天到来以前,在他们得知什么东西将成为时髦货以前,不敢支出资本去雇用帮工;2. 在春天,帮工又不够用,于是,为了保证王国商业在一季或半年内的需要,织布厂老板必须采用许多习惯做法。这一切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把人手从耕犁旁夺走,把农民从农村夺走,而城市则大都充满乞丐,许多耻于乞讨的人就会饿死。”(《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9页)

(30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171页第34号。

(304) 例如,某些布拉德福德出口商人的证词说:“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少年在商店里从早晨8点干到晚上7点就够了,用不着再延长。唯一的问题是得增加开支和增加人手。如果某些雇主不这样贪图利润,少年是没有必要劳动到这样晚的;添置一部机器只需花费16镑到18镑。——一切困难都是由设备不够和空间不足引起的。”(同上,第171页第35[、36]和38号)

(305) 同上。伦敦有一个工厂主认为,强制规定工作日是保护工人不受工厂主侵害的手段,也是保护工厂主不受批发商侵害的手段。他说:“我们在交易中遇到的困难是由出口商人造成的;例如,他们愿意用帆船运送货物,既想在一定的季节到达目的地,同时又想把帆船运费和轮船运费之间的差额装进自己腰包;或者,从两艘轮船中挑选最先出航的一艘,争取在他们的竞争者之前到达国外市场。”(同上,第81页第32号)

(306) 有个工厂主说:“只有在一项普遍适用的议会法令的压力下,以牺牲劳动场所的扩大为代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同上,第X页第38号)

即同时在所有生产部门用法律强制规定正常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办到。

9. 工厂立法

工厂立法是社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机体自身的第一次有意识、有系统的反作用。正如我们看到的,它像铁路、自动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在考察工厂立法如何在英国普遍实行之前,我们还要看一看英国工厂立法中与劳动持续时间无关的某些条款。

卫生条款是按照资本家容易规避的方式来拟定的,而且它实际上只是就粉刷墙壁和其他几项清洁措施,通风和危险机器的防护等做出一些规定。

我们在第三册¹³¹里还会谈到,工厂主曾怎样进行疯狂的斗争,反对这些要求他们拿出少量的钱来保护他们的工人的四肢的条款。在这里,再一次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自由贸易论者的信条:在一个以阶级利益对抗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人追逐私利,就必然会促进公共福利。

现在,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过去 30 年的初期,爱尔兰的亚麻工业以及随之兴起的打麻工厂,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864 年那里的打麻工厂已有约 1 800 个。每到春冬两季,便从农村中招收一些完全不熟悉机器的人,妇女和少年,即附近小租地农民的妻子儿女,让他们从事往碾压机里装填亚麻的劳动。这里的事故,按其数量和可怕程度来说是工厂史上根本没有先例的。只在基尔迪南(在科克附近)的一家打麻工厂里,从 1852 年至 1856 年就一共发生 6 起造成

死亡和 60 起造成严重残废的事故,而所有这些事故本来只要安上一些非常便宜的装置就可以防止。唐帕特里克各工厂的外科医生怀特先生,在 1865 年 12 月 16 日的官方报告中说道:

“打麻工厂里的事故可怕到了极点。在许多场合身体被铡掉四分之一。受伤者的通常结局,不是死亡,就是变成残废而痛苦终身。国内工厂数量的增多当然会扩大这种可怕的结果。我相信,通过国家对打麻工厂的适当监督,人类的这种牺牲大部分可以避免。”⁽³⁰⁷⁾

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取最起码的清洁卫生措施,也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

“1864 年的工厂法使陶器业的 200 多个工场进行了粉刷和清扫,这些工场已经有 20 年有意识地节制了这一类的工作。〈这就是资本的节欲!〉这些作坊里雇有 27 878 个工人,他们被昼夜的劳动搞得筋疲力尽,他们不得不呼吸着极端有害的空气。这种空气使得这种危害相对较少的职业也成为疾病和死亡的温床。工厂法使通风设备大大增加了。”⁽³⁰⁸⁾

同时,工厂法也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例如,英国的医生曾异口同声地宣布,每人起码要有 500 立方英尺的空间才能持续地工作。好了!既然工厂法通过它的各种强制性措施间接地加速了工厂取代较小的工场的进程,从而侵害了较小的资本家的所有权,并确保了大资本家的垄断权,那么,法律关于任何工场中的每个劳动者应得到充分的空气的强制规定,就会一下子直接剥夺成千上万的小资本家!就会动摇资本主义生产

(307) 同上,第 XV 页第 71 号及以下各号。

(30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 年 10 月 31 日》第 127 页。

的根基,也就是说,会破坏大小资本通过劳动力的自由购买和自由消费而实现自行增殖。所以说,500 立方英尺的空气使工厂立法窒息了。公共卫生机关、工业调查委员会、工厂视察员,都一再强调 500 立方英尺的必要性,又一再述说不可能强迫资本接受这一点。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宣布,劳动者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家生存的条件。(309)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儿童劳动的强制性条件。(310) 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从实践上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反过来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311) 工厂视察员在向教师咨询时立刻发现:虽然工厂儿童只上半天课,但学到的东西和正规的学生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309) 我们从经验中发现,一个中等健康的人每次呼吸通常大约要消耗 25 立方英寸空气。而每分钟大约要呼吸 20 次。所以,一个人在 24 小时内所消耗的空气约为 72 万立方英寸或 416 立方英尺。我们又知道,呼吸过的空气在自然大工场内经过净化以前,是不能再用于呼吸过程的。根据瓦伦廷和布鲁纳的试验,一个健康的人看来每小时呼出的碳酸气约为 1 300 立方英寸;这就等于说,在 24 小时内从肺中排出的,约合 8 盎司固体碳素。——赫胥黎说,每人至少应该有 800 立方英尺空气。

(310) 根据工厂法,如果父母不能让他们的 14 岁以下的孩子受初等教育,就不能同时把他们送进“受监督”的工厂做工。工厂主对遵守法律有责任。“工厂教育是强制性的,并且是劳动条件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 年 10 月 31 日》第 111 页)

(311) 关于体育(对男孩子来说还有军事训练)同工厂儿童和贫民学生的强制教育相结合的非常有利的结果,可以参看纳·威·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1863 年伦敦版第 63、64 页)也可以参看 1865 年 10 月 31 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 118、119、120、126 页及以下几页。

“道理很简单。那些在学校里只待半天的人,总是精力充沛,有较强的能力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³¹²⁾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186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会的演说中也可以找到更丰富的材料。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层阶级的孩子们的漫长的、单调的和不生产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³¹³⁾。只要看过罗伯特·欧文的著作³¹⁸,就会确信,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终

(31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8[、119]页。一个丝织厂主曾天真地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我完全相信,造就优秀工人的真正秘诀在于从幼年时期起就把劳动与智育结合起来。当然,劳动既不应该过分紧张,又不应该令人厌恶、有损健康。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们能够用一部分时间上课,另一部分时间劳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82页第36号)

(313) 把纳·威·西尼耳在1863年的演说和他对1833年工厂法的痛骂比较一下,或者把这次大会的观点同英国某些农业区域仍然禁止贫穷的父母送子女上学,违者将受到饿死的惩罚这个事实比较一下,就可以判断,大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物质生产发生变革,使这种物质生产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发生变革,从而同样使人的头脑发生变革。例如,斯内尔先生报告说,在萨默塞特郡,任何向教区请求救济的穷人,必须让自己的孩子退学,这已经成为惯例。例如,费尔特姆市的牧师沃拉斯顿先生谈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家庭被拒绝给予任何救济,因为他们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而同时,大工业以资本主义形式同时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并且把工厂工人变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在工厂之外,大工业由于几乎使一切手工工场都间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劳动者,由于到处利用妇女、儿童和廉价工人作为分工的新基础,也引起了同样的结果。⁽³¹⁴⁾

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通过一些破坏性的现象表现出来。例如它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整年整年被牢牢地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工厂或手工工场中能用得上的手艺。例如,过去在英国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过若干阶段的实习,最终就成为熟练的印刷工人。所有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印刷机使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一个成年工人,他看管机器;另一种是两个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他们(特别是在伦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枯燥乏味的工作达14、15、16小时,甚至往往一连

(314) 在为手工业者制造并由人力推动的机器,同发达的机器即以机械动力为前提的机器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竞争的地方,对推动机器的劳动者来说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是蒸汽机代替工人,而在上述情况下却是工人要代替蒸汽机。工人的劳动力的紧张和耗费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注定要受这种苦刑的全是未成年人!如调查委员朗格在考文垂及其附近地方发现,人们使用10岁到15岁的少年推动织带机,至于使用更幼小的孩子去推动小型织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这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儿童成了蒸汽力的单纯的代用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114页第6号)关于官方报告所说的“这种奴隶制度”的杀人后果,见同页及以下几页。

劳动 36 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间!⁽³¹⁵⁾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笨手笨脚的非常粗野的人。

“要使他们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识教育;他们很少有机会使用技巧,更少有机会运用判断力;他们的工资虽然比他们这个年龄的少年略高一些,但是不会随着他们的成长按比例增加,而且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有希望被提升到收入较高和地位较高的机器看管工人的职位,因为每一台机器只需要一个看管工人,却需要 4 个助手。”⁽³¹⁶⁾

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 17 岁时,就被印刷厂解雇。他们成为罪犯的补充队。企图在别的地方为他们找到职业的某些尝试,也都由于他们的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而遭到了失败。

关于工场内部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所谈到的这一切,也适用于社会内部的分工。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劳动者对专一职业的依附,他的能力和职业的原有多样性的破坏⁽³¹⁷⁾,就可以被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必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得到确立,慢慢地完善,而一当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固定下来。不时地引起变化的原因,正是由于通过

(315) 同上,第 3 页第 24 号。

(316) 同上,第 7 页第 59、60 页。

(317) 根据统计报告,过去人们可以看到,在苏格兰高地某些地方,——有许多牧羊人和小屋贫农及其妻子儿女,穿着他们用自己鞣制的皮革缝制的鞋子,穿着不经任何外人之手而自己制成的衣服,做衣服的材料是他们自己从羊身上剪下来的羊毛,或者是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麻。在做衣服时,除锥子、针、顶针和少数织布用的铁制工具外,几乎没有一件买来的东西。染料是妇女们自己从灌木、野生植物上面采来的。(《杜格尔德·斯图亚特全集》汉密尔顿编 1855 年爱丁堡版第 8 卷第 327[、328]页)

商业进口外国商品和不断地改造劳动工具。但劳动工具一旦取得比较适合的形式，它就会结晶化，而且往往会世代相传达几个世纪之久。

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事实是，各种手艺直到 18 世纪还称为**秘诀**。在埃蒂耶纳·布瓦洛的有名的著作《手工业手册》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帮工升师傅时，要进行如下宣誓：要兄弟般地热爱同行弟兄，扶持同行弟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本行业的规定即决不随意泄露本行**秘诀**。”⁽³¹⁸⁾

事实上，由社会分工自然形成的各个不同的产业部门彼此成了外行业的人不得涉足其间的独立王国。这些产业部门怀着焦虑不安的唯恐失去的心情严守着本行业传统做法的秘密，其理论甚至对内行人来说也仍然是个哑谜。

这层帷幕使人们看不到自己生活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这层帷幕在工场手工业时代被揭开了，而在大工业到来的时候则被完全撕碎了。大工业的原则是，对每一个生产过程就其自身来进行考察，把每一个生产过程分解成各个构成运动，而不管这些运动是由人的肌肉力还是由手艺来完成。这个原则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工艺学把工业生活的五光十色的、一成不变的和表面上无联系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各种按不同预期效用进行划分的应用。

同时，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最复

⁽³¹⁸⁾ 他还必须发誓，为了本行业的共同利益，决不为了宣扬自己的商品而向买主指出那些制作不好的商品的缺点。

杂的机器不过是掩盖了简单机械力的作用一样。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做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³¹⁹⁾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劳动者的职能和劳动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同时它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而使已有的分工不断发生革命。

如果说大工业的性质本身需要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流动和劳动者的普遍流动性,那么,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又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的技术上的必然性和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具有的社会性之间的这个绝对的矛盾最终破坏了劳动者生活的一切保障,使劳动者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³²⁰⁾,在他的局部职能被排挤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我们也看到,这个对抗产生了一支处于贫困中、从而在资本家需要时随时可供支配的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它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周期性的牺牲,劳动的

(319)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5页³¹⁹)

(320)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莎士比亚)³²⁰

无限制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这种无政府状态使每一个经济进步都成了社会的灾难。这是消极的方面。

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到处都遇到障碍并盲目地破坏这些障碍——为自己开辟道路⁽³²¹⁾，那么，大工业所产生的灾难本身必然要求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劳动者尽可能多方面发展能力是现代生产的规律，并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使各种情况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作用。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大工业迫使社会在死亡的威胁下用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的个人，也就是用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只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

资产阶级为自己的子孙创办了工科学校、农科学校等等，但这仅仅是为了顺应现代生产的内在趋势，它给予无产者的只是一点点职业教育。但是，如果说，工厂立法作为从资本那里奋力争取来的最初的让步，不得不把初等教育（虽然是很可怜的初等教育）同工业劳动结合起来，那么，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必将在人民的学校中实行实践的和理论的工艺教育。⁽³²²⁾毫无疑问，这种以消

(321) 一个法国工人从旧金山回来后这样写道：“我从没有想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竟能够干各种职业。我原来确信，除了印刷业外，我什么也干不了……可是，一旦处在这个换手艺比换衬衫还要容易的冒险家世界中，实际上，我也就和别人一样地干了。由于矿山劳动的收入不多，我就抛弃了这个职业到城里去，在那里我先后做过印刷工人、屋面工人、铸铅工人等等。因为有了适合做任何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一个软体动物而更像一个人了。”〔（昂·科尔邦《论职业教育》第2版第50页）〕

(322) 17世纪末，一位那个时代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在谈到不包括生产劳动的教育时说道：

灭旧分工为最终目的的变革,是同产业的资本主义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使工人所处的经济环境明显地矛盾的。但是,一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走向瓦解和形态变化的唯一的现实道路,是它们的内在的对抗的历史发展。这正是乐观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空论家们不愿意理解的历史运动的秘密。

“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³²¹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荒唐和可诅咒的事情了。

当工厂立法规定工厂、工场手工业等的劳动时,这仅仅表现为对资本的领主权的干涉。但是,一旦触及到家庭劳动时,这就是对父权(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亲权)的直接的、公开的侵犯。英国议会元老对于采取这一触犯神圣的家庭制度的步骤长期来一直装腔作势,畏缩不前。然而,用夸夸其谈并不能逃避事实。最终必须承认,大工业在破坏工人家庭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使工人家庭的一切其他关系也发生了变革。人们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

关于这个问题,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家庭劳动遭受剥削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约束或监督……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

“游手好闲的学习并不比学习游手好闲好……体力劳动是上帝原本安排的……劳动对于身体健康犹如吃饭对于生命那样必要,因为舒适固然使人免掉痛苦,但身体不适又会给他带来痛苦……劳动给生命之灯添油,而思想把灯点燃。一种愚笨的儿童劳动会使儿童的心灵愚笨。”(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12、14、[16、]18页)

成单纯机器的绝对权力……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亲权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323)

然而,不是亲权的滥用造成了对儿童的剥削,恰恰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造成了亲权的滥用。而且工厂立法不是公开承认,资本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这种使旧的工人家庭彻底解体的溶剂,由于大工业而成为经济的必然性了吗?工厂立法不是承认大工业把亲权变成了社会机构的一个装置,其使命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为资本家提供那些由于处在死亡威胁下面不得不充当贩卖奴隶的捐客和商人的无产者的子女吗?因此,这个立法的全部努力也不过是企图对这种奴隶制度的过度行为加以克制而已。

不论旧家庭关系在目前条件下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324),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和最后的东西,就像把东方家庭形式、希腊家庭形式和罗马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和最后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发展序列。甚至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集体劳动者,这个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产生堕落和奴役的根源也包含着新的社会发展的萌芽。(325)在历史中同在自然中一样,腐败孕育着生命。

(32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2号和《第2号报告》第XXXVIII页第285、289号,第XXV[、XXVI]页第191号。

(324)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62、178—183页。

(325) “工厂劳动可以像过去的家务劳动一样洁净、美妙,甚至更洁净、更美妙。”(《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9页)

工厂法从一项在机器纺纱业和机器织布业中实行的特殊法律，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英国是通过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现代家庭劳动的反作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在受工厂法约束的产业部门中遇到的界限本身扩大了这种剥削，使之和所谓的自由⁽³²⁶⁾产业部门比起来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后，“受工厂法约束的”产业部门叫喊着要求在法律上有平等的竞争权，即要求在法律上有平等的对劳动的剥削权。⁽³²⁷⁾

我们且听一听关于这方面的两种由衷的呼声吧。W.库克斯利先生们(布里斯托尔的生产钉子、链条等的工厂主)，自愿接受工厂条例。

“因为邻近各厂继续存在着旧的不规范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得不遭受损失，眼看着他们的少年工人在下午6点钟以后被引诱到别的地方去继续做工。他们当然会说：‘这对于我们是一种不公平，并且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会消耗少年工人的部分体力，而从少年取得的全部利益理应属于我们。’”⁽³²⁸⁾

辛普森先生(伦敦纸盒纸袋厂的工厂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

“他愿意在任何一个要求实行工厂法的请愿书上签名。在当前的状况下，他在他的工场关门以后总是感到不安，睡觉时总是在想，别的工场干的时间更长些，正在把订货从他的鼻子底下抢走。”⁽³²⁹⁾

(326) 同上，第27、32页。

(327) 关于这一点，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

(32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页第35号。

(329)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IX页]第28号。

童工调查委员会总结说：

“只使较大的雇主的工厂遵守规定，而他们同行业的小工场在劳动时间上却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这对较大的雇主是不公平的。大工厂主不仅要接受劳动时间上的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而且他们的女工和童工也会被引到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从而给他们造成损失。最后，这会促使较小的工场增加，而这些较小的工场对国民的健康、福利、教育以及普遍的改善，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最为不利的。”(330)

童工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最终报告(1866年)中，建议把140多万儿童、少年和妇女(其中几乎有一半人受小工场和家庭劳动的剥削)置于工厂法的约束之下。委员会说：

“如果议会全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立法不仅对同它直接有关的年幼和体弱的人，而且对直接(妇女)和间接(男子)地受立法约束的更大量的成年工人也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这种立法会迫使他们接受规定好的和适度的劳动时间，它会节约和积蓄体力储备，而这同他们的个人幸福和国家幸福是息息相关的；它会保护正在发育的一代，使他们免于在幼年从事毁坏体质和引起早衰的过度紧张的劳动；最后，它还会为至少13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从而结束那种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曾得到如实的描写，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国民受到了侮辱。”(331)

早在24年前，另一个童工调查委员会用纳·威·西尼耳的话来说，就已经

“在该委员会1842年报告中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

(330) 同上，[第XXV页]第165—167号。关于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请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3页第144号；第25页第121号；第26页第125号；第27页第140号等等。

(33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9号。

年的困苦、堕落和遭受摧残，展示出一幅极为可怕的图景……也许有人会说，报告描写的是过去时代的惨状……这种惨状仍然存在，比过去更为严重……1842年受到指责的弊端，今天（1863年10月）仍在泛滥……这份报告（1842年）上面又压上了其他文件，根本无人过问，就这样整整过了20年，在这期间，这些在身体、智力和道德上受到摧残的儿童又成了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父母”（332）。

在这期间，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议会再也不敢像当年拒绝童工调查委员会1840年的要求那样，干脆拒绝该委员会1862年的要求了。因此还在1864年，当新的委员会只公布了它最初的几份报告时，瓦器业（包括陶器业）、壁纸、火柴、弹药和雷管制造业以及剪绒业，便都受到已在纺织业中实行的那些法律的约束。当时的托利党内阁在1867年2月5日的国王演辞中，公布了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866年完成了它的工作）的最后提案起草的新法案。

1867年8月15日颁布了工厂法扩充条例，8月21日颁布了工场管理条例。前者约束大企业，后者约束小企业。

工厂法扩充条例约束炼铁厂、铜铁工人、用机器生产的机器制造厂、金属加工厂、古塔波树胶厂、造纸厂、玻璃厂、烟草厂，还有印刷业（包括报纸印刷业）和装订业，以及所有在一年中至少有100天同时雇用50名以上工人的同类工业的工场。

为了对“工场管理条例”的适用范围的扩大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在这里引用该法律的几项条款：

第四条。

“手工业是指任何一种作为职业或者为了谋利而从事的对任何物品或任何

（332）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55页及以下几页。

物品的一部分进行改装、修理、装饰、最后加工或用其他方式使之适于出售的劳动。”

“工场是指有任何一个儿童、少年或妇女在其中从事某种‘手工业’，并且雇用这个儿童、少年或妇女的人有权进入并实行监督的一切有顶的或露天的场所。”

“受雇是指在一个雇主或尊亲的手下从事任何手工业，不管领工资或不领工资。”

“尊亲是指父、母、监护人、或其他负责监护或监督某一……儿童或少年工人的人。”

第七条的处罚条款中规定，凡违反该法律者，得处以罚款，这一条不仅适用于雇主(不管是不是尊亲之一)，而且也适用于

“尊亲或从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的劳动中得到直接好处或对他们的劳动有监督权的人”。

适用于大企业的工厂法扩充条例作了大量恶劣的例外规定和对企业主的卑怯妥协，因此同工厂法比较起来，是后退了。

工场管理条例由于其各项细节十分贫乏，它在被授权执行该法律的市政及地方当局手中仍然是一纸空文。1871年议会从这些当局手里收回该法的执行权，把它交给工厂视察员，从而使工厂视察员的视察范围一举扩大了10万多个工场和300个砖厂，但对于本来就人手不足的视察人员，只增派了8名助手。(333)

因此，在1867年的这次英国立法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议会不得被迫在原则上采取非常的和广泛的措施，来

(333) 工厂视察人员包括：2名视察员，2名副视察员，41名助理视察员。新添的8名助理视察员是1871年任命的。1871年至1872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用于这些行政人员的全部预算只有25 347镑，其中还包括控告违法雇主的诉讼费。

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另一方面，议会在真正实现这些措施时又迟疑不决、很不自愿、很少诚意。

1862年的调查委员会还建议对采矿业实行一种新的规定：采矿业和其他各种工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过去，这两种利益的对立曾促进了工厂立法；现在，正是不存在这种对立，才足以说明矿业立法为什么会如此拖延和施展诡计。

1840年调查委员会揭露了骇人听闻、令人愤慨的事实，这在欧洲成为一件丑闻，以致议会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不得不通过了1842年的矿业法，这项法律仅限于禁止使用妇女和不满10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

以后，1860年，一条新的法令，“矿山视察法”，规定矿山要受专门任命的国家官员的检查，不许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除非他们持有学校的证明或者按一定的时数上学。由于任命的视察员少得可笑，职权又很小，加上其他一些下面将要详细叙述的原因，这项法令仍完全是一纸空文。

关于矿山的最近的蓝皮书¹⁰之一，是《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1866年7月23日》。这是由下院内部组成的一个有全权传呼和询问证人的议会委员会的作品，是厚厚的一册对开本，其中委员会的报告本身一共只有五行。由于无话可说，还必须大量资料！所有只有五行字。剩下的就是对证人的询问记录了。

询问证人的方式使人想起英国法庭对证人的反问法，就是律师乱七八糟地提出各种无耻的、临时拼凑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吓唬证人，弄得他们手足无措，糊里糊涂，然后对他的话加以歪曲。在这里，律师也就是议会里负责调查的先生们，其中有矿主和矿山经营者；证

人是煤矿工人。这套滑稽戏最能说明问题了，因此在这里不能不从这个报告中引述几段。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分类叙述。当然，问题和相应的回答在英国蓝皮书中都是编有号码的。

1. 矿山中 10 岁以上童工的劳动。——在矿山中，劳动，连同到矿山往返的路程，一般持续 14—15 小时，有时甚至从早晨 3、4、5 点钟到傍晚 4—5 点钟（第 6、452、83 号）。成年工人分两班劳动，每班 8 小时，但是为了节省开支，少年不换班（第 80、203、204 号）。年幼的儿童主要是雇来开关矿内各巷道的通风门，大一些的儿童则做较重的活，如运煤等等（第 122、739、740、1717 号）。这种长时间的井下劳动一直要做到 18 岁或者 22 岁，然后才转入真正的矿山劳动（第 161 号）。现在儿童和少年受到的虐待和剥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残酷（第 1663—1667 号）。矿工几乎一致要求议会制定一项法令禁止使用不满 14 岁的童工从事矿山劳动。于是，布鲁斯先生问道：

“这种要求难道不取决于父母的贫穷程度吗？如果父亲死了或者变成残废等等，那么夺去家庭的这个收入来源，难道不残忍吗？那就必须施行一项普遍的规章。你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不满 14 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吗？”回答：“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第 107—110 号）哈西·维维安（一个矿山经营者）：“如果矿山禁止使用不满 14 岁的童工，父母不会把孩子送到工厂等处去吗？——一般说，不会。”（第 174 号）工人：“开关通风门看起来很容易，但这是很苦的活。这些少年不仅老是挨风吹，而且关在那里完全像关在阴暗的牢房里的囚犯一样。”资产者哈西：“如果一个少年有灯，他不能在看门的时候读读书吗？——首先，他得自己买蜡烛，再说，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他在那里要注意自己的工作，他必须尽他的责任。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少年在矿里念书。”（第 139—160 号）

2. 教育。——矿工要求像工厂中那样，制定一项有关儿童强制教育的法律。他们声言，1860 年法令中关于使用 10—12 岁儿童要有学校证明的条款纯粹是一种空想。资本家的预审法官的盘问在这

里实在可笑极了。〔(第 115 号)〕

“法令应当更多地约束谁呢,雇主还是父母?——对双方都应当约束。”(第 116 号)“不更多地约束其中的一方吗?——让我怎么回答呢?”(第 137 号)“雇主有没有表示某种愿望想使劳动时间规定得适合于上学呢?——从来没有。”(第 211 号)“矿工以后能改进自己的教养吗?——一般说来,他们越来越坏,染上了各种恶习;赌钱、酗酒等等,完全堕落了。”(第 154 号)“为什么不送儿童们进夜校呢?——多数煤矿区根本没有夜校。但主要的是,他们都让长时间的过度劳动累得精疲力尽,连眼睛也睁不开……因此,资产者最后断定说,这样看,你是反对教育啰?——决不是。”(第 441—443 号)“1860 年的法令不是规定雇主等等在雇用 10 岁至 12 岁的儿童时要索取学校的证明么?——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雇主不照办。”(第 444 号)“你认为,法律的这项条款没有普遍实行吗?——根本就没有实行。”(第 717 号)“矿工对教育问题很关心吗?——绝大多数人都很关心。”(第 718 号)“他们都盼望强制实行这项法律吗?——绝大多数人都盼望。”(第 720 号)“为什么他们不力争实行这项法律呢?——有许多工人希望拒绝没有学校证明的少年做工,但是他会成为被记名的人。”(第 721 号)“谁给他记名呢?——他的雇主。”(第 722 号)“那你岂不是相信雇主会追究一个服从法律的人吗?——我相信雇主会这样做。”(第 723 号)“为什么工人不拒绝使用这样的少年呢?——这可不由工人做主。”(第 1634 号)“你要求议会干涉吗?——要在矿工的孩子们的教育上多少做出点有成效的事情,议会必须制定一项法令来强制实行”。(第 1636 号)“这种办法应适用于大不列颠全部劳动者的孩子呢,还是只适用于矿工的孩子?——我到这里来是代表矿工说话。”(第 1638 号)。“为什么要把矿工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分开?——因为他们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例外。”(第 1639 号)“在哪一方面?——身体方面。”(第 1640 号)“为什么教育对他们比其他阶级的孩子更有价值呢?——我不是说教育对于他们更有价值,但是,由于他们在矿上从事过度劳动,就更少有机会上日校和星期日学校。”(第 1644 号)“这类问题可不能绝对地看,难道不是这样吗?”(第 1646 号)“矿区的学校够么?——不够。”(第 1647 号)“如果国家要求每一个儿童都入学,那么,从哪里来这么多的学校容纳所有的儿童上学呢?——我想,如果情况需要这么办,学校自然会办起来的。不只是绝大部分儿童,而且绝大部分成年矿工也都不会写不会读。”(第 705、726 号)

3. 妇女劳动。——虽然从 1842 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等等。最近三四年来使用的女工大有增加(第 1727 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女儿和寡妇,年龄从 12 岁至 50、60 岁不等。(第 647、1779、1781 号;第 648 号)

“矿工对矿上雇用妇女有什么想法呢?——他们普遍谴责这种做法。”(第 649 号)“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对女性的侮辱并且会使女性堕落。妇女穿着男人的衣服。有些妇女抽烟。在许多场合下丧失了任何的羞耻心。劳动同井下一样脏。其中许多已婚的妇女不能尽自己的家庭职责。”(第 651 号及以下几号;第 709 号)“寡妇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样收入(每周 8—10 先令)的职业吗?——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第 710 号)“那么你仍然下决心截断她们的这条谋生之路么?〈铁石心肠!〉——毫无疑问。”(第 1715、1717 号)“哪儿来的这种情绪呢?——我们矿工非常尊敬女性,不忍看到她们在煤矿里受罪……这种活大部分是很繁重的。有许多姑娘一天要提重物达 10 吨之多。”(第 1732 号)“你是否认为矿上雇用的女工比工厂雇用的女工更没有道德?——我们这里变坏的姑娘比别的地方要多。”(第 1733 号)“但你不是对工厂里的道德状况也不满意么?——不满意。”(第 1734 号)“那么你也希望禁止工厂里使用妇女劳动吗?——不,我不希望。”(第 1735 号)“为什么不希望?——工厂劳动对于女性比较体面和适合。”(第 1736 号)“你不是认为这种劳动对她们的道德仍然是有害的吗?——不,远不像矿上的劳动那样有害。不过,我的意见不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而且也出于身体和社会方面的考虑。姑娘们的社会堕落是令人痛心的,是极端严重的。在这些姑娘成为矿工的妻子以后,她们的丈夫就深受这种堕落之苦,这种情况使他们离开家跑去酗酒。”(第 1737 号)“但是工厂雇用的妇女不也是这样吗?——关于其他生产部门我不能说什么。”(第 1740 号)“但是矿上雇用的妇女和工厂雇用的妇女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第 1741 号)“你能找出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吗?——我没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挨家挨户访问过,知道我们矿区里的一些丑事。”(第 1750 号)“你是不是很希望在所有会使妇女堕落的地方消灭妇女劳动呢?——是的……儿童的最好的感情应由母亲来培养。”(第 1751 号)“但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也是这样吗?——农活只有两季,而我们这里的妇女一年四季都要劳

动,有时白天黑夜接着干,汗流浹背,使她们的体质变弱,健康受到损害。”(第1753号)“你没有全盘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即妇女劳动的问题)吗?——我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我敢说,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煤矿上的妇女劳动相似的工作……〔(第1793、1794、1808号)〕这是男人干的活,而且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干的活……较好的矿工想振奋起来并认真做人,但在妻子那里得不到支持,反而被她们拖了后腿。”

资产者先生们又乱七八糟地盘问了一通之后,终于暴露了他们对寡妇、贫苦家庭等等的同情心的秘密。

“煤矿主们派一些绅士去当总监工,而这些总监工为了博得主人嘉许,就实行尽可能节约地办一切事情的政策;雇用的姑娘每天得到1先令—1先令6便士,而男人却得到2先令6便士。”(第1816号)

4. 矿山事故死者的验尸陪审员。——〔(第360号)〕

“谈到你们区里的验尸官的调查,那么,在发生事故时,工人对诉讼程序是否满意?——不,他们不满意。”(第361—375号)“为什么不满意?——主要是因为当陪审员的那些人对矿山毫无所知。工人除了当证人以外,根本不让干别的。我们要求由矿工当一部分陪审员。现在,判决和证人的证词一般是矛盾的。”(第378号)“陪审员不是应当公正吗?——是的,他们应该是公正的。”(第379号)“劳动者会公正吗?——我看不出有任何原因会使劳动者不公正。他们有实际知识。”(第380号)“但是他们会不会由于偏袒工人并为了工人的利益而作出不公正的苛刻的判决呢?——不,我相信不会。”

5. 虚假的度量衡等等。——工人要求以每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代替两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要求按桶的重量计算,保证不使用假秤等等。

(第1071号)“如果煤桶用欺骗的办法被加大,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14天就可以离开矿井吗?——是的。但是如果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第1072号)“但他不是仍然可以离开这种不公平的地方吗?——

到处都是不公平的。”(第 1073 号)“但是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 14 天又可以离开他所在的地方吗?——是的。”

询问就此了结!

6. 矿山视察。——工人不仅遭受瓦斯爆炸事故带来的痛苦。

(第 234 号及以下几号)“我们也要对煤矿内通风不良提出控诉,这种情况使工人在矿内几乎无法呼吸,因此什么活也干不了。例如,正好现在在我干活的那个工作面上,恶劣的空气使许多工人病倒了好几个星期。在主要巷道里,空气一般还够用,然而正好在我们干活的地方就不够用了。如果有谁向视察员控诉通风情况,那他就会被解雇,并且成为一个‘被记名的’人,到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1860 年的矿山视察法纯粹是一张废纸。视察员这类先生的人数太少了,他们也许要 7 年才能进行一次形式上的视察。我们的视察员是一个 70 多岁的残废人,他要管 130 多个煤矿。我们除了需要有更多的视察员外,还需要有助理视察员。”(第 280 号)“这样是不是政府应当维持一支视察员队伍,让他们在没有工人报告的情况下自己就能够解决你们的全部要求?——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应该自己到矿井里来听取报告。”(第 285 号)“你不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把矿主和矿山经营者的责任推到政府官员身上吗?——绝不会这样,他们的职责是要求人们遵守现行的法律。”(第 294 号)“你说的助理视察员是不是指那些比现任视察员薪水少级别低的人呢?——如果你们能够派比较好的,我决不希望要级别比较低的。”(第 295 号)“你们是要更多的视察员呢,还是要比视察员低一级的人呢?——我们需要那些能亲自到矿上来跑跑并且不顾私利的人。”(第 297 号)“如果你们要求派另一类视察员的愿望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在熟练程度上的缺陷不会造成危险吗?……——不会,政府的责任是委派适当的人员。”

这种询问法最终连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也感到太荒唐了。[298、299 号]他打断他的伙伴的话说:

“你们是希望有实际经验的人员,能亲自到矿井看看并把情况报告给视察员,而视察员就可以运用他的较高级的知识。”(第 531 号)“所有这些旧矿井都搞通风设备,不是会造成很大的花费吗?——是的,费用可能会增加,但人的生命会得到保障。”

(第 581 号)一个煤矿工人对 1860 年法令第 17 条表示抗议:

“现在,如果矿山视察员发现矿井的某一部分不适于工作,他必须向矿主和内务大臣报告。然后矿主有 20 天的考虑时间;20 天期满后,矿主可以拒绝任何改进。但是矿主主要是这样做,他就必须给内务大臣打一个报告,并向他推荐 5 名矿山工程师,由内务大臣从中挑选仲裁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矿主实际上是委派自己的仲裁人。”

(第 586 号)作为询问人的资产者(他自己就是矿主)说:

“这种抗辩纯粹是瞎想出来的。”(第 588 号)“这样说来,你们对矿山工程师的正直评价很低了?——我是说,这种做法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第 589 号)“难道矿山工程师不具备某种公正的品格,从而可以使他们的决定避免你们所担心的那种偏袒吗?——我拒绝回答有关这些人的个人品格的问题。我相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做事很不公正,在这种人命关天的地方,应当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力。”

这个资产者又厚颜无耻地问:

“你不认为矿主也会因瓦斯爆炸而遭到损失吗?”

最后还问道:

“你们工人不请求政府的帮助就不能自己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吗?——不能。”(第 1042 号)

1865 年大不列颠有 3 217 个煤矿和 12 个视察员。约克郡的一个矿主(1867 年 1 月 26 日《泰晤士报》报道)自己曾计算过,撇开视察员的纯事务性的工作(而这就占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不说,每个矿山每 10 年才能被视察一次。无怪近几年来惨祸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严重,有时一次竟牺牲 200—300 名工人。

议会于 1872 年通过的有很大缺陷的法令,是对矿山雇用的儿童的劳动时间作出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矿山经营者和采矿业主要对所谓事故负责的第一个法令。

1867年调查农业中儿童、少年、妇女的劳动情况的皇家委员会公布了几个很重要的报告。为了把工厂立法在形式上加以改变而应用到农业方面去，曾有过各种尝试，但直到今天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可是我在这里必须提醒注意的一点是：普遍应用工厂立法已经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如果说，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对于保护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来说已经必不可少，那么，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同时也加速了孤立的、分散的和小规模劳动向社会地组织和大规模结合的劳动过渡，从而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权力的传统的过渡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资本的专制。这样，它同时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每个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的对技术发展的巨大刺激，加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危机，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工人与机器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同时，也消灭了大量日益过剩的劳动者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安全阀。它在发展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的同时，也发展了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发展了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即破坏旧社会的力量。⁽³³⁴⁾

(334) 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之父，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他不像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变要素的作用抱有任何幻想。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³²² 莱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菲瑟灵先生，在1860年至1862年所出版的著作《实用国民经济手册》（这部著作以最适当的形式复述了庸俗经济学的一切庸俗主张）中竭力赞成手工业生产、反对大工业，可见他似乎也感觉到了类似的东西。

10. 大工业和农业

大工业在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说明。在这里，我们先简短地提一下某些一般的结果就够了。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和危险，那么劳动者由于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而被取代和排挤的倾向则表现得更为强烈，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³³⁵⁾例如，在萨福克郡和剑桥郡，最近 20 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而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使相同数量的劳动者能够耕种更大的面积，从而潜在地代替了工人，只是现在还没有把他赶走。在英格兰，农业机器使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如果认为这可以由于使用机器的新的农业劳动而得到补偿，那就大错而特错了。1861 年，在农业机器即蒸汽机和工具机上干活的农业工人只有 1 205 人，而制造这些蒸汽机和工具机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和这个数字大致相等。

与所有其他地方相比，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更为革命的作用，是消灭农民——旧社会的堡垒，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阶级斗争，就和城市达到了相同的程度。

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切断了在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幼年时期把这

⁽³³⁵⁾ 我们可以在威·哈姆博士的《英国的农具和农业机器》(1856 年第 2 版)中找到关于英国农业所应用的机器的详细叙述。哈姆先生在描述英国农业发展进程时毫无批判地重复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³²³的著作。

二者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各自在它们完全分离的时期所取得的发展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条件。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它不仅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劳动者的精神生活⁽³³⁶⁾,而且也使以衣食等形式从土地取走并消费掉的土地的各种肥力要素和化学成分的恢复越来越困难,从而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落后社会几乎是自发地完成这种物质循环的条件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循环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

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的资本主义转化只是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资料只是表现为征服劳动者、剥削劳动者和使劳动者贫困的手段,劳动的社会结合只是表现为对劳动者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劳动者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集中却增强了城市工人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收益的增大是以劳动力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

(336) “你们把人民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粗笨的农民和娇弱的侏儒。天啊!一个按农业利益和商业利益分裂开来的民族,不仅无视这种惊人的违反自然的划分,而且正是因为这种划分,才自称为健康的,甚至自命为开化的和文明的民族。”(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19页)这段话同时表明了这样一种批判的长处和短处,这种批判知道评论现在,谴责现在,却不知道理解现在。

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³³⁷⁾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两个源泉：土地和劳动者。

(337) 参看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特别是第1卷《农业自然规律概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他对农业发展所作的历史的概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也说明了不少问题。可惜的是，他竟会不加考虑地发表这样的见解：“把土弄得更细并且经常翻耕，会促进疏松的那部分土壤内的空气流通，扩大并更新受空气作用的土壤表面；但是很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不会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率增加”。李比希接着说：“这个规律最先是由约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表述的，该书第一卷第217页这样写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雇用的劳动者人数的增加相比，土地的产量以递减的比率增加，这是农业的普遍规律（穆勒先生甚至以错误的公式复述了李嘉图学派²⁸的规律，因为在英国，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而农业却不断取得进步，因此，这个在英国并且为了英国而发明的规律，至少在英国是完全不适用的）。’这确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穆勒并不知道这个规律的根据。”（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第1卷第143页和注释）且不说李比希对劳动（他所理解的劳动与政治经济学不同，他把劳动理解为对土地施肥和对土地施加机械作用）一词的错误解释，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是，他竟把约翰·斯·穆勒先生当做这个规律的首倡者，其实，这个规律最先由亚当·斯密时代的詹姆斯·安德森发现，直到19世纪初还被他在不同的著作³²⁴中加以重复。1815年，剽窃能手马尔萨斯（他的全部人口论都是惊人的剽窃）把它据为己有，³²⁵威斯特在当时也与安德森无关而独立地阐述了 this 规律。³²⁶1817年，李嘉图把这个规律同一般的价值理论调和起来，³²⁷从此以后，这个规律就以李嘉图的名字传遍全世界。1820年，詹姆斯·穆勒（约翰·斯·穆勒的父亲）把这个规律庸俗化了，³²⁸后来，约翰·斯·穆勒也把它当做一种老生常谈的学派教条加以复述。不可否认，约·斯·穆勒先生之所以享有那种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权威，完全是由于类似的误解造成的。

第五篇

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研究

第十六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当我们从劳动过程的一切历史形式所共有的最简单的方面来对它进行研究,即把它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行为来研究时已经看到:“如果这整个运动从其结果即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都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¹⁾人创造出产品,使外在物适合自己的需要,在这一行为中,正像在自然机体中手和头缺一不可一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一旦个人的产品转化为社会的产品,转化为集体劳动者的产品,而这一集体劳动者的不同成员以极其不同的程度参与材料的

(1) 见第七章第76—79页。^①

① 见本卷第183页。——编者注

加工,或近或远,或者甚至根本不接触材料,生产劳动、生产劳动者的定义就必然获得更广泛的意义。要成为生产的,不再有必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集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或者完成其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被看做一个人的集体劳动者来说,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集体劳动者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

但是,这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劳动的独特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的决定性目的是剩余价值。因此,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通过劳动使资本增殖的劳动者才被看做是生产的。例如,一个教员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训练他的学生的头脑,而是因为他为校董带来了金钱。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是他的事情。从此以后,生产劳动的概念不只包含活动和有用效果之间的关系,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特别包含一种使劳动成为增殖资本的直接工具的社会关系。

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而本能地、时而有意识地始终主张生产劳动的特征是生产剩余价值。³²⁹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它对剩余价值的分析推向前进,它对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也就有所变化。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为什么?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³³⁰

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为提供自己的生活费用的等价物所必需的时间,并把这部分剩余劳动交给资本,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工作日已经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通

过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劳动的持续时间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随着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建立起来并成为普遍的方式，那么只要涉及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假定劳动力按照它的公平的价值得到支付，我们显然就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在工作日的界限既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只有通过下述二种办法才能提高，或者增大劳动强度，或者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过来，如果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不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进一步延长工作日才能提高。

然而，不管劳动持续时间的长度如何，只要劳动不具有使工人只需要用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可以生产出他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的生产率，这种劳动就不会提供剩余价值。因此，我们要问：是否存在人们所说的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呢？

假定维持生产者和他的家庭的生存所必要的劳动占据了他可供支配的全部时间，那么他在哪里能找到为别人进行无偿劳动的方法呢？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就没有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剩余价值，不可能有纯产品，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私有者阶级。(2)

(2) “资本家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206页)“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好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不会有财产了。”(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14页)

自然并没有妨碍一些人的肉成为另一些人的食物；⁽³⁾ 同样，自然也没有设置不可克服的障碍会妨碍一个人能够为更多的人劳动，会妨碍另一个人能够把劳动负担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前一个人。但是，人们赋予这种自然的事实以某种神秘的色彩，力图经院式地通过劳动的“看不见的”性质，劳动的固有的生产率，即人一来到世间就天然具有的现成的生产率来说明这种自然的事实。

但是，原始人的那些仍然处在萌芽状态的、隐藏在他的动物的硬皮底下的能力，只是在生理需要的压力下慢慢地形成的。当人们通过艰苦的劳动终于摆脱了他们的最初的动物状态，因而他们的劳动在一定的范围内已经社会化时，在那时并且只是在那时，使一个人的剩余劳动能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命的源泉的条件才产生出来，然而如果不通过暴力，使一个人从属于另一个人，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社会生活的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确实是很低的，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同时，社会上依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⁴⁾

此外，资本主义生产是在一系列长期的经济进化和经济革命所准备好的土壤上扎下根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的劳动生产率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历史发展的时期不是以若干世纪来计算，

(3) 据最近统计，仅在地球上已经考察过的地区内，至少还居住着 400 万吃人的人。

(4) “在美洲未开化的印第安人那里，几乎一切都属于劳动者，99%的产品归劳动所有；在英国，工人从来没有得到 $\frac{2}{3}$ 。”（《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1720 年伦敦版第 72、73 页）

而是要用几千个世纪来计算的。

撇开社会的生产方式不说,劳动生产率取决于进行这种劳动的自然条件。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从经济的角度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明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后来,在较进步的社会,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世界,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各国比较。

必须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为别人的劳动超过他为自己的劳动的部分就可以越多。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谈到古代埃及人时就这样说过:

“他们抚养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费用少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给孩子随便煮一点最简单的食物;甚至纸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来给孩子们吃。此外也给孩子们吃沼泽植物的根和茎,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烤一烤再吃。因为气候非常温暖,大多数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养大一个子女的费用总共不超过 20 德拉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兴建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⁵⁾

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相对更大一部分人口可以用于非生产劳动。个体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中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于其

(5) 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 1 卷第 80 章。

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建立起来,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由此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最有利于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³³¹它不能使人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因而妨碍人的发展。⁽⁶⁾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地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化学性质、地质构成、自然地形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由于人所处的条件的多样性,促使人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

社会地控制、利用和节约自然力,用人力兴建的工程大规模地占有自然力的必要性,总之,驯服自然力的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⁷⁾、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的必要性就是例

(6) “因为前者(自然富源)非常富饶非常有利,它使人无所用心,骄傲自满,放荡不羁;而后者则发展并加强积极性、上进心、技术、文化知识和文明程度。”(《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国对外贸易差额是衡量我国财富的尺度》,伦敦商人托马斯·曼著,作者之子约翰·曼为公共利益出版,1669年伦敦版第181、182页)“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几乎不必为穿担忧……当然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极端。即使投入劳动也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土地,同不投入任何劳动就能出产丰富产品的土地是一样坏的。”(《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0页)

(7) 计算尼罗河泛滥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同时这又使祭司种姓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二至点是尼罗河水每年开始上涨的时刻,埃及人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力去观察它……确定这个回归年,以便安排农事,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们必须向天空探索它的回转的明显标志。”(居维叶《论地球表面的巨变》,赫弗编,1863年巴黎版第141页)

子。在印度、波斯等地也是这样,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从山上流下来并沉淀在淤泥中。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⁸⁾

良好的自然条件会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会提供纯产品或剩余价值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视气候好坏的程度、土地天然肥力的程度不同,基本需要的数量也会或者较多或者较少,为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须作出的努力程度也会或者较大或者较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必要劳动时间都不相同⁽⁹⁾;但是剩余劳动只能在必要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因此,那些决定必要劳动相对量的自然作用,为剩余劳动规定了自然界限。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在我们的欧洲社会中,劳动者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纯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

(8) 在印度,供水的管理是中央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的共同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征服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1866年的那次饥荒在孟加拉省奥里萨地区饿死了100多万印度人就够了。

(9) “没有两个国家能够以等量的劳动耗费而同样丰富地提供数目相等的必要生活资料。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所处的气候的严寒或温暖,所以不同国家的居民必须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的程度只有根据冷热的程度才能断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维持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气候寒冷的地方最大,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最小,前一种地方与后一种地方相比,人们不仅需要较多的衣服,而且土地也必须耕作得更好。”(《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9页)这部划时代的著作的作者是约瑟夫·马西。休谟就是从这部著作中得出他的利息理论的。

天生的性质。⁽¹⁰⁾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那里的森林中长着野生的西米树。

“居民在西米树上钻个孔,确定树髓已经成熟时,就把树放倒,分成几段,取出树髓,再换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从一棵西米树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 300 磅,有时可采得 500 磅至 600 磅。那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像我们到森林去砍柴一样。”⁽¹¹⁾

假定某个这样的岛民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劳动 12 小时。我们看到,自然给予他的第一个恩惠,是许多闲暇时间。要他把这些闲暇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要他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他就必须受到暴力的强制。如果在他的岛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这个诚实的岛民为了能被允许占有自己的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也许每周就得劳动 6 天。自然的恩惠说明不了,为什么他现在每周要劳动 6 天,或者为什么他要提供 5 天的剩余劳动。它只是说明,为什么他的必要劳动时间可以缩减到每周一天。³³³

因此,劳动要能够延长到超出生产者为自己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时间,必须在此以前达到一定程度的生产率;但是,剩余价值的原因绝不是这种生产率,不管这种生产率的程度如何。剩余价值的原因始终是剩余劳动,而不管以何种方式夺取这种剩余劳动。

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他把剩余价值看做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

(10) “任何劳动都必须留有一些剩余量。”(蒲鲁东³³²) (看来,这也是市民的权利和义务。)

(11) 弗·沙乌《土地、植物和人》1854 年菜比锡第 2 版第 148 页。

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做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商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²⁸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³³⁴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本能地感觉到，如果过分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棘手的问题，用基佐先生的夸张的语言来说，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是在李嘉图以后半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还在拙劣地重复那些最先把李嘉图学说庸俗化的人的陈腐遁词，郑重其事地宣称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对此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穆勒说：

“利润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的东西比维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多。”

这不过是旧话重提；但是穆勒还想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他接着说：

“或者对这一论点换一种说法：资本提供利润的原因在于，食物、衣服、原料和工具等存在的时间比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时间长。”

这里，穆勒把劳动时间的持续与劳动产品存在时间的持续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看法，面包业主不可能从他的雇佣工人那里取得同机器制造业主相同的利润，因为面包业主的产品只能持续一天，而机器制造业主的产品却能持续20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如果鸟巢存在的时间不比造巢所需的时间长，鸟只好不要巢了。

这一基本真理一旦确立，穆勒就来确立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之

处了,他大声说:

“因此,我们看到,利润不是来自交换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来自劳动生产力;不管交换是否发生,一个国家的总利润总是由劳动生产力生产的。如果没有职业的区别,那就既没有买,也没有卖,但是利润依然存在”。

在他看来,交换、买和卖这些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只是偶然的事情;并且没有劳动力的买和卖,利润依然存在!他接下去又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劳动者所生产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额的20%,那么不论商品价格的水平如何,利润总是20%。”

从一方面看,这是绝妙的大实话,因为既然工人为资本家生产了20%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工人工资之比自然是20:100。另一方面,说利润“总是20%”却是完全错误的。它必然总是小于20%,因为利润要按预付资本的总额来计算。例如,假设企业主预付了500镑,其中五分之四预付在生产资料上,五分之一预付在工资上,那么利润率就是20:500,即4%,而不是20%。

下面是穆勒先生对待社会生产各种历史形式的方法的最卓越范例,这是他给我们的最精彩的东西。他说:

“我总是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到处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劳动者的报酬在内”。

把我们地球上迄今只是作为例外而存在的一种状态看做到处存在的状态,这真是奇怪的错觉!我们再往下看。穆勒欣然承认,“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³³⁵。事情正好相反。

“如果劳动者在他完成全部工作以前已有维持这段时间生活所必需的资金,他就可以在劳动全部结束后再去领……甚至他的全部工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资本家了,因为他把资本投入企业,提供了经营企业

所需的一部分基金。”

穆勒先生还可以进一步断言，一个不仅为自己预付生活资料，而且为自己预付生产资料的工人实际上只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他同样也可以说美国农民只是为自己服劳役而不是为别人服劳役的奴隶。

穆勒先生在这里清楚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即使在它不存在的时候也总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即使在它存在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他说：

“甚至在前一场合（即工人是由资本家预付自己全部生活资料的雇佣工人），我们也可以用同一观点来考察工人（即把他看做资本家）。因为他是在市场价格以下（！）提供他的劳动的，所以他好像是把其中的差额（？）预付给他的企业主……”（12）

实际上工人是在一周或其他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无偿地预付给资本家，然后在一周之末或其他一段时间结束时才取得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在穆勒看来，这就使工人成了资本家。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像座小山；因此，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

（12） 约·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68年伦敦版第252—253页。

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间 量的比例的变化

我们看到,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格之间量的比例取决于三个因素:1. 劳动的持续时间,或劳动的外延量;2. 劳动强度,由于劳动强度不同,同一时间支出的劳动量不同;3. 劳动生产力水平,由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同,同量劳动能在同一时间内提供不同的产品量。显然,这三个因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或者是其中一个因素不变(量不变),其他两个因素可变(量发生变化);或者两个因素不变,一个因素可变;最后,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变化。如果各个不同因素的量不是同时按同一方向变化(一个因素增大而另一个因素变小),或者不按同一程度变化(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以更快的速度增大)等等,组合也就会更加多种多样。我们在这里只考察几种主要的组合。

1. 已定: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强度不变。 生产率可变

假定有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得到下述三个规律:

第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是生产相同的价值。

如果一个具有平均劳动强度的劳动小时生产半法郎价值,那么十二小时工作日所生产的就总只是 6 法郎价值。⁽¹³⁾ 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或者降低,同一工作日就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6 法郎的价值就会分配在较多或较少的商品上面。

第二,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彼此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剩余价值按照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同一方向变化,而劳动力价值则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

显然,在一个不变量的两个部分中,如果一个部分不减少,另一个部分就不能增大;如果一个部分不增大,另一个部分也不能减少。但是,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总是生产同一价值,例如 6 法郎,其中一部分是剩余价值,另一部分是劳动力的等价物,假定前一部分和后一部分都是 3 法郎。很清楚,剩余价值不降低到 2 法郎,劳动力的价格就不可能达到 4 法郎,而如果劳动力的价值不降低到 2 法郎,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提高到 4 法郎。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或劳动力等价物的绝对量的每一次变化,都要求它们的相对量或比例量发生变化。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不可能同时提高或同时降低。

劳动生产率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导致劳动力价值的相反方向的变化。如果生产率的提高使以前需要 6 小时生产的生活资料量用 4 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从 3 法郎降低到 2 法郎;但是,如果生产力的下降使以前只用 6 小时就能生产的生活资料量要用 8 小时才能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会从 3 法郎提高到 4

(13) 我们总是假定货币价值不变。

法郎。

最后,既然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彼此按相反的方向变化,那就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必然会提高剩余价值,而生产率的下降会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必然会降低剩余价值。

李嘉图在表述这个规律时忽略了重要的一点:虽然剩余价值量或剩余劳动量和劳动力的价值量或必要劳动量只能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但不能由此推论说,这些量是按照同一比例变化的。假定劳动力价值为4法郎,或必要劳动时间为8小时,剩余价值为2法郎,或剩余劳动为4小时;如果由于生产率提高,劳动力价值降低到3法郎,或必要劳动降低到6小时,那么剩余价值就提高到3法郎,或剩余劳动提高到6小时。一方增加的和另一方减少的量都是2小时或1法郎,但这同一个量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影响每一方的量。劳动力的价值由4法郎降低到3法郎,即降低了 $\frac{1}{4}$ 或25%,剩余价值则由2法郎提高到3法郎,即提高 $\frac{1}{2}$ 或50%。

总之,假定工作日的长度已定,而工作日又分为两个部分,即必要劳动部分和剩余劳动部分,那么,剩余劳动部分原来越小,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起的剩余价值的相应增长就越大,而如果剩余劳动部分原来越大,生产率的下降所引起的剩余价值的相应减少就越小。

第三,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始终是劳动力价值相应的减少或增加的结果,而绝不是这种减少或增加的原因。(14)

(14) 麦克库洛赫也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规律作了荒谬的补充:通过取消资本家以前必须缴纳的捐税,剩余价值在劳动力不降低的情况下,也能提高。这些捐税的取消绝不会改变产业资本家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量。它只是改变产业资本家装进自己腰包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或要同第三者分享的

工作日是一个不变量,不断生产出同一价值,这个价值,分为劳动力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这两个部分,剩余价值量的每一变化都伴随着劳动力价值的相反的变化,而劳动力的价值最终只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变化而发生量的变化,所以很清楚,在这些条件下,首先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使劳动力价值提高或降低,而后者的上升或下降的运动又会引起剩余价值的相反方向的运动。因此,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量的比例的每一次变化,始终是由于后者的量的绝对变化而引起的。

我们曾假定,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生产的全部价值是6法郎,这6法郎分为劳动力价值4法郎和剩余价值2法郎。换句话说,8小时为必要劳动,4小时为剩余劳动。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那么工人只需要他以前的一半时间就可以生产出自己每天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他的必要劳动从8小时减少到4小时,因此他的剩余劳动就从4小时增加到8小时;同样,他的劳动力价值从4法郎下降到2法郎,而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会使剩余价值从2法郎增加到4法郎。

但是,这一使劳动力的价格总是还原为劳动力价值的规律会遇到障碍,从而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得到实现。劳动力的价格只能降低到3法郎80生丁、3法郎40生丁、3法郎20生丁等等,从而剩余价值只能增加到2法郎20生丁、2法郎60生丁、2法郎80生丁等等。这种以劳动力的新价值2法郎为最低限额的下降的程度,取决

剩余价值的比例。所以它不会改变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因此,麦克库洛赫的“例外情况”只能证明他对规则的误解。在他把李嘉图庸俗化时,正像让·巴·萨伊把亚当·斯密庸俗化时一样,常常发生这种不幸。

于资本的压力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的力量对比。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在我们的例子中,尽管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一倍,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不变,工人始终得到4法郎,而资本家得到2法郎;但是这两笔钱中的每一笔钱可以购买到的生活资料比以前多一倍。尽管劳动力的价格没有变,但是这种价格已经超过了劳动力的价值。如果这种价格没有下降到劳动力的新价值的最低限额2法郎,而是下降到3法郎80生丁、3法郎40生丁、3法郎20生丁等等,那么这种下降的价格仍然代表着较多的生活资料。可见,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可以支配的生活资料同时不断增加。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劳动力价格的不断的下降也会导致剩余价值的不断增加,从而扩大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¹⁵⁾

李嘉图第一个严密地表述了上述三个规律;但是他犯了错误,他把这些规律所适用的各种特殊条件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的和独有的条件。在他看来,工作日的长度不变,劳动的强度也不变,因此劳动生产率是唯一可变的因素。

事情还不止于此,他同其他一切经济学家一样,从不研究剩余价值本身,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去进行研究。他把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混为一谈,因此认为利润率能直接表

(15) “当工业生产率发生变化,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产品增多或减少时,工资所占的比例部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这个部分所代表的量不变;或者这个量发生变化,但工资的比例部分不变。”(《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67页)

示劳动的剥削程度。³³⁶我们已经指出⁽¹⁶⁾，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而剩余价值率则是剩余价值同预付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假定资本(C)为500镑，分为400镑价值的原料、劳动资料等(c)，支付给工人的100镑(v)；再假定剩余价值(p)为100镑；这样，剩余价值率为 $\frac{p}{v} = \frac{100 \text{ 镑}}{100 \text{ 镑}} = 100\%$ ，而利润率 $\frac{p}{C} = \frac{100 \text{ 镑}}{500 \text{ 镑}} = 20\%$ 。除了这种量的差别外，很显然，利润率还会受到与剩余价值率毫无关系的一些情况的影响。以后在本书第三册中，我将说明，在剩余价值率已定的情况下，利润率可以有无限多样的变化，而在利润率已定的情况下，与这种利润率相适应的也可以是各种不同的剩余价值率。³³⁷

2. 已定：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生产率不变。 劳动强度可变

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就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不是生产出更多的价值。如果劳动强度提高，劳动就不仅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且也会生产出更多的价值，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产品来自更多的劳动。

因此，在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生产率已定的情况下，劳动的强度超出社会平均强度多少，劳动所实现的价值就增大多少。这样，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所生产的价值就不再是不变的，而是可变的。由此就可以

(16) 见第93页。^①

① 见本卷第423页。——编者注

说,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可以按相等的比例或不等的比例平行地朝同一方向变动。如果同一个工作日不是生产 6 法郎而是生产 8 法郎,那么很明显,工人的份额和资本家的份额就会同时从 3 法郎提高到 4 法郎。

劳动力价格的这种提高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得到的报酬超过了劳动力的价值。相反,与价格的提高相伴随的可以是价值的下降。当价格的提高不足以补偿劳动力损耗的增大时,就总是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只有影响劳动力价值的那些生产率的变化,才影响到为工人的日常消费生产产品的产业部门。相反,劳动量在外延上和内涵上发生的一切变化,只要它加速劳动力的损耗,都会对劳动力的价值发生影响。

如果劳动在一个国家的一切产业部门中都同时达到了同样的较高的强度,这种劳动强度从此就会成为国民劳动的通常的强度,从而不再受到人们的注意。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平均的劳动强度在不同的国家仍然是不同的,因而,会使价值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应用上有所变化。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另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表现为更大的货币额。⁽¹⁷⁾

3. 已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不变。 劳动持续时间可变

从持续时间来看,劳动可以向两个方向变化,可以缩短或延长。我们在我们假定的前提下会得到下述新的规律:

(17)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别国工厂主相比,英国工厂主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劳动量要多得多,以致英国每周总计 60 小时的工作日抵得上别国 72—80 小时的工作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 年 10 月 31 日》第 65 页)

1. 工作日同它的持续时间成正比地实现为较大量的价值或较小量的价值，——因此，是可变的，而不是不变的。

2. 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量的比例的一切变化都产生于剩余劳动、从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

3. 劳动力的绝对价值的变化只能来自剩余劳动的延长对这种劳动力的损耗程度发生的反作用。因此，劳动力绝对价值的一切变动都是剩余价值量变动的结果，而不是这种变动的原因。

我们在本章以及以后总是假定，通常计算的十二小时工作日——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生产价值6法郎，其中一半归工人，另一半归资本家。

我们从工作日例如由12小时缩短到10小时开始。这时，工作日就只生产价值5法郎。剩余劳动从6小时减少到4小时，因而剩余价值从3法郎减少到2法郎。剩余价值绝对量的这种减少会引起剩余价值相对量的减少。剩余价值同劳动力价值之比原来是3:3，现在只是2:3。相反，劳动力价值没有变，在相对量上增大了；劳动力价值同剩余价值之比现在是3:2，而不是3:3。

资本家只能把他对劳动力支付的报酬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以此来取得补偿。

反对减少劳动时间的陈词滥调都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按照这种假设，这种现象是在这里假定的条件下发生的；这就是说，假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不变。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即使不是在工作日缩短以前已经提高，那么在工作日缩短以后也总会紧接着提高。(18)

(18) “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施行，表明……存在着各种补偿的情况。”（《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2月1日》第7页）

如果工作日例如从 12 小时延长到 14 小时,而追加的几小时并入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就会从 3 法郎增加到 4 法郎。剩余价值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了,而劳动力,虽然它的名义价值没有变,但它的相对价值却变小了。它同剩余价值之比只是 3:4。

在我们假定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日价值总量随着每日的劳动持续时间的延长而增大,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两个部分——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等价物——可以同时等量或不等量地增大;同样,在劳动强度增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随着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力可能降到它的价值以下,虽然它的价格没有变或者甚至提高了。在一定的限度内,更大的收入可以补偿由于延长工作日而强加给工人的生命力的更大的耗费。⁽¹⁹⁾但事情总是会达到这样一点,那时,工人的工作日的任何进一步的延长都会打乱他的再生产和活动的正常条件,从而缩短他的平均寿命。从这时起,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就不再是可通约的量了。

4. 已定:劳动持续时间、劳动生产率 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劳动持续时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同时发生变化会产生出许多种组合,因而会产生出许多问题,不过只要依次把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因素看做是可变的,而其他两个因素是不变的,或者计算三个

(19) “人在 24 小时内所耗费的劳动量,可以从研究人体内部的化学变化来大致确定,因为物质形式的变化能表明动力已经消耗的情况。”(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

变动的因素的产物,这些问题总是很容易解决的。我们在这里只考察两种特别有趣的情况。

劳动生产率降低,而劳动持续时间同时延长:

假定同量劳动由于土地肥力减退生产出较少的日常消费品,这些日常消费品的价值的提高使工人每天的生活费昂贵,结果这种生活费现在不是3法郎而是4法郎。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新的日价值所必需的时间从6小时增加到8小时,或者说占了工作日的 $\frac{2}{3}$,而不是 $\frac{1}{2}$,因此,剩余劳动就从6小时减少到4小时,剩余价值就从3法郎减少到2法郎。

如果工作日在这种情况下延长到14小时,追加的2小时并入剩余劳动,剩余劳动重新达到6小时,剩余价值就增大到它原来的量3法郎,但是它的相对量仍然减少了,因为它同劳动力价值之比原来是3:3,而现在只是3:4。

如果工作日延长到16小时,或剩余劳动延长到8小时,剩余价值就会提高到4法郎,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就会达到4:4,也就是说,同劳动生产率下降以前的比例一样,因为 $4:4=3:3$ 。但是,尽管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由此只是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它的绝对量却增大 $\frac{1}{3}$,从3法郎增加到4法郎。

因此,当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劳动的持续时间的延长同时发生时,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可以不变,但它的相对量却会减少;它的相对量可以不变,但它的绝对量却会增加。如果人们把劳动的持续时间延长到足够的程度,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和相对量还会同时增加。

如果在劳动持续时间延长的同时劳动强度也增大,那就可以更快地达到同样的结果。

在1799年到1815年期间,英国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引起了名

义工资的提高,虽然实际工资降低了。威斯特和李嘉图由此得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引起剩余价值率下降的结论,并且把这个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假定当做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量的关系进行重要分析的出发点。³³⁸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强制延长,剩余价值也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了。⁽²⁰⁾这个时期的特点正是资本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加速增长。⁽²¹⁾

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持续时间同时缩短。

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提高,使一定时间内得到的商品量成

(20) “谷物和劳动很少会完全齐头并进,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它们就不能互相分离。劳动阶级在物价上涨时期作出的异乎寻常的努力,引起工资下降,这种下降在证词(特别是向 1814—1815 年议会调查委员会作的证词)中已经得到证实。这种努力对个人来说是十分光荣的,并确能促使资本增长。但是,一个有人性的人会希望看到这种努力无限地继续下去吗?这种努力在一定的时期内是值得赞扬的救济措施;如果这种努力永远坚持下去,其结果就和一个国家的居民在食物上濒于绝境一样。”(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 年伦敦版第 48[、49]页注)当李嘉图等人面对最惹人注目的事实,把工作日是不变量这个假定当做他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时,马尔萨斯却注意到工作日的延长,并且在自已的小册子的其他地方直接强调这一点。这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但是马尔萨斯为之忠实效劳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随着机器的异常的发展以及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日益严重的剥削,一旦战争结束和英国失去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过剩”。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马尔萨斯真正牧师般地崇拜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21) “战争期间资本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每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的更加努力,也许还在于这个阶级的更加贫困。更多的妇女和儿童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事痛苦的劳动;由于同样的原因,男工不得不拿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去增加生产。”(《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1830 年伦敦版第 248[、249]页)

倍增加,从而缩短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的工作日部分。工作日的这个必要的但能缩减的部分形成工作日的绝对界限,这个界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达到的。一旦资本主义制度被消灭,剩余劳动就会消失,整个工作日就可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不应忘记,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即形成准备基金和积累基金的部分在这种场合将会被看做是必要劳动,而现在的必要劳动量只是以替自己的雇主生产财富的雇佣劳动阶级的生活费用为限。

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劳动持续时间就越能缩短;而劳动持续时间越是缩短,劳动强度就越能增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还可以通过节约劳动,即通过消除生产资料以及生命力的无益耗费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资本主义制度迫使每一个企业节约生产资料;但是这个制度不仅把疯狂地耗费劳动力当做为剥削者节约的手段,而且它还通过无政府的竞争制度使最无节制地浪费生产劳动和社会生产资料成为必然的事情,更不用说它所产生的并使之成为多少是必不可少的许多寄生性职能了。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自然迫使接受的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权力越小,社会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时间就越短,可供个人自由发展的时间就越多。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最后界限就是体力劳动的普遍化。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把群众的全部生活转化为劳动时间,为唯一的阶级挣得了自由时间。

第十八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的：

$$I. \frac{\text{剩余价值 (p)}}{\text{可变资本 (v)}}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劳动力价值}}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前两个比率是价值比率，第三个比率是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

这些互相补充的公式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只是隐约地和无意识地出现的。相反，下列公式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

$$II. \left(\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工作日}} \right)^{(22)}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产品价值}} = \frac{\text{纯产品}}{\text{总产品}}$$

这里，同一个比率依次地在劳动量的公式上，在劳动量借以实现的价值的公式上，在这些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公式上表现出来。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必须理解为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完全不包括生产资料的价值。

在所有这些公式中，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是虚假

(22) 我们把第一个公式放在括号内，因为剩余劳动的概念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表述得不清楚。

地被表现出来的。在前面的例子中，实际的剥削程度表现为如下的比率：

$$\frac{6 \text{ 小时剩余劳动}}{6 \text{ 小时必要劳动}} = \frac{3 \text{ 法郎剩余价值}}{3 \text{ 法郎可变资本}} = \frac{100}{100}$$

但是，根据公式 II，我们却得出：

$$\frac{6 \text{ 小时剩余劳动}}{12 \text{ 小时工作日}} = \frac{3 \text{ 法郎剩余价值}}{6 \text{ 法郎价值产品}} = \frac{50}{100}$$

这些派生的公式实际上表示工作日或其价值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因此，如果把这些公式看做资本的价值增殖的直接表现，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的规律：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绝不能达到 100%。(23) 剩余劳动只是工作日的的一个部分，或剩余价值只是所生产的价值量的一个部分，所以剩余劳动必然始终小于工作日，或剩余价值必然始终小于所生产的价值。如果剩余劳动同工作日之比为 100:100，剩余劳动就会吞掉整个工作日（这里指年平均日），必要劳动就会被消灭。但是，如果必要劳动消失了，剩余劳动同样也就消失了，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函数。因此，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工作日}}$ 或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所生产的价值}}$ 这个比率永远不能达到 $\frac{100}{100}$ 的界限，更不能提高到 $\frac{100+x}{100}$ 。但剩余价值率或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不是这种情况。就拿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的计算做例子。根据他的计算，英国农业工人只得到产品或其价值的 $\frac{1}{4}$ ，而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得到 $\frac{3}{4}$ 。(24)，不管这个赃物以后还

(23) 例如，见《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

(24) 在这种计算中，产品中只补偿预付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是一位盲目崇拜英国的人，他只会把比例估计过低，决不会估计过高。

要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在这个场合,英国工人的剩余劳动和他的必要劳动之比是 3:1,也就是说,剥削率是 300%。

古典学派把工作日看做不变量的方法,在公式 II 的应用中找到了根据,因为人们在这里总是把剩余劳动同一定的工作日进行比较。如果只考察所生产的价值的分配,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一旦工作日已经物化在价值中,它的界限就必然是已定的。

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所生产的价值量的各个部分的习惯,掩盖着可变资本同劳动力相交换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这个事实意味着产品归非生产者所有。在这种场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采取了一种协同关系的假象,仿佛工人和雇主在这种协同关系中是按照他们向产品提供的不同要素的比例来分配产品的⁽²⁵⁾。

但是,公式 II 总是能还原为公式 I。例如,如果我们知道比率 $\frac{6 \text{ 小时剩余劳动}}{12 \text{ 小时工作日}}$,那么必要劳动时间等于 12 小时工作日减掉 6 小时剩余劳动,并得出:

$$\frac{6 \text{ 小时剩余劳动}}{6 \text{ 小时必要劳动}} = \frac{100}{100}$$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是:

$$\text{III.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劳动力价值}}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 \frac{\text{无酬劳动}}{\text{有酬劳动}}$$

(25)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切发达的形式都是协作形式,所以,把这些形式所特有的对抗性质抽去,并像变魔术一样把它们变成自由的协同形式,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例如,亚·德·拉博尔德伯爵在《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同精神》(1818 年巴黎版)中就是这样做的。³³⁹ 美国人亨·凯里甚至在谈到奴隶制度时也同样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壮举。

$\frac{\text{无酬劳动}}{\text{有酬劳动}}$ 这个公式只是公式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的通俗的表述。

在我们前面所作的说明之后,从这一公式中不再会产生出这样一种流行的错误,好像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资本家购买了一日、一周等等的劳动力,因此通过交换取得了在一日、一周等等时间内使用这种劳动力的权利。使用时间分为二个时期。在一个时期内,劳动力的使用只生产出劳动力的价格的等价物;在另一个时期内,劳动力的使用是无偿的,因而给资本家带来一个他没有给予任何等价物、没有为此花费分文的价值。⁽²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从中得到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

因此,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别人的劳动的支配权;³⁴⁰而且在本质上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具有何种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的物化。资本的增殖能力的全部秘密就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支配着别人的一定数量的、它不支付报酬的劳动。

(26) 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至少承认,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出钱买却可以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11页)。

第六篇

工 资

第十九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劳动者的报酬表现为劳动的工资;劳动多少,就支付给多少货币。因此劳动本身被看做是一种其市价在自己的价值上下波动的商品。

但什么是价值呢?这就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的客体形式。我们又用什么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那么,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荒谬的同义反复。⁽¹⁾

(1) “李嘉图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推翻他的关于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如果严格地坚持这个原则,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李嘉图先生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他这里指的是为生产付给劳动者的货币或商品所必

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劳动者如果能使他的劳动具有一种与他自身相分离、相独立的物质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2)

撇开这些矛盾不说,货币即已实现的劳动同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会或者消灭那个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展开的价值规律,或者消灭那种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实现为6法郎的货币价值。如果是等价物相交换,这样,工人以12小时劳动获得6法郎,或者说他的劳动的价格就会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下,他没有为他的劳动的购买者生产任何剩余价值,这6法郎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就会消失。然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工人才出卖他的劳动,而他的劳动才成为雇佣劳动。或者工人在12小时劳动中获得的少于6法郎,就是说,少于12小时劳动。在这种场合就是12小时劳动同10小时劳动、6小时劳动等等相交换。这样使不等的量相等的做法,不只是消灭了一切价值规定。这种自我消灭的矛盾甚至根本不可能当做规律来表述。(3)

需的劳动量。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衣服的价值不是由生产衣服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而是由生产用衣服换来的银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1825年伦敦版第50、51页)

(2) “如果你们把劳动叫做商品,那么它也还是不同于这样的商品,这种商品最初为交换的目的而生产,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应和同时可能出现在市场上的其他商品按照各自的量相交换。劳动只有当它被带到市场上去的那一瞬间才被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劳动是在它被创造出来以前被带到市场上去的。”(《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75、76页)

(3)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么……一定量

从互相交换的各种劳动之间的形式的差别,从买者用过去的劳动或已实现的劳动支付而卖者用现在的劳动或活劳动支付来解释这种以多换少的交换,这是徒劳无益的。⁽⁴⁾假定一个商品代表6个劳动小时。如果一些发明使这个商品用3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么,连已经生产出来、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的价值也就只有它原来的价值的一半。现在,这个商品所代表的只是3小时劳动,尽管已经实现在这个商品中的是6个小时。因此,这种已实现的劳动的形式不会给价值增添什么东西,相反,这种价值的量始终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现在的劳动的量,或社会必要的劳动量。

在市场上同资本家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者。劳动者出卖的是自身,是他的劳动力。一旦他开始把这种力投入运动,开始劳动,一旦他的劳动已经存在,这种劳动就已经不再属于他,从这时起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⁵⁾

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用语,就像说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不合理的用语却根

的劳动就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会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的。”(爱·吉·韦克菲尔德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230、]231页注)

(4) “必须同意《“社会契约”³⁴¹的又一翻版),每当已经完成的劳动同将要完成的劳动相交换时,后者(资本家)获得的价值会多于前者(工人)。”(西尔蒙第《论商业财富》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第37页)

(5) “劳动,即价值的唯一尺度……一切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不是商品。”(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186页)

源于生产关系本身,它们是这些生产关系的现象形态的反映。不过我们知道,除政治经济学外,在一切科学中都必须区分事物的外观和事物的实在⁽⁶⁾。

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先丝毫不加检验就天真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劳动的价格”这一范畴,然后问自己:这一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马上认识到,供求关系对于劳动也像对于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无非是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着一一定的量上下波动。如果供求相抵,供求所引起的价格波动就会停止。而这时,供求也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不再取决于供求的作用,因此必然会像不存在供求时那样被决定。因此,这个价格,市场价格的这个引力中心,就表现为科学分析的真正对象。

如果考察数年的时期,比较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运动由于不断抵

(6) 把这些不合理的用语说成是单纯的诗人的破格权,这只能说明分析的无能。蒲鲁东说:“人们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们认定劳动中所隐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比喻说法。”因此,针对这种说法我指出:“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事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好吧!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34、35页)³⁴²把价值理解成什么也不是,当然方便多了。这样,就可以随便把任何东西都包括到这个范畴中去。例如,让·巴·萨伊就是这样做的。“价值”是什么?答:“物之所值。”“价格”是什么?答:“以货币表现的物的价值。”为什么“土地的劳动”具有“价值”?因为人们赋予它一个价格。这就是说,价值是物之所值,而土地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用货币表现了它的价值。总之,这是理解事物“因何”和“为何”问题的非常简便的方法。

消而达到的平均数,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这样就发现了平均价格,即在市场价格的波动本身中显示出来并成为市场价格的内在调节因素的比较固定的量。因此,这个平均价格,重农主义者的“必要价格”,亚当·斯密的“自然价格”³⁴³,对劳动来说(对一切其他商品也一样)只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劳动的价值。亚当·斯密说:“商品在这种场合被卖掉的正是它的所值”。

古典经济学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已经从劳动的偶然价格进到劳动的实际价值。然后,它用维持和再生产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劳动的实际价值。这样,它就不知不觉地变换了场所,用劳动力的价值代替了迄今为止一直是它研究的明显对象的劳动的价值。劳动力只存在于劳动者的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运转一样。因此,分析的进程不仅不可避免地从劳动的市场价格推导出劳动的必要价格或劳动的价值,而且把所谓的劳动的价值化为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劳动的价值今后只应该被看做是劳动力的价值的现象形态。因此,这种分析得出的结果不是解决了在出发点上提出的问题,而是完全改变了它的用语。

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能发现这种混乱,它只是把全副精力用于研究劳动的市价和劳动的价值之间的区别,研究这种价值同商品的价值、同利润率的关系等等。它越是深入分析价值一般,所谓的劳动的价值就越是使它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

工资是按照劳动的价值或来自这一价值的价格支付给劳动的报酬。因此,工资意味着劳动力的偶然的价值和价格已经发生形态变化,从而使它们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现在我们更仔细地考察这种转化。

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法郎⁽⁷⁾，工作日是12小时⁽⁸⁾。现在如果把劳动力的价值同劳动力的职能的价值、劳动力的劳动混为一谈，那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公式：12小时的劳动有3法郎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低于或高于其价值，也就是4法郎或2法郎，12小时劳动的市价就等于4法郎或2法郎。只是形式改变了。劳动的价值只是反映劳动力——劳动是劳动力的职能——的价值，劳动的市场价格按照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与劳动力价值相偏离的同一比例而与劳动的所谓价值相偏离。

既然劳动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语，那么不言而喻，劳动的价值必定总是小于劳动的产品的价值，因为资本家总是使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超过再生产劳动力的等价物所需要的时间。在我们的例子中，为了生产3法郎价值，即劳动力的日价值，每天需要劳动6小时，但是劳动力执行职能12小时，因此它每天生产出6法郎价值。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荒谬的结果：创造6法郎价值的劳动只值3法郎。⁽⁹⁾但是，这个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上是看不见的。完全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6小时劳动即半个工作日所生产的3法郎价值表现为12小时劳动即整个工作日的价值。因此，工人每天得到3法郎工资，就好像是得到了他的劳动所

(7) 同在第五篇一样，假定一个劳动小时内所生产的价值是半法郎。

(8) 如果用平均日内正常维持工人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来规定劳动力的日价值，那么不言而喻，他的劳动力的支出是正常的，工作日不超过与劳动者一定的平均寿命相一致的界限。

(9)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0页。³⁴⁴我曾在那里指出，对资本的考察将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

应该得到的全部价值，而正因为如此，工人的产品的价值超过工人的工资的余额采取了由资本而不是由劳动创造的 3 法郎剩余价值的形式。

因此，工资的形式，或劳动的直接报酬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结果是自由工人的全部劳动都被看做是有酬的劳动。在农奴制下，服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领主的强制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在奴隶制度下，连奴隶只是用来补偿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工作日部分，即他实际上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现为为主人的劳动。他的全部劳动都具有无酬劳动的外观。⁽¹⁰⁾相反地，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具有有酬劳动的外观。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为他的资本家的无代价劳动。

现在我们可以懂得这种使劳动力的报酬表现为工资、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劳动力的职能的价格的形态变化在实际上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意义了。这种只表现雇佣劳动的假象的形式，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现实关系看不见了，它恰恰表示着与此相反的关系；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神秘性，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从这种形式中产生出来的。

如果说世界历史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揭开了工资的秘密，那么

(10) 伦敦一家天真到愚蠢程度的自由贸易派机关报《晨星报》，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再以人类所能有的义愤对南部同盟的黑人完全无偿地劳动的状况悲叹不已。最好请它把这种黑人的一天的食物同例如伦敦东头的自由工人的一天的食物比较一下。

相反地,要了解这种现象形态的必然性,存在的理由,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买者付出一定数额的货币,卖者付出与货币不同的物品。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劳动契约中所能看到的同其他一切种类的契约的区别,只是这样一种包含在法律上对等的各个公式中的区别:“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³⁴⁵。

因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按其性质是彼此不可通约的量,所以“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格”这种用语,似乎并不比“棉花的价值”,“棉花的价格”这种用语更不合理。况且,劳动者是在提供自己的劳动以后被支付报酬的。而货币在其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上,是在事后才实现所提供的物品的价值或价格的,在我们这个场合就是实现已经完成的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最后,工人提供给资本家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不是他的劳动力,而是这个力的使用,它的职能,即劳动。因此,从一切表面现象来看,资本家所支付的是工人给予资本家的使用价值的价值,劳动的价值,而不是工人在表面上没有让渡的劳动力的价值。仅仅靠实际生活经验并不能清楚地看到劳动的双重有用性,即满足需要的属性和创造价值的属性。前一种属性为劳动与一切商品所共有,后一种属性使劳动区别于一切商品并使劳动成为价值形成要素,从而排除了劳动不具有任何价值的可能性。

让我们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来看,他以 12 小时劳动获得 6 小时内所生产的价值,比如说 3 法郎,对他说来,他的 12 小时劳动实际上是 3 法郎的购买手段。由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变化或者供求关系的波动,他的报酬时而提高到 4 法郎,时而又降低到 2 法郎,——但是他付出的始终不少于 12 个劳动小时。因此,在他看来,他所获得的

等价物的量的任何变化,都必然表现为他的12个劳动小时的价值或价格的变化。把工作日看做不变量的亚·斯密⁽¹¹⁾反过来根据这一事实断言,劳动所固有的价值始终不会发生变化。他说:“不管工人作为自己的劳动的报酬所得到的商品量如何,他支付的价格始终不变。这种价格实际上有时可以买到较大量的商品,有时可以买到较小量的商品:但是,发生变化的是这些商品的价值,而不是购买它们的劳动的价值……等量的劳动始终具有相等的价值”。⁽¹²⁾

现在我们拿资本家来说,他希望得到什么?他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因此,他实际上所关心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执行职能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但是,他同时力图尽可能便宜地购买一切其他商品,并且总是把低于价值购买和高于价值出售这一纯粹欺诈行为说成是他的利润的来源。因而,他理解不到,如果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而且他确实支付了这一价值,那么资本就不会存在,他的货币也就会失去产仔的神秘性质。

此外,工资的实际运动显示出一些现象,似乎证明被支付的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它的职能即劳动本身的价值。这些现象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工资随着劳动持续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结论说,因为租用机器一周的费用比租用一天要贵,所以被支付的不是机器的价值,而是机器运转的价值。第二,执行同一职能的劳动者的工资间存在着个人的差别。这种个人的差别在奴隶制度下也可以看到,但是在那里劳动力本身是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饰地出卖的,这种差别没有引起任何幻觉。确实,在

(11) 亚·斯密只是在谈到计件工资时,才偶然地隐约提到工作日的变化。

(12) 亚·斯密《国富论》,热尔曼·加尔涅的新译本,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65、66页。

奴隶制度下对奴隶主来说，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对劳动者来说，劳动力超过平均水平是一种利益，而低于平均水平是一种损失，因为在后一种场合，劳动者是自己出卖劳动力，而在前一种场合，是由第三者出卖。

此外，“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种形式与这种形式所包含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切现象形态与它们的实体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是自发地直接地在知性中反映出来，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从来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蜕掉它的资产阶级的旧皮，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十章

计时工资

工资又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对于这些形式,那些只注重粗糙的事实的经济学论著的作者没有作出任何说明。显然,在本书中不可能论述所有这些形式,这是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论著的任务³⁴⁶,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这里要详细地说明一下两种基本形式。

我们记得,劳动力总是按一定时期来出卖的。因此,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或年价值呈现出来的表面的形式,首先是计时工资的形式,也就是日工资、周工资等等。

工人靠日劳动、周劳动等等得到的货币额⁽¹³⁾,形成他的名义的即按价值计算的工资额。但是很明显,依照他的工作日的长短,即依照工人每天所提供的劳动量,同样的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可以代表极不相同的劳动价格,也就是说,可以代表对同量劳动所支付的极不相同的货币额。⁽¹⁴⁾因而,在谈到计时工资时必须再把日工资、周工资

(13) 这里总是假定货币的价值是不变的。

(14) “劳动价格是对一定量劳动所支付的货币额。”(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67页)这个威斯特是《论资本用于土地》(牛津大学大学学院一研究员著,1815年伦敦版)这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匿名著作的作者。

等等的总额和劳动价格区别开来。但怎样得出这个价格，即一定量劳动的货币价值呢？劳动力的平均日价值除以平均工作日的小时数，就得出平均的劳动价格。

如果劳动力的日价值例如是 3 法郎，即 6 小时所生产的价值，而工作日为 12 小时，那么 1 小时的价格 = $\frac{3 \text{ 法郎}}{12} = 25 \text{ 生丁}$ 。这样得出的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劳动价格的计量单位。

由此可见，即使劳动价格不断下降，日工资、周工资等等仍然可以保持不变。如果工作日是 10 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3 法郎，那么 1 个劳动小时得到的报酬就是 30 生丁。一旦工作日延长到 12 小时，1 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 25 生丁，一旦工作日延长到 15 小时，1 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 20 生丁。虽然如此，日工资或周工资仍旧不变。反之，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甚至下降，日工资或周工资也可以增加。

如果工作日是 10 小时，而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3 法郎，那么 1 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 30 生丁。如果由于工作量增加，工人按照原来的劳动价格劳动 12 小时，那么他的日工资就增加到 3 法郎 60 生丁，而劳动价格没有变化。如果不是增加劳动的外延量而是增加劳动的内涵量，那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¹⁵⁾

因此，在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提高的同时，劳动价格可以不变或下降。这也适用于工人家庭的收入，只要家长提供的劳动量是靠其他家庭成员的劳动而增加的。我们看到，直接减少日工资或周

(15) “工资决定于劳动价格和完成的劳动量…… 工资的增加不一定包含着劳动价格的提高。在工作量较大的情况下，工资可以大大增加，而劳动价格却可以保持不变。”(爱德华·威斯特爵士，同上，第 67、68 和 112 页)不过关于“劳动价格”是怎样决定的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威斯特却用陈词滥调搪塞过去了。

工资并不是降低劳动价格的唯一方法。⁽¹⁶⁾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规律:日劳动或周劳动的量已定,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本身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化,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市场价格而变化。

反之,如果劳动价格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日劳动或周劳动的量。

计时工资的计量单位,即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劳动力的日价值除以普通工作日的小时数所得之商。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2小时,而生产劳动力的日价值3法郎需要6小时,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25生丁,但它却生产出50生丁的价值。如果现在工人就业不足12小时(或每周不足6天),例如8小时或6小时,那么按这个劳动价格计算,他就只能得到2法郎或 $1\frac{1}{2}$ 法郎的日工资。因为工人仅仅为了生产出一个只是和他的劳动力价值或者说和他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相适应的工资,一天必须平均劳动6小时,又因为他在每小时内只有半小时是为自己劳动,而半小时是为资本家劳动,所以很清楚,如果他就业不足12小时,他就不能挣得正常工资,即他用6小时生产出的价值。

(16) 18世纪工业资产阶级的最狂热的代表人物、我们多次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完全注意到了这一点,虽然他把问题阐述得很混乱,他说:“由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是劳动的量,而不是劳动的价格(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如果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那你们自然就会相应地减少劳动的量……工厂主们知道,在不改变劳动价格的名义数额的情况下,有各种提高或降低劳动价格的方法”(同上,第48和61页)。纳·威·西尼耳在他的《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中不加引号地利用了威斯特的著作:“劳动者主要关心的是工资的数量”(第15页)。这就是说,劳动者主要关心的是他所得到的东西,即工资的名义数额,而不是他所给予的东西,即劳动的量!

我们已经看到过度劳动的有害后果,同样,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工人由于就业不足所遭受的苦难的根源。(17)

如果小时工资是用下述办法来确定的,即资本家只承担支付一天中他让工人就业多少小时就支付多少小时工资的义务,那么,资本家就能使工人就业的时间少于原先作为计算小时工资或劳动价格的计量单位的基础的那个时间。因为这种计量单位是由 劳动力的日价值 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 这个比率确定的,所以,一旦工作日不再包含一定的小时数,这种计量单位自然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之间就没有联系了。现在资本家不让工人做满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也能从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他可以破坏就业的任何规则性,任意地按照自己的方便和眼前利益,使最长的过度劳动同部分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他可以在支付“正常的劳动价格”的借口下,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不给工人任何补偿。这就是 1860 年伦敦建筑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强制实行这种小时工资的企图而发动完全合理的暴动的原因。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可耻的做法,不过,这种限制当然没有消灭由于机器的竞争,由于用不熟练劳动代替熟练劳动,用儿童妇女代替成年男子等等,最后由于局部的和普遍的危机而产生的失业。

(17) 这种异常的就业不足的影响是和普遍缩短工作日的影响完全不同的。前者与工作日的绝对长度无关,它可以在 15 小时工作日上发生,同样也可以在 6 小时工作日上发生。正常的劳动价格,在第一种场合是按照工人平均每天劳动 15 小时来计算的,在第二种场合,是按照他平均每天劳动 6 小时来计算的。因此,如果他的第一种场合只劳动 $7\frac{1}{2}$ 小时,在第二种场合只劳动 3 小时,那么结果就会相同。

虽然日工资或周工资增加了,但劳动价格可以在名义上保持不变,甚至降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只要工作日超出它的普通长度,同时劳动小时的价格不变,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 $\frac{\text{劳动力的日价值}}{\text{工作日}}$ 这一分数中,如果分母增大,分子就会更快地增大。由于劳动力的损耗,劳动力的价值会同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持续时间一起增加,而且前者增加的比例比后者更快。

在计时工资占统治地位而工作日又不受法律限制的许多产业部门中,就逐渐地形成了一种习惯,把只持续一定小时数例如 10 小时的工作日部分当做是正常的(“normal working day”[“正常的工作日”],“the day's work”[“日劳动”],“the regular hours of work”[“正规的劳动时间”])。超过这个界限就开始了额外劳动时间,这种额外时间以小时为计量单位得到额外报酬,虽然额外报酬往往低得可怜。(18) 正常工作日在这里是作为实际工作日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且就全年来说,实际工作日往往比正常工作日要长。(19) 在英国各种产业部门中,随着工作日的延长超出一定的界限,劳动价格的的增长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所谓正常时间内的劳动价格很低,这就迫使那些想挣得足够工资的工人在额外时间去做报酬较高的

(18) “额外时间的额外报酬(在花边制造业中)非常低,每小时 $\frac{1}{2}$ 便士等等,以致同它对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力所造成的巨大损害形成了尖锐的对照……不仅如此,这样挣得的一点点额外报酬往往又不得不耗费在额外的饮食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2 号报告》第 XVI 页第 117 号)

(19) 例如,在染料工场中,在工厂法最近实行以前,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劳动,连吃饭的间歇时间也没有,结果 10 个半小时的日工到下午 4 点半就完了,此后就全是额外时间,这种时间很少在下午 6 点以前结束,因此,实际上我们终年都在做额外时间的工作。”(斯密斯先生的证词,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1 号报告》第 125 页)

工作。(20) 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伎俩。(21)

在一个产业部门内,工作日越长,工资就越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22) 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通过 1839 年到 1859 年间的不同产业的比较观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这种比较观察中可以看到,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厂中,工资提高了,而在每天工作 14—15 小时的工厂中,工资下降了。(23)

(20) 例如,在苏格兰的漂白业中就是这样。“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这种行业(在 1862 年工厂法实行以前)是按额外时间的制度经营的,即把 10 小时当做正常的工作日,每小时的报酬是[1 先令]2 便士。每天还有 3 或 4 小时额外时间,每小时的报酬是 3 便士。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只在正常时间内劳动的人,只能挣得 8 先令的周工资,而这样的工资是不够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4 月 30 日》第 10 页)这种“额外时间的额外报酬,是工人无力抗拒的一种诱惑”(《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 年 4 月 30 日》第 5 页)。伦敦西蒂的书籍装订业雇用了许多 14、15 岁的少女,而且还订有学徒合同,规定了一定的劳动小时。尽管如此,在每月的最后一周,她们还是要同较年长的男工混杂在一起,一直劳动到夜间 10、11、12 点,甚至到凌晨 1 点。“业主以额外工资和一顿丰富的夜餐钱来引诱她们”,这顿夜餐,她们是在附近的酒馆中吃的。在这些“年轻的永生者”中间因此产生了十分放荡的行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5 号报告》第 44 页第 191 号),不过这些行为,由于她们除了其他书籍外还装订了大量的圣经和宗教书籍而或许得到了补偿。

(21)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4 月 30 日》第 5 页。在 1860 年大罢工和同盟歇业中,伦敦建筑工人对事态作了完全正确的判断,他们声明,只有在下述两个条件下才愿意接受小时工资:1. 在规定劳动小时价格的同时,也要规定以 9 小时或 10 小时为正常工作日,而且十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要高于九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2. 超过正常工作日的每一小时都要相应地付给较高的报酬。

(22) “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通常劳动时间长的地方,工资就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10 月 31 日》第 9 页)“只能挣得一点点口粮的劳动几乎都是过长的。”(《公共卫生。第 6 号报告。1863 年》第 15 页)

(2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 年 4 月 30 日》第 31、32 页。

我们从前面的叙述中已经知道,在劳动价格已定时,日工资或周工资决定于所提供的劳动量。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价格越低,工人为了保证得到哪怕是不充分的平均工资而付出的劳动量必然越大,或者说,工作日必然越长。如果劳动价格是 12 生丁,也就是说,一小时得到这么多报酬,那么工人为了得到 1 法郎 60 生丁的日工资就必须一天劳动 $13\frac{1}{3}$ 小时。如果劳动价格是 25 生丁,一个 12 小时的工作日就足以使他得到 3 法郎的日工资。因此,劳动价格的低廉起了刺激劳动时间延长的作用。⁽²⁴⁾

但是,如果工作日的延长是劳动价格低廉的自然结果,那么,工作日的延长反过来又会引起劳动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日工资或周工资的下降。

劳动价格由 $\frac{\text{劳动力的日价值}}{\text{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 来决定这个事实表明:即使名义上的劳动价格率没有下降,单是工作日的延长就会在实际上降低劳动价格。但是那些使资本家能够延长工作日的情况,最初使他能够,后来则迫使他也在名义上降低劳动价格,以致劳动时数增加了,但总价格下降了,因而日工资或周工资下降了。如果由于工作日的延长,一个人完成两个人的工作,那么即使劳动力的供给,也就是市场上的工人人数不变,劳动的供给还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

(24) 例如,英国手工制针业工人,由于他们的劳动价格低廉,不得不每天劳动 15 小时才能在周末挣得极可怜的工资。“他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地要干许许多多小时,才能挣得 11 便士或 1 先令,而且从中还要扣除 $2\frac{1}{2}$ 到 3 便士,以补偿工具的磨损、燃料的耗费和铁屑的耗损。”(《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3 号报告》第 136 页第 671 号)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女工只能挣得 5 先令的周工资(同上,第 137 页第 674 号)。

使他能够把工作日的界限往后推延。⁽²⁵⁾因此,资本家可以从通常的劳动价格的扣除和劳动持续时间的过度延长中得到双重的好处。但是,在剩余价值由此高于平均水平的特殊产业部门中,支配异常的无酬劳动量的这种权力,很快就会成为资本家本身之间的竞争手段。商品的价格包含劳动的价格。因此,劳动价格的无酬部分可以不被资本家计算在他的商品的出售价格内;他可以把这一部分赠送给买者。这是竞争促使他走的第一步。竞争迫使他完成的第二步是,至少把额外劳动产生的异常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商品的出售价格中。在发生这种运动的产业部门中,产品的异常低廉的出售价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逐渐形成并在最后固定下来,并且从这时起成为极低的工资的不变基础,而这种工资的量同劳动量成反比。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到这一点就够了,因为分析竞争不是这里要做的事情。³⁴⁷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听一下资本家本人的自白。

“在伯明翰,业主之间的竞争是这样激烈,以致我们中间的某些人,不得不以雇主的身份做他们平素感到可耻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多赚钱,而只是让公众从中得到全部好处。”⁽²⁶⁾

我们记得伦敦有两种面包房老板,一种是按全价出售面包,另一种是低于正常价格出售面包。“全价出售者”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指责他们的竞争者说:

(25) 例如,一个工厂工人如果拒绝像通常那样干较多的时数,“他很快就会被任何一个不论干多长时间都愿意的工人所代替,这样他就会失业”(《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证词第39页第58号)。“如果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利润率通常会提高……因为这种追加的劳动供给,压低了劳动的价格。”(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15页)

(26)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证词第66页第22号。

“他们能够存在,首先就是靠欺骗公众(通过面包掺假),其次是靠从穷鬼身上榨取 18 小时的劳动而支付 12 小时的工资……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使他们有可能进行竞争斗争的手段……面包业主之间的这种竞争是夜间劳动难以废除的原因。低价出售者低于实际价格(它随着面粉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出售面包,但他得到了补偿,因为他从他的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劳动。如果我从工人那里只取得 12 小时劳动,而我的邻居却从他的工人那里取得 18 或 20 小时劳动,那么,我就会在商品价格上被他击败。如果工人能要求支付额外时间的报酬,这种手法立刻就会完蛋……低价出售者雇用的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少年和其他被迫满足于任何一种他们所能得到的工资的人。”(27)

这种诉苦之所以特别有意思,就在于它表明:反映在资本家头脑中的只是生产关系的假象。资本家不知道,所谓劳动的正常价格也包含着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并且正是这种无酬劳动是他的正常利润的源泉。剩余劳动时间对他说来是不存在的,因为剩余劳动时间包含在正常的工作日之内,而这个正常工作日在他看来已经在日工资中支付了。但是,他承认额外时间的存在,并按照工作日超过与普通的劳动价格相适应的界限的延长部分来计算这种额外时间。为了对付他的低价出售的竞争者,他甚至主张对这种额外时间支付额外报酬。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这种额外价格,和普通的劳动小时的价格一样,也包含着无酬劳动。例如,十二小时普通工作日的一个小时的报酬是 25 生丁,即 $\frac{1}{2}$ 个劳动小时所生产的价值,而普通工作日以外的每一小时的报酬提高到 $33\frac{1}{3}$ 生丁。在第一种场合,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 $\frac{1}{2}$ 个劳动小时,在第二种场合,无偿地占有了 $\frac{1}{3}$ 个劳动小时。

(27)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62 年伦敦版第 111 页和同一报告,证词第 479、359、27 号。不过,全价出售面包者,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而且像他们的代言人贝内特本人所承认的,也让他们的工人“在晚上 11 点钟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干活,并且往往干到第二天晚上 7 点钟”(同上,第 22 页)。

第二十一章

计件工资

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

乍一看来，计件工资似乎表明，支付给工人的不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已经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的价值，而这种劳动的价格不是像计时工资那样，由 $\frac{\text{劳动力的日价值}}{\text{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 这个分数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者的工作能力来决定的。⁽²⁸⁾

那些受到这种假象欺骗的人，仅仅由于同一些工业部门中同时并存着两种工资形式这一简单事实，就已经应该感到他们的信念被剧烈地动摇了。

“例如，伦敦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件工资，日工资在他们那里是例外。相

(28) “计件劳动制度标志着劳动者史上的一个时代；它是介于受资本家意志支配的普通短工的地位和不久的将来有希望一身兼任于工业者和资本家的合作工人之间的阶段。计件劳动者虽然靠他们的雇主的资本并按照这些雇主的命令从事劳动，实际上是自己的主人。”(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2、53页)我引用这本小册子，是因为它是一切早已陈腐的辩护滥调的真正臭水坑。就是这位瓦茨先生，以前曾热衷于欧文主义，并在1842年发表过另外一本小册子《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在那里，他说财产就是掠夺。从那时起，时过境迁了。

反地,外省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是例外。伦敦港口的造船工人拿计件工资,英国其他港口的造船工人则拿日工资、周工资等等。”(29)

在伦敦,同一些马具工场中,往往对法国人支付计件工资,对英国人支付计时工资。在普遍实行计件工资的真正工厂中,某些劳动职能由于无法按件计算,因而按所使用的时间来支付。(30) 不过很清楚,工资支付的不同形式丝毫没有改变工资的本质,虽然其中一种形式可以比另一种形式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假定普通工作日为 12 小时,其中 6 小时是有酬的,6 小时是无酬的,并假定所生产的价值是 6 法郎。因此,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是 50 生丁。假定经验表明,一个具有平均劳动强度和技能,因而在生产一种物品时只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人,在 12 小时内提供 24 件产品,不管它们是一个个可分离的产品,还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制品的可以分别计量的部分。这样,这 24 件产品的价值,扣除其中包含的生产资料,为 6 法郎,每件产品的价值为 25 生丁。工人每件得 $12\frac{1}{2}$ 生丁,所以 12 小时得 3 法郎。在实行日工资的情况下,不

(29) 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 年伦敦版第 22 页。

(30) 这两种工资形式的同时并存有利于工厂主进行欺诈:“一个工厂雇了 400 个人,其中一半是拿计件工资的,劳动时间长一些对他们有直接利益,另外 200 人是按日支付报酬的,他们劳动的时间与计件工人一样长,但是他们的额外劳动时间得不到任何报酬。这 200 个人每天在半小时内干的活,就等于 1 个人在 50 小时内或一个人在一周劳动的 $\frac{5}{6}$ 的时间内所干的活,这对于企业主有实际的好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 年 10 月 31 日》第 9 页)“额外劳动仍旧非常盛行。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法律本身为工厂主提供了保障,使工厂主不会遭到被揭发出来并受到惩处的危险。在以前许多报告中,我曾指出过……所有那些不是领取计件工资而是领取周工资的工人所受到的损失。”(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 年 4 月 30 日》第 8、9 页)

管是假定工人6小时为自己劳动,6小时为资本家劳动,还是假定他每小时一半为自己劳动,另一半为他的雇主劳动,都是没有区别的;同样在这里,不管是说每一件产品一半是有酬的,一半是无酬的,还是说12件产品的价格只是劳动力的等价物,而剩余价值体现在另外12件产品中,也是没有区别的。

计件工资的形式同计时工资的形式一样是不合理的。例如,两件商品,扣除已耗费掉的生产资料,作为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值50生丁,而工人由此得到25生丁的价格。计件工资实际上不表现直接的价值关系。因为,在这里计件工资不是用体现在某件产品的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该件产品的价值,相反是用工人生产的产品的件数来计量工人耗费的劳动。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劳动由劳动的直接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则由在一定时间内劳动所凝结成的产品量来计量。⁽³¹⁾劳动时间的价格始终决定于这个等式:日劳动价值=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

现在我们比较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计件工资的特点。

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每件产品才能按照约定的价格得到支付。从这方面说,计件工资是克扣工人工资和夺取属于工人的东西的借口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计件工资同时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计算劳动强度的准确尺度。只有体现在一个预先规定的并由经验确定的商品量中的劳动时间,

(31) “工资有两种计算方法,或者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或者是按劳动产品来计算。”(《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1796年巴黎版第32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热·加尔涅。

才被看做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当作这种劳动时间来支付报酬。因此，在伦敦较大的裁缝工场中，把某件产品，例如一件背心等等，叫作一小时或半小时等等，每小时付给 6 便士。从实践中就可以知道，一小时的平均产品是多少。在做时装等等时，雇主和工人之间常常会为某件产品是否等于一小时等等发生争执，最后还是要由经验来解决。在细木工场和高级木器工场等等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工人没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日劳动，他就会被解雇。(32)

既然劳动的质量和强度在这里是由工资形式本身来保证的，那么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就成为多余的了。计件工资的形式不仅是现代家庭劳动的基础，而且也是层层剥削和压迫的制度的基础。后一种制度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容易介入寄生者，使包工制(subletting of labour)更容易实行。中间人即包工者的利润完全来自资本家支付的劳动价格和中间人付给工人的那部分劳动价格之间的差额。(33) 在英国，这种制度在俗话中被称为“sweating-system”(血汗制度)。(34) 另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

(32) “纺纱工人得到一定重量的准备好的棉花。经过一定时间，他必须交出一定量的线或纱，并且根据这样提供的每一磅产品，得到一定的报酬。如果产品的质量不好，他就要受罚；如果产品数量少于一定时期规定的最低限度，他就会被解雇，就会被更熟练的工人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61页)

(33) “如果一件劳动产品要经过许多人的手，他们都要从中分取利润，而只有最后一双手才从事劳动，那么女工最后得到的报酬就微乎其微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LXX页第424号)

(34) 实际上，如果货币贷出者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是用他的钱生钱，那么包工者是直接用劳动生钱。

本家能与工头(在手工工场是组长,在矿井是真正的采煤工人等等)签订按件计酬的合同,——这个工头按照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和支付给他们工资。在这里,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是通过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剥削来实现的。(35)

一旦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个人利益就会使工人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使资本家更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36)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是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的手段。(37)由此就产生了与我们在研究计时工

(35) 甚至辩护士瓦茨谈到这种情况时也说:“如果在一项工作中所有被雇用的人都成为合同的参加者,每个人都量力而为,而不是从属于他们中间那个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让其他人去从事过度劳动的人,那么这会是计件工资制的一个重大改进。”(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3页)关于这个制度的害处,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66页第22号;第11页第124号,第XI页第13、53、59号等等。

(36) 虽然这种结果会自己产生出来,但人们往往采用各种手段人为地造成这种结果。例如,伦敦的机器制造业中惯用的诡计是:“资本家挑选一名特别强壮和灵巧的人做一定数量工人的头头。每到一个季度或其他期限就付给他以追加工资,条件是他拼命地干,以促使他的那些只领取普通工资的同伴也跟着拼命地干……这不用解释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资本家要抱怨说:‘工联限制劳动、卓越技能和劳动力的发挥’。”(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23页)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工人和工联书记,人们也许会认为他的话过于夸张。但是请看一看,比如说,约·查·摩尔顿的“受人推崇的”农业百科全书吧,在那里,这个方法是做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向租地农场主们推荐的。

(37) “所有拿计件工资的人……由于劳动超过法定界限而获得利益。这种从事额外时间的劳动的愿望,在织布女工和绞纱女工中间尤为常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页)“这种计件工资制对资本家非常有利……它直接促使少年陶工在四五年内从事过长的额外劳动,而得到的却是按低价支付的计件工资。这是引起陶工身体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第XIII页)

资时已经谈到过的反作用相类似的反作用,更不用说,即使在计件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本身就包含着劳动价格的下降。

除少数例外,计时工资的前提是对从事同一工作的工人支付同额的报酬;计件工资由于劳动时间的价格是由一定量的产品来计量的,所以很自然会随着一定时间内提供的产品超过规定的最低限额的程度而变化。因此在这里,由于劳动者个人的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的程度不同,他们的收入也会有很大的差别。⁽³⁸⁾当然,这绝不会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工资之间的一般关系。第一,就整个工场来说,这些个人的差别会互相抵消,所以,在一定劳动时间内几乎总是会得到一个平均产品,而总工资最终也超不过工场所在的产业部门的平均工资。第二,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仍旧不变,因为各个工人各自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是同他们各自的工资相适应的。但是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在发展工人个性的同时发展了劳动者的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精神;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个别工资在提高到高于一般水平的同时会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但是,在古老的习惯已经确立某种计件工资、因而特别难以降低的地方,雇主就会把计件工资强行转化为日工资。针对第一点,例如,1860年考文垂织带工人举行了大罢工。⁽³⁹⁾

(38) “在劳动按件付酬的地方……工资在数量上就会有实际的差别……但就日工资来说,通常都有一个统一的数额……雇主和工人都把这个数额看做是该类工作的工资标准。”(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17页)

(39) “手工业帮工的劳动,是按日或按件规定的……从事每种手艺的手工业帮工一天能完成多少工作,手工业师傅大体是心中有数,他们往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付给这些帮工报酬;这样,即使没有监督,这些帮工为了切身利

最后,计件工资是前面叙述的计时制的一个主要支柱,这种制度就是雇主只支付小时劳动而不必在一日或一周内固定地雇用工人。⁽⁴⁰⁾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虽然计件工资绝不是什么新东西,在14世纪,它就已经与计时工资一起正式列入法国和英国的法律中,但是只是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才得到比较广泛的发展。在机器制造工业的初期,特别是从1797年至1815年,计件工资成了延长劳动持续时间和降低工资的强有力的杠杆。蓝皮书¹⁰《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证词》(1813年至1814年议会会期)和《上院委员会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报告》(1814年至1815年会期)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自从反雅各宾战争³⁴⁹开始以来劳动价格不断下降了。

益也会尽力劳动。”(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85页和第202页。第1版于1755年出版)魁奈、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和亚·斯密曾充分利用过的康替龙,在这里已经把计件工资看做只是计时工资的改变后的形式。在康替龙著作的法文版的扉页上注明系译自英文,但是该书的英文版《关于工商业、货币、金银、银行和外汇的分析》(菲利浦·康替龙著,选自一位已故的伦敦西蒂商人的手稿)不仅出版日期较晚(1759年),而且按其内容来说,也表明是后来的修订版。例如,在法文版中还没有提到休谟,而在英文版中,配第的名字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英文版在理论上的价值比较小,但是其中关于英国贸易、贵金属贸易等等的各种专门材料,却是法文版所没有的。因此,英文版扉页上注明的本书“主要选自一位已故的人的手稿,加以改编”等字样,看来并不完全是当时所流行的虚构手法。³⁴⁸

(40) “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有些工场雇用的工人远远超过要做的工作的需要吗?雇主雇用工人往往是为了期待某种无法预料的、有时甚至完全是想象的工作。既然雇主支付计件工资,所以他认为他并不冒任何风险,因为一切时间上的损失完全由没有活干的人承担。”(昂·格雷古瓦《布鲁塞尔轻罪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鲁塞尔版第9页)

例如,织布工人的计件工资下降得很厉害,尽管工作日已经大大延长,但1814年的日工资或周工资低于18世纪末的水平。

“织布工人的实际收入比从前大为减少:同普通工人相比,他的优越性以前是很大的,而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事实上,普通工人的工资和熟练工人的工资间的差别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小得多。”⁽⁴¹⁾

计件工资增加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持续时间,但对农业无产阶级毫无好处,这从维护英国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利益的辩护论中摘录出来的下面这段话可以得到证明:

“绝大部分农活是由按日或按件雇用的人来完成的。他们的周工资约为12先令;虽然可以假定,一个人在采用计件工资的情况下,由于劳动有较大的刺激,比在采用周工资的情况下能够多挣1先令或许2先令,但是总起来计算就会发现,他在一年中由于失业而造成的损失抵消了这一增加部分……此外,一般说来我们还会发现,这些人的工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保持着一定的比例,所以有两个孩子的人,可以不靠教区的救济而维持一家的生活。”⁽⁴²⁾

如果这个人有三个孩子,他就不得不接受社会慈善事业的救济粮。当时,议会公布的全部事实引起了马尔萨斯的注意,他大声说:

“我承认,我看到计件工资的广泛采用,感到不愉快。在较长的时期内每天从事12或14小时实在繁重的劳动,对一个人来说是太多了。”⁽⁴³⁾

在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内,一般采用的是计件工资,因为在这里,资本只能从强度方面扩大每天的劳动。⁽⁴⁴⁾

(41) 《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1815年伦敦版第48页。

(42) 《论谷物法》1815年伦敦版第34页。

(43) 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年伦敦版[第49页注]。

(44) “拿计件工资的劳动者,约占工厂工人总数的 $\frac{4}{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页)

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同量产品就代表较少的劳动量。这时,只表示一定量劳动的价格的计件工资也必然会发生变化。

我们回到前面所举的例子并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在这种场合,12小时工作日生产48件产品,而不是24件产品,每件产品只代表 $\frac{1}{4}$ 个劳动小时而不是 $\frac{1}{2}$ 个劳动小时,因此计件工资就会由 $12\frac{1}{2}$ 生丁降低到 $6\frac{1}{4}$ [生丁],但是每天的工资总额不会变,因为 $24 \times 12\frac{1}{2}$ 生丁 $=48 \times 6\frac{1}{4}$ 生丁 $=3$ 法郎。换句话说,计件工资的下降是与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件数的增加成比例的⁽⁴⁵⁾,从而,是与耗费在同一件产品上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成比例的。工资的这种变动虽然纯粹是名义上的,但也会引起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经常不断的斗争;或者是因为资本家以此为借口来实际降低劳动的价格,或者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引起劳动强度的提高;或者是因为工人当真看待计件工资的假象,认为被支付的是他的产品,而不是他的劳动力,因此反对在商品的出售价格没有相应地降低的情况下降低工资。

(45) “他(纺纱工)的纺纱机的生产力是准确计算好了的,劳动的报酬,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了……虽然这种减少同生产力的提高不是按同一比例。”(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61页)可是尤尔自己又把后面那种不是按同一比例减少的情况否定了。例如他在谈到在走锭纺纱机加长的时候说:“由于这种加长,劳动会有某些增加。”(同上,第2卷第134页)可见,劳动不是按照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同一比例减少。他又说:“这种加长使生产力提高了 $\frac{1}{5}$ 。在这种场合,纺纱工的价格就会降低,但由于不是减少 $\frac{1}{5}$,于是这种改良也就会在一定数量劳动小时中提高纺纱工的收入。但是必须改变……纺纱工由于必须增加他的未成年的助手人数,他要从6便士中拿出追加费用,同时,还有一部分成年工人被挤掉了”(同上,第66、67页),这一事实绝没有提高工资的趋势。

“工人仔细地注视着原料的价格和制品的价格,这样就能够准确地估计他们的雇主的利润。”⁽⁴⁶⁾

资本有权拒绝这种要求,认为这是对工资性质的粗暴歪曲。⁽⁴⁷⁾它大骂这种要求是企图对产业进步课税的侵占行为,并且断然宣称劳动生产率与工人毫不相干。⁽⁴⁸⁾

(46)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伦敦版第178[、179]页。

(47) 在1861年10月26日伦敦的《旗帜报》上,载有一篇关于约翰·布莱特公司诉讼案的报告。该公司向罗奇代尔治安法官控告地毯业工联代表,说他们进行恐吓。“布莱特公司的股东采用了一种新机器,用以前生产160米地毯所需的时间和劳动(!),现在可以生产240米。工人无权要求参与他们的雇主因投资于改良机器而获得的利润的分配。因此,布莱特公司提议把每米的工资从 $1\frac{1}{2}$ 便士降低到1便士,这样,工人以同量劳动所得的收入仍和以前完全一样。这只是名义上的降低。关于这件事,据说工人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48) “工联的不变目的是要保持工资,他们企图分享改良机器而获得的利润!(多么可怕啊!)……他们因为劳动缩短而要求较高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对产业改良课税。”(《论工会》1834年伦敦新版第42页)

第二十二章

国民工资率的差异

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工资率时,首先必须考虑到每个国家决定劳动力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⁴⁹⁾的各种情况,如通常的需要范围、生活资料的价格、工人家庭的平均人数、劳动者的教育费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最后还要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强度。

同一些产业部门内的每日劳动的持续时间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但是只要把日工资除以工作日小时数,我们就可以得出每个国家内对一定量劳动即一小时支付的价格。假定劳动的价格和持续时间这两个因素已定,我们就可以比较各个国家的计时工资率。

其次,应该把计时工资换算成计件工资,因为只有计件工资才能表明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不同程度。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通常的 average 强度,在没有达到这种平均强度的情况下,劳动在生产一个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做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但是,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

(49) 即同剩余价值相比较的劳动力的价值。

不同了。国民劳动的平均强度或通常的强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劳动的普遍的通常强度是这个阶梯的计量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价值规律在国际范围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做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平均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⁵⁰⁾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同国际价值的量一起发生量的变化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平均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但这绝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劳动者支配的生活资料数额也是这样。

但是即使撇开不同国家货币的相对价值的这种差异,也常常可以发现,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在 A 国比在 B 国高,而劳动的相对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在 B 国却比在 A 国高。

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詹姆斯·安德森说过:“应当指

(50) 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一规律发生变化。

出,虽然在农产品特别是谷物便宜的贫国中,劳动价格表面上通常较低,其实在那里,劳动价格实际上比其他国家高。给予劳动者的工资,虽然是劳动的表面价格,但是并不构成劳动的实际价格。实际价格是已完成的一定量劳动使资本家花去的费用。从这个观点看来,劳动在富国几乎总是比在贫国便宜,虽然谷物和其他食品的价格在贫国通常比在富国低得多……按日计酬的劳动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贱得多,而按件计酬的劳动一般在英格兰较贱。”⁽⁵¹⁾

工厂调查委员会(1833年)成员J.W.考威尔,曾对纺纱业作了仔细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

“英国的工资虽然对于工人说来可能比欧洲大陆高,但是对于资本家说来,实际上比欧洲大陆低。”⁽⁵²⁾

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根据比较统计材料指出,大陆的劳动,尽管工资较低,工作日长,但是同所生产的价值相比较,还是比英国的劳动贵。他引用奥登堡一家棉纺织厂的一位英国经理给他提供的资料说,那里的劳动时间每天是十四小时半(从早晨5点30分到晚上8点),但是,工人在英国监工的监视下在这个时间内提供的产品,也比英国工人在10小时内提供的产品少,要是在德国监工的监视下,那还要少得多。他们的工资比英国的工资低得多,往往低50%,但是机器所使用的工人数却比较多,在一些工厂部门的比

(51) 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第350、351页。——相反,负责调查铁路情况的皇家委员会却说:“劳动在爱尔兰比在英格兰贵,因为那里的工资低得多。”(《皇家铁道委员会报告》1867年版第2074号)

(52) 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58页。

例为 5:3。(53)

下面是雷德格雷夫先生提供的关于英国棉纺织厂和大陆棉纺织厂内劳动强度的比较表：

每个工厂的平均纱锭数

英格兰	12 600
瑞 士	8 000
奥地利	7 000
萨克森	4 500
比利时	4 000
法 国	1 500
普鲁士	1 500

每个工人的平均纱锭数

英格兰	74
瑞 士	55
德意志各小邦	55
萨克森	50
比利时	50
奥地利	49
巴伐利亚	46
普鲁士	37
俄 国	28
法 国	14

(53) 在俄国,棉纺织厂是英国人管理的,因为当地的资本家不适合于这一职务。根据一个英国经理向雷德格雷夫提供的确切的详细材料,那里的工资

雷德格雷夫先生指出,这些数字是他写报告的那年即 1866 年以前几年内收集的,而从那时以来,英国棉纺织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他假定大陆的纺织业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因此这些数字仍然有比较的价值。

但是他认为,英国劳动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英国有许多工厂兼营机器织布业和纺纱业,而在上表中织工一个也没有除去。相反,大陆工厂一般都是纺纱工厂⁽⁵⁴⁾。

我们知道,英国的一些公司在西欧和亚洲承包过铁路建筑工程,它们除了使用当地工人外,一般还使用了一定数量的英国工人。它们迫于实际的需要,就不得不考虑劳动强度的国民差异,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受到任何损失。从它们的经验可以知道,即使工资的提高多少同平均劳动强度是相符合的,但是劳动的相对价格通常是按相反方向变动的。

亨·凯里先生在他的最早的经济著作之一《论工资率》⁽⁵⁵⁾中企图证明,不同的国民工资表示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各个阶段。他想从这种国际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说,劳动者的报酬总是同他的劳动生产率相一致的。即使凯里没有像往常那样毫无道理地把未经批判的统计材料堆砌在一起,而是论证了自己的前提,我们关于剩余价值生

低得可怜,过度劳动骇人听闻,生产夜以继日不间断地进行。而且,这些棉纺织厂只是由于实行禁止外国货的制度才能勉强维持。

(5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 年 10 月 31 日》第 31—37 页。雷德格雷夫先生还说,我可以从我的管区中举出许多棉纺厂,在这些工厂里,只要一个男工和两个少女作助手就能看管共有 2 200 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每天生产出重 220 磅、长 400 英里的棉纱。

(55) 亨·凯里《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口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 年费城版。

产的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但是他毕竟承认,实际同他的理论是相违背的。在他看来,国家的干涉歪曲了这种自然的经济关系,因此在计算国民工资时,似乎必须把工资中归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看做是留在工人手中的部分。凯里先生难道不应当自问一下:这种政府的意外开支不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果实吗?他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宣布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并且说这些规律的和谐的作用只是由于国家干涉才遭到破坏,可是后来他竟发现,英国对两大陆市场的恶魔般的影响(似乎这种影响与竞争的自然规律无关),最终使得有必要把这些前定和谐¹²⁰即这些永恒的自然规律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换句话说,就是有必要采用保护关税制度。其次他发现,李嘉图用来表述现存的社会对立的定理,并不是现实经济运动的观念上的产物,相反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这些现实对立倒只是由于李嘉图的理论才存在!最后,他发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天生的优美与和谐的,归根到底是贸易。再前进一步,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弊病就是资本本身。

只有一个如此惊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如此假装博学的人(尽管他相信保护关税的异端邪说),才配成为一位名叫巴师夏的人和其他自由贸易论鼓吹者的和谐智慧的秘密源泉。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

导 言

一个货币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要执行资本职能的价值的第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

生产过程,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时就告结束,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或者说,除了预付资本以外还包含剩余价值。

这时,商品必须被投入流通领域。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们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然后把这些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

这种通过这样一些连续阶段的循环运动,就是资本流通。

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在下面的叙述中假定资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我们将在第二册进一步分析这一流通过程。

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固定在商品中的无酬劳动

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绝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相反，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其他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

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份额，这些份额为不同类的人所有，具有表面上互相独立的不同形式，如产业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但是，这种分割既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也不会改变使它成为积累源泉的那些条件。无论资本主义企业主为自己留下的或者转交给别人的份额如何，他始终是第一个占有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是他一个人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因此，我们不谈剩余价值的分配和转化，把它们放到第三册¹³¹中去研究。在这里，我们把产业资本家，如工厂主、农场主等等，看做剩余价值的唯一所有者，或者也可以说，看做所有瓜分掠夺物的人的代表。

流通的中介运动，剩余价值分割为具有不同形式的不同部分，使积累的基本过程复杂化了，模糊了。因此，为了使分析简化，我们必须预先抛开掩盖积累机制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从生产的观点来研究积累。

第二十三章

简单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具有的社会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如果不是从它的孤立的方面,而是从它不断更新的过程来看,它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再转化为新产品的要素,它就不能再生产,即不断地生产。在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劳动资料、原料、辅助材料,总之,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只有为数量相等的其他同类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保持自己的财富。因此年产品中必须定期地分离出来的、以便不断重新并入生产过程的部分,是属于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大部分是这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存在方式本身使它们不适合于充当消费资料。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前一场合,劳动过程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在后一场合,劳动过程是把已经预付的价值作为资本,也就是作为产生价值的价值再生产出

来或者使之永久化的手段。

一个人只有让他的货币执行资本的职能,他才具有资本家的经济特征。比如说,如果他今年预付 100 镑,把这些钱转化为资本,从中得到 20 镑剩余价值,那么,他在明年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

剩余价值作为预付价值的周期增加额,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¹⁾

如果资本家只是把这种收入当做消费基金来使用,周期地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么,在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换句话说,资本继续执行职能但不会增殖。周期地重新开始的生产过程,总是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同样一些阶段,但它总是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不过,这种重复或连续性,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作为孤立行为表现出来的虚假特征。

我们首先考察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或可变资本。

开始生产前,资本家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而在规定的期限届满,即在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之后,重新开始

(1) “但是,这些消费别人劳动产品的富人,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这种产品。如果他们把已经得到的和已经积累的财富拿去交换那些成为他们的嗜好品的新产品,那么,他们似乎很快就会花光自己的准备金。我们曾经说过,他们完全不劳动,他们甚至不会劳动。因此,人们相信,他们原有的财富会日益减少,而当他们完全没有这些财富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同只为他们劳动的工人相交换…… 但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财富获得了一种没有它的所有者的参与而通过别人劳动再生产出来的能力。财富,和劳动一样,并且通过劳动,每年提供果实,这种果实每年可以被消费掉,但不会使富人变穷。这种果实就是来源于资本的收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巴黎版第1卷第81、82页)

这一交易。但是,资本家只是在工人已经发挥了作用并在产品上加进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和一定的剩余价值之后才支付。因此,除了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以外,工人还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工人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由此产生了经济学家的公式(见第十七章),这个公式把工资表现为成品的一部分。⁽²⁾实际上,工人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商品中有一部分不断地以工资形式流回工人手中。当然,这个部分是用货币支付给工人的,但是这些货币不过是商品的价值形式。

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新的产品时,他的过去劳动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在那里转化为货币。因此,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

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及其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商品流通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资本家阶级定期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工人阶级用来领取由它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也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因此,可变资本⁽³⁾不过是所谓的维持劳动的基金[fonds d'entre-

(2) “工资和利润一样,都应该看成成品的一部分。”(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42页)“产品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等等属于工人。”(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佐译,1823年巴黎版第34页)

(3) 可变资本在这里只是被看成工资基金。我们知道,实际上,可变资本只是在它所购买的劳动力已经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时才是可变的。

tien du travail]⁽⁴⁾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可能的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基金以工资的形式即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回到工人手里,那么这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工人所得到的作为资本家的预付⁽⁵⁾的东西,只是工人自己的过去的和已经实现的劳动的一部分。

以徭役农民为例,他每周比如说3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3天在主人的庄园服徭役。他不断地再生产出维持自己的基金,他是这一基金的唯一所有者,而这一基金对他来说,从来也没有采取第三者预付给他的支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无酬的强制的劳动也同样从来没有采取自愿的和有酬的劳动形式。现在我们假定,他的主人把他的耕地、耕畜、种子,一句话,把他的生产资料都攫为己有,那么,徭役农民从此以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主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每周劳动6天,3天为了养活自己,3天为了现在转化为雇主的过去的主人。他继续使用同样一些生产资料,并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同以前一样,一定部分的产品进入再生产。但是,一旦徭役劳动变成了雇佣劳动,过去的徭役农民自己不断再生产出来的维持自己的基金就立即会采取前面提到的那个主人预付给他的资本的形式。

(4) 英国人说 labour fund[劳动基金],法语从字面上来说是 fonds de travail,但这样表达在法语中是有歧义的。

(5) “用资本来给工人预付工资,这丝毫不增加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卡泽诺夫对他编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22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区别形式和本质,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在欧洲大陆和北美的农民那里,维持劳动的基金也只是例外地采取资本的形式,⁽⁶⁾即资本主义企业主付给直接生产者的预付金的形式。

诚然,只是由于生产过程的周期更新,可变资本才失去从资本家的私人基金中拨出的预付金⁽⁷⁾的性质。但是,这一过程在更新之前,总必须已经开始进行并继续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工人还不能从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得到报酬,也不能靠空气为生。是否应该假定:资本家阶级第一次出现在劳动市场上时,就已经靠自己的劳动和节约积累起一笔财富,从而使它能够以货币形式预付工人的生活资料?我们暂时先这样解决问题,在所谓的原始积累一章中再进行更详细的考察。

无论如何,只要同一资本不断执行职能,或者以经久不变的规模不断重复生产过程,连续再生产就会引起另一种变化,改变预付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原有性质。

如果10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资本家每年把这200镑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年生产过程重复五次以后,剩余价值量就等于 5×200 ,即1000镑,也就是预付资本的全部价值。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消费掉,例如消费掉一半,那么在

(6) “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不是由资本家预付给他们的。”(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36页)

(7) “(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然由雇主预付,但实际上雇主没有破费什么,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通常总是带着利润,在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对象的增大的价值中又被保留下来。”(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2篇第3章第311页)

10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 $10 \times 100 = 1\,000$ 。总之,预付资本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经过若干个生产期间,原有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

资本家无疑认为,他消费了剩余价值,保存了资本价值,但是他的这种看法丝毫也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经过一定时期以后,他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同一时期内无偿地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他预付的价值额。因此,他从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诚然,他手中始终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要素。如果某人借债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么他的财产的价值就只代表他的债务的总额。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就只代表他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

因此,撇开一切真正意义上的积累不说,简单再生产就足以使全部预付资本或早或迟地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这些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企业主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但在经过了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也会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获得的价值,成为他人的无酬劳动的化身。

我们在开始分析的时候(第二篇)已经看到,要使资本产生出来,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这样的条件:拥有货币的人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其他的人,这些人是自由的,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出售,他们不得不自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产品和生产者的分离,拥有实现劳动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人和只有自己的劳动力的人的分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但是,起初是起点的东西,后来由于简单再生产而成为不断重新出现的结果。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和资本家的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走出生产过程:他是财富的人身源泉,被剥夺了他自己的实现[劳动]的手段。他的劳动还在过程开始以前就已经异化,成为资本家的财产,并入了资本,所以很清楚,他的劳动在过程中只能实现在迅速离开他的产品中。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就是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消费,所以它不断地把雇佣劳动的产品不仅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汲取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统治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购买工人本身的生活资料。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或者周期重复本身会再生产出它的基础,即作为雇佣工人的劳动者,并使之永久化。⁽⁸⁾

劳动者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行为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以便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是他的生产消费,这种生产消费同时是他的力所从属的那个资本家对他的力的消费。⁽⁹⁾但是,购买这个力的货币被劳动者用于生活资料,而这就是他的个人消费。

(8) “确实,一种工场手工业最初采用时,会使许多贫民得到工作;但他们依然贫穷,而且这种工场手工业的继续经营又会造成更多的贫民。”(《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1677年伦敦版第19页)“租地农场主荒谬地断言他维持穷人生活。实际上,穷人被维持在贫困生活中。”(《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31页)

(9) “这就是生产消费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生产中所消费的东西就是资本,并且通过消费才成为资本。”(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242页)如果詹·穆勒懂得生产消费,他就不会在这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中发现什么令人奇怪的东西。

可见,劳动者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消费下,劳动者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消费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一种消费的结果是资本的生存,后一种消费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诚然,在《工作日》和《大工业》等章中已经有许多例证向我们表明,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他的力的食物所起的作用同供给蒸汽机的水和煤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食物只是为了工人能从事生产,或者换句话说,工人的个人消费同他的生产消费结合在一起了。但是,这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消耗。⁽¹⁰⁾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生产行为,而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并且不断更新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情况就不同了。

当资本家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转变为劳动力时,他由此就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总资本做好了准备。但事情不止于此。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取利益。

为了取得劳动力而让渡的资本,被工人阶级用来交换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的劳动者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劳动者。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

(10) 那些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这种合一看做正常情况的经济学家,必然会把工人的生活资料列入辅助材料,如像劳动工具所消费的、因而构成生产资本的要素的油、煤等等一样。罗西激烈地反对这种分类法,他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工人的生活资料不进入生产资本,但工人本身是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

要的限度内,是把它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购买到的生活资料转化为新的劳动力,转化为可供资本剥削的新的材料。这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工具即劳动者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像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间歇中进行,总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

劳动者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确实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资本家。但是,役畜同样要吃东西,有谁会断言,役畜的饲料不是租地农场主所关心的事情呢?而资本家在这里没有必要进行监督,他可以大胆地信任自由劳动者保存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

因此,资本家同粗暴的南美洲矿山主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这些矿山主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¹¹⁾而资本家唯一操心的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之内。

因此,资本的意识形态家即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人消费中只有工人阶级为了延续并扩大自己所必要的部分,才是生产的消费,没有这一部分,资本就找不到可供消费的劳动力,或者就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劳动力。除此之外,劳动者为了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享受而可能花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¹²⁾如果资本积累引起工资的提高,

(11) “南美洲矿工每天的劳动(也许是最繁重的劳动),就是把重180—200磅的矿石从450英尺深的地下背到地面上来,但他们只靠面包和豆子过活;他们宁愿只吃面包,但他们的雇主发现他们光吃面包不可能干这样的重活,所以强迫他们吃豆子;豆子含磷酸钙比面包多得多。”(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94页注)

(12)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238页及以下几页。

而这种提高使工人的花费增加却不会使资本家有可能扩大劳动力的消费,那么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被消费掉。⁽¹³⁾实际上,劳动者的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它再生产出来的只是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出创造资本家和国家的力量。⁽¹⁴⁾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同其他一切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在一定限度内甚至包含着劳动者的个人消费。这个过程不断地从劳动那里夺取它的产品,并把产品转移到对立的一极,即转移到资本那里,不让有自我意识的工具逃离资本。个人消费维持并再生产出这些工具,同时毁灭掉他们的生活资料,从而迫使他们不断地重新出现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只不过这个所有者——不是个别的资本家,而是资本家阶级。

不久之前,这个阶级还采取法律强制手段来实现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1815年以前,英国禁止机器工人移居国外,违者予以严惩。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世代相传的技能的积累。⁽¹⁵⁾这

(13) “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

(14) “唯一真正的生产消费,就是资本家为了再生产而对财富的消费或破坏(他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消耗)……工人对于雇用他的人、对于国家是生产的消费者;但严格说来,对自己本身就不是生产的消费者。”(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53年伦敦版第30页)

(15) “人们可以说真正积累起来的唯一的東西,就是劳动者的技能……熟练劳动的积累,这种最重要的操作,对大部分劳动者来说,不要任何资本也可以完成。”(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13页)

种技能列入了资本家的财产清单，资本家只把工人的存在看做他的可变资本的存在方式，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每当危机使这种珍贵的财产有丧失的危险时，资本家就会毫无顾忌地公开承认这一事实。

美国的南北战争⁷以及随之而来的棉荒，把兰开夏郡和英格兰其他郡的大部分工人抛向街头。³⁵⁰于是他们要求国家援助或国民自愿捐款，使他们便于迁往国外。英国到处都可以听到这种绝望的呼声。当时《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发表了曼彻斯特前任商会会长埃德蒙·波特尔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下院被恰当地称为“工厂主宣言”。⁽¹⁶⁾我们在这里举出几处有代表性的地方，这些地方蛮横无理地要求得到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

“有人可能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 社会舆论坚决要求移民…… 雇主(即棉纺织厂主等)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减少；他会想，这样做既不公平又不正确…… 如果移民靠国库资助，他就有权要求听取他的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这个波特尔接着强调了棉纺织业的极其有用的性质。他说，棉纺织业“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国农业区的多余人口”，它在1866年占英国输出总额的 $\frac{5}{13}$ ，它将会在几年之后由于市场特别是印度市场的扩大，并由于“按每磅6便士得到充足的棉花供给”而再行扩大。他继续说：

“时间(一年两年或许是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 于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指活的劳动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兰开夏郡和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和的

(16) 1863年4月27日费伦德在下院会议上就棉荒提出的议案。

受过教育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工人进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一年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¹⁷⁾……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以后怎么办呢？”

这种发自内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 1792 年的哀号：如果没有朝臣，假发师怎么办呢？

“抛掉劳动者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经不起同劣等劳动供应不足的斗争……有人对我们说，工人自己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把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比如降低 $\frac{1}{3}$ ，或 500 万，这样一来，工人上面的一个阶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小租地农场主、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么办呢？输出国家最优秀的工厂工人，降低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我建议两三年内分批发放一笔 500 万—600 万的贷款；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依照特别法律的规定来使用，并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来保持受救济者的道德标准……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并且通过实行大规模的造成国内空虚的移民，⁽¹⁸⁾以及把全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

(17) 人们会记得，通常在必须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同一资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这时“主人”异口同声地说（见第十五章）：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因为只要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训练就可以获得这种劳动所需的全部技能。在生产中，主人的机器（现在我们听到，这种机器可以在一年内加以改良和替换而获得利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按照波特尔的意见，今天这种劳动和技巧在 30 年中无法替换）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只需要 6 个月的训练，并且一个普通农民都可以学会。”

(18) 相反，资本家在通常的时期说：如果工人能明智地减少他们的人手数目以提高价格，那么他们就不会挨饿、道德败坏和感到不满。

波特尔这位被工厂主选中的辩护士,把机器分为两类,这两类都属于资本。一类固定在工厂里,另一类在干完每天的活以后离开工厂。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死机器不仅逐日损坏和贬值,而且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它的大部分不断变得如此陈旧,以致在几个月之内可以用新机器来替换而获得利益。活机器则相反,它延续的时间越久,历代的技能积累得越多,就越好。《泰晤士报》在回答这位大厂主时写道:

“埃·波特尔先生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对的重要性,因此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50万劳动者强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¹⁶⁴。波特尔先生问道,棉纺织工业值得维持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特尔先生又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生指的机器是人这种机器,因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当做绝对的财产。我们必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不管你如何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疯狂地喧闹。正如波特尔先生所说,再生产劳动者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手里有机械师和货币,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可以造就出超过我们任何时候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波特尔先生向我们宣告,过一年、两年或三年工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们不鼓励或不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他说工人希望移居国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要求,把这50万工人和他们的70万家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这是必然会得出的——国家必须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力同煤、棉花和铁一样看待的人的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¹⁹⁾

(19) 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益智游戏。“强大的舆论”实际上同波特尔先生的意见一样，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主的动产的一部分。工人被制止移居国外。⁽²⁰⁾ 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区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他们仍然是“兰开夏郡棉纺织业主的力量”。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会再生产出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那些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使资本家有可能购买工人以发财致富的条件⁽²¹⁾，并使这些条件永久化。现在，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使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市场上相对立。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做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市场，并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家的购买手段。实际上，劳动者在把自己出卖给个别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家阶级。劳动者在经济上的奴隶地位，⁽²²⁾ 是通过这种出卖行为的周期

(20) 议会没有为移民批准一个铜板的经费，只是颁布法令，责成市政当局把劳动者维持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或不付给标准工资而对他们进行剥削。相反，三年后，当农村地区牛瘟流行的时候，议会甚至粗暴地破坏议会惯例，立即批准数百万来补偿百万富翁地主们的损失；他们的租地农场主由于肉价上涨已经得到了补偿。土地所有者在 1866 年议会开会时的野兽般的吼叫表明，即使不是印度教徒也可以礼拜撒巴拉神牛，即使不是丘必特也可以转化为牛。

(21) “工人为了生活而需要生活资料，工厂主为了获利而需要劳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布鲁塞尔版第 1 卷第 91 页）

(22) 达勒姆都存在着这种隶属地位的农村粗野形式。有少数几个郡，当地的条件不能保证租地农场主对农业短工的无可争辩的所有权，达勒姆郡就是其中的一个。采矿业使农业短工有选择的机会。因此，在这些地方，租地农场主打破惯例，只承租筑有工人小屋的土地。小屋租金就是工资的一部分。这些小屋叫做“农业工人房舍”。工人要租这些小屋必须完成一定的封建义务，租赁契约就叫做“依附关系”，按照这种束缚劳动者的契约，例如劳动者在外地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他的女儿或其他人代他工作。劳动者本人叫 bondsman，即依附

更新、自由契约的假象、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23)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其连续性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来考察,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并使之永久化。(24)

农。这种关系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明,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同时是为资本的消费或生产消费。“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这种依附农的粪便都成了他的利欲熏心的主子的一项额外收入……租地农场主除了自己的厕所以外,不许邻近有别的厕所,而且不容许对这方面的领主权有任何侵犯。”(《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版第188页)

(23) 我们记得,在儿童劳动等方面,甚至连卖身的形式也不需要。

(24) “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新莱茵报》1849年4月7日第266号)用这个标题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是1847年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³⁵¹就这个题目发表的演说的片断;文章的登载由于二月革命¹⁹¹而中断。

第二十四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 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商品生产所有权如何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权

我们在前几篇中已经看到,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

如果剩余价值不是被花费掉,而是作为资本被预付和使用,那就会形成一个新的资本并加入原有资本。因此,积累是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进行的。(25)

首先,我们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

例如,一个纱厂主预付了 25 万法郎,其中 $\frac{4}{5}$ 用于棉花,机器等等, $\frac{1}{5}$ 用于工资。假定他每年生产棉纱 24 万磅,价值为 30 万法郎。5 万法郎剩余价值包含在 4 万磅纯产品中,它占总产品的 $\frac{1}{6}$ 。这笔剩余价值将由于出售而变成 5 万法郎总额。5 万法郎就是 5 万法

(25) “资本积累就是把收入的一部分当做资本使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53 年伦敦版,卡泽诺夫编,第 11 页)“收入转化为资本。”(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 年伦敦第 2 版第 320 页)

郎。它们的剩余价值的性质,向我们表明它们是如何落入资本家手中的,但是丝毫也不会影响它们的价值或货币的本性。

因此,纱厂主要把追加的5万法郎转化为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只需预付其中的 $\frac{4}{5}$ 去购买棉花等物, $\frac{1}{5}$ 去购买追加的纺纱工人,这些纺纱工人会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价值已由纱厂主预付给他们了。于是,这5万法郎新资本就在纺纱厂中执行职能,并又带来1万法郎剩余价值,等等。

资本价值最初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开始就作为总产品的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总产品卖出去,同货币相交换,那么资本价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则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从这时候起,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后来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转化为资本。纱厂主预付这二者用来购买商品,以便能够重新开始制造自己的产品。而这次是在扩大的规模上进行的。但是,他要买到这些产品的构成要素,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些要素。

他自己的棉纱所以能流通,只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年产品投入市场,正像其他所有的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场一样。但这些商品在进入市场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年生产基金中了,这个基金不过是各个单个资本的总额或社会资本在一年中转化成的各种物品的总额,而每个资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个相应部分。市场上的过程只是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转移或易手,既不能增大年生产,也不能改变所生产的物品的本性。可见,全部年产品能有什么用途,取决于它本身的构成,而不取决于流通。

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用来在实物形式上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的一切物品。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

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

但是这种纯产品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当然是那些供资本家阶级满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该阶级的消费基金的物品。如果这些物品全部加入消费基金，剩余价值就会被挥霍尽，这样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纯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那些能够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那些能够维持劳动者生存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除了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外，还要有一部分年剩余劳动用来生产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纯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要素。⁽²⁶⁾

要使这些要素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劳动，而这种追加劳动，除了在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更多地剥削已就业的工人以外，资本家阶级只有靠吸收追加劳动力才能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已经提供了这个条件，它把工人阶级作为雇佣工人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能维持生存，而且还能用来进行繁殖。

现在剩下的事情只是要把工人阶级每年所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年产品已经包含的追加生产资料结合起来。

因此，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

(26) 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化为生产资料或必要生活资料，或者也可以反过来。为了使一般的分析摆脱没有用处的偶然情况，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做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产。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扩大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²⁷⁾,变成螺旋形了。³⁵²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所举的例子。这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³⁵³等等的老故事。250 000 法郎原有资本带来 50 000 法郎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新的 50 000 法郎资本又带来 10 000 法郎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或者说转化为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 2 000 法郎剩余价值,依此类推。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追加资本是作为增殖额加在原有资本上,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执行职能;是由积累它的同一个人使用,还是由他转入别人手中,这些我们暂时也不必过问。只是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的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原有资本是由预付 25 万法郎而形成的。它的占有者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它是通过占有者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²⁸⁾而他们的这种假定好像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

5 万法郎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产生过程我们是一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无酬的他人劳动产生的。合并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

(27) 西斯蒙第对积累的分析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太满足于“收入转变为资本”这句话,而没有深究这个活动的物质条件。

(28) “最初的劳动是他的资本产生的由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109 页)

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纯产品,即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的组成部分。如果资本家阶级用贡品的一个部分从工人阶级那里购买追加劳动力,甚至以公平的价格来购买,就是说,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这仍然是征服者的做法,他们乐于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来的人,那么他们在继续使原有资本增殖的同时,必须对自己过去的无酬劳动的产品用比它所费劳动更多的追加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做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么,即使用过去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雇用追加的工人,事情也是一样的。新资本也可能用来购买机器,以便把生产这种新资本的那些人抛向街头,用几个儿童来代替他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追加资本。⁽²⁹⁾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创造资本。

第一个资本 5 万法郎的积累的前提,是作为原有资本而预付的 25 万法郎来自它的占有者的自己的基金,来自他的“最初劳动”。而第二个追加资本 1 万法郎的前提只能是 5 万法郎资本的先行积累,因为前者只是后者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资本家已经积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换句话说:他过去占有无酬的他人劳动越多,现在就越能更多地占有。在这里,甚至等价物交换、交换者的劳动产品的交换的假象也看不见了。

尽管这种发财致富的方式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十分矛盾,但必须清楚懂得,它的产生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

(29) “在资本使用劳动以前,劳动就已经创造了资本。”(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110 页)

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略微回顾一下导致积累的那个运动的依次发生的各个阶段就够了。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全按照交换规律进行的。交换双方中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购买劳动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这种商品的使用即劳动就让渡给后者。于是，后者就借助于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归他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理所当然归他所有。

这个产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但如果有用劳动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就不能消费这些生产资料，而劳动力要卖得出去，就必须能够向使用它的工业部门提供有用劳动。

新产品的价值包含了劳动力的等价物和一个剩余价值。这是由于按一定时期（一日、一周等等）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的使用在同一时期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劳动者得到了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因而让渡了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同任何商品买卖都一样。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会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但这种情况丝毫也不会改变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预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再现在产品中，而且还带有一个余额，那么，这绝不是由于卖者受到损害，——因为他得到了自己商品的等价物，——而是由于买者消费了这种商品。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物品的交换价值相等，但它要求这些物品的使用价值即它们的效用各不相同，它同这些物品的消费无关，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以后才开始的。

可见，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

尽管如此,这种转化会产生如下结果:

(1)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生产者;

(2)这一产品的价值既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也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

(3)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

简单再生产仅仅是这种最初的活动周期反复;因而它每一次都是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规律的作用的连续性,显然是规律的违反的对立面。

“好多次连续发生的交换,不过使最后一次成为最初一次的代表。”⁽³⁰⁾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简单再生产根本改变了第一个行为就其孤立的方面来考察时所具有的性质。

“在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人中间,一部分人(工人)每年通过新的劳动获得新的分配权;另一部分人(资本家)则通过最初劳动已经预先取得了永久的分配权。”⁽³¹⁾

此外,劳动领域并不是长子继承权创造奇迹的唯一领域。

如果简单再生产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为积累所代替,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本家花费了全部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只花费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转化为货币,以此表现了自己的公民美德。

(30)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巴黎版第1卷第70页。

(31) 同上,第111页。

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因此，他预付剩余价值时，就像他第一天进入市场时那样，是他从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的，尽管这一次他的基金来自他的工人的无酬劳动。如果工人 B 是用工人 A 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来雇用的，那么，应该看到，一方面，A 提供这种剩余价值时，资本家对他的商品支付了合理的价格，分文也没有少给；另一方面，这一交易同工人 B 毫无关系。B 所要求的而且有权要求的，是资本家把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付给他。

“双方都有利，因为对工人来说，他在劳动前〈应当说：在他自己的劳动带来成果前〉就预先得到劳动〈应当说：别的工人的无酬劳动〉的果实；对雇主来说，这个工人的劳动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应当说：他生产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³²⁾

诚然，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更新的不间断进行中加以考察，而且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

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契约所规定的期限到期以后即告结束。要是交易重复进行，那是由于订了新的契约，它同旧的契约没有什么联系，同一卖者和同一买者订立契约纯粹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按商品生产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易孤立起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的和以后的交易的一切联系。此外，因为卖和买总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应该在这里去寻找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32) 同上，第 135 页。

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假定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易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财富由于不断地占有别人的无酬劳动而越来越大规模地积累起来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³³⁾

一旦劳动力由劳动者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越来越是为卖而生产,而且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不仅强加于整个社会,而且第一次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越是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就越是必然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某些社会主义学派以为,在资本的制度中应用商品生产的永恒规律可以摧毁这一制度,他们的这种想法多么荒唐!³⁵⁴

大家知道,最初预付的资本,即使它完全起源于它的占有者的劳动,迟早也会由于简单再生产而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但除此以外,全部预付资本会像一滴水一样消失在越来越大的积累的洪流中。经济学家们如此熟知这一事实,以致他们热衷

(33) 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唯一的所有权”(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8页)。——作者感觉到了辩证的矛盾,但错误地加以解释。

于把资本说成是“重新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积累起来的财富”⁽³⁴⁾，而把资本家说成是“纯产品的占有者”⁽³⁵⁾。这种看法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全部现存的资本都是积累起来的或资本化的利息，因为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写道：“资本加上储蓄资本的每部分复利，将以这样的方式增加，以致全世界能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³⁶⁾《经济学家》实在太克制了。既然它步普赖斯博士的后尘，它就应当用准确的计算来证明，为了把应该还给资本的一切东西还给资本，只有地球是不够用的，还必须加上其他的星球。

2. 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资本家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购买的作为消费资料的商品，显然对他不能起生产资料和价值增殖[valorisation]⁽³⁷⁾手段的作用；他为了同一目的而购买的劳动也不是生产劳动。购买这些商品和购买这种劳动，不会使他致富，相反会减少他的财富。他这样做就是把剩余

(34) “资本就是用来获取利润的积累起来的财富。”(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资本就是由收入中节约下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的。”(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16页)

(35) “纯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

(36) 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51年7月19日。

(37) 我们认为，“valorisation”这个术语最准确地反映了使价值成为它自身的增殖手段的运动。

价值当做收入来消费,而不是把它作为资本来获利。

封建贵族竭力要消费比自己的财产更多的东西,炫耀自己有不计其数的游手好闲的侍从,以示自己的阔绰。与此相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则必然宣扬积累是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人们,为了积累,需要明智,不应该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应该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生产劳动者,他们提供的东西比他们得到的东西更多。

此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见作斗争,这种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以为积累就是使构成财富的那些物品不被消费掉,或者说,把货币从流通的危险中救出来。其实,把货币锁起来,才是使货币避免资本化的最可靠的方法,而为了货币贮藏而积累商品,这只有发狂似的吝啬鬼才会这样做。⁽³⁸⁾商品的积累,如果它不是商品流通本身的暂时现象,就是市场商品充斥或者生产过剩的结果。⁽³⁹⁾

在日常生活用语中,人们还把资本主义积累(它是生产过程)同其他两种经济现象混为一谈,这两种现象是:富人消费基金中供慢慢消费的财物的增长⁽⁴⁰⁾和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储备或库存的形成。

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指出,积累的最富有特征的地方是,

(38) 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式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在他的作品中,那个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开始为了货币贮藏而积累商品时就已经失去了理智。

(39) “商品积累…… 交换停滞…… 生产过剩。”(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1841年伦敦版第104页)

(40) 内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了“奢侈品”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财产法使奢侈品集中在一个社会阶级手中。”(《内克著作集》1789年巴黎—洛桑版第2卷《论法国财政的管理》第291页)³⁵⁵

靠纯产品维持生活的人应该是生产劳动者,而不是非生产劳动者⁽⁴¹⁾,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它的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亚当·斯密的任何理论都没有像下面这一点一样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真理:积累无非是纯产品由生产劳动者消费,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无非是剩余价值转变为劳动力。

例如,我们听听李嘉图的说法: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生产新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新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劳动者消费的,而不是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的。如果认为资本可以由于不消费而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⁴²⁾

认为“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劳动者消费的”,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为可变资本,并且只能预付在工资上。相反,剩余价值和产生它的资本价值一样,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纯产品要转化为追加劳动力,它必须包含追加的必要生活资料;但是,这个劳动力要能够被利用,纯产品还必须包含追加的生产资料,这种追加的生产资料既不进入劳动者的个人消费,也不进入资本家的个人消费。

既然从积累产生的追加价值额转化为资本的方式同任何其他价值额一样,那就很清楚,亚当·斯密的错误的积累理论只能是他对资

(41) “现今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把储蓄看做只是货币贮藏;撇开这种狭隘和无效的做法不说,储蓄这个术语在涉及国民财富方面只能设想有一个用法,即根据储蓄维持这种或那种劳动(生产劳动或非生产劳动)而表示储蓄的不同用途。”(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8、39页)

(42)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注。

本主义生产的分析的根本错误造成的结果。他实际上断言,尽管每一个资本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分为工资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但单个资本的总和即社会资本却不是这样。社会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支付的工资的总和,换句话说,社会资本只是可变资本。

例如,一个呢绒厂主把 20 万法郎转化为资本。他把这些货币的一部分用来雇织工,另一部分用来购买毛纱和织毛机等等。这样转到生产毛纱、织毛机等等的厂主手中的货币,首先要支付他们的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扣除剩余价值以外,货币又要用于支付工人的劳动,购买其他厂主所制造的生产资料,依此类推。因此,呢绒厂主预付的 20 万法郎逐渐消费在工资上:一部分由呢绒厂主用于工资,另一部分由卖给他生产资料的那些厂主用于工资,依此类推,直至全部价值额,除了预先依次扣除的剩余价值外,或者完全预付在工资上,或者这一价值额所体现的产品完全为生产劳动者所消费。

这个论据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把我们推来推去的“依此类推”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并没有使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手中握有的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最终会消失不见的资本家。亚当·斯密正是在困难开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⁴³⁾

如果我们只考察年生产基金,那么年再生产就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过程;但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市场。在市场上,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运动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观察者的视线,给研究提

(43) 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著有《逻辑》一书³⁵⁶,但从未怀疑他的老师的这种错误的分析;他满足于以门徒的教条主义态度重复这些错误。在这里也是这样,他说:“从长远来看,资本本身终归要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偿时,会再变为工资。”

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⁴⁴⁾ 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³⁵⁸中,首次试图画出一幅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再生产的图画。他们的论述在许多方面比他们的继承者的论述更接近于真理。

既然亚当·斯密把执行资本职能的全部社会财富归结为可变资本或者说工资基金,他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确实荒谬绝伦的教条,这个教条在今天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商品的必要价格由工资、利润(包括利息)和地租构成;换句话说,由工资和剩余价值构成。从这一点出发,施托尔希至少幼稚地承认:“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⁴⁵⁾

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学不会不利用亚·斯密的所谓纯产品中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阶级消费这一论点,来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

3. 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迄今为止,我们考察剩余价值,有时把它看做消费基金,有时把它看做资本家的积累基金。剩余价值同时既是前者又是后者。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被消费,⁽⁴⁶⁾另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资本积累起来。

(44) 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册³⁵⁷中解决这个问题。

(45) 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1页注。

(46) 读者会注意到,收入[revenue]一词有两种不同含义的用法:第一是指剩余价值,即从资本周期地产生的果实;第二是指这一果实中被资本家周期地消费掉或加入他的消费基金的部分。我们保留了这一双重意义,因为它同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通常的用语相一致。

在剩余价值量已定时，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积累量。而谁进行这种分割呢？是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因此，这是他的意志行为。至于他所征收的贡品中由他积累的部分，据说是他节约下来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吃光用尽，也就是说，因为他执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历史存在权和社会意义。只有以这样的身份，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因此，他的活动的决定性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不断的增殖。他狂热地追求积累，无情地、无休止地迫使人们为生产而生产，因而本能地推动人们发展那些唯一能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创造基础的生产力和物质条件。

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为盲目的追求抽象财富即价值的欲望所支配。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齿轮罢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使资本家只有扩大资本才能保存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资本家的意志和意识只反映他所代表的资本的需要，所以他的个人消费对他来说就像是偷窃积累，至少是向积累的借贷；实际上，私人开支在簿记中记在借方，作为资本家欠他的资本的债务。

最后,积累意味着征服社会财富世界,扩大资本家的私人统治,(47)增加他的臣民的人数,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

但是,原罪到处发生作用,毁坏一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从而积累和财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他对自己的亚当,对他的肉体具有“人的同情感”³⁵⁹,他非常开明,

(47) 路德用高利贷者这种虽然在不断翻新但仍属老式的资本家形式为例,出色地说明了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异教徒仅凭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杀人犯和四重盗贼的结论。而我们基督教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金钱而崇拜他们。凡是偷盗和掠夺别人食物的人,就是使人饿死,使人毁灭的杀人凶手(这要看他的力量的大小)。高利贷者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身上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么,他盗窃了多少埃巨,就应该被多少乌鸦去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而小偷却被绞死……小偷带上镣铐,大盗却腰缠万贯,身着丝绸。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当然也是恶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穷人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不免会产生恻隐之心。而高利贷者,这个贪财之徒却想使整个世界处于饥渴、悲伤和贫苦之中;他想独占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永远成为他的奴隶。他戴上金链指环,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温厚的虔诚者。——高利贷者是一个庞大可怕的怪物,比吃人妖魔,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扮成一个伪善的圣徒,使人们看不到他是从什么地方把牛倒着拖回他的洞穴中去。然而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被囚禁的牛的吼声,甚至到岩石中去搜寻卡库斯,把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者这个恶汉。他装着什么坏事也没有做,小心翼翼不让别人发现他,因为牛是倒着拖回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牛似乎是从洞里走出来的。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牛并把它独吞了……既然对杀人犯、劫路人应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驱逐,革出教门,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

多疑，以致敢于把严肃的禁欲主义嘲笑为旧式货币贮藏者的偏见。老派的资本家谴责一切不是必需的个人消费，认为这些消费仅仅是积累的损失，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过程看做是自己的欲望的障碍。前者说，消费意味着“节制”积累；后者说，积累意味着“放弃”享受。“啊，我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⁴⁸⁾³⁶⁰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在每个产业暴发户的私人生活中都出现过这个历史阶段，——贪欲和致富欲绝对占统治地位。但是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新的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的一种必要。奢侈成了营业的必需，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此外，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像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吸收别人的无酬劳动的程度和强迫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虽然它难以隐藏最可鄙的吝啬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他的积累不一定要受到他的消费的限制，他的消费也不一定要受到他的积累的限制。不过那时，在资本家身上仍然存在着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艾金医生在 1795 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曼彻斯特的工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劳动。”

(48) 引自歌德的《浮士德》。

他们发财致富的主要手段是从那些把子女送来当学徒的父母那里盗窃,那些父母付给他们高额学费,而这些学徒却忍饥挨饿。另一方面,当时平均利润很低,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他们过着像货币贮藏者一样的生活,甚至连资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费。

“在第二个时期,他们开始赚到了少量的财产,但还像过去那样辛勤地劳动”,——因为像一切奴隶监督者都知道的那样,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要花费劳动的,——“并且过着和过去一样的俭朴生活……”

“在第三个时期,奢侈开始了,各企业通过派骑马的推销员到王国各商业城市去兜揽生意,扩大经营。在1690年以前,在工业中赚到3 000镑以上资本的人为数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或者在稍后的时期,工业家已经赚了钱,开始建造石头房子来代替木棚或土房……”

“但在18世纪最初30年,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脱外国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会遭到所有邻居的议论和非难……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德尼埃^①($62\frac{1}{2}$ 生丁)一杯果汁酒和1德尼埃一包烟。”

“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业家坐上自己的马车!……”

“第四个时期”,即18世纪最后30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扩大营业所造成和维持的”(49)。如果善良的艾金医生今天在曼彻斯特复活的话,他又将说些什么呢!

积累啊,积累啊!这是天经地义的!“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不是勤劳,而是节俭,实际上,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50)

(49) 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第182页及以下几页。

(50) 亚·斯密《国富论》第2卷第3章。

① 旧时法国一种辅币的名称。——编者注

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不断地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纯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宣告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的口号。它从未低估过财富分娩带来的痛苦⁽⁵¹⁾,但是,既然悲叹无法改变历史必然性,那么这种悲叹又有什么用处呢?

从这个观点来看,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资本化的机器。

古典政治经济学非常严肃地对待资本家及其职能。为了使资本家摆脱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间的不幸的冲突,马尔萨斯在维也纳会议³⁶²数年后,在理论上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体系:让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另一些共同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贵族、国家和教会的达官贵人,游手好闲的年金收入者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把支出欲和积累欲分开”⁽⁵²⁾。那些早就变得享乐成性和沉湎于交际的资本家先生们不由得大叫起来。他们的代言人之一,一个李嘉图派反对说:马尔萨斯先生鼓吹高额地租、高额税收、肥差,难道是为了让非生产消费者来不断地刺激工业家!诚然,我们的口号,我们的万应灵丹是生产,越来越多的生产,但是,

“这个办法与其说会促进生产,不如说会阻碍生产。而且让一部分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只是为了去鞭策另一些人,这也不是十分公正的。尽管从后者的

(51) 甚至让·巴·萨伊也说:“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³⁶¹“罗马的无产者几乎完全靠社会过活……几乎可以说,现代社会是靠无产者过活,靠夺取无产者的那一部分劳动报酬过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24页)

(52)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版第325、326页。

性格来说,如果强迫他们去做,他们是能把事情办好的”(53)。

尽管这位李嘉图派认为靠吸掉工业资本家汤里的油水这种办法来刺激工业资本家去积累是不公正的,但是他宣布,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从而“让工人勤勉劳动”,是合理的。他从来也不隐瞒剩余价值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

“从工人方面来说,对劳动的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拿走自己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其中大部分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工人的消费减少会产生所谓过剩现象(市场商品充斥,生产过剩),那我只能回答说:过剩现象是高额利润的同义语。”(54)

关于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应该怎样在工业资本家和游手好闲的富人之间进行分配才最有利于积累这种学究气的争论,遇到七月革命³⁶³就中断了。此后不久,城市无产阶级在里昂敲响了警钟,而农村无产阶级在英国燃起了熊熊烈火。³⁶⁴海峡此岸在传播傅立叶主义和圣西门主义,海峡彼岸在传播欧文主义。庸俗政治经济学抓住这个时机,提出了拯救社会的学说。

这个学说是由纳·威·西尼耳公诸于世的。恰恰在一年以前,他在曼彻斯特发现,一个十二小时的工作日中只有最后第十二个小时生产利润,其中包括利息。他庄严地声称:“当资本和生产相关时,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资本一词。”(55)没有比这更能说明庸俗经济学的“发

(53)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67页。

(54) 同上,第59页。

(55)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第309页。在旧古典学派的追随者看来,这也未免太过分了。“西尼耳先生用劳动和节

现”的概念了！它用答尔丢夫^①的言辞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

西尼耳教训说：“野蛮人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这就清楚地向我们说明，在比我们落后的时代，为何和如何可以没有资本家的节欲，但不能没有劳动工具。“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⁵⁶⁾，尤其要求那些以占有别人劳动产品为业的人实行节欲。

如果资本家的工人毫不节欲地为资本家劳动，那么，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一下子就如数转化为资本家的节欲行为了。谷物不只是吃掉，而且还用来播种，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葡萄酒保留一段时间进行发酵，这是资本家的节欲！⁽⁵⁷⁾资本家“把生产工具贷给(!)劳动者”，也就是说，把劳动力并入生产工具，使之作为资本来增殖，而不把肥料、挽马、棉花、蒸汽机、铁路等等吃光，或者按照节欲论的理论家的幼稚说法，不把“它们的价值”变成奢侈品等等挥霍掉，这就是资本家

欲这两个词来代替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词……节欲是一个单纯的否定。利润的来源不是节欲，而是用于生产的资本的使用。”(约翰·卡泽诺夫对他编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130页)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面满足于抄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另一面又接受西尼耳的“节欲报酬论”。——庸俗经济学家从来也不会作这种简单的思考：人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做他的相反行动的“节欲”。吃饭是禁食的节欲，行走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闲逸的节欲，闲逸是劳动的节欲等等。这些先生们应当想一想斯宾诺莎的话：规定就是否定³⁶⁵。

(56)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第342[、343]页。

(57) “如果不打算获得追加价值，谁……也不会播种自己的小麦并让它在地里种上一年，或把自己的葡萄酒藏在窖里好多年，而会立即把这些东西或它们的等价物消费掉。”(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原理》，阿·波特尔编，1841年纽约版第133页³⁶⁶)

① 莫里哀喜剧《伪君子》中主人公的名字。——编者注

在掠夺自己的欲望。⁽⁵⁸⁾资本家阶级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严加保守的秘密。总之,世界之所以能生存,无非全靠这个在毗湿奴神前的现代赎罪者资本家的自我修行¹⁷⁵。不仅是积累,就是“单纯保存资本也要求不断地努力克服把资本吃光用尽的诱惑”⁽⁵⁹⁾。所以,单是人道就要求把资本家从诱惑和殉道中解救出来,其办法同不久前解救佐治亚州的种植园主所采取的一样,人们用这种办法使种植园主摆脱了这样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³⁶⁷:是把鞭打黑奴所得的全部纯产品轻而易举地消耗在香槟酒和巴黎的时髦商品上,还是把其中一部分变成追加的土地和黑人。

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中,从经济角度来看,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随着生产和消费的增加,必须把更多的产品再变成新的生产资料。但是,只要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打上使它们转化为资本的社会的印记,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⁶⁰⁾

(58) “资本家如果不把自己的生产工具的价值转化为消费品或奢侈品供自己使用,而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就是资本家对自己的掠夺。”(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概论》1846年巴黎版第36页)

庸俗经济学使用贷给这种委婉的说法,是为了把受工业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工人,与那些向其他资本家借款的工业资本家本身混为一谈。

(59) 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第20页。

(60) “最有助于增加国民资本的几种特殊收入,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地位是不同的,而且它们在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里也是不同的。在社会的初期阶段,同工资和地租相比,利润……是一个不重要的积累源泉……当国民劳动的力量得到显著发展时,利润作为一个积累源泉就非常重要了。”(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16、20、21页)

继马尔萨斯之后在黑利伯里东印度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理查·琼斯，曾用东印度的实例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

因为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农，所以他们的产品、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从来不具有“从别人的收入中节约下来从而要经过一个预先的积累过程的基金的形式”⁽⁶¹⁾。另一方面，在旧制度被英国统治改变最小的省份，一部分纯农产品以贡品或地租形式流到这些豪门手中。他们把这种纯产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为豪门所消费，第二部分由非农业劳动者转化为奢侈品和消费品供他们使用，而第三部分则用来支付非农业劳动者的工资。这些劳动者是占有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手工业者。在这里，虽然没有现代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骑士^①、实行禁欲的资本家介于其间，生产和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仍在照常进行。

4. 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率。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积累的资本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假定 80% 资本化，20% 被消费掉，那么，

(61) 同上，第 36 页及以下几页。

① 指唐·吉珂德。——编者注

积累的资本是 2 400 法郎还是 1 200 法郎,就要看剩余价值是 3 000 法郎还是 1 500 法郎。可见,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况也参与决定积累的量。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情况再作一次扼要的说明,但是这一次仅仅从积累的角度来考察。

我们知道,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⁶²⁾。在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我们总是假定工人得到正常工资,就是说,工人得到的工资同他的劳动力价值相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扣除工资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一点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内,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劳动者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

约·斯·穆勒说:

“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本身一起参加商品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本身一起参加商品的生产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⁶³⁾

但是,假如劳动无须任何花费,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得到它了。因此,工资永远不可能降低到这种不费分文的极限,虽然资本的趋势

(62) 靠提高劳动生产力来加速积累和靠提高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来加速积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经济学家却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例如,李嘉图说:“在不同的社会或同一个社会的不同阶段,资本或使用劳动的手段的积累有快有慢,但无论怎样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最高。”另一个经济学家这样评论道:“假如在这句名言里所说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么这段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是基金,只要它的占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74页)

(63) 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90[、91]页。

是不断接近这一极限。

我常引用的一个 18 世纪著作家、《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声称，英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法国和荷兰的水平，他不过是泄露了英国资本家灵魂深处的秘密。⁽⁶⁴⁾他说：

“如果我们的穷人一味追求奢侈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就必然昂贵……我们只要看看那些工场手工业工人消费大量的奢侈品就够了，例如白兰地酒、杜松子酒、茶叶、砂糖、外国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亚麻布、鼻烟和香烟等等，难道这不令人吃惊吗？”⁽⁶⁵⁾

他还引用了北安普敦郡的一个工厂主的小册子，这位工厂主仰天长叹：

“劳动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法国的穷人劳动繁重，但衣食简单，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咸鱼；他们很少吃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⁶⁶⁾。《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接着说道：“而且他们喝的只是白水或低度酒。因此他们实际上花的钱极少……这种状况在我们这里当然很难达到，但并不是不能达到的，在法国和荷兰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了。”⁽⁶⁷⁾

(64)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 年伦敦版第[43、]44 页。1866 年 12 月和 1867 年 1 月的《泰晤士报》也表达了英国矿山所有者的真实心情。这些先生描绘了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的、令人向往的生活，他们只是要求和得到为他们的“主人”而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比利时的矿工不久就用马谢讷的罢工对这类贺词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枪弹镇压下去的。³⁶⁸

(65) 同上，第[44、]46 页。

(66) 北安普敦郡的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虔诚的欺骗罪，这是出于内心的冲动，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他表面上是在比较英国的和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但是，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本文的引文中，他描写的却是法国的农业工人的状况。

(67) 同上，第 70[、]71 页。

今天,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把全世界的劳动者都投入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种愿望已经大大地落后了。现在不仅是要把英国工资降到欧洲大陆工资的水平,而且是要在或远或近的将来把欧洲的水平降到中国的水平。英国议会的议员斯特普尔顿在《未来的劳动价格》的演说中,向他的选举人展示了这样一种前景:“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工业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⁶⁸⁾

20年后,一位名列贵族的美国人本杰明·汤普森(又称拉姆福德伯爵)遵循着同一博爱主义的路线,使上帝和人都大为满意。他的《论文集》⁽⁶⁹⁾可以说是一本菜谱,其中全是制作各种各样的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贵食品。请看这位哲学家的一张特别成功的菜单:

“大麦5磅,玉米5磅,青鱼 $\frac{3}{4}$ 便士(按整数算为34生丁),醋1便士,胡椒和白菜2便士,盐1便士,总计 $20\frac{3}{4}$ 便士,可以做成供64个人喝的汤,如果粮食的

(68) 1873年9月9日《泰晤士报》。

(69) 本杰明·汤普森《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三卷集,1796—1802年伦敦版。当然,我们这里只涉及到《论文集》的经济学部分。至于汤普森对热等等的研究,这方面的功劳今天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弗·莫·伊登爵士在他所著的《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一书中,热烈称赞拉姆福德氏汤的效用并竭力向贫民习艺所¹⁶⁴的主管人推荐。他以责备的口吻提醒英格兰的工人说:“在苏格兰,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个月都只吃加盐和水的燕麦面和大麦面,而不吃小麦、黑麦和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生活得很舒适”(同上,第1卷第2篇第2章)。在19世纪持这种看法的也不乏其人。例如查理·亨·帕里说:“英格兰的工人不愿吃搀有杂粮的混合面粉。在教育比较好的苏格兰就没有这种偏见。”(《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性》1816年伦敦版第[68、]69页)可是这位帕里也哀叹,“现在(1815年)英格兰工人的境况”比伊登时代(1797年)“差多了”。

价格中常,汤的费用还可以降低到每人合 $\frac{1}{4}$ 便士(不到3生丁)。”

商品掺假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齐头并进,把这位勇敢的汤普森的理想抛到后面去了。(70)

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最初20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竞相把工资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为此,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的钱比最低限度还要低,而用教区救济金付给不足的部分。在这个美好的时期,这些英国的乡绅们还享有为农业劳动规定合法的工资率的特权。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他们的丑态:

“1795年,当地主们在规定斯皮纳姆兰地方的工资的时候,他们已用过午餐,但是他们显然认为劳动者是无须用午餐的……他们决定:当一个8磅11盎司重的面包卖1先令的时候,每人每周的工资应为3先令,在这种面包价格上涨,而没有达到1先令5便士之前,工资可以适当增加。一旦超过了这一价格,工资则应按比例地减少,直到这种面包的价格达到2先令为止,这时每人的食量应比以前减少 $\frac{1}{5}$ 。”(71)

1814年,有一位大租地农场主,治安法官,济贫院主管,农业工资官方调整人A. 贝内特在上院调查委员会上被质问:

“一天劳动的价值和教区给工人的救济金之间是否有某种比例?”著名的贝内特回答说:“有的,每个家庭每周的收入要超过名义工资,补足到每人一个8磅11盎司的圆面包和每人3便士……我们认为一个家庭中每人每周有一个圆面包就足以维持生活了;3便士则用来买衣服;如果教区愿意发给实物,这3

(70) 从最近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食物掺假的报告可以看到,在英国,药物的掺假也不是例外的现象,而成为一种通例。例如,把从伦敦34家药房买来的34个鸦片样品进行化验,发现其中31种掺有面粉、罂粟头、树胶、黏土和沙等物,而且大部分样品连一个吗啡原子也没有。

(71) 乔·路·纽纳姆(律师)《评向议会两院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谷物法的证词》1815年伦敦版第20页注。

便士就可以不发了。这种办法不仅在威尔特郡西部一带普遍采用,我想全国也在普遍采用。”(72)

当时有一位资产阶级著作家喊道:

“这样,租地农场主们在若干年内就把自己同胞中的这个可敬的阶级贬低了,竟然迫使他们以贫民习艺所作为栖身之所……租地农场主甚至阻碍工人积累最必要的消费基金,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73)

目前,掠夺劳动者必要的消费对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对于资本积累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已经由所谓家庭劳动的例子说明了。在下一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更丰富的详细的材料。

虽然在一切产业部门里,由劳动资料[*outillage*]⁽⁷⁴⁾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必须足够供由设备规模决定的一定数量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并不是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假定某一工厂有100个工人,每天劳动8小时,每天共提供800个劳动小时。如果资本家想使这个劳动小时数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50个工人,或者使原有的工人不是劳动8小时而是劳动12小时。在第一种场合,他不仅要在工资上,而且要在劳动资料上追加预付资本。在第二种场合,原有的劳动资料就足够使用了,只是今后要加速运转,积极服务,损耗得快一些,更新日期早一些到来罢了。可见,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

(72) 同上[·,第19、20页]。

(73) 查·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性》1816年伦敦版第77[·,69]页。地主老爷们不仅补偿了他们以英国的名义所进行的反雅各宾战争³⁴⁹中的损失。在18年中,“他们的地租增加了1倍、2倍、3倍,个别的甚至增加了5倍。”(同上,第100、101页)

(74) 我们用“*outillage*”表示劳动资料的总称,包括机器、器具、工具、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线等等。

度而获得的追加劳动,没有预付资本的不变部分预先的相应增加,也能够增加剩余价值和纯产品,即积累的实体。

在采掘工业中,例如在采矿业中,原料不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是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如金属矿石、矿物、煤炭,石头等等。这里的不变资本几乎完全由预付的劳动资料组成,它们不会由于增加劳动而受到影响。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同采矿中所使用的劳动成正比地增加。在这里,正像在生产的第一天一样,人和自然作为财富的原始源泉是共同起作用的。由于劳动力具有弹性,即使不预先增加预付资本,积累的领域也能扩大。

在农业中,不预付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扩大耕地。但是,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么,即使只对土地进行机械性的耕作,也会奇迹般地提高它的肥力。只要原有数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不必增加预付的农具,也可以提高肥力。这又是人对自然的直接作用,这种作用无需追加资本的介入,也会提供积累的追加资金。

最后,在加工厂、制造厂和工厂中,任何追加的劳动消耗都要求相应的追加原料的消耗,而不是要追加劳动资料的消耗。此外,因为采掘工业和农业给加工工业提供了它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原料,所以采掘工业和农业无需追加资本就能生产的追加产品,对于加工工业也是有利的。

总的结论是:资本一旦合并了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财富的原始源泉,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资本赖以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

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

剩余价值既定,代表这一价值的纯产品的量就同所用劳动的生产率相一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纯产品就包含着更多的消费资料和积累资料。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中资本化的那一部分甚至会牺牲构成收入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增加,但不会缩减资本家的消费,因为较小的价值现在实现为较大量的使用价值。

扣除收入,余下的剩余价值作为追加资本发挥作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生活资料变得更便宜,从而也会使劳动者的价格下降。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影响生产资料的效率、数量和价格。因此,新资本本身的进一步积累,不是取决于该资本的绝对价值,而是取决于该资本所掌握的劳动力、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数量。

通常,由于新的追加资本的参与,更完善的组合、方法和工具会首先得到应用。

至于原有资本,它的一部分是劳动资料,这种劳动资料是逐步被消费掉的,而且只是在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才需要再生产出来。但是,这些劳动资料每年都有相当大一部分走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就像衰弱的老年人结束自己的一生一样。于是,在这些劳动资料提供积极服务的时期内所取得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有可能用另一些效率更高的而且相对来说更便宜的工具来代替那些已经损坏的工具。因此,原有工具除了不时有细小的改变以外,它的大部分每年都要彻底更新,因而会成为生产效率更高的工具。

至于原有资本的另一个不变要素,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如果它们是农业的产品,那么它们大部分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再生产出来;如果它们是矿产品,那么它们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再生产出来,等等。因此,任何不会引起劳动资料的改变的工艺上的改良,几乎会同时既影响到追加资本,又影响到原有资本。

化学会发现新的有用物质或已经被使用的物质的新的有用属性,从而会扩大积累资本的投资领域。化学会创造出一套方法,把生产和社会消费的残余物即废物重新投入再生产循环过程,从而在没有资本参与的情况下把这些非价值变成积累的补充要素。

因此,同劳动力所具有的弹性一样,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会使资本具有一种在一定范围内不取决于构成该资本的已有财富量的扩张能力。

毫无疑问,劳动生产力没有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参与也可以发展,但是,资本一旦采取新的形式就可以从这种发展中获得利润。劳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会使资本在它以原有形式执行职能的时期内或多或少地贬值。例如,投在机器上的资本会由于出现更好的同类机器而丧失其价值。但是,一旦竞争使资本家感觉到这种贬值,他就会通过降低工资的办法来弥补所受到的损失。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随着劳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的。因此,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转移到产品上的原有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

例如,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么在一周当中他们会创造出相等的价值。但是,尽管有这种相等,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原始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由于机器劳动的高度的生产率可以纺好几百磅。于是,一个巨大的旧价值的追加额使英国人的产品的价值膨胀了,这些旧价值以新的有

用形式重新出现在产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执行资本的职能。

“在英国,从1780年到1782年三年中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及时提供设备把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⁷⁵⁾新机器并没有使任何一个人从地下冒出来,但是它使相对少量的工人能够用很短的时间把连续三年积压的大量羊毛纺出来,并加进新的价值,而且还以毛纱等等的形式保存它的旧的资本价值。此外,它还引起了羊毛的扩大再生产。

在创造新价值时又保存旧价值,这是劳动的自然属性。因此,随着劳动的生产资料的效能、数量和价值的增长,也就是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造成的积累的加快,劳动在不断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断增大的旧的资本价值保存下来并使其永久化。⁽⁷⁶⁾但是在雇佣劳

(7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0页³⁶⁹。

(76) 古典经济学由于没有对生产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作出正确的分析,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积累这一重要因素。例如李嘉图说:“不管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100万人在工厂里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在他们的劳动持续时间和劳动强度不变时,这样说是对的。但是随着他们的生产力的不断的变化,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和积累的规模也在不断地变化。——在这个问题上,李嘉图试图向让·巴·萨伊阐明使用价值(wealth,即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的区别是白费力气。

萨伊回答说:“李嘉图先生说,应用较好的方法,100万人可以生产出多一两倍的财富,而并不生产更多的价值。李嘉图提出的这一难题,只要我们把生产看做(也必须看做)一种交换,即人们为了取得产品而在其中提供自己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服务的那种交换,就能迎刃而解了。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生产服务才获得世界上的一切产品……因此……在名为生产的那种交换中,我们的生产服务所产生的有用物的量越多,我们就越富,我们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就越大。”(让·巴·萨伊《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68、169页)萨伊竭力想要解决的“难题”(这种“难题”只是对他来说才是存在的)如下:为什么在使用价值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时,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却在减少?

动制度中,劳动的这种自然能力具有一种假象,似乎它是一种会使资本永久化的资本固有的属性;同样,结合劳动的集体力量表现为资本的神秘性质,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不断占有由于资本的增殖力而成为不断再现的奇迹。

不变资本中以劳动资料形式预付的、被亚当·斯密称为“固定资本”的部分,在周期的生产过程中总是用自己的整体执行职能,但只是逐渐地损耗自己,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在它的参

回答是:只要我们把使用价值叫做(“也必须叫做”)交换价值,这个难题就解决了。交换价值无疑是一种以某种方式与交换相联系的东西。因此,我们把生产称为“交换”,劳动和生产资料同产品的交换,同时十分清楚,生产提供的使用价值越多,所得到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多。例如,一个工作日生产的袜子越多,工厂主也就越富有袜子。但是萨伊先生突然想起了供求规律。按照这个规律,更多量的有用物似乎就是更低廉的价格的同义语。因此,他告诉我们,“袜子的价格(它当然与袜子的交换价值毫无关系)就会下降,因为竞争迫使他们(生产者)按照他们在产品上花去的费用出售产品”。但如果资本家按照他在商品上所耗费的价格出售这些商品,那么利润又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不要紧。总之,萨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生产袜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那么,每一个买者现在用同一等价值就不是换一双而是换两双。很不幸,这个结论正是他想驳倒的李嘉图的论点。经过了这样一番苦思之后,他用谦虚的口吻教训马尔萨斯道:“先生,这是个有充分根据的学说,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个学说,便无从解决政治经济学上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特别是解决这样的问题:财富代表价值,但在产品价值下降时,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更为富有。”(同上,第170页)——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于萨伊在“信”中所玩弄的类似手法说道:“这些装腔作势的说法大体上就是萨伊先生喜欢称之为自己的学说的东西,他还力劝马尔萨斯在赫特福德讲授这种学说,就像人们‘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做过的那样。他还说道:‘如果你发现这一切论断中有什么似乎矛盾的地方,就请你考察一下它们所表现的那些事物吧,我敢相信,你会觉得这些论断是十分简单,十分合理的。’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手法,这些论断绝不会表现为独创的或重要的。”(《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10页)

与下依次制造出来的商品中去。不变资本的这个部分的增加是生产力发展的真正的测量器,这种增加使正在使用的整个资本和只用一次就消费掉的那部分资本之间的量的差额越来越大。例如,我们可以把每天都在使用的欧洲铁路的价值和它们在每天的使用过程中所消耗的价值总额做一个比较。实际上,人们创造的这些劳动资料就像自然力如水、蒸汽、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它们提供的无偿服务是与它们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协助生产出来的有用效果成比例的。被现在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相应的资本积累而积累起来。

因为劳动者 A、B、C 等人的过去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总是表现为非劳动者 X 等人的资产,所以资产者和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死劳动的恩惠总是感激涕零,赞扬备至;苏格兰的天才麦克库洛赫甚至认为,过去劳动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通俗的名称就是利息、利润等等。⁽⁷⁷⁾可见,这些智者不是把过去劳动以劳动资料形式给予活劳动的越来越大的帮助归功于创造产品的工人,而是归功于占有产品的资本家。在他们看来,劳动工具和它的资本的性质(现有的社会环境给劳动工具打上了这种性质的印记)是不能分开的,就像在佐治亚州的种植园主的思想中劳动者本身和他的奴隶性质不能分开一样。

最后,在所有同剩余价值分为收入和资本的比例无关但极大地影响积累规模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预付资本的量。

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人数和资本的量是相适应的,虽然它们的

(77) 在西尼耳取得“节欲的报酬”的专利权以前,麦克库洛赫早就取得了“过去劳动的报酬”的专利权。

比例是变动着的。所以，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分为消费基金和用做进一步积累的基金的价值也就增加得越多。此外，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运作得越是有力量。

5. 所谓劳动基金

资本家、他们的共同所有者、他们的下属以及他们的政府每年都要浪费很大一部分年纯产品。此外，他们还把大量可以用于再生产的耐用物品留在消费基金中，他们把大量劳动力用于为个人服务，从而使这些劳动力不能从事生产。因此，财富中资本化的部分绝不会像它本来可以资本化的部分那样大。这部分财富和整个社会财富的量的比例随着剩余价值分割为个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每一变化而变化。这种分割的比例在周围情况的影响下不断变化。这里，我们不去研究这些情况，我们只要了解资本不是社会财富中预定的和固定的部分而是变化的和流动的部分就够了。

至于已经积累的和投入使用的资本，即使它的价值和它由以构成的商品的总量一样已经被规定，它也并不表现为不变的、以划一方式起作用的生产力。相反，我们看到，资本在它的作用的强度、效率和规模上具有很大的弹性。我们已经从生产的观点考察了这一现象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各种不同程度的流通速度也会极大地改变现有资本的作用。经济学家不顾这些事实，他们总是喜欢把资本看成是社会财富中的预定的部分，看成以划一的方式起作用的一定量商品和劳动力。而边沁这个 19 世纪的庸俗的圣哲，却把这种偏见

变成了一种教条⁽⁷⁸⁾。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像他的同胞马丁·塔珀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同样的陈腐不堪的论调,在前者表现为哲学,在后者则表现为诗歌。⁽⁷⁹⁾

关于社会资本的量在任何时候固定不变的教条,不仅和生产的最普遍的现象,如生产的扩张和收缩运动相矛盾,而且它使积累本身变得几乎不可理解⁽⁸⁰⁾。可以说,边沁及其追随者麦克库洛赫、穆勒

(78) 参看耶·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埃·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册第2章]。

(79) 耶利米·边沁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连德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热衷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他不仅是津津乐道,简直是沾沾自喜。著名的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18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平庸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变成评价人的运动和关系的最高准则,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历史时代人的本性的变化。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小资产者、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就被宣布为本身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文学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珀的讲究韵律的散文。边沁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³⁷⁰,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这是一个被捧为天才的资产阶级蠢材。

(80) “政治经济学家们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劳动者看做具有一种划一效能、几乎以不变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那些主张商品是生产的唯一要素的人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加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这等于说,没有生产的预先增长,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长,或者换句话说,任何增长都是不可能的。”(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58、70页)

等都是带着“功利主义”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来鼓吹这个教条的。他们特别喜欢把这个教条应用于资本中和劳动力相交换的部分，这一部分资本被他们不加区别地称为“工资基金”、“劳动基金”。在他们看来，这是社会财富的特殊部分，是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个价值的性质在任何时候都设置了工人阶级竭力想超越但又无法超越的最后界限。既然在雇佣工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总量是这样确定的，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说：每个参加分配的人得到的部分太小，这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了；归根结底，他们的贫困不是由社会造成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为生产者的消费所规定的界限只有在这个制度特有的条件下才是“自然”的，就像鞭子的作用只有在奴隶制的条件下才是对劳动的“自然”刺激一样。实际上，把生产者应得的份额限制在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部分，把他的产品的剩余部分交给资本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同样，归资本家所得的纯产品也被他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而劳动者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靠侵占非劳动者的消费基金来增加自己的消费基金，这也是这个制度的本性。西斯蒙第说：

“富人向穷人发号施令……因为年产品是由他自己来分配的，他把一切被他称为收入的东西留做自己消费，而把一切被他称为资本的东西让给穷人，以便使后者为他创造收入。”⁽⁸¹⁾（应读做：以便使后者为他创造追加收入。）

约·斯·穆勒说：

“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不愉快和越艰苦，

(81)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版第1卷第107、108页。

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82)

因此,首先应该证明,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虽然刚刚出现不久,但却是社会生产的不变的和“自然”的方式。但是,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工资基金”由社会财富的量或社会资本的量预定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社会资本不过是社会财富的变化的和流动的部分,因此,仅仅作为社会资本一个部分的工资基金不可能是社会财富的固定的和预定的部分;另一方面,工资基金的相对量取决于社会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这个比例在积累过程中并不是不变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在以后各章中我们还要加以详细的说明。)

工资基金的量固定不变的学说会导致荒谬的同义反复,在这一点上福塞特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

他说:

“一个国家的流动资本就是它的维持劳动的基金。因此,要想计算出每个工人所得到的平均工资,只要简单地用工人人口的数目去除这个资本就行了。”(83)

这就是说,我们先算出实际付给的个人工资的总额,然后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样加起来的结果就是“工资基金”的价值。我们接着把这个总额除以全部工人人口的人数,而不是除以雇用的工人人数,就可以发现平均每个工人能得到多少。多么狡猾的手法!

福塞特先生又一口气地说下去:

(82)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83) 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120页。

“英国每年所积累的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维持我们本国的工业；另一部分则输往国外…… 用在本国工业上的那一部分占这个国家每年积累的财富的不大的一部分。”⁽⁸⁴⁾

由此可见，逐年都在增长的纯产品的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国外资本化的。因此，这部分产品就从英国工人手中毫无补偿地被夺走了。但是同这个额外资本一起输出的，不是偶尔还有上帝和边沁分配给英国劳动的很大一部分基金吗？⁽⁸⁵⁾

(84) 同上，第 123、122 页。

(85) 可以说，每年从英国输出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以移民形式输出的工人。不过本文所指的并不是移民的特有财产³⁷¹，这些移民中租地农民的儿子和高等阶层的成员占很大部分。每年为了获得利息而输往国外的英国额外资本同每年的积累的比率，要比每年的移民同每年人口的增长的比率大得多。

第二十五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 资本构成不变，积累的增长导致工资率的提高

现在我们来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条件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中所起的变化。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角度来看。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可变部分(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例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来决定的。前一种资本构成是**价值构成**，后一种资本构成是**技术构成**。最后，为了表明二者之间的密切的相互关系，我们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因而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一般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总是指资本的有机构成。

投入同一生产部门并在许多资本家手中执行职能的互相独立的许多资本在构成上多少不同,但是,它们的个别的构成的平均数就是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各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平均构成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所有这些平均构成的平均数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后面的研究所涉及的归根到底就是这种构成。

在做出这些预备性的说明以后,让我们再回到资本主义积累。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部分的增长。换句话说:一部分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必须作为工资预付出去。因此,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对劳动的需要就会和积累齐头并进,资本的可变部分就至少会按照总资本增长的同一比例增长。

在这种条件下,积累的不断增长迟早必然导致工资的逐步提高。因为每年结出的这种果实即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其次,这种年增殖额本身会随着职能资本的膨胀而增长;最后,致富欲在特别有利的情况的刺激下,例如,在国外开辟了新的市场、在国内开辟了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就会把较大份额的纯产品突然投入再生产基金,使再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年就业的雇佣工人人数要比前一年多,在一定的時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率必然会发生上升的运动。在整个15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不断地听到这方面的怨言。

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性质。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现同一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制度;同样,积累只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这种关系:一方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方是更多的雇佣工人。资本的再生产包含了它的主要增殖手段即劳动力的再生

产。因此,资本的积累同时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86)

亚·斯密、李嘉图等人这样理解这种表面上相互对立的两个用语的同一性,以致在他们看来资本的积累不过是纯产品中整个资本化的部分由生产劳动者消费或转化成追加的无产者。

早在1696年,约翰·贝勒斯就说过:

“假设某人有10万英亩土地,有10万镑货币和10万头牲畜,而没有一个劳动者,那么这个富人自己还不就是劳动者?既然劳动者使人变富,那劳动者越多,富人也就越多……穷人的劳动就是富人的财源。”(87)

同样,贝尔纳德·曼德维尔在18世纪初也曾说过:

“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因为谁去劳动呢?……应当使劳动者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忍饥挨饿和异常的勤劳来提高自己的地位,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但是不能否认,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做法;但是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

(86)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在群众受压迫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无产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31页)无产者在政治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贝魁尔对这种人的称呼)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原始森林中的病弱的无产者”只是罗雪尔的奇妙的幻想。原始森林的居民是原始森林的所有主,就像猩猩一样毫不客气地把原始森林看做自己的财产。可见,他不是无产者。只有在原始森林剥削他,而不是他剥削原始森林时,他才是无产者。至于他的健康状况,那么,不仅完全可以同现代无产者的健康状况相比,而且也可以同患梅毒的和患瘰疬病的上流人士的健康状况相比。不过,威廉·罗雪尔先生所说的“原始森林”,大概是指他的家乡吕讷堡吧。

(87) 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页。

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的收入……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但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卖苦力的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他们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垂头丧气,或者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傲慢不逊,好逸恶劳……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此外,他们还是征募海陆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然产品都不可能被用来谋利。要使社会〈当然是非劳动者的社会〉幸福,使人民自己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88)

曼德维尔这个勇敢的和头脑清晰的著作家还没有了解:积累的机制,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生命力,从而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变成了自己的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奴隶。

弗·莫·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谈到这种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公认的必要条件之一的从属关系,他说:

“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但是一些不劳动的人却随心所欲地支配着勤劳的产品。这些所有主所以这样得天独厚,仅仅归因于文明和既定的秩序:他们纯粹是市民制度的创造物”。

伊登应当问一下:谁创造了市民制度?他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

(88) 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第212、213、328页附注)“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他是指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和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对于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及政界显贵〉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54页)

发,不是把法律看做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做法律的产物。兰盖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³⁷²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拼凑的虚幻的“法的精神”推翻了。现在我们让伊登继续说下去:

“因为这种制度〈市民制度〉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还可以用别种方法占有劳动的果实。拥有独立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拥有财产,几乎完全是靠别人的劳动,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能力绝不比别人强;富人不同于穷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货币,而在于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对穷人适宜的,不是使他们处于卑贱的或奴隶般的地位,而是使他们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对拥有财产的人来说,他们则应当对于为他们劳动的人拥有充分的影响和权威……每一个懂得人类天性的人都承认,这样一种从属关系是劳动者自身安乐所必需的。”⁽⁸⁹⁾

顺便提一下,在亚当·斯密的学生中,只有弗·莫·伊登爵士在18世纪写过一部杰出的著作。⁽⁹⁰⁾

(89) 伊登《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1797年伦敦版第1卷第1篇第1章[第1、2页]和序言[第20页]。

(90) 人们可能会举出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来反对我的看法。但是马尔萨斯的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富兰克林、华莱士、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等人的原著的小学生般的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点作者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幼稚的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的理念引起的。法国革命在海峡彼岸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彩。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成功大为惊奇,于是不断把一些表面地拼凑起来的材料塞进原来的模型中去。——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以及像托马斯·莫尔、坦普尔、苏利、德·维特、诺思、罗、范德林特、康替龙、富兰克林一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获得巨大成就的,是像配第、巴尔本、曼德维尔、魁

在以上所假定的积累条件下——这是对工人最合适的积累条件

奈一类的医生。甚至在 18 世纪中叶，一位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牧师塔克尔先生，还认为有必要为自己这样一个圣职人员参与玛门^①的勾当而辩解。新教牧师们打着“人口原理”的旗号开始进入政治经济学并在这个领域大量繁殖。除了威尼斯的僧侣奥特斯这位有创见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数人口学博士都是新教牧师，例如布鲁克纳，他 1767 年在莱顿出版的《动物界论》提出了完整的现代人口理论，还有华莱士“牧师”、唐森“牧师”、马尔萨斯“牧师”及其学生托·查默斯大牧师，马尔萨斯虽然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⁸的牧师，但他作为剑桥大学的研究员曾立过终身不婚的誓言：“已婚者不得成为本委员会会员。谁一旦娶妻，即不再为会员。”（《剑桥大学委员会报告》第 172 页）而一般的新教牧师在摆脱了天主教终身不婚的束缚以后，则要求把实现圣经的“要生养众多”³⁷³的圣诫当做自己的特殊使命，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向工人宣讲“人口原理”。他们几乎垄断了这个学说的微妙之处：经济学上仿造出来的原罪；亚当的苹果；“迫不及待的情欲”；唐森牧师风趣地称之为“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钝的各种障碍”。配第，似乎预料到了这些渎职的家伙的所作所为，他说道：“教士最守苦行时，宗教最繁荣，正如在律师饿死的地方，法律最昌明一样”。因此，配第劝告新教的牧师们：如果你们不愿再追随使徒保罗，不愿终身不婚来禁欲，至少不要生出多于现有牧师俸禄所能吸收的牧师，也就是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 12 000 份牧师俸禄的时候，要是生出 24 000 个牧师，那是很危险的，因为 12 000 个无以为生的人总要设法自谋生计。为此他们走向民间，向人们游说：那 12 000 个受俸牧师在毒害人们的灵魂，使这些灵魂饿死，把他们引入歧途而无法升入天国。”（配第《赋税论》1667 年伦敦版第 57 页）同配第一样，亚当·斯密也被牧师所憎恶，这可以从一本名为《给法学博士亚·斯密的一封信，论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一位称做基督徒的人著，1784 年牛津第 4 版）的著作中看出来，这本小册子的作者诺里奇的高教会派主教霍恩博士责难亚·斯密，因为斯密发表了一封致斯特拉恩先生的信，他在信中要使自己的“朋友大卫（即休谟）不朽”，因为斯密向公众讲述，“休谟在他临终的床上以读琉善的作品和玩惠斯特牌而自娱”，甚至胆敢写道：“无论在休谟生前或死后，我始终认为，他在人类天性的弱点所允许的范围内，接近了一个理想的全智全德的人”。这位主教

① 玛门，《圣经》中的财神，贪欲之神。——编者注

了，——他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说的“安适和宽松的”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不是更为加强，而只是更为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资本化的纯产品中，会有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好的饮食，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等，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待遇高一些，食物丰富一些，衣服体面一些，特有财产³⁷¹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制的锁链，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劳动制的锁链。由于资本积累而带来的劳动价格上升的运动不过表明，资本家给雇佣工人戴上的、雇佣工人不停地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愤怒地叫喊道：“先生，您向我们把一个不可救药地反对一切叫做宗教的东西，并且竭尽全力甚至要使宗教这个名称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的性格和品行，描绘成全智全德的，您这样做合适吗？……但是，热爱真理的朋友们，不要气馁，无神论是长久不了的……您（亚当·斯密）抱着残忍的恶意，要在全国宣扬无神论（主要是通过《道德情操论》）……博士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诡计！您想得倒好，但是这一次却失算了。您想用大卫·休谟先生的例子来使我们相信，无神论对于精神沮丧的人来说是唯一的兴奋剂，是对付死亡恐怖的唯一解毒剂……您去笑那废墟中的巴比伦吧！去祝贺那无情的恶魔法老吧？”（同上，第8、17、21、22页）另一个高教会的正统派，一个经常听亚·斯密讲课的人，在亚·斯密去世时告诉我们：“斯密对休谟的友谊妨碍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相信休谟的每一句话。即使休谟对他说，月亮是一块绿色的干酪，他也会相信。所以，休谟说没有上帝，没有奇迹，他也同样相信……斯密在政治原则上接近于共和主义。”（詹姆斯·安德森《蜜蜂》1791—1793年爱丁堡版）最后，托·查默斯“牧师”曾怀疑，亚·斯密故意捏造出“非生产劳动者”这个范畴用来指新教牧师，虽然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劳动。³⁷⁴

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经济学争论中，人们忘掉了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这里，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直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从而达到发财致富。生产剩余价值，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做资本来保存，把自身的等价物当做资本再生产出来，此外还要为资本家创造出消费基金和资本的追加额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必然包含着劳动力的不断再出卖，资本家财富的扩大再生产。工资按其本性来说，总是要求推动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因此，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相对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损害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度。

在我们的条件下，工资率由于资本的增长大于供给的劳动的增长而提高。以下两种情况二者必居其一：

一种情况是，工资继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因为，亚·斯密说过，

“即使利润下降，资本还是能增长，甚至增长得比以前还要快…… 利润小的大资本，一般也比利润小的资本增长得快。”⁽⁹¹⁾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工人的无酬劳动的减少绝不会妨碍资本统治范围的扩大。相反，这种运动使劳动者习惯于把他的主人的发财致富当做自己唯一能够得救的机会。另一种情况是，工资

(91) 亚·斯密《国富论》第1卷第189页。

的逐步提高使利润的刺激迟钝,从而减缓了积累的进程,积累减少了。但是这种减少本身使积累减少的最初原因,即资本和劳动供给相比而言的过剩也消失了。从那时起,工资率就会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这个水平可能高于、等于或低于工资提高前的水平。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会自行排除它有时造成的障碍。

我们必须充分地理解积累过程中的资本的运动和工资率所发生的相应的周期变化之间的联系。

有时是积累的加速所引起的资本过剩使劳动的供给相对不足,从而导致劳动价格的提高。有时是积累的减缓使劳动的供给相对过剩,从而使劳动的价格下降。

可见,积累过程中的资本的扩张和收缩的运动交替地引起劳动供给的相对不足和过剩,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并不是工人人口数量的绝对或相对减少引起资本过剩,在第二种情况下,并不是工人人口数量的绝对或相对增加引起资本不足。

我们在工业周期的变迁中可以看到完全类似的现象。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商品价格普遍降低,这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高。相反,在信心恢复的时候,商品的价格普遍提高,这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下降,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的实际价值并没有丝毫的变化。但是,以通货学派¹⁰⁸⁽⁹²⁾闻名的英国学派歪曲了这些事实。他们认为价格提高是由于货币太多,价格下降是由于货币太少。同样,经济学家们倒果为因,他们力图用工人人口提供的人手

(92) 关于这个学派的诡辩,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65页及以下几页。³⁷⁵

太多和太少的运动去解释积累的周期变化。

这样，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就变成了所谓的“自然人口规律”，它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

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有酬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绝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项，即一方为资本量和另一方为工人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而归根到底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必须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追加资本，那么，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这样一点，即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减缓，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永远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使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得到保证。⁽⁹³⁾

在劳动者的存在只是为了用自己创造的财富来增加别人的财富的地方，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像人在宗教世界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受他自己双手

(93) “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就业界限是相同的，那就是雇主能够从他们的劳动产品中榨取一定的利润……如果工资提高，使雇主的利润降低到平均利润以下，那么雇主就会不再雇用他们，或者只有在他们答应降低工资的条件下才会雇用他们。”（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240页）

的产物的支配。(94)

2. 资本构成在积累的增进中的一系列变化和资本中与劳动力相交换的那一部分的相对减少

按照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见解,引起工资提高的,既不是社会财富的现有规模,也不是已经取得的资本的绝对量,而仅仅是积累的不断增长和它的增长速度。(95)因此,首先我们必须阐明这个过程实现的条件。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亚·斯密说:

“引起工资提高的原因,即资本的增长,也促使劳动生产能力提高,使较小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较大量的产品。”(96)

但这个结果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呢?是通过生产方式的一系

(94) “如果回头来看看我们在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么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劳动者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孤立国家》1863年罗斯托克版第2卷第2部分第5、6页)杜能的功绩在于提出了问题。他的回答却十分幼稚。

(95) 亚·斯密《国富论》第1卷第8章。

(96) 同上,加尔涅译,第1卷第177页。

列变化,使一定量的劳动力能够推动数量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对所使用的劳动力来说,生产资料在这种增长中起着双重作用。一些生产资料,例如机器、建筑物、炼铁炉、排水装置、矿物质肥料等等在数量、规模、总量和效率上增长了,使劳动有了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另一些生产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生长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在一定时间内消费的生产资料也增多了。

在大工业诞生时期,有人在英国发明了一种利用焦炭把铸铁变成锻铁的方法。这种被称为搅炼法的工艺就是在具有特殊构造的高炉中精炼生铁,它使高炉的规模变得非常巨大,导致了鼓风装置等等的使用,最后,它使同量劳动所推动的劳动资料和原料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以致铁很快就有了相当充足和廉价的供应,从而在许多用途上代替了石头和木材。因为铁和煤是现代工业的有力的杠杆,所以怎么评价这一革新的重要意义也不算过分。

但是,搅炼工,即从事生铁精炼的工人是用手工操作的,所以他们能够生产的炉量仍然受到他们个人能力的限制。正是这种限制阻碍了冶金工业自 1780 年搅炼法发明以来所取得的令人惊异的飞跃发展。

英国工程师的一家机关报《工程学》报说:

“事实上,手工操作的搅炼法的陈旧工艺不过是野蛮的残余……目前,我国工业的发展趋向是要在各个不同生产阶段对越来越多的原料进行加工。所以,几乎每年我们都可以看到更庞大的高炉、更沉重的气锤、更强大的锻压机以及在许多金属工业部门使用的更巨大的工具出现。在这种普遍的增长——生产资料比使用的劳动的相对增长——中,搅炼工艺几乎停滞不前,而现在则成了工业运动的不可容忍的障碍……因此,在所有大工厂,我们正在用自动转炉来代替这种工艺。自动转炉的巨大炉量完全是手工劳动所力不能及的。”⁽⁹⁷⁾

(97) 《工程学》报 1874 年 6 月 12 日。

因此,搅炼法在完成了炼铁工业革命并引起了劳动资料和一定量劳动推动的原料总量极大扩张以后,在积累过程中成为一种经济上的障碍,它限制了物质生产资料比所使用的劳动进一步相对增长。现在,人们正在通过能够消除这种限制的新工艺来摆脱上述障碍。这就是由积累而引起的一切发现和发明的历史,我们在回顾现代生产从它的起源到现在的进程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98)

可见,在积累的增进中,不仅是资本的各种现实要素在量上同时增长,这个增进所引起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还表现为质的变化,表现为资本技术构成的逐步变化:资本的客观因素比主观因素在量上所占的比例日益相对增大,也就是说,劳动资料和原料的总量比推动这些劳动资料和原料的必要的劳动力的总量日益相对增加。因此,随着资本的增长使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就会同资本自身的量成比例地减少。

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些变化,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反映在资本的不变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部分的逐步增加上。例如,在积累停滞的时期,50%的资本价值转化为生产资料,50%转化为劳动。在积累增长比较快的时期,80%的资本价值花费在生产资料上,只有20%花费在劳动上。显然,并不是整个资本而只是资本的可变部分与劳动力相交换,并形成分配给雇佣工人的基金。

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像前面已经说明的),不管我们比较的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只代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即预付资本的不变部分的那个价格

(98) 见本书第四篇。

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预付资本的可变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

不过，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资本价值构成的这种变化，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本技术构成上的变化。例如，目前投入纺纱业的资本价值中，不变资本占 $\frac{7}{8}$ ，可变资本占 $\frac{1}{8}$ ，而在18世纪初不变资本占 $\frac{1}{2}$ ，可变资本占 $\frac{1}{2}$ ，但是，目前一个纺纱工在一定的时间内所消耗的棉花、纱锭等等的量却比18世纪初要多几百倍。这里的原因就是：这种劳动能力的增长不仅使较少量劳动所推动的劳动资料和原料增大，而且也减少了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大部分产品的价值。

因此，这些产品的价值并不同它们的量按同一比例增长，因而资本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的相对增长大大低于生产资料的量比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相对增长。前一个运动以较慢的速度跟随着后一个运动。

最后，为了避免发生误解，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绝不排斥它的绝对的增加。假定资本价值起初分为 $\frac{1}{2}$ 的不变资本和 $\frac{1}{2}$ 的可变资本，后来可变部分只占资本价值的 $\frac{1}{5}$ 。在发生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原有资本价值例如6 000法郎增加到18 000法郎，那么，可变部分也就增加 $\frac{1}{5}$ 。这个可变部分从3 000法郎增加到3 600法郎。但是，要使对劳动的需求提高20%，以前只需积累增加20%就够了，现在要产生同样的效果则要求积累增加为三倍。

协作、工场手工业分工、机器等等，总之，能够使集体劳动能力得到飞跃发展的方法，只有在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大的地方才能被引进，

随着生产的扩大,这些方法也得到发展。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操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在私人企业主手中积累的资本的量。因此,一定的预先积累⁽⁹⁹⁾(我们以后再研究它的起源)就成了现代工业,即我们称之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结合和技术工艺的整体起点。但是,现代工业用以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的一切方法也就是增加剩余价值或纯产品,补充积累源泉,用资本来生产资本的方法。因此,如果说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在积累的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够确立,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反过来又会加速积累,而积累的进一步增长则使企业的规模能够扩大,从而又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等等。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小。

构成社会资本的每一单个资本最初代表生产资料和维持劳动的资料在一个资本家手中的某种积聚,随着单个资本的积累,这种积聚也就扩大。因此,积累在增大财富的再生产要素的同时也就使这些要素在私人企业主手中的积聚不断扩大。然而,这种作为积累的必然结果的积聚只能在比较狭隘的界限内运动。

社会资本分配在不同生产领域,在那里采取许多单个资本的形式。这些单个资本各自经历自己的积累的运动,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运动。这个运动首先生产出财富构成要素的追加额,然后把这个追加额并入已经结合、因而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构成要素的整体。每一个这样的整体,每一个资本,都与它已经达到的量和它的再生产

(99) “如果没有资本的预先积累,劳动能力就不能得到这种扩大。”(亚·斯密《国富论》)

力的程度相应地由于这些追加要素而增大了财富,从而发挥出固有的活力,通过扩大这种活力来保持自己的独特存在并限制其他资本的活动领域。积聚的运动不仅和积累一样分散在同样多的点上,而且正因为每一个资本都作为**相对的积聚点**执行职能,社会资本分裂为许多互相独立的资本的情形就加强了。

因为积累增大各单个资本的量,使社会资本也得到了同量的增长,所以,如果没有社会资本即用于再生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增长,所有这些资本平均代表的相对积聚就不能增大。这就是积聚的第一个限制,因为积聚不过是积累的必然结果。

不仅如此,社会资本的积累不仅是各单个资本逐步增长的结果,而且也是它们的数量增多的结果:或者是闲置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者是从原资本分出枝杈而成为独立的根系,最后,慢慢积累起来的大资本在一定时刻分裂为好几个不同的资本,例如资本家家庭内部分遗产的时候就是如此。因此,积聚既被新资本的形成所中断又被旧资本的分裂所中断。

因此,社会积累的运动一方面表现为财富的再生产要素在私人企业主手中的不断增大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相对的积累和积聚点的分散和增加,而这些点在它们各自的轨道上互相排斥。

社会资本分裂为许多单个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互相排斥运动,在经济发展的一定点上,会遭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对立运动的阻碍。这个对立的运动不再是与积累等同的积聚,而是根本不同的过程,是把不同的积累和积聚点结合在一起的吸引,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数量较多的资本合并为数量较少的资本,总之,这是本来意义的集中。

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在这里我们就不深入

研究了。我们只做一些简单扼要的论述。

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因此，大资本战胜小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达，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就越高。因此，较小的资本就涌向那些大工业还没有或只是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介入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介入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归于消灭，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积累和生产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动因，也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巨大企业，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能力。因此，现在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虽然集中运动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财富已经达到的数量和经济机制的优越程度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并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这正是集中与积聚特别不同的地方，因为积聚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必然结果。集中只要求改变现有资本的分配，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

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长,是因为它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在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中,只有在投入的全部资本仅仅成为唯一的个别资本时,集中才算达到极限。在一定的社会里,只有当全国的资本仅仅成为唯一的资本家手中的唯一资本,或者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唯一资本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不论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积累的结果,还是集中的结果;不论集中是通过暴力方法吞并,——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强大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由于并入其他资本的瓦解的部分而增大了财富,——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温和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融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集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总之,对于使分散的旧式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始终是起点。

不过很明显,积累,即由螺旋形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首先只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不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资本的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这样扩大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通过集中而迅速形成的大资本,同其他资本一样再生产,但速度更快,从而又成为社会积累的强有力的动因。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积累的增进时,已经把集中产生的作用包括在内。

由积累提供的追加资本⁽¹⁰⁰⁾，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等等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旧资本一旦达到全部更新的时期，就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产出来，在这种形式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力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劳动资料和原料。经历这种技术变革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增长，这种变革所引起的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明显。

可见，一方面，在由于集中而加剧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地吸引劳动者。另一方面，旧资本周期地经历的技术变革和相应的价值构成的变化使它越来越多地排斥以前被它所吸引的劳动者。

3.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 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资本对劳动的绝对需求与资本的绝对量无关，而是与资本中仅仅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可变部分的绝对量有关。资本对劳动的相对需求，即资本的量本身和它吸收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的相对量。我们刚才已经说明，积累会使社会资本增大，但同时又会缩小资本的可变部分的相对量，从而会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现在我们要问，这一运动对雇佣工人阶级的命运有什么影响呢？

很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资本的可变部分在积累过程中的减少是如何影响这一部分的绝对量的，

(100) 见本书第七篇第二十四章。

从而也就是，对劳动的相对需求的减少是如何影响对劳动的绝对需求或者现实需求的。

只要资本的量没有变化，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每一次相对减少同时就是它的绝对减少。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增加预付资本价值的总额来抵消这种相对减少。因此，充当工资基金的可变部分的减少，同它的相对量的减少成正比例，同总资本的的同时的增加则成反比例。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种组合：

第一，如果可变资本的相对量的减少同总资本的增加成反比例，那么工资基金的绝对量就不变。例如，无论它是 1 000 法郎资本的 $\frac{2}{5}$ ，还是 2 000 法郎资本的 $\frac{1}{5}$ ，它都是 400 法郎。

第二，如果可变资本的相对量减少的程度大于总资本量增加的程度，那么，尽管预付资本价值绝对增加了，但工资基金绝对减少。

第三，如果可变资本的相对量减少的程度小于总资本量增加的程度，那么，尽管工资基金的相对量减少了，但却会绝对增加。

从社会积累的观点来看，这些不同的组合会对形式发生影响，会对分配在不同生产领域中的各个社会资本所依次经历的（常常是不同方向的）各个阶段发生影响，也会对不同生产领域同时代表的各种不同的情况发生影响。我们在大工业那一章中考察了运动的这两个方面。

我们记得，例如在那些工厂里，同样数量的工人足以推动数量越来越多的原料和劳动资料。在那里，仅仅由于资本的不变部分的扩大而引起的资本增长，虽然会减少可变资本的相对量或被剥削的劳动力的相对量，但是并不改变可变资本的绝对量。

有些大的工业部门的雇佣工人人数绝对减少，而其他部门的雇佣工人人数却同时增加，虽然所有这些部门的投入资本都同样增长，

它们的生产率都同样得到了提高。这里以英国的情况为例：从 1851 年到 1861 年，从事农业的人员从 2 011 417 人减少到 1 924 110 人；从事毛织业的人员从 102 714 人减少到 79 242 人；丝织厂人员从 111 940 人减少到 101 678 人，而在同一时期从事棉纺织业的人员从 371 777 人增加到 456 646 人；从事制铁业的人员从 68 053 人增加到 125 711 人。⁽¹⁰¹⁾

最后，至于说到社会积累的另一方面，即社会积累的增进在同一工业部门中交替地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减少或停滞不变的情况，棉纺织业变迁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

如果我们考察若干年，例如 10 年的时期，那么，我们一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积累的增进，被剥削的工人人数也增多了，虽然单独地看各年，它们对于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增多起着程度极不相同的作用，某些年甚至没有起任何作用。因此，我们在一些工业中可以看到的那种与投入资本的巨大增长同时发生的雇佣工人人口绝对人数的停滞或减少，必然会由于另一些工业雇用的劳动力的增加最终战胜了相反方向的运动而得到更多的抵偿。但是，这种结果只有在动荡不定的环境和越来越难于实现的条件下方才能够得到。

在积累和劳动能力同时扩大的过程中，可变资本部分的量的相对减少是累进的。假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最初是 1:1，后来会变成 2:1、3:1、5:1、6:1 等等，因而总资本价值中用于预付生产资料的部分递增为 $\frac{2}{3}$ 、 $\frac{3}{4}$ 、 $\frac{5}{6}$ 、 $\frac{6}{7}$ 等等，但是，用于预付劳动力的部分只是 $\frac{1}{3}$ 、 $\frac{1}{4}$ 、 $\frac{1}{6}$ 、 $\frac{1}{7}$ 等等。虽然资本的总量会按照相同的顺序增长到

(101) 《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1 年》1863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36—39 页。

3倍、4倍、6倍、7倍等等，但是，这并不足以增加被雇用的工人人数。要雇用的工人人数增加，社会资本总量增长的比例的指数就必须大于工资基金相对量减少的比例的指数。

因此，工资基金的相对量下降得越低，社会资本必须增长得越快。社会资本的增长本身会成为新的技术变革的源泉，而这些技术变革又会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于是机制又重新开始发生作用。

我们在大工业那一章中详细地考察了那些使雇佣工人队伍不顾对抗性趋势而随着积累的增进不断扩大的原因。我们在这里简要地谈一谈直接与我们的题目有关的问题。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会使某些大工业部门雇用的工人人数不仅相对减少，而且往往是绝对减少，同时还会使这些部门廉价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因此，这些部门会刺激那些从它们那里得到生产资料或者向它们提供原料、工具等等的其他工业部门；使其他工业部门的规模不断扩大。如果在这些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手工劳动，那么对这些部门的劳动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很大的。1861年的《英国人口调查》的编纂官员说：“工人人数的增长一般在尚未卓有成效地引进机器的那些工业部门中达到最高限量。”⁽¹⁰²⁾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所有这些工业同样经历了使它们能够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技术变革。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生产部门为劳动提供了补充市场。这些新部门在出现时所采取的形式有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或者，最后是大工业。在前两种场合，它们必须转化为机器生产；在最后一种场合，资本的集中使这些部门有可能建立起一支如此巨大的产业军，人们不禁为之目瞪口呆，似乎它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一样。但是，不管

(102) 同上，第36页。

这样雇用的工人人数有多大，他们的相对人数同投入企业的资本数量相比，一开始就显得微不足道，一旦这些工业部门扎下根以后，他们的相对人数就会立即减少。

最后，有这样一些间歇时期，那时技术变革不太明显，积累则更多地表现为在已经达到的新的技术基础上的量的扩张运动。在这种场合，不管资本的实际构成如何，对劳动的需求按照资本增长的同一比例而增加的规律，就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重新开始发生作用。但是，在资本所吸引的工人人数达到最大限度的同时，产品会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只要这些产品的销路稍遇到一点障碍，社会机制就会停滞下来；资本就会立即以最大的规模和最粗暴的方式排斥劳动，紊乱本身迫使资本家要以最大的努力节约劳动。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细小的改良，可以说，就在这种高压下集中起来了；它们体现为使全部大的生产领域里的资本构成发生革命的技术变革。美国的南北战争曾促使英国的纺纱业者用更强大的机器来装备自己的工厂，并减少工厂中劳动者的人数。最后，积累最能促进对劳动的需求的那些间歇时期的长度会逐渐缩短。

因此，一旦机器工业占了优势，积累的增进就会成倍地加大那些趋向于减少可变资本相对量的力量，并且减弱那些趋向于增加可变资本绝对量的力量。可变资本随着社会资本（可变资本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增长的比例越来越小。⁽¹⁰³⁾

(103) 这种比例越来越小的增长的明显例子，是生产花布的工厂的变动。我们比较下述数字：在英国，这类工业 1851 年出口 577 687 229 码（1 码等于 0.914 米），价值 10 259 621 镑，而在 1861 年出口 828 873 922 码，价值 14 211 572 镑。雇佣工人人数，1851 年为 12 098，1861 年只增加到 12 556，也就是只增加 458 人，或者说，在整整十年时期内约增加 4%。

对劳动的实际需求,不仅要由已经投入周转的可变资本的量来调节,而且还要由可变资本不断增长的平均量来调节,劳动的供给只要紧随这一运动,就是正常的。但是,一旦可变资本的增长平均降到较低的水平,那时,原来正常的劳动的供给就成了不正常的、多余的供给,于是工人阶级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对资本的增殖来说就不再是必要的,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既然这种情况还会随着积累的增长过程不断反复出现,积累就会带来不断增长的过剩人口。

因此,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以及对劳动的相对需求相应减少的规律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可变资本按越来越小的比例的绝对增长,对劳动的需求按越来越小的比例的绝对增长,最后,作为补充的是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我们说:“相对的”,因为这种过剩不是工人人口超过正在积累的财富的界限的实际增长的结果,而相反是社会资本加速增长的结果,这种加速增长使社会资本不再需要它的相当大部分的工人。既然这种过剩人口只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暂时需要相对而言才存在,它就可以突然膨胀,也可以突然收缩。

因此,雇佣工人阶级生产出资本的积累并随着它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同时它自身就生产出解雇自己或者把自己变成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并且同它的特殊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人口规律。实际上,每一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都有它特有的人口规律,这一规律只适用于它,同它一起存亡,因此只具有历史意义。抽象不变的人口规律只对植物和动物来说才存在,而且还只有在这些植物和动物不受到人的影响的情况下才存在。

古典学派的某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与其说理解,不如说是感觉到了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和这一规律对雇佣工人阶级状况所产

生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最大的功绩应归于约翰·巴顿,虽然他本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混为一谈,把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为一谈。他在《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一书中说:

“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确实都是一样的话,那么由此的确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业工人的人数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但是这种假定一点也不符合现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越来越大。英国生产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等于印度生产同样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的一百倍,也许是一千倍。而流动资本的份额则是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如果把一年的全部积蓄都加到固定资本上去,也不会使劳动的需求有任何增长。”⁽¹⁰⁴⁾

李嘉图虽然赞同巴顿的一般观点,但是,他对上面引用的这段话提出了以下不同意见:

“资本的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引起对劳动的更大的需求,这是很难理解的。人们至多可以说,这种需求会相对减少。”⁽¹⁰⁵⁾

他还说:

“地主和资本家赖以提取收入的基金会增大,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赖以生存的基金会减少。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同一原因(即用机器来代替人力劳动)既会使国家纯收入增加,同时又会使人口过剩,从而使劳动者状况恶化。”⁽¹⁰⁶⁾

理查·琼斯则宣布:

(104) 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16、17页。

(105)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480页[注]。

(106) 同上,第469页。

“用来维持劳动的资本额可以不依赖于资本总额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资本本身越来越雄厚，就业量的大波动以及大贫困变得越来越频繁。”⁽¹⁰⁷⁾

让我再引用拉姆赛的话：

“对劳动的需求的提高……并不是同总资本成比例的……因此，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用于再生产的国民资本的每次增加，对劳动者命运的影响会越来越小。”⁽¹⁰⁸⁾

因此，如果说，积累，即财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发展，必然会生产出过剩的工人人口，那么，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成为处在全面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培养并训练出来的一样。这支后备军不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为波动的资本增殖需要提供随时可供剥削和随时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

这种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它有时部分地、有时全部地转入现役的情况，它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新建立，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充满变化的生活过程的深处，现代工业经历着由中常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有规则的大约十年一次的周期（其他不规则的动荡除外）。

工业的这种独特的进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技术进步缓慢，技术进步的普遍推广更慢，社会资本构成的变化几乎还感觉不

(107) 理查·琼斯《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伦敦版第52页。

(108) 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90、91页。

到。在同一时期，不久前建立的殖民地市场的扩大，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相应增加，新的工业部门的出现，所有这些增加了积累，同时扩大了对劳动的需求。尽管从我们时代的观点来看，积累增长的速度不快，但是这种增长还是碰到了人口的自然界限，我们将在以后看到，这种界限只有靠剧变才能消除。只有在大工业制度下，过剩人口的生产才成为财富生产的经常的原动力。

如果说这个制度使社会资本具有突然膨胀的力量，令人惊异的弹性，那么，这是因为，在有利情况的刺激下，信用使大量不断增长着的社会财富涌入生产，使新资本涌入生产，这些新资本的占有者都迫不及待地要增殖资本，总是在等待着适当的时机；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大工业的技术手段使得有可能把大量增长的产品非常迅速地变成追加的生产资料，并且更加迅速地把商品从世界的一端运到世界的另一端。如果这些商品的低廉价格最初为它们开辟了新的市场并扩大了旧的市场，那么这些商品的过剩会逐渐地缩小整个市场，直到它们突然被排挤出市场为止，因此，商业的兴衰就同社会资本的交替运动结合在一起，社会资本在自己的积累过程中有时在构成上发生根本变革，有时又在已经达到的技术基础上增长。所有这一切影响，都会促使生产规模突然膨胀和收缩。

生产通过不规则的运动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首要原因；诚然，后者又会引起前者，但是，如果没有可供资本支配的后备军，如果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的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形成起点的生产的过度膨胀难道是不可能的吗？劳动者人数的这种增加是通过工人每天被抛向街头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过程达到的，是通过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缩减对劳动的需求这种办法达到的。因此，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而复始地不断变成半失业的或者完全失业的人

手,这是现代工业运动具有的典型形式。

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们的轨道就会无限期地围绕着轨道旋转一样,社会生产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运动,也会由于机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结果又成为原因,最初是不规则的、表面上是偶然的变动,越来越表现为正常周期的形式。但是,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而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兼并了新大陆,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新周期的起点。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做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当工业兴衰的周期性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事情时,甚至在经济学家中也有一些人准备承认,资本不能没有由过剩人口中的“贱民”构成的后备军。

曾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来又任英国殖民部官员并兼历史学家的赫·梅里韦尔说:

“假定在危机时期国家竭力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来摆脱几十万过剩的人手,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当对劳动的更强烈的需求刚一恢复时,就会感到劳动不足。人的再生产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劳动者补充起来,总需要有一代人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工厂主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利用需求活跃的有利时机,并以此来弥补滞销时期的损失。而他们只有拥有对机器和人手的支配权,才能保证有这种能力。他们必须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们必须能够依

据市场情况在必要时加强或收缩他们的营业活动,否则他们就决不能在竞争的角逐中保持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国家财富的基础。”(109)

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虽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狭之见,把它解释成人手和嘴的现实的过剩。他说:

“在一个主要依靠工商业的国家里,如果在工人阶级中间盛行慎重地对待婚姻关系的习惯,那对国家是有害的……按人口的性质本身来说,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经过 16 年或 18 年的时间,也不可能向市场供应追加劳动者。然而,收入通过节约转化为资本却可以快得多;因此,一个国家总是处于工资基金比人口增长得快的状况之中。”(110)

政治经济学在这样充分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积累不能没有工人的过剩人口之后,便恰如其分地用模范工厂主的优雅的谈吐,对那些因自己创造了过剩资本而被抛向街头的过剩的人说了如下的话:

“我们工厂主为你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而你们必须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你们的人数同生存资料的数量相适应。”(111)

伴随着积累进程的工业进步,不仅会越来越减少推动日益增长的生产资料量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而且同时还会增加单个工人必须

(109) 赫·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1842年伦敦版第1卷第146页。

(110)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15、319、320页。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依靠西斯蒙第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美妙的三位一体: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消费过剩,实在是三个极美妙的怪物!参看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07页及以下几页³⁷⁶,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

(111) 哈丽雅特·马蒂诺《曼彻斯特的罢工》1832年版第101页。

提供的劳动量。在发展劳动生产力并保证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出较多的产品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既通过延长工作日也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发展着从雇佣工人身上汲取更多劳动的手段,或者在表面上增加雇佣劳动者的人数,用较低级的劳动力代替较高级的劳动力,用较便宜的劳动力代替较贵的劳动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儿童代替成年人,用三个中国人代替一个美国人。这些就是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创造出过多的供给,总之,生产出过剩人口的办法。

雇佣工人阶级中服役的那一部分被迫从事的过度劳动,会扩大后备军队伍,增加后者的竞争对前者造成的压力,迫使前者更听命于资本。在这方面,我们把上一个世纪机器革命前夕,英国工厂主提出的告诫和19世纪英国工厂的工人提出的告诫做一个比较是十分有益的。前者的代言人高度评价过剩劳动者的后备军对劳动者的服役军的影响。

“在这个王国中,引起怠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劳动人手。只要出现对产品的某种特殊需求,而使可供支配的劳动量变得不足时,工人就会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并且想使业主也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令人惊奇的;但是这帮家伙坏透了,每遇到这种场合,成群的工人就联合起来,终日停工,使他们的业主陷于困境。”⁽¹¹²⁾

他是说,这帮“坏透了”的家伙竟以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神圣的”供求规律。

今天,由于机器工业的发展,情况完全不同了。再也没有人敢说在这个繁荣的联合王国劳动人手不足使工人怠惰了。在棉荒时期,当英国工厂把大部分苦工抛向街头,其余的人每天只能工作4或6

(112)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27,28页。

小时的时候，博尔顿的一些工厂主却力图迫使他们的织工从事额外劳动。根据工厂法，只有成年男工才能从事这种劳动。工人们在一本小册子中做出了回答。我们从中摘录了下面这段话：

“人们要求成年工人每天劳动 12—13 小时，虽然有成百的人被迫无事可做，而他們又愿意劳动一部分时间，以便养家糊口和防止自己的工人弟兄因过度劳动而早死……我们要问，迫使就业工人进行额外时间的劳动这种做法，能使主人和仆役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容忍的关系吗？过度劳动的牺牲者和因此而被宣告为被迫无事可做的人，同样地感到不公平。如果把劳动加以公平的分配，那么，这个地区所需完成的工作足以使所有的人都能部分地就业。我们只要求一个权利：我们请求业主们，至少在目前状况维持不变的期间，普遍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使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活干被迫靠救济来维持生活。”⁽¹¹³⁾

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迫无事可做，不仅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使单个资本家发财致富，而且同时也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维持一支同积累的发展齐头并进的产业后备军。我们以英国为例：英国为了节约劳动而采用的技术手段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完善程度之高是十分令人惊奇的！但是，如果明天劳动减少到与雇佣工人的年龄、性别相适应的正常程度，那么，为了进行国民生产，现有的工人人口就会不够，而且远远不够。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时就必须把所谓的“非生产劳动者”变成“生产劳动者”。

因此，一般工资率的变动与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并不一致。这种变动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不同比例，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减，相对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总之，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同工业周期变化相应的膨胀和收缩的

(11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 10 月 31 日》第 8 页。

交替运动。对于现代工业来说,如果有下面这样的规律,那确实是太好了:资本的运动依存于工人人口的绝对量的运动;劳动的供给不是通过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交替的膨胀和收缩,也就是说,不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临时需要来调节。然而,这正是经济学的教条。

按照这个教条,工资因积累而提高。工资的提高使工人人口逐渐增加,直到劳动市场充斥,资本不足以同时雇用他们时为止。工资下降,于是事情走向反面。由于工资的下降,工人人口减少,以致资本同工人人口数量比较起来又过剩,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起点。

或者像另一些人口学博士所说的那样,工资的降低及其引起的对工人剥削的提高,会重新刺激积累,而与此同时,低工资又会抑制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于是,就又出现劳动的供给小于劳动的需求、工资提高等等情况。

这种运动如果能同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谐相处该有多好啊!可是,在真正有劳动能力的绝对人口因工资提高而有稍许的实际增长以前,人们已经一再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决出胜负。

1849年至1859年间,尽管谷物价格下降,但英国农业地区工资同时却略有提高。例如,周工资在威尔特郡由7先令提高到8先令,在多塞特郡由7先令或8先令提高到9先令,等等。这是农业过剩人口异乎寻常外流的结果,而这种外流是由于为克里木战争³⁷⁷征兵和铁路工程、工厂、矿山等部门的大规模扩展对劳动人手的需要而引起的。工资率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现得越高。例如,周工资是20先令,提高到22先令,只是提高10%;但如果周工资只有7先令,提高到9先令,那就是提高 $28\frac{1}{7}\%$,这听起来就相当可观了。不管怎样,租地农场主大喊大叫起

来,甚至伦敦《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些饥饿工资时,也郑重其事地说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114)。租地农场主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会等待这种优厚的报酬促使农业工人增加,用这种方法制造出充斥市场的未来人手并降低未来的工资吗?在空论家们的头脑中事情确实是如此。但是,我们的诚实的租地农场主只是采用了机器,后备军转瞬间又满员了,从此,以强大的工具的形式预付的追加资本开始在英国农业中执行职能,而农业工人人口却绝对地减少了。

经济学家们把调节一般工资率和表现总资本和总劳动力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同在各个投资领域之间分配工人人口的规律混为一谈了。

一些特殊的情况,时而会促进一个工业部门的积累,时而会促进另一个工业部门的积累。一旦有的部门利润超过了平均利润率,追加资本就会受到强大的吸引,于是对劳动的需求就会受到影响,变得更为强烈,从而引起工资的提高。较高的工资把较大一部分雇佣阶级吸引到这个有利的部门,直到这里劳动力达到饱和,但是,由于候补者不断流入,工资很快又下降到通常的水平,甚至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那时工人流入不仅停止,甚至还会流到其他工业部门。在这里,政治经济学家自以为看到了实际的社会运动。他亲眼看到了资本的积累引起了工资的提高,工资的提高引起了工人的增长,而工人的增长又引起了工资的下降,最后,工资的下降引起了工人的减少。但是,他所看到的,只是劳动者在各投资领域之间的分配运动所造成的劳动市场的波动。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常活跃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

(114) 1860年1月21日《经济学家》。

产过剩和高度繁荣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一旦相对过剩人口成为劳动供求规律运转的枢轴，它就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使资本的剥削活动和统治欲能够有充分行动余地的界限之内。

这里正好应该回过来谈一下“科学”的一大业绩。每当一部分工资基金转化为机器，政治经济学的空想家们就宣称，这种转化会按照这样固定下来的资本的比例排挤当时已经就业的工人，与此同时就游离出等量的资本，从而使他们以后能够在某个别的工业部门就业。我们已经指出（见“补偿理论”第十五章第六节），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原有资本的任何部分都不会因此而可供被排挤的工人支配，相反，在有新资本存在的情况下，他们本身却可供这些新资本支配。只有到现在我们才能充分地评价这种“补偿理论”的肤浅。

工资基金部分地转化为机器所打击的工人分属不同的类别。这里首先是被解雇的工人，其次是他们的经常的代替者，最后是一种产业在通常的扩大状态中可以吸收的追加人员。现在他们都是可供支配的，并且每一笔即将执行职能的追加资本都能支配他们。不管这种资本吸引的是这些工人，还是另一些工人，只要这笔资本刚好足以从市场上雇走被机器抛到市场上的那么多人手，那么它对劳动的总需求的影响就等于零。如果这笔资本雇用的人数较少，过剩的人数就会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多，劳动总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过等于它“吸收”的人手超过被机器“游离的人”的那个差额。可见，正在投入的追加资本本来会给予人手总需求的刺激，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按照人手被机器抛向劳动市场的程度而抵消。

这就是一切会引起劳动者过剩的方法的一般结果。由于这些方法，劳动的供求不再是从资本和劳动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出发的运动。

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如果说它的积累增加了对人手的需求，那么，它也通过制造过剩人口扩大了人手的供给。骰子是假的。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供求规律成全了资本主义的专制。

因此，一旦劳动者发现，随着他们的劳动和他们的主人的财富的增加，他们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他们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他们团结起来，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成联盟并采取共同行动来削弱资本主义积累的这个“自然”规律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资本和它的献媚者经济学家就立刻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亵渎和违反了“永恒的”供求规律。事实上，在另一些地方，例如在殖民地，只要有不利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备军，资本家和他们的官方辩护士就会毫不迟疑地督促国家来阻止这个“神圣的”规律的危险倾向。

4. 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除了在工业周期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时，在总的形态上发生的重大周期变化以外，总是表现出无限多样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很快地把它们划分成几个大的范畴，几种显著不同的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现代工业的中心——自动工厂、制造厂、工厂、矿山等等，不断交替地吸引和排斥劳动者，但是，一般说来，吸引从长期来看是压倒排斥的。因此，在那里被剥削的工人人数不断增加，虽然这个人数和生产规模相比在缩小。在这里，过剩人口处于流动状态。

在自动工厂以及机器只是在现代分工之旁起辅助作用的大多数大制造厂,只是大量雇用未成年的男工,少年期一过,只有少数人能够留下,而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过剩人口的这个要素随着大工业的扩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国外,其实不过是跟着外流的资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长得快,英格兰就是一个例子。工人阶级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全国积累的需要,但又超过全国市场的吸收能力,这里似乎包含着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是由资本运动本身引起的。资本需要的女工、童工、少年工人、青年工人的比例较大,成年男工的比例较小。因此,乍一看来,在成千上万的工人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这更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例如,在1866年下半年,伦敦有10万工人被迫失业,而由于缺乏劳力,兰开夏郡工厂的许多机器不得不停工。(115)

此外,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劳动者刚过中年就已经消耗殆尽了。一旦到了成年,他就必须让位于更年轻的劳动力,从社会的阶梯上降一级,如果他终于能留在过剩者队伍中,那就是万幸了。而且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的平均寿命最短。

“曼彻斯特保健医官利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不那么幸运的公民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116)

(115) “说需求总是恰好在必需的时候引起供给,似乎不是绝对正确的。至少工厂劳动就不是这样,因为许多机器由于缺乏劳动力,不得不停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1867年伦敦版]第81页)

(116) 伯明翰市长约·张伯伦1875年1月14日在伯明翰市卫生改革会议上的开幕词。

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条件,这部分无产阶级就只有经常地替换它的单个的成员,它的人数才能增大。这样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是大工业工人社会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剥削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得到满足的。

资本主义制度一旦占领农业,在那里对劳动的需求就随着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在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排斥不像在其他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或制造业人口,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

1861年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公国的人口调查表明,

“781座城市有居民 10 960 998 人,而乡村和农村教区只有居民 9 105 226 人……在 1851 年的人口调查中列有 580 座城市,它们的人口同农业地区的人口大致相等。可是,农业地区的人口只增加 50 万人,而 580 座城市的人口却增加了 1 554 067 人。农村教区的人口增加 6.5%,而城市人口增加 17.3%。增长率之差是由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的。人口增长总额中有 $\frac{3}{4}$ 属于城市”。⁽¹¹⁷⁾

农业地区要成为流入城市的人口的供给地,农村本身必须有潜在的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的整个规模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看得到。

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里。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是现役产业军的一部分。但同时它的就业极不规则,因此成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

(117) 《1861年人口调查》第3卷第11、12页。

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因为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经常处于慢性的贫困,毫无保障和大大低于工人阶级的正常水平的的生活状况之中,所以它成为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在这些部门中,劳动时间达到了最高限量,而工资率则达到了最低限量。在这方面,所谓的家庭劳动为我们提供了骇人听闻的例子。

工人阶级的这个阶层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被工场手工业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生产领域里得到补充。这个阶层的队伍除了由这些补充成分而得到扩大以外,它本身也以扩大的规模再生产着。不仅这个阶层的出生和死亡的人数非常高,而且,目前这种处于停滞状态的过剩人口的各类工人与他们所得到的工资、从而与他们赖以活命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成反比例地增长着。这种现象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使人想起某些种类的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但是亚当·斯密说:“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³⁷⁸在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父看来,这甚至是上帝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118)。“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兰格用统计材料说明了这个论点之后,又继续说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么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119)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低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撇

(118) 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4卷第78页。

(119) 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伦敦版第69页。

开流浪者、罪犯、妓女、乞丐，撇开这些被称为危险阶级的人们不说，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

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工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发生危机和处于停滞阶段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和孤儿。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 1860 年，他们大量地进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悲惨的人们。主要可以说是由于社会发展取消了分散的劳动而被淘汰的男女工人，而这种分散劳动的分工过去是他们的收入的唯一来源；还有不幸已经超过雇佣工人正常年龄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业、化工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的直接牺牲者，如病人、残疾人、寡妇等等。

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疾院和现役劳动后备军的死荷重^①。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资本主义财富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下层的肩上。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积累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工人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人数也就越多。发展资本的膨胀力的同一些原因，也会产生出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因此，产业后备军必然会同财富的增长一起增大。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

① “死荷重”是运输业的用语，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编者注

他们的贫困同劳动折磨成正比^①。最后，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这个贫苦阶层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作用当然也会由于各种特殊情况而有所变化。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当经济学的智者们的不断向劳动者说教，要他们使自己的人数去适应资本的需要时，他们的愚蠢是很清楚的。难道资本的机制不是在经常地实现所期望的这种适应吗？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产业后备军，结尾是贫困越来越深地侵入现役劳动军，是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

由于劳动的集体力量的不断发展，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财富组成要素，这个规律使社会的人有可能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但在不是生产资料为劳动者服务而是劳动者为生产资料服务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却会转化为相反的规律，即：劳动的资源越多，力量越大，劳动者对自己的就业手段的压力越大，雇佣工人的生存条件，劳动力的出卖就越没有保证。因此，物质手段和劳动的集体力量比人口增长得快这一事实表现为相反的公式，即生产人口总是比资本对它的需要增长得快。

我们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第四篇）时得出了如下结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集体劳动力量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劳动者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生产者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或者机器的附属品，使生产的科学力量作为敌对的力量与生产者相对立；这些手段把具有吸引力的劳

^①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至第4版中是“成反比”。（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42页）——编者注

动转化为强制劳动,使劳动条件越来越不正常,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卑鄙可恶的无限专制,把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主义的札格纳特车轮下。¹⁷⁵

但是,一切有助于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促进积累,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促进了这些方法的发展。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工资率高低如何,劳动者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

最后,使积累的增进和相对过剩人口的增长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劳动者钉在资本上,比武尔坎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正是这一规律确立了资本积累同贫困积累之间必然相适应的关系。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对立的一极,即在生产资本本身的阶级方面,是贫穷、劳动折磨、无知、粗野、道德堕落和受奴役的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对抗性质甚至使经济学家们感到吃惊⁽¹²⁰⁾,虽然他们往往把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出来的现象同属于以前的社会生产制度的现象混同起来。

18世纪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威尼斯的修道士贾·奥特斯,把资本主义财富固有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不变的自然规律。他说:

“我不想设计对人民幸福无用的制度,我只研究人民不幸的原因……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充裕总是

(120) “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⁴⁴ 1847年巴黎版第116页)

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少数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多数人被剥夺必需品。一些人的过度勤劳迫使另一些人懒惰。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¹²¹⁾

但是,如果说奥特斯对于经济上遭受的这种厄运深感悲痛的话,那么,在他之后 10 年,高教会⁸新教牧师约·唐森,则以轻松愉快的心情颂扬这种厄运是财富的必要条件。他说: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劳动和勤勉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

所以,使劳动者的饥饿永久化是他的劳动法典中唯一重要的条款。而且,他补充说,只要让对穷人特别有效的人口原理充分发挥作用,这项条款就可以得到实施了。

“下面这一点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安心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秩序与均称。”⁽¹²²⁾

(121) 贾·奥特斯《国民经济学》(六卷集)1774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21卷第6、9、24、25等页。

(122) 《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即牧师约·唐森先生)著,1786年版,1817年伦敦再版,第15、39、41页。这位“高雅的”牧师的上述著作和他的《西班牙游记》,马尔萨斯曾经恬不知耻地加以抄袭,而唐森自己的大部分学说却是从詹·斯图亚特爵士那里抄袭来的,不过加以歪曲了而已。例如斯图亚特说:“奴隶制度曾经是使人超出自身的需求而劳动,使国家的一部分人无偿地养活另一部分人的唯一手段。这是一种使人(为了别人)勤勉劳动的暴力手段……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为了别的不劳动的人),因为他们是自己需求的奴隶”(詹·斯图亚特《政治

威尼斯的修道士从经济上遭受贫困的厄运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终身不婚、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等等存在的理由，而这位新教的牧师却从其中找到借口来指责使穷人有权享受教区的救济的英国法律“济贫法”。

施托尔希说：

“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单调、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妙！〉高贵品性……”⁽¹²³⁾

施托尔希问自己：这种伴随有群众贫困和堕落的资本主义文明，同野蛮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只找到一个答案：安全！

西斯蒙第发现，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劳动者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比维持他自己日常需要的东西多得多。但是，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费这个财富，那么这个财富，即他的劳动的产品，就会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他认为：

“如果人们〈当然是非劳动者〉必须像工人那样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技艺的一切改良和制造业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享受，那么他们大概会放弃这些东西……在今天，努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先劳动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为一个人劳动，另一个人才休息……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结果，只能增加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¹²⁴⁾

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七章³⁷⁹)——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像这位教会的慈善家那样作出结论：雇佣工人应当挨饿。相反地，他希望增加雇佣工人的需要，并希望他们需要量的增加能刺激他们去为体面的人们劳动。

(123) 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3卷第223页。

(124)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巴黎版第1卷第79、80页。

西斯蒙第的门徒舍尔比利埃补充说：

“劳动者自身……在协助生产资本积累的同时迟早必然促使自己的工资的一部分被剥夺。”⁽¹²⁵⁾

最后，在内心狂热地拥护资产阶级理论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率直地声称：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¹²⁶⁾

5. 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 1846—1866 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 20 年这样适合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¹²⁷⁾ 在这个时期，就好像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还因为，从 1846 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国³⁸⁰的实现，又把庸俗政治经济学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赶了出来。我们已经在第三篇和第四篇里充分谈到了这 20 年期间英国生产的巨大进步，其中后 10 年的进步又远远超过了前 10 年。

(125) 舍尔比利埃《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 年巴黎版第 146 页。

(126)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 年巴黎版第 231 页。

(127) 写于 1867 年 3 月。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 1861 年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证明。

英格兰和威尔士公国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1811—1821	1.533%
1821—1831	1.446%
1831—1841	1.326%
1841—1851	1.216%
1851—1861	1.141%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同时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税的产业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1853—1864 年,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利润)增长 50.47%(平均每年增长 4.58%)(128),而同时期人口增长 12%。1853—1864 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渔场等等的地租)在同时期内增加 38%,每年增加 $3\frac{5}{12}\%$,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项目:

	1853 年到 1864 年	每年增加
	收入增加	
房屋	38.60%	3.50%
采石场	84.76%	7.70%
矿山	68.85%	6.26%
铸铁厂	39.92%	3.63%
渔场	57.37%	5.21%
煤气厂	126.02%	11.45%
铁路	83.29%	7.57%

(128)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 10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第 38 页。

如果把 1853—1864 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1853—1857 年期间每年增加 1.73%,1857—1861 年期间每年增加 2.74%,1861—1864 年期间每年增加 9.30%。在联合王国,应纳所得税的收入总额,1856 年为 307 068 898 镑,1859 年为 328 127 416 镑,1862 年为 351 745 241 镑,1863 年为 359 142 897 镑,1864 年为 362 462 279 镑,1865 年为 385 530 020 镑。(129)

资本的集中与资本积累齐头并进。虽然英格兰没有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 10 个郡自动提供了统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1851 年到 1861 年,100 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 31 583 个减少到 26 567 个,也就是说,有 5 016 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130) 1815 年到 1825 年,在应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 100 万镑的,但是从 1825 年到 1855 年,就有了 8 份,从 1855 年到 1859 年 6 月,也就是 4 年半的时间里,又有了 4 份。(131) 简单地分析一下 1864 年和 1865 年的 D 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等等的利润除外的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可以最为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

(129) 这些数字用来作比较是足以说明问题的,但是绝对地看来,则是虚假的,因为每年也许有 1 亿镑收入没有申报。国内税务委员在每一次报告中都要对这种一贯的欺瞒,特别是商业和工业方面的欺瞒抱怨不已。例如:“某股份公司估算应纳税的利润是 6 000 镑,而税务员估算为 88 000 镑,结果还是按后面这个数目纳了税。另一家公司呈报的是 19 万镑,但后来被迫承认,实际数目是 25 万镑。”(同上,第 42 页)

(130) 《人口调查》1863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29 页。约翰·布莱特断言,英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 150 个地主,苏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 12 个地主。这一说法从未有人反驳过。

(131)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 4 号报告》1860 年伦敦版第 17 页。

的发展。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在 60 镑以上的就要交纳所得税,收入在 60 镑以下的无需纳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公国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 1864 年为 95 844 222 镑,1865 年为 105 435 579 镑⁽¹³²⁾,纳税的人数 1864 年在居民总数 23 891 009 人中是 308 416 人,1865 年在居民总数 24 127 003 人中是 332 431 人。两年中这种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到 1864 年 4 月 5 日为止的一年		到 1865 年 4 月 5 日为止的一年	
	利润收入(镑)	人 数	利润收入(镑)	人 数
总收入	95 844 222	308 416	105 435 738	332 431
其中	57 028 290	22 334	64 554 197	24 075
其中	36 415 225	3 619	42 535 576	4 021
其中	22 809 781	822	27 555 313	973
其中	8 744 762	91	11 077 238	107

联合王国的煤产量,1855 年为 61 453 079 吨,价值 16 113 267 镑,1864 年为 92 787 873 吨,价值 23 197 968 镑;生铁产量,1855 年为 3 218 154 吨,价值 8 045 385 镑,1864 年为 4 767 951 吨,价值 11 919 877 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1854 年为 8 054 英里,投入资本 286 068 794 镑,1864 年为 12 789 英里,投入资本 425 719 613 镑。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1854 年为 268 210 145 镑,1865 年为 489 993 285 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¹³³⁾

(132) 这是纯收入,即已扣除了法定的免税额。

(133) 现在,1867 年 3 月,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由于英国棉纺织厂主的委托销售,又已经商品过剩了。1866 年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 5%,1867 年由于类似的过程,普雷斯顿发生了 2 万人的罢工。

1847年	58 842 377 镑
1849年	63 596 025 镑
1856年	115 826 948 镑
1860年	135 842 817 镑
1865年	165 862 402 镑
1866年	188 917 536 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户籍总署署长³⁸¹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¹³⁴⁾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先生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¹³⁵⁾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 1843 年 2 月 13 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 20 年,在 1863 年 4 月 16 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 20%! 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更富了,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¹³⁶⁾ ³⁸²

(134) 《人口调查》1863 年伦敦版第 3 卷第 11 页。

(135) [格莱斯顿 1843 年 2 月 13 日在下院的演说。(1843 年 2 月 14 日《泰晤士报》。2 月 13 日《汉萨德》)]

(136) 格莱斯顿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

这段演说的结尾多么精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么，穷的极端程度随着富的极端程度的增大已经增大了。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么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3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1853年3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1863—1865年3年中，肉、黄油、牛奶、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¹³⁷⁾ 格莱斯顿先生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演说，是一首真正的、平达式的赞歌。他在这个演说中歌颂了赚钱事业、它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谈到了“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了“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¹³⁸⁾

(137) 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散见《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六部分）》1866年伦敦版第260、273页。不用研究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只要看一看有关皇家儿女婚嫁费用的政府公告就可以了。这些公告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

(138) 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英国的一位平庸的著作家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演说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人皆如此：暮四朝三，
由白变黑，反复无常，
有如时装，时时变换，
惹人讨厌，自己心烦。”³⁸³

（《兑换理论》1864年伦敦版第135页）

不像这位大臣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我并不否认，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 20 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大部分都丧失了……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福利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劳动者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¹³⁹⁾

读者已经知道，不列颠工人阶级最近二三十年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前面提到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本书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充分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在工厂中执行职能的劳动者。为了深入地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还必须对他的私人生活，他的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略加考察。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考察的主要是工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中报酬微薄的部分，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大多数。⁽¹⁴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¹⁴¹⁾，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 1855 年是 851 369 人，1856 年是 877 767 人，1865 年是 971 433 人。由于棉荒，

(139)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 年伦敦版第 67、82 页。至于说劳动者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劳动者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迫使他们赊购的结果。

(140) 我期望弗·恩格斯很快就会着手研究 1844 年以来的这一时期的情况，以此对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出增补，或者单独以第二卷的形式把最近这一时期的情况示于世人。

(141) 英格兰总是包括威尔士；大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王国包括以上三个地方和爱尔兰。

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 079 382人和1 014 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这种贫困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级斗争日益发展,从而劳动者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几年来英国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贫民习艺所的穷人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1844年就叙述过完全相同的惨状和“追求轰动效应的作品”中完全相同的喧闹一时的呼叫。³⁸⁴不过,最近10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这清楚地、“明白无误”地证明劳动者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这种贫民惩治所的奴役了。

(b) 报酬微薄的产业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英国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1862年棉荒时期,枢密院¹⁴⁹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处于绝望境地的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

“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3 900格令碳素,180格令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4 300格令碳素,200格令氮素,这就是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2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男子需要的还要多 $\frac{1}{9}$ 。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28 600格令碳素和1 330格令氮素。”

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棉荒而被压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1862年12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29 211格令，氮素是1 295格令。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协助他做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劳动者，另一方面包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 $\frac{1}{5}$ 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 $\frac{1}{3}$ 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萨默塞特郡）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¹⁴²⁾

在农业劳动者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劳动者营养最差。⁽¹⁴³⁾³⁸⁵农村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劳动者中，营养缺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¹⁴⁴⁾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

事实上，资本家禁欲到了不给他的奴隶勉强糊口的地步！

我们从下表可以把上述各类城市劳动者的营养状况同棉纺织工

(142)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3页。

(143) 同上，第17页。

(144) 同上，第13页。

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以及同斯密斯医生假定的最低营养量进行对比。(145)

男 女 两 性	每周平均的 碳素量(格令)	每周平均的 氮素量(格令)
五种城市生产部门	28 876	1 192
兰开夏郡失业的工厂工人	29 211	1 295
兰开夏郡工人应得的最低限量 (按男女人数相等计算)	28 600	1 330

各类工业劳动者中,有半数完全得不到啤酒,有 $\frac{1}{3}$,28%完全得不到牛奶。家庭中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的家庭,只有7盎司,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 $24\frac{3}{4}$ 盎司。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 $7\frac{3}{4}$ 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 $11\frac{1}{4}$ 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9.9磅。糖(糖浆等等)每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4盎司,最高的是织袜工人,有11盎司;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不超过8盎司。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5盎司。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工人,只有 $7\frac{1}{4}$ 盎司,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 $18\frac{1}{4}$ 盎司;各类工人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13.6盎司。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2先令 $2\frac{1}{2}$ 便士,女缝工2先令7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 $9\frac{1}{2}$ 便士,制鞋工人2先令 $7\frac{3}{4}$ 便士,织袜工人2先令 $6\frac{1}{4}$ 便士。迈克尔斯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不超过1先令 $8\frac{1}{2}$ 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146)

(145) 同上,附录第232页。

(146) 同上,第232、233页。

西蒙医生在他的总报告中说：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可以说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剂量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无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了过于破费和难于办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么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加重饥饿。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足最不清洁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空气和阳光也最缺乏。当穷到连饮食都感到缺乏时，也就必然要遭到这些灾祸。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这使人产生痛苦的思考，特别是，如果想到这里所说的贫困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这是勤劳的人的贫困。是的，说到城市工人，他们为了换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劳动延长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说这种劳动可以使工人维持生活……在大多数场合，这不过是一条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迂回道路而已。”(147)

人们只有认识了经济规律，才能理解最勤劳的社会阶层的饥饿痛苦和资本主义积累及其必然结果，即富人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劳动者也就越要聚集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实际上，很明显，城市的改良和美化——这是财富增长的结果——例如，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货栈等等用的

(147)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4、]15页。

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市内的铁路等等,总是要把贫民赶到越来越肮脏和有害健康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困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³⁸⁶赚钱多,花钱少。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由资本主义积累产生的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¹⁴⁸⁾,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激烈的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即有身份的人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强制市政当局来实行公共卫生措施。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种恶劣的状况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¹⁴⁹的命令,1864年对农村劳动者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年又对城市中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关于公共卫生的第7号(1865年)和第8号(1866年)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村劳动者的情况,我们以后再来研究。在介绍城市工人的情况之前,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他说:

“虽然我的公务上的观点仅限于身体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一定程度时,几乎必然会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龌龊的男女混杂,像野兽而不像人的身体的裸露。受这种影响会使

(148) “任何情况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一个场所,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伦敦版第150页)

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养育的儿童来说,这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那是绝对无望的。”(149)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 20 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 1 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到目前为止在英国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 20 年前糟糕得多。”(150)“即使把伦敦和纽卡斯尔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151)

在伦敦,随着旧区的“改良”和拆除,随着这个大都会中工厂增多和人口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中等阶级其他下层分子,也越来越受到这种恶劣的居住环境的致命影响了。

“房租过高,只有很少数的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152)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

(149) 《公共卫生。第 8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第 14 页注。

(150) 同上,第 89 页。关于生活在这些贫民区里的儿童,汉特医生说:“我们不知道,在这种贫民密集成堆的时期以前,孩子们是怎样被教养成人的。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吵架,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危险阶级的教育(他们以后将按照这种教育行事);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同上,第 56 页)

(151) 同上,第 62 页。

(152) 《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 年》。

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买到的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获得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¹⁵³⁾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

“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突然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的家庭,背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¹⁵⁴⁾。

贫民习艺所已经有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

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的工人,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方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新的住所却比他们被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英里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外国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 581 人,而且还把泰晤士河的一半水而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毁不适用的房

(153) 《公共卫生。第 8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第 91 页。

(154) 同上,第 88 页。

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结束这一整套荒谬的做法；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155)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法律和公道，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赏钱，作为对他们的“禁欲”，迫不得已的“节制”的安慰。而劳动者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警察还要以公共卫生的名义把他们驱逐出去。

19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五个城市超过5万人。而现在，超过5万人的城市已有28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简直没有地方进得了新鲜空气。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影响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156)

随着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中资本积累的加速，随着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流入这些城市，为劳动者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

(155) 同上，第[88、]89页。

(156) 同上，第56页。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煤和采石矿区的中心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 34 000 人。在纽卡斯尔和盖茨黑德，不久前警察局以危害公共安全为理由下令拆毁了大量的房屋。新房子盖得很慢，但是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此，1865 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纽卡斯尔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与外面隔绝的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完善和更不卫生了。这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几乎完全没有厕所，不通风，臭气熏天，瘟疫蔓延。”⁽¹⁵⁷⁾

这样简陋的房屋，每周租金也从 8 便士涨到了 3 先令。汉特医生说：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纯粹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¹⁵⁸⁾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会变得恶劣不堪。如果市政官员终于可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那么，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劳动者立即就会像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像样的劳动者住房变成一种临时营房，里面住的人不断地更换。布拉德福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此外，1861 年那里还有 1 751 栋

(157) 同上，第 149 页。

(158) 同上，第 50 页。

没有住人的房子。但是营业突然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黑人之友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随着营业的兴旺,那里自然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没。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¹⁵⁹⁾,表

(159) 布拉德福德一家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火神街 122 号	1 间房	16 人
拉姆利街 13 号	1 间房	11 人
鲍威尔街 41 号	1 间房	11 人
波特兰街 112 号	1 间房	10 人
哈迪街 17 号	1 间房	10 人
北街 18 号	1 间房	16 人
北街 17 号	1 间房	13 人
怀默街 19 号	1 间房	8 个成年人
乔伊特街 56 号	1 间房	12 人
乔治街 150 号	1 间房	3 家
赖夫尔广场玛丽门 11 号	1 间房	11 人
马歇尔街 28 号	1 间房	10 人
马歇尔街 49 号	3 间房	3 家
乔治街 128 号	1 间房	18 人
乔治街 130 号	1 间房	16 人
爱德华街 4 号	1 间房	17 人
约克街 34 号	1 间房	2 家
咸饼街	2 间房	26 人

地下室

瑞琴特广场	1 个地下室	8 人
爱克街	1 个地下室	7 人
罗伯茨街 33 号	1 个地下室	7 人
普拉特后街(炼铜场)	1 个地下室	7 人
埃比尼洋街 27 号	1 个地下室	6 人

(《公共卫生。第 8 号报告》1866 年伦敦版第 111 页)

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被迫住在里面的大多还是收入较好的劳动者。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流着激动的眼泪为自由贸易即听之任之政策的巨大恩惠,为布拉德福德的致力于研究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高额利润祝福的时候,劳动者们的境遇却每况愈下,疾病不断夺走他们的生命。

布拉德福德的贫民诊所医生贝尔在他 1865 年 9 月 5 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在一个 1 500 立方英尺的地下室里住着 10 个人…… 在文森特街、格林-艾尔广场和利斯,有 223 栋房子住着 1 450 人,可是只有 435 个床铺和 36 个厕所…… 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在内的,每个床铺平均睡 3.3 人,有些甚至睡 4—6 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些臭气熏天、阴暗、潮湿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 这里是引起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160)

按照城市中住房的数量和住房的可怕现状来划分,布里斯托尔居第三位。

“这里,在这个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也极为严重。”(161)

(c) 流动人口。矿工

无产阶级的流民来自农村,但是他们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他

(160) 同上,第 114 页。

(161) 同上,第 50 页。

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支轻步兵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在一路上并在他们扎营的地方和附近地区散布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¹⁶²⁾在像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企业主通常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企业主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做产业士兵又当做房客进行剥削。木棚里各有1个、2个或3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瓦工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1先令、2先令、3先令。⁽¹⁶³⁾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1864年9月塞文欧克斯教区卫生治理委员会主席向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揭发了如下事实：

“大约一年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刘易舍姆到坦布里奇的铁路工程开始了。此外，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为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所以企业主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紧靠窗子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会传播疾病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立即采取一些卫生措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7月底，他再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就在他向我描绘的情况非常可怕的小棚里发生了几起天花。

(162)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

(163) 同上，第165页。

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我还应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总是挤满病人。有一家5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4月1日至9月1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10人，其中有4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¹⁶⁴⁾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¹⁶⁵⁾在这里我们只是谈谈考察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此外，工人还无偿得到一部分煤，也就是说，他们的工资的一部分是用煤而不是用货币来支付的。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4镑作为补偿。

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他们是原来的矿工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像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狭小的建筑地段上，盖起尽可能多的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当然就会达到极点。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支配作用的动机就

⁽¹⁶⁴⁾ 同上，第18页注。查珀伦勒弗里斯联合教区的济贫所监督向户籍总署署长³⁸¹报告说：“在达夫霍尔斯，在小山似的石灰渣堆上挖了许多小窑洞。这些洞穴就是掘土工人和雇来修筑铁路的其他工人的住处。这些洞穴狭窄、潮湿，没有排水沟，也没有厕所。除了在顶上凿一个小孔兼作烟囱外，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天花十分猖獗，已经在这些穴居人之中造成几起死亡。”（同上，注2）

⁽¹⁶⁵⁾ 第四篇末的注释主要是关于煤矿工人的情况。关于金属矿山的更加恶劣的状况，参看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诚实的报告。

是资本家的“禁欲”，即他对一切非必需的现金开支的厌恶。

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除了蒙茅斯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外，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矿山的矿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整个说来，大概是英国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挤在一间房里；在狭小的建筑地段，胡乱盖了一大批房子；缺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几层的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采矿业主把整个移民队伍看成似乎只是露营，而不是定居。”（166）

· 斯蒂文斯医生说：

“我奉命视察了达勒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矿山村落……除了极少数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所有矿工都被束缚（bound 这个词和 bondage[依附]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 12 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年底就不再和他们签订新的契约……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用商品支付工资的制度）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更坏了。劳动者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他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恐怕只有向他的所有主请求帮助。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劳动者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从他的工资中都要作出扣除。”（167）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它强制工人接受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一切都是增加收入所必需的。当资本拒绝在工厂的机器上安装

（166） 同上，第 180、182 页。

（167） 同上，第 515、517 页。

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21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的工人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提供适当的住房;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慨一点,他的良好愿望也会由于地主的要价而受到挫折;如果他要取得这样一种特权,也就是在地主的土地上造起像样而舒适的村庄供那些开采地主的地下财产的劳动者居住,那么,地主马上就会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性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建筑投机商吓回去…… 我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追加费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责,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劳动者还是由公众负担…… 但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那些可耻事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份把一个工业移民队伍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份使他所招来的劳动者的住房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利益要来反对这种说不清楚的交易,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受的教育太少,不懂得自己享有的卫生权利;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用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168)

(d) 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 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甚至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68) 同上,第16页。

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普遍危机,每一次工业周期都是周期性地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来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于1866年5月在伦敦爆发,这是以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不可靠的金融公司也接着彻底垮台了。遭殃的伦敦大工业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高度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发展生产,而且由于他们以为信用来源不会迅速枯竭,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现在,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目前,1867年3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许多工业部门⁽¹⁶⁹⁾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劳动者的状况,从1867年1月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169) “大批伦敦贫民在饥饿中倒毙……近几天来,在伦敦的墙上张贴着巨幅招贴画,上面写着:‘肥牛们!快饿死的人们!肥牛离开了自己的水晶宫,来养肥住在豪华宅第中的财主,而快饿死的人们却惨死在自己的穷窟里。’载有这种不祥字句的招贴画不断地重新出现。刚刚撕掉或盖住一批,马上在同一地方或在同样显眼的地方又出现一批……这使人想起促使法国人民发动1789年事变的不祥之兆……正当英国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死于饥寒交迫的时候,成百万的英国货币,即英国劳动的产品,却被投资到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别的国家的企业中去。”(1867年1月20日《雷诺新闻》)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铁船制造业以及其他大工业部门工人的所在地,而且还是大量处于停滞状态的过剩人口的所在地。这种过剩人口分配在各种不同的家庭劳动部门中。下面我们从托利党人的主要机关报《旗帜报》中摘引一段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虽然只是伦敦东头的一部分失业工人打着黑色丧旗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相当可观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4万人……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另一边是4万个行将饿死的人!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勒、米尔沃尔、格林尼治、德特福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 15 000 名劳动者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 3 000 多人是熟练的劳动者。他们失业 6 个月至 8 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勒）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一群饿坏了的人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开的小块地方，活像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屋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 5 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并获得 3 便士（30 生丁）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拆船上用过的绳索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 7 000 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很多人在 6 个月或 8 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有些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决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离开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在波普勒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工人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一个已经失业 27 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 3 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杯没有牛奶的清茶。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

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涌入其他市区；这些一年到头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也不能靠求乞度日。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1867 年 4 月 5 日《旗帜报》）

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想在困难时有点依靠。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从若干先令减到若干便士，直到存折变得像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最后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她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她已经19个星期被迫无事可干，以致陷入这样的境地。她一边哭泣，一边讲述她的痛苦经历，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170)

(170)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劳动者的乐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臭名昭著的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视察员的强制性的财产管理的侵犯。关于“自由的”比利时劳动者的幸福的全部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4个孩子”。这6个人中“有4个人可以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座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86生丁。“根据不同行业同意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1法

(e) 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英格兰农

郎 56 生丁,妇女是 89 生丁,男孩是 56 生丁,女孩是 55 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 1 068 法郎……我们把这个当做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

但是,既然我们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料理家务呢?谁来照料孩子、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年预算是:

	1 日的工资额	300 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父亲	1.56 法郎	468 法郎
母亲	0.89 法郎	267 法郎
儿子	0.56 法郎	168 法郎
女儿	0.55 法郎	165 法郎
	合计	1 068 法郎

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和不足额如下:

	支出额	不足额
水兵的营养	1 828 法郎	760 法郎
士兵的营养	1 473 法郎	405 法郎
囚犯的营养	1 112 法郎	44 法郎

“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囚犯的伙食标准,更不用说达到水兵或士兵的伙食标准了。所有监狱的总平均费用(1847—1849年期间,各个监狱中监禁的每个囚犯的费用)为 63 生丁,这个数字同劳动者每天的生活费用相比还有一个 13 生丁的差额。此外要说明的是,虽然监狱的管理费和监视费必须

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18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新的生产方式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革还要早得多。

阿瑟·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察家,他所提供的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1771年的农业工人同他们14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171)的先人比较起来,扮

计算进去,但是囚犯不用支付房租;他们在监狱食堂小卖部里购买的东西并没有包括在生活费用里边,而且由于监狱里人很多,囚犯们消费的食品和其他物品都是通过拍卖或批发购进的,所以他们的生活费用大大降低了……但是多数劳动者,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过得还要俭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由于工人采取了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其中秘密的应急措施;他们减少了每天的口粮;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调味品;一家大小挤在一两间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张简陋的床上;他们节减服装、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开支;放弃星期天的消遣;总之,他们甘愿过最痛苦的贫困生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食品的价格稍稍上涨一点,或者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劳动者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债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需的家具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人申请列入贫民名册”(同上,第151、154、155页)。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见《佛来米人,前进!》协会呼吁书》1860年布鲁塞尔版第13、14页)——全比利时共有93万个家庭。根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9万户,共45万人;城乡中等阶级下层的家庭39万户,共195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工人家庭45万户,共225万人。在这45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20万户以上!

(171) 詹姆斯·埃·索·罗杰斯(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0页。这部著作是辛勤劳动的成果,目前已出版的头两卷只包括1259—1400年时期。第二卷全是统计资料。这是我们手头所有的关于那个时期的第一部真实可靠的《价格史》。³⁸⁷

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15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么远。在1777年出版的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中写道:

“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却被踩在脚下……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40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处境是一目了然的……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劳动者。”⁽¹⁷²⁾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1737年到1777年几乎降低了 $\frac{1}{4}$ 即25%。理查·普赖斯说:

“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¹⁷³⁾

但是英格兰农业劳动者在1770年至1780年期间的状况,无论就他们的居住和营养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如果用小麦来表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脱,到伊登时代(1797年)已经只有65品脱,而到1808年时则只剩下60品脱了。⁽¹⁷⁴⁾

(172) 《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5,11页。

(173) [理查·普赖斯:]《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编,1803年伦敦版第2卷第158页。作者在第159页上指出:“现在一个工作日的名义价格不过比1514年提高3倍,或者最多不过提高4倍。可是现在谷物价格却涨了6倍,肉类和衣服的价格涨了将近14倍。因此,劳动价格的提高远远赶不上生活的必需费用的上涨,现在的劳动价格同生活的必需费用相比较,看来还买不到过去的一半东西。”

(174) 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26页。关于18世纪末的情况,参看伊登《贫民的状况》一书。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³⁴⁹（威廉·科贝特把这场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称之为反雅各宾战争）末期农业劳动者的状况，在这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一方面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²⁹¹及其行政机关在1814年同1795年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来补足名义工资和劳动者勉强糊口所不可缺少的最低数额之间的差额。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比它的最低限额低多少；第二，农业劳动者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敦郡，1795年平均周工资是7先令6便士，一个六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36镑12先令5便士，收入总额是29镑18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6镑14先令5便士。1814年，该郡周工资是12先令2便士，一个五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54镑18先令4便士，收入总额是36镑2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18镑6先令4便士。⁽¹⁷⁵⁾可见，在1795年，不足额占工资的 $\frac{1}{4}$ 弱，而到1814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无影无踪了。⁽¹⁷⁶⁾从此以后，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

(175) 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性》1816年伦敦版第80页。

(176) 同上，第213页。

劳动者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

“1830年暴动³⁸⁸使我们（即统治阶级）在燃烧着的麦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农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也像在工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一样，充满着贫困和燃烧着一触即发的阴森的反叛的怒火”^{（177）}。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给农村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爱·吉·韦克菲尔德说：

“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劳动者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178）}

谷物法¹⁷⁹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有关派别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方面，废除派鼓动家通过事实和数字来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正生产者从来就没有起什么保护作用，以此来争取人民的同情。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丧尽天良、腐败透顶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大喊大叫地要求工厂立法的干预。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劳动者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吵，大大有助于真相的暴露。

舍夫茨别利伯爵（以前称做阿什利勋爵）是土地贵族反对工厂主

（177） 赛·兰格。

（178） 《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47页。

的慈善运动的总司令³⁸⁹。因此,他成了1844年至1845年《纪事晨报》发表的揭露性文章中的主要目标。这家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记者。这些记者不满足于一般的记述和统计,而且还把调查过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¹⁷⁹⁾列举了布兰福德、温伯恩和普尔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低教会派³⁹⁰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样,还以房租为借口从他表面上给农业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分。

儿童人数	全家人口	男子周工资	儿童周工资	全家每周收入	每周房租	扣除房租后每周净收入	平均每人每周收入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村 庄 一							
2	4	8 —	—	8 —	2 —	6 —	1 6
3	5	8 —	—	8 —	1 6	6 6	1 3 $\frac{1}{2}$
2	4	8 —	—	8 —	1 —	7 —	1 9
2	4	8 —	—	8 —	1 —	7 —	1 9
6	8	7 —	1 6	10 6	2 —	8 6	1 $\frac{3}{4}$
3	5	7 —	2 —	7 —	1 4	5 8	1 1 $\frac{1}{2}$

(179) 1845年[3月29日]伦敦《经济学家》第290页。

儿童人数	全家人口	男子周工资	儿童周工资	全家每周收入	每周房租	扣除房租后每周净收入	平均每人每周收入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先令 便士
村 庄 二							
6	8	7 —	1 6	10 —	1 6	8 6	1 $\frac{3}{4}$
6	8	7 —	1 6	7 —	1 $3\frac{1}{2}$	5 $8\frac{1}{2}$	$8\frac{1}{2}$
8	10	7 —	—	7 —	1 $3\frac{1}{2}$	5 $8\frac{1}{2}$	— 7
4	6	7 —	—	7 —	1 $6\frac{1}{2}$	5 $5\frac{1}{2}$	— 11
3	5	7 —	—	7 —	1 $6\frac{1}{2}$	5 $5\frac{1}{2}$	1 1
村 庄 三							
4	6	7 —	—	7 —	1 —	6 —	1 —
3	5	7 —	2 —	11 6	— 10	10 8	2 $1\frac{1}{2}$
0	2	5 —	2 6	5 —	1 —	4 —	2 —

谷物法的废除使英格兰的农业得到了一个新的惊人的推动力。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¹⁸⁰⁾，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黏土的优良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犁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具机等等，总之，集约化的耕作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

(180) 为此目的，土地贵族自己从国库中贷给自己一笔低利资金(当然是通过议会)，而租地农场主却必须以双倍的利息偿还给这班贵族。

得到的实际收益迅速增加了。投资的增加,由此必然引起的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¹⁸¹⁾同时,从1846年到1865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464 119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在同一时期内却减少了。就拿男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1851年的1 241 269人减少到1861年的1 163 227人。⁽¹⁸²⁾因此,英国户籍总署署长³⁸¹有理由说:“1801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¹⁸³⁾。但是从1846年到1866年这个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在这个时期内,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耕作的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的空前积累,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农产品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实现的利润的增加,农村人口逐渐地减少了。如果再考虑到与这一切相适应的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么,农业劳动者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终于被

(181) 在全国人口调查中,“租地农场主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女儿、孙女、姊妹、侄女”,一句话,就是租地农场主所使用的自己家庭的成员一栏的总人数1851年为216 851人,到1861年就只有176 151人了。这个数字的缩小证明了中等租地农场主的减少。——从1851年到1871年,英格兰20英亩以下的小租地农场减少了900多个,50—75英亩的租地农场由8 253个减到6 370个,所有100英亩以下的其他各类租地农场减少的情况也与此相仿。相反,在同一时期大租地农场的数目却增加了,300—5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由7 771个增加到8 410个,5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2 755个增加到3 914个,1 0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492个增加到582个,等等。

(182) 牧羊人总数由12 517人增加到25 559人。

(183) 《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1年》1863年伦敦版第36页。

安排在人们所说的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劳动者，不要说同他们从14世纪后30多年到15世纪后30多年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¹⁸⁴⁾朱利安·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农仆〈这是封建时期对农民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计算中是个零。⁽¹⁸⁵⁾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¹⁸⁶⁾。“至于他的微薄收入的进一步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计算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¹⁸⁷⁾

1863年，对被判处流放和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¹⁰中。其中写道：

“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及自由农业劳动者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¹⁸⁸⁾而“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业劳动

(184) 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3页。“农民又成了农奴。”(同上，第10页)罗杰斯先生属于自由学派³⁹¹，他是科布顿和布莱特之流的私人朋友，因此绝不是过去时代的赞颂者³⁹²。

(185)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42页。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房屋出租者一听说劳动者挣得多一些就对他提高房租，而租地农场主一看到“工人的妻子找到工作”就降低他的工资(同上)。

(186) 同上，第135页。

(187) 同上，第134页。

(188)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卷第50号。

者的一半”(189)。³⁹³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在作证时说：

“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第 5056 号)“苏格兰的普通农业劳动者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第 5057 号)“你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确实不知道。”(第 3047 号)“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和自由农业劳动者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第 3048 号)⁽¹⁹⁰⁾ 否则“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¹⁹¹⁾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

每周营养量

(单位:盎司)

	含氮成分	无氮成分	矿物质	合计
波特兰监狱的犯人	28.95	150.06	4.68	183.69
皇家海军水兵	29.63	152.91	4.52	187.06
士 兵	25.55	114.49	3.94	143.98
马车制造工人	24.53	162.06	4.23	190.82
排 字 工 人	21.24	100.83	3.12	125.19
农 业 工 人	17.73	118.06	3.29	139.08

医务调查委员会对英国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读者已经知道了。^①它表明,许多农

(189) 同上,第 77 页。《大法官备忘录》。

(190) 同上,第 2 卷证词。

(191) 同上,第 1 卷附录第 280 页。

① 见本卷第 703—706 页。——编者注

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沃尔、德文、萨默塞特、多尔塞特、威尔特、斯塔福德、牛津、伯克斯和赫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西蒙医生说：

“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我们指出的平均量多，因为他得到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都是如此。”⁽¹⁹²⁾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但是他们的总数在减少，由 1851 年的 288 272 人减少到 1861 年的 204 962 人。

斯密斯医生说：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给家庭增加一些钱用于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¹⁹³⁾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在联合王国的农业劳动者中英格兰农业劳动者的营养是最差的。下表就是他们的食物的比较分析：

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的碳素和氮素⁽¹⁹⁴⁾

(单位：格令)

	碳素	氮素
英格兰	40 673	1 594
威尔士	48 354	2 031
苏格兰	48 980	2 348
爱尔兰	43 366	2 434

(192) 《公共卫生。第 6 号报告。1863 年》1864 年伦敦版第 238、249、261、262 页。

(193) 同上，第 262 页。

(194) 同上，第 17 页。英格兰农业工人得到的牛奶量只等于爱尔兰农业

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

工人的 $\frac{1}{4}$ ，面包量只等于 $\frac{1}{2}$ 。本世纪初，阿·杨格在他的《爱尔兰游记》中就指出，爱尔兰工人的营养状况要好些。理由很简单：贫穷的爱尔兰租地农场主比富裕的英格兰租地农场主要人道得多。至于威尔士公国，正文中引用的资料不适用于它的西南地区。“当地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承认，随着居民身体状况的恶化，由结核病和瘰疬病等等引起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了，并且一致认为身体状况的恶化是由贫穷造成的。当地农业劳动者一天的生活费大约为5便士，在许多地区，租地农场主（他自己也很拮据）付给的还要少些。大量的葱花麦面汤或燕麦粥，加上一片干得像红木一样硬、几乎不值得费很大的劲去消化的咸肉，或者加上一小块油脂当做调味品，每天都是这样的饮食。工业进步的结果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说，不过是在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下用廉价的棉织品代替了结实的家庭手织棉布，用‘名义上的’茶代替了浓烈的饮料……农民在风吹雨打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下来烤烤火，烧的是泥炭或用黏土和煤末做的煤球，碳酸气和硫酸气烟雾腾腾。小屋的墙是用黏土和石块砌成的，地是光秃秃的泥地，跟没盖房子以前一样，屋顶是一堆切碎的、蓬松的秸秆。为了保暖，所有的裂缝都堵死了。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有些曾在夜间不得不在这类小屋里待过几小时的助产医生们描绘说，他们的双脚曾怎样陷在泥泞里，他们曾经怎样不得不在墙上挖一个小洞（这很容易办到）为自己吸点新鲜空气。各阶层的大量证人都证明，吃不饱的农民每天晚上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有害健康的影响下；其结果是居民身体孱弱，常常患瘰疬病，在这方面确实不乏证据……卡马森郡和卡迪根郡的教区官吏的报告也清楚地证明了同样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灾难，这就是白痴病的流行。下面再谈谈气候情况。在威尔士全境，一年中有八九个月刮着强烈的西南风，带来了暴雨，受侵袭的主要是丘陵地带的西坡。树木稀少，只有在遮挡的地方才能见到，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全被大风刮倒了。小屋都蜷缩在山脚下，往往是在山沟里或者石坑里，只有最小的羊和本地的牛才能在这种牧场上生活……年轻人都跑到格拉摩根郡和蒙茅斯郡的东部矿区去了。卡马森郡是矿工的繁殖场和他们的残疾人收容所……人口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在卡迪根郡：

“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劳动者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要找到栖身之所困难大得多了,即使找到了,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束手无策,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一个像样的住处还是找到一个猪舍,同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要求他支付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上面建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像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像雨露和阳光一样必不可少……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这就是济贫法关于居住和教区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195) 在这项法律的影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农业工人和他的一家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无论这种劳动是多么辛苦,它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是这样近,他只要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大地主们(196) 只要决定不

	1851年	1861年
男人	45 155	44 446
女人	52 459	52 955
	97 614	97 401

(汉特医生的报告,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1865年伦敦版第498—502页)

(195) 1865年这项法律有了某些改进。但是人们从经验中很快就知道,这种修补是无济于事的。

(196) 为了便于理解下文,这里要说明:close villages(非开放村庄)是指一个或两个大地主所有的村庄;open villages(开放村庄)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地主的村庄。建筑投机家只有在开放村庄才能建造小屋和旅店。

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劳动者的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减轻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能够像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法律和宪法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 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这是对农业劳动者的居住条件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之一……”

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据调查，在最近 10 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兰的 821 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

拿 1861 年和 1851 年相比，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那些不得不在自己劳动的教区以外居住的人之外，居民人数增加了 $5\frac{1}{3}\%$ ，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 $4\frac{1}{2}\%$ …… 汉特医生说：

“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供人观赏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了牧羊人、园丁、看守狩猎场的人以及其他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¹⁹⁷⁾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居住在地主的庄园里，而是也许从 3 英里外的开放村庄来的；他们是在自己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在那里被接纳下来的。在那些拆除工作正在进行的地方，小屋的悲惨景象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子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劳动者租用，而他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像样的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从来不修缮，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

(197) 这种村庄华而不实，如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巡游克里木时所看到的村庄一样。³⁹⁴近来，连牧羊人往往也被赶出这些供人观赏的村庄了。例如，在哈伯勒市场附近有一个占地将近 500 英亩的牧羊场，这里只需要一个男劳力。以前，为了减少在这个辽阔的草原——莱斯特和北安普敦的美丽的牧场上进行长途跋涉，牧羊人通常可以在农场上得到一所小屋。而现在多付给他一个先令让他到很远的开放村庄去租住处了。

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开放村庄或最近的小村子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劳动者接纳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是这个‘附近’也可能离劳动者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3—4英里远。这样,工人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6—8英里路,而这好像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干了。然而住的地方离做工的地方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于此。在开放村庄里,建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多种最廉价的简陋小屋。在这些肮脏不堪的小屋里挤满了英格兰农业工人。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的城市住宅的种种弊病⁽¹⁹⁸⁾……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许多地主认为,能让工人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

(198) “工人住宅〈在开放村庄里,这些住宅当然总是挤得满满的〉通常都是盖成一排一排的,后端紧挨着建筑投机家声称属于他的小块地皮的边缘。因此这些住宅只有从正面才能透进阳光和空气。”(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5页)“在农村中,啤酒店老板或小店主往往同时就是房屋出租者。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工人除了租地农场主外,又有了这第二个主人。他必须既是这个主人的房客又是这个主人的顾客。农业工人每周收入10先令,除每年付房租4镑外,还得按小店主随意规定的价格向他购买一点茶叶、糖、面粉、肥皂、蜡烛和啤酒。”(同上,第132页)这些开放村庄实际上成了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的“流放地”。许多小屋不过是当地一切流氓出出进进的场所。村民和他的家庭虽然在最污浊的环境中也往往能真正令人惊奇地保持纯朴正直的品格,但是在这种地方也会彻底堕落。显贵的夏洛克们在谈到建筑投机家、小地主和开放村庄时,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这在他们中间已经成了一种时髦。但是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没有他们的“非开放村庄和供人观赏的村庄”,这些开放村庄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开放村庄的小地主,绝大部分农业工人就得在他们劳动的田庄的树下过夜了。”(同上,第135页)“开放村庄”和“非开放村庄”的制度,在英格兰中部各郡和东部地区非常流行。

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199) 这也许是一座破落的小屋, 只有一间卧室, 没有火炉, 没有厕所, 没有窗户, 除了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 没有园圃, 但劳动者对这种不公正也无可奈何。而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的地主们来实行……我们决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 住宅固然普遍恶劣不堪, 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 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 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 而且也使一切关心体面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总是不停地用一成不变的看来已成老套的词句指出, 由于居住过挤, 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报告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 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 但是由于居民过于密集, 传染病的蔓延也促使一般的疾病发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另一种更严重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限于保健工作, 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告中指出, 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 这必定使人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 道德的败坏几乎是必然的(200)……例如, 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 载有奥德医

(199) “房屋出租者(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直接或者间接地靠别人的劳动致富, 他每周给这个人 10 先令工资, 然后每年再从这个穷鬼身上榨取 4 镑或 5 镑房租。这种房子在市场上连 20 镑也不值, 但是由于地主的权力却保持着人为的价格, 地主会说: ‘要么住我的房子, 要么滚你的蛋, 没有我的证明, 看你到哪里去找住处……’ 如果有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 想到采石场去干活或者到铁路上去铺轨, 同样的权力又会对他说: ‘要么拿这样的低工资给我干下去, 要么再过一个星期就滚蛋, 有猪你也弄走, 往后看你从你的菜园里长的马铃薯中能搞到什么’。在地主(或租地农场主)认为对他有利的情况下, 他就抬高房租, 以作为对工人辞工的惩罚。”(同上, 第 132 页)

(200) “新婚夫妇对于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成年弟弟妹妹不会有什么好影响, 虽然不能记下实例, 但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实这种说法; 血亲通奸罪使妇女招致极大痛苦, 甚至常常死亡。”(汉特医生的报告, 同上, 第 137 页) 有个曾在

生关于白金汉郡温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夫来的年轻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9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在几星期内,9人中有5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患热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10个人。几星期以前这个房间曾住过13个儿童。”(201)

汉特医生调查过5375户农村劳动者居住的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5375座小屋中,2195座小屋只有一间卧室(整个住宅往往只有这一间屋子),2930座小屋有2间卧室,250座小屋有2间卧室以上。以下是12个郡中的若干例子。

1. 贝德福德郡:

雷斯林沃思:卧室大约长12英尺、宽10英尺,还有许多比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5英尺6英寸的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每年3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只提供一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一个叫理查森的一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一个奇观。它的石灰墙鼓得像行屈膝礼的女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木头和泥土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像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很粗的棍子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和窗

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过多年侦探的农村警官,在谈到他们村的姑娘时说:“她们在这样小的年纪就这样道德败坏,这样放荡不羁和厚颜无耻,这是我在伦敦风气最坏的街区当侦探时都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像猪一般地生活,小伙子和大姑娘,母亲和父亲,统统睡在一个房间里。”(《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1867年伦敦版,附录第77页第155号)

(201) 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第9—14页。

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 17 户人家中，只 4 户有卧室一间以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 3 个大人和 3 个孩子，另一户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 6 个孩子，如此等等。

邓顿：房租昂贵，每年 4 镑至 5 镑，男子每周工资 10 先令。他们都想靠家庭劳动（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 6 个大人和 4 个孩子的卧室，房租是 3 镑 10 先令。邓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 15 英尺，宽 10 英尺，租金 3 镑。在调查过的 14 户人家中，只有一户有两间卧室。村前不远有一户人家，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 9 英寸。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向外塞上几块瓦片，再挡上块破席子。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3 个大人和 5 个小孩挤做一团。邓顿比起比格尔斯韦德联合教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

2. 伯克郡：

比内姆：1864 年 6 月，一间小平房住着丈夫、妻子和 4 个孩子。一个女儿得了猩红热，解雇后回到家里就死了。另一个孩子也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要保证隔离很难，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放着这一家人的待洗的衣物。——哈家的房租每周 1 先令，唯一的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和 6 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 8 便士（每周）；长 14 英尺 6 英寸，宽 7 英尺，厨房高 6 英尺；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只有一个通向过道的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来的。

3. 白金汉郡：

在 1 000 英亩土地上建有 30 户小屋，大约住着 130—140 人。布拉德纳姆教区占地 1 000 英亩，1851 年有 36 户人家，住着 84 个男人和 54 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 1861 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有 98 人，女子 87 人，10 年间男子增加 14 人，女子增加 33 人。然而户数却减少了一户。

温斯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大，因为非常整脚的小屋每周也要付 1 先令或 1 先令 3 便士的租金。

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 20% 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 4 英里路，有人问他能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不能，他们生怕招到像我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温斯洛附近的廷克斯恩德：一间卧室长 11 英尺，宽 9 英尺，最高处 6 英尺 5 英寸，住着 4 个大人和 5 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 11 英尺 7 英寸，宽 9 英尺，高 5 英尺 10 英寸，住着 6 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 1 先令 4 便士到 2 先令。在调查过的 16 户人家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 10 先令的收入。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 4 英尺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的小屋倒有许多通风口。

4. 剑桥郡：

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这样破烂不堪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

端的灾难,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不幸的房客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8—9个人硬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6个大人各带着1—2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

5. 埃塞克斯:

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居民和小屋同时减少。但是有22个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种到处发生的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面积为3443英亩的芬格林霍教区,1851年有房屋145座,到1861年只剩了110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拉姆斯登克莱斯教区,1851年252人住在61座房屋里,而到1861年,262人却挤在49座房屋里。在面积为1827英亩的巴西尔登教区,1851年157人住35座房屋,10年以后,180人却只住27座房屋。在总面积为8449英亩的芬格林霍、南芬布里奇、威德福德、巴西尔登和拉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1851年1392人住316座房屋,到1861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1473人却只住249座房屋。

6. 赫里福德郡:

这个小郡受“驱逐风气”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3镑或4镑的租金出租这些小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9先令!

7. 亨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区,1851年有房屋87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1720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19座小屋。居民1831年452人,1851

年 382 人,1861 年 341 人。调查过的 14 户人家居住的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其中一户住着一对夫妇、3 个成年儿子、一个成年姑娘、4 个小孩,共计 10 人;另一户住着 3 个大人、6 个小孩。有一个房间长 12 英尺 10 英寸,宽 12 英尺 2 英寸,高 6 英尺 9 英寸,住着 8 个人;连房子向外突出的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 130 立方英尺。在这 14 间卧室内,共住着 34 个大人和 33 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大约 17 英尺)10 或 12 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家人要么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要么,像这里发生的那样,这简直很难说出口,干脆就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拿到需要粪便的地方倒掉。在日本,这类事情也要比这清洁些。

8. 林肯郡:

兰托夫特:在莱特的一家中住着 1 个男人、他的妻子、母亲和 5 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厨房顶上是卧室,还有个洗濯间。厨房和卧室长 12 英尺 2 英寸,宽 9 英尺 5 英寸。房屋总面积长 21 英尺 3 英寸,宽 9 英尺 5 英寸。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像宝塔糖一样越往上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因为有园圃吗? 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低吗? 房租很贵,每周 1 先令 3 便士。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吗? 不,离工作地点有 6 英里远,他每天来回要走 12 英里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

下面是兰托夫特教区 12 户人家的统计资料,每户都只有一间卧室,共住着 38 个大人和 36 个小孩。

兰托夫特的 12 座房屋

户数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户数	卧室	大人	小孩	总人数
1	1	3	5	8	1	1	3	3	6
1	1	4	3	7	1	1	3	2	5
1	1	4	4	8	1	1	2	0	2
1	1	5	4	9	1	1	2	3	5
1	1	2	2	4	1	1	3	3	6
1	1	5	3	8	1	1	2	4	6

9. 肯特郡：

肯宁顿，1859 年居民拥挤到了极点，当时发生了白喉，教区医生对居民中贫困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正式调查。他发现，在这个需要大量劳动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新的却没有建造。在一个地区有 4 座被称为鸟笼的小房子，每座有 4 个房间，其大小如下：

厨房 ……… 9 英尺 5 英寸×8 英尺 11 英寸×6 英尺 6 英寸
 洗濯间 …… 8 英尺 6 英寸×4 英尺 6 英寸×6 英尺 6 英寸
 卧室 ……… 8 英尺 5 英寸×5 英尺 10 英寸×6 英尺 3 英寸
 卧室 ……… 8 英尺 3 英寸×8 英尺 4 英寸×6 英尺 3 英寸

10. 北安普敦郡：

布里克斯沃思、皮茨福德、弗洛尔：这 3 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有 20—30 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栽种的谷物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并成两到三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地沟的一边是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被剥夺的劳动者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们夏天拼死拼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说：“the parson and gentlefolks seem frit to death at

them”(牧师和贵族好像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

弗洛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对夫妇和4、5或6个孩子，或者是住着3个大人和5个孩子，或者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6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8个大人和9个大人。

11. 威尔特郡：

斯特拉顿：调查过31户人家，其中8户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个教区的彭希尔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1先令3便士，住着4个大人和4个孩子，除了墙壁以外，从做得很粗糙的碎石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

12. 伍斯特郡：

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1851年到1861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4.2人增加到4.6人。

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

“即使再修建500座小屋，穷人也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反过来自然又会对“居住手段”产生压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

“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不存在救济之类的特别吸引力，那必然是从另一个更不适合的地方被赶到这儿来的。他们在这里定居，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地方了。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因为在这里，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采用机器、耕地

转化为牧场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相对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些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这种过剩在农村中所造成的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实际人数减少了,同时他们的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摇篮。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摧毁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²⁰²⁾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等处的地区,而且在秋季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

(202) “农仆的高贵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士兵,他理应得到必须由地主提供的适合已婚人居住的房屋,因为地主有权要求他从事强制劳动,就像国家要求士兵这样做一样。他的劳动,也像士兵的劳动一样,得不到按市场价格支付的报酬。像士兵一样,他也是在年幼无知、只熟悉本行职业和本乡本土的时候就被抓去的。他必须早婚并遵守各种居住法,就像士兵必须应征入伍并遵守军法一样。”(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2页)有时也例外地有某个软心肠的地主对他一手造成的荒凉景象感到惋惜。例如莱斯特伯爵在人们向他祝贺霍尔克姆城堡落成的时候就说:“一个人独居在自己的领地上是非常郁闷的事。我环顾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子外,再看不到别的房子。我成了巨人城堡中的巨人,把我所有的邻居都吃光了。”

看到。农业工人按农业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²⁰³⁾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大量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只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妇女和儿童开始受剥削的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男劳动者过剩，并使他们保持最低的工资。英格兰东部地区使我们看到了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美好结果，即帮伙制度。下面我们来看看这种制度。⁽²⁰⁴⁾

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亨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丁汉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敦、贝德福德和拉特兰各郡的个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来是沼泽，同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情况一样，是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

(203) 近十年来在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侵入农业和把“过剩的”农村人口赶往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里，居住条件也变坏了，生活也同样越来越困难。关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所造成的真正“农业无产阶级”，请参看前面引用过的科兰的《政治经济学》和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版（第56页及以下几页³⁹⁵）。1846年，法国城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到1861年，城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占71.14[%]。最近几年来，农村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又减少了。早在1846年，皮埃尔·杜邦就在自己的《工人之歌》中写道：

“穿破衣，住洞窟，
屋檐底下，垃圾堆里找栖身处，
猫头鹰，小扒手，这些黑夜之友啊，
齐来和我们同住。”

(204)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也就是最后一次报告，于1867年3月底公布，专门谈农业中的帮伙制度。

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动者来自几英里以外的、分布在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400—10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上长期住着一些劳动者(他们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100英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

“我的租地占地320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我这里。我有四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做。”⁽²⁰⁵⁾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拣石子、施肥等等。所有这些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每个帮伙由10人至40或50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不过男孩们大多一到13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6—13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所谓的坏蛋,无赖汉,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干劲和才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下干活。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²⁰⁶⁾,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从经验中发现,妇女只

(20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证词[第37页]第173号。

(206) 但是有的帮头已经变成了拥有50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成片房屋的所有主。

有在男子的指挥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少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像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样，就会拼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能使他的帮伙干6—8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道要比同个别只是偶尔雇用孩子的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这种情形大大加强了帮头的权势，以致在许多开放村庄中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雇到孩子。他也把个别儿童向租地农场主出租，不过这只是“帮伙”制度中的特殊情况。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们每天要到5、6英里有时甚至7英里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途跋涉，最后，这支流动的队伍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就像传说中的捕鼠者一样，是一个魔法师，一个民主的皇帝。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茨冈式的生活——流浪的生活，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粗野的放纵——把他的臣民笼络住。帮头常常在小酒馆里支付工资，大家开怀畅饮，然后酩酊而归，受人尊敬的帮头步履蹒跚，左右由一个剽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这种归途成了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³⁹⁶的凯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开放村庄是这些帮伙产生和聚集的地方，成了所多玛和蛾摩拉³⁹⁷（207），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是最多的。受这种环境熏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会落

（207）“拉德福德郡有半数少女让帮伙制度毁了。”（同上，附录第6页第32号）

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²⁰⁸⁾ 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一样，但人数较少，这种帮伙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了。

最近几年来不断壮大的帮伙制度⁽²⁰⁹⁾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利益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²¹⁰⁾或地主⁽²¹¹⁾的发财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方法能把他的劳动者人数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而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²¹²⁾，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不会再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

(208) 见本书第 172、173 页。

(209) “最近几年来，这种制度大为流行。在某些地区，这种制度刚实行不久，在另一些实行较久的地区，就有更多和更年幼的儿童被卷到帮伙里面来了。”(同上，第 79 页第 174 号)

(210) “小租地农场主不使用帮伙。”“贫瘠的土地上不使用帮伙，只有每英亩能提供 2 镑至 2 镑 10 先令地租的土地上才使用帮伙。”(同上，第 17 页和第 14 页)

(211) 有一位地主担心他的地租可能会减少，他愤然地对调查委员会说，一切喧扰的产生只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名称太刺耳了。如果不叫“帮伙”，而叫“农村少年工农业合作协会”，那么谁也不会再说什么了。

(212) 一个当过帮头的人说：“帮伙劳动比任何其他劳动都便宜，这就是人们所以使用它的原因。”(《童工调查委员会。第 6 号报告》，第 17 页第 14 号) 一个租地农场主说：“帮伙制度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无疑是最便宜的，对儿童来说无疑是最有害的。”(同上，第 16 页第 3 号)

一方面公开承认农业工人处于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²¹³⁾

林肯郡的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被玷污的农业工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正负两极。⁽²¹⁴⁾

(213) “毫无疑问，现在由帮伙中的儿童干的许多活过去都是由男子和妇女干的。在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现在失业的男子比以前更多了。”（同上，第43页第202号）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农业地区，特别是产粮区，因为农民移居国外以及铁路使他们便于流往大城市，劳力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这个“证人”是某个大地主在农村的代理人）认为儿童劳动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80页第180号）。英格兰农业地区的劳力问题和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同，这是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农村工人外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在农村中永远保持足够的“相对过剩人口”并从而使农业工人永远领取最低工资？

(214) 在本书第四篇中我曾引用过的《公共卫生报告》，在说明儿童死亡率时顺便谈到了帮伙制度，这个报告一直是报刊从而是英国公众所不知道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六号报告却为报刊提供了求之不得的耸人听闻的材料。自由派报刊质问那些雍容尔雅的绅士们、女士们和英国国教会享受高额俸禄的人们，那些曾派出自己的使团到另一半球去驯化南洋野人的人物们，怎么竟会睁着眼睛听任这样的弊害在他们的庄园内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上流报刊则大谈特谈农村居民的极端堕落，他们愚蠢到了竟肯把亲生儿女卖身为奴的地步！其实，这些“野人们”处在开明的阶级把他们紧紧束缚住的那种万恶的条件下，就是把他们自己的儿女吃掉，也是可以理解的。真正值得惊奇的，倒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保持良好品德。官方报告的起草人证明，甚至在帮伙制度盛行的地区，父母们对这种制度也非常反感。“在我们收集的证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证明，如果有一项强制法律能够使父母们抵制他们经常遇到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多半会感激不尽。时而是教区官吏，时而是雇主用解雇威胁他们，强迫他们从孩子身上谋利，而不是送他们去上学。时间上和精力上造成种种浪费，农民全家由于过度的无益的劳累而含辛茹苦，父母们眼看自己的子女由于小屋居住过挤或者帮伙制度的恶劣影响而道德败坏，所有这一切在劳苦的穷人心中

(f) 爱尔兰³⁹⁸

在结束本篇时,我们还应该离开英格兰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1841年曾达到8 222 664人,1861年减少到5 788 415人,1866年减少到5 500 000人,即几乎减少到1800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1846年开始的,此后不到20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 $\frac{5}{16}$ 以上。⁽²¹⁵⁾1851年5月到1865年7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数为1 591 487人,而在1861年到1865年最近5年间移居国外的人口达500 000人以上。住宅从1851年到1861年减少了52 990座。从1851年到1861年,15—30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61 000个,3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109 000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数减少了120 000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集中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自然,产品总量也减少了。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1861年到1865年这5年就够了。这5年间,有500 000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330 000以上(见

会引起怎样的感触是不难理解的,这里用不着详加叙述。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于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许多痛苦的处境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只要他们有能力,他们是决不会表示赞同的,但是他们无力反抗这种处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XX页第82号;第XXIII页第96号)

(215) 爱尔兰的人口:1801年5 319 867人,1811年6 084 996人,1821年6 869 544人,1831年7 828 347人,1841年8 222 664人。

A表)。

A表 牲畜头数⁽²¹⁶⁾

年 份	马		牛		
	总 数	减 少	总 数	减 少	增 加
1860	619 811	—	3 606 374	—	—
1861	614 232	5 579	3 471 688	134 686	—
1862	602 894	11 338	3 254 890	216 798	—
1863	579 978	22 916	3 144 231	110 659	—
1864	562 158	17 820	3 262 294	—	118 063
1865	547 867	14 291	3 493 414	—	231 120

年 份	羊			猪		
	总 数	减 少	增 加	总 数	减 少	增 加
1860	3 542 080	—	—	1 271 072	—	—
1861	3 556 050	—	13 970	1 102 042	169 030	—
1862	3 456 132	99 918	—	1 154 324	—	52 282
1863	3 308 204	147 928	—	1 067 458	86 866	—
1864	3 366 941	—	58 737	1 058 480	8 978	—
1865	3 688 742	—	321 801	1 299 893	—	241 413

根据上表可得出如下结果：

马	牛	羊	猪
绝对减少	绝对减少	绝对增加	绝对增加
71 944	112 960	146 662	28 821

(216) 如果我们回溯得更远一些,结果会更加糟糕。例如,1865年有羊3 688 742只,而1856年是3 694 294只;1865年有猪1 299 893头,而1858年是1 409 883头。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人和牲畜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中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增加或减少的数字。“谷物”包括小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甜萝卜、甜菜、白菜、欧洲防风、野豌豆等等。

B表 耕地和草地(即牧场)的面积增减情况
(单位:英亩)

年 份	谷 物 地		蔬 菜 地		草 地 和 三 叶 草 地		亚 麻 地		耕 地 及 畜 牧 地 总 面 积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1861	15 701	—	36 974	—	47 969	—	—	19 271	81 873	—
1862	72 734	—	74 785	—	—	6 623	—	2 055	138 841	—
1863	144 719	—	19 358	—	—	7 724	—	63 922	92 431	—
1864	122 437	—	2 317	—	—	47 486	—	87 761	—	10 493
1865	72 450	—	—	25 421	—	68 970	50 159	—	28 218	—
1861—65	428 041	—	108 013	—	—	82 834	—	122 850	330 370	—

1865年,“草地”增加了127 470英亩,因为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101 543英亩。我们把1865年同1864年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246 667夸特(一个英国夸特=29 078升),其中小麦减少48 999夸特,燕麦减少166 605夸特,大麦减少29 892夸特,等等;马铃薯种植面积在1865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446 398吨,等等[见C表]。

C表 耕地面积、每英亩产量和总产量的增减(1865年和1864年比较表)(217)

产 品	耕地英亩数		1865年的 增减情况		每英亩产量		1865年的 增减情况		总 产 量		1865年的 增减情况	
	1864	1865	+	-	1864 (英担) (吨)	1865 (英担) (吨)	+	-	1864 (夸特) (吨)	1865 (夸特) (吨)	+	-
小 麦	276 483	266 989	—	9 494	13.3	13.0	—	0.3	875 782	826 783	—	(夸特) 48 999
燕 麦	1 814 886	1 745 228	—	69 658	12.1	12.3	0.2	—	7 826 332	7 659 727	—	166 605
大 麦	172 700	177 102	4 402	—	15.9	14.9	—	1.0	761 909	732 017	—	29 892
毕 尔 麦	8 894	10 091	1 197	—	16.4	14.8	—	1.6	15 160	13 989	—	1 171
黑 麦	—	—	—	—	8.5	10.4	1.9	—	12 680	18 364	5 684	(吨)
马 铃 薯	1 039 724	1 066 260	26 536	—	4.1	3.6	—	0.5	4 312 388	3 865 990	—	446 398
芜 菁 薯 卜	337 355	334 212	—	3 143	10.3	9.9	—	0.4	3 467 659	3 301 683	—	165 976
[甜 萝 卜]	14 073	14 389	316	—	10.5	13.3	2.8	—	147 284	191 937	44 653	—
白 菜	31 821	33 622	1 801	—	9.3	10.4	1.1	—	297 375	350 252	52 877	—
亚 麻	301 693	251 433	—	50 260	34.2*	25.2*	—	9.0*	64 506	39 561	—	24 945
干 草	1 609 569	1 673 493	68 924	—	1.6	1.8	0.2	—	2 607 153	3 068 707	461 554	—

* 单位为英石(1英石合14磅)

(217) 表中的数字是据《爱尔兰农业统计。1860年各郡各省农作物的种植亩数和牲畜存栏数概况》(1860年都柏林版)以及以后各年的统计和《爱尔兰农业统计。1865年平均产量估计表》(1866年都和林版)的材料汇编的。我们知道,这些统计资料是每年向议会提出的官方统计资料。——官方统计表明,1872年的耕地面积比1871年减少134 915英亩。芜菁、胡萝卜等菜类种植面积增加了;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是:小麦减少16 000英亩,燕麦减少14 000英亩,大麦和黑麦减少4 000英亩,马铃薯减少66 632英亩,亚麻减少34 667英亩,草地、三叶草地、野豌豆、芜菁和油菜籽播种面积减少30 000英亩。小麦种植面积在最近5年中逐年减少的情况如下:1868年为285 000英亩,1869年为280 000英亩,1870年为259 000英亩,1871年为244 000英亩,1872年为228 000英亩。按整数计算,1872年马增加2 600匹,牛增加80 000头,羊增加28 682只,猪减少236 000头。

我们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应该考察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D表,应当指出,D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英国人所说的自由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总之,“技能”的收入,表内没有详细列出的C和E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入。

D表 应纳所得税的收入(218)
(单位:镑)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A项 地租	12 893 829	13 003 554	13 398 938	13 494 091	13 470 700	13 801 616
B项 租地农场主 的利润	2 765 387	2 773 644	2 937 899	2 938 923	2 930 874	2 946 072
D项 工业等利润	4 891 652	3 836 203	3 858 800	4 846 497	4 546 147	4 850 199
A至E 各项合计	22 962 885	22 998 394	23 597 574	23 658 631	23 236 298	23 930 340

从1853年到1864年,D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0.93%,而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4.48%。下表表明1864年和1865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

(218)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

E表 爱尔兰的D项利润收入(60镑以上者)⁽²¹⁹⁾

	1864年		1865年	
	镑	分配人数	镑	分配人数
年总收入	4 368 610	17 467	4 669 979	18 081
60镑以上100镑以下的 年收入	238 726	5 015	222 575	4 703
年总收入中	1 979 066	11 821	2 028 571	12 184
年总收入中尚余	2 150 818	1 131	2 418 833	1 194
其中	1 073 906	1 010	1 097 927	1 044
	1 076 912	121	1 320 906	150
	430 535	95	584 458	122
	646 377	26	736 448	28
	262 819	3	274 528	3

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它的人口也像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许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

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荒废,使农产品大大减少,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像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随着小的租地农场被大的租地农场兼并和耕地转化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纯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其中一

(219) D项中年总收入的数字同前表不符,因为已经做了法律许可的一定扣除。

部分的纯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纯产品的货币价值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 20 年来,特别是最近 10 年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上涨了。

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为生产者本身提供就业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他人劳动不靠别人劳动增殖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因此,用在农业上的生产资料量与人口同时减少,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了。

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 20 年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波动之中。但是,这个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更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对增长量很小,但是同不断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这个增长量还是相当大的。

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个过程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著名的教条了。按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恢复平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 14 世纪中叶的鼠疫¹⁶⁸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而且,把 14 世纪的尺度应用到 19 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变动上来,这是一种学究式的天真,另一方面,他们引用这次造成欧洲人口大量死亡的鼠疫而不知道这次鼠疫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后果,这是小学生的知识水平;在英格兰,这次鼠疫导致了农民的致富和解放,但在法兰西却导致了贫困和更全面的奴役⁽²²⁰⁾。

(220) 因为爱尔兰被看做“人口原理”的乐土,所以托·萨德勒在发表他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著作之前,先出版了他的批判马尔萨斯的名著:《爱尔兰,它的

爱尔兰 1846 年的饥荒毁灭的人超过 100 万,然而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直接遭受损失。此后 20 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也不像例如德国的三十年战争那样,在减少人口的同时也减少他们的生产资料。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方法,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美洲的移民,逐年寄回国一笔钱,给亲属和朋友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反而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有组织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而是使每年从人口中夺走的人数多于新生的人数,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221)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劳动者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手同 1846 年以前一样庞大;实际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把这个国家引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在英格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使用大量人手的菜类例如蔬菜等等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了。在爱尔兰,从前的大片耕地转化为休耕地或永久的牧场,而同时一部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主——我把耕地不超过 100 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

灾难及其补救办法》(1829 年伦敦第 2 版)。在该书中,他比较了爱尔兰各省的统计资料以及每一省里各郡的统计资料,并证明,爱尔兰各地的贫困并不像马尔萨斯所设想的那样同人口密度成正比,而是同人口密度成反比。

(221) 1851—1874 年期间,移居国外的总人数达 2 325 922 人。

内——仍然占总数的 $\frac{8}{10}$ 。(222)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

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麻布制造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像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和痉挛而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分散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像它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同样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零售商、小工场主、手工业者,总之,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减少了。E表内60—100镑之间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原因。

关于农业雇佣工人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1870年)(223)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齿的。虽然他们

(222) 根据墨菲《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年版)一书中的一个统计表:在所有的租地农场中,占有土地100英亩以下者为94.6%,占有土地100英亩以上者为5.4%。

(223)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并参看《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3月8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

明智地采取了谨慎的做法,但是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主人沉湎于幻想。

据他们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 20 年来已经提高了 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 6—9 先令。

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就可作为例证。

每人每周的平均生活费

日 期	食	衣	合 计
到 1849 年 9 月 29 日止	1 先令 $3\frac{1}{4}$ 便士	3 便士	1 先令 $6\frac{1}{4}$ 便士
到 1869 年 9 月 29 日止	2 先令 $7\frac{1}{4}$ 便士	6 便士	3 先令 $1\frac{1}{4}$ 便士

可见,同 20 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如果只是比较两个时期的货币工资率,就可能得出非常错误的结论。在发生灾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工资的补充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工资率必然提高。

“饥荒以前,农业劳动者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丧失了。”(224)

(224)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 年版第 [29、]1 页。

从前,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大农场和中等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真正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1846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工人尽管人数日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除了阿尔斯特省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利默里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韦克斯福德、威克洛等郡,中部有女王郡、国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唐郡、安特里姆、蒂龙等郡,最后,西部有斯莱戈、罗斯康芒、梅奥、戈尔韦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直是宗教和我国文明的耻辱。”⁽²²⁵⁾为了使农业工人們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工人对那些把他们当做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²²⁶⁾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劳动者不得不到附近的城市和村镇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像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

(225) 同上,第12页。

(226) 同上,第12页。

移植到腐化堕落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被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定；同时，

“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经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和贫困”⁽²²⁷⁾。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纳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人手”⁽²²⁸⁾，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人手过剩，而农业地区中则人手不足！”⁽²²⁹⁾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人手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²³⁰⁾；“秋收以后，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²³¹⁾；甚至在干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²³²⁾。

农业革命——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模范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

“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人手，小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当时的普通短工的工资还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事情而招致许

(227) 同上，第25页。

(228) 同上，第27页。

(229) 同上，第26页。

(230) 同上，第1页。

(231) 同上，第32页。

(232) 同上，第25页。

多不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233)。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频繁和长期的被迫失业,所有这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收容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城市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转化为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人口,虽然不断压低城市的工资率,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工人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述: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他们的居住环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234)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这就是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丹——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埃林^①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就

(233) 同上,第30页。

(234) 同上,第21、13页。

① 凯尔特语:绿岛;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

可以说明。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他是一个干活的好手，不然是不会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场制造商品的。我把约翰逊（这是他的名字）亲口对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他说：我是一个捶布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6点钟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干这种活每周收入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大女儿12岁，料理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唯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起床上班。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5点半钟把我叫醒。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班。白天，12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8点钟回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买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下班以后，我总是感到非常疲乏。我们偶尔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们有3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每两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²³⁵⁾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为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弗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摩菲斯特斐勒司说：“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³⁹⁹

我们从E表可以看出，1864年，3个剩余价值制造者从爱尔兰

⁽²³⁵⁾ 视察员贝克在上面引用的这段话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感想：“我们很自然地会把这位面带病容的熟练工人和南部斯塔福德郡的身体健康，肌肉发达的搅炼工作一比较。后者每周的工资和许多绅士、学者的收入一样，甚至更多。但是他们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停留在乞丐的水平。”《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1867年伦敦版]第96、97页。

实现的总利润 4 368 610 镑中攫取了 262 610 镑,而 1865 年,同是这 3 位大“禁欲家”就从总利润 4 669 979 镑中捞去 274 528 镑;1864 年,26 个剩余价值制造者得到 646 377 镑,1865 年,28 个剩余价值制造者得到 736 448 镑;1864 年,121 个剩余价值制造者得到 1 076 912 镑,1865 年,150 个剩余价值制造者得到 1 320 906 镑;1864 年,1 131 个剩余价值制造者得到 2 150 818 镑,几乎占全年总利润的一半,1865 年,1 194 个积累狂得到 2 418 833 镑,超过全年总利润的一半。可是同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情况一样,爱尔兰的一小撮大地主从年土地收入中吞掉的数额是如此庞大,以致英国的治国明哲认为,关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像利润分配这样的统计资料。达弗林侯爵就是这些大地主中的一个。说地租、工业或商业利润、利息等等会在某个时候过多,或者说财富的过多同人民的过于贫困有某种联系,这当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看法。侯爵依据的是事实。事实是,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而爱尔兰的地租却增长了;人口减少对地主“有利”,从而对土地以及仅仅是土地附属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留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仍然太多,人口外流仍然不够。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爱尔兰至少还应该再排出 30 多万农民。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①见病人没有起色,就让放血,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没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位还很富有诗意的侯爵是个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他只是要求 45 万牺牲者而不是 200 万。如果拒绝他的要求,就别想在爱尔兰建立起千年王国。证据是可以立即提出来的。

^① 桑格拉都是勒萨日的小说《山梯良那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中的人物,医生,他医治一切疾病时都给病人放血和让他们喝温水。——编者注

1864 年爱尔兰租地农场的数目和面积
(单位:英亩)

1 1 英亩以下的 租地农场		2 1—5 英亩 的租地农场		3 6—15 英亩 的租地农场		4 16—30 英亩 的租地农场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48 653	25 394	82 037	288 916	176 368	1 836 310	136 578	3 051 343
5 31—50 英亩 的租地农场		6 51—100 英亩 的租地农场		7 100 英亩以上 的租地农场		8 总面积 (泥沼地和荒 地包括在内)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71 961	2 906 274	54 247	3 983 880	31 927	8 227 807	20 319 924	

1851 年到 1861 年间的集中只是消灭了前三类 1 英亩以下至 15 英亩的一部分租地农场。这些农场必然要先于其他农场被消灭。结果就产生了 307 058 户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 4 口人,那么就有 1 228 232“过剩人口”。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完成后,其中的 $\frac{1}{4}$ 将被吸收,结果仍须有 921 174 人移居国外。15—100 英亩的 4、5、6 三类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的谷物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大家在英格兰就知道的。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 788 358 人移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 1 709 532 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⁴⁰⁰,所以大地主们立刻会发现,具有 350 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贫困,而贫困的原因是爱尔兰人太多,因此,它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人口,才能完成它的真正使命,即成为辽阔的牧场和草地,以便满足英格兰饕

饕的吸血鬼的贪欲。(236)

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像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也有它的缺陷。随着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爱尔兰人在美国也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被牛和羊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社社员⁴⁰²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轻的大共和国面对日趋衰落的海上女皇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

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⁴⁰³

(236) 在本书第二卷论述土地所有制的那一篇，我将更详细地谈到，英国的立法以及爱尔兰的土地所有者如何共同利用饥荒和饥谨来推行农业革命，并使人口减少⁴⁰¹。在那里我还要重新谈到小租地农民的状况。这里只引证一段话。纳索·威·西尼耳在他的遗著《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中提到：“G博士非常正确地指出：首先我们有了自己的济贫法，这是使地主取胜的强大武器；另一个武器就是往国外移民。没有一个爱尔兰朋友〈应读做在爱尔兰实行英格兰统治的朋友〉会希望战争〈地主和凯尔特族小租地农民之间的战争〉拖延下去，更不希望这场战争以小租地农民获胜而告终。这场战争越是迅速地结束，爱尔兰越是迅速地变成牧场国，同时人口相应地减少到一个牧场国所需要的程度，对一切阶级就越是有利。”(同上，第2卷第282页)1815年的英国谷物法保证了爱尔兰向大不列颠自由输出谷物的独占权。这样一来，谷物法就人为地促进了谷物生产。1846年，当议会废除谷物法时，这种独占权突然消灭了。即使撇开其他各种情况不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大大促使耕地向牧场转化、租地农场的积聚和小农的被驱逐。1815—1846年间，人们称赞爱尔兰土地的资源，大肆宣扬爱尔兰的土地天然适合种植小麦，可是后来，英国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又突然发现，这些土地除适于种植青饲料外别无用处！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也急急忙忙在海峡彼岸重复这种论调。大概只有像拉韦涅那样认真的人才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第八篇

原始积累

第二十六章

原始积累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变成资本,资本怎样成为剩余价值的源泉,而剩余价值又怎样成为追加资本的源泉。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的存在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只是在既是生产者又是商人的人手中已经积累了足够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时才出现。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⁴⁰⁴人们用创世数日之后发生的奇遇来解释这种罪恶的起源。

在很久很久以前,社会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有节约习惯的精英人物,另一种是整天吃喝玩乐的无赖汉。

不言而喻,前一种人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而后一种人则很快失去了一切。由此产生了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前者尽管无休止地劳动,仍然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来支付,而后者虽然手指都没有动一下,却获得了全部劳动果实。

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故事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怎样注定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故事则向我们揭示,怎么有的人会逃脱上帝的这种安排,从而填补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

人们不厌其烦地叨念这些乏味的儿童故事。例如,梯也尔先生竟然现在还用这种儿童故事戏弄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法国人,他在一部著作中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这部著作中以政治家的厚颜无耻断言已经粉碎了社会主义对所有权的诽谤性的攻击。确实,一旦讨论到所有权问题,每个人就都认为自己的神圣义务是满足于识字课本的智慧,即满足于只是各种年龄的小学生所能运用和达到的智慧。(1)

在现实历史的编年史中,征服、奴役、劫掠,总之,暴力统治占优势。但是在恬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按照这些教科书的说法,除了当前这一年以外,劳动和权利从来

(1) 歌德被这种无稽之谈所激怒,用下列的对话作了嘲笑:

小学教师:告诉我,你父亲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孩子:祖父给的。

小学教师:祖父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孩子:曾祖父给的。

小学教师:曾祖父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孩子:抢来的。⁴⁰⁵

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公开关系具有纯粹商业的性质。如果说前者是主人,后者是仆人,那么这是因为有一个契约。按照这个契约,后者不仅为前者服务,从而依附于前者,而且还放弃了对他自己的产品的所有权。那么雇佣劳动者为什么要做这种交易呢?因为他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劳动力即潜在状态的劳动,而使这种潜在状态具体化所必需的一切外在条件,有效地进行劳动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维持劳动力并把劳动力转化为生产运动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支配权,所有这一切都处在另一方的手中。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这种分离就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但是,因为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没有这种分离,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至少局部地说,只是在生产者被剥夺了他们用以实现自己劳动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为既是生产者又是商人的人所占有并被用于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利时,资本主义制度才诞生。把劳动同它的外在条件分离开来的历史运动,这就是因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的史前时代而被称做“原始”积累的秘密。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从封建的经济制度的母胎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构成要素得到解放。

劳动者,直接生产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他要成为劳动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制度,摆脱行会关于师傅身份、行会理事会的规定以及行会学徒法等等。因此,使

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产业的等级制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 and 旧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用不可磨灭的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资本主义企业主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胜了领主权力和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制度及其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同时既产生雇佣工人又产生资本家的整个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 16 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到来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光荣——主权城市制度也已经衰落。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夺大量人手中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并把他们突然抛向劳动市场的变革。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

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因此，英国必然在我们的概述中占着主要的地位。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

同样的运动,虽然因环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地域色彩,或者局限在较窄的范围内,或者特征不是那么明显,或者过程的顺序不同。⁽²⁾

(2) 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比其他地方早,封建制度也比较早地消灭了。在这里,农奴在获得对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原有时效权之前,就已经在实际上得到解放。这些像空气一样自由轻松的无产者,大部分涌向了多半还是罗马帝国遗留下来而领主们早就在那里定居的城市。15世纪末世界市场上发生的巨大变革⁴⁰⁶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并使它的制造业走向没落,这时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第二十七章

对农村居民的剥夺

* 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 14 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 15 世纪,绝大多数人口⁽³⁾是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农民,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较大的封建领地上,过去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被独立的租地农场主排挤了。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在耕种自己土地以外的空闲时间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民,一种是特殊的、人数不多的雇佣工人阶级。甚至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至少还分得 4 英亩耕地和小屋。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

我们顺便指出,农奴本身不仅是他的宅旁小块土地的占有者,也就是纳税人,而且也是公有地的共有者。例如,在米拉波出版他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时,普鲁士的大多数州,其中包括西里西亚,还存在着农奴制。但是,农民占有公有地。米拉波

(3) 直到 17 世纪末,英国的农业人口占 80%。见麦考莱《詹姆士二世登基以来的英国史》1854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413 页。我所以引用麦考莱的话,是因为他作为系统的历史伪造者,总是要随心所欲地砍掉这类事实的。

说,直到今天还无法“使西里西亚人分割公有地,而在诺伊马克,几乎没有一个村庄不是非常成功地实行了这种分割”(4)。

在西欧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其他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取决于他的钱财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他的臣民的人数,也就是取决于在他的领地上定居的农民的人数。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所有组织和小农经济,同我们的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历史著作相比,它在许多方面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牺牲中世纪来显示“自由精神”,是极其方便的事情。

虽然诺曼人的征服⁴⁰⁷把整个英国分为巨大的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就包括 900 多个盎格鲁撒克逊领地——但是,农村的小地产仍然遍布全国,有些地方穿插有大的封建领地。因此,一旦农奴制消失和 15 世纪城市迅速繁荣,英国居民就达到了大法官福蒂斯丘在其《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一书中十分雄辩地描述过的富裕境地。但是英国居民的这种财富是排斥资本家的财富的。

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 15 世纪最后 30 多年和 16 世纪初演出的。由于无数的领主的家臣(这些领主的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恰当地指出的,“塞满了房屋和城堡”⁴⁰⁸)的解散,大量无家可归的无产者突然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它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手段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绝不是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同王室和议会公开对抗的大领主,通过夺去农民的公有地

(4) 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 年版第 2 卷第 125—126 页。

并把他们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他们的主人一样的封建权利)上赶走,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佛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造成了这些暴力行为。长期的蔷薇战争⁴⁰⁹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他们把货币看做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转化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

哈里逊在其著作《英国概述》(载于霍林舍德的编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对农民的剥夺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他写道:

“我们的大掠夺者什么也不在乎!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或者任其坍塌。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城堡保留下来,我可以列举很多这方面的情况。”⁽⁵⁾

这些老的编年史家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是他们准确地描绘了社会的经济制度的革命给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蒂斯丘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见15世纪和16世纪之间的鸿沟。桑顿说得对,英国劳动者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代。

立法被这一变革吓住了。它还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文明程度:把国民财富,也就是把资本家的发财致富、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

(5) 霍林舍德的编年史(两卷集)初版刊印于1577年。这是珍本书;英国博物馆所藏的一本有缺损。书名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等的编年史》第一卷,拉·霍林舍德收集并出版,伦敦威·哈里逊印刷。第二卷的书名相同。第二版分三卷,增订至1586年,1587年由约·胡克等出版。

们的贫穷化当做全部国策的极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说道：

“这时(1489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把耕地转化为少数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场；定期租地、终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农靠年度租地生活)转化为领地。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许多城市、教会衰落，使什一税减少……国王和议会为挽救这种灾难性的局势而表现出的智慧是值得赞叹的。他们采取措施来制止对公有地的灭绝人口的掠夺，来制止随之而来的灭绝人口的牧场的扩大。”

1488年亨利七世颁布的第19号法令，禁止拆毁附有2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又重申这条法律。其中谈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地租飞涨，耕地荒芜，房屋和教堂被毁，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

因此法律规定重建那些拆毁的农场上的房屋，制定耕地和牧场的比例等等。1533年的一项法令指出，有些所有者拥有24000只羊，于是规定不得超过2000只，等等。⁽⁶⁾

但是，人民的抱怨和从亨利七世以来150年内颁布的禁止剥夺农民和小租地农民的法律，都同样毫无效果。它们毫无效果的秘密，培根已经不自觉地透露给我们了。他在《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20节中写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保证农民有足够数量的土地，这样，农场和农舍就能养活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

(6) 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吃人”。

是掌握在雇工手中。”⁽⁷⁾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

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立法也曾力图使农业雇佣工人的小屋保有4英亩土地，并且禁止他们以自己的小屋招揽房客。1627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丰特米尔的罗杰·克罗克在丰特米尔的领地上修建一座小屋时，还因没有拨出4英亩土地作为小屋的永久附属物而被判罪；1638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还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监督旧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关于4英亩土地的法律的实施；克伦威尔还禁止在伦敦周围10英里的地区内修建未附有至少4英亩土地的房屋。在18世纪上半叶，如果农业工人的小屋未附有1—2英亩土地，他还会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现在，如果小屋附有一个小园子，或者在远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几平方米的土地，就是很幸运的了。汉特医生说：

(7) 培根很清楚地说明了自由的富裕农民的存在是优秀步兵的条件。他说：“保持足够的租地，以保证精明强壮的男子能过富裕的生活，使王国的大部分土地牢靠地掌握在自耕农，即处于贵族和小屋贫农、雇农之间的中等地位的人的手里，这对维持王国的威力和风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有权威的军事专家一致认为……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但是，要建立一支优秀的步兵，就需要不是在奴役或贫穷中而是在自由和富裕的状况下成长的人。因此，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上流人士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农村居民和庄稼人却是单纯的雇工或雇农，却是小屋贫农，即有栖身之处的乞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支优秀的骑兵，但绝不会有一支强健的步兵。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实际上只有贵族和贫穷的农民……因此，它们只好雇用瑞士等国的人来当自己的步兵营的士兵，结果形成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人口众多，但士兵很少。”（《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全文转载自1719年肯尼特《英国》1870年伦敦版第308页）

“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在这方面是行动一致的。他们认为，小屋附有几英亩土地就会使劳动者过于独立。”⁽⁸⁾

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掠夺，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那时，天主教会是英国绝大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教会地产落入了国王的宠臣手中，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了市民和投机的租地农场主，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走。贫苦农民对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也被暗中取消了。⁽⁹⁾伊丽莎白女王一次巡视英格兰之后叫喊说：“穷人到处受苦难。”⁴¹⁰在她执政的第四十三年，终于不得不承认救济贫民是一项国家制度并设立了济贫税。

“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说明起草该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惯例，未附有任何序言就把该法律公布了。”⁽¹⁰⁾

在查理一世时期，议会宣布这项法律是永久性的，该法律只是在1834年才进行了修改。那时，人们把贫民原先因被剥夺而作为补偿得到的东西，变成了对贫民的惩罚。

新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宗教。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新教的“精神”。那还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南部的若干土地

(8) 汉特医生《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4页。“〈旧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现在看来对于劳动者是太多了，甚至能使他们变成小租地农民。”(乔治·罗伯茨《过去若干世纪英国南部各郡人民的社会史》1856年伦敦版第184页)

(9) “贫民享有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权利是由旧法律明文规定的。”(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2卷第804、805页)

(10) 威廉·科贝特《新教改革史》第471节。

所有者和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秘密集会，彻底地研究了新颁布的济贫法。接着他们在一部提出十个经过认真推敲的问题的著作里概括了他们共同研究的结果。后来，他们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皇家律师斯尼格（后来在詹姆斯一世时晋升为法官）对这十个问题发表意见。下面是从中摘出的一部分：

“第九个问题是：本教区某些富有的租地农场主想出了一个能排除法令执行中遇到的任何困难的巧妙计划。他们建议在本教区设立一座监狱。每个贫民如不愿被投入上述监狱，就予以救济。其次，应当通知邻近居民，如果有人打算租赁这个教区的贫民，他可以在预定的期限内以密封函件提出他愿出的最低价格。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认为，邻郡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愿劳动，但又没有财产或信用可用来获得租地或船舶而不过不劳而获的生活。于是这种人只能提出对教区十分有利的价格。如果贫民在雇主的保护下死亡，那就罪在雇主，因为教区对这些贫民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我们担心，现行法令不会允许实施这类英明措施，但你们要知道，本郡及邻郡的所有其他的自由农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来敦促他们的下院议员提出这样的法案：允许监禁贫民和强迫贫民劳动，从而使任何拒绝受监禁的人都无权要求救济。我们希望，这样能使陷于贫困的人不致要求救济。”⁽¹¹⁾

但是，宗教改革的这些直接后果并不是这一改革的最重要的后

(11) 罗·布莱基《古今政治文献史》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84、85页。——苏格兰农奴制的废除要比英格兰迟几百年。1698年索尔顿的弗莱彻还在苏格兰议会中说：“在英格兰，乞丐的人数估计不下20万。我，一个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能提出的消除这种现象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农奴制的旧状态，把一切没有能力独立谋生的人变为奴隶。”同样，伊登在《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第1章中说：“农业工人的自由是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开始……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是我国贫民的真正父母。”伊登和我们的那位原则上是共和主义者的苏格兰人的错误只在于：不是农奴制的废除，而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废除，才使农民成为无产者，最后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在法国，剥夺是以另外的方式完成的，1566年的穆兰教令和1656年的敕令相当于英格兰的济贫法。

果。教会所有权是传统的土地所有权的神圣堡垒。前者受到冲击，后者也就不能维持了。(12)

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莎士比亚称为“骄傲的英国自耕农”的独立农民阶级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英格兰共和国的主要力量，甚至麦考莱也承认，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同时代乡绅即怪僻、粗鲁、嗜酒的宁禄们^①以及他们的奴仆即那些急于向乡村贵族的“弃妾”求婚的乡村教士们的风俗习惯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13)。

我们在这里不谈那些为剥夺农民做好准备的纯经济原因。我们在这里只研究那些以暴力方式加速这一剥夺过程的手段。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土地所有者终于通过立法实行掠夺，而这种掠夺随后在大陆则是不经过议会就直接完成了的。他们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摆脱了隶属关系，摆脱了由此造成的过重负担，以对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课税来补偿国家，他们要求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他们对地产只有封建权利)，最后，他们强令对

(12) 甚至罗杰斯先生这位新教正统派的故乡牛津大学的前政治经济学教授，也在自己的著作《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的序言中指出这个事实，即英国人民群众的贫困是宗教改革的结果。

(13) 《关于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萨福克一绅士著，1795年伊普斯威奇版第4页。甚至大租地制度的狂热的维护者，《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1773年伦敦版第139页)的作者也说：“我最感痛心的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我惋惜的是，看见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实行垄断的地主和小租地农民手里，而小租地农民承租的条件并不比必须随时听从召唤的仆从好多少。”

① 宁禄，圣经中挪亚的曾孙，猎人。——编者注

农村劳动者实行定居法。这个定居法使农村劳动者成为教区的附属物，就同鞑靼人波里斯·戈东诺夫的著名命令使俄国农民成为土地的附属物一样⁴¹¹。

“光荣革命”⁴¹²把谋利者、贵族地主和平民资本家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¹⁴⁾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以国库的真正大规模的浪费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以前只是在符合社交惯例的限度内有节度地对国有土地进行掠夺，现在这些土地是从新即位的国王手中被强制地夺过来，作为对国王的昔日的同伙的酬谢，或者非常便宜地出售，或者直截了当地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¹⁵⁾所有这一切都是厚颜无耻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蔑视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完成的。这种对国有土地的欺诈性的攫取和对教会地产的掠夺，——共和革命⁴¹³投入流通的土地除外——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地产权的基础。⁽¹⁶⁾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为的是把土地转化为商品，增加来自农村的无产者的供给，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等等。并且，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支持

(14) 下面的记载表明了这位资产阶级英雄的私人道德：“1695年爱尔兰的大片土地被赠送给奥克尼夫人，这是国王的宠爱和夫人的影响的公开证明……奥克尼夫人的可爱的和忠实的效劳想必就是淫秽的嘴唇的效劳。”（英国博物馆斯隆收集的原稿第4224号，原稿的标题是：《萨默斯、哈利法克斯、牛津、秘书弗农等人给什鲁斯伯里公爵的原信中所描绘的威廉国王、桑德兰等人的性格和行为》。里面充满了秘闻。）

(15) “王室土地的非法让渡（一部分通过出卖，一部分通过赠送）是英国历史上可耻的一章……是对国家的一个大欺骗。”（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29、130页）

(16) 参看埃·伯克的关于贝德福德公爵家族的小册子⁴¹⁴。自由主义的山雀约翰·罗素爵士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

保护关税制度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英国资产阶级同瑞典的资产阶级一样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的，虽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们同农民协同一致，支持国王用暴力手段夺回被贵族夺走的王室土地。⁴¹⁵

公有地——同刚才谈的国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社会中保存下来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15世纪的最后30多年，在16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这些掠夺行为当时只是个人的暴力行为，立法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150年而毫无效果。但是在18世纪，——请看这种进步吧！——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的工具，虽然这并不妨碍大租地农场主也使用自己的小办法，或者说超法律的办法。⁽¹⁷⁾

对公有地的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这实际上是地主借以把公有地当做礼物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弗·莫·伊登爵士在狡黠的辩护词中企图把公有地说成是现代地主从他们的先辈封建主那里取得的私有地，虽然这种私有地尚未分割。但是他自己否定了自己，因为他要求议会通过一项一般性的法令，永远认可公有地的圈围制。这样，他就承认，为了使公有地转让给地主的现象合法化，议会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感到满足，他在结束他的极度混乱的辩护词时，由于良心发现而坚持

(17) “租地农场主禁止小屋贫农在他们自身以外饲养牲畜和家禽等生物，其借口是：如果他们饲养牲畜或家禽，他们就会从谷仓中偷窃饲料。他们还说：如果你们使小屋贫农处于贫穷状态，你们就能使他们保持勤劳。实际情况是：租地农场主用这种办法夺取对公有地的全部权利并随心所欲地利用这种权利。”（《圈围荒地的后果的政治上的分析》1785年伦敦版第75页）

认为,应该给予贫苦农民以赔偿。⁽¹⁸⁾但是,如果没有被剥夺者,显然也就没有人需要赔偿。

当任意租户,即每年都可能被解除租契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像奴隶一样战战兢兢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阶级时,对公有地的有组织的盗窃同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结合起来,促使在18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¹⁹⁾或商人租地农场⁽²⁰⁾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工业“可以自由使用”的无产阶级。

但是,18世纪的人还不像19世纪的人那样清楚地了解到,国民财富和人民贫穷是一回事。因此,当时经济著作中就有关于“公有地的圈围”的十分激烈的论战。我从手边的大量材料⁴¹⁶中只摘录几段话,因为这几段话就能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一位作者愤慨地写道:

“在赫特福德郡的很多教区中,有24个平均占50—15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被合并为3个租地农场了。”⁽²¹⁾“在北安普敦郡和莱斯特郡,圈围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50英亩,而过去耕种的有1500英亩……过去的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迹。在某些地方,100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8所或10所。在大多数不过15年或20年前才开始圈地

(18) 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序言。——公有地圈围法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效,因此在某些地主的请愿下,下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批准在地主所要求的地区圈围公有地。

(19) “Capital-farms”(《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1767年伦敦版第19、20页。)

(20) “Merchant-farms”(《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11页注,这部匿名佳作的作者是牧师纳撒尼尔·福斯特。)

(21) 托马斯·莱特《论小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1795年版第2、3页。

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种开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4—5个富有的畜牧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20—30个租地农民和大量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他们的家属，从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们做工以维持生活的许多其他家庭。”⁽²²⁾

邻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共同耕种的土地或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耕种的土地。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圈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圈地减少了耕地，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减少……甚至像现在这样进行的荒地的圈围，也使贫民失去他们的一部分生存资料，而把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²³⁾

普赖斯博士说：

“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么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指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公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就要转化为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劳动也许加重了，因为对劳动的强制更大了……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到那里去。这就是租地农场的集中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这种集中多年以来在这个王国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²⁴⁾

(22) 散见牧师阿丁顿《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伦敦版第37—43页。

(23) 理·普赖斯博士《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编，1803年伦敦版第2卷第155[、156]页。请读一读福斯特、阿丁顿、肯特、普赖斯和詹姆斯·安德森的论著，并把它们同麦克库洛赫在他的书目汇编《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伦敦版）中穷极无聊的献媚的饶舌比较一下吧。

(24) 同上，第2卷第147[、148]页。

他把圈地的总的结果概括如下：

“总的说来，下层人民的状况几乎在各方面都恶化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了。”⁽²⁵⁾

确实，对公有地的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对农业劳动者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伊登自己就说，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在 1765—1780 年之间开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说，“他们的工资已经不能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

现在我们再听一下一位圈地卫护者，普赖斯博士的反对者的意见。

“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劳动，就得出人口减少的结论，这是绝对错误的。如果农村人口减少，那么城市的人口就会增多……如果小农转化为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短工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动用起来，那么，这是国民〈那些已经经历转化的农民当然不在此列〉应当期待的

(25) 同上，第 2 卷第 159[、160]页。这使我们想起了古罗马的冲突。“富人占有了未分土地的最大部分。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相信这些土地不会再被夺去，因此，把邻近贫民的土地也占有了，部分是取得贫民的同意买下来的，部分是用暴力夺得的，于是，他们不再是耕种零星的土地，而是耕种大片的土地。这时，他们使用奴隶来从事耕作和畜牧，因为自由民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要服兵役，不能替他们劳动。拥有奴隶所以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还因为奴隶不服兵役，可以没有阻碍地繁殖，而且实际上也生了许多孩子。这样一来，强者占有了一切财富，全境到处都是奴隶。而意大利人则由于贫穷、赋税和兵役的折磨而逐渐减少了。当和平时期到来时，他们还要遭到完全无事可做的痛苦，因为富人占有土地，并且用奴隶而不用自由民来耕种。”（阿庇安《罗马内战》第 1 卷第 7 页）这里说的是李奇尼乌斯法⁴¹⁷颁布以前的时代的情况。兵役大大加速了罗马平民的没落，它也是查理大帝大力促使自由的德意志农民转化为农奴的一个主要手段。

一种利益…… 如果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²⁶⁾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有助于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平静的心情和坚定的斯多亚主义⁴¹⁸来加以观察。托利党人,博爱主义者弗·莫·伊登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到18世纪末,伴随着对农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这个令人鼓舞的结论:

“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亩牧场。在16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3英亩牧场对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

到19世纪,人们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密切的联系都忘却了。例如,从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去3 511 770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圈地法案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人们用来剥夺农民的最后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手段,是所谓的 **Clearing of Estates**,即清扫领地,从字面上讲是:“地产间伐”。法语中有“森林间伐”的说法,而英语中的“地产间伐”并不是一项农艺学上的技术措施;这是把农民以及要转为大农场耕作和牧

⁽²⁶⁾ 《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1773年伦敦版第124、[125、128、]129页。一位同时代的作者指出了同样的事实,但倾向相反:“劳动者被赶出了自己的小屋,被迫去城市寻找职业;但这样便生产出了更多的纯产品,于是资本也增大了”(〔罗·本·西利〕《国家的危险》1843年伦敦第2版第14页)。

场的地产上的农民房屋清除掉的全部暴力行为。这是前面谈过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面谈到,现在在英国已经没有农民可以清除,人们正在清除农业工人的小屋,因为这些小屋的存在有损他们耕种的土地的美观。我们将要考察的“清扫领地”的适当舞台是现代小说家所喜爱的地方,苏格兰高地。

在那里,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它有系统性,有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在爱尔兰,一个地主一下子就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还有被侵占的所有权的特殊形式。

苏格兰高地的居民由克兰^①组成,每一克兰是该克兰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兰的代表,即克兰的首领或“大人”,只是这块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就像英国女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完全一样。英国政府虽然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大人”之间的内部战争,制止了他们对苏格兰低地的不断侵袭,但是克兰首领们丝毫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劫掠行径;他们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威,把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转化为私有财产权,由于发现克兰成员妨碍他们发财致富,但又没有必要杀死这些人,他们就决定公开使用暴力把克兰成员驱逐出去。纽曼教授说:

“英国国王可以自以为有同样的权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²⁷⁾

这种革命是在拥护王位觊觎者的人进行了最后一次武装暴

(27) 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32页。

① 即氏族。——编者注

动⁴¹⁹后开始的,我们可以从詹姆斯·安德森⁽²⁸⁾和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著作中看到这次革命的最初阶段。斯图亚特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即在18世纪最后30多年间,苏格兰高地还是四百年前的欧洲的缩影。斯图亚特说:

“这些土地的地租(他这样称谓向克兰首领缴纳的贡税是错误的)与其土地的面积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把租地农场所养活的人数拿来比较,也许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块土地所养活的人数,是最富饶地区的同等价值的土地所养活的人数的10倍。某些土地的情况同托钵僧寺院的情况一样:要养活的人越多,这些人的生活就越好。”⁽²⁹⁾

当18世纪最后30多年间开始驱逐盖尔人⁴²⁰时,人们同时禁止他们移居国外,以使用暴力把他们赶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业城市去。⁽³⁰⁾

大卫·布坎南在他的于1814年出版的著作《论亚·斯密的〈国富论〉》中向我们描述了“清扫领地”所取得的进步。他说:

“地主不顾世袭租佃者(他错误地把这个称呼用于共同占有克兰土地的克兰成员)而把土地给予出价最高的人,如果这人是个改良家,他就会立即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在先前广布着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纯产品,因此,变得无用的租佃者都要被赶走。被赶出故乡的人都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如此等等”。⁽³¹⁾

(28) 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

(29) 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6章。

(30) 1860年,被暴力剥夺的人在各种虚伪的许诺下被运往加拿大。有些人逃往山里和邻近的小岛。警察在后面追赶,他们便同警察格斗,然后逃走了。

(31) 大卫·布坎南《论亚·斯密的〈国富论〉》1814年爱丁堡版。

乔治·恩索尔在181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说：

“苏格兰的显贵像拔除野草那样剥夺农民的家庭，像热衷于复仇的印第安人对待猛兽及其巢穴那样来对待村庄及其居民。一个人只能换到一只羊的毛或一条羊腿，甚至更贱……当蒙古人入侵中国北部地区的时候，蒙古人长老会议曾经商议要消灭这一地区的全体居民，并把这一地区转化为广阔的牧场。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地主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实现了这个建议。”⁽³²⁾

但是，一切光荣归于所有的领主。最富有蒙古人格调的独创精神归于萨瑟兰公爵夫人。这个女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她一当权就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把全郡转化为牧场。当时该郡的人口由于采取类似的措施（不过规模较小而已）已经减少到15 000人。从1811年到1820年，这15 000个居民，大约3 000户，陆续地被驱逐了。他们的村庄全都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不列颠的士兵奉命协助，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一个老太太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贵夫人用这种方式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794 000英亩土地据为己有了。

一部分被剥夺的人完全被赶出去了。她把沿海地区大约6 000英亩的土地分配给另一些被驱逐的居民。这6 000英亩土地以前一直是荒地，没有给所有者带来过收入。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亩2先令6便士的租金把这些荒地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为萨瑟兰家族流洒鲜血的克兰成员。她把从克兰那里夺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29个大牧羊租地农场，每一个租地农场住一户人家，他们几乎都是英格兰租地农场主的雇农。到1825年，15 000个放逐者已经被131 000只羊所代替。被赶到海边的那部分土著居民

(32) 乔治·恩索尔《各国人口的研究》1818年伦敦版第215、216页。

企图靠捕鱼为生。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话来说，他们成了真正的两栖动物，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一起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³³⁾

但是，书中写道，诚实的盖尔人由于他们对“克兰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崇拜，必须更加含辛茹苦。鱼的气味传到这些大人的鼻子里去了。他们嗅到其中有某种有利可图的东西，于是把沿海地区租给伦敦的大鱼商。盖尔人又一次被驱逐了。⁽³⁴⁾

最后的一次形态变化终于完成了。一部分变成牧场的土地又转化为狩猎场。

大家知道，英格兰没有真正的森林。饲养在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像家畜，肥得像伦敦的市议员一样。所以，苏格兰就必然成为狩猎这种高贵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

罗伯特·萨默斯写道：

“在苏格兰高地，鹿林⁽³⁵⁾的面积大大扩大了。在盖克的一边，可以看见

(33) 当现在的萨瑟兰公爵夫人在伦敦隆重欢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利用这个机会发泄她对美洲共和国的仇恨并对黑奴表示同情的时候，——后来在南北战争时期，她和其他贵妇人一样，明智地忘记了这种同情，当时所有高贵的英国人的心都是同情奴隶主的，——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描述了萨瑟兰的奴隶的状况⁴²¹。（凯里在1853年费城出版的《奴隶贸易》一书的第202、203页上引用了我的文章的一部分。）我的文章被一家苏格兰报纸转载，并且引起了该报和萨瑟兰家族的献媚者之间的一场有趣的论战。

(34) 关于这种鱼类买卖的有趣材料，我们可以在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公文集·新辑》中看到。——纳索·威·西尼耳在他的前面引述过的遗著中把萨瑟兰郡驱逐盖尔人的做法说成是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一次“清扫”。

(35) 必须指出，在苏格兰高地的“鹿林”中没有一棵树木。人们把羊群从秃山上赶走，把鹿群赶上秃山，并称此为“鹿林”。因此，连造林也谈不上！

格伦费希新森林,在另一边,是阿德韦里基新森林。从同一条线上,布莱克山这一大片荒地不久前植树造林了。从东到西,从阿伯丁附近到奥本峭壁,现在都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林带,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阿恰格湖、格伦加里、格伦莫里斯顿等新森林出现……盖尔人由于他们的土地转化为牧羊场而被赶到更贫瘠的地方。现在供狩猎用的鹿开始代替羊,使盖尔人更加贫困。这种迅速营造起来的森林和人民不能并存。总有一方要让位。如果在未来的25年当中,狩猎场的数目和规模像过去25年那样增长,那么盖尔人就会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绝迹了。一方面,人为地把苏格兰高地变成荒地是一种满足地主贵族的欲望和打猎的爱好的时髦;另一方面,他们做鹿的交易只是为了商业的目的。毫无疑问,把一块山地辟为狩猎场,常常比把它变为牧羊场有利得多。对于爱好打猎而寻找狩猎场的人说来,出价高低一般只受自己钱袋大小的限制⁽³⁶⁾……苏格兰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诺曼人国王的政策给英格兰带来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动场所,而人却被赶到越来越窄的圈子里去了……人民的自由接二连三地被夺去……在地主们看来,把当地居民从土地上清除出去,像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树木和灌木丛一样,被当做固定的原则,当做农业上的必要措施;这一过程静静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³⁷⁾

我们刚刚引用了罗伯特·萨默斯著作中的几段话。这部著作最初发表在《泰晤士报》上,以书信的形式报导了被鹿的竞争所压垮的盖尔人在1847年遭受到的饥荒。有学识的英国经济学家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高明的结论,即盖尔人太多了,这就不能不对他们的生存资料形成不正常的“压力”。

20年后,这种状况大大恶化了。莱昂内·莱维教授1866年在

(36) 英国的猎鹿爱好者是有钱的!租借这些狩猎场的不仅有贵族成员,而且还有最早的暴发户们,这些人在谈到自己在高地上有“狩猎的小屋”时,简直以为自己就是麦卡勒姆·莫尔了。

(37) 散见罗伯特·萨默斯《苏格兰高地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版第12—28页。

技艺协会²²⁸所作的报告中也确认了这一点。他说：

“减少人口，把耕地变为牧场，是不花费代价便能获得收入的最方便的手段…… 鹿林代替牧场已经成为苏格兰高地的普遍的变化。现在是鹿赶走了羊群，就像从前羊群把人赶走一样…… 从福弗尔郡的达尔豪西伯爵领地一直到约翰·奥格罗特都是所谓的森林。在这些森林中早已住有狐狸、野猫、白鼬、黄鼠狼、貂、鼬和山兔；近来那里还出现了兔、松鼠和鼠。在苏格兰的统计中被当做特别富饶和广阔的牧场的大片土地，现在既不耕作，也不改良，只是供少数人在每年的几个月时期内狩猎消遣。”

1866年5月底，一家苏格兰报纸在新闻中提到了下述事实：

“萨瑟兰郡的最好的牧羊场之一，在不久前租约期满时，还曾有人出价年租1200镑，然而现在正在转化为鹿林！”

1866年6月2日出版的一期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就这一事实写道：

“就像当时诺曼征服者为造新林曾毁掉了36个村庄一样，这种封建本能现在又风行一时…… 包括苏格兰某些最肥沃的地区在内的200万英亩土地完全变成了荒地。格伦蒂尔特的野草是珀斯郡最富于营养的牧草之一；本奥尔德的鹿林曾是巴德诺赫广大地区内的最好的天然草地；布莱克山森林的一部分曾是苏格兰最适宜放牧黑脸羊的牧场。为了狩猎爱好而变成荒野的土地面积，比整个珀斯郡的面积还要广阔得多。本奥尔德森林的土地可以养活15000只羊，而这个森林的面积不过只占苏格兰全部猎区的 $\frac{1}{30}$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人为的荒芜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生产资源的损失。所有这些土地都完全是非生产的…… 结果等于是沉到了北海海底一样。这种随意制造的荒野或荒地应当用立法的断然手段来加以铲除。”

但是，同一期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又刊登了为制造荒地辩护的文章。作者通过严密的计算证明，地主的纯收入增加了，因而苏格兰

高地的国民财富也增加了。(38)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宗法制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清除茅屋之战,这就是原始积累的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提供了无家可归的、顺从的无产阶级人手。

(38) 在德国,尤其是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地主贵族开始暴力剥夺他们的农民。这个过程引起了多次起义(其中最后一次起义是1790年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爆发的起义⁴²²)。在德国东部,这种暴力剥夺尤为流行。在普鲁士的大部分省里,弗里德里希二世第一次保护农民免遭这种剥夺。他占领了西里西亚以后,强迫地主重建他们拆毁的农舍、谷仓,供给农户牲畜和农具。他的军队需要士兵,他的国库需要纳税人。但是,不应当想象农民在他的军事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财政勒索的混合统治下过着愉快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伟大的米拉波的叙述中看出:“亚麻是德国北部农民的最大财富之一。但可惜,对于人类来说,这只是防止贫困的手段,而不是走向幸福生活的途径。直接税、徭役以及各种强制性服役使德国农民破产,此外他们还要为他们所买的一切东西缴纳间接税……而使他们彻底毁灭的是:他们不敢在他们愿意的地方,以他们愿意的方式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也不敢从那些能够以较低廉的价格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商人那里购买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原因不知不觉地使他们毁灭,如果不纺纱,他们就无法到期缴纳直接税;纺纱成了他们的补助的来源,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妻子、儿女、男女仆人甚至他们自己从事有利的工作。但是,即使有了这种补助来源,生活还是可怜极了!

夏天,他们9点睡觉,2点就要起床,这样才能把活干完;冬天,他们本来需要有较长期的休息来恢复体力,但是,如果他们为了缴纳税款而出售产品,他们就缺少谷物来做面包和种子了。因此,只好以纺纱来填补这种不足……而且还要十分勤奋地纺。因此,农民在冬天要到半夜或1点才睡觉,而早晨5点或6点就要起床,或者在晚上9点睡觉,2点起床;除了星期日,他们一辈子天天都是这样。这种过度的不眠和劳动使人憔悴;因此农村里的男女比城市里的男女要衰老得快”(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3卷第212页及以下几页)。

第二十八章

15 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 血腥立法。关于工资的法律

创造出无家可归的无产阶级——大封建领主遣散的人和成为不断反复出现的暴力剥夺的牺牲品的农民——的速度必然比新兴工业吸收它们的速度快。另一方面，突然被夺走自己惯常生活条件的人，也不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社会制度的纪律。由此就产生了大量的乞丐、盗贼和流浪者。从这时起直至 15 世纪末和整个 16 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做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继续像过去他们的生活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时那样劳动。

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时期开始的。

亨利八世时期，1530 年，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获得一种行乞许可证。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要遭到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人们认为这项法令还太宽大。于是议会通过了补充条款，使处罚更严厉了。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

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做叛国犯并作为国家的敌人被处死。

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生动活泼地描述了受这些残忍的法律打击的不幸者的状况，他说：

“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强占几千英亩土地，统统用栅栏或篱笆圈围起来，或者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管以什么方式，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些贫穷朴实的人，男人、女人、丈夫、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母亲，必须带着他们的全部家当离开；他们的财产很少，但是人口很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人手。我是说，这些人背井离乡，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动产和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一文不名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做流浪者投入监狱，理由是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罪名，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他们的同时代人托马斯·莫尔说，这些不幸的难民被迫流浪和行窃，他们中间，“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有 72 000 人被处死”。⁽³⁹⁾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 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因此，为了利用某个穷鬼的劳动，只要告发他拒绝劳动就行了。)

主人应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 14 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 S 字样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做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把他出租给别人，完全像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在接到报告后必须搜捕逃亡的坏蛋。如果抓住一个流浪者，就要用烧红的铁器在他胸前打

(39) 霍林舍德《英国概述》第 1 卷第 186 页。

上 V 字样的烙印,把他送回原籍,套上锁链在公共广场上劳动。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 S 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 24 岁为止,女的当到 20 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傅可以随意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⁴⁰⁾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个人或地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 19 世纪中叶。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 1572 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 14 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一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右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 18 岁,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留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 3 号法令和 1597 年的法令。斯特赖普在他的编年史中说,在伊丽莎白女皇无论是作为母亲还是作为处女的时代,成队的流浪者被绞死,每年在各地绞死的有 300 或 400 人;根据他的统计,仅萨默塞特郡一年中就有 40 人被处决,35 人被打上烙印,37 人遭鞭打和 183 个“不可救药的恶棍”被释放。但这位博爱家又说:

(40) 资本家的捍卫者、《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 年伦敦版)的作者说:“在爱德华六世执政时期,英国人确实似乎非常认真地鼓励工场手工业和使用贫民。这一点可以从规定一切流浪者都要打上烙印这条值得注意的法令中看出来。”(同上,第 5 页)

“由于治安法官的疏忽大意和人民的愚昧同情,这个巨大的被控告者人数还不到实际犯罪人数的 $\frac{1}{5}$ …… 英格兰其他郡的情形并不比萨默塞特郡好,许多郡的情况甚至更糟。”⁽⁴¹⁾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无赖。即决法庭⁴²³的治安法官(当然,所有的地主、工场主、牧师等等都被授与了刑事裁判权)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抓到的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抓到的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R字样的烙印;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抓到,那就要毫不留情地并在没有牧师出席的情况下被处死。这些条例直到1714年才被废除。

法国也有同样的法律。17世纪中叶,流浪者在法国建立了一个王国,并以巴黎为他们的首都。在路易十六初期(1777年7月13日的敕令)还规定,16岁至60岁的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都要罚做苦工。1531年10月查理五世对尼德兰颁布的法令,1614年3月19日荷兰各州和各城市的第1号告示,1649年6月25日联合省的公告等,都有类似的规定。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奴役,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单是在一方有劳动的物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方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劳动者阶级的人数

(41) 文学硕士约翰·斯特赖普《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宗教改革和国教运动以及英国教会中其他事件的编年史》(1725年由作者亲自出版的第2版)。

越来越多,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本能地接受制度的要求,就像承认季节的变化一样。一旦这种生产方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它的机制就会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的需要相适应的范围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压力执行着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专制。固然有时还求助于强制,还在使用暴力,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劳动者由社会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的机制本身产生,得到这种机制的保证并由它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不能没有不断的国家干预;它利用这种干预来“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适当的水平,延长工作日并使劳动者本身处于所需要的从属状态。这是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雇佣工人阶级是在14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它在当时和后一世纪内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农村的独立农民和城市的手工业行会制度的有力的保护。在农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会上是接近的。生产技术方式还没有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所以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它的不变要素。因此,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每一次新的积累而迅速增加,而劳动者的供给只是缓慢地跟在后面。后来转化为资本家的积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国民产品,在当时还是劳动者的消费基金。

自始就是为了剥削劳动者,而在后来一直与劳动者为敌的关于雇佣劳动的立法⁽⁴²⁾,在英国开始于1349年爱德华三世的劳工法。

(42) “每当立法机关企图调解雇主与其工人之间的纠纷时,它的顾问总是雇主。”(亚当·斯密)⁴²⁴

在法国,与此相当的是1350年以国王约翰名义颁布的敕令。英法两国的立法齐头并进,内容也相同。关于劳工法企图强制延长工作日这一点,我就不再谈了,因为前面(第十章)已经讲过了。

劳工法是由于下院即劳动的购买者的迫切要求而颁布的。一个托利党人天真地说:

“以前贫民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现在他们的工资太低,也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和以前的不同,可能更危险。”⁽⁴³⁾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18条和第19条也还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10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21天。立法并不仅仅满足于强制雇主人接受那些对雇主的集体利益有好处
的限制,而且还在违章的情况下,把雇主当做同谋者处理,把工人则当做叛逆者。1360年的一项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14世纪起到1824年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行为。

1349年的法令和以后的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法律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

大家知道,在16世纪,劳动者的状况十分恶化。名义工资提高

(43) 《自由贸易的诡辩》,一个律师著,1850年伦敦版第206页。他补充说:“立法总是准备以自己的权威为雇主效劳,难道就不能为雇工做一点事吗?”

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相应上涨的程度。因此,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压低工资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时,“没有人愿意使用”的人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丽莎白五年颁布的第4号法令学徒法,授权治安法官(必须始终记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官,而是地主、工场主、牧师及富裕阶级中充当法官的其他成员)规定一定的工资,并按季节和物价加以调整。詹姆斯一世也把这种有关劳动的规定推行到纺织工人和其他各种劳动者身上。⁽⁴⁴⁾ 乔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³¹¹推行到一切工场手工业。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敕令这个旧武库。在乔治三世时期,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除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不得超过2先令 $7\frac{1}{2}$ 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68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1796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农业劳动者,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

(44) 从詹姆斯一世一年颁布的第6号法令的一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某些织布业主以治安法官的身份在自己的工场内正式规定了工资率。——在德国,三十年战争以后常常颁布尽量压低工资的法令。“对人口稀少地区的地主来说,缺乏仆人和劳动者是十分麻烦的。所有村民都被禁止把自己的房间租给单身男女;凡遇到这种租房人,必须报告当局,如果他们不愿当仆人,那么,即使他们靠其他工作,靠替农民做短工或从事粮食买卖为生,也要被关进监狱。(《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和法令》第1章第125条)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德国各君主的命令不断地强烈责骂那些不服从苛刻条件、不满法定工资的蛮横的无赖汉;每个地主都被禁止付给高于行政区规定的工资。尽管如此,战后仆人的处境有时比一个世纪后还要好;1652年在西里西亚,仆人每周还可以吃到两次肉,而在我们这个世纪,那里的某些地方,仆人每年只能吃到三次肉。而战后的工资也比以后几个世纪都要高。”(古·弗赖塔格)

决来确定；在 1789 年，一项议会法令还确认，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白时期的一项法令和 1617 年及 1661 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此期间，经济情况经历了如此彻底的变化，甚至连英国下院也发生了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在这里，400 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绝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 1796 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是悲惨的”。最后，在 1813 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工厂主以其私人权威，通过以工厂规则的形式颁布的法令来监督工人，租地农场主依靠济贫税把他的苦力的工资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实际上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法令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的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许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可提出刑事诉讼。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 1825 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态度面前取消了，但是并没有彻底废除。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 1859 年才消失。最后，1871 年 6 月 29 日的法令，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修正法令，即《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禁止结社法。这种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斗争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雇主本人手中。下院和格莱斯顿先生在 1871 年的修正法令中杜撰了一些针对劳动者的新的犯罪条例，而在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却曾以正直态度把一项废除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提交二读。在这二年时间内，这帮

狡猾的家伙始终停留在二读上，把问题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自由党”⁴²⁵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反过来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在自己的热忱的领袖的一贯支持下，它让一贯奴颜婢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⁴²⁶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我们看到，五百年来的英国议会卑鄙无耻地一直固守那种反抗劳动者的常设的资本家工联的地位，后来只是在群众的具有威胁性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反对结社和工联的法律。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组织法，宣布劳动者为保卫自己的共同利益的一切联合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⁴⁵⁾这个法令依靠刑法和警察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家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⁴²⁷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⁴²⁸中取消；而且还留了一手！最能说明资产阶级的这种彻底转变的，是下述借口。被卡米耶·德穆兰称为“可悲的诡辩家”⁽⁴⁶⁾的法律报告人列沙白里哀非常坦率地说：“日工资应该比现在提高一些…… 因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工资的

(45) 这个法律的第一条说：“取缔同一等级或同一职业的市民的各种联合组织，是法国宪法的根本基础之一，因此禁止以任何借口或任何形式恢复这种联合组织。”第四条说：“同一职业、手艺或手工业的市民，如果为了一致拒绝从事手艺或劳动或为了按一定报酬才从事手艺或劳动而彼此协商或协议，那么这种协商和协议……应视为违反宪法，侵犯自由和人权……”从而，和旧劳工法中的规定完全一样，应视为国事罪。（《巴黎革命》1791年巴黎版第3卷第523页）

(46) 《法国革命……》第77期。

数额必须使领工资的人能够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但是,在他看来,现在是“防止混乱状态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了”,这种混乱状态就是:“工人为了提高工作日的价格”和缓和这种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而结社”。必须绝对制止结社,为什么?因为工人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因为他们在破坏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的同时——谁也想不到——却“力图恢复革命所取消的公会”。⁽⁴⁷⁾

(47) 散见毕舍和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1834年版第10卷第193—195页。

第二十九章

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我们考察了无家可归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阶级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从而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是：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很清楚，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

至于资本主义农场主的产生，我们是能够弄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缓慢的、经历了许多世纪的过程。农奴以及大大小小的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以领主转让采地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占有自己的土地。因此他们在解放后处于极不相同的经济状况下。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14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全部所需的资本、种子、牲畜和农具的自由租地农民所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更多的雇工。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制佃农，半租地农场主。他预付农业基金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总产品。这种租佃形式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存在了很长时间，而在英国却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在这种农场中，租地农场主预付资本，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按照租约

的条款把年纯产品的一部分以实物或货币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致富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15世纪最后30多年开始的、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最后25年的农业革命，以同一速度使农村居民变穷，使租地农场主致富。⁽⁴⁸⁾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迅速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他通过出售牲畜，把牲畜当役畜使用，最后供给土地以丰富的肥料而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在16世纪，出现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给租地农场主和其他的资本主义企业主带来了黄金果。这个因素就是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降。这种下降导致城市和农村的工资率的下降（工资率只是缓慢地跟随一切其他商品价格的提高发生变动）。农村工人的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农场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支付的地租，由于租约期限内货币的贬值而减少了。必须指出，在16世纪，租约期限一般来说是很长的，往往达99年。所以，租地农场主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⁴⁹⁾。因此，在16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

(48) 哈里逊在自己的《英国概述》中说：“过去交出4镑地租都很困难的租地农场主，现在要交40镑、50镑、100镑，但是他们在租约满期时，如果手里没有积存6—7年租金的话，就认为是做了一次不好的生意。”

(49) 关于16世纪货币贬值对社会各阶级的影响，当时的一个著作家在《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绅士威·斯·著，1581年伦敦版）中作了非常清楚的描述。由于这一著作采取对话形式，人们在很长时期内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写的，直到1751年还用他的名字出过新版。它的作者是威廉·斯塔福德。书中的一个地方，骑士有如下的推论：

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⁵⁰⁾

骑士：“您，我的邻居农民，您，商人先生，您，善良的铜匠，你们同其他的手工业者们一样，都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一切物品比以前贵多少，你们也会把你们的商品和劳动的价格提高多少。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卖，以抵偿我们在购买物品时所受的损失。”在另一个地方，骑士问博士：“请告诉我，您指的是哪种人？首先，您认为哪些人不会受到损失？”博士：“我指的是所有靠买卖为生的人，因为他们以高价买进，也以高价卖出。”骑士：“其次，您认为哪种人会得利呢？”博士：“是所有按旧租金租赁租地或农场的人，因为他们按旧价格支付，按新价格出售，就是说，他们为土地支付极少的钱，而以高价出售土地的一切产品……”骑士：“您认为，哪种人会受到比这些人得到的利益还要大的损失？”博士：“那就是所有贵族、绅士以及其他一切靠少量地租或薪金过活，或不亲自耕种土地，或不做买卖的人。”

(50) 在封建领主和他的隶属程度各不相同的从臣之间有一种很快成为实业家的中间代理人，这些人的原始积累方法同置身于国库和纳税人的钱袋之间的征税员的原始积累方法一样，就是采取各种形式的贪污、舞弊和诈骗。管理和征收租税、租金、地租以及应交给领主某些产品的人，在英国称为 Steward，在法国称为 Régisseur。这些管家有时自己就是显贵。例如，在首次发表的蒙泰伊的手稿中说：“这个账单是贝桑松的城堡主人，骑士雅克·德·托雷斯就其应当支付的1359年12月25日至1360年12月28日的地租，交给勃艮第公爵和伯爵在莱戎的管账先生的。”（亚历克西斯·蒙泰伊《关于各类历史手稿的研究》[第234、235页]）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常常落入中间人的手里。例如，在经济方面，金融家、交易所经纪人、银行家、大小商人等捞足了营业的油水；在民法方面，律师敲诈诉讼双方而又使他们提不出异议；在政治方面，议员比选举人重要，大臣比君主重要，等等；在宗教方面，上帝被中介人挤到次要地位，而后者又被牧师挤到次要地位，牧师又是善良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必然的中间人。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大的封建领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土地，那是在对农民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在14世纪出现了租地农场。它们的数量不断增长，远远超过10万个。它们以实物或货币支付产品的 $\frac{1}{12}$ — $\frac{1}{5}$ 作为地租。租地农场根据土地价值和面积的大小分为封地、次封地等等，而土地的面积有时只有几英亩。所有这些租地农场对自己土地上的居民享有裁判权；这种裁判权有四等。农村居民在所有这些小暴君下受到的压迫自然是残酷的。蒙泰伊说，当时法国有16万个法庭，而现在有4000个法庭和治安法庭就足够了。

第三十章

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 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对农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这一奇妙的现象，使老亚·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在他的《商业史》⁴²⁹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预。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原始积累的这个要素。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假设，宇宙物质在一处的稀薄化会引起它在另一处的稠密化⁽⁵¹⁾，同样，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的稀薄化也不仅仅引起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此外，农业雇佣工人不仅被迫加强了劳动强度⁽⁵²⁾，而且他们为自己谋利而经营的耕地也日益缩小了，因此租地农场主越来越多地占有这些人的全部自由劳动时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生活资料与他们自己同时成为可以自由支配的，而这

(51) 见他的《对自然哲学的认识》1838年巴黎版。

(52) 这一点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所强调的⁴³⁰。

些生活资料在将来则必然表现为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剥夺的农民今后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转化为不变资本的要素。

例如，可以设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全都纺亚麻的威斯特伐利亚农民，一部分突然被剥夺了土地，另一部分留下来的则转化为大租地农场的短工。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亚麻纺织厂出现了，这些农民受雇在那里做工。

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一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的身体。它现在是手工工场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前，亚麻分散在许多小生产者之间，他们自己种植亚麻，并和家人一道小量地进行纺织；现在，它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他叫别人为他纺织。消耗在纺亚麻上的额外劳动以前实现为无数农民家庭的额外收入，或者说，既然我们谈的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还实现为“给普鲁士国王”的赋税。现在，它实现为少数资本家的利润。纱锭和织机不久以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和劳动者以及原料一样都集中在少数大劳动营里了。现在，纱锭、织机和原料由使用它们的纺织工人独立生存的手段都转化为指挥他们和榨取他们的无酬劳动的手段。⁽⁵³⁾

大手工工场同大租地农场一样，表面上看不出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无论是由小工场的集中而形成，还是由剥夺大量独立小生产者而形成，都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

(53) 资本家说：“如果你们把你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交给我，作为我辛苦指挥你们的报酬，我就让你们得到为我服务的荣幸。”（让·雅·卢梭《论政治经济学》）

但是,民众的直观是不会受迷惑的。在革命狮子米拉波的时代,人们还把大手工工场叫做“联合手工工场”,正如我们现在说“联合耕地”一样。米拉波说:

“人们只注意有几百人在一个厂长指挥下进行劳动的、通常叫做联合手工工场的大手工工场;而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分散地独自经营的手工业工场,几乎不屑一顾,把这些手工工场完全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使国家繁荣的真正重要的因素……联合工场使一两个企业主大发其财,但工人不过是得到或多或少的报酬的短工,他们丝毫分享不到企业得到的好处。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场中没有人发财致富,但许多工人过着优裕的生活;勤劳节俭的人会积聚起一小笔资本,为生育孩子、防备疾病,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某个家庭成员而节约少量的资金。勤劳节俭的工人人数将会增加,因为他们将会认识到,良好的品行和劳动,是根本改善自己状况而不是稍许提高工资的手段;稍许提高工资对于将来绝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只能使工人的生活稍为好一些,不过也只能勉强糊口……联合的手工业工场,即由若干对工人支付日工资、独立经营的企业主组成的企业,能够使这些企业主个人过富裕的生活,但是根本不足以引起政府的注意。”⁽⁵⁴⁾

此外,他把通常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单个分散的手工业工场称为“唯一自由的手工业工场”。他还认为,分散的工场比“联合的”工场更经济,生产率更高,并把后者只是看做政府温室中的果实。当时大陆上大部分手工业工场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那些使农民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事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同样的农民家庭先加工生活资料和原料,即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直接消费(至少大部分是这样)。现在,这些生活资料和原料都变

⁽⁵⁴⁾ 散见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3卷第20、21、109页。

成了商品；租地农场主大批地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另一方面，纱、麻布、粗毛织品，等等（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以前是农村的产品，现在转化为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村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从大量独自经营的小生产者那里就地零星地得到供应的许多分散的买主，现在集中起来，仅仅形成工业资本的一个巨大市场。⁽⁵⁵⁾于是，随着农民的被剥夺以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农村的家庭工业就被消灭了，农业与一切种类的工场手工业分离了。实际上，只有消灭农民的家庭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范围和结构。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这种根本的改变。我们已经看到，工场手工业只是局部地、分散地占领一国的工业，它的主要基础始终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对原料进行最初的加工。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例如，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的亚麻种植业就是这样。这就是使详细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起怨

(55) “一个农民家庭在它从事的农业劳动的间歇，通过自己的辛劳不知不觉地把20磅羊毛转化为全家的衣着，这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如果您把羊毛拿到市场，送进工厂，然后送到经纪人手里，然后再送到商人手里，那么您就可以看到巨大的商业活动，所用的名义资本会是羊毛的价值的20倍……生产阶级就是这样为了维持不幸的工厂人口、寄生的商人阶级和绝对虚假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而受人剥削。”（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20页）

声不断(只是有短暂的中止),抱怨资本主义农业日益发展,独立农民日益被消灭,同时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克伦威尔时代是一个例外。在实行共和制期间,英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从他们在都铎王朝时代所陷入的那种衰落状态中恢复过来。

我们刚刚看到,小农的这种再现一部分是工场手工业制度本身的结果,但主要原因是英国有时以种植谷物为主,有时以畜牧为主,而它们的交替周期有时长达50年,有时刚刚达到20年。独自经营的小农的人数也随着这种变动而变动。

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把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建立在永久的基础上,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例如:“随着机器的采用,大羊毛工业从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从农村工业或家庭工业的毁灭中产生出来。”⁽⁵⁶⁾戴维·乌尔卡尔特大声说:

“犁和轭为神所发明,而由英雄使用——难道织机、纱锭和纺车的由来就没有这么高贵吗?你们把纺车和犁分开,把纱锭和轭分开,结果产生了工厂和济贫院、信贷和恐慌,产生了两种敌对的国民,即农业国民和商业国民。”⁽⁵⁷⁾

(56) 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42、143页。

(57) 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22页。但凯里出来了,他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地责备英国,说英国力图把其他所有国家转化为纯农业国,而唯有英国拥有工厂垄断权⁴³¹。他认为,土耳其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英国“从来不允许土耳其的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把犁和织机、锤和耙自然地结合起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奴隶贸易》1853年费城版第125页)。在他看来,乌尔卡尔特本人就是毁灭土耳其的罪魁之一,因为乌尔卡尔特曾在土耳其为英国的利益鼓吹过自由贸易。但是最妙不过的是,极其钦佩俄国政府的凯里竟想利用保护关税制度来阻止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过程,其实它只会加速这个过程。

但是,从这种必然的分离开始了集体劳动能力的必然的发展,分散的、因循守旧的生产转变为结合的、科学的生产。完成这种分离的机器工业也首先为资本征服了全部国内市场。

英国的博爱主义经济学家(如约·斯·穆勒、罗杰斯、戈尔德温·斯密斯、福塞特等人)和自由主义工厂主(如约翰·布莱特之流),像上帝向该隐询问他的弟弟亚伯的下落一样⁴³²,向英国的地主问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自由农到哪里去了?然而你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些自由农的消灭中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往下问,那些独立的纺纱工人、织布工人以及所有的独立手工业者到哪里去了?

第三十一章

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工业⁽⁵⁸⁾资本家不是像租地农场主那样逐渐地产生的。毫无疑问,有些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首先转化成了尚未成熟的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最后完全蜕去了包裹着资本家的外壳。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方法的乌龟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⁴³³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要。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成长的。而且在现代以前,独自垄断着资本的地位。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一位没有注意到商业资本的作用的英国作者说:

“现今,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对劳动者支付工资,对征税者支付赋税和什一税,而留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做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

(58) 这里的“工业”一词是在相对意义上使用的。就“范畴”的含义来说,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一样,也是工业资本家。

权……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放高利贷而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止这件事……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一种彻底的革命；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⁵⁹⁾

这位作者应当说，革命不是靠法律制造出来的。

农村的封建制度和城市的行会组织妨碍着通过高利贷和商业这两条道路形成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这些障碍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但是，我们可以从下述事实中看到商人在转化为既是生产者又是商人的人时所遇到的反抗：在1794年，利兹城的小织布业者还派代表请求议会制定法律，禁止任何商人成为工厂主。⁽⁶⁰⁾因此，新的工场手工业宁愿建立在作为出口中心的沿海港口或不受城市自治制度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在享有公会特权的旧城市和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法国，这些工业培养所是处在国王的特殊保护之下的。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奴役、被埋葬于矿井和被剿灭，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猎获黑人的商业性饲养场——这就是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曙光的田园诗式的原始积累过程。紧接着爆发了以整个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的暴动³³⁴开始，在英国的反对法国革命的十字军东征³⁴⁹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在当代，以海盗船远征的形式继续下去，著名的反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是一个例子。

(59) 《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第98、99页。这一匿名著作的作者是托·霍吉斯金。

(60) 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

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原始积累的不同方法,当初多少是按时间顺序分配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甚至英国在17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把所有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同时包括殖民制度、国家信贷、现代财政、保护关税制度的完整体系。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使用暴力为基础的,但所有这些方法都毫无例外地利用了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经济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化并缩短过渡时期。暴力是每一个临产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就是一种经济动因。

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个由于对基督教虔诚而非常出名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⁶¹⁾

荷兰——它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残杀、背信弃义、贿赂、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⁶²⁾。

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西里伯斯岛实行掠夺当地人的制度。他们专门训练了一批人员来进行这种新式的诱拐。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掠夺来的青年在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西里

(61) 威廉·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伦敦版第9页。关于对奴隶的待遇,沙尔·孔德在其《立法论》(1837年布鲁塞尔第3版)中收集了很多材料。要想知道资产者在其能够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世界的地方,把自己和劳动者变成了什么,就必须仔细研究这部著作。

(62) 前爪哇岛副总督托马斯·斯坦福·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

伯斯的秘密监狱中。

一份官方报告说：

“例如，望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强行和家人分离。”

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1641年总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立即到总督住宅把他杀了，从而就节省……支付21 875镑，即总督背叛的酬金。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巴纽旺宜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 000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

英国东印度公司⁹⁸除了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和亚洲之间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像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铜板的情况下进行。沃伦·哈斯丁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万镑把他的契约卖给一个名叫本恩的人，本恩又在当天以6万镑把它转卖出去，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1757年到1766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仅以无偿赠与的名义就从印度人那里夺走了

600 万镑！在 1769 年到 1770 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⁶³⁾

在像西印度那样专营出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像东印度和墨西哥那样落入贪婪的欧洲冒险家手中的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国家里，土著居民的境遇当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节俭的新教阴谋家、清教徒⁴³⁵，1703 年在他们的议会法令中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 40 镑；1722 年，赏金提高到 100 镑；1744 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判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 12 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 100 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 105 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 55 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 50 镑！30 年后，这些虔诚的朝圣者⁴³⁶的子孙成了叛匪，殖民制度的残酷暴行又落到了他们的头上。英国议会曾宣布，用经过训练的警犬来驱逐反叛的殖民者，以及出钱收买印第安人的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航运和贸易的发展。它创立了商业公司，这些商业公司由政府授予垄断权和特权，成为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制度为新兴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这些工场手工业的积累能力通过对殖民地市场的垄断成倍增长了。在欧洲以外直接靠变成奴隶的土著居民的强制劳动、贪污、掠夺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 1648 年就已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它几乎

(63) 1866 年仅奥里萨一个邦就饿死了 100 多万印度人。尽管如此，有人仍力图以高价把粮食卖给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借此来充实印度的国库。

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资本总和还要多⁴³⁷。

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但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霸权。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位外来的神把自己安置在祭坛上”，与欧洲旧的偶像并列；“忽然有一天，他用胳膊肘推了他的同伴们一下，于是啪嚓一声，所有的偶像都倒下来”。⁴³⁸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公共信用制度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⁶⁴⁾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学说丝毫也不值得奇怪。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因此，自国债产生以后，唯一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不相信国债。⁽⁶⁵⁾

国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

(64) 威廉·科贝特指出，英国的一切公共的东西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作为补偿，债是国家的。

(65) 在第二次投石党人战争的最紧急的时刻，比西·拉布丹为了成立一个军团，要求拨给“涅弗尔努瓦的未交纳的人头税”和盐税，马扎里尼回答说：“但愿这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过这一切都要用于向巴黎市政厅支付年金；因此用这些钱来征兵是荒唐的；不应该激怒年金收取者来反对我和您。”（比西·拉布丹伯爵《回忆录》1751年阿姆斯特丹新版第1卷第165页）

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私人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风险和纷争。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的转化为容易转让的国债券的本金,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同样也大发横财,他们把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当做从天而降的资本来利用,——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冒险活动、投机买卖,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与政府并立,依靠从政府那里取得的特权能够把公众的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一开始就以8%的利率把它的全部货币资本贷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把这些银行券投入流通,并用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购买贵金属。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商业信用的重心。在英国,当人们禁止焚杀女巫的时候,却开始绞死伪造银行券者。

为了了解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大实业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的突然兴起,对同时代人曾产生怎样

的影响,必须阅读当时的著作如博林布罗克的著作。⁽⁶⁶⁾

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和暴力就是荷兰资本财富的基础。荷兰的工业霸权和商业霸权在17世纪末也没落了,它只得通过向外国提供贷款的办法来使自己的巨额资本增殖,尤其是从1701至1776年期间向它的胜利的竞争者英国提供贷款。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在英国资本化了的工厂儿童的血液。

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的必然结果。借债使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一开始就以对必要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⁴³⁹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工人阶级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

(66) “如果鞑靼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会是很困难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第4卷第33页)

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

国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道布尔迪等一大批著作家错误地在国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劳动工具和劳动的物质条件资本化、强行缩短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各国为了获得保护关税主义的荣誉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为剩余价值谋取者效劳,就不会满足于间接通过保护关税,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和国内专卖权等来对本国人民敲骨吸髓。在附属它的邻国里,它用暴力摧毁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通过议会的强制命令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柯尔培尔已经开了先例⁴⁴⁰的欧洲大陆上,制造工厂主的过程更是大大地简化了。在那里,国库往往是具有魔力的财源,原始资本从那里以预付的形式、甚至以无偿赠与的形式直接流入工厂主的手中。米拉波喊道:

“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远去寻找战前^①萨克森工场手工业繁荣的原因呢?只要看看君主们制造的 18 000 万国债就行了!”⁽⁶⁷⁾

殖民制度、国债、征税、工业保护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残杀无辜者、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像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新工厂也是强行招收工人的。

(67) 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6卷第101页。

① 这里指的是 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编者注

尽管弗·莫·伊登爵士对于三个世纪以来由于剥夺农村居民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这一历史悲剧表示满意，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机器生产以及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须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有对经济必然性表现出这种清醒的理智。他说：

“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⁶⁸⁾

本人是纺纱业者的菲尔登写道：

“在德比郡、诺丁汉郡，尤其在兰开夏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兰开夏郡最需要人。普遍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伯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7岁到13、14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夺儿童的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他们住在工厂附近专门的房子里。他们在劳动时要受到监工监督。这些苦役犯看守人的工资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结果必然是残酷虐待……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兰开夏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极其残忍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得精疲力尽，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当他们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常常还用皮鞭催他们干活。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德比郡、诺丁汉郡和兰开夏郡的那些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对人施加令人发指的暴行，甚至加以虐杀而不受处罚的恐怖地方！……工厂主

(68) 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2卷第1章第420—422页。

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工人精疲力尽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工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兰开夏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⁶⁹⁾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良心和羞耻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加速资本积累的卑鄙行径。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商业编年史。这个正直的人把下面的事实当做英国国策的一种机智的行为而倍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⁴⁴²，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班牙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获得了到171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班牙美洲4800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英国的走私大业提供了公开的掩护。黑人贸易为利物浦的繁荣打下

(69) 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5、6页。关于工厂制度的早期的丑恶，见艾金医生(1795年)《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第219页，以及吉斯伯恩《论大不列颠社会上层和中层阶级人们的义务》1795年版第2卷。——由于蒸汽机使工厂从农村有河流的地方搬到城市中心，“喜欢禁欲”的剩余价值谋取者现在随手就可以找到童工，而不必从贫民习艺所征用了。——当罗·皮尔爵士(诡辩大臣的父亲)于1815年提出保护儿童法案时，弗·霍纳(李嘉图的密友)在下院引证下述事实说：“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帮工厂儿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被列为一个破产者的财产的一部分，同他的动产一起公开拍卖，并且卖掉了。两年前(1813年)王座法院⁴⁴¹受理一件令人愤慨的案子。这是一件关于一批儿童的案子。伦敦一个教区把这批儿童交给一个工厂主，这个工厂主又把他们转让给另一个工厂主。最后，一些慈善家发现这些儿童处于绝对饥饿的状态。当我是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时，我还知道另一个更令人愤慨的案件，几年前，伦敦某一教区和一个工厂主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这个工厂主每购买20个身体和智力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

了基础。人肉买卖是这个正教城市进行原始积累的唯一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受尊敬的人仍然赞扬奴隶贸易的特殊美德:“奴隶贸易使企业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⁷⁰⁾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采用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黑人买卖转化为一种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⁷¹⁾

这是多么艰难的事情!我们为了取得我们的成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畅通无阻,为了使劳动者同劳动条件分离,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劳动贫民这一艺术杰作,现代史的这一最高造物⁽⁷²⁾,我们经受了多少苦难⁴⁴³!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

(70) 参见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

(71) 1790年,奴隶与自由民在英属西印度是10比1,在法属西印度是14比1,在荷属西印度是23比1。(亨利·布鲁姆《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1803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74页)

(72) 劳动贫民一词是当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引人注目时出现在英国法律中的。劳动贫民一方面是同闲散贫民、乞丐等相对而言,另一方面是同那些尚未被掠夺一空而仍然占有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劳动贫民一词是从法律搬到政治经济学上的,卡耳佩珀、乔·柴尔德等人直到亚·斯密和伊登都使用这个词。由此可以评价可憎的政治伪君子埃德蒙·伯克在把“劳动贫民”一词解释为可憎的政治伪善时的好心善意究竟是什么了。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寡头政治雇用,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像在美洲动乱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扮演了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者。他说:“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

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⁷³⁾，那么，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⁷⁴⁾

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埃·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32页）。他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无怪乎他总是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塔克尔牧师——塔克尔是一个牧师和托利党人，但他却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很有才干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这位埃德蒙·伯克在他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好的评述。在我们这个行为卑鄙、毫无气节并虔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代，我们有责任不懈地揭露伯克之流，他们同自己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才能！

(73) 马利·奥日埃《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第265页。

(74) 《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第三十二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因此,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历史起源的本质,就是直接生产者被剥夺,是以所有者的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是集体所有制的对立物,它只存在于劳动工具和劳动的其他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但是,私有制的面貌,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彩不同的形式,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活动的资料的私有制,是农业或工场手工业的小生产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小生产是社会生产的技艺养成所,是培养劳动者的手艺、发明技巧和自由个性的学校。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形式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所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所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所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完整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自理的独立小生产者的生产制度是以土地的分割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制度既排斥这些生产资料的积

聚,也排斥大规模的协作。它排斥工厂和农业劳动中的分工,机器,人对自然的科学统治,社会劳动力的自由发展,集体活动的目的、手段和努力的协调一致。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状态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就像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⁷⁵⁾。但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自己就会产生出使它自身解体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制度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被消灭的运动,即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某些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的起源,资本的产生。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原始积累的方法。

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在最无耻的动机、最卑鄙而又可憎的下流的贪欲驱使下使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完成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把孤立的、自主的劳动者同劳动的外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⁷⁵⁾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充分地彻底地瓦解,一旦生产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最后,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唯一的经济力量的基础上,那时,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以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向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资料逐步转化,总之,私有制的进一步消灭,就会获得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

(75) “我们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我们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一种劳动完全分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版第2卷第434页)

是独立的劳动者，而是资本家，即雇佣工人大军或一队雇佣工人的指挥员。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作用进行的，这些规律会导致资本的集中。随着这种集中，即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科学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被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的利用日益讲究方法和整体性，工具仅仅由于共同使用而转化为强大的手段，由此生产资料越来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社会进化时期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的庇护之下成长、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劳动的社会化和劳动的物质资料的集中达到了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再容纳它们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自身就要被剥夺了。

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占有，是这种仅仅作作为独立的个体劳动的必然结果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当然，作为个人劳动的目的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必然要有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和痛苦。

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群众,后者是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76)

(76) “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劳动者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灭亡……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11、9页319)

第三十三章

现代殖民理论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力图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随心所欲地混为一谈,其中一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另一种是以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它有意忘记了,后者不仅是前者的对立物,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对劳动者的剥夺部分地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支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经济条件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一起继续存在的、与自己所体现的过时的生产方式一起日趋衰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77)

在那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到处都碰到作为个人劳动的必然结果的所有权的阻碍,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

(77)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此外,这里还包括那些由于废除了奴隶制而早已彻底改变了征服者所强加的制度的旧种植殖民地在内。

生产者支配着劳动的外部条件,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具体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开诚布公,大声宣布这两种社会秩序是互不相容的。因此,他证明,不想方设法剥夺劳动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就是放弃劳动的集体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工场手工业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穷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论的甲冑就像朽木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关于殖民地,爱·吉·韦克菲尔德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⁷⁸⁾,他的独特功绩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⁷⁹⁾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工厂主一样,英国在若干年间力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其目的是要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韦克菲尔德把这称为系统的殖民。

首先,韦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一个人只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一定的补充物即雇佣工人,总之,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另一个人,还不能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

(78) 韦克菲尔德的少许卓见,全都由老米拉波、重农主义者以及他以前的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例如卡耳佩珀、柴尔德等人提出过了。

(79) 后来,这种制度在国际竞争斗争中成了一种暂时的必要。但不论它的动机如何,后果都是一样的。

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建立起来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⁸⁰⁾他向我们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①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3000名工人阶级的成员——男人、妇女和儿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⁸¹⁾。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为了解韦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必须先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属于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劳动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这种属性,可以说它们的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韦克菲尔德就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生产者私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和中世纪的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己封建的标签。

(80)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条件,它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7日《新莱茵报》第266号)

(81) 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2卷第33页。

① 澳大利亚的旧称。——编者注

韦克菲尔德说：

“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望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⁸²⁾

因此，只要劳动者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那么，在韦克菲尔德的想象中，旧大陆劳动者的劳动资料是怎样被剥夺，从而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是怎样产生的呢？靠一种非常原始的社会契约。

人类“采用了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简单方法”，自然，从亚当和夏娃时代起人类在想象中就把这种积累当做自己生存的唯一和最终的目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 这种划分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⁸³⁾。

一句话，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但是，为什么又要提倡与自然的殖民相对立的系统的殖民呢？唉！这是因为

“在美国北部各州，是否有 $\frac{1}{10}$ 的人口属于雇佣工人的范畴，是值得怀疑的…… 在英国几乎所有的人民群众都是雇佣工人。”⁽⁸⁴⁾

可见，劳动人口为资本的荣誉而自我剥夺的欲望完全是虚构的，

(82) 同上，第1卷第17页。

(83) 同上，第18页。

(84) 同上，第[42、]43、44页。

连韦克菲尔德本人也认为,奴隶制是殖民地财富唯一的自然基础。他的系统的殖民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因为他要对付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奴隶。

“但是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如果没有奴隶制,资本就会死亡,至少也会缩小到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狭小领域里使用的微小数额。实际上,英国人最后建立的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占有的资本超过了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⁸⁵⁾

剥夺人民群众的地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条件。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占有一部分土地作为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因此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⁸⁶⁾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就劳动者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很大的份额而言——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⁸⁷⁾

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和劳动的物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以,农业还没有和工场手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里,资本的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

(85) 同上,第2卷第5页。

(86) “土地要成为殖民的要素,不仅必须是未耕种的,而且必须是能够转化为私人财产的公共财产。”(同上,第125页)

(87) 同上,第1卷第247页。

“在美洲，除了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即那些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经营大企业的人，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他们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业制品送到遥远的市场去。他们是纺纱者和织布者，他们制造自己消费的肥皂、蜡烛、鞋和衣服。在美洲，铁匠、小商人或木匠等人往往同时也是农民。”⁽⁸⁸⁾

这些古怪的人哪里还给资本家留下什么禁欲的场所呢？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对剥削最有利的范围内，最后，劳动者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得到了保证。惯于欺骗的经济学家在欧洲，用花言巧语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人即一个让渡资本商品和另一个让渡劳动商品的商人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并使之永久化。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劳动者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工人人口的绝对数字的增长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致命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劳动者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或农民。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自由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先生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市场的状况，从而对工资率，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

(88) 同上，第21、22页。

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像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资本家的实际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卓越的爱·吉·韦克菲尔德那样感人，那样雄辩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

他说：

“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⁸⁹⁾……虽然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分配的产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而即使寿命大大超过平均寿命的人，也只有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⁹⁰⁾”

劳动者决不允许资本家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劳动。即使资本家想出绝妙的主意，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转化为独立的农民，甚至和自己原来主人展开竞争，把到市场上来等待雇用的人手夺走。”⁽⁹¹⁾

这是多么令人不快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资本家竟用自己宝贵的金钱从欧洲输入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完蛋了！无怪乎韦克菲尔德埋怨殖民地的工人缺乏服从精神和从属感情。他的门徒梅里韦尔说：

“由于殖民地的工资高昂，那里渴望有一种较便宜较驯服的劳动，有一个能接受资本家的条件，而不是向资本家提出条件的阶级……在旧的文明国家，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

(89) 同上，第2卷第116页。

(90) 同上，第1卷第131页。

(91) 同上，第2卷第5页。

关系必须用人为的手段建立起来。”⁽⁹²⁾

那么,殖民地的这种占支配地位的、以每个人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而不是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权制度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⁹³⁾生产资料分散在无数独立经营的既是生产者又是所有者的人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各种结合劳动的资本主义基础。

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本的长期性的企业能否取得成功就成了问题。在欧洲,资本在同样的情况下不会有片刻迟

(92) 散见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1842年伦敦版第2卷第235[—237]、314页。甚至那位大好人,庸俗经济学家和杰出的自由贸易论者莫利纳里先生也说:“在奴隶制已经消灭、但没有相应数量的自由劳动来代替强制劳动的殖民地,我们看到了和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相反的现象。我们看到,普通的(原文如此)劳动者反过来剥削工业企业主,他们要求企业主给的工资大大超过产品中应归他们所有的合法部分。因为种植园主出售砂糖得到的价格,不足以弥补工资的提高,所以对这一超额部分,最初不得不用他的利润来弥补,后来不得不用他的资本本身来弥补。许多种植园主就是这样破产的,另一些种植园主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破产,而关闭了自己的企业……毫无疑问,与其看着整代的人毁灭,还不如看着资本积累毁灭(莫利纳里先生多么慷慨!);但如果二者都不毁灭,岂不更好吗?”(莫利纳里《经济学概论》1846年巴黎版第51、52页)莫利纳里先生啊,莫利纳里先生!如果在欧洲“企业主”可以减少工人的合法部分,而在西印度工人可以减少企业主的合法部分,那么,十诫、摩西和先知们⁴⁴⁵,以及供求规律又都成了什么呢!请问您所承认的欧洲资本家每天没有支付的这个合法部分,又是什么呢?在殖民地那里,劳动者竟头脑简单到“剥削”起资本家来了,因此,莫利纳里先生很想在那里用一点警察手段来挽救这条可怜的供求规律。而按照您的说法,这条规律在其他场合是会自动发生作用的。

(93) 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2卷第52页。

疑,因为工人阶级是它的活的附属物,总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总是过剩的。可是在殖民地国家……韦克菲尔德讲了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同加拿大和纽约州的某些资本家交谈过,这些地方移民浪潮经常发生停滞并且把工人沉淀下来。传奇剧中的一个 人物叹惜说:

“我们的资本打算从事许多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们能用我们明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工人来开始这些工作吗?如果我们能确实掌握这些移民,我们就会乐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们。确实,如果我们有保证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给,即使他们肯定要离开,我们还是会雇用他们。”⁽⁹⁴⁾

韦克菲尔德在把英国的“结合劳动”式的资本主义农业,同美洲农民 的分散经营作了绝妙的对比之后,却无意中让人看到了事情的反面。他把美洲的人民群众描绘成独立、富裕、有事业心和比较有教养的人,而

“英国的农业工人是衣衫槛褛的穷人,需要救济的贫民……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农业上使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稍许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毫无疑问,英国的耕马对于它们的主人来说是一种贵重财产,所以吃得比英国的农业工人好得多”。⁽⁹⁵⁾

不过没有关系!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就事物的性质来说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子把殖民地的全部土地由公有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时也会消除殖民地。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正

(94) 同上,第191、192页。

(95) 同上,第1卷第[21、]47、246页。

式规定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人为价格来出售处女地。这样就可以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⁹⁶⁾，转化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政府应当用按照迁移来的劳动者较难支付的价格出售土地得来的基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从工资中榨取来的基金，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程度，从欧洲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使资本家先生在那里总是可以找到人手充裕的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最美好的殖民地上，一切都十全十美¹²⁹。这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

韦克菲尔德扬扬得意地喊道：

“按照这个计划，劳动的供给必然是不断的和有规则的；因为，第一，既然任何一个劳动者在没有靠劳动挣到钱以前，都不能获得土地，所有移民就必须作为结合起来的雇佣工人进行劳动，从而就为他们的主人生产出可以使用更多劳动者的资本来；第二，每个改变了自己的雇佣工人地位而成为农民的人，正好由于购买公有土地而提供了一个能把新劳动者输入到殖民地来的追加基金。”⁽⁹⁷⁾

国家强行规定的土地价格，当然必须是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说，必须高到“使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被另一个人取代以前不可能变成

(96) “你们还说，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所以能找到工作，为自己弄到收入，是由于土地和资本的占有……恰恰相反，所以会有这种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正是由于土地的个人占有……你们把一个人置于真空中，你们就夺去了他的空气。你们夺取土地，也就是这样……这就是说，你们把他置于没有任何财富的真空中，所以他只能按照你们的意志生活。”（散见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267、271页）

(97) 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2卷第192页。

独立的农民”(98)。因此,这种“充分的价格”,无非是工人为了能从劳动市场回到农村而付给资本家的赎金的一种隐蔽婉转的说法。他先是必须为自己的慈善的主人创造资本,以及使他的主人能够剥削更多的劳动者,然后又必须使政府能够用他所提供的费用,为这位高贵的、精明强干的老爷把他的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是,韦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当然,它遭到了和罗伯特·皮尔先生的银行法¹⁰⁴同样彻底的可耻的失败。结果只是使移民潮流从英国殖民地转向美国。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压迫的加重,使韦克菲尔德的方案成为多余。一方面,逐年涌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并沉淀下来,因为从欧洲来的移民浪潮把第二次移民浪潮还没有卷到西部去的那些人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了。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⁷的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和赋税,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分送给经营铁路、矿山等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此,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劳动者的乐园了。在那里,特别是在东部各州,资本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对工人的奴役还远没有达到欧洲的标准水平。

韦克菲尔德本人大声责难英国政府如此大规模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家的做法。这种做法加上寻找金矿的不断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对殖民地最小的手工业者的竞争,在澳大利亚产生了一个相对过剩人口,这种相对过剩人口虽

(98) 同上,第45页。

然还远远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固定,但数量相当可观,以致每班邮船都带来澳大利亚劳动市场供给过剩的凶讯。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卖淫现象和在伦敦草市⁴⁴⁶一样盛行。⁽⁹⁹⁾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现状。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在其论述殖民地的煞费苦心的著作中真实地暴露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基础的。

(99) 澳大利亚自治后,当然就要制定有利于移民的法律,但英国过去滥送土地的做法,成了一种障碍。“1862年新土地法的第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移民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公共土地大臣加·达菲《维多利亚土地法指南》1862年伦敦版)

致 读 者

约·鲁瓦先生保证尽可能准确地、甚至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正由于他那样认真,我不得不对译文作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因为本书分册出版,这些修改是逐日作的,所以不能处处一样仔细,文体不免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担负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要加进去,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等等。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

下面是我从德文第二版跋中摘引的几段,是有关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发展和本书运用的方法的。

卡尔·马克思

1875年4月28日于伦敦

德文第二版跋摘录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塔夫·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等的历史》中,已经大体上说明了在我们这里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阻碍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不是我国的产品;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我们的教授一直是学生;而且,进步社会的理论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落后社会的意识去解释,因此,被歪曲了。为了掩饰自己的虚伪的立场、缺乏独创性的见解和科学上的无能为力,我们这些由于置身于不熟悉的领域而感到困惑的先生们就摆出一副十足的博通文史的架势,或者从德国官僚用官房学⁴⁴⁷的美名装饰起来的各种知识的杂拌中抄袭一些东西,把它们同自己的货色掺在一起。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日益牢固地树立起来,现在它已经把这个梦幻者的国家变成了行动者的国家,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显然命运不济。当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恰好缺少作为政治经济学前提的社会环境。而当这种环境出现时,容许他们即使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发展的过渡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

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在那里，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古典时期。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是第一个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的经济学家。这种对立实际上同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各阶级的存在本身是不可分离的，而他却天真地把这种对抗说成是人类社会的不变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人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科学了，这个人就是西斯蒙第。⁴⁴⁸

随后一个时期，从 1820 年到 1830 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生机勃勃，大放异彩。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完成和庸俗化的时期，也是他的理论同由亚当·斯密的学说中产生的其他各个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⁴⁴⁹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几乎完全分散在杂志论文、小册子以及其他时事性著作中。这一论战的纯朴的性质——虽然某些无派别的著作家已经把李嘉图的理论当做攻击资本主义的武器⁴⁵⁰——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因为大工业只是从 1825 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的。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⁴⁵¹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¹⁷⁹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逝世后法国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像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

1830年，决定性的危机发生了。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警察来说是否悦耳，是否能够博得他们的欢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有良心的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由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赞助的反谷物法同盟⁴⁵²强加给公众的论文集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不久，罗伯特·皮尔的自由贸易的立法就把庸俗经济学的最后的爪子连同它的最后的抱怨一起除掉了。⁴⁵³

1848—1849年大陆的革命爆发了。它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有科学抱负、不愿单纯充当上层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缓和的折中主义产生了。⁴⁵⁴正如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出色地指出的那样，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

可见，当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成熟时，阶级斗争已经在英国和法国明显地表现出对抗的性质；此外，德国无产阶级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因此，当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资产阶级的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雄心勃勃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辩护论经济学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自己科学的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

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道地的背诵课文、模仿老师的学生，是为外国大商行效劳的可怜的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任何独创的进步，但是没有排除对它的批判。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⁴⁵⁵既责备我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形而上学，又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单纯批判地分析既成的要素，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基辅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季别尔先生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所共有的。”^{(1) 456}

莫·布洛克先生⁽²⁾认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甚至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⁴⁵⁷彼得堡出版的俄国杂志《欧洲通报》在一篇专谈《资本论》的方法的文章中^{(3) 458}，声

(1) 《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

(2) 《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

(3) 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

言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辩证法的。文中说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者，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者。而实际上，在批判的经济学领域中，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俄国著作家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读者感到兴趣。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⁴⁵⁹，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关心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此，只要证明现有结构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结构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结构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类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历史现象的自然的联系，即受一些规律支配的联系，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明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明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既不能以意识的任何形式也不能以意识的任何结果为基础。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只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这种批判仅仅要求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最重要的是，它要求把各种现象的序列、对这些现象作为连续的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

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同一的、永远不变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现象,和我们在生物学的其他领域所看到的现象相同……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事情远远不止于此,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绝对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经济时代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不同,生产关系和调节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所必须完成的工作。这种研究的特殊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正是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把他称为我的研究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完整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这种幻影就可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⁴⁶⁰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运动,即他用观念这一名称加以人格化的思维运动,是现实的创造主,而现实只是观念的现象形态。我的看法则相反,思维运动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现实运动的反映。

将近 30 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 虽然黑格尔出于自己的误解而用神秘主义歪曲了辩证法,但这绝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叙述了辩证法的总体的运动。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只要使它重新用脚站起来,就可以发现它的完全合理的面貌。

辩证法,在其神秘的形态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的形态上,引起统治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意识形态家们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把运动本身的一切既成形式都看做是过渡的形式,因此它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些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危机的先兆,它又要临头了;由于它的作用范围的广阔和影响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投机家们的头脑里去。⁽⁴⁾

(4) 德文第二版跋写于 1873 年 1 月 24 日。该文发表不久,文中预言的危机就在奥地利、美国和德国爆发了⁴⁶¹。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这些猛烈的、但又是局部的爆发已经就是普遍危机。相反,普遍危机正在向自己的顶点发展。英国将成为这场危机爆发的中心,其影响将波及世界市场。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资本论》第一卷 1867 年德文第一版第一章的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其中概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 年柏林版的内容。马克思在 1866 年 10 月 13 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了作这一概述的原因。后来，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一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一篇。关于这些修改的具体情况，见《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14 页）。——16。
- 2 完全删去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A. 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B. 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C. 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三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45—457、470—481、552—582 页）。马克思在撰写 1863—1865 年经济学手稿时放弃了他最初的打算，即在每一章理论部分的后面加上理论史的部分，而计划在《资本论》第四册中来叙述理论史，这部分后来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发表。——16。
- 3 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一书的 III 章《交换、价值和自由竞争》（见该书 1864 年柏林版第 120—158 页），其中拉萨尔在第 149 页上指明参看马克思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有关拉萨尔的抄袭行为，见马克思 1864 年 6 月 3 日给恩格斯和 1866 年 10 月 13 日给路·库格曼的信。——16。
- 4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这句话引自贺拉斯《讽刺诗集》第 1 卷第 1 首。——17、274。
- 5 英国应用社会统计比德国早得多。1662 年伦敦市的官员约·格朗特首次

把计算具体地运用于人口统计。但政治算术(统计)的真正创始人是威·配第,他在1676年写成的《政治算术》这一著作中用算术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18。

- 6 美国独立战争即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是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七年战争后英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激起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1774年北美殖民地代表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呈交英王的请愿书和抵制英货的法案。1775年4月19日,战争在列克星敦爆发,5月10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织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在进行反英战争中的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成立。1781年10月,英军主力被击溃后,在约克镇被迫投降,交战双方最终于1783年9月签订了巴黎和约。在条约中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取得胜利的北美人民建立了美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8。
- 7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18、411、453、609。
- 8 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高教会信徒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他们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的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见注390),其信徒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19、658、694。
- 9 三十九条信纲是英国国教会的信仰纲要,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制定。1562年女王审定批准克兰默起草的四十二条款,后压缩为三十九条。1563年起,所有神职人员就职时必须宣誓恪守这些信纲。1571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三十九条信纲正式成为英国国教会的信纲。——19。

- 10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主要的官方资料。——19、175、437、522、586、729。
- 11 马克思未能实现他的计划。在他逝世后,《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先后于1885年和1894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恩格斯没有能出版《资本论》第四册。——20、363。
- 12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是套用但丁《神曲》中《炼狱篇》第5首中的一句(Vien dietro a me, e lascia dir le genti)。——20。
- 1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页。——23。
- 14 法的拟制(fictio juris)本是法律上一个原则,即把现实中不存在的事实法律上当做存在的事实来处理。正文中的意思是指一种与现实相矛盾的假定。——24。
- 15 这里套用了赛·巴特勒的长诗《休迪布腊斯》第2部第1首中的诗句。——27。
- 16 1785年,埃·卡特赖特发明了机械织布机。19世纪20—30年代,蒸汽织布机得到较广泛的使用。——30。
- 17 见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两卷集)1831年伦敦版。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引用了杰科布的这句话:“可能在所有时代,贵金属的生产费用都超过它们历来被支付的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79页)——31。
- 18 见赫·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年伦敦版第1卷第52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引用了这句话:“厄什韦葛(在1823年)估计,在巴西,80年间开采的金刚石的总价值还赶不上18个月中所生产的砂糖或咖啡的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46页)——31。
-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7页及以下几页。——32。
- 20 古代印度公社是古印度社会典型的劳动组织形式,形成于原始社会瓦解、

阶级社会关系产生的时期。作为生产者集体的村社由当地的农民和其他以某种方式与农业相联系的人组成。它相当独立地组织几乎所有地区的以人工灌溉和排水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受气候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村社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即把手工业纳入农业生产中。村社的原始形式的特点保持了很久。虽然在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出现了财产差异(村社中开始形成阶级),但村社成员的土地优先权继续存在(种姓制度形成以及手工业继续受农业的约束)阻止了村社最后的瓦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古代印度公社作了详细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和第30卷第467、476—478页)。——33,82,372。

- 21 威·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见他的《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47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引用了配第的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33、428页);他在1875年4—5月写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同上,第25卷)中,批评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论点——34。
- 22 “上帝的羔羊”,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章第29节。——43。
- 23 “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是亨利四世的话。1593年,当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时,他说了这句话。——43。
- 24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卷第5章。——51。
- 25 关于弗·路·奥·费里埃和沙·加尼耳的重商主义的观点,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391页和第VIII笔记本第358—36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08—310、240—247页)。——52。
- 26 马克思所说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除了弗·巴师夏之外,还有德国自由贸易派的信徒如约·普林斯·史密斯、维·伯默特、尤·孚赫、奥·米夏埃利斯、麦·希尔施、海·舒尔采·德里奇等人。他们为工人举办讲座,其中一部分人还在工人协会中宣传他们的目的。——53。
- 27 这是马克思对亨·邓·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年伦敦第2版作出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38页和马

- 克思 1868 年 3 月 6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有对该书的评价。——53。
- 28 马克思所说的李嘉图学派是指以罗·托伦斯、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在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 年在伦敦出版之后用庸俗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基本对立。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由于它无法解决两个问题：“（1）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与价值规律相一致。（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5 卷第 208 页）。对这一学派的详细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VII 笔记本第 319 页—第 VIII 笔记本第 347 页（同上，第 33 卷第 168—221 页）。——55、320、462、532、541。
- 29 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 1 章第 2 节，其中马克思提到下述著作：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威·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托·娄·埃德蒙兹《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他还详细地引用了约·布雷《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一书。而约·格雷《社会制度》一书，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78—480 页）中引用的。——61。
- 30 “在蒲鲁东以前，就已经有布雷、格雷等人进行过这种尝试。”这句话在德文版中是：“没有一个学派比蒲鲁东学派更会滥用‘科学’这个字眼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85 页注（24））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远没有在德文版中那么激烈，这是马克思采取的另一种策略。马克思考虑到了蒲鲁东的思想当时在法国工人阶级中还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也考虑到了法文版《资本论》在法国的销售数量问题，正是这些原因促使他在文字上作出了上述修改。实际上，蒲鲁东的思想早就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刻批判。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尤其是在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中的批判，“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马克思 1859 年 7 月 22 日给恩格斯的信）。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驳倒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观。公社成为“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见恩格斯

- 1891年为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但蒲鲁东的一些重要思想,如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和他的反国家主义,在各种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中都有反映。——61。
- 31 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16场《玛尔特的花园》。——65。
- 32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出现了一个政治反动时期。当时欧洲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热衷于唯灵论,特别是桌子跳舞的降神术,而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506—517页)中深入分析了唯灵论。在德文版中马克思在此处加了一个注:“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同上,见第44卷第88页)——65。
- 33 “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14章第1节和第9节。——67,376。
- 34 谈到鲁滨逊的故事时,马克思指的是大·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三版第一章,尤其是第一章第三节。马克思在1857年8月写的《导言》里全面论述了鲁滨逊故事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2—25页)。在恩格斯1869年11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也有相关的论述。——70。
- 35 “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见大·李嘉图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版第21页。罗·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庭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正方形的住宅区。“欧文的平行四边形”这一名词即由此而来。——70。
- 3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4—455页。——70。
- 3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6页。——71。
- 38 关于古亚细亚的、古代世界的等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3页。——73。
- 39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

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73。

- 40 在马克思 1843 年底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中已包含了这一思想。——73。
- 41 “马克思所说的本书第三册和第四册中评论大·李嘉图的价值量的地方,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 年手稿)》第三册第二章《5. 工资的普遍提高或降低(下降)对各种商品的生产价格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2 部分第 4 卷第 2 册第 273—278 页)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II 笔记本第 650—652 页,即《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中《(1)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一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4 卷第 447—451 页)。”——74。
- 42 教父是公元 2—6 世纪基督教界最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的泛称,意为教会父老。他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较深影响。教父的主要观点是贬低知识和智力,颂扬无条件的信仰,敌视“异教”即非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特别是古代的唯物主义。——75、79。
- 43 “经济学家们”(économistes)原先是对重农学派的称呼。大约在 19 世纪中叶,这个名词广泛用于各种经济学说的著作家,不再只用于说明某一经济学说的特点。而且,弗·魁奈及其门徒杜邦·德奈穆尔已经给自己加上了“重农学派”这一称谓。——75、85。
- 44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 2 章第 1 节中《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75、693。
- 45 美国的这家德文报纸可能是指卡·海因岑在波士顿出版的《先驱者》。该报在 1859 年 7 月 12 日第 26 号第 2 版第 IV 栏与第 3 版第 I 栏的“杂文集”专栏匿名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先生》一文。除了“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句话,文章摘录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阐述其著作的全部计划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认识的一整段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11—413 页)。紧接着,作者把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说什么“一种女人的情绪推翻了一个王国,一种诸侯的情绪严重破坏了世界的一部分,一种改革者的思想使整个世界振奋起来,并抛弃了全部的‘经济学’和所有的‘生产关系’”。关于

- 海因岑对《资本论》的反应，见马克思 1869 年 11 月 6 日给恩格斯的信。——75。
- 4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12 页。——75。
- 47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IV 笔记本第 836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5 卷第 176—177 页）。——77。
- 48 莎士比亚《无事生非》第 3 幕第 3 场。——77。
- 49 朗迪是巴黎近郊的一个地方，12—19 世纪每年都在这里举办一次大集市。——78。
- 50 “很多人”在德文各版中为“蒲鲁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103 页注（38））。——78。
- 51 歌德《浮士德》第 1 部第 3 场《书斋》。——80。
- 52 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 17 章第 13 节和第 13 章第 16—17 节。
《启示录》（或《约翰启示录》）是收入《新约全书》的原始基督教著作之一，写于 1 世纪。《启示录》的作者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公愤，把它打上“兽”的印记，并把它看做魔鬼的化身。马克思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是暗指货币。——81。
- 5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77 页及以下几页，另见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者路·阿·达里蒙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0 卷第 59—88 页）。——81。
- 54 印加国是南美洲西南部的古国。其君主称印加，国民称印加人。11 世纪以后，艾马拉和克丘亚西两大部落在秘鲁库斯科谷地陆续兼并邻近地区，15 世纪中叶形成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印加国保存了很多原始社会残余。印加社会有严密的行政制度，分为三个阶级：贵族、平民和奴隶。社会基本单位是有共同祖先的一些家庭组成的氏族公社或村社（Aylla），共同占有土地和牲畜。16 世纪，印加国最盛时期曾扩展到现在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1533 年被西班牙殖民者消灭。——82。
- 5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216、475—476 页。——83。

- 5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0页。——83。
- 5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8—552页。——83。
- 58 《学说汇纂》是罗马民法大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汇集了罗马著名法学家关于民法和诉讼法著作中一些符合奴隶主利益的摘录。它是在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执政时编著的，公元529年作为法律公布。《学说汇纂》包含如下的看法：货币是抽象的价值量，贵金属金银也同样只有虚构的价值，这个价值可以由最高的国家权力任意规定。——85。
- 59 菲力浦六世（瓦卢瓦的）多次发动反对英国的战争，这促使他多次下令征税并导致铸币质量下降。——85。
- 60 这句话引自君士坦丁二世于公元356年颁布的一项诏书（见《狄奥多西法典》第9章第23节第2段）。《狄奥多西法典》是由东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二世执政时编纂的，它收集了4世纪和5世纪皇帝的敕令。——85。
- 6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7页及以下几页。——88。
- 62 罗·欧文认为，在未来的新社会中，以银行券形式表现劳动价值的纸币是用于满足国内需要和货物交换的，它的发行必须同现有的储备相适应，它只有同实际的价值产品相交换时才可得到。——88。
- 63 威·爱·帕里《航行日志。记威·爱·帕里指挥的赫克拉号和格赖珀号轮船为开辟大西洋至太平洋的西北航线而进行的远航（1819—1820）》1821年伦敦第2版第277—278页。——89。
- 64 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12—17、232—233和248页。——90。
- 6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0—481页。——90、95。
- 6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9—470页。——91。
- 67 在古代神话里，人类历史分成五个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是五个时代中最初两个时代。在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们无忧无虑，只是在后面几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个即最后一个时代——

- 黑铁时代——充满了不平、暴行和屠杀。关于这五个时代的传说，在古希腊叙事诗人赫西俄德以及古罗马抒情诗人奥维狄乌斯的作品中都有记述。——94。
- 68 指 1707 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使苏格兰最终归并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苏格兰的议会解散了，两国间在经济上的相互阻隔也随之消除了。——94。
- 6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66 页。——94。
- 7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69 页。——95。
71. 黑格尔关于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的观点，见他的《哲学全书纲要》第 1 部《逻辑学》1840 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 6 卷）第 147 节。——97。
- 72 圣哲罗姆《给欧斯托希的信——论童贞的保持》。——97。
- 73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 24 首歌。——98。
- 74 关于马克思对斐·拉萨尔的这一著作，尤其是对拉萨尔对赫拉克利特的这句话的注解的解释，见马克思 1858 年 2 月 1 日和 1859 年 2 月 25 日给恩格斯的信。——100。
- 75 关于商品的惊险的跳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已经谈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83 页。——101。
- 76 “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见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 1 幕第 1 场。——102。
- 77 “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iecta membra poetae)见贺拉斯《讽刺诗集》第 1 卷第 4 首。——102、496。
- 78 “卖就是买”这句话不是直接出自弗·魁奈，而是出自杜邦·德奈穆尔的著作《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见《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 年巴黎版第 1 部第 392 页。——103。
- 79 “货币没有臭味”套用了“这类税没有臭味”这句话。“没有臭味”(non olet)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105。

- 80 “永生之水”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4章第14节。——107。
- 8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90—493页。——109。
- 82 见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33—52页，在那里他谈到了危机。在紧接第2卷第3册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概要》第459页上他写道：“商品：为卖而买的产品。”——109。
- 8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3页。——117。
- 8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4—560、564页及以下几页。——118。
- 85 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1848年伦敦版第2卷序言第3—4页。——118。
- 86 阿·威灵顿率领的英国军队在1808—1815年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中曾取得辉煌战果，而英国的威·芬·威廉斯将军（卡尔斯从男爵）却在1855年11月27日被迫把他指挥防御的卡尔斯城交给了俄国军队。——119。
- 87 见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2册第280页。——119。
- 88 关于王茂荫改革币制的主张以及他1853年和1854年（咸丰三年和四年）两次向皇帝呈上奏折的情况，详见郭沫若1936年10月写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载于《沫若文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1卷第28—34页）和吴晗1937年3月写的《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载于《吴晗史学论著选集》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84—210页）。——121。
- 89 俄国政府1861年才向北京委派公使。在此以前，即从1715年起，“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又称传教士团，布道团）实际上起着官方代表的作用。这里的“公使馆”应为“传道团”。
- 这里关于中国的著作是指传道团编的文集《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该《集刊》由俄文译成德文时书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及其人民、宗教、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著述》。——121。
- 90 英语“sovereign”一词，既有“君主”、“帝王”的意思，又是一英镑金币的名称。——122。

- 91 黑格尔关于一切限度都消失了的观点,见他的《逻辑学》第1部《客观逻辑》第1编《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第421—455页(《黑格尔全集》第3卷)。——122。
- 92 皮·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见《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213页。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37页)。——125。
- 93 “社会的抵押品”这个表述,马克思引自约·格·毕希《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1800年汉堡—基尔增订第2版第298—299页:“……货币……作为普遍的抵押品,不仅仅是在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之间,而是在几个资产阶级社会之间。”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的《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第LX节中简短地概括了毕希的论点:“货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抵押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48页)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110页。——126。
- 94 “物的神经”(nexus rerum),意思是各种物的联系。此处当指货币。——126。
- 95 位于福基斯领土上的德尔斐阿波罗神庙被看做是中立的、不可侵犯的。大量的捐赠和贵重物品使神庙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政中心。公元前356年福基斯人占领并抢劫了寺庙区,这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即公元前356—346年的第三次神圣战争),马其顿王菲力浦二世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几年后(公元前338年凯罗尼亚会战),他把由此而赢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为对希腊的统治。——127。
- 96 圣杯,根据中世纪的传说,是耶稣的门徒用来承接耶稣自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的神圣杯子。中世纪后,教会规定圣杯(至少杯身)需用金或银制造。如果是银杯,里面还应镀金。有些圣杯还要镶嵌珍珠宝石。——127。
- 97 “让我们成为富人或外表像富人吧。”引自德·狄德罗《1767年的沙龙》。——129。
- 98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

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129、815。

- 99 见《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 1864年2月8日的质询》第3页。——129。
- 10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34页。——132。
- 10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1页。——134。
- 102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收入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至第四版中,除第一版直接改为“正比”外,其余各版仍为“反比”,但编者在注释中作了如下说明:“马克思这里指的是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参看本卷第141—144页)。由此得出,在支付期限较长的情况下,流通的货币手段增加了。脚注(107)也说明了这一点。”——137。
- 103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91年伦敦版的附录《献给英明人士》。——137、141、280。
- 104 1844年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倡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1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求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令,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三十四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
- 关于马克思仔细研究英国银行制度的发展和1844年皮尔银行法的情况,见他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有关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7卷第89—94、108—109页;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111—113、251和26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9、579页。——138、440、839。
- 10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0页及以下几页。——

138。

- 10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3页及以下几页。——139。
- 107 见大·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1年伦敦修订第4版。——139。
- 108 “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理论”(currency theory)是19世纪广泛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货币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1825年开始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它以大·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银行券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银行券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理论”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赛·琼·劳埃德(1850年起为奥弗斯顿男爵)、罗·托伦斯、乔·沃·诺曼、威·克莱、乔·阿巴思诺特等人。他们主张把金属货币流通的抽象规律推广到银行券的发行上。除了金属货币以外,他们还把银行券称做“通货”(即流通手段)。他们相信,用贵金属为银行券建立充足的准备金,可以实现稳定的货币流通,认为银行券的发行应按照贵金属的输出、输入来调整。英国政府依据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尝试(包括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不能解决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7—580页)。——139,661。
- 109 见约·拉·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这门科学的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第181页。——139。
- 110 詹·斯图亚特关于金银的特征是世界货币的说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2卷第370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已提到斯图亚特这一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2页)。——140。
- 111 “生出货币的货币”(money which begets money),引自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2年伦敦版第87页,参看马克思《1844年经

- 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45页)。
——153。
- 112 指法兰西研究院,它是1795年成立的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成。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
——162。
- 113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 Rhodus, hic salta!)这句话出自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义是: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 ——165。
- 114 “历史学家”在德文版中为“有关古典古代的一些实用百科辞典”,显然是指奥·保利的《古典古代实用百科全书》1839—1852年斯图加特版第1—6卷。马克思在1857年7月16日和9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过这一著作。——167。
- 115 库扎政变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859年1月,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亚·库扎先后被选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的国君。这两个长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公国于1862年合并,为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库扎执政后,立意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他的政策遇到了地主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在地主代表占优势的国民议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草案后,库扎于1864年实行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颁布了新宪法,扩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政府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实行的土地改革,规定废除农奴制和通过赎买把土地分给农民。——167、242。
- 116 抵债劳役(péonage),就是要由劳役来偿还的借债形式,马克思在1867年10月11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作过论述。——168。
- 117 威·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91年伦敦版第64页。另参看本卷第326页脚注(1)。——171。
- 118 关于伊甸园,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章第8节。——176。
- 119 耶·边沁是所谓的有用哲学即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他来说,个人的利益是一切行动的动力。然而,一切利益,如果正确加以理解,又处

- 于内在的和谐状态中。每个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也就是社会的利益。
——176。
- 120 “前定和谐”是哥·威·莱布尼茨的用语,根据他的哲学,特别是他的单子论,每个单子与其他所有单子和整个宇宙的发展是一致的,这种和谐秩序是由上帝事先确定的。——176。
- 121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27节和《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2章第25节。——181。
- 122 雅·杜尔哥的这一著作写于1766年。马克思把这一年作为本书的发表年。其实该书是1769—1770年由杜邦·德奈穆尔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引用的是1844年欧·德尔在巴黎编辑出版的版本。——182。
- 123 “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引自托·本特利的著作《关于使用机器缩短工时的益处和政策的书信》1780年伦敦版。马克思在1859—1863年于伦敦所作的第VII笔记本第155页中,摘录了这一著作第2—3页上的一段话:“人们用许多方式对人下定义……a toolmaking animal或engineer(富兰克林)已被一些人当做人的最好的、最有特点的定义而加以采纳。”——182。
- 124 见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29—238页。——184。
- 125 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版第14页。——184。
- 126 这是套用圣经后典中的一句话:“虽然不信神的人走在良好的道路上,但是他的终点是地狱的深渊。”(圣经后典《西拉子耶稣智慧书》或《便西拉智训》第21章第10节)。——193。
- 12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30页。——195。
- 128 “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是套用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中的诗句。——196。
- 129 “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Tout pour le mieux dans le meilleur des mondes possibles)是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一句格言。——197、838。

- 130 “劳动者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套用的古罗马作家马可·忒伦底乌斯·瓦罗的话。他在《论农业》第1卷第17章第1节中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犁是“无声的工具”。马克思引自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47页。——198。
- 131 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218、405、423、474、507、598。
- 132 “无中不能生有”引自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卷第156—159行。——218。
- 133 修昔的底斯是古希腊历史学家，马克思把威廉·罗雪尔讽刺地叫做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因为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如马克思所说，“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在引用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时表示：“像那位我特别地奉为老师的古代历史学家一样，我也希望我的著作有益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希望准确地了解过去的事情，了解由于人性的缘故有朝一日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再次发生的事情。”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362页）。——220。
- 134 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中此处的注文中所举的一个纺纱业例子，摘自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笔记本第8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84—185页）。在德文第二版中改写的第(31)脚注注文根据的是恩格斯提供的材料。见马克思在1865年11月20日和1868年5月7日和16日给恩格斯的信。——222。
- 135 威·杰科布《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赛·惠特布雷德的一封信》1815年伦敦版第33页。——223。
- 136 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2章《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223。
- 137 指1833年的工厂法《关于规定联合王国工厂童工与青工劳动强度的法令》。（1833年8月29日）（见《公共普通法汇编》1833年伦敦版第103

章)。马克思在本卷第 320—326 页还专门论述了 1833 年的工厂法。——227、287。

- 138 锡利亚一词源于希腊文 *chilias*, 意为一千年的时期。锡利亚教义产生于奴隶制度解体时期, 宣传基督复临, 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 反映了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心态。恩格斯把这种信仰称做“锡利亚式狂想”。这种信仰在基督教早期流传很广, 后来经常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教义中。——231。
- 139 安·尤尔《工厂哲学: 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6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197—198 页。——232。
- 140 关于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 见本卷第 273—302 页、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299—310 页)、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11—12 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V 笔记本第 217—218 页。——232、290、432。
- 141 小先令派(*little shilling men*)亦称伯明翰派, 是 19 世纪上半叶在英国伯明翰产生的一个经济学学派。他们宣扬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理论, 把货币仅仅看做“计算名称”, 否认货币的计算名称(例如镑、先令)是与一定量的贵金属相联系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托·阿特伍德和马·阿特伍德兄弟以及理·斯普纳等人。他们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计量单位含金量的方案, 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别名由此而来。同时, “小先令派”还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 运用他们的理论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而振兴工业, 保证国家普遍繁荣。然而, 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 实际上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 从而为各种贷款的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关于马克思对这一学派的评价,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76—477 页。——237。
- 142 “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是大·汉泽曼 1847 年 6 月 8 日在普鲁士联合议会的演说中的一句话, 见《在第一届普鲁士联合议会的演说及演说者》1847 年柏林版第 417 页。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第四篇论文开头也引用了这句话。——239。

- 14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I笔记本第10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17—218页)以及第XXI笔记本第1314页上,都有关于工资制和正常工作日的论述。——239。
- 144 《组织规程》是1831年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这两个公国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为俄军所占领。《组织规程》的方案是由两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帕·德·基谢廖夫拟定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土地占有者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则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各城市的代表推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将政治权力集中在土地占有者手中。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措施,即废除国内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司法与行政分立以及取消刑讯等。1848年革命期间,该《组织规程》被废除。——243。
- 145 指《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50年8月5日)》。其中对工作日的时间作了规定。
马克思利用的大概是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的《工厂法》第3—5页。——245、276、303。
- 146 关于这条注释的改动情况,见马克思1866年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说道:“我对《工作日》一节作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我现在‘加进去的’是对你的书到1865年止的(简略的)补充(我在注释中指出了这一点)。”
《工作日》一节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是第三章的组成部分,在德文第二版中是第三篇第八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67—350页)。——245。
- 147 杰·乔叟《公鸡和狐狸》,见德莱登编《古代和现代寓言》1713年伦敦版第280页。——248。
- 148 关于“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1858年伦敦版。——249。
- 149 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一个最高咨询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组成。它最初成立于13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17世纪以前,枢密院在治

- 理国家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到了 18、19 世纪,随着议会制的发展和内阁权力的加强,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仅保留接受和审理殖民、宗教和行政事务方面的申诉权。在现今的英国,它实际已没有任何意义。——250、416、489、703、707。
- 150 这些材料的实际来源是《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 年。第 1 号报告》1863 年伦敦版第 10 页。——250。
- 151 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其他劳动部门》一节。——250、261。
- 152 “又是克里斯平”(Ecce iterum Crispinus)是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第四首诗的首句,在讽刺诗集的第一部分中曾有一篇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宫廷克里斯平的。这句话的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254。
- 153 马克思在本卷第 174 页脚注(52)以及他 1862 年 10 月写的《面包的制作》一文中也谈到了有关面包掺假的情况。——255。
- 154 普罗塔哥拉是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他认为物质处于不断流动中,不断变动中,但是在认识论方面,他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人的每一个认识的相对性。在他看来,认识的内容取决于进行认识的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55。
- 155 埃利亚派是公元前 6 世纪末—5 世纪古希腊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派别。这一派别的最重要的代表有色诺芬、巴门尼德和芝诺。埃利亚派企图证明,运动和现象的多样性不是存在于现实中,而只存在于想象中。——255。
- 156 大陪审团是 1933 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出 12—23 个“忠厚老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进行预先审查,并决定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258。
- 157 英国国教把星期日定为安息日,它在节期方面虽不同于犹太教(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晚上为安息日),但有关安息日的规定却一样严格:在安息日,任何人都不得经商或旅行;不许挑担,或把负载的牲口赶回来,什么东西都不许从家里拿出去,特别是禁止从事各种劳动。——259、272。
- 158 参见荷马史诗《奥德赛》第 11 章第 34—43 和 541—542 节。——260。
- 159 马克思指他和恩格斯对托·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2

月。(二)模范监狱。3月》一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1—323页)。“天才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崇拜”这句话,看来是套用席勒《阉人和男人》中的诗句。——262。

160 威·斯特兰奇《健康的七要素》1864年伦敦版第84页。——265。

161 1866年危机以前,英国工商业欣欣向荣,无数股份公司纷纷成立,以致约·罗素内阁中越来越多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在1865年把这一发展称为整个社会的进步。

关于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进步年”里英国工人的状况,恩格斯后来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写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详细描述了1865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271。

162 “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Britons never, never shall be slaves!)是词作家詹·汤姆生和作曲家托·阿恩1740年谱写的歌曲《统治吧,不列颠!》中的最后一句歌词。——271。

163 埃克塞特会堂是伦敦的一座建筑物,各种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集会的地方。——272。

164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入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们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一节),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275、413、611、639。

165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回答他的亲信们的谏告时说的,他们劝他不要经常大办酒宴和举行节庆,认为这会使国债剧增,危及国家。——277。

- 166 歌德《致祖莱卡》。——277。
- 167 “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这一典故源于圣经故事：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第29—34节）。现已成为日常惯用的借喻语。——279。
- 168 1347—1350年西欧鼠疫猖獗。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2500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79、756。
- 169 关于摩西传上帝的十诫，规定每周第七日人们应安息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17节。——283。
- 170 这些材料马克思可能引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其中提到1802年的学徒法以及1819、1825、1831、1833年工厂法。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3页。——286。
- 171 1833年6月28日的第1号报告即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这里的信，引自《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第141页。——287。
- 172 “危险在于迟缓”这句话引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38卷第25章第13节。——288。
- 173 引自《〈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第602页，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288。
- 174 解放法令可能是指英国政府1831年11月2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该法令把生活在印度西部的14岁以上的黑人的劳动时间限为9小时，14岁以下的限为6小时。——288。
- 175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十分豪华，充满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将自己轧死。——289、635、693。

- 176 指英国宪章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宪章,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290。
- 177 反谷物法同盟(见注452)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工人的实际工资会提高,工人会得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big loaf)。他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290、478。
- 178 根据基督教关于“千年王国”的教义,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在这期间,信仰基督的圣徒们将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为王;魔鬼暂被捆锁,福音将顺利传遍世界。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20章第3—4节。——290。
- 179 谷物法是1815年以来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实施的法令,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关税,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导致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292、725、843。
- 180 革命委员指国民公会委员,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1792—1795年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在各省和军队中派驻的享有

特许全权的代表。——293。

- 181 暗指英国议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否决人民宪章(见注176)。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示威者将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但是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中有许多人(例如爱·奥康瑙尔)发生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劝说请愿的群众就地解散。反动势力利用这次行动的失败向工人发起进攻并对宪章派加以迫害。结果导致了大逮捕,大约500名最有名、最积极和最激进的分子被捕,其中也包括厄·琼斯,他于1848年6月—1850年7月遭到拘禁。恩格斯在《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中谈到宪章运动的这次失败时写道:“工人阶级的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294。
- 182 指巴黎工人于1848年6月23—26日的英勇起义。二月革命(见注191)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让·巴·菲·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3页)——294。
- 183 嫌疑犯处治法(*loi des suspects*)又称社会治安法(*lois de sûreté publique*),它是1858年2月19日由法国立法团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授予皇帝拿破仑第三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投入监狱或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偏僻地区,或者彻底驱逐出法国领土。——295。
- 184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297。
- 185 十二表法,即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它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习惯法的解释权原先掌握在贵族手中,在平民的要求下,

成立了以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为首的十人委员会(十人团),该委员会受托编制法律,公元前 451 年编出十表,次年又成立新的十人委员会,再编两表,先后刻在十二块铜牌上公布,故而得名,原物已散失,仅在拉丁作家文集中保存下来不完整的法律条文。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奴隶制发展和奴隶主国家形成的过程。十二铜表法是后来罗马法以及欧洲法学的渊源。——297。

- 186 见西·尼·昂·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5 册第 20 章。——297。
- 187 德国著作家格·弗·道默在他的著作《基督教古代的圣礼》1847 年汉堡版第 1 卷第 33—34 页中证明,最初的基督徒在举行圣餐礼时吃人肉。马克思 1847 年 11 月 30 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中也谈到这一点。——297。
- 188 世袭法庭是在地主有权审判和惩罚自己的农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法庭。这类法庭在封建领主土地所有权范围内拥有较低的司法权(财产司法权、遗产司法权和地产司法权),往往委托一位世袭法官(乡长或管家)来行使职权。——299。
- 189 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描绘的未来社会里,人在一个工作日里从事几种劳动,也就是说,工作日将由若干“短时工作”(courtes séances)组成,每一项工作不超过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傅立叶认为,这样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连最贫穷的劳动者也能够比从前的任何资本家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301。
- 19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307 页。——302。
- 191 二月革命指 1848 年 2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 年 2 月 22—24 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国二月革命在欧洲 1848—1849 年革命中具有重要影响。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311、613。

- 192 指 1866 年 8 月 20—25 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 60 人,代表加入工会的 6 万名工人。大会讨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工人的政治活动、合作社、吸收全体工人参加工会、罢工等问题。大会通过了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全国劳工同盟的决定。——312。
- 193 这里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根据马克思 1866 年 8 月底写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拟定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第 268 页。——313。
- 19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299 页。——314。
- 195 “折磨他们的毒蛇”是套用海涅《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中的诗句。——314。
- 196 大宪章即自由大宪章。英王“无地王约翰”统治时期(1199—1216 年),对内肆意践踏封建秩序,对外征战失利,引起大封建主的不满,连支持王权的中小领主以至市民也加入了反对国王的行列。在受到骑士和市民支持的大封建主和大主教等的联合压力下,约翰被迫于 1215 年 6 月 15 日接受并签署了这个大宪章。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力,确认和扩大了大封建贵族的政治、经济和司法特权,甚至规定在他们的封建特权遭到破坏时,可以举行起义反对王室;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作了某些让步;自由民得到不受国王滥用专制权力的法律保证,但基本居民群众即农奴没有得到任何权利。到 19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宪章被用来作为争取权利的法律依据,并成为英国立宪君主制的象征和基础。马克思在这里是指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顽强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而争得的限制工作日的法律。——314。
- 197 多么大的变化啊!(Quantum mutatus ab illo!)引自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2 卷第 274 行。——314。
- 198 指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坚实的支点,我将把地球彻底翻转过来。”——317。
- 199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IV 笔记本第 782—851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5 卷第 70—208 页)。——320。

- 200 关于庸俗经济学抓住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见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20—9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358—361页)。——320。
- 201 巴·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增补)中说,无知并不是充足的论据。这句话是针对那些对抱有僧侣主义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说的,他们认为“上帝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320。
- 202 黑格尔关于量变到质变的观点,见他的《逻辑学》第1部《客观逻辑》第1编《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3卷)。马克思在1867年6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在这里引用黑格尔的观点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资本家的情况。——322。
- 203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1843年由热拉尔首次命名的碳氢化合物的“同系列”,恩格斯在德文第3版中对此加了一个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58页。——322。
- 204 马丁·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见《可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著作集》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6部第296页。——322。
- 205 阿·凯特勒关于平均的个人的言论,见他的《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1842年爱丁堡版第9页。——336。
- 206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88—89页。——337。
- 207 指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 恩格斯在审阅《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的校样之前,已把这一篇和《资本论》第三册的第二至四篇完成并准备付印。见恩格斯1890年4月9日给斐·多·纽文胡斯的信。——338、446。
- 208 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赫伦理学》中把人定义为城市的市民(zoon politi-

- con)。“politicon”既有“国家的”含义,也有“城市的”含义,因为在古希腊,城市和国家是一回事,它们用同一字(polis)来表示。关于人的定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部分也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5页。——340。
- 209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影响下,罗奇代尔城(曼彻斯特北部)的工人在1844年成立了公平先驱社。它最初是一个消费合作社,不久就扩大了,成立了生产合作机构。随着罗奇代尔城先驱社的成立,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345。
- 210 奥·孔德在其1830—1842年出版的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论证了实证论,它是要把科学主要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即事实上(“实证的”)的东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察和理解。孔德从自己的社会理想——工人和资本家的和谐——出发,认为任何一种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都在于巩固资本主义的制度。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他的观点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已经获得广泛的影响。马克思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谈到对孔德的看法。——346。
- 211 古代亚洲的庞大建筑。例如亚述尼尼微的庙宇,巴比伦的伊什塔尔城门和中国的长城;在埃及人那里出名的有吉萨的金字塔,在伊特鲁里亚人那里有公元前7世纪—4世纪的庙宇和陵墓。——347。
- 212 关于股份公司,在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第三册已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4章第6节)。——348。
- 213 关于古典共同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72页。——348。
- 214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亚·斯密在其主要著作中所说的制造针的18种操作(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13页)。——352。
- 215 威·配第关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见他的《论人类的增殖》(《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第35页)。——356。
- 216 指纽伦堡的装配工和钟表匠彼·亨莱恩在1510年前后制造出的第一个

由弹簧推动的小怀表。——357。

- 217 这个例子摘自《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03—204页。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3—1184页。——360。
- 21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冯·波珀的《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10年格丁根版第2卷第198、381—384和386页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0—1171页已有关于工艺学的摘录。——363。
- 219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冯·波珀的《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9页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3和1164页有关于水磨的摘录。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了有关情况。——363。
- 22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8—314页,第33卷第219—221、315—317、357—358页,第35卷第62—66页。——363。
- 221 由于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见注7)的影响,棉花供应不足而需求量大增。——368。
- 222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冯·波珀的《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413—414页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5页。——368。
- 223 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也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同上,第2卷第83页)。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即市民社会之外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372。
- 224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另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V笔记本第171页(《马克思恩

- 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35页)。——372、375、441。
- 225 关于印度公社的情况，马克思依据的不只是这里提到的著作，还有托·斯·拉弗尔斯的著作《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的材料。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同上，第49卷第432—433页）中都引用过拉弗尔斯的《爪哇史》。——373。
- 226 拉普拉塔各国指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376。
- 227 据罗马历史传说，公元前494年罗马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大冲突，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为了劝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对贵族压迫的平民，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四肢反抗胃的寓言，使平民同意和解。他把当时的社会比做有生命的机体，把平民比做这个机体的手，把贵族比做供养这个机体的胃。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376。
- 228 技艺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 of Arts and Trades)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促进技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酬劳那些“为解决穷人就业、扩大商业贸易以及对国家财富增长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人”。1853年，该协会为了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称该协会为“技艺和骗术协会”（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379、391、407、791。
- 229 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40年柏林第2版第247页第187节注（《黑格尔全集》第8卷）。——379。
- 230 见威·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380。
- 231 《关于幸福的对话》的作者不是《日记和通信集》（1844年伦敦版第1—4卷）的作者——外交官詹·哈·马姆兹伯里伯爵，而是他的父亲詹·哈里斯。马克思这里引证的话见哈里斯《三篇论文》1772年伦敦修订第3版第292页。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V笔记本第16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2页）。——

381。

- 232 阿基洛库斯“每个人都从事自己的工作,所有的人都会感到满意”这句话转引自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反对数学家》第11卷第44页。——381。
- 233 “同时做许多事,什么也做不成”这句话出自荷马《麦尔吉泰斯》,马克思引自伪柏拉图对话篇《阿基比阿德第二》,见编者威·汉密尔顿在《斯图亚特全集》第8卷第311页加的注。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V笔记本第1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0页)。——381。
- 234 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是指公元前5世纪末期,古雅典三十寡头恐怖制度被推翻,重新建立了奴隶民主制。这是雅典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时期。——382。
- 235 这句话引自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11,370 b—c。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也引用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0页)。——382。
- 236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1页)。——382。
- 237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描述的理想奴隶制共和国。在这种国家里,自由市民分为三个等级,奴隶不包括在三个等级之内,各等级之间实行严格分工。少数哲学家执行管理职能,军人打仗和保卫市民的生命财产,农民、手工业者为人民生产并提供生活资料。——383。
- 238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加工棉、毛、麻、丝的工业经济学。附英国各工厂使用的各种机器的描述》(两卷集)1836年巴黎版第1卷第31页。——385。
- 239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37页。——387。
- 240 《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164—165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387。

- 241 指 19 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其代表是德国动物学家卡·福格特、荷兰生理学家雅·摩莱肖特和德国医生路·毕希纳。他们力图对人民大众进行无神论和自然科学的教育,但没有阐发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阐发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于他们与达尔文主义有紧密关系,他们企图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第二部分,在批判毕希纳等人的狭隘庸俗的思维方式的时,详细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388。
- 242 热力机(kalorische Maschine)是根据一般气体体积热胀冷缩的原理而制造的机器,与蒸汽机相比,它笨重而且功率低。热力机是 19 世纪 30 年代由约·埃里克森发明的,但到 19 世纪末就已经失去了任何实用价值。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IX 笔记本第 1176 页。——388、484。
- 243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 年伦敦版第 2 部第 154—156 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IX 笔记本第 1184 页。——389。
- 244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 年伦敦版第 2 部第 222—250 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IX 笔记本第 1206—1211 页。——389。
- 245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冯·波珀《从科学复兴至 18 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 年格丁根版第 1 卷第 271 页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IX 笔记本第 1172 页。——389。
- 246 珍妮机是詹·哈格里沃斯于 1764—1767 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389、466。
- 247 “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见《旧约全书·申命记》第 25 章第 4 节。——390。
- 24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冯·波珀《从科学复兴至 18 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 年格丁根版第 1 卷第 105 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IX 笔记本第 1167 页。——390。
- 249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冯·波珀《从科学复兴至 18 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

- 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2—13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1页。——390。
- 250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52—253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7页。——390。
- 251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3、227、228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07页。——390。
- 252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安·尤尔《技术词典或工业手册》1843年布拉格版第1卷第423—430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3页。——390。
- 253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冯·波珀《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8—140和147—149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5—1166页。——392。
- 254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冯·波珀《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73—17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6—1167页。——392。
- 255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2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4、1207页。——393。
- 25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198和200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3页。——394。
- 257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1862年9月19日《旗帜报》(伦敦)第11889号第5版第6栏《国际博览会》的材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46—747页上已有这些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648—699页)。——394、399。

- 25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155—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4页。——398。
- 259 沙·傅立叶把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本质特征称做“枢纽”，即一切围绕着转的支点(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2卷，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第304页)。——399。
- 260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38—239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5和1209页。——400。
- 261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25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页。——401。
- 262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22—24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11页。——401。
- 263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23、227、228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07页。——401。
- 264 让·巴·萨伊在与亚·斯密关于价值和财富的观点的论战中，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见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1卷第4章。——404。
- 265 恩格斯在德文第三版中此处增补的脚注中指出：“一·马力’等于一分钟33 000英尺磅的力，即等于一分钟使33 000磅上升一英尺，或一分钟使一磅上升33 000英尺的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46页)在采用米制的国家中，一马力相当于一秒钟使75千克上升一米的力。——404。
- 266 约·贝恩斯的计算，见他的《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技术学校学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次演讲》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第48页。另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

- 第 1232 页。——404。
- 267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 年伦敦版第 2 部第 228—231 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IX 笔记本第 1207 页。——405。
- 268 勒·笛卡儿关于动物是单纯的机器的观点,见他的著作《论人类》1664 年莱顿版。——405。
- 269 卡·冯·哈勒关于动物是人的助手的观点,见他的《国家学的复兴》1816 年温特图尔版第 1 卷第 332 页和第 378 页脚注 8。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IX 笔记本第 1163 页。——405。
- 270 弗·培根关于生产形态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的观点,见他的《新工具论》1793 年柏林版《序言》第 13 页、《箴言 81》第 102 页。——405。
- 271 关于机器印花代替手工印花的情况,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其他劳动部门》一节。——407。
- 272 关于伊·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见马克思 1861 年 11 月 1 日前后写的《英国的危机》一文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V 笔记本第 208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2 卷第 391 页)。——407。
- 273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孟买商会 1859—1860 年年度报告》中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V 笔记本第 209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2 卷第 391 页)。——407。
- 274 约·福·沃森的报告(载于 1861 年 4 月 19 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 408 页)中提到的这些材料,见马克思 1859—1863 年在伦敦写的第 VII 笔记本第 207 页。那里将 1861 年误写为 1860 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V 笔记本第 209 页上也有这些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2 卷第 391 页)。——407。
- 275 在矿井禁止使用妇女和儿童(10 岁以下的)是 1842 年矿业法的规定。见本卷第 522 页。——409。
- 276 戈弗雷强心剂是一种用鸦片制剂制成的有害于健康的镇静药。恩格斯在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结果》一节中描述了戈弗雷对工人健康和生命的危害。——411。
- 277 “希律王式的掠夺”是马克思用来比喻资本主义生产中对童工进行摧残身体的残酷剥削的用语。希律王对儿童的屠杀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章第16—18节。——420。
- 278 纳·威·西尼耳运算时没有用预付资本总量10万镑，而是用每个工人所占的份额100镑（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4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XI笔记本中概要摘录西尼耳著作时改为10万镑。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35页和第32卷第379页。——423。
- 279 见《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2页。马克思在1857年4月写的《英国工厂制度》中使用了这一统计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117—118页）。——434。
- 280 马克思在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35。
- 281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的结尾曾引用了安·尤尔《工厂哲学，或加工棉、毛、麻、丝的工业经济学》（两卷集）1836年巴黎版第1卷中的几段文字。——439。
- 282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加工棉、毛、麻、丝的工业经济学》（两卷集）1836年巴黎版第1卷第32—33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9页摘录了这段话。——440。
- 283 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5页开头。——442。
- 284 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5页。——442,444。

- 285 分权制是沙·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国家权力分成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学说。这三种权力互相独立地发挥作用，互相保持平衡和监督。这一学说的目的是限制在法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专制制度的权力。——443。
- 286 “温和的监狱”(les bagnes mitigés)是沙·傅立叶对工厂的称呼，见他的《虚假的、分散的、可恶的、欺骗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的、真实的产量增加三倍的行业》1835年巴黎版第59页。——446。
- 287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塞·朗切洛蒂的书指《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引自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第1卷第125—129页。约·冯·波珀在《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490页也谈到德国人改进织带机的情况。——447。
- 28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冯·波珀《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69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2页。——448。
- 289 鲁德运动是英国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这一运动以传说中的工人领袖耐·鲁德的名字命名，据说他是第一个捣毁机器的人。这一运动大约在1760年在设菲尔德和诺丁汉兴起，在1811—1817年的危机期间扩展到整个英国。——448。
- 290 英国政府自1812年亨·阿·西德茅斯任内务大臣、卡斯尔雷子爵任外交大臣以来，残酷地镇压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同时还发动了反对法国的战争，即所谓的反雅各宾战争(见注349)。——448。
- 291 1834年济贫法即《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和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于1834年8月14日生效，在此之前实施的是1601年生效的、以后没有作过重大修改的济贫法。1832年，英国议会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当时的济贫法及其实施情况并准备一项新的济贫法。该委员会把当时对贫民的救济说成是英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成立习艺所(见注164)是实施济贫法的重要手段；设立一个中央行政机关。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

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451、724。

- 292 这里的材料引自恩格斯 1867 年 1 月 29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454。
- 293 下面这些表格中的材料引自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 年伦敦版第 124—125 页。——455。
- 294 彼·加斯克尔《手工业工人和机器》1836 年伦敦版第 23、34—35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2 卷第 389 页。——456。
- 295 马克思标明的出处是彼·加斯克尔的著作第 1 版,但他引用的却是 1836 年在伦敦以《手工业工人和机器》为标题出版的第 2 版。——456。
- 296 詹·内史密斯的证词,见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 年伦敦版第 129—130 页。——457。
- 297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 年伦敦版第 2 部第 232 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IX 笔记本第 1208 页。——457。
- 298 昔尼克主义又译犬儒主义,原本为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安提西尼创立的哲学学派。昔尼克学派崇尚自然,却把自然和社会绝对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它蔑视财富,崇尚俭朴,反映了城邦贫民和被剥夺了部分权利的自由民对大奴隶主骄奢淫逸生活的消极反抗。
- 后来在西方,人们通常在转义上使用昔尼克主义,泛指:蔑视道德;凌辱人的尊严;不知羞耻;冷酷无情;无所顾忌;对眼前事物冷嘲热讽,等等。——457。
- 299 “好话能遮丑”(Nominibus mollire licet mala)引自奥维狄乌斯《爱经》第 2 卷第 657 行。——461。
- 300 在英国,从 1801 年起,包括财产统计在内的人口调查每十年进行一次。——465。
- 301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载于 1863 年 4 月 28 日《泰晤士报》第 24544 号第 8 版第 5 栏《棉荒》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XX 笔记本第 1270 页。——466。

- 302 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XXXIV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煤气装置、煤气用器具，——机器制造88人；煤气工程师83人，煤气装置5469人；煤气表、蒸馏器、气量计，——制造工人314人；煤气管，——制造工人565人；煤气厂服务部门8672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15191人。——468。
- 303 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XXXVII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铁路经理处247人；制造铁路客车钢板和缓冲器的工人99人；铁路客车、车厢制造工人774人；铁道公司职员、门房和服务员26846人；铁路承包商549人；火车司机、司炉10414人；铁路工人27773人；铁道灯制造工人5人；官员、办事员和火车站站长14539人；铁路警察1444人；铁路信号灯制造工人8人；车轮制造工人54人；其他有关人员47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82779人。——468。
- 304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页上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上摘引来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7页。——468。
- 305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中没有这个数据。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摘引来的。那里讲到18岁以上的男子有177596人。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7页。——468。
- 306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39页，LIII、LV和LXV页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469。
- 307 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和其中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学说》1821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212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36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61页）。——470。
- 308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6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24页。——471。

- 309 这里的数据分别引自《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31页和《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22、1218页。——473。
- 310 下面这些材料引自议会文件《粮食、谷物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2月18日的质询》。——475。
- 311 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但在1824年当年,因食品价格上涨引起各地纷纷罢工,资本家要求重新禁止结社,1825年,威·哈斯基森提议成立委员会调查工人结社情况,最后,由于工人的斗争,关于禁止结社的法案未获通过。1825年7月6日通过了结社法(或称工人联合法),其中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根据1825年的结社法,只有那些旨在规定工资和劳动时间而成立的工人社团才免于受到惩罚,当局仍然极力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478、799。
- 312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4544号第8版第5栏《棉荒》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0—1272页。——478。
- 313 指英国和法国在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国向英国出口时髦服饰和丝绸品、首饰、刺绣品和工艺品等货物时,大部分可以免税。为此,法国取消了禁止进口英国商品的规定,代之以征收商品价格的30%的最高税额,同时法国将英国煤的进口税减低到每100公斤15生丁。
- 关于贸易协定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1860年1月28日写的《法英之间的新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478。
- 314 指英国肆无忌惮地侵占亚洲市场的情况。在东印度公司(见注98)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3年)以后,英国私商加紧侵占中国市场。他们在英国政府竭力支持下,向中国大量私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后来英国

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

在印度,英国主要通过大量输入廉价棉布扩大市场。印度手工织布者因他们的手织棉布无法同英国生产的机织棉布竞争,而大批失业以致饿死。——482。

- 315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392、394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7—1179页。——485。
- 316 马克思这里指的情况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XXXIX页第296、299号。——494。
- 317 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2月11日刊印)第9页。——500。
- 318 罗·欧文在他的著作如《在罗·欧文先生与约·鲁伯克牧师讨论前在曼彻斯特做的六篇演讲》(1839年曼彻斯特版第72页及以下几页)和《新道德世界书》(第3册1842年伦敦版第46页及以下几页)中提出过如下的类似观点:未来的教育对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这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也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510。
- 319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1节《资产者和无产者》。——514、828。
- 320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见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514。
- 321 “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Ne sutor ultra crepidam!)这句话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在一个鞋匠批评他的画时所作的回答,这个鞋匠对绘画一窍不通,只能看出所画的鞋的某些毛病。见老普林尼《博物志》第35卷第10章第36行。——516。
- 322 罗·欧文关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的观点,见他的《在曼彻斯特的六篇演讲》1839年曼彻斯特版第56—58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5—6页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9—110页)已摘录了有关的段落。——529。

- 323 指莱·德·拉韦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5年爱丁堡—伦敦版。——530。
- 324 指詹·安德森的如下著作：《谷物法性质探讨。论苏格兰新谷物法案》1777年爱丁堡版；《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1775—1796年爱丁堡版第1—3卷；《迄今阻碍欧洲农业进步的原因的研究》1779年爱丁堡版；《漫谈农学、博物学、技艺和各类文献》1799—1802年伦敦版第1—6卷。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56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23、124、261—262页）。——532。
- 325 关于托·罗·马尔萨斯剽窃他人人口论的情况，见他的《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496、49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23—126、131—132页）。——532。
- 326 爱·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24页）。——532。
- 327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52—453、483、485页和第XI笔记本第495—496、5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6—31、95—98、100—102、122—126、270—272页）。——532。
- 328 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99—80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103—106页）。——532。
- 329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00—318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376页和第IX笔记本第377—4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35—168、219—345页）。——534。
- 330 在准备《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时，马克思在1877年3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但是，看来这并不妨碍在答复杜林时引用

- 《资本论》的下述两段话。我引用的是法文版,因为这里不像在德文原本中那样一笔带过。……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而本能地、时而有意识地始终主张生产劳动的特征是生产剩余价值。’(第219页)‘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是有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出钱买却可以拿去卖的财富’(《资本论》德文第2版第554页),以及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出来(同上,第141—145页)。’(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德文版《资本论》引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85—194,611页)——534。
- 331 “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是套用了18世纪末德国诗人弗·莱·施托尔贝格《致自然》一诗中的诗句。——538。
- 332 见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73页。另参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4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57页)。——540。
- 333 恩格斯在1873年12月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对接下来的内容作了如下评价:“关于法译本,过几天再详谈。到现在为止,我发现你加过工的确实比德文的好,但这里问题不在法文和德文上。就文体来说,关于穆勒的评语写得最好。”(这里的“德文”版本是指《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二版)1875年2月11日,马克思在给彼·拉·拉甫罗夫寄去《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前六册时,就明确提醒后者注意关于驳斥穆勒的补充。——540。
- 33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09—211页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I笔记本第1374页。——541。
- 335 马克思在1878年11月28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建议把这一段改正如下:“接下去又有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一种历史形式的。他说:‘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地方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穆勒先生欣然相信,即使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经济制度下,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

要。”——542。

- 336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20页和第XII笔记本第636—63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7页和第34卷第418—425页)。——549。
- 337 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第三册第1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7—111页);第2章《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同上,第212—284页)。——549。
- 338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8—5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29—150页)。——554。
- 339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9页。——558。
- 340 亚·斯密关于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权的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59页及以下几页。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1笔记本第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04页)和第VI笔记本第247页及以下几页(同上,第33卷第50页及以下几页)。——559。
- 341 关于社会契约的观点最先由古希腊伊壁鸠鲁提出,后来逐渐形成一种认为国家与法都源于人们订立的契约的政治学说。它以天赋人权为基础,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君权神授的教条,指出封建君主损害了人民达成的契约,人民有权进行革命,推翻政府,以恢复天赋人权。这一学说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性。17—18世纪,这一观点和学说曾由欧洲自然法学派广泛传播。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托·霍布斯、皮·伽桑狄、巴·斯宾诺莎、约·洛克、许·格劳秀斯、让·雅·卢梭、亚·尼·拉季舍夫、托·杰弗逊、托·潘恩。——563。
- 342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2节《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564。
- 343 “必要价格”引自弗·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XXXVI页);“自然价格”引自亚·斯密《国

- 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约·拉·麦克库洛赫编)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107页。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45页)。
——565。
- 34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6页。——566。
- 345 这是罗马法中的契约关系的四种公式。原文是:Do ut facias, facio ut facias, facio ut des, do ut des。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七章末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620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25—1336页中也引用了这些公式。——568。
- 346 马克思曾计划将其经济学著作写成六册,见他于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415页)。计划的第三册是《雇佣劳动》,其中也将论述工资的各种特殊形式。虽然《资本论》包含关于工资及其基本形式的论述,但应该包括工资各种特殊形式的《雇佣劳动》这一册马克思没有写。——571。
- 347 马克思大概打算在计划中的第三册《雇佣劳动》中来详细地叙述竞争对劳动力这一商品出售价格形成的影响。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19页和第XX笔记本第1257页。——578。
- 348 《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一书的作者是理·康替龙。该书的英文版由理·康替龙的一个亲属菲·康替龙修订过。——586。
- 349 反雅各宾战争是1792—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为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而进行的长达23年的战争,也称二十三年战争。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反法同盟的联军,公开参战。战争期间,为对付劳动群众,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镇压了多起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586、641、724、813。
- 350 在1861—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见注7)时期,北部各州的海军对南部

各州实行封锁,美国的棉花供应中断,从而引起了棉花危机,因此,欧洲很大一部分棉纺织工业陷于瘫痪,工人的状况严重恶化。——609。

- 351 德意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 191)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613。
- 352 西斯蒙第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变成螺旋形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19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119 页。——617。
- 353 关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代最终产生了整个犹太民族的情况,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 章。——617。
- 354 这里是指蒲鲁东及其见解。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 2 版中,马克思在该处以脚注的形式明确地批判了蒲鲁东(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678 页脚注(24))。——622。
- 355 马克思在 1859—1863 年于伦敦所作的第 VII 笔记本第 181 页上,摘录的可能是《内克著作集》1786 年洛桑版。这里提到的 1789 年版没有找到。并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第 IX 笔记本第 420 页及以下几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3 卷第 369 页及以下几页)。——624。
- 356 指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1843 年伦敦版。——626。
- 357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1885 年汉堡版第 341—489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5 卷第 389—539 页)。——627。

- 358 弗·魁奈在他的著作《经济表》1758年凡尔赛版中第一次试图用图表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利用了欧·德尔1846年在巴黎出版的主要的经济学家文集《重农学派》第2卷中魁奈的著作。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22页及以下几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74—383页),以及1863年7月6日和1877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经济表作了论述。——627。
- 359 “人的同情感”引自席勒的叙事诗《人质》。——629。
- 360 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2场《城门之前》中的诗句。——630。
- 361 让·巴·萨伊“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这句话引自让·吉·科兰《政治经济学》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41页。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I笔记本第1384页。——632。
- 362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土耳其除外)从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断断续续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同盟国的君主和代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统称为维也纳条约。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奥地利获得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了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了挪威;俄国获得了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名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了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和锡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1792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1815年9月关于成立神圣同盟的决议是对维也纳决议的补充。——632。
- 363 七月革命即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发展,限制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

- 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633。
- 364 指 1831 年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和英国农业工人的多次起义。——633。
- 365 规定就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是巴·斯宾诺莎的一个命题,他在 1674 年 6 月 2 日给某人的信中用这一命题来表示“限定就是否定”(见斯宾诺莎《通信集》第 50 封信)。马克思此处是按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来援引的。见《哲学全书纲要》第 1 部《逻辑学》1840 年柏林版第 180 页(《黑格尔全集》第 6 卷);《逻辑学》第 1 部《客观逻辑》第 1 编《存在论》1833 年柏林版第 117 页(《黑格尔全集》第 3 卷);《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 1833 年柏林版第 294 页(《黑格尔全集》第 13 卷)。——634。
- 366 这段引文引自阿·波特尔《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 年纽约版。从导言中可以看出,该书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 1833 年在英国出版的乔·斯科罗普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前十章的翻版,波特尔作了一些修改。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2 卷第 315 页。——634。
- 367 1862 年 9 月 22 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林肯发表《解放黑奴宣言》,宣布叛乱州的奴隶获得自由。该宣言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1865 年 1 月 31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在合众国境内及其管辖范围内禁止奴隶制或强迫劳役。1865 年 12 月 6 日,佐治亚州批准该修正案,至此该修正案得到四分之三联邦州的认可。1865 年 12 月 18 日,该修正案正式生效,奴隶制在美国被废除。——635。
- 368 由于经济危机,比利时沙勒罗瓦地区的工厂主在 1867 年初把冶金工人以及附属矿井的矿工的工资降低了 10%。工资降低的那一天,面包和面粉的价格再次提高。该地区冶金业的工人从 1867 年 2 月 1—3 日进行罢工并要求恢复他们原有的工资。2 月 2—8 日,许多矿工加入了罢工,他们要求降低面粉价格。罢工者在 2 月 2 日占领了马谢讷的碾磨厂。市长下令向罢工者开枪,许多人受伤,其中三名工人受了致命伤。——638。
- 369 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导言部分。——645。
- 370 “没有一天不动笔”(nulla dies sine linea),这句话据说是古希腊著名画家

- 阿佩莱斯所说的,他照例每天不拘多少总要画一点。——649。
- 371 特有财产(Peculium)是古罗马法中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例如,拥有特有财产的奴隶可以同第三者交易,但只能在赢利总额不足以完全赎身的限度内进行。特别有利的交易和其他能大大增加特有财产的办法,通常都由家长一手包办。——652、659。
- 372 “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句话,见西·尼·昂·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236页。——657。
- 373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28节。——658。
- 374 大概指托·查默斯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尤其是第11章第344和346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4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62页)。
- “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劳动”,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0章第1节。——659。
- 375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C节《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中的最后几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4页及以下几页)。——661。
- 376 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结尾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63页及以下几页)。——681。
- 377 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684。
- 378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160页。——690。
- 379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9、40

页。——695。

- 380 自由贸易理论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的一部分,尤其为18—19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扬。最著名的代表是亚·斯密和大·李嘉图。这种学说从理论上论证了对自由贸易的要求,它认为不应用任何限制的办法,如关税、禁止进出口来阻碍自由贸易。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见注179),就消除了自由贸易的一个重大障碍。马克思把自由贸易代表的许诺与宗教上的千年王国(见注178)的许诺相比。——696。
- 381 户籍总署署长是对主管英国户籍总署的官吏的称呼。该署的职权是主管英国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的整个系统,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700、715、728。
- 382 关于这段引文曾经发生过一场论战。恩格斯的第四版序言和马克思1872年写的《答布伦坦诺的文章》、《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就表明了这一点。后两篇文章是马克思对布伦坦诺刊登于《协和。工人问题杂志》的两篇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和《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的回答;恩格斯的文章《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以及马克思1872年5月23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都有关于这一论战的情况。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也引用了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8页。——700。
- 383 尼·布瓦洛-德普雷奥《讽刺诗集》第8首。——701。
- 384 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703。
- 385 关于英格兰的农业劳动者的营养状况,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704。
- 386 波托西矿山是在玻利维亚南部的丰富的银矿地区,于1545年发现,17世纪成为最重要的银矿中心,它提供的银产量约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一半。——707。
- 387 马克思认为詹·埃·索·罗杰斯《从召开牛津议会(1259)到大陆战争爆发(1793)时期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中有很多材料,他在1866年12月17日和1867年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不仅谈到此书,而且说要在《资本论》中给它留出空位。——722。

- 388 指斯温暴动,它是 1830—1833 年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租地农场主使用脱粒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失业现象加剧引起的。举行暴动的雇农反对使用脱粒机,并要求增加工资,他们以假名“斯温上尉”的名义向租地农场主和地主发出恐吓信,烧毁庄稼垛,捣毁脱粒机,想以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按照乔·格雷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暴动遭到了残酷的武力镇压。——725。
- 389 安·舍夫茨别利伯爵(即阿什利勋爵)从 1844 年至 1846 年初在下院多次提出把工作日缩短到 10 小时的法律草案。在此之前,1840 年曾根据阿什利的提案,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以调查仍未实施 1833 年工厂法的工业部门中工人的状况。1842 年,他提出了禁止妇女和 13 岁以下的儿童在矿井中劳动的法案。1845 年,他又提出了在薄印花布厂中限制童工的法案。——726。
- 390 低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19 世纪高教会派(见注 8)产生后,反对过高强调教会的权威地位和恢复天主教旧制的一派称低教会派。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该派主张简化仪式,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和从事一些慈善活动。安·舍夫茨别利伯爵(即阿什利勋爵)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在低教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讽刺地把他称为该教会的“教皇”。——726。
- 391 自由学派是对那些拥护经济自由主义、生产和贸易的无限制自由的经济学家的称呼。他们表达了上升时期的、部分已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期待国家从内部和外部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不受干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口号表达了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的观点。自由学派的见解,即自由贸易理论(见注 380)源于重农学派的著作以及亚·斯密与大·李嘉图的著作。——729。
- 392 “过去时代的赞颂者”,见贺拉斯《诗论》第 173 节。——729。
- 393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1 卷)中也引用了这些材料。——730。
- 394 1783 年俄国吞并克里木,1787 年,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格·

- 亚·波将金为了讨好她，在克里木建造了一片假村庄布景，即所谓的“波将金村”，以显示被征服领土的富庶。——734。
- 39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28—235页。——745。
- 396 沙·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见他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29年巴黎版第399、503页。——747。
- 397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淫乱罪恶之城。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8章第20节。——747。
- 398 在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中有四页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321—328页），这原来是为在1867年11月26日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而准备的，但他没有作这次发言。这一提纲包含了与本节后面几页类似的事实。马克思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上所作报告的提纲（共10页）论述了同样的问题（同上，第341—358页）。——750。
- 399 “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是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的《天上序幕》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763。
- 400 “胃口越吃越大”（l'appétit vient en mangeant），源于弗·拉伯雷的讽刺小说《巨人传》第1卷第5章。——765。
- 401 在《1863—1865年手稿》第三册（见本卷第20页）和恩格斯编的《资本论》第三卷都没有这方面的论述。——766。
- 402 芬尼社社员是爱尔兰民族主义革命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参加者。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掀起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50年代末，詹·斯蒂芬斯领导的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起初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不久也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该组织自称芬尼社。芬尼的古爱尔兰语“Fiann”，是传说中爱尔兰古代英雄芬恩·麦库尔统率的武装民团的名称。芬尼社曾广泛活动于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等地，其宗旨是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并建立爱尔兰共和国，其成员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1865年，芬尼社社员的武装起义未能成功；1867年芬尼社社员密谋发动的武装起义也遭英国政府镇压。——766。

- 403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Acerba fata Romanos agunt scelusque fraternae necis),引自贺拉斯《抒情诗集》第7首。——766。
- 404 亚当偷吃禁果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章。——767。
- 405 参看歌德《警句般的问答式的教义》。——768。
- 406 指15世纪末地理上的大发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由于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海路,发现了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商路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北部的贸易城市热那亚、威尼斯等失去了它们在过境贸易中的统治地位。相反,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由于位于大西洋海岸而受益,开始在世界贸易中起重要作用。——771。
- 407 指西部诺曼人即丹麦人和挪威人对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所采取的掠夺行为。9世纪初,诺曼人开始侵袭英格兰,最初是掠夺,后来,在英格兰东北地区建立了移民区。——773。
- 408 见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52页。——773。
- 409 蔷薇战争亦称玫瑰战争,是1455—1485年在英国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约克家族的族徽上饰有白色蔷薇,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上则饰有红色蔷薇。站在约克家族一方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以及骑士和市民阶层;支持兰开斯特家族的则是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场家族之间自相残杀战争几乎使古老的封建家族消灭殆尽,其后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并实行专制政体。——774。
- 410 “穷人到处受苦难”(Pauper ubique jacet)引自奥维狄乌斯《节令记》第1卷第218行。——777。
- 411 显然是指1579年费·伊万诺维奇统治下(当时俄国的实际统治者是波·戈东诺夫)所颁布的关于侦缉逃亡农民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凡经受不住地主的残酷奴役和欺压而逃跑的农民,要被通缉五年并强制遣送给原来的主人。该命令的目的在于继续扩大农奴制度,限制农民的相对自由。——780。

- 412 “光荣革命”指英国 1688 年的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 1689 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为“光荣革命”。——780。
- 413 共和革命指 1642—1646 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结果是英国在 1649 年建立了共和国。——780。
- 414 指埃·伯克 1796 年在伦敦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尊敬的埃德蒙·伯克就贝德福德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780。
- 415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 4 版，这里指的是从 1604 年开始，后来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继续进行的事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832 页。——781。
- 416 指马克思 1863 年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所做的八个单独的“补充笔记本”（Beihefte），它们以字母 A、B、C、D、E、F、G、H 标示，正文中下面这些引文引自“补充笔记本 B”。——782。
- 417 李奇尼乌斯法是公元前 367 年在古罗马通过的一项法律，又称李奇尼乌斯土地法。该法对于把公有地转交个人使用的权利作了某种限制，并规定撤销部分债务。该法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扩大贵族的特权，反映平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加强。根据罗马的传统说法，该法是罗马护民官李奇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制定的。——784。
- 418 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 4 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画廊的希腊文是“στοά”）讲学，故称斯多亚派，又译画廊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

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785。

- 419 指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要求拥立所谓的“年轻的王位觊觎者”查·爱·斯图亚特为英国国王而于1745—1746年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同时反映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民群众对他们遭受地主剥削以及驱逐小农的抗议。随着起义被英国正规军镇压,克兰制度在苏格兰高地开始迅速瓦解,农民被逐出土地的现象更加严重了。——787。
- 420 盖尔人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古代凯尔特人的后裔。——787。
- 421 指马克思于1853年2月9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789。
- 422 由于农业人口的状况不断恶化和受法国革命(1789—1795年)的影响,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农民于1790年8月举行起义。封建主们被驱逐或逃跑。8月中旬,农民成为大的农业地区的主人。由于缺少城市人口的支持和领导,1790年9月初这次起义被武力镇压。——792。
- 423 即决法庭(Petty Sessions)是英国治安法院的期庭,这种法庭按简化的诉讼程序审理小案件。——796。
- 424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237页。——797。
- 425 指英国自由党。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叶在英国形成了两个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自由党由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新辉格党人、自由学派(见注391)和皮尔分子左翼托利党人组成。自由党成立后它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801。

- 426 英国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禁止“秘密活动”法。该法禁止“一切秘密活动，即使其理由是合法的”。在禁止结社法（见注 311）通过以前和废除以后，工人的组织和阶级斗争都根据禁止“秘密活动”法受到镇压。——801。
- 427 指 1793 年 6 月—1794 年 6 月法国雅各宾派专政的政府。它代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它的领导人为马·罗伯斯比尔和安·路·圣茹斯特。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的恐怖。——801。
- 428 拿破仑帝国时期制定的 1810 年刑法典（Code Pénal）在第 414—416 条中规定禁止结社。1864 年 5 月 25 日的一项法律取消了禁止罢工的规定。1884 年 3 月 21 日的一项法律容许成立工会。——801。
- 429 亚·安德森在其著作《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1764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226 页中涉及 15 世纪经济的主要特征时，谈到“神的恩赐”。——806。
- 430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 年都柏林版第 1 卷第 1 册第 16 章。——806。
- 431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364 页）。——810。
- 432 上帝向该隐询问亚伯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 4 章第 9 节。——811。
- 433 指通往印度的航路的发现以及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的发现。——812。
- 434 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的暴动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566—1609 年）的结果。尼德兰的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16 世纪中叶，尼德兰城乡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发展，但受到其宗主国西班牙专制主义及其支柱天主教会的严重阻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1566 年爆发了矛头直指天主教会的圣像破坏运动。1567 年春，运动遭镇压。1572 年，北方各省举行大规模起义，并推举奥伦治的威廉为北方各省执政。南方革命形势也日益高涨，1576 年布鲁塞尔起义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西南几省的贵族慑于革命不断深入，于 1579 年 1 月 6 日结成阿拉斯同盟，与西班牙当局妥协。同年 1 月 23 日，信奉新教的北方七省成立乌得勒支同盟，为建立联省共和国奠定了基础。1581 年由北方

各省组成的三级会议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正式成立资产阶级联省共和国。由于荷兰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最重要,亦称荷兰共和国。

1609年,西班牙被迫与荷兰签订十二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的独立。——813。

- 435 清教徒是基督教新教教徒中的一派,16世纪中叶产生于英国,原为英国国教会(圣公会)内以加尔文教义为旗帜的新宗派,如长老会、公理会等。清教徒要求“清洗”英国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烦琐仪文,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提倡“勤俭清洁”的简朴生活,因而得名。16世纪末,清教徒中开始形成两派,即温和派(长老派)和激进派(独立派)。温和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利益,主张立宪君主政体。激进派代表中层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的利益,主张共和政体。——816。
- 436 指16世纪末17世纪初因在英格兰遭到迫害、镇压而移民北美的英格兰清教徒。从那时起开始了英国向北美洲的大举移民,这些移民为当时新英格兰各州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奠定了基石。——816。
- 437 参看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1卷第371页。——817。
- 438 看来马克思是套用德·狄德罗《拉摩的侄子》的如下一段话:“一位外来的神谦卑地把自己安置在祭坛上,与当地的偶像并列,他的地位逐渐地巩固起来,忽然有一天,他用胳膊肘推了他的同伴一下,于是啪嚓一声,那偶像就倒下来。”——817。
- 439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德·维特的箴言指《论荷兰共和国和弗里斯兰西部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箴言》,该书1662年第一次在莱顿出版。——819。
- 440 显然是指让·巴·柯尔培尔建立的一种为封建君主制度服务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为了使国家和封建统治者获得高收入,柯尔培尔对不受封建剥削的工商业征收高额税,为了扩大这种税收,王室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来促进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从而在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熟过程。——820。
- 441 王座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在此之前,它一直是最高刑事法院和所有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有权重新审理下级司法机构的判决。——822。

- 442 阿西恩托条约是英国和西班牙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01—1714年)中于1713年3月26日签订的。按照这一条约,英国人有权在属于西班牙的美洲省份中从事奴隶贸易。该条约在1713年7月13日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第12款中得到了确认。——822。
- 443 “经受了多少苦难”(Tanta molis erat)引自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33行。——823。
- 444 “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见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第435页。——826。
- 445 据基督教传说,《旧约全书》是摩西和其他先知们写成的。“摩西和先知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主要的东西!这是第一诫!——836。
- 446 草市原文为“Haymarket”,是伦敦西区的繁华街道。——840。
- 447 官房学是16—18世纪德国有关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是当时德国官僚候补人员所必须通过的训练科目。许多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都曾讲授这门课程。——842。
- 44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5页。——843。
- 449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82—850a页,即《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中《(1)罗·托伦斯》、《(2)詹姆斯·穆勒》、《(3)论战著作》、《(4)麦克库洛赫》四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70—204页)。——843。
- 450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2—890页,即《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中《(1)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2)莱文斯顿》、《(3)霍吉斯金》三节以及第XVIII笔记本第1084—108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09—301页;第36卷第195—200页)。——843。
- 451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

- 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1818年亚琛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莱巴赫会议以及1822年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神圣同盟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843。
- 452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见注179）。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844。
- 453 指首相罗·皮尔在1842年和1844年实行的财政改革。他废除或降低了所有的出口税以及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关税。为了补偿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实施了收入税。后来在1853年，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所有关税都取消了。——844。
- 454 关于以约·斯·穆勒为代表的折中主义的产生，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8—331页和第VIII笔记本第332—34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67—217页）。——844。
- 455 指1867—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该杂志在1868年11—12月的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845。
- 456 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

关于季别尔的这本书,马克思 1872 年 12 月 12 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谈到,他很想看到它,1873 年 1 月 18 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到他收到了这本书。——845。

- 457 暗指尤·孚赫发表在《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柏林)1868 年第 5 年卷第 20 卷第 216 页和欧·杜林发表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希尔德堡豪森)1867 年第 3 卷第 3 册第 182 页上的有关《资本论》的短评。——845。
- 458 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845。
- 45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1 卷第 412—414 页。——846。
- 460 马克思在 1868 年 3 月 6 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也说过他的辩证方法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847。
- 461 马克思在 1878 年 11 月 15 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到:“我在法文版第 351 页(注释)上预言要发生的英国危机,终于在近几周内爆发了。我的朋友们——既有理论家也有实业家——曾经要求我删掉这个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注没有充分的根据。他们竟然确信,美国北部和南部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危机可以说会‘抵消’英国的危机。”——848。

人名索引

A

- 阿巴思诺特, 约翰 (Arbuthnot, John 18 世纪)——英国租地农场主, 1773 年在伦敦出版的匿名著作《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的作者。
——321、339、341。
- 阿贝尔, 卡尔 (Abel, Carl)——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每日电讯》驻柏林通讯员; 曾同弗·阿·梅克伦堡一起翻译《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及其人民、宗教、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著述》一书。——122。
- 阿庇安 (Appianos [Appian] 1 世纪末—2 世纪 70 年代)——古罗马历史学家, 曾任执政官; 写有二十四卷本《罗马史》。——784。
- 阿丁顿, 斯蒂芬 (Addington, Stephen 1729—1796)——英国经济学家, 教士; 写有一些教科书。——783。
- 阿基洛库斯 (Archilochos [Archilochus] 公元前 7 世纪)——古希腊抒情诗人。
——381。
- 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公元前 287 前后—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
——317。
- 阿克莱, 理查 (Arkwright, Sir Richard 1732—1792)——英国企业家, 各种纺织机械的设计者和制造者。——384、392、397、443、448、516。
- 阿里瓦本伯爵, 乔万尼 (让) (Arrivabene, Giovanni [Jean], conte 1787—1881)——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翻译家, 1847 年布鲁塞尔经济会议的发起人; 曾把一些经济学著作译成法文。——633、634。
- 阿利奇 (Arledge, J. T.)——英国医生, 1863 年在北斯塔福德郡医院任职。
——251。
- 阿林斯沃思, 乔治 (Allinsworth, George)——英国一轧钢厂的童工。——266。
- 阿那卡西斯 (Anacharsis 约公元前 6 世纪)——古代亚细亚民族的哲学家, 西徐

- 亚人。——95。
- 阿什利——见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 阿什沃思,亨利(Ashworth, Henry 1794—1880)——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理·科布顿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298、423。
- 阿斯普登,乔治(Aspden, George)——英国工人。——253。
- 阿泰纳奥斯(Athenaios [Athenaeus] 约2世纪)——古希腊雄辩家、语法学家和作家,论述文化史题材的对话集《哲人宴》的作者。——95、127。
- 埃弗里特(Everet 18世纪)——英国发明家。——448。
- 埃利斯(Ellis, J.)——英国埃利斯—布朗钢铁公司老板(1865)。——267、268。
- 埃默里,查理·爱德华(Emery, Charles Edward 1838—1898)——美国发明家。——399。
- 埃斯克里格(Eskrigge)——英国纺纱厂主,斯托克波特市治安法官。——299。
- 艾金,约翰(Aikin, John 1747—1822)——英国医生、历史学家和激进派政论家。——630、631、813、822、823。
- 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 1312—1377)——英国国王(1327—1377)。——91、279、797。
- 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1537—1553)——英国国王(1547—1553)。——794、795。
- 阿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649。
- 爱利莎(Elise)——英国伦敦一家宫廷时装店的老板。——261、262。
- 安·斯图亚特(Anna [Ann, Anne] Stuart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162。
- 安德森,亚当(Anderson, Adam 1692前后—1765)——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关于贸易史方面的著作。——806、822。
- 安德森,詹姆斯(Anderson, James 1739—1808)——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了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特征。——532、591—592、659、783、787、806。
- 安蒂帕特洛斯(帖撒罗尼迦城的)(Antipatros of Thessalonike 约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诗人。——426。
- 奥德,威廉·米勒(Ord, William Miller 1834—1902)——英国医生。——736。

- 奥弗斯顿勋爵——见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
- 奥克尼夫人,伊丽莎白·维利尔斯(Orkney, Elizabeth Villiers, Lady 1657—1733)——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奥伦治的)的情妇。——780。
- 奥雷利,约翰·卡斯帕尔·冯(Orelli, Johann Kaspar von 1787—1849)——瑞士古典语文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古典古代著作家著作的出版者。——382。
- 奥姆斯特德,弗雷德里克·罗(Olmsted, Frederick Law 1822—1903)——美国园林设计师,写有关于英国和北美方面的著作,《普特南氏月刊》的撰稿人;1856年曾到欧洲各国考察公园的设计情况。——199。
- 奥普戴克,乔治(Opdyke, George 1805—1880)——美国企业家、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163。
- 奥日埃,马利(Augier, Marie 19世纪中叶)——法国新闻工作者,财政经济学家,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823,824。
- 奥特利,乔治(Ottley, George)——英国伦敦一家壁纸厂的经理。——254。
- 奥特斯,贾马里亚(Ortes, Giannaria 1713—1790)——意大利经济学家,修士;重商主义的反对者。——658,693,694。
- 奥特韦,约翰·哈斯丁(Otway, John Hastings)——爱尔兰法官,贝尔法斯特法庭庭长。——286。

B

- 巴顿,约翰(Barton, John 1789—1852)——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677,723。
- 巴尔本,尼古拉斯(Barbon, Nicholas 约1640—169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货币国定说的先驱。——23—24、27—28,118,123,124,139,140,657。
-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624。
- 巴拉德,爱德华(Ballard, Edward 1820—1897)——英国医生,伦敦卫生视察员。——494。
-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52—53,75,195,426,595,844。
- 巴特勒,赛米尔(Butler, Samuel 1612—1680)——英国讽刺诗人,革命浪漫派的

- 代表;《休迪布腊斯》一诗的作者。——27。
- 拜比吉,查理(Babbage, 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361、364、365、391、407、422。
- 拜特,约翰·格奥尔格(Baier, Johann Georg 1801—1877)——瑞士语文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古典古代著作家著作的出版者。——382。
- 班克斯,乔治(Bankes, George 1788—1856)——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财政部官员。——726。
- 邦伯里,托马斯·查理(Bunbury, Sir Thomas Charles)——英国经济学家,议会议员。——779。
- 贝德福德家族——英国贵族世家。——780。
- 贝恩斯,约翰(Baynes, John)——英国政论家,布莱克本市议会议员;1857年发表了两篇关于棉花贸易的论文。——404、406。
- 贝尔,查理(Bell, Sir Charles 1774—1842)——苏格兰生理学家和外科医生,在布拉德福德贫民习艺所任职。——288、713。
- 贝卡里亚侯爵,切扎雷·博内萨纳(Beccaria, Cesare Bonesana, marchese de 1738—1794)——意大利法学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381。
- 贝克,罗伯特(Baker, Robert)——英国工厂视察员(1878年以前)。——312、416、445、470、763。
- 贝克尔,伊曼努尔(Bekker, Immanuel 1785—1871)——德国语言学家,整理并出版了古典古代著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等)的著作。——150。
- 贝克莱,乔治(Berkeley, George 1685—1753)——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政治经济学上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货币国定说的代表人物。——349、369。
- 贝魁尔,康斯坦丁(Pecqueur, Constantin 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生。——655、826。
- 贝勒斯,约翰(Bellers, John 1654—1725)——英国经济学家,强调劳动对财富形成的意义;曾提出一些空想的社会改革方案。——126、134、141、339、363、447、506、515、516、655。
- 贝利,赛米尔(Bailey, Samuel 1791—187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李

- 嘉图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盾。——38、47、55、77、93、649。
- 贝内特(Bennett)——英国伦敦面包房老板(1862)。——579。
- 贝内特(Bennet, A.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农场主, 仲裁人, 一家贫民习艺所的管理人。——640。
- 本恩(Benn)——815。
- 比彻-斯托, 哈丽雅特·伊丽莎白(Beecher-Stowe, Harriet Elizabeth 1811—1896)——美国女作家, 美国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789。
- 比多(Bidaut, J.N. 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论家, 国家官员; 写有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334。
- 比西·拉布丹伯爵, 罗杰(Bussy-Rabutin, Roger, comte de 1618—1693)——法国作家, 法兰西学院成员。——817。
- 比泽, 弗兰茨(Biese, Franz 1803—1895)——德国教育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 写有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著作。——425。
- 毕舍, 菲力浦·约瑟夫·本杰明(Buchez, 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21年起为圣西门的学生, 七月革命后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 国民议会议长(1848)。——802。
- 边沁, 耶利米(Bentham, Jeremy 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功利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 主张效用原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176、648、649、652。
- 波斯尔思韦特, 玛拉基(Postlethwayt, Malachy 1707—1767)——英国经济学家, 《工商业大辞典》的编者。——282、283。
- 波特尔, 阿朗索(Potter, Alonzo 1800—1865)——美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1815年起为宾夕法尼亚的主教; 曾在一些院校教授神学。——634。
- 波特尔, 埃德蒙(Potter, Edmund)——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60年代初是曼彻斯特商会会长, 议会议员。——306、609—612。
- 伯克, 埃德蒙(Burke, Edmund 1729—1797)——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重农主义者; 初期倾向自由主义, 后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对者; 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209、240、336、780、823、824。
- 伯里克利(Perikles [Pericles] 公元前495前后—429)——雅典国务活动家, 战

- 略家(公元前444—429);主张巩固奴隶主民主制。——381。
- 柏拉图(Platon [Plato] 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381—383。
- 勃艮第公爵和伯爵——见菲力浦第一(罗弗尔的)。
- 博德里亚尔,昂利·约瑟夫·莱昂(Baudrillart, Henri Joseph Léon 1821—1892)——法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杂志》主编。——70。
- 博尔顿,马修(Boulton, Matthew 1728—1809)——英国工程师和工厂主。——393。
- 博克斯霍恩,马尔库斯·聚埃里乌斯(Boxhorn, Marcus Zuerius 1612—1653)——荷兰历史编纂学家和语言学家。——447,448。
- 博林布罗克子爵,亨利·圣约翰(Bolingbroke, Henry Saint-John, Viscount 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819。
- 跛帖木儿——见帖木儿(跛帖木儿)。
-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 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125,136。
- 布代(Boudet 19世纪)——法国医生。——414。
- 布坎南,大卫(Buchanan, David 1779—1848)——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斯密的学生,斯密著作的出版者和注释者。——121,787。
- 布莱基,罗伯特(Blakey, Robert 1795—1878)——英国哲学家。——778。
- 布莱斯,阿道夫·古斯塔夫(Blaise, Adolph-Gustave 1811—1886)——法国经济学家,日·阿·布朗基的著作的编者。——351。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262,292,589,698,729,811,844。
- 布朗,约翰(Brown, John)——英国埃利斯—布朗钢铁公司老板(1865)。——267,268。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

- 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285。
- 布朗基,日罗姆·阿道夫(Blanqui, Jérôme-Adolphe 1798—1854)——法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路·奥·布朗基的哥哥。——285、351。
-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7)——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阐发了“劳动货币”的理论。——61。
- 布林德利,詹姆斯(Brindley, James 1716—1772)——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363。
- 布鲁克纳,约翰(Bruckner, John 1726—1804)——英国教士,写有一些哲学著作。——658。
- 布鲁姆,亨利·彼得,布鲁姆·沃克斯勋爵(Brougham, Henry Peter, Lord Brougham and Vaux 1778—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和著作家,辉格党人,20—30年代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曾任大法官(1830—1834),曾促进1832年选举改革的实施;议会议员。——823。
- 布鲁纳,约翰·康拉德(Brunner, Johann Konrad 1653—1727)——德国医生。——509。
- 布鲁斯(Bruce)——英国矿主,1866年为议会矿山调查委员会委员。——523。
- 布罗德赫斯特,约翰(Broadhurst, John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46。
- 布罗迪,本杰明·柯林斯(Brodie, Sir Benjamin Collins 1783—1862)——英国外科医生和生理学家。——288。
- 布罗顿男爵——见霍布豪斯,约翰·卡姆,布罗顿男爵。
- 布罗顿(Broughton)——英国诺丁汉的治安法官。——249。
- 布洛克,莫里斯(Block, Maurice 1816—190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845。
- 布思罗伊德(Boothroyd)——1860年曾在英国汉利行医。——251。
- 布瓦洛,埃蒂耶纳(Boileau, Etienne 1200—1269)——法国商人,巴黎商会会长,记述巴黎手工业行会的《手工业手册》一书作者。——513。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古拉(Boileau-Despréaux, Nicolas 1636—1711)——法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法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读经台》的作者。——701。

C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查理大帝。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776,777。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 I, 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年起)和皇帝(800年起)。——784。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120。

查理五世(Karl V 1500—1558)——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称查理五世;曾为西班牙国王(1516—1556),称查理一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查理五世的原型。——796。

查理六世(Karl VI 1685—174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11—1740),莱奥波德一世之子。——448。

查默斯,托马斯(Chalmers, Thomas 1780—1847)——苏格兰神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161,658,659。

柴尔德,乔赛亚(Child, Josiah [Josias] 1630—1699)——英国商人,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重商主义者;东印度公司董事长。——823,830。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哲学家。——844。

D

达尔豪西侯爵和伯爵,詹姆斯·安德鲁·布龙·拉姆齐(Dalhousie, James Andrew Broun-Ramsay, Marquess and Earl of 1812—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8—1856),执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791。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356,387。

达菲,查理·加万(Duffy, Charles Gavan 1816—1903)——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青年爱尔兰”领导人和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创建人之一,议

- 会议员；1856年流亡澳大利亚，曾多次任国家公职。——840。
- 达菲，威廉(Duffy, William)——英国工人。——253。
- 达弗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Dufferin, Frederick Temple Hamilton-Temple-Blackwood, Marquess of 1826—190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爱尔兰大地主，曾参加格莱斯顿内阁(1868—1872)，加拿大总督(1872—1878)，驻彼得堡大使(1879—1881)，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81—1882)，印度总督(1884—1888)。——763,764。
-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98,253。
- 道布尔迪，托马斯(Doubleday, Thomas 1790—1870)——英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820。
- 道默，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Daumer, Georg Friedrich 1800—1875)——德国著作家，写有一些宗教史方面的著作。——297。
- 德·昆西，托马斯(De Quincey, Thomas 1785—1859)——英国著作家和经济学家，李嘉图著作的注释者。——411。
-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 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479。
- 德尔，路易·弗朗索瓦·欧仁(Daire, Louis-François-Eugène 1798—1847)——法国著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27,30,85,96,103,104,106,111,114,125,136,140,144,147,156—157,159,160,162,213,326,333。
- 德库，萨洛蒙(De Cous, Salomon 1576—1626)——法国建筑师和工程师。——392。
- 德莱登，约翰(Dryden, John 1631—1700)——英国诗人和剧作家，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247。
- 德穆兰，吕西·西姆普利斯·卡米耶·贝努瓦(Desmoulins, Lucie-Simplice-Camille-Benoist 1760—1794)——法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801。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 安东·路易·克劳德(Destutt de Tracy, Antoine-Louis-Claude, comte de 1754—1836)——法国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哲学上观念学派的创始人; 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74、155、162、338、341、696。

德维利耶(Devilliers 19世纪)——法国医生, 向医学科学院提交了关于儿童死亡问题的论文。——414。

邓宁, 托马斯·约瑟夫(Dunning, Thomas Joseph 1799—1873)——英国工会活动家和政论家。——581、584、585、824。

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Diodorus Siculus 公元前80前后—29)——希腊历史学家, 曾在罗马居住; 《史学丛书》的作者。——241、354、383、537。

狄德罗, 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无神论者, 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 启蒙思想家, 百科全书派领袖; 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129。

笛福, 丹尼尔(Defoe, Daniel 1660前后—1731)——英国作家和政论家, 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136、657。

笛卡儿, 勒奈(Descartes, René 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405、406。

蒂利·亨德森(Tillie & Henderson)——爱尔兰的伦敦德里的一家衬衫厂。——486、499。

都铎王朝——英国王朝(1485—1603)。——810。

杜邦, 皮埃尔(Dupont, Pierre 1821—1870)——法国作曲家, 他的《工人之歌》在工人中广为流传。——745。

杜尔哥, 安娜·罗伯尔·雅克, 洛恩男爵(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baron de l'Aulne 1727—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魁奈的学生; 财政总监(1774—1776)。——182、326、559。

杜克佩西奥, 爱德华(Ducpétiaux, Édouard 1804—1868)——比利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 资产阶级慈善家, 监狱和慈善设施视察员。——720。

杜鲁门(Truman)——英国诺丁汉贫民诊所的医生。——491。

杜蒙, 皮埃尔·埃蒂耶纳·路易(Dumont, Pierre-Etienne-Louis 1759—1829)——瑞士传教士和政论家, 米拉波和边沁的秘书, 边沁著作的出版者。——649。

杜能, 约翰·亨利希·冯(Thünen, Johann Heinrich von 1783—1850)——德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过农业经济问题,他在《孤立国家》中提出了按最大利润原则来配置农业的理论和环状生产分布的构想。——663。

E

厄什韦葛,威廉·路德维希·冯(Eschwege, Wilhelm Ludwig von 1777—1855)——德国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矿工;写有关于采矿工程的著作。——31。

恩布尔顿(Embleton)——英国纽卡斯尔热病医院的医生。——711。

恩索尔,乔治(Ensor, George 1769—1843)——英国政论家,马尔萨斯主义的批评者。——788。

F

法尔,约翰·理查(Farre, John Richard 1774—1862)——英国医生。——288。

范德林特,杰科布(Vanderlint, Jacob 死于1740年)——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118, 125, 140, 282, 284, 326, 344, 363, 657。

菲尔登,约翰(Fielden, John 1784—1849)——英国厂主,慈善家;议会议员,工厂立法的拥护者。——420, 430, 821, 822。

菲利浦第一(罗弗尔的)(Philippe I de Rouvres 1346—1361)——勃艮第公爵(1349—1361)。——805。

菲利浦六世(瓦卢瓦的)(Philippe VI de Valois 1293—1350)——法国国王(1328—1350)。——85。

菲瑟灵,西蒙(Vissering, Simon 1818—1888)——荷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529。

费尔贝恩,威廉(Fairbairn, William 1789—1874)——英国厂主,工程师和发明家。——457。

费里埃,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r, François-Louis-Auguste 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国家官员。——52。

费伦德,威廉·布什菲尔德(Ferrand, William Bushfield 1809—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贵族慈善运动的主要代表。——274, 435, 609。

-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44。
- 丰特雷,安东·路易(Fonteret, Antoine-Louis)——法国医生,19世纪下半叶写有一些公共卫生方面的著作。——379。
- 弗格森,亚当(Ferguson, Adam 1723—1816)——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大·休谟的追随者。——117,369,377—379。
- 弗莱彻,安德鲁(Fletcher, Andrew 1655—1716)——苏格兰政治活动家,地主,维护苏格兰的独立。——778。
- 弗赖塔格,古斯塔夫(Freytag, Gustav 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著作家和新闻工作者。——799。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792,807。
- 弗利特伍德,威廉(Fleetwood, William 1656—1723)——英国主教,写有英国价格史方面的著作。——280。
- 弗尼霍夫,约翰(Fernyhough, John)——英国斯塔福德郡陶器厂的一名10岁的童工(1863)。——251。
- 孚耳阿伯,约翰(Faulhaber, Johann 1580—1635)——德国数学家和工程师。——392。
- 福布斯(Forbes 19世纪)——英国发明家。——407。
- 福蒂斯丘,约翰(Fortescue, John 约1394—1476)——英国法学家,财政大臣,写有一些关于英国国家制度的著作。——773,774。
- 福尔邦奈,弗朗索瓦·韦龙·杜韦尔热·德(Forbonnais, François Véron-Duverger de 1722—180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重农主义的反对者。——85。
- 福塞特,亨利(Fawcett, Henry 1833—188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约·斯·穆勒的信徒,1865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人。——589,651,702,811。
- 福斯特,纳撒尼尔(Forster, Nathaniel 1726前后—1790)——英国教士,写有一些经济学著作,维护工人的利益。——282,447,782,783。
-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1年起),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奉行残酷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712,713。

-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01, 399, 446, 470, 633, 747。
- 富尔顿,罗伯特(Fulton, Robert 1765—1815)——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1803年建造了第一艘轮船。——516。
- 富拉顿,约翰(Fullarton, John 1780—1849)——英国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123, 137, 140。
-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美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美国独立宣言(1776)的起草人之一;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73, 74, 163, 182, 340, 657。

G

- 戈登,约翰(Gordon, Sir John 1798—1862)——爱尔兰医生,科克市市长。——175。
- 戈东诺夫,波里斯·费多罗维奇(Годунов, Борис Федорович 1551前后—1605)——俄国沙皇(1598—1605)。——780。
- 戈弗雷(Godfrey)——戈弗雷强心剂(一种鸦片制剂)的发明者。——411。
-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Colombo [Columbus], Cristoforo 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在四次航海(1492—1504)过程中,发现并考察了加勒比群岛以及中美洲沿海地区和南美洲的东北地区。——126。
-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277, 630, 768。
- 格迪斯(Geddes, J.)——英国一家玻璃制品厂厂主。——419。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 1880—1885, 1886和1892—1894)。——308, 475, 700, 701, 800。
- 格雷,乔治(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 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298, 714。
- 格雷,约翰(Gray, John 18世纪末)——英国著作家,写有一些关于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著作。——159。

- 格雷,约翰(Gray, John 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阐发了“劳动货币”的理论。——61。
- 格雷格,罗伯特·海德(Greg, Robert Hyde 1795—1875)——英国大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302。
- 格雷古瓦,昂利·利特雷格(Gregoir, Henri Litreg 19世纪下半叶)——比利时工人,布鲁塞尔印刷工人协会书记,《布鲁塞尔轻罪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一书的作者。——586。
- 格林豪,爱德华·黑德勒姆(Greenhow, Edward Headlam 1814—1888)——英国医生和公共卫生学家。——250,251,304,435。
- 格罗夫,威廉·罗伯特(Grove, William Robert 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552。
- 格思里,詹姆斯(Guthrie, James 1785—1856)——英国医生。——288。

II

-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冯(Haller, Carl Ludwig von 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冯·哈勒的儿子。——405。
- 哈里斯(Harris)——英国博尔顿市警察局长。——482。
- 哈里斯——见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
- 哈里斯,詹姆斯(Harris, James 1709—1780)——英国语文学家 and 哲学家,国务活动家,议会议员,财政部部务委员(1763—1765)。——381。
- 哈里逊,威廉(Harrison, William 1534—1593)——英国教士,他的一些著作是研究英国16世纪历史的宝贵资料。——774,804。
- 哈鲁普(Harrupp)——英国韦斯特伯里利的利奥韦呢绒厂厂主。——444,445。
- 哈姆,威廉(Hamm, Wilhelm 1820—1880)——德国农学家,写有一些农业问题的著作。——530。
- 哈斯丁,沃伦(Hastings, Warren 1732—1818)——英国政治活动家,英国第一任印度总督(1774—1785),同时任职于东印度公司,实行残酷的殖民政策,因滥用职权于1788年被提交法庭,但被宣告无罪并由公司赔偿损失。——815。
- 哈索尔,阿瑟·希尔(Hassall, Arthur Hill 1817—1894)——英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公共卫生问题的著作。——175,255。
- 哈维(Harvey)——英国医生。——90,737。

- 哈维,威廉(Harvey, William 1578—1657)——英国医生、生理学家和胚胎学家,科学生理学的创始人和胚胎学研究的倡导者;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系统。——90。
- 哈西,维维安(Hussey, Vivian 19世纪)——英国矿主,1866年为议会矿山调查委员会委员。——523。
- 海恩斯,耶利米(Haynes, Jeremiah)——英国一家轧钢厂的一名12岁的童工(1865)。——266。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314。
- 汉密尔顿,威廉(Hamilton, William 1788—1856)——苏格兰哲学家,不可知论者;杜·斯图亚特著作的编者。——334。
- 汉特,亨利·朱利安(Hunter, Henry Julian 19世纪)——英国医生,写有许多关于工人困苦生活条件方面的报告。——415、707—708、710—712、716、717、729、733—738、743、744、776、777。
- 豪威耳,托马斯·琼斯(Howell, Thomas Jones 死于1858年)——英国工厂视察员。——232、247、299、301。
- 豪伊特,威廉(Howitt, William 1792—1879)——英国著作家,写有基督教的历史和许多其他问题的著作。——814。
- 赫顿,查理(Hutton, Charles 1737—1823)——英国数学家。——387。
- 赫弗,斐迪南(Hoefer, Ferdinand 1819—1882)——法国出版商,原系德国人。——538。
-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100。
- 赫伦施万德,让(Herrenschwand, Jean 1728—1812)——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16。
-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及其学说的普及者,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509。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35、97、168、181、269、321、379、845、847、848。
- 亨利三世(Henri III 1551—1589)——法国国王(1574—1589)。——126。

-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280、775、776、793。
-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775、793、794。
- 胡阿雷斯·贝尼托·帕布洛(Juárez [Juaréz], Benito Pablo 1806—1872)——墨西哥国务活动家,内战(1858—1860)和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1861—1867)时期为自由党的领袖,墨西哥总统(1858—1872)。——168。
- 华德,约翰(Ward, John 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位初期的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城》(1843)一书的作者。——274。
- 华莱士,罗伯特(Wallace, Robert 1697—1771)——英国教士和统计学家,提出了人口论,后为马尔萨斯所利用。——367、657、658。
- 怀特(White)——英国社会活动家,曾任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253、265、268、271、419、494、496。
- 怀特(White, W.)——英国医生。——508。
- 淮亚特,约翰(Wyatt, John 1700—1766)——英国技师,曾发明纺纱机。——387。
- 惠特布雷德,赛米尔(Whitbread, Samuel 1758—1815)——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辉格党人。——800。
- 惠特尼,伊莱(Whitney, Eli 1765—1825)——美国发明家,曾发明轧棉机。——399、407。
- 霍布豪斯,约翰·卡姆,布罗顿男爵(Hobhouse, John Cam, Baron Broughton 1786—1869)——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1831年的工厂法是在他的倡议下通过的;曾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35—1841和1846—1852)。——299。
-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 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70、406、657。
- 霍顿,约翰(Houghton, John 死于1705年)——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关于商业、工业和农业问题的著作。——447。
- 霍恩,乔治(Horne, George 1730—1792)——英国主教,写有抨击伊·牛顿、大·休谟、亚·斯密和其他学者的小册子。——658。
- 霍尔,克里斯托弗·纽曼(Hall, Christopher Newman 1816—1902)——英国教士,高级僧侣的代表人物。——262。
- 霍华德·德·沃尔登男爵,查理·奥古斯塔斯·埃利斯(Howard de Walden,

- Charles Augustus Ellis, Baron 1799—1868)——英国外交官。——285。
- 霍吉斯金, 托马斯(Hodgskin, Thomas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 批判资本主义, 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353, 367, 370, 563, 608, 813。
- 霍林舍德, 拉斐尔(Holinshed, Raphael 约死于1580年)——英国历史学家, 写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自远古时代至16世纪70年代的编年史。——774, 794。
- 霍罗克斯—杰克逊公司(Horrocks & Jackson)——英国一家纺织公司。——429。
- 霍纳, 弗兰西斯(Horner, Francis 1778—1817)——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辉格党人, 金条委员会主席(1810), 李嘉图货币论的追随者。——822。
- 霍纳, 伦纳德(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9), 维护工人利益。——228, 246, 286, 290, 294, 298, 300, 306, 417, 418, 432, 433, 446, 581。
- 霍普金斯, 托马斯(Hopkins, Thomas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234。

J

- 基尔希曼, 尤利乌斯·海尔曼·冯(Kirchmann, Julius Hermann von 1802—1884)——德国法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 自由党人;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后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写有哲学和法学方面的著作。——557。
- 基林, 安(Killin, Ann)——苏格兰一所学校的创办人。——417。
- 基斯(Keys)——英国医生。——262。
- 基谢廖夫伯爵,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Киселё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граф 1788—187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将军;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俄国行政当局首脑(1829—1834), 枢密院农民问题委员会常务委员(1835), 国家产业大臣(1837—1856); 1837—1841年实行温和的改革; 俄国驻巴黎大使(1856—1862)。——242。
- 基佐,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奥尔良党人; 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

- 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541。
- 吉尔摩公司(Gilmore)——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家纺织品公司。——454。
- 吉洛特,约瑟夫(Gillott, Joseph 1799—1873)——英国工厂主,在伯明翰首先实行钢笔尖的大规模生产。——485。
- 吉斯伯恩,托马斯(Gisborne, Thomas 1758—1846)——英国神学家,写有一些基督教道德问题的著作。——822。
- 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Зиб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845。
- 加德纳,罗伯特(Gardner, Robert)——英国棉纺厂厂主,1844年将开设在普雷斯顿各企业的工作日从12小时缩减到11小时。——429,432。
- 加尔涅伯爵,热尔曼(Garnier, Germain, comte de 1754—1821)——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重农学派的模仿者,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注释者。——378,379,569,582,663。
-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Galiani, Ferdinando 1728—1787)——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反对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同时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作了一些正确的猜测。——67,83,85,94,151,157,328,690。
- 加尼耳,沙尔(Ganilh, Charles 1758—1836)——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52,87,174,182,470。
- 加斯克尔,彼得(Gaskell, Peter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医生和政论家,自由党人。——456,466。
- 杰科布,威廉(Jacob, William 1762—1851)——英国商人和著作家,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223。
- 杰克逊公司——见霍罗克斯—杰克逊公司。
- 杰伊(Jay)——英国的一个铁路工程的承包商。——714。
- 金凯德,约翰(Kincaid, John 1787—1862)——英国官员,1850年起为苏格兰工厂和监狱视察员。——417,418。
- 居利希,古斯塔夫·冯(Gulich, Gustav von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德国保护关税派领袖;写有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842。
- 居维叶男爵,若尔日·莱奥波德·克雷蒂安·弗雷德里克·达哥贝尔特(Cuvier,

Georges-Léopold-Chrétien-Frédéric-Dagobert, baron de 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经将比较解剖学上升为科学,并提出了灾变论。——538。

K

卡尔利伯爵,乔万尼·里纳尔多(Carli, Giovanni Rinaldo, conte 1720—1795)——意大利学者,重商主义的反对者;写有一些关于货币和谷物贸易的著作。——342。

卡尔斯(卡尔斯的),威廉斯——见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

卡耳佩珀,托马斯(Culpeper, Sir Thomas 1578—1662)——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拥护者。——823,830。

卡莱尔,安东尼(Carlisle, Sir Anthony 1768—1840)——英国外科医生。——288。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托利党人;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262。

卡莱尔父子公司(Carlile, Sons & Co.)——苏格兰佩斯利的一家棉麻纺纱厂。——323,324。

卡姆梅尔公司(Cammell)——英国的一家钢铁公司。——268。

卡斯尔雷子爵——见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

卡泽诺夫,约翰(Cazenove, John 1788—1879)——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200,331,602,614,634。

凯尔恩斯,约翰·埃利奥特(Cairnes, John Elliot 1823—1875)——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199,274,346。

凯里,亨利·查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221,558,594—595,789,810。

凯特勒,阿道夫·朗贝尔·雅克(Quételet, Adolphe-Lambert-Jacques 1796—1874)——比利时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平均的个人”论的创立者。——336。

坎伯尔,乔治(Campbell, Sir George 1824—189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官,议会议员(1875—1892),自由党人;1843—1874年屡任英国驻印度的殖

- 民官员；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373。
- 康替龙，菲利浦(Cantillon, Philip)——英国经济学家，1759年曾修订出版理·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一书的英文版。——586。
- 康替龙，理查德(Cantillon, Richard 1680—1734)——英国经济学家，商人，重农学派和亚·斯密的先驱；《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一书的作者。——586、657。
- 考威尔(Cowell, J. W. [S. W.])——1833年曾以英国工厂委员会委员身份调查工厂劳动。——592。
- 柯贝特，托马斯(Corbet, Thomas 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追随者。——147、624。
-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Colbert, Jean-Baptiste 1619—1683)——法国国务活动家，重商主义者，财政总监(1661年起)，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外政策；曾建立国家工场，促进内外贸易。——322、820。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纪事年鉴》和《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299、444、724、777、817、820。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262、292、729、844。
- 科尔邦，克劳德·昂蒂姆(Corbon, Claude-Anthime 1808—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制宪议会副议长(1848—1849)；第二帝国崩溃后任巴黎市第十五区区长，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少数派。——515。
- 科兰男爵，让·吉约姆·塞扎尔·亚历山大·伊波利特(Colins, Jean-Guillaume-César-Alexandre-Hippolyte, baron de 1783—1859)——法国经济学家，原系比利时人；主张由国家征收地租，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矛盾。——655、745、838。
- 克劳生，彼得(Claussen, Pieter)——比利时发明家，圆编机的改进者。——387。
- 克雷格(Craig)——爱丁堡一家银行的雇员(1824)。——137。
- 克虏伯，阿尔弗勒德(Krupp, Alfred 1812—1887)——德国大工业家，埃森冶金厂和兵工厂厂主；曾向欧洲许多国家供应枪炮和其他军火。——406。

- 克伦威尔, 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 1649 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 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776、810。
- 克罗克, 罗杰 (Crocker, Roger)——英国丰特米尔的农业工人, 1627 年被处死。——776。
- 克肖-利斯公司 (Kershaw, Leese & Co.)——英国斯托克波特一家纺纱厂。——299。
- 肯尼特, 怀特 (Kennet, White 1660—1728)——英国主教和历史学家。——776。
- 肯宁安, 约翰 (Cunningham, John 1729—1773)——英国著作家和经济学家。——238、283。
- 肯特, 纳撒尼尔 (Kent, Nathaniel 1737—1810)——英国农学家, 写有农业方面的著作。——783。
- 孔德, 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e 1798—185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实证论的创始人。——346、845。
- 孔德, 弗朗索瓦·沙尔·路易 (Comte, François-Charles-Louis 1782—1837)——法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和庸俗经济学家。——814。
- 孔狄亚克, 埃蒂耶纳·博诺·德 (Condillac, Étienne-Bonnot de 1715—1780)——法国经济学家和自然神论哲学家, 感觉论者; 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 约·洛克的追随者。——157、158。
- 孔多塞侯爵, 玛丽·让·安东·尼古拉·卡里塔 (Condorcet, Marie-Jean-Antoine-Nicolas Caritat, marquis de 1743—1794)——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数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启蒙思想家,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吉伦特派; 1769 年起为科学院院士, 1777 年起被选为科学院常任秘书, 1782 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罗伯斯比尔执政后被剥夺公民权; 1794 年 3 月 27 日被捕, 两天后死于狱中。——657。
- 库尔塞尔-塞讷伊, 让·古斯塔夫 (Courcelle-Seneuil, Jean-Gustave 1813—1892)——法国经济学家, 商人; 写有一些关于工业企业经济、信贷和银行问题的著作。——237、635。
- 库克斯利 (Cooksley, W.)——英国布里斯托尔一家小五金厂厂主。——518。
- 库斯托第, 彼得罗 (Custodi, Pietro 1771—1842)——意大利经济学家, 16 世纪末—19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著作的编者。——34、67、83、85、94、150、

151、157、381、690、694。

库扎,亚历山大鲁·约翰(Cuza [Kusa], Alexandru Ion 1820—1873)——罗马尼亚政治活动家,1859—1866年为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于1862年成立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国君,称亚历山大·约翰一世,由于反动派的阴谋,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167。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103、333、586、657—658、843。

L

拉博尔德伯爵,亚历山大·路易·约瑟夫(Laborde, Alexandre-Louis-Joseph, comte de 1774—1842)——法国考古学家、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主义者。——558。

拉弗尔斯,托马斯·斯坦福(Raffles, Thomas Stamford 1781—1826)——英国殖民地官员,曾任爪哇总督(1811—1816);《爪哇史》一书的作者。——374、814。

拉马志尼,贝尔纳迪诺(Ramazzini, Bernardino 1633—1714)——意大利医生,曾收集并整理有关职业病的统计材料。——379。

拉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Rumford, Benjamin Thompson, Count of 1753—1814)——英国物理学家,出生于北美;一度供职于巴伐利亚政府,在英国举办过贫民习艺所。——639。

拉姆赛,乔治(Ramsay, George 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160、164、329、535、601、678。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法学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16、100。

拉沙特尔,克劳德·莫里斯(La Châtre [Lachâtre], Claude-Maurice 1814—1900)——法国作家、新闻工作者、出版商和书商;空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13、15。

拉韦涅,路易·加布里埃尔·莱昂斯·吉洛·德(Lavergne, Louis-Gabriel-Léonce-Guilhaud de 1809—188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写有农业经济方面的著作。——530、557、766。

莱瑟比,亨利(Letheby, Henry 1816—1876)——英国医生和化学家。——261。

- 莱斯特伯爵, 罗伯特·达德利(Leicester, Robert Dudley, Earl of 1532 前后—1588)——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宠臣, 1588 年为奉命保卫英国抵御西班牙人入侵的英军司令。——744。
- 莱特(Wright)——741。
- 莱特, 托马斯(Wright, Thomas 1711—1786)——英国自然科学家。——782。
- 莱特伯恩, 约翰(Lightbourne, John)——英国一家壁纸厂的一名 13 岁的童工(1863)。——253。
- 莱维, 莱昂内(Levi, Leone 1821—1888)——英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法学家; 写有商法方面的著作; 理·科布顿的朋友。——790。
- 莱文斯顿, 皮尔西(Ravenstone, Piercy 死于 1830 年)——英国经济学家, 李嘉图主义者, 维护无产阶级利益, 反对马尔萨斯主义。——450、535。
- 赖德(Ryder)——英国工厂主和发明家。——405。
- 赖希, 爱德华(Reich, Eduard 1836—1919)——德国医生, 写有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卫生学问题的著作。——379。
- 兰盖, 西蒙·尼古拉·昂利(Linguet, Simon-Nicolas-Henri 1736—1794)——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反对重农学派, 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作了批判。——238、297、348、657。
- 兰格, 赛米尔(Laing, Samuel 1810—1897)——英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议会议员, 自由党人; 曾任英国铁路公司某些高级职务。——200、690、707、725。
- 朗格, 弗兰西斯·戴维(Longe, Francis Davy 1831—1910)——英国法学家。——250、252、477、511。
- 朗切洛蒂, 塞孔多(Lancellotti, Secondo 1575—1643)——意大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曾任修道院长; 写有一些历史方面的著作。——447。
- 劳埃德, 赛米尔·琼斯, 奥弗斯顿男爵(Loyd, Samuel Jones, Baron Overstone 1796—1883)——英国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通货原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议会议员(1819—1826)。——118、139。
- 勒蒙泰, 皮埃尔·爱德华(Lemontey, Pierre-Édouard 1762—1826)——法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立法议会议员(1791—1792)。——378。
- 勒萨日, 阿兰·勒奈(Lesage, Alain-René 1668—1747)——法国作家, 著名小说《山梯良那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的作者。——764。
- 勒特罗纳, 吉约姆·弗朗索瓦(Le Trosne, Guillaume-François 1728—1780)——法

-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27,30,85,96,106,111,114,140,156—159,162,213。
-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Redgrave, Alexander 1818—1894)——英国官员,曾任工厂视察员(1878年以前)。——275,276,393,412,419,435,454,471,479—481,576,592—594。
- 雷尼奥,埃利亚斯·若尔日·奥利瓦(Regnault, Élias-Georges-Oliva 1801—1868)——法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国家官员。——244。
-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244,341,402,532,607。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46,55,64,70,74,77,118,139,161,165—166,190,207,209,233,234,320,403,404,408—409,425,450,452,459,462,532,540,541,546—548,554,557,561,595,608,625,632—634,637,645,646,655,677,822,843。
- 李奇,耶利米(Leach, Jeremiah)——英国工人。——253。
- 李奇尼乌斯(盖尤斯·李奇尼乌斯·斯托洛)(Gaius Licinius Stolo 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罗马国务活动家,护民官,曾和塞克斯蒂乌斯共同制定保护平民利益的法律。——784。
- 李斯特——见马沙姆男爵,赛米尔·坎利夫·李斯特。
- 里德,乔治(Read, George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面包业的历史》一书作者。——257,258。
- 理查森(Richardson)——737。
- 理查森,本杰明(Richardson, Benjamin 1828—1896)——英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卫生学问题的著作。——261,263。
- 利(Leigh)——英国医生,曼彻斯特的保健医官。——688。
- 列沙白里哀,伊萨克·勒奈·居伊(Le Chapelier, Isaak [Isaac] René-Guy 1754—1794)——法国政治活动家,1791年6月14日通过的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的法案起草人,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因参加阴谋活动被处死。——801。
- 琉善(Lucianus [Lukianus] 约120—180)——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658。
- 卢·拉维涅,皮埃尔·塞勒斯坦(Roux-Lavergne, Pierre-Célestin 1802—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802。

-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1844年同马克思一起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69、149、163、681。
- 卢克莱修(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 约公元前99—55)——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218。
-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807。
- 鲁本斯,彼得·保尔(Rubens,Peter Paul 1577—1640)——佛兰德大画家。——308。
- 鲁宾逊(Robinson)——英国一家纺纱厂主。——299。
- 鲁瓦,约瑟夫(Roy,Joseph)——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法文译者。——841。
- 鲁瓦尔·德卡尔,皮·玛丽(Rouard de Card,Pie-Marie 19世纪)——法国神学家。——255。
-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194、322、629。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136。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796。
-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286。
-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John of Lauriston 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85、657。
- 罗伯茨,乔治(Roberts,Sir George 1803—1860)——英国历史学家,写有关于英国南部各郡的历史著作。——777。
- 罗德戴尔伯爵,詹姆斯·梅特兰(Lauderdale,James Maitland,Earl of 1759—

- 183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亚·斯密理论的批评者。——363。
- 罗杰斯,詹姆斯·埃德温·索罗尔德(Rogers, James Edwin Thorold 1823—18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英国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722、729、779、811。
-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 Charles-Latour 1800—1885)——比利时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自由党人;1847—1852年任内务大臣。——285。
-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39—1841),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623、780。
- 罗西伯爵,佩莱格里诺·路易吉·爱德华多(Rossi, Pellegrino Luigi Edoardo, conte 1787—1848)——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长期住在法国。——173、606。
-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86、87、158、209、220、233、271、337、380、655。
- 罗伊,亨利(Roy, Henry)——英国医生和经济学家。——134。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557。
- 洛德(Lord)——英国伦敦的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266、498。
-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24、85、95、119、148、406、657。
- 洛朗,奥古斯特(Laurent, Auguste 1807—1853)——法国化学家,同热拉尔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322。

M

- 马蒂诺,哈丽雅特(Martineau, Harriet 1802—1876)——英国女作家,马尔萨斯主义的鼓吹者。——681。

- 马丁,亨利(Martyn, Henry 死于 1721 年)——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写有关于商业问题的著作。——381。
- 马丁,罗伯特·蒙哥马利(Martin, Robert Montgomery 1803—1868)——英国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曾到东方旅行。——469。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161、216、326、367、532、554、587、602、608、614、623、625、632—634、636、645、646、657、658、681、694、756、757、762。
- 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的)(Maximilian von Habsburg 1832—1867)——奥地利大公,在意大利的奥国领地总督(1857—1859),在英法西武装干涉墨西哥时期被宣布为墨西哥傀儡帝国的皇帝(1864—1867),1867 年被墨西哥爱国者枪毙。——168。
- 马利特(Mallett)——英国工厂主。——250。
-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Malmesbury, James Harris, Earl of 1746—1820)——英国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驻圣彼得堡大使(1777—1782)。——381。
- 马沙姆男爵,赛米尔·坎利夫·李斯特(Masham, Samuel Cunliffe Lister, Baron 1815—1906)——英国工业家和发明家。——395。
- 马西,约瑟夫(Massic, Joseph 死于 1784 年)——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539。
- 马歇尔,威廉(Marshall, William)——英国一家玻璃手工工场的总经理。——364。
- 马修曼,亨利(Matthewman, Henry)——英国一家轧钢厂的一名 17 岁的童工(1865)。——266。
- 马扎里尼,朱利奥·雷蒙多(Mazarini, Giulio Raymondo 1602—1661)——法国国务活动家,意大利人,罗马教廷驻法国的使节(1634—1636),红衣主教(1641 年起),在路易十四成年以前实际上是法国的统治者;专制制度的拥护者。——817。
-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Meyer, Rudolph Hermann 1839—1899)——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人;《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者。——244。
- 麦格雷戈,约翰(MacGregor, John 1797—1857)——英国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

- 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并为董事之一(1849—1856),写有统计学方面的著作。——282。
- 麦考莱,托马斯·巴宾顿(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印度总督所属参事室参事(1833—1838);曾主持制定印度刑法典,这部法典于1860年被批准为法律。——281,285,772,779。
- 麦克贝恩(McBean)——英国医生。——251。
-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139,147,148,150,194,282,334,426,459,464,546,547,647,649,783。
- 麦克拉伦,詹姆斯(Maclaren, James 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流通史的研究者。——92。
- 麦克劳德,亨利·邓宁(Macleod, Henry Dunning 1821—1902)——英国法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主要从事信贷理论研究,阐发了所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53,151。
- 曼,托马斯(Mun, Thomas 1571—1641)——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贸易差额论的创立者,1615年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538。
- 曼,约翰(Mun, John 1615—1670)——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托·曼的儿子,曾出版其父亲的著作。——538。
- 曼德维尔,贝尔纳德(Mandeville, Bernard 1670—1733)——英国讽刺文学和民主主义的伦理学作家、医生和经济学家。——370,655—657。
- 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保尔·皮埃尔(Mercier de la Riviere, Paul Pierre 1720—1793)——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104,125,144,147,156,160,193。
- 梅克伦堡(梅克尔堡),弗里德里希·阿道夫(Mecklenburg [Meckelburg], Friedrich Adolf 1809—1881)——德国教师和档案保管员,曾同卡·阿贝尔一起翻译《帝俄驻北京公使关于中国及其人民、宗教、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著述》一书。——122。
- 梅里韦尔,赫尔曼(Merivale, Herman 1806—1874)——英国经济学家和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副大臣(1848—1859),印度事务副大臣(1859—1874)。——680,681,835,836。
- 梅涅尼·阿格利巴(Mencnius Agrippa 死于公元前493年)——古罗马贵族。

—— 376。

蒙森, 泰奥多尔 (Mommsen, Theodor 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 柏林大学教师; 写有关于古罗马史的著作。——167, 170。

蒙塔朗贝尔伯爵, 沙尔·福布斯 (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奥尔良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1848—1851), 天主教党的领袖;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 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 1852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495。

蒙泰伊, 阿芒·亚历克西斯 (Monteil, Amans-Alexis 1769—1850)——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805。

孟德斯鸠, 沙尔 (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 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 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 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 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85、118, 657, 819。

弥勒, 安东 (Müller, Anton 16世纪上半叶)——447。

弥勒, 亚当·亨利希, 尼特多夫骑士 (Müller, Adam Heinrich, Ritter von Nitterdorf 1779—1829)——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 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 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119。

米拉波伯爵,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 (Mirabeau, Honoré-Gabriel-Victor Riqueti, comte de 1749—1791)——法国政论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503, 772, 773, 792, 808, 820。

米拉波侯爵, 维克多·里凯蒂 (Mirabeau, Victor Riqueti, marquis de 1715—1789)——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农主义者; 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的父亲。——830。

米夏埃利斯 (米歇尔), 奥托 (Michaelis [Michel], Otto 1826—1890)——德国经济学家, 1863年与尤·孚赫同为《国民经济学与文化史季刊》的编辑。——233。

摩尔顿, 约翰·查默斯 (Morton, John Chalmers 1821—1888)——英国农学家, 《农业报》编辑 (1844—1888), 写有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391, 392, 584。

摩尔根, 威廉 (Morgan, William 1750—1833)——英国经济学家, 理·普赖斯著

- 作的出版者;写有一些反对增加军费和国债的文章。——723、783。
- 莫尔,麦卡勒姆(More, M'Callum 19世纪)——苏格兰土地占有者。——790。
- 莫尔,托马斯(More, Thomas 1478—1535)——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人文主义作家,曾任大法官;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657、774、775、794。
- 莫尔斯沃思从男爵,威廉(Molesworth, Sir William, Baronet 1810—1855)——英国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53—1855)和殖民大臣(1855)。——170。
- 莫里哀(Molière 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634。
- 莫里斯,约翰(Morris, John)——英国一家轧钢厂的一名14岁的童工(1865)。——266。
- 莫里逊—狄龙公司(Morrison, Dillon & Co.)——英国一家贸易公司。——135。
- 莫利纳里,古斯塔夫·德(Molinari, Gustave de 1819—1912)——比利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自由贸易论者;《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主编(1876)和《经济学家杂志》主编(1881)。——157、442、635、836。
- 莫兹利,亨利(Maudslay, Henry 1771—1831)——英国设计师、工厂主和发明家。——400。
- 墨菲,约翰·尼古拉斯(Murphy, John Nicholas 19世纪)——英国政论家,《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一书的作者。——758。
- 默里,休(Murray, Hugh 1779—1846)——英国地理学家和政论家。——354。
- 默里,约翰(Murray, John)——英国一家陶器厂的一名12岁的童工(1863)。——250。
- 米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118、119、129、386、459、532、541—543、626、634、637、649—651、811、844。
- 米勒,詹姆斯(Mill, 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109、118、151、188、200、367、459、532、601、605、607。

N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284,745。
- 内克,雅克(Necker, Jacques 1732—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从1770—1789年多次任财政大臣;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曾试图进行某些改革。——624。
- 内勒—维克斯公司(Naylor & Vickers)——英国的一家钢铁公司。——267,268。
- 内史密斯,詹姆斯(Nasmyth, James 1808—1890)——英国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者。——401,433,456。
-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r, Barthold Georg 1776—1831)——德国古典古代史学家,写有古代史方面的著作,曾在丹麦和普鲁士供职。——240。
- 纽马奇,威廉(Newmarch, William 1820—1882)——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306。
-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Newman, Francis William 1805—1897)——英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写有一些关于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著作。——780,786。
- 纽曼,赛米尔·菲利浦斯(Newman, Samuel Philips 1797—1842)——美国哲学家、语文学家和经济学家。——158,210。
- 纽纳姆,乔治·路易斯(Newnham, George Lewes)——英国律师。——640。
- 诺思,达德利(North, Dudley 1641—169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初的代表人物。——95,116,119—120,129,406,657。

O

-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70,88,89,311,420,510,529,580,633。

P

- 帕里,查理·亨利(Parry, Charles Henry 1779—1860)——英国医生,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写有一些关于经济学和政治问题的著作。——639,641,724。
- 帕里,威廉·爱德华(Parry, William Edward 1790—1855)——英国旅行家,曾考察北极地区。——89。

- 帕里佐, 雅克·泰奥多尔(Parisot, Jacques-Théodore 生于 1783 年)——法国海
军军官和政论家, 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他经济学著作的译者。
——601。
-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辉
格党领袖,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军务大臣(1809—1828), 外交大臣(1830—
1834, 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
1858 和 1859—1865)。——479。
- 帕尼尼, 乔万尼·弗兰契斯科(Pagnini, Giovanni Francesco 1715—1789)——意
大利经济学家, 写有一些关于货币的著作。——85。
- 帕森斯, 查理(Parsons, Charles)——英国外科医生。——252。
- 培根, 弗兰西斯, 维鲁拉姆男爵, 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
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 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405、
406、775、776。
- 佩诺(Penot 19 世纪)——法国医生。——412。
- 佩托, 赛米尔·莫顿(Peto, Samuel Morton 1809—1889)——英国企业主, 从事
铁路建筑;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1866 年企业破产后退出社会活动。
——239。
- 配第, 威廉(Petty, William 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英国资
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34、64、73、86、95、117、137、141、171、
280、281、326、356、363、381、449、586、657、658。
- 皮尔, 罗伯特(Peel, Robert 1750—1830)——英国棉纺织厂厂主, 议会议员, 托
利党人; 英国首相罗·皮尔的父亲。——822。
- 皮尔, 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 托利
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 该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1822—
1827 和 1828—1830), 首相(1834—1835 和 1841—1846); 1844 年和 1845 年
银行法的起草人;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138、237、
831、839、844。
- 皮特(小皮特), 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
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反对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
者之一; 1781 年起为议会议员, 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

- 1801 和 1804—1806)。——209,800。
- 皮由兹,菲利浦(Pusey, Philipp 1799—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大地主,托利党人。——727。
- 平达(Pindaros 约公元前 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写有一些瑰丽的颂诗。——148,438,701。
- 平托,伊萨克·德(Pinto, Isaac de 1715—1787)——荷兰的大证券交易商和经济学家,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148。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61,441,540,564。
- 普赖斯,理查德(Price, Richard 1723—1791)——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282,623,723,783,784。
- 普罗塔哥拉(阿布德拉的)(Protagoras of Abdera 公元前约 480—410)——古希腊哲学家,鼓吹奴隶主民主制的思想家。——255。

Q

- 奇斯曼(Cheesman)——英国一家面包店的老板。——258。
- 乔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1727—1760)。——30,91,799。
-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799。
- 琼斯,理查德(Jones, Richard 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321,334,342,348,603,623,635,636,677,678。

R

- 热拉尔,沙尔·弗雷德里克(Gerhardt, Charles-Frédéric 1816—1856)——法国化学家,同洛朗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322。
-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埃蒂耶纳(Geoffroy Saint-Hilaire, Étienne 1772—1844)——法国动物学家,进化论者,查·达尔文的先驱者之一。——806。

S

- 萨德勒,迈克尔·托马斯(Sadler, Michael Thomas 1780—1835)——英国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托利党人,慈善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对者。

- 343,725,756。
- 萨默斯, 罗伯特(Somers, Robert 1822—1891)——英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
——789,790。
- 萨瑟兰公爵夫人, 哈丽雅特·伊丽莎白·乔治亚娜·鲁森-高尔(Sutherland, Harriet Elizabeth Georgiana Leveson-Gower, Duchess of 1806—1868)——苏格兰大地主, 伊·鲁森-高尔·萨瑟兰的儿媳。——789。
- 萨瑟兰女伯爵, 伊丽莎白·鲁森-高尔, 斯塔福德侯爵夫人, 萨瑟兰公爵夫人(Sutherland, Elizabeth Leveson-Gower, Countess of, Marchioness of Stafford, Duchess of 1765—1839)——苏格兰大地主, 斯塔福德侯爵的妻子, 哈·伊·乔·鲁森-高尔·萨瑟兰的婆婆。——788,789。
- 萨伊, 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最先系统地阐述“生产三要素”论。——74、109、151、162、195、208—209、378、404、462、547、564、632、645、646。
- 塞克洛普(Cyklops)——英国卡姆梅尔公司的一家钢铁厂。——268。
-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 2世纪下半叶)——古希腊医生和怀疑派哲学家。——381。
- 桑德森(Sanderson, E. F.)——英国桑德森兄弟公司的老板之一。——268—270。
- 桑德森兄弟公司(Sanderson, Bros. & Co.)——英国阿特克利夫的炼钢、压延、锻铁工厂。——268—270。
- 桑德斯, 罗伯特·约翰(Saunders, Robert John)——英国官员, 曾任工厂视察员(19世纪40年代)。——301、313、420。
- 桑顿, 威廉·托马斯(Thornton, William Thomas 1813—18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约·斯·穆勒的追随者。——171、277、774。
- 色诺芬(Xenophon 约公元前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 自然经济的拥护者; 写有历史、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
——382。
- 沙白里哀——见列沙白里哀, 伊萨克·勒奈·居伊。
- 沙利文(Sullivan)——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伙伴。——815。
- 沙乌, 华金·弗雷德里克(Schouw, Joakim Frederik 1789—1852)——丹麦植物学家。——540。
- 莎士比亚, 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

——77, 102, 127, 514, 779, 804。

舍尔比利埃, 安东·埃利泽 (Cherbuliez, Antoine-É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 西斯蒙第的追随者, 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184, 188, 622, 696。

舍伐利埃, 让·巴蒂斯特·阿尔丰斯 (Chevallier, Jean-Baptiste-Alphonse 1793—1879)——法国化学家和药学家。——255。

舍夫茨别利伯爵,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 40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领袖, 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低教会派的拥护者, 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 帕麦斯顿的女婿。——419, 430, 431, 725, 726。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33。

圣哲罗姆——见哲罗姆。

施托尔希, 安德烈·卡尔洛维奇 (Шторх, Андрей Карлович 原名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施托尔希 Heinrich Friedrich von Storch 1766—1835)——俄国经济学家、目录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 德裔; 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模仿者。——174, 184, 366, 375, 376, 627, 695。

舒尔采-德里奇, 弗兰茨·海尔曼 (Schulze-Delitzsch, Franz Hermann 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主张在普鲁士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 民族联盟创始人之一 (1859); 60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 国会议员 (1867年起); 曾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16, 233。

舒尔茨, 威廉 (Schulz, Wilhelm 1797—1860)——德国政论家, 1833年被判处五年要塞监禁, 1834年逃跑, 流亡瑞士至1848年; 同尤·福禄培尔和阿·卢格有密切联系;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387。

斯宾诺莎, 巴鲁赫 (贝奈狄克特) (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论者。——320, 634。

斯蒂文斯 (Stevens)——英国医生。——716, 717。

斯卡尔培克, 弗里德里克 (Skarbek, Fryderyk 1792—1866)——波兰经济学家, 华沙大学教授; 亚·斯密的追随者。——340, 366。

- 斯克里文,赛米尔(Scriven, Samuel)——英国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250。
- 斯科罗普,乔治·朱利叶斯·波利特(Scrope, George Julius Poulett 1797—1876)——英国经济学家和地质学家,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议会议员。——634。
- 斯隆,汉斯(Sloane, Hans 1660—1753)——英国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从事书籍和手稿的收藏,1753年把全部收藏和另外两个私人藏书库合并,创立了英国最大的国家博物馆——英国博物馆。——780。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37, 38, 64, 71, 117—119, 138, 165, 281, 363, 369, 370, 378, 381, 403, 428, 483, 532, 547, 559, 563, 565, 569, 586, 591, 603, 625—627, 631, 646, 655, 657—660, 663, 667, 690, 767, 787, 797, 823, 843。
- 斯密斯(Smith)——英国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股东兼经理。——253, 254, 575。
- 斯密斯,爱德华(Smith, Edward 1818 前后—1874)——英国医生,枢密院卫生顾问和调查工人区居民饮食状况的医务专使,济贫法委员会委员。——411, 703—705, 731。
- 斯密斯,戈尔德温(Smith, Goldwin 1823—1910)——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自由党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曼彻斯特学派的拥护者,英格兰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的辩护士;1868年迁居美国;1871年起住在加拿大。——811。
- 斯密斯,威廉(Smith, William)——英国一家轧钢厂的一名15岁的童工(1865)。——266。
- 斯密斯,约翰(Smith, John)——爱丁堡的典狱官。——730。
- 斯内尔(Snell)——510。
- 斯尼格(Snigge)——英国律师,詹姆斯一世时的法官。——778。
- 斯帕克斯,贾雷德(Sparks, Jared 1789—1866)——美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富兰克林著作的出版者。——73, 163。
- 斯塔福德,威廉(Stafford, William 1554—1612)——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804。
- 斯特拉恩,威廉(Strahan, William 1715—1785)——英国出版商,大·休谟、亚·斯密等人的著作的出版者。——658。
- 斯特赖普,约翰(Strype, John 1643—1737)——英国教会史学家。——795, 796。

- 斯特兰奇,威廉(Strange, William)——英国医生,《健康的七要素》(1864)的作者。——264。
- 斯特罗克,阿奇博尔德(Sturrock, Archibald)——英国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453。
- 斯特普尔顿(Stapleton)——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639。
- 斯图亚特,杜格尔德(Stewart, Dugald 1753—1828)——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哲学上唯心主义派别——所谓健全理智的哲学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反对者。——334, 359, 376, 512。
- 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Stewart, Henry Robert, Viscount Castlereagh 1769—182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和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英国政府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448。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117, 138, 140, 146, 181, 346, 367, 449, 586, 657, 694, 773, 787, 806。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44—1839)——英国将军,曾出版其父亲詹·斯图亚特的著作。——146。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uart, James 1775—1849)——英国医生和政论家,工厂视察员。——298, 324。
-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王朝(1371—1714)和英格兰王朝(1603—1649和1660—1714)。——779。
- 苏利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德·贝坦(Sully, Maximilien de Béthune, duc de 1560—1641)——法国国务活动家,重商主义者;国王亨利四世的顾问。——657。
-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公元前497前后—40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者。——127。

T

- 塔夫内尔,爱德华·卡尔顿(Tufnell, Edward Carleton 19世纪)——英国政论家,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和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一书的作者。——271。
- 塔克尔,乔赛亚(Tucker, Josiah 1712—1799)——英国牧师和经济学家,亚·斯

- 密的先驱。——282,658,824。
- 塔克特,约翰·德贝尔(Tuckett, John Debell 1786—1864)——英国政论家。——378,777,810。
- 塔珀,马丁(Tupper, Martin 1810—1889)——英国诗人,写有一些空泛的劝谕性诗篇。——649。
- 泰勒,爱德华(Taylor, Edward)——英国一家轧钢厂的一名15岁的童工(1865)。——266。
- 泰特(Tait)——英国利默里克的一家服装厂厂主(1864)。——499。
- 坦普尔,威廉(Temple, William 1628—1699)——英国外交官和政治活动家,重商主义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的近臣;写有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著作。——657。
- 汤普森,本杰明——见拉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
- 汤普森,威廉(Thompson, William 1775—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377。
- 唐森,约瑟夫(Townsend, Joseph 1739—1816)——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学家,教士;他提出的人口理论后来为马尔萨斯所利用。——367,657—658,694。
- 特里门希尔,休·西摩尔(Tremenheere, Hugh Seymour 1804—1893)——英国官员和政论家,曾屡次参加政府的工人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174,175,256,271。
- 特纳(Turner)——英国牧师,柴郡威尔姆斯托工业区的教区长。——451。
- 特纳,威廉(Turner, William)——英国一家轧钢厂的一名12岁的童工(1865)。——266。
- 梯特——见韦斯帕西安(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464,768。
- 帖木儿(跛帖木儿)(Timūr-i-lang [Tamerlane] 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271。
-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

史》。——306。

托雷斯,雅克·德(Thoraisse, Jacques de 14 世纪)——法国贵族,贝桑松城堡主。——805。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 Robert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通货原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160、171、186、422、459。

W

瓦茨,约翰(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早期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1853年在伦敦创办了“国民人身保险公司”,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公司。——580、584。

瓦尔皮,蒙塔古(Valpy, Montagu J.)——英国牧师。——250。

瓦伦廷,加布里埃尔·古斯塔夫(Valentin, Gabriel Gustav 1810—1883)——德国物理学家。——509。

瓦什隆-康斯坦丁(Vacheron & Constantin)——瑞士的一家钟表工厂。——358。

瓦特,詹姆斯(Watt, James 1736—1819)——英国商人、工程师和发明家,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设计者。——390、392、393、397、400、516。

王茂荫(1798—1865)——中国清朝官员,1853年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曾提出将官票宝钞兑现的主张;《条议钞法析》和《论行大钱析》等著作的作者。——121。

威德,本杰明·富兰克林(Wade, Benjamin Franklin 1800—1878)——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参议院议长,1867—1869年任副总统;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19。

威德,约翰(Wade, John 1788—1875)——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249、280、662。

威尔克斯,马克(Wilks, Mark 1760 前后—1831)——英国殖民军军官,长期驻印度,写有一些关于印度的著作。——373。

威尔士亲王夫人——见亚历山德拉。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47—1859),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的创办人和编辑;曾任财

- 政部财务次官(1853—1858)、印度财政大臣(1859—1860);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33、354。
- 威兰德,弗兰西斯(Wayland, Francis 1796—1865)——美国神学家、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曾任普罗维登斯大学校长;著有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通俗教科书。——162、211。
-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780。
-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299。
-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Williams, William Fenwick, Baronet of Kars 1800—1883)——英国将军,1855年克里木战争时期曾指挥卡尔斯保卫战,后投降俄国军队;议会议员(1856—1859)。——119。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119。
- 韦斯特,爱德华(West, Edward 1782—1828)——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过地租问题。——532、554、571—573。
-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276、339、563、618、725、830—833、835—839。
- 韦里,彼得罗(Verri, Pietro 1728—1797)——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最初批评者之一。——34、84、128、342。
- 韦奇伍德,乔赛亚(Wedgwood, Josiah 1730—1795)——英国制陶业主和企业家,某种制陶技术的发明者和英国陶器工业的奠基者。——274、278。
- 韦斯帕西安(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39—81)——罗马皇帝(79—81)。——412。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840。
- 维尔特,麦克斯(Wirth, Max 1822—190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233。
- 维科,乔万尼·巴蒂斯塔(Vico, Giovanni Battista 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试图阐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388。

- 维利尔斯, 查理·佩勒姆(Villiers, Charles Pelham 1802—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 自由贸易派, 议会议员; 曾任军法总监(1852—1858), 济贫法总督察(1859—1866)。——275。
- 维特, 约翰·德(Witt, Johan de 1625—1672)——尼德兰国务活动家, 大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657, 819。
- 沃邦侯爵, 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Prestre], 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136。
- 沃尔弗男爵, 克里斯蒂安(Wolff, Christian Freiherr von 1679—1754)——德国哲学家, 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 开明的专制主义和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拥护者。——649。
- 沃康松, 雅克·德(Vaucanson, Jacques de 1709—1782)——法国力学家, 曾改进织机的构造和发明灵敏的自动装置。——397。
- 沃克利, 玛丽·安妮(Walkley, Mary Anne 1843—1863)——英国女工。——261, 262。
- 沃拉斯顿(Wollaston)——英国牧师。——510。
- 沃森, 约翰·福布斯(Watson, John Forbes 1827—1892)——英国医生、政论家和民族学家; 殖民官, 曾长期在印度军队任职; 1858—1879年任伦敦印度博物馆馆长; 写有一些关于印度农业和纺织业的著作。——407。
- 乌尔卡尔特, 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亲土耳其分子; 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 议会议员(1847—1852); 《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94, 379, 531, 789, 809, 810。
- 伍德, 威廉(Wood, William)——英国一家陶器厂的一名9岁的童工(1863)。——250。

X

- 西德茅斯子爵, 亨利·阿丁顿(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Viscount 1757—1844)——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 掌玺大臣(1806—1807), 内务大臣(1812—1821)。——448。
- 西利, 罗伯特·本顿(Seecley, Robert Benton 1798—1886)——英国出版商和政

- 论家,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785。
- 西蒙,约翰(Simon, Sir John 1816—1904)——英国医生,枢密院医官,曾对英国的保健事业进行改革。——416, 489, 490, 704, 706, 707, 714, 717, 731, 732。
-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227—229, 232, 233, 271, 334, 423, 459, 509, 510, 519, 520, 573, 578, 633, 634, 647, 766, 789。
-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97, 426。
-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152, 173, 240, 328, 425, 563, 600, 612, 617, 620, 632, 650, 681, 695, 696, 826, 843。
- 希,威廉(Shee, William 1804—186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444。
- 希律(Herod 公元前73—4)——犹太国王(公元前40—4)。——420。
- 咸丰(1831—1861)——中国清朝皇帝(1850—1861)。——121。
- 辛普森(Simpson)——英国伦敦的一家纸袋纸盒厂厂主。——518。
- 辛辛纳图斯(鲁齐乌斯·昆克提乌斯·辛辛纳图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 约公元前519—438)——罗马贵族,执政官(公元前460),独裁者(公元前458和439),据传说,他生活简朴,亲自耕种土地。——186。
- 休谟,大卫(Hume, 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117, 118, 539, 586, 657—659。
- 修昔的底斯(Thukydides 约公元前460—400)——古希腊历史学家。——220, 381, 382。

Y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50—52, 75, 79, 149, 150, 163, 339, 340, 425。
- 亚历山德拉(Alexandra 1844—1925)——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之女,1863

- 年嫁给威尔士亲王, 亲王于 1901 年起为英国国王, 称爱德华七世; 克拉伦斯公爵的母亲。——261, 266。
- 杨格, 阿瑟 (Young, Arthur 1741—1820)——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 18 世纪末出版的《爱尔兰游记》一书的作者。——117, 234, 282, 722, 732。
- 耶伦顿, 安德鲁 (Yarranton, Andrew 1616—约 1684)——英国工程师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363。
- 叶卡捷琳娜二世 (喀德邻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 (1762—1796)。——734。
- 伊壁鸠鲁 (Epikouros 约公元前 342—270)——古希腊哲学家, 无神论者。——73。
- 伊登, 弗雷德里克·莫顿 (Eden, Sir Frederic Morton 1766—180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亚·斯密的学生。——249, 639, 656—657, 659, 723, 724, 778, 781—782, 784—785, 821, 823。
- 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1533—1603)——英国女王 (1558—1603)。——280, 777, 795—796, 798—800, 809。
-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公元前 436—338)——古希腊作家和演说家, 写有一些抨击性的文章。——383。
- 尤尔, 安德鲁 (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论者, 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232, 271, 280, 311, 363, 365, 384, 396, 402, 421, 438, 440, 443, 452, 453, 457—459, 583, 588, 592。
- 约翰二世 (善人) (Jean II le Bon 1319—1364)——法国国王 (1350—1364)。——798。
- 约翰逊 (Johnson)——爱尔兰工人。——763。

Z

- 詹姆斯一世 (James I 1566—1625)——英国国王 (1603—1625), 1567 年起为苏格兰国王, 称詹姆斯六世。——778, 796, 799。
- 詹诺韦西, 安东尼奥 (Genovesi, Antonio 1712—1769)——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者。——150。
- 张伯伦, 约瑟夫 (Chamberlain, Joseph 1836—1914)——英国国务活动家, 自由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合并派, 1873—1875 年任伯明翰市市长, 曾多年任英国

内阁阁员，英布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688。

哲罗姆(圣哲罗姆)(Hieronymus [St. Jerome] 347 前后—420)——神学家和著作家，生于达尔马提亚，曾把圣经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97。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斯塔尔塔——腓尼基神话中的农神与爱神，巴比伦的保护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芙罗狄蒂女神。——127。

埃伽昂(布里亚雷)——古希腊神话中的百臂巨人，长有50个脑袋和100个手臂。——359。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力斯发现了他的这个特点，把他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629。

安提戈涅——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她不顾国王的禁令埋葬了她的被抛尸旷野的哥哥波吕涅克斯，因此被国王下令幽禁在地窖中，最后自缢而死。——127。

奥德赛(乌利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传说他去过阴曹地府，同一些亡灵谈过话。——260。

B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658。

彼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98。

柏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宙斯同丹娜所生的儿子。因神谕他将杀其外祖父，所以出生后即同母亲一起被外祖父装进木箱，投入大海，随流漂至塞里福斯岛。该岛国王欲娶其母，便用计使他去取女怪美杜莎的头。回国后出示女怪头使国王及随从全部变成了石头，救出了母亲。后来又除去海怪，救出埃塞俄比亚公主，并同她结为夫妇。——18。

布里亚雷——见埃伽昂。

布西里士——古希腊神话中的埃及国王。——383。

D

答尔丢夫——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的人物。——634。

代达罗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425。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
——77。

F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80、630。

福尔土纳特——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取之不尽的钱袋和一顶隐身帽。——481、696。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38。

G

该隐——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长子，出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
——811。

高布赛克——巴尔扎克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624。

格里昂——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有三个身体的巨人，海格力斯夺走了他的牛，并用箭把他射死。——629。

H

哈默尔恩的捕鼠者——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传说中的捕鼠者，曾用魔笛替哈默尔恩城的居民消灭了鼠患，而居民没有给以应有的报答，他为了报复，又用魔笛把全城儿童从哈默尔恩城引诱走。——747。

海格力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他的十二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443、457、629。

J

基督——见耶稣基督。

K

- 卡库斯——罗马神话中的吐火怪物，火神武尔坎的儿子，住在阿文丁山的山洞里；杀害过路人，被海格立斯打死。——629。
-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作品《讽刺诗集》中的人物。——254。
- 快嘴桂嫂——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酒店女店主。——38。

L

- 莱喀古士——传说中的古斯巴达立法者，相传为公元前9—8世纪时候的人。——443。
- 鲁滨逊·克鲁索——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70、72。

M

- 马立托奈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一个女人。——79。
- 玛门——古希腊神话中的财神；在基督教教文中，玛门是恶魔，是好利贪财的化身。——658。
- 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变成石头；后为柏修斯所杀。转意为可怕的怪物或人。——18。
- 摩菲斯特斐勒司——歌德《浮士德》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763。
-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做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707。
-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390、836。

N

- 宁禄——据圣经传说，是挪亚的曾孙，猎人。——779。
- 挪亚——据圣经传说，是“洪水灭世”后重新繁殖的人类的始祖。——779。

P

- 普隆涅斯——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一个狡猾多嘴的廷臣。

——282。

普路托——罗马神话中的地府之神。——127。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类；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罚。——693。

Q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神，雷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头公牛。——612。

邱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他被描绘成一个带有弓箭的男孩。——658。

S

撒巴拉——印度传说中的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612。

塞克洛普(独眼巨人)——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额头上长有一只眼睛。——243。

赛克斯，比尔——见威廉·赛克斯。

桑格拉都——勒萨日的小说《山梯良那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中的人物，医生，他医治一切疾病时都给病人放血和让他们喝温水。——764。

T

泰门——莎士比亚的剧作《雅典的泰门》中的人物。——127。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76、636。

托尔——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雷神，一个斗士，手中握有大锤。——401。

W

威廉·赛克斯(比尔·赛克斯)——狄更斯的小说《奥列佛尔》中的角色，强盗。——464。

沃尔坎——罗马神话中雷神丘必特的儿子，火神，手工业的保护神。——425、693。

乌利斯——见奥德赛。

X

西可尔——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77。

息息法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因欺骗了众神，被罚终生推滚一巨石到山上，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就会又滚回山下。“息息法斯的劳动”源出于此，意即吃力而徒劳的工作。——128、441。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借约要求从无法如期还债的债户身上割下一磅肉。——297、735。

夏娃——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创世时从亚当身上取肋骨而造，是人类的第一位女性、第一个妻子和第一位母亲。——832。

星期五——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人物，鲁滨逊的仆人。——299。

许德拉——古希腊神话中堤丰与厄喀德那的后裔，是一个九头怪物，正中的一个头长生不死，杀死许德拉是海格立斯完成的十二件功绩之一。因为怪物正中的那个头砍下后会生出两个头。最后海格立斯想尽办法，终于杀死了怪物。——457。

Y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古犹太人的始祖；《雅各书》的作者。——617。

雅赫维(耶和華)——犹太教中的主神。——376。

亚伯——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次子，由于遭到长兄该隐的嫉妒而被杀害。——811。

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族长。——617。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658、767、832。

耶和華——见雅赫维。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266。

以撒——据圣经传说，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古犹太人的族长和始祖之一，亚伯拉罕曾把他作为牺牲献给上帝。——617。

Z

札格纳特——古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之一。——289、693。

文献索引^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 1849 年 4 月 5—8, 11 日《新莱茵报》(科隆)第 264—267, 269 号(Lohnarbeit und Kapita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64, 5. April 1849; Nr. 265, 6. April 1849; Nr. 266, 7. April 1849; Nr. 267, 8. April 1849; Nr. 269, 11. April 1849)。——613, 655, 831。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 1852 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第 1 期(Der 18te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rsg. von J. Weydemeyer, New-York, 1852, H. 1)。——745。
- 《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载于 1853 年 2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86 号(Elections—Financial clouds—The Duchess of Sutherland and slave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86, 8. Februar 1853)。——789。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 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75, 372, 375, 378, 439, 564, 693。
-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 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 Oekonomie, H. 1, Berlin 1859)。——16, 23, 32, 75, 81, 83, 88, 90, 91, 95, 109, 117, 118, 132, 134, 138, 139, 195, 566, 661, 846。
- 《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3册(Das Kapital <Ökonomisches Manuskript 1863—1865>, Drittes Buch)。——405, 423, 425, 446, 474, 507, 549, 598。
- 《资本论(1868—1870年经济学手稿)》第2册(第2稿)(Das Kapital <Ökonomisches Manuskript 1868—1870>, Zweites Buch <Manuskript II>)。——597, 627。
-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1.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13, 14, 16, 692。
-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1.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2., verb. Aufl. Hamburg 1872)。——14, 692, 841, 845, 848。
-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译自德文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1872年圣彼得堡版(Капиталь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Т. 1. Кн. 1: Процесс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апитала С.-Петербургъ 1872)。——845。

弗·恩格斯

-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onomi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Paris, 1844, Lfg. 1—2)。——69, 149, 163, 681。
- 《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 卡尔·马克思编,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4期(Die englische Zehnstundenbil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Red. Von Karl Marx,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4)。——302, 314。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 Quellen, Leipzig 1845)。——245, 250, 261, 275, 416, 442, 444, 467, 517, 645, 70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1848])。——514,828。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巴思诺特,约·]《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Arbuthnot,J.:] An inquiry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price of provisions, and the size of farms. With remarks on population as affected thereby. To which are added, proposals for preventing future scarcity. By a farmer. London 1773)。——321,339,341,779,785。

阿庇安《罗马内战》——见阿庇安(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史》。

阿庇安(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史》,斐·L. J.迪勒尼乌斯译,1830年斯图加特版第7卷(Appian von Alexandria; Römische Geschichten. Übers. von F. L. J. Dillenius, Bd. 7. Stuttgart 1830)。——784。

阿丁顿,斯·《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考文垂第2版。引自理·普赖斯《评继承支付》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Addington, S.; An inquiry into the reasons for and against inclosing open-fields. 2. ed. Coventry 1772. Nach; R. Price; 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 6. ed. Vol. 2. London 1803)。——783。

阿什利,[安·]《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Ashley, [A.]: Ten hours' factory bill. The speech ...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riday, March 15th, 1844. London 1844)。——419,431。

《埃德蒙·波特先生》,载于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514号(Mr. Edmund Potter, in another part of our paper ...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514, 24 März 1863)。——306,611。

艾金,约·《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Aikin,

- J.: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thirty to forty miles round Manchester. London 1795)。——631,813,822。
- [安德森,亚·]《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两卷集)1764年伦敦版([Anderson, A.:]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time. Containing, an history of the great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an app. In 2 vol. London 1764)。——806,822。
- 安德森,詹·《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主要是为了发展苏格兰的农业、商业、工业和渔业。1775年给一位朋友的几封信》1777年爱丁堡版(Anderson, J.:Observations on the means of exciting a spirit of national industry; chiefly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agriculture, commerce, manufactures, and fisheries of Scotland. In a ser. of letters to a friend. Written in the year 1775. Edinburgh 1777)。——592,783,787。
- [安德森,詹·]《蜜蜂,或文学周报》1791年爱丁堡版第3卷([Anderson, J.:]The bee, or literary weekly intelligencer. Vol. 3. Edinburgh 1791)。——659。
- 奥姆斯特德,弗·罗·《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1856年纽约—伦敦版。引自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1862年伦敦版(Olmsted, F. L.:A journey in the seaboard slave states ... New York, London 1856. Nach:J. E. Cairnes: The slave power: its character, career, & probable designs; being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re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American contest. London 1862)。——199。
- 奥普戴克,乔·《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Opdyke, G.: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851)。——163。
- 奥日埃,马·《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Augier, M.: Du crédit public et de son histoire depuis les temps anciens jusqu' à nos jours. Paris 1842)。——824。
- 奥特斯,贾·《国民经济学》(六卷集),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彼·库斯托第编,]1804年米兰版第21卷(Ortes, G.: Della economia nazionale. Lib. 6.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Hrsg. P. Custodi.] Parte moderna, T. 21. Milano 1804)。——694。
- 奥特韦,约·哈·《1860年春季开庭期贝尔法斯特法庭庭长约·哈·奥特韦先生的判决》,载于《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60

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Otway, J. H.: Judgment of J. H. Otway, Chairman of County Sessions. —Belfast. Hilary Sessions, 1860. In: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 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0 ... London 1860)。——286。

B

巴顿, 约·《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Barton, J.: Observat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society, London 1817)。——677, 723。

巴尔本, 尼·《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Barbon, N.: A discourse concerning coining the new money lighter. In answer to Mr. Lock's considerations about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London 1696)。——23, 24, 27, 28, 124, 139, 140。

拜比吉, 查·《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2年伦敦版(Babbage, Ch.: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32)。——407。

拜比吉, 查·《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2年伦敦增订第2版(Babbage, Ch.: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2. ed., enl. London 1832)。——361, 364。

拜比吉, 查·《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 爱·比奥译自英文第3版, 1833年巴黎版(Babbage, Ch.: Traité sur l'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 Trad. de l'anglais sur la 3. éd., par Éd. Biot, Paris 1833)。——391, 422。

[拜耳斯, 约·巴·]《自由贸易的诡辩和通俗政治经济学》, 一个律师著, 1850年伦敦增订第7版([Byles, J. B.:] Sophisms of free-trade and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examined. By a barrister, 7. ed., with corr. and add. London 1850)。——279, 798。

贝恩斯, [约·]《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技术学校学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次演讲》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Baynes, [J.]; The cotton trade. Two lectures on the above subject, delivered b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Blackburn Literary, Scientific and Mechanics' Institution, Blackburn, London 1857. 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 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8 ... London 1858)。——404。

- 贝卡里亚,切·《社会经济原理》,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彼·库斯托第编,]1804年米兰版第11卷(Beccaria, C.: *Elementi di economia pubblica*.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Hrsg. P. Custodi.] *Parte moderna*. T. 11. Milano 1804)。——381。
- 贝克莱,乔·《提问者。几个提交公众讨论的问题》1750年伦敦版(Berkley [vielm. Berkeley], G.: *The querist, containing several queries, propos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ublic*. London 1750)。——349, 369。
- 贝勒斯,约·《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Bellers, J.: *Proposals for raising a college of industry of all useful trades and husbandry, with profit for the rich, a plentiful living for the poor, and a good education for youth*. London 1696)。——134, 339, 447, 516, 655。
- 贝勒斯,约·《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Bellers, J.: *Essays about the poor, manufactures, trade, plantations, and immorality ...* London 1699)。——126, 141, 506。
- [贝利,赛·]《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Bailey, S.:] *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measures, and causes of value; chiefly in reference to the writings of Mr. Ricardo and his followers. By the author of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pinions*. London 1825)。——55, 77, 562。
- [贝利,赛·]《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这种变动对国家工业和金钱契约的影响》,附关于股份银行的附录,1837年伦敦版([Bailey, S.:] *Money and its vicissitudes in value; as they affect national industry and pecuniary contracts; with a postscript on joint-stock banks*. London 1837)。——38, 93, 649。
- 比多, J. N.《大生产工具引起的工业技术和商业中的垄断》第2册《生产和销售的垄断》1828年巴黎版(Bidaut, J. N.: *Du monopole qui s'établit dans les arts industriels et le commerce, au moyen des grands appareils de fabrication*. Livr. 2: *Du monopole de la fabrication et de la vente*. Paris 1828)。——334。
- 比西·拉布丹伯爵,罗·《回忆录》(Bussy-Rabutin, R. comte de: *Mémoires*)。——817。
- 比泽,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及其内在联系,着重论述他著作中的哲学用语》1842年柏林版第2卷(Biese, F.: *Die Philosophie des Aristoteles, in ihrem in-*

- neren Zusammenhäng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philosophischen Sprachgebrauchs, aus dessen Schriften entwickelt. Bd. 2: Die besonderen Wissenschaften. Berlin 1842)。——425。
- 毕舍, 菲·约·本·/皮·塞·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 或 1789—1815 年的国民议会日志》(四十卷集)1834 年巴黎版第 10 卷(Buchez, Ph.-J.-B., P.-C. Roux[-Lavergne]: 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u Journ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depuis 1789 jusqu'en 1815. T. 1—40, T. 10. Paris 1834)。——802。
- 边沁, 耶·《惩罚和奖赏的理论》(两卷集), 埃·杜蒙编, 1826 年巴黎第 3 版第 2 卷(Bentham, J.: Théorie des peines et des récompenses, ouvrage extrait des manuscrits. Par Ét. Dumont, 3. éd. T. 1. 2. T. 2. Paris 1826)。——649。
- 波斯尔思韦特, 玛·《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两卷集)1759 年伦敦第 2 版(Postlethwayt, M.: Great Britain's commercial interest explained and improved ... 2. ed. Vol. 1. 2. London 1759)。——282。
- 波斯尔思韦特, 玛·《工商业大辞典》。引自[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 年伦敦版(Postlethwayt, M.: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 with large additions and improvements ... Nach: [J. Cunningham:] 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 ... London 1770)。——282。
- 波特尔, 埃·《产棉区与移民》, 载于 1863 年 3 月 24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4514 号(Potter, E.: The cotton districts and emigration.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514, 24. März 1863)。——609。
- 伯克, 埃·《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 原系 1795 年 11 月向最尊敬的威廉·皮特提出的报告》1800 年伦敦版(Burke, E.: 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 originally presented to the Right Hon. William Pitt, in the month of November, 1795. London 1800)。——209, 240, 336, 823—824。
- 伯克, 埃·《尊敬的埃德蒙·伯克就贝德福德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1796 年伦敦版(Burke, E.: A letter from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to a Noble Lord, on the attacks made upon him and his pension, in the House of Lords, by the Duke of Bedford and the Earl of Lauderdale, early in the present session of Parliament. London 1796)。——780。
- 柏拉图《理想国》, 载于《柏拉图全集》, 拜特尔、奥雷利、温克尔曼编, 1840 年苏黎

- 世版第 13 卷(Plato; De republica. In: Opera quae feruntur omnia. Recogn. Georgius Baiterus, Caspar Orellius, Augustus Guilielmus Winckelmannus. Vol. 13. Turici 1840)。——381。
- 布阿吉尔贝尔, [皮·]《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 载于《18 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 欧·德尔编, 1843 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 [P.]; 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de l'argent et des tributs, ... In: 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 de comm.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Paris 1843)。——136。
- 布坎南, 大·《大不列颠赋税和商业政策的研究》1844 年爱丁堡版(Buchanan, D.; Inquiry into the taxation and commercial policy of Great Britain;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principles of currency, and of exchangeable value, Edinburgh 1844)。——121。
- 布坎南, 大·《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 年爱丁堡版(Buchanan, D.; Observations on the subjects treated of in Dr. Smith's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nburgh 1814)。——787。
- 布莱基, 罗·《古今政治文献史》(两卷集)1855 年伦敦版第 2 卷(Blakey, 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ol. 1. 2. Vol. 2. London 1855)。——778。
- 布朗基, [日·阿·]《工业经济学教程》, 阿·布莱斯编注, 1838—1839 年巴黎版(Blanqui, [J.-A.]; Cours d'économie industrielle. Recueilli et ann. par Ad. Blaise. Paris 1838—1839)。——351。
- 布朗基, [日·阿·]《1848 年法国的工人阶级》, 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 1855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56 年伦敦版(Blanqui, [J.-A.];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 Pendant l'année 1848. 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 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5 ... London 1856)。——285。
- [布鲁克纳, 约·]《动物界论》1767 年莱顿版([Bruckner, J.]; Théorie du système animal. Leide 1767)。——658。
- 布鲁姆, 亨·《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两卷集)1803 年爱丁堡版第 2 卷(Brougham, H.; An inquiry into the colonial policy of the European powers. In 2 vol. Vol. 2. Edinburgh 1803)。——823。

布罗德赫斯特, 约·《政治经济学》1842 年伦敦版 (Broadhurst, J.: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2)。——46。

布洛克, 莫·《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 摘自 1872 年 7 月和 8 月《经济学家杂志》(巴黎) (Block, M.: Les théoriciens du socialisme en Allemagne. Extrait du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Numéros de juillet et d'août 1872). Paris 1872)。——845。

布瓦洛, 埃·《巴黎的技艺和手工业的规章, 订于 13 世纪, 并称为手工业手册》1837 年巴黎版 (Boileau, É.: Règlements sur les arts et métiers de Paris, rédigés au XIII^e siècle, et connus sous le nom du Livre des métiers ... Avec des notes et une introd. par G.-B. Depping. Paris 1837)。——513。

C

[柴尔德, 乔·]《论贸易, 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1689 年伦敦版 ([Child, J.:]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rade, and that in particular of the East-Indies. London 1689)。——84。

D

达尔文, 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 译自英文第 3 版, 附译者 H.G. 布龙的注释, 1863 年斯图加特增订第 2 版 (Darwin, Ch.: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ten im Thier und Pflanzen-Reich durch natürliche Züchtung, oder Erhaltung der vervollkommneten Rassen im Kampfe um's Daseyn. Nach der 3. engl. Aufl. ... aus dem Engl. übers. und mit Anm. vers. von H. G. Bronn, 2., verb. und sehr verm. Aufl. Stuttgart 1863)。——356。

达菲, 加·《维多利亚土地法指南》1862 年伦敦版 (Duffy, G.: Guide to the land law of Victoria. London 1862)。——840。

达弗林, 弗·《爱尔兰移民。致〈泰晤士报〉编辑》, 载于 1866 年 12 月 11 日、26 日和 1867 年 1 月 1 日、28 日《泰晤士报》第 25678、25691 号和第 25696、25719 号 (Dufferin, F.: Irish emigration.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5678, 11. Dezember 1866; Nr. 25691, 26. Dezember 1866; Nr. 25696, 1. Januar 1867; Nr. 25719, 28. Januar 1867)。——763。

《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 载于 1867 年 1 月 20 日《雷诺新闻》(伦敦) 第 858 号 (The wholesale starvation of the London poor. In: Reynolds's Newspaper.

- London, Nr. 858, 20, Januar 1867)。——718。
- 德·昆西,托·《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伦敦版(De Quincey, Th.: The logic of political economy. Edinburgh, London 1844)。——411。
-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安·路·克·]《意识形态原理》第4、5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Destutt de Tracy, [A.-L.-C.]: *Éléments d'idéologie*. Pt. 4. 5. *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 Paris 1826)。——74, 155, 162, 338, 341, 696。
-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安·路·克·]《政治经济学概论》1823年巴黎版(Destutt de Tracy, [A.-L.-C.]: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823)。——155。
- 邓宁,托·约·《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Dunning, Th. J.: *Trades' Unions and strikes; their philosophy and intention*. London 1860)。——581, 584, 585, 824。
- [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狄奥多尔)《史学丛书》(十九卷集), 尤·弗·武尔姆译, 1827—1829年斯图加特版第1、3卷([Diodorus] Diodor von Sicilien: *Historische Bibliothek*. Übers. von J. F. Wurm. Bd. 1—19. Bd. 1. 3. Stuttgart 1827—1829)。——241, 354, 383, 537。
- [迪尔克,查·温·]《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Dilke, Ch. W.]: *The source and remedy of the national difficulties, deduced from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 letter to Lord John Russell*. London 1821)。——623。
- [笛福,丹·]《论公共信贷》1710年伦敦版([Defoe, D.]: *An essay upon publick credit; being an enquiry ...* London 1710)。——136。
- 笛卡儿,勒·《正确运用理性与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论》1668年巴黎版(Descartes, R.: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pour bien conduire sa raison, et chercher la vérité dans les sciences*. Paris 1668)。——405—406。
- 杜尔哥, [安·罗·雅·]《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载于《杜尔哥全集》, 欧·德尔新编, 1844年巴黎版第1卷(Turgot, [A.-R.-J.]: *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In: *Œuvres*. Nouv. éd., ... par E. Daire. T. 1. Paris 1844)。——182, 326, 559。
- 杜克佩西奥,爱·《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生活资料、工资、人口》1855年布鲁塞尔版(Ducpétiaux, É.: *Budgets économiques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 Belgique, Subsistances, salaires, population, Bruxelles 1855)。——720—722。
- 杜能,约·亨·冯·《孤立国家的农业和国民经济》1863年罗斯托克版第2卷第2部分(Thünen, J. H. von; Der isoli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hschaft und Nationalökonomie, Th. 2, Abth. 2, Rostock 1863)。——663。
- 《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1738年]伦敦版(Some thoughts on the interest of money in general,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ublick funds, London [1738])。——30, 38。

E

- 恩索尔,乔·《各国人口的研究,驳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1818年伦敦版(Ensor, G.;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opulation of nations; containing a refutation of Mr. Malthus's Essay on population, London 1818)。——788。

F

- 范德林特,杰·《货币万能,或试论怎样才能使各阶层人民都有足够的货币》1734年伦敦版(Vanderlint, J.; Money answers all things; or, an essay to make money sufficiently plentiful amongst all ranks of people, and increase our foreign and domestick trade, London 1734)。——118, 125, 140, 282, 326, 344。
- 《纺纱厂主的案例》,载于1862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413号(The case of the millowner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413, 26, November 1862)。——210, 421。
- 《非掠夺地租》,载于1851年7月19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12期(Rent no robbery,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12, 19, Juli 1851)。——623。
- 菲尔登,约·《工厂制度的祸害,或略述工厂中残酷现象的根源》[1836年]伦敦版(Fielden, J.; The curse of the factory system; or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factory cruelties;... London [1836])。——420, 430, 821—822。
- 菲瑟灵,西·《实用国民经济手册》(三卷集)1860—1862年阿姆斯特丹版(Vissering, S.; Handboek van praktische staathuishoudkunde, Delen 1—3, Amsterdam 1860—1862)。——529。
- 费里埃,弗·路·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Ferrier, F.-L.-A.; Du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 Paris 1805)。——52。

- 丰特雷,安·路·《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1858年巴黎版。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Fonteret, A. L.: Hygiène physique et morale de l'ouvrier dans les grandes villes en général et dans la ville de Lyon en particulier, Paris 1858. Nach: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 London 1862)。——379。
- 《封建主义和鹿林》,载于1866年6月2日《经济学家》(伦敦)第1188期(Feudalism and deer forests.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1188, 2. Juni 1866)。——791。
- 弗格森,亚·《论市民社会史》1767年爱丁堡版(Ferguson, A.: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Edinburgh 1767)。——369。
- 弗格森,亚·《论市民社会史》(两卷集),贝尔吉埃先生译,1783年巴黎版第2卷(Ferguson, A.: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civile. Ouvrage trad. de l'anglais par Bergier, T. 1.2. T. 2. Paris 1783)。——377。
- [弗利特伍德,威·]《行情表,或六百年来英国的货币、谷物和其他商品的价格》1707年伦敦版([Fleetwood, W.:] Chronicon preciosum; or, an account of English money, the price of corn, and other commodities, for the last 600 years. London 1707)。——280。
- [弗利特伍德,威·]《行情表,或六百年来英国的金银货币、谷物和其他商品的价格》1745年伦敦版([Fleetwood, W.:] Chronicon preciosum; or, an account of English gold and silver money; the price of corn and other commodities; and of stipends, salaries, wages, jointures, portions, day-labour, etc. in England, for six hundred years last past. London 1745)。——280。
- 福蒂斯丘,约·《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1537年伦敦版](Fortescue, J.: De laudibus legum Angliae. [London 1537])。——773。
- [福尔邦奈,弗·韦·德·]《商业学入门》1766年莱顿新版第2卷([Fornbonnais, F.-V. de:] Éléments du commerce. Nouv. éd. Pt. 2. Leyde 1766)。——85。
- 福塞特,亨·《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伦敦版(Fawcett, H.: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Cambridge, London 1865)。——589, 651, 702。

[福斯特,纳·]《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Forster, N.:] 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Pt. 1. 2. London 1767)。——282,447,538,782,783。

富拉顿,约·《论通货的调整。原理的分析,根据这些原理提出在某些固定的范围内限制英格兰银行和全国其他银行机构将来的贷款发行活动》1845年伦敦第2版(Fullarton, J.: 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 be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t is proposed to restrict, within certain fixed limits, the future issues on credi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of the other banking establishmen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2. ed. With corr. and add. London 1845)。——123,137,140。

富兰克林,本·《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于《富兰克林全集》,贾·斯帕克斯编,附注释和作者传记,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Franklin, B.: Positions to be examined, concerning national wealth. In: The Works. With notes and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J. Sparks. Vol.2. Boston 1836)。——163。

富兰克林,本·《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载于《富兰克林全集》(十卷集),贾·斯帕克斯编,附注释和作者传记,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Franklin, B.: 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In: The Works. With notes and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J. Sparks. Vol. 2. Boston 1836)。——73—74。

G

哥伦布,克·[《寄自牙买加的信》](Columbus, Ch.: [Brief aus Jamaika])。——126。

格莱斯顿,[威·]《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伦敦)第2219号(Gladstone,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pril 1863.] In: The Morning Star. London. Nr. 2219, 17. April 1863)。——700。

[格雷,约·]《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驳亚当·斯密博士等人的某些错误论点》1797年伦敦版([Gray, J.:]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llustrated, in opposition to some false doctrines of Dr. A. Smith, and others. London 1797)。——159。

[格雷格,罗·海·]《从工人健康和道德影响看工厂问题。“十小时工作日法

- 案”对英国及其他国家工业的影响》1837年伦敦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Greg, R. H.:] The factory question,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its effects on the health and morals of those employed in factories. And the „Ten Hours Bill“, in relation to its effects upon the manufactures of England, and those of foreign countries. London 1837. 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 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8 ... London 1849)。——302。
- 格雷古瓦, 昂·《布鲁塞尔轻罪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鲁塞尔版(Gregoir, H.: Les typographes devant le Tribunal correctionnel de Bruxelles, Bruxelles 1865)。——586。
- 格罗夫, 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 附《论连续性》, 1867年伦敦第5版(Grove, W. R.: 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 5. ed. Followed by a discourse on continuity. London 1867)。——552。
- 《各国的工业。工艺、机器和工厂的现况概述》1855年伦敦版第2卷(The industry of nations. A survey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arts, machines, and manufactures. Pt. 2. London 1855)。——359, 400。
- 《工厂法的作用》, 载于1848年4月15日《经济学家》(伦敦)第242期(The working of the factory act.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242, 15. April 1848)。——233。
- 《工业伙伴》, 载于1866年5月26日《旁观者》(Industrial partnership. In: The Spectator, London. 26. Mai 1866)。——345。
- 《公共经济概论, 或论流通手段、农业和工业》, 一位初级原理研究者著, 1833年卡莱尔版(Public economy concentrated; or, a connected view of currency,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By an enquirer into first principles, Carlisle 1833)。——412。
- 《关于济贫税和食物价格高昂给 T. C. 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 建议减税降价》, 萨福克一绅士著, 1795年伊普斯威奇版(A Letter to Sir T. C. Bunbury, Bart. on the poor rates, and the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With some proposals for reducing both. By a Suffolk gentleman, Ipswich 1795)。——779。
- 《国家的进步》, 载于1872年1月5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998期(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I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 London. Nr. 998, 5. Januar 1872)。——435。

H

- 哈勒,卡·路·冯·《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状况理论》(六卷集)1816年温特图尔版第1卷(Haller, C. L. von: *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 oder Theorie des natürlichgeselligen Zustands, der Chimäre des künstlich-bürgerlichen entgegengesetzt*, Bd. 1—6, Bd. 1, Winterthur 1816)。——405。
- 哈里斯,詹·《关于幸福的对话》,载于哈里斯《三篇论文》1772年伦敦修订第3版(Harris, J.: *Dialogue concerning happiness*. In: *Harris, Three treatises ... 3. ed., rev. and corr.* London 1772)。——381。
- 哈里逊,威·《英国概述》,载于《编年史》第1、2卷,拉·霍林舍德、威·哈里逊等第一次收集和发行,[1587年伦敦版](Harrison, W.: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Chronicles, first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by R. Holinshed, W. Harrison, and others.* [London 1587])。——774、794、804。
- 哈姆,威·《英国的农具和农业机器》1856年不伦瑞克增订第2版(Hamm, W.: *Die landwirtschaftlichen Geräte und Maschinen Englands. Ein Handbuch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Mechanik und Maschinenkunde, mit einer Schilderung der britischen Agricultur. 2., gänzl. umgearb. und bed. verm. Aufl.* Braunschweig 1856)。——530。
- 哈索尔,阿·希·《揭穿了的掺假行为,或鉴别掺假食物和药品的通俗指南》1861年伦敦第2版(Hassall, A. H.: *Adulterations detected or plain instructions for the discovery of frauds in food and medicine. 2. ed.* London 1861)。——175、255。
- 汉特,亨·朱·《关于英格兰某些农业区婴儿死亡率过高的报告》(Hunter, H. J.: *Report on the excessive mortality of infants in some rural districts of England*)。——415。
- 豪伊特,威·《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伦敦版(Howitt, W.: *Colonization and Christianity; 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natives by the Europeans in all their colonies.* London 1838)。——814。
- 赫顿,查·《数学教程》(两卷集)1804年伦敦增订第4版第2卷(Hutton, Ch.: *A*

- course of mathematics. 4. ed., enl. and corr. In 2 vol. Vol. 2. London 1804).
——387。
- 赫胥黎,托·亨·《初等生理学讲义》1866年伦敦版(Huxley, Th. H.: 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 London 1866)。——509。
-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爱·甘斯编,1840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 G. W. F.: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 Gans. 2. Aufl. Berlin 1840.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 Bd. 8))。——35, 168, 379。
-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1卷《客观逻辑》第1编《存在论》,莱·冯·亨宁编,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3卷)(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 1. 2. Th. 1. Die objektive Logik. Abth. 1. Die Lehre vom Seyn. Hrsg. von L. von Henning. Berlin 1833.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 Bd. 3))。——321。
-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莱·冯·亨宁编,1840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Hegel, G. W. F.: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Th. 1; Die Logik. Hrsg. von L. von Henning. Berlin 1840.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 Bd. 6))。——181, 269。
- 华德,约·《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位初期的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城》1843年伦敦版。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Ward, J.: The borough of Stoke-upon-Trent, i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reign of Her Most Gracious Majesty Queen Victoria. London 1843. Nach: 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irst report ... London 1863)。——274。
- 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载于《霍布斯英文著作集》,威·莫尔斯沃思第一次收集和出版,1839年伦敦版第3卷(Hobbes, Th.: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In: Hobbes: The English works. Now first coll. and ed. by Sir W. Molesworth. Vol. 3. London 1839)。——170。
- 霍顿,约·《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进:关于谷物、家禽、煤、啤酒花、羊毛等的宝贵资料汇编》(四卷集)1727—1728年伦敦版(Houghton, J.: Husbandry and trade improv'd; being a collection of many valuable materials relating to corn, cattle,

- coals, hops, wool etc. ... Vol. 1—4, London 1727—1728)。——417。
- [霍恩, 乔·]《给法学博士亚当·斯密的一封信, 论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 一位称做基督徒的人著, 1784年牛津第4版([Horne, G.:] A letter to Adam Smith on the life, death, and philosophy of his friend David Hume, By one of the people called Christians, 4. ed. Oxford 1784)。——658。
- [霍吉斯金, 托·]《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 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 一个工人著, 1825年伦敦版([Hodgskin, Th.:]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 or, the unproductiveness of capital prov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combinations amongst journeymen. By a labourer. London 1825)。——370, 608。
- [霍吉斯金, 托·]《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Hodgskin, Th.:]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ight of property contrasted. A ser. of letters, addressed without permission, to H. Brougham ... By the author of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 London 1832)。——813。
- 霍吉斯金, 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Hodgskin, Th.:]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 London 1827)。——353, 367, 563。
- 霍林舍德, 拉·《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等的编年史》(三卷集), 约·胡克出版, 1587年伦敦第2版第1卷(Holinshed, R.: The firste volume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e, Scotlande, and Irelande, ... Faithfully gathered and set forth. The laste volume ... conteyning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e from William the Conquerour untill this present tyme. Publ. by J. Hooker, 2. ed. Vol. 1—3. London 1587)。第1版1577年出版。——774。
- 霍林舍德, 拉·《英国概述》——见哈里逊, 威·《英国概述》。
- 霍纳, 伦·《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察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议》, 载于《工厂法》, 根据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 [1859年伦敦版](Horner, L.: Suggestions for amending the factory acts to enable the inspectors to prevent illegal working, now become very prevalent. In: Factories regulation act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9. August 1859. [London 1859])。——246, 306。
- 霍纳, 伦·《霍纳先生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1837年5月23日于利兹》, 载于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

(Horner, L.; Letter from Mr. Horner to Mr. Senior. Leeds, May 23, 1837. In: Senior, N. W.;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 London 1837)。——228。

霍普金斯,托·《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 and 人口的影响。兼论影响各国劳动阶级状况的原因》1828年伦敦版(Hopkins, Th.; On rent of land, and its influence on subsistence and population;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operating causes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various countries. London 1828)。——234。

J

《机械搅炼》,载于1874年6月12日《工程学》(伦敦)第17卷第441期(Mechanical puddling. In: The Engineering. London, Vol. 17, Nr. 441, 12. Juni 1874)。——664。

吉斯伯恩,托·《论大不列颠社会上层和中层阶级人们的义务》(两卷集)1795年伦敦修订第2版第2卷(Gisborne, Th.; An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men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of society in Great Britain, 2. ed., corr. In 2 vol. Vol. 2. London 1795)。——822。

季别尔,尼·[伊·]《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Зибель, Н. [И.]; Теорія цінности и капітала Д. Рикардо в зв'язи зь позднїйшими Доповненнями и раз'ясненнями. Опыт критико-економічного изслїдованія. Київ 1871)。——845。

加尔涅,热·《译者注释》——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五卷集),热·加尔涅的新译本。

[加尔涅,热·]《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1796年巴黎版([Garnier, G.]; Abrégé élémentair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796)。——582。

加利阿尼,斐·《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 [彼·库斯托第编,]1803年米兰版第3、4卷(Galiani, F.; Della moneta.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Hrsg. P. Custodi.] Parte moderna. T. 3. 4. Milano 1803)。——67, 83, 85, 94, 151, 157, 328, 690。

加尼耳,沙·《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和其中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学说》(两卷集)1821年巴黎第2版(Ganilh, Ch.; Des systèmes d'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valeur comparative de leurs doctrines, et de celle qui paraît la plus favorable aux progrès de la richesse. 2. éd. T. 1. 2. Paris

1821)。——52、174、170。

加尼耳,沙·《政治经济学理论》(两卷集)1815年巴黎版(Ganilh, Ch.: La théori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fondée sur les faits résultans des statistiques de la France et de l'Angleterre. T. 1, 2. Paris 1815)。——182。

加斯科尔,彼·《英国的工业人口,他们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状况以及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附童工劳动调查》1833年伦敦版(Gaskell, P.: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 its moral, 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the change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the use of steam machinery; with an examination of infant labour. London 1833)。——456、466。

杰科布,威·《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赛·惠特布雷德的一封信》1815年伦敦版(Jacob, W.: A letter to S. Whitbread, being a sequel to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required by British agriculture;... London 1815)。——223。

居利希,古·冯·《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五卷集)1830年耶拿版第1、2卷(Gulich, G. von: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k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 Bd. 1—5. Bd. 1, 2. Jena 1830)。——842。

居维叶,〔若·〕《论地球表面的巨变》,赫弗编,1863年巴黎版(Cuvier,〔G.〕: Discours sur les révolutions du globe avec des notes et un appendice d'après les travaux récents de MM. de Humboldt, Flourens, Lyell, Lindley, etc. Réd. par Hoefler. Paris 1863)。——538。

K

卡尔利,乔·里·《注释》——见彼·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

卡莱尔,托·《(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特)》载于1863年8月《麦克米伦杂志》(伦敦—剑桥)第8卷第46期(Carlyle, Th.: (The American Iliad in a nutshell.) In: Macmillan's Magazine. London, Cambridge. Vol. 8. Nr. 46, August 1863)。——262。

卡泽诺夫,约·《序言、注释和补充评论》——见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53年伦敦新版。

〔卡泽诺夫,约·〕《政治经济学大纲。略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1832年伦敦版〔Cazenove, J.:〕 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 plan and short view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

- sumption of wealth;... London 1832)。——200,331,548。
- 凯尔恩斯,约·埃·《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试论涉及美国冲突的实际争论问题》1862年伦敦版(Cairnes, J. E.: *The slave power: its character, career, & probable designs; being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re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American contest.* London 1862)。——199,274,346。
- 凯里,亨·查·《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除的办法》1853年费城版(Carey, H. Ch.: *The slav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 why it exists, 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 Philadelphia 1853)。——789,810。
- 凯里,亨·查·《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口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伦敦版(Carey, H. Ch.: *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 London 1835)。——594。
- 凯特勒,阿·《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首次译成英文,1842年爱丁堡版(Quételet, A.: *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 Now first transl. into English. Edinburgh 1842)。——336。
- 坎伯尔,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年伦敦版(Campbell, G.: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To which is prefixed, some account of the natives and native institutions.* London 1852)。——373。
- 康替龙,菲·《关于工商业、货币、金银、银行和外汇的分析。主要选自一位已故的极有才能的绅士的手稿,适应我国商业的目前情况》1759年伦敦版(Cantillon, Ph.: *The analysis of trade, commerce, coin, bullion, banks and foreign exchanges. Where in the true principles of this useful knowledge are fully but briefly laid down and explained, to give a clear idea of their happy consequences to society, when well regulated. Taken chiefly from a manuscript of a very ingenious gentleman [d. i. vermutl. Richard Cantillon] deceas' d, and adapted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ur trade and commerce.* London 1759)。——586。
- [康替龙,理·]《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译自英文,1755年伦敦版([Cantillon, R.:]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Trad. de l'anglais.* Londres 1755)。——586。
- [康替龙,理·]《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译自英文,载于《政论集》1756年阿姆斯特

- 特丹版第3卷([Cantillon, R.:]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Trad. de l'anglais. In: *Discours politiques*. T. 3. Amsterdam 1756)。——586。
- 考[夫曼],伊·[伊·]《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评:]《资本论》1872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载于1872年《欧洲通报》(圣彼得堡)第3卷(К[ауфманъ],И.[И.]; *Точка зрѣнія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 у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Rezension zu:] *Капиталь*. Т. 1. Спб. 1872. In: *Вѣстникъ Европ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ъ. 1872. Т. 3)。——845。
- 柯贝特,托·《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解释》(两卷集)1841年伦敦版(Corbet, Th.: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modes of the wealth of individuals; or the principles of trade and speculation explained*. Pt. 1, 2. London 1841)。——147, 624。
- 科贝特,威·《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说明这次事件怎样使这两国的基本人民群众贫困和堕落。给一切明智的和公正的英国人的信》1824年伦敦版(Cobbett, W.: *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Ireland. Showing how that event has impoverished and degraded the main body of the people in those countries. In a series of letters, addressed to all sensible and just Englishmen*. London 1824)。——777。
- 科尔邦,昂·《论职业教育》1860年巴黎第2版(Corbon, A.: *De l'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 2. éd. Paris 1860)。——515。
- 科兰,[让·吉·]《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三卷集)1856—1857年巴黎版第1, 3卷(Colins, [J.-G.]; *L'économie politique. Source des révolutions et des utopies prétendues socialistes*. T. 1—3. T. 1. 3. Paris 1856—1857)。——655, 745, 838。
- [克拉克,乔·]《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萨默塞特郡大陪审团的陈述。敬呈议会》[1685年版]([Clarke, G.:] *The case of our English wool, and the manufacture there of truly stated ... As also the presentment of the Grand Jury of the county of Sommerset thereon. Humbly offered to the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 o. O. [1685])。——258。
- [克莱门特,西·]《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一个商人著,1695年伦敦版([Clement, S.:] *A discourse of general notions of money, trade, and exchanges, as they stand in relation each to other*. By a merchant. London 1695)。——84。

- 克里德,赫·/瓦·威廉斯《外国与大不列颠工厂的竞争。致(泰晤士报)编辑》,载于1866年12月11、15、24、27、31日和1867年1月1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5678、25682、25689、25692、25695和25708号(Creed, H., W. Williams; Foreign competition with British manufacture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5678, 11. Dezember 1866; Nr. 25682, 15. Dezember 1866; Nr. 25689, 24. Dezember 1866; Nr. 25692, 27. Dezember 1866; Nr. 25695, 31. Dezember 1866; Nr. 25708, 15. Januar 1867)。——638。
- [肯宁安,约·]《论赋税。赋税对我国工厂中的劳动价格的影响。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1765年伦敦版([Cunningham, J.] Considerations on taxes, as they are supposed to affect the price of labour in our manufactories. In a letter to a friend. London 1765)。——282。
- [肯宁安,约·]《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对我国工厂中的劳动价格的影响》1770年伦敦版([Cunningham, J.] 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 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axes, as they are supposed to affect the price of labour in our manufactories; together with some interesting reflec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our trade to America. London 1770)。——236、238、282—284、384、573、638、656、682、795。
- 肯特,纳·《奉告土地所有者先生们》1776年伦敦版(Kent, N.: Hints to gentlemen of landed property. London 1776)。——783。
- 孔德,沙·《立法论,或谈谈使人民繁荣、衰落或停滞不前的一般规律》1837年布鲁塞尔修订第3版(Comte, Ch.: Traité de législation ou exposition des lois générales, suivant lesquelles les peuples prospèrent, dépérissent, ou restent stationnaires, 3. éd., rev. et corr. Bruxelles 1837)。——814。
- 孔狄亚克, [埃·博·]《商业和政府》,载于《政治经济学文集》,附欧·德尔和古·莫利纳里的注释,1847年巴黎版第1卷(Condillac, [É. B.]: 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 In: Mélanges d'économie politiqu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 de comm.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et G. de Molinari. Pt. 1. Paris 1847)。——157。
- 库尔塞尔-塞讷伊,让·古·《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1857年巴黎增订第2版(Courcelle-Seneuil, J.-G.: Traité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es entreprises industrielles, commerciales et agricoles ou manuel des affaires, 2. éd., rev. et augm. Paris 1857)。——237、635。

魁奈,弗·《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 F.: 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et sur les travaux des artisans.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t. 1. Paris 1846)。——103, 333。

魁奈,弗·《经济表分析》,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 F.: 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t. 1. Paris 1846)。——627。

L

拉博尔德,亚·德·《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同精神》1818年巴黎版(Laborde, A. de: De l'esprit d'association dans tous les intérêts de la communauté, ou essai sur le complément du bien-être et de la richesse en France par le complément des institutions. Paris 1818)。——558。

拉弗尔斯,托·斯·《爪哇史》(两卷集)1817年伦敦版(Raffles, Th. S.: The history of Java. With a map and plates. In 2 vol. London 1817)。——374, 814。

拉马志尼,贝·《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00年摩地那版。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Ramazzini, B.: De morbis artificum diatriba. Mutinae 1700. Nach: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 London 1862)。——379。

拉马志尼,贝·《论手工业者的疾病》,译自拉丁文,1777年巴黎版(Ramazzini, B.: Essai sur les maladies des artisans. Trad. du latin. Paris 1777)。——379。

拉马志尼,贝·《论手工业者的疾病》,载于《医学百科全书》第7部分。古典作家》1841年巴黎版。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Ramazzini, B.: Essai sur les maladies des artisans. In: Encyclopédie des sciences médicales; ou traité général, méthodique et complet des diverses branches de l'art du guérir. 7. div. Auteurs classiques. Paris 1841. Nach: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 London 1862)。——379。
- 拉姆福德伯爵,本·[汤·]《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三卷集)1796—1802年伦敦版(Rumford, B. [T.], Count of; Essays,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philosophical. Vol. 1—3. London 1796—1802)。——639。
-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伦敦版(Ramsay, G.: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dinburgh, London 1836)。——160、164、329、535、601、678。
- 拉萨尔,斐·《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两卷集)1858年柏林版第1卷(Lassalle, F.: 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Nach einer neuen Sammlung seiner Bruchstücke und der Zeugnisse der Alten dargestellt. Bd. 1. 2. Bd. 1. Berlin 1858)。——100。
- 拉萨尔,斐·《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Lassalle, F.: 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16。
- 莱特,托·《论小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1795年伦敦版(Wright, Th.: A short address to the public on the monopoly of small farms, a great cause of the present scarcity and dearness of provisions. With the plan of an institution to remedy the evil; and for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small farms throughout the Kingdom. London 1795)。——782。
- 莱维,莱·《论鹿林和高地农业对食物供应的关系》,载于1866年3月23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15卷(Levi, L.: On deer forests and Highland agriculture in relation to the supply of food. In: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and on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 London. 23. März 1866)。——790—791。
- 莱文斯顿,皮·《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Ravenstone, P.: Thoughts on the funding system, and its effects. London 1824)。——450、535。
- 赖希,爱·《论人类的退化,退化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68年埃朗根第2版(Reich, E.: Über die Entartung des Menschen, ihre Ursachen und Verhütung. 2. Aufl. Erlangen 1868)。——379。
- [兰盖,西·尼·昂·]《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2卷([Linguet, S.-N. H.:] Théorie des loix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 la société. T. 1. 2. Londres 1767)。——238, 318。
- 兰格, 赛·《国家的贫困, 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Laing, S.: National distress; its causes and remedies. London 1844)。——200, 690, 707, 725。
- 朗切洛蒂, 塞·《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1636年威尼斯版第2部。引自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第1卷(Lancellotti, S.; L'Hoggi di overo gl'ingegni non inferiori a'passati. Pt. 2. Venetia 1636. Nach; J. Beckmann; Bey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 2., verb. Ausg. Bd. 1. Leipzig 1786)。——447。
- 《劳动与工资。过劳但少得的铁路员工》, 载于1866年2月4日《雷诺新闻》(伦敦)第808号(Labour and wages. Overworked and underpaid railway servants. In; Reynolds's Newspaper. London. Nr. 808. 4. Februar 1866)。——260。
- 勒特罗纳, 吉·弗·《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1777年》, 载于《重农学派》, 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 1846年巴黎版第2部(Le Trosne, G. F.; De l'intérêt social par rapport à la valeur, à la circulation, à l'industrie et au commerce intérieur et extérieur. 1777.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t. 2. Paris 1846)。——27, 30, 85, 96, 106, 111, 114, 140, 156, 157, 159, 162, 213。
- 雷尼奥, 埃·《多瑙河两公国政治社会史》1855年巴黎版(Regnault, E.; Histoire politique et sociale des principautés danubiennes. Paris 1855)。——244。
- 李比希, 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两卷集)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第1卷(Liebig, J.;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7. Aufl. In 2 Th. Th. 1. Braunschweig 1862)。——244, 532, 607。
- 李比希, 尤·《农业的理论与实践》1856年不伦瑞克版(Liebig, J.; Ueber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 Landwirthschaft. Braunschweig 1856)。——341。
-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166, 190, 234, 404, 408, 409, 450, 452, 459, 608, 625, 677。
- 里德, 乔·《面包业的历史》1848年伦敦版。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Read, G.;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read

- baking trade,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1848.
- Nach: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 London 1862)。——257, 258。
- 理查森, [本·]《劳动与过度劳动》, 载于 1863 年 7 月 18 日《社会科学评论》第 2 卷第 58 期(Richardson, [B.]: Work and overwork. In: The Social Science Review. London. Vol. 2. Nr. 58, 18. Juli 1863)。——263。
- 卢[-拉维涅], 皮·塞·——见毕舍, 菲·约·本·皮·塞·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
- 卢梭, 让·雅·《论政治经济学》1760 年日内瓦新版(Rousseau, J. J.; Discour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Nouv. éd. Genève 1760)。——807。
- 鲁瓦尔·德卡尔, 皮·玛·《论伪造圣物》1856 年巴黎版(Rouard de Card, P. M.; De la falsification des substances sacramentelles. Paris 1856)。——255。
- 路德, 马·《给牧师们的谕示: 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 年维滕贝格版(Luther, M.; An die Pfarrherrn wider den Wucher zu predigen. Vermanung. Wittenberg 1540)。——194, 629。
- 《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90 年伦敦版(A discourse of the necessity of encouraging mechanick industry. London 1690)。——281。
- 《论工会》1834 年伦敦新版(On combinations of trades. New ed. London 1834)。——589。
- 《论谷物法》1815 年伦敦版(Considerations upon the Corn Bill; suggested by a recent declaration from high authority. London 1815)。——587。
- 《论国民政治经济学, 或论各国间的交往对各国财富的影响》1821 年伦敦版(An essay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 or, a view of the intercourse of countries, as influencing their wealth. London 1821)。——203, 320。
-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 从这一原理所得出的结论是: 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1821 年伦敦版(An inquiry into those principles, respecting the nature of demand and the necessity of consumption, lately advocated by Mr. Malthus, from which it is concluded, that tax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unproductive consumers can be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wealth. London 1821)。——161, 174, 462, 633, 646。

- 《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1767年]伦敦版(Two letters on the flour trade, and dearness of corn ... By a person in business, London [1767])。——782。
- 《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给一位朋友的几封信》[1753年伦敦版](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aking off the bounty on corn exported. In some letters to a friend. [London 1753])。——333。
- 《论信贷和破产法》1707年伦敦版(An essay on credit and the Bankrupt Act. 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Escape-Act. London 1707)。——130。
- 罗·约翰《论货币和贸易》，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年巴黎版(Law, Jean [John]; Considérations sur le numéraire et le commerce. Mémoires et lettres sur les banques, opuscules divers.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 de comm.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Paris 1843)。——85。
- 罗伯茨·乔·《过去若干世纪英国南部各郡人民的社会史》1856年伦敦版(Roberts, G.;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southern counties of England in past centuries; illustrated in regard to their habits, municipal bye-laws, civil progress, etc. London 1856)。——777。
- [罗伯逊·乔·]《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1830年伦敦版([Robertson, G.:]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which are illustrated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the present national distress; with appropriate remedies. London 1830)。——554。
- 罗哈奇, R. H.《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Rohatzsch, R. H.; Die Krankheiten, welche verschiedenen Ständen, Altern und Geschlechtern eigenthümlich sind. Bd. 1—6. Ulm 1840. Nach: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 London 1862)。——379。
- 罗杰斯, 詹·埃·索·《从召开牛津议会(1259)到大陆战争爆发(1793)时期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两卷集)1866年牛津版(Rogers, J. E. Th.;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from the year after the Oxford Parliament (1259)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war (1793). Compiled entirely

- from original and contemporaneous records, Vol. 1, 2, Oxford 1866)。——722, 729, 779。
- 罗西, 佩·《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包括巴黎版的两卷内容)》, 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Rossi, P.: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Année 1836—1837 <Cont. les deux vol. de l'éd. de Paris>. In: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3)。——173。
- 罗雪尔, 威·《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Roscher, W.: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3., verm. und verb. Aufl. Stuttgart, Augsburg 1858. (Roscher: 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Bd. 1))。——87, 158, 209, 220。
- [罗伊, 亨·]《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版([Roy, H.:] The theory of the exchanges. The bank charter act of 1844. The abuse of the metallic principle to depreciation. London 1864)。——134, 701。
-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 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 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 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Rodbertus-Jagetzow [, J. K.]: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ef: 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 Berlin 1851)。——557。
- 洛克, 约·《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 载于《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77年伦敦第8版第2卷(Locke, J.: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1691>. In: The works, 8. ed. In 4 vol. Vol. 2. London 1777)。——24, 85, 119。

M

- 马蒂诺, 哈·《政治经济学解说》(九卷集)第3卷第7例《曼彻斯特的罢工》1832年伦敦版(Martineau, H.: 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9 vol. Vol. 3. No. 7: A Manchester strike. A tale. London 1832)。——681。
- [马丁, 亨·]《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Martyn, H.:] The advantages of the East-India trade to England. London 1720)。——332, 353, 358, 360, 363, 381, 447, 536。
- 马丁, 罗·蒙·《与大不列颠联合前后的爱尔兰》1848年伦敦第3版(Martin, R.

- M.: Ireland before and after the union with Great Britain. 3. ed. London 1848)。——169。
- 马尔萨斯,托·罗·《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Malthus, Th. R.: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 and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it is regulated. London 1815)。——326, 554, 587。
-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观点》1798年伦敦版([Malthus, Th.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London 1798)。——367, 657。
-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附约·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充评论,1853年伦敦新版(Malthus, Th. R.: 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preceded by an inquiry into the rules which ought to guide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the definition and use of their terms; with remarks on the deviation from these rules in their writings. A new ed., with a pref., notes, and suppl. remarks by J. Cazenove. London 1853)。——602, 608, 614, 634。
-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札记作了大量补充,1836年伦敦第2版(Malthus, Th. 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with a view to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2. ed., with considerable add. from the author's own manuscript and an orig. memoir. London 1836)。——216, 614, 623, 625, 632, 681。
- [马西,约·]《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Massie, J.:] An essay on the governing causes of 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wherein the sentiments of Sir William Petty and Mr. Locke, on that head, are considered. London 1750)。——539。
- 麦考莱,托·巴·《詹姆斯二世登极以来的英国史》1854年伦敦第10版第1卷(Macaulay, Th. B.: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10. ed. Vol. 1. London 1854)。——281, 772。
- 麦考莱,托·巴·《詹姆斯二世登极以来的英国史》第1卷。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Macaulay, Th. B.: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Vol. 1.

- 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 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5 ... London 1856)。——281。
- 麦克库洛赫,约·拉·《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1847年伦敦增订新版(MacCulloch, J. R.; A dictionary,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navigation, Ill, with maps and plans. A new ed., corr., enl., and improved; with a suppl. London 1847)。——148。
- 麦克库洛赫,约·拉·《政治经济学文献。这门科学的分类书目。附史评、评注和作者介绍》1845年伦敦版(MacCulloch, J. R.;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select publications in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hat science, with historical,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notices. London 1845)。——139, 783。
- 麦克库洛赫,约·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述》1825年爱丁堡—伦敦版(MacCulloch, J. R.;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a sketch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science. Edinburgh, London 1825)。——150, 464。
- 麦克库洛赫,约·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述》1830年伦敦增订第2版(MacCulloch, J. R.;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a sketch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science. 2, ed., corr. and greatly enl. London 1830)。——150, 464。
- 麦克拉伦,詹·《通货简史。略论最优秀的作家对该问题的看法》1858年伦敦版(Maclaren, J.;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urrency; comprising a brief review of the opinions of the most eminent writers on the subject. London 1858)。——92。
- 麦克劳德,亨·邓·《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通货、价格、信用和汇兑的基本原理》(两卷集)1855年伦敦版第1卷(Macleod, H. 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with the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currency; prices; credit; and exchanges. Vol. 1, 2. Vol. 1. London 1855)。——151。
- 曼,托·《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国对外贸易差额是衡量我国财富的尺度》,作者之子约·曼为公共利益出版,1669年伦敦版(Mun, Th.;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Or, the balance of our forraign trade is the rule of our treasure. Now publ. for the common good by his son J. Mun. London 1669)。——538。

- [曼德维尔, 贝·]《抱怨的蜂巢, 或骗子变做老实人》1705年伦敦版 ([Mandeville, B.]: The grumbling hive; or, knaves turn'd honest. London 1705)。——370。
- [曼德维尔, 贝·]《蜜蜂的寓言, 或个人劣行, 公共利益》1714年伦敦版 ([Mandeville, B.]: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London 1714)。——370。
- [曼德维尔, 贝·]《蜜蜂的寓言, 或个人劣行, 公共利益》1728年伦敦第5版 ([Mandeville, B.]: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5. ed. London 1728)。——656。
- 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 [保·皮·]《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两卷集) 1767年伦敦版, 载于《重农学派》, 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 1846年巴黎版第2部 (Mercier de la Rivière, [P.-P.]: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T. 1. 2. Londres 1767.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t. 2. Paris 1846)。——104, 105, 125, 144, 147, 156, 160, 193。
- 梅里韦尔, 赫·《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1842年伦敦版第1、2卷 (Merivale, H.: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1839, 1840, and 1841. Vol. 1. 2. London 1841—1842)。——681, 836。
- 蒙森, 泰·《罗马史》(三卷集) 1856—1857年柏林第2版 (Mommsen, Th.: Römische Geschichte. 2. Aufl. Bd. 1—3. Berlin 1856—1857)。——167, 170。
- 蒙泰伊, 阿·亚·《关于各类历史手稿的研究》(两卷集) 1835年巴黎版第1卷 (Monteil, A.-A.: Traité de matériaux manuscrits de divers genres d'histoire. T. 1. 2. T. 1. Paris 1835)。——805。
- 孟德斯鸠, [沙·]《论法的精神》1767年伦敦版(《孟德斯鸠全集》第2卷) (Montesquieu, [Ch.]: De l'esprit des loix. Nouv. éd., revue, corr., & considérablement augm. par l'auteur. Londres 1767. (Œuvres. T. 2))。——85, 118。
- 孟德斯鸠, [沙·]《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修订新版(《孟德斯鸠全集》第1、3卷) (Montesquieu, [Ch.]: De l'esprit des loix. Nouv. éd., revue, corr., & considérablement augm. par l'auteur. Londres 1769. (Œuvres. T. 1. 3))。——819。

- 米拉波, [奥·加·维·里·] 《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八卷集)1788年伦敦版第2、3、6卷(Mirabeau, [H.-G.-V. R.]; De la monarchie prussienne, sous Frédéric le Grand. Avec un app. cont. des recherches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s principales contrées de l'Allemagne. T. 1—8. T. 2. 3. 6. Londres 1788)。——772、773、792、808、820。
- 《棉荒》, 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544号(The cotton famine.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544, 28. April 1863)。——609。
- 摩尔顿, 约·查·《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 载于1859年12月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368期。引自1860年1月21日《经济学家》(伦敦)第18卷第856期, [标题:]《农业的进步和工资》(Morton, J. Ch.: On the forces used in agriculture. I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 London. Nr. 368, 9. Dezember 1859. Nach: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856, 21. Januar 1860. [U. d. T.:] Agricultural progress and wages)。——391。
- 摩尔顿, 约·查·《应用农学和理论农学百科全书》(两卷集)1855年格拉斯哥—爱丁堡—伦敦版第2卷(Morton, J. Ch.: A cyclopedia of agriculture, practical and scientific; in which the theory, the art, and the business of farming, are thoroughly and practically treated. By upwards of fifty of the most eminent practical and scientific men of the day. Vol. 2. Glasgow, Edinburgh, London 1855)。——584。
- 莫尔, 托·《乌托邦》, 1516年最初用拉丁文发表, 拉·鲁宾逊译成英文, 爱·阿伯编, 1869年伦敦版(More, Th.: Utopia. Originally printed in Latin, 1516. Transl. into English by R. Robinson ... Carefully ed. by E. Arber. London 1869)。——775、794。
- 莫利纳里, 古·德·《经济学概论》1846年巴黎版(Molinari, G. de: Études économiques. Paris 1846)。——442、635、836。
- 墨菲, 约·尼·《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年伦敦版(Murphy, J. N.: Ireland industrial, political, and social, London 1870)。——758。
- 穆勒, 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Mill, J. St.: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4)。——119、637。
- 穆勒, 约·斯·《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 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1843年伦敦版(Mill, J. St.: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

- ductive, 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n 2 vol. London 1843)。——626。
- 穆勒,约·斯·《证词,银行法报告》1857年版(Mill, J. St.; Evidence, reports on bankacts. o. O. 1857)。——129。
- 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2卷(Mill, J. 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In 2 vol. Vol. 2. London 1848)。——118, 386, 532, 651。
- 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Mill, J. 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In 2 vol. Vol. 2. London 1868)。——543。
-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Mill, J.;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1)。——151, 188, 367。
-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雅·泰·帕里佐译自英文,1823年巴黎版(Mill, J.; 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Trad. de l'anglais par. J. T. Parisot. Paris 1823)。——601, 605, 607。
- [穆勒,詹·]《殖民地》,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5、6版增补卷)1824年爱丁堡版。引自[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两卷集)1833年伦敦版第2卷([Mill, J.:] Colony. In: Supplement to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editions of th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dinburgh 1824. Nach: [E. G. Wakefield:] England and America. In 2 vol. Vol. 2. London 1833)。——200。

N

- 内克, [雅·]《论法国财政的管理》1784年巴黎版,载于《内克著作集》1786年洛桑版第2卷(Necker, [J.]; 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de la France. Paris 1784. In: Œuvres. T. 2. Lausanne 1786)。——624。
- 尼布尔,巴·格·《罗马史》1853年柏林修订版(Niebuhr, B. G.; Römische Geschichte. Berichtigte Ausg. in einem Bd. Berlin 1853)。——240。
- 纽马奇,威·——见图克,托·/威·纽马奇《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
- 纽曼,弗·威·《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Newman, F. W.;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51)。——780, 786。

- 纽曼, 赛·菲·《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纽约版(Newman, S. Ph.: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over, New York 1835)。——158, 210。
- 纽纳姆, 乔·路·《评向议会两院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谷物法的证词》1815年伦敦版(Newnham, G. L.: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before the committees of the two Houses of Parliament, on the corn laws. London 1815)。——640。
- 《农业的进步和工资》, 载于1860年1月21日《经济学家》(伦敦)第856期(Agricultural progress and wages.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856, 21. Januar 1860)。——685。
- 《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3月8日的质询》, 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6日刊印(Agricultural labourers (Ireland). Return to an order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8 March 1861.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6 February 1862)。——758。
- 《农业工人的工资》, (转引自《纪事晨报》,) 载于1845年3月29日《经济学家》(伦敦)第3卷第13期(Wages of agricultural labourers. (From the Morning Chronicle.)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Vol. 3, Nr. 13, 29. März 1845)。——726。
- 《农业工人与工联》, 载于1866年1月13日《工人辩护士报》(伦敦)第149号(Agricultural labourers and Trades' Unions. In: The Workman's Advocate. London. Nr. 149, 13. Januar 1866)。——259。
- [诺思, 达·]《贸易论: 主要是关于利息、硬币的铸造和损坏、货币量的扩大问题》1691年伦敦版([North, D.:] Discourses upon trade; principally directed to the cases of the interest, coynage, clipping, increase of money. London 1691)。——116, 120, 129, 406。

O

- 欧文, 罗·《评工业体系的影响, 并提出改进那些对健康和道德最有害的部门的意见》1817年伦敦第2版(Owen, R.: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with hint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ose parts of it which are most injurious to health and morals. 2. ed. London 1817)。——420。

P

- 帕里, 查·亨·《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

- 必要性》1816年伦敦版(Parry, Ch. H.: The question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existing corn laws, considered,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 the tenantry, the landholder, and the country. London 1816)。——639, 724。
- 帕尼尼, 乔·弗·《试论物品的合理价格、货币的合理价值以及罗马人的贸易》, 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文集·现代部分》, [彼·库斯托第编,] 1803年米兰版第2卷(Pagnini, G. F.: Saggio sopra il giusto pregio delle cose, la giusta valuta della moneta e sopra il commercio dei romani.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Hrsg. P. Custodi.] Parte moderna. T. 2. Milano 1803)。——85。
- [帕皮隆, 托·]《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1677年伦敦版([Papillon, Th.:] The East-India-trade a most profitable trade to the Kingdom. And best secured and improved in a company, and a joint-stock. Represented in a letter written upon the occasion of two letters lately published, insinuating the contrary. London 1677)。——84。
- 培根, 弗·《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 转载自怀·肯尼特《英国》1719年版, 载于约·弥尔顿《特洛伊、罗马、撒克逊统治下的不列颠》1870年伦敦版(Bacon, F.: The reign of Henry VII. Verbatim reprint from W. Kennet's England, ed. 1719. In: J. Milton; Britain under Trojan, Roman, Saxon rule. London 1870)。——776。
- 培根, 弗·《文明与道德论文集》, 引自理·普赖斯《评继承支付》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Bacon, F.: The essays or counsels, civil and moral. Nach: R. Price; 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 6. ed. Vol. 2. London 1803)。——775。
- 配第, 威·《爱尔兰的政治解剖。附〈献给英明人士〉》1691年伦敦版(Petty, W.: 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 To which is added Verbum sapienti. ... London 1691)。——137, 141, 280, 326。
- [配第, 威·]《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Petty, W.:]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 London 1667)。——86, 117, 658。
- 配第, 威·《货币略论。致哈利法克斯侯爵。1682年》1760年伦敦版(Petty, W.: 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 To the Lord Marquess of Halifax. Anno 1682. London 1760)。——95, 141。
- [平托, 伊·德·]《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Pinto, I.

- de:]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 Amsterdam 1771)。——148。
- 《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主要是评它同谷物贸易的关系》1815年伦敦版(*Remarks on the commercial policy of Great Britain, principally as it relates to the corn trade*. London 1815)。——587。
-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Observations on certain verbal disputes in political economy, particularly relating to value, and to demand and supply*. London 1821)。——77、207、562、637。
-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两卷集)1846年巴黎版第1卷(*Proudhon, P.-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1. 2. T. 1. Paris 1846)。——540。
- 普赖斯,理·《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两卷集),威·摩尔根编,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Price, R.: 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on schemes for providing annuities for widows, and for persons in old age; 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s of assurances on lives; and on the national debt*. 6. ed. By W. Morgan. Vol. 1. 2. Vol. 2. London 1803)。——723、783。

Q

- 琼斯,理·《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Jones, R.: Text-book of lectur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 ... Hertford 1852*)。——321、334、348、603、623、635。
- 琼斯,理·《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年伦敦版(*Jones, R.: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on the sources of taxation*. London 1831)。——342。
- 琼斯,理·《1833年2月27日在伦敦国王学院讲述的政治经济学绪论。附工资讲座大纲》1833年伦敦版(*Jones, R.: An introductory lecture on political economy, delivered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27th February, 1833. To which is added a syllabu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the wages of labor*. London 1833)。——678。
- 《圈围荒地的后果和当前肉价高昂的原因的政治上的分析》1785年霍尔本版(*A political enquiry into the consequences of enclosing waste lands, and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butchers meat. Being the sentiments of a society of farmers in-shire. Holborn 1785)。——781。

R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 [埃·]《对自然哲学的、综合的、历史的和生理的认识》1838年巴黎版(Geoffroy Saint-Hilaire, [É.]; Notions synthétiques, historiques et physiologiques de philosophie naturelle. Paris 1838)。——806。

S

萨德勒, 迈·托·《爱尔兰, 它的灾难及其补救办法》1829年伦敦第2版(Sadler, M. Th.; Ireland; its evils, and their remedies; being a refutation of the errors of the emigration committee and others, touching that country. To which is prefixed, a synopsis of an original treatise about to be published on the law of population; developing the real principle on which it is universally regulated. 2. ed. London 1829)。——756—757。

萨德勒, 迈·托·《人口的规律》(两卷集) 1830年伦敦版第2卷(Sadler, M. Th.; The law of population; A treatise, in six books; in disproof of the superfluency of human beings, and developing the real principle of their increase. In 2 vol. Vol. 2. London 1830)。——343, 756。

《萨默斯, 哈利法克斯、牛津、秘书弗农等人给什鲁斯伯里公爵的原信中所描绘的威廉国王、桑德兰、萨默斯等人的性格和行为》(The character and behaviour of King William, Sunderland, Somers etc. as represented in original letters to the Duke of Shrewsbury, from Somers, Halifax, Oxford, secretary Vernon etc.)。——780。

萨默斯, 罗·《苏格兰高地来信, 或 1847 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版(Somers, R.; Letters from the Highlands; or, the famine of 1847. London, Edinburgh, Glasgow 1848)。——790。

萨伊, 让·巴·《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 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Say, J.-B.; Lettres à M. Malthus, sur différens sujets d'économie politique, notamment sur les causes de la stagnation générale du commerce. Paris 1820)。——645, 646。

萨伊, 让·巴·《论政治经济学, 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1802

- 年巴黎版。引自威·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Say, J.-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Paris 1802. Nach: W. Roscher;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3., verm. und verb. Aufl. Stuttgart, Augsburg 1858. (Roscher; *System der Volkswirtschaft*. Bd. 1))。——209。
-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两卷集)1817年巴黎第3版(Say, J.-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3. éd. T.1. 2. Paris 1817)。——151, 162, 209。
-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两卷集), C.R. 普林塞普译自法文第4版, 1821年伦敦版(Say, J.-B.: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 from the 4. ed. of the French by C. R. Prinsep. In 2 vol. London 1821)。——209。
-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Sextus Empiricus; Adversus mathematicos*)。——381。
- 桑顿,威·托·《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Thornton, W. Th.: *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y; or, an inquiry into the extent and causes of the distress prevailing among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the British Islands, and into the means of remedying it*. London 1846)。——171, 277。
-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 恩·波波编, 1821年莱比锡版(Xenophon; *Cyropaedia*. Ed. E. Poppo. Lipsiae 1821)。——382。
- 沙乌,华·弗·《土地、植物和人》, H. 蔡泽在作者参与下译自丹麦文, 1854年莱比锡第2版(Schoww, J. F.: *Die Erde, die Pflanzen und der Mensch*. *Naturschilderungen*. Aus dem Dän. unter Mitw. des Verf. von H. Zeise ... 2. Aufl. Leipzig 1854)。——540。
- 舍尔比利埃,安·《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版(Cherbuliez, A.: *Richesse ou pauvreté. Exposition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e la distribution actuelle des richesses sociales*. Paris 1841)。——188, 622, 696。
- 舍伐利埃,阿·《食品、药品和商品伪造掺假词典》(两卷集)1850—1852年巴黎版(Chevallier, A.: *Dictionnaire des altérations et falsifications des substances alimentaires, médicamenteuses et commerciales avec l'indication des moyens de les reconnaître*. T. 1. 2. Paris 1850—1852)。——255。

-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四卷集)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1、2卷(Storch, 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T. 1—4. T. 1, 2. St. Pétersbourg 1815)。——174、376、627。
-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四卷集),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1823年巴黎版第1、3卷(Storch, 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 B. Say. T. 1—4. T. 1, 3. Paris 1823)。——366、375、695。
- 舒尔茨,威·《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Schulz, W.: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 Zürich, Winterthur 1843)。——387。
- 斯卡尔培克,弗·《社会财富的理论。附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两卷集)1839年巴黎第2版第1卷(Skarbek, F.: Théorie des richesses sociales. Suivie d'une bibliographi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2. éd. T. 1, 2. T. 1. Paris 1839)。——340、366。
- 斯克罗普,乔·波·《政治经济学原理》,阿·波特尔编,1841年纽约版(Scrope, G. P.: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deduced from the natural laws of social welfare, and applied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Britain. Ed. A. Potter. New York 1841)。——634。
- 斯密,亚·《道德情操论》1759年伦敦版(Smith, A.: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1759)。——659。
-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两卷集)1776年伦敦版第1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2 vol. Vol. 1. London 1776)。——117、367。
-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五卷集),热·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注释和评述,1802年巴黎版第1、5卷(Smith, A.: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rad. nouv., avec des notes et observations; par G. Garnier. T. 1—5. T. 1.5. Paris 1802)。——37、117、378、569、603、660、663、667。

-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三卷集),附注释和附录,大·布坎南编注,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With notes, and an add. vol., by D. Buchanan. In 3 vol. Vol. 1. Edinburgh 1814)。——787。
-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六卷集[可能是四卷集]),附《英国和美国》一书作者[爱·吉·韦克菲尔德]的评注,1835—1836年伦敦版第1—3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 commentary, by the author of „England and America“ [d. i. E. G. Wakefield]. In 6 [vielm. 4] vol. Vol. 1—3. London 1835—1836)。——37, 117, 370, 378, 563, 631。
- 斯[塔福德],威·《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1581年伦敦版(S[tafford], W.; A compendious or briefe examination of certayne ordinary complaints, of divers of our country men in these our dayes, etc. London 1581)。——804。
- 斯特赖普,约·《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宗教改革和国教运动以及英国教会中其他事件的编年史》1725年第2版(Strype, J.; Annals of the Reform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and other various occurrences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during Queen Elisabeth's happy reign. 2. ed. o. O. 1725)。——796。
- 斯特兰奇,威·《健康的七要素》1864年伦敦版。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Strange, W.; The seven sources of health. London 1864. Nach: 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orth report ... London 1865)。——264—265。
- 斯图亚特,杜·《政治经济学讲义》1855年爱丁堡版第1卷(《斯图亚特全集》,威·汉密尔顿编,第8卷)(Stewart, D.;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Edinburgh 1855. (The collected works. Ed. by W. Hamilton. Vol. 8))。——334, 359, 376, 512。
-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第1卷(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In 2 vol. Vol. 1. London 1767)。——367。
-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三卷集)1770年都柏林版第1、2卷(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 o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In 3 vol. Vol. 1.2. Dublin 1770)。——181、694—695、787。
- 斯图亚特, [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五卷集) 1789年巴黎版第1卷(Steuart, [J.]; 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ou essai sur la science de la police intérieure des nations libres. T. 1—5. T. 1. Paris 1789)。——346、449。
- 斯图亚特, 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 载于《斯图亚特著作集》(六卷集), 其子詹·斯图亚特汇编, 1805年伦敦版第1卷(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In: The Works, political, metaphysical, and chronological. Now first collect. by J. Steuart, his son, from his father's corr. copies, to which are subjoined anecdotes of the author. In 6 vol. Vol. 1. London 1805)。——146。

T

- 塔克特, 约·德·《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 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两卷集) 1846年伦敦版(Tuckett, J. D.; A history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including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 Vol. 1. 2. London 1846)。——378、777、810。
- 汤普森, 本·——见拉姆福德伯爵, 本·[汤·]《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
- 汤普森, 威·托·《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Thompson, W. Th.;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applied to the newly proposed system of voluntary equality of wealth. London 1824)。——377。
- [唐森, 约·]《论济贫法》, 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著(1786年), 1817年伦敦再版([Townsend, J.]; A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 By a well-wisher to mankind. 1786. Republished. London 1817)。——694。
- 唐森, 约·《西班牙游记。1786年和1787年》(三卷集) 1791年伦敦版(Townsend, J.; A journey through Spain in the years 1786 and 1787. In 3 vol. London 1791)。——694。
- 梯也尔, 路·阿·《财产论》1848年巴黎版(Thiers, L. A.; De la propriété. Paris 1848)。——464。

- 《通货论评述。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论政府干涉苏格兰现存银行制度的危险》，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年爱丁堡版（The currency theory reviewed; in a letter to the Scottish people on the menaced interference by government with the existing system of banking in Scotland. By a banker in England. Edinburgh 1845）。——135。
- 图克，托·威·纽马奇《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1856年》（两卷集），载于《价格史。1792年到现在》1857年伦敦版第5、6卷（Tooke, Th., W. Newmarc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In 2 vol.; forming the 5. and 6. vol. of the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792 to the present time. Vol. 5. 6. London 1857）。——306。
-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Torrens, R.; An 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with an app., in which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re applied to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is country. London 1821）。——160、186。
- 托伦斯，罗·《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Torrens, R.; On wages and combination. London 1834）。——422。
- 托伦斯，罗·《论谷物外销》1815年伦敦版（Torrens, R.; An essay on the external corn trade; containing an inquiry in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at important branch of traffic; an examination of the exceptions to which these principles are liable; and a comparative statement of the effects which restrictions on importation and free intercourse, are calculated to produce upon subsistence, agriculture, commerce, and revenue. London 1815）。——171。

W

- 瓦茨，约·《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Watts, J.; Trade societies and strikes; their good and evil influences on the members of Trades Unions, and on society at large. Machinery; its influences on work and wages, and cooperative societies, productive and distributiv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anchester [1865]）。——580、584。
- 瓦茨，约·《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科学原则述评，去伪存真》1842年曼彻斯特—伦敦版（Watts, J.; The facts and fic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being a re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science, separating the true from the

- false. Manchester, London 1842)。——580。
- 威德, 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Wade, J.: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with a popular exposition of th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past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industrious orders. Also an app. ... 3. ed. London 1835)。——249、280、662。
- 威尔克斯, 马·《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迈索尔历史初探》(三卷集)1810年伦敦版第1卷(Wilks, M.: Historical sketches of the South of India, in an attempt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Mysoor from the origin of the Hindoo Government of that state, to the extinction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y in 1799. Vol. 1—3. Vol. 1. London 1810)。——373。
- 威兰德, 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Wayland, F.: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1843)。——162、210—211。
- 威廉斯, 瓦·——见克里德, 赫·瓦·威廉斯《外国与大不列颠工厂的竞争》。
- 威斯特, 爱·《谷物价格和工资, 并论斯密博士、李嘉图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关于这些问题的学说》1826年伦敦版(West, E.: Price of corn and wages of labour, with observations upon Dr. Smith's, Mr. Ricardo's, and Mr. Malthus's doctrines upon those subjects; and an attempt at an exposi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fluctuation of the price of corn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London 1826)。——571—573。
- [威斯特, 爱·]《论资本用于土地, 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 牛津大学大学学院一研究员著, 1815年伦敦版([West, E.:]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apital to land, with observations shewing the impolicy of any great restriction of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and that the bounty of 1688 did not lower the price of it. By a fellow of University College, Oxford. London 1815)。——571。
- 韦克菲尔德, 爱·吉·《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Wakefield, E. G.: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with present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Empire; in letters between a statesman and a colonist. London 1849)。——339。
- [韦克菲尔德, 爱·吉·《斯密〈国富论〉评注》, 载于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35年伦敦版第1卷([Wakefield, E. G.: A commentary to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In: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London 1835)。——563。

- [韦克菲尔德,爱·吉·]《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两卷集)1833年伦敦版第2卷([Wakefield, E. G.:] *England and America.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 In 2 vol. Vol. 2. London 1833*)。——276,618,725,831—839。
- 韦里,彼·《政治经济学研究》,附乔·里·卡尔利的注释,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彼·库斯托第编,]1804年米兰版第15卷(Verri, P.: *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 ... con annotazioni di G.-R. Carli.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Hrsg. P. Custodi.] Parte moderna. T. 15. Milano 1804*)。——34,84,128,342。
- 沃伯顿,约·《矿山视察。致〈泰晤士报〉编辑》,载于1867年1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5718号(Warburton, J.: *Inspection of mine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5718, 26. Januar 1867*)。——528。
- 沃森,约·福·《[也谈]约翰·克劳弗德的[报告]〈论棉花的供应〉》,载于1861年4月1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Watson, J. F.: [Diskussion zu:] John Crawford; *On the cotton supply. [Bericht.] I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 London. 19. April 1861*)。——407。
- 乌尔卡尔特,戴·《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Urquhart, D.: *Familiar words, as affecting the character of Englishmen and the fate of England. London 1855*)。——94,379,531,809,810。

X

- [西利,罗·本·]《国家的危险。向立法机关、僧侣和上层阶级及中等阶级的呼吁》1843年伦敦修订第2版([Seeley, R. B.:] *The perils of the nation. An appeal to the legislature, the clergy, and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2. ed., rev. London 1843*)。——785。
- 西尼耳,纳·威·《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Senior, N. W.: *Journals, conversation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Ireland. In 2 vol. Vol. 2. London 1868*)。——766,789。
-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伦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以及埃·阿什沃思先生、汤普森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Senior, N. W.: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 To which are appended, a letter to Mr. Senior from*

- Leonard Horner, and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dmund Ashworth, Mr. Thompson and Mr. Senior. London 1837)。——228, 233, 423。
-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并附关于现行的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和纠正办法的导言》1830年伦敦版(Senior, N. W.: Three lectures on the rate of wages,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Easter term, 1830. With a pref. on the causes and remedies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London 1830)。——573, 578。
- 西尼耳·纳·威·《会议致词》,载于《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总结报告。大会1863年10月在爱丁堡召开》1863年爱丁堡—伦敦版(Senior, N. W.: Address. In: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port of proceedings at the seventh annual congress, held in Edinburgh, October 1863. Edinburgh, London 1863)。——509, 520。
-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选自纳·威·西尼耳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Senior, N. W.: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irés de leçons éd. et inéd. de N.-W. Senior, par J. Arrivabene, Paris 1836)。——633。
-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科学大纲》1836年伦敦版(Senior, N. W.: An outlin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36)。——233。
-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论商业财富,或商业立法中运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两卷集)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Sismondi, J.-Ch.-L. Simonde de; De la richesse commerciale, ou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appliqués à la législation du commerce, T. 1. 2. T. 1. Genève 1803)。——563。
-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概论》(两卷集)1837—1838年布鲁塞尔版(Sismondi, J.-Ch.-L. Simonde de;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1. 2. Bruxelles 1837—1838)。——328, 632。
-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两卷集)1819年巴黎第1版(Sismondi, J.-Ch.-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1. éd. T. 1, 2. Paris 1819)。——600, 617, 620, 621, 695。
-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两卷集)1827年巴黎第2版(Sismondi, J.-Ch.-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 avec la population, 2. éd. T. 1, 2. Paris 1827)。——152, 173, 612, 650, 826。
- 《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1677年[伦敦版](Reasons for a limited exportation of wooll. [London] 1677)。——605。
- 休谟, 大·《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64年伦敦新版(Hume, D.: 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A new ed. In 2 vol. London 1764)。——118。
-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集)1831年莱比锡版(Thucydides; De bello Peloponnesiaco libri octo. Lipsiae 1831)。——381—382。

Y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 原文依据伊·贝克尔文本作了新的校订并译成德文, 另附完整的考证资料和译者阿·施塔尔编制的人名索引, 1839年莱比锡版(希腊文德文对照)(Aristoteles; Politik in acht Büchern. Der Urtext nach I. Bekkers Textesrec. auf's Neue berichtet und in's Deutsche übertr., so wie mit vollst. krit. Apparate und einem Verz. der Eigennamen vers. von A. Stahr. Leipzig 1839. [Paralleltitel; lat.; Text; griech., dt.])。——150, 163。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1837年牛津版(《亚里士多德全集》, 伊·贝克尔编, 第10卷)(Aristoteles; De republica libri VIII et œconomica. (Politica.) Oxonii 1837. (Opera. Ex rec. I. Bekkeri. T. 10))。——79, 150。
- 杨格, 阿·《爱尔兰游记。该王国目前状况概述》(两卷集)1780年伦敦第2版(Young, A.: A tour in Ireland; with 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at Kingdom ... 2. ed. In 2 vol. London 1780)。——732。
- 杨格, 阿·《政治算术。兼评大不列颠目前状况》1774年伦敦版(Young, A.: Political arithmetic. 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principles of her policy in the encouragement of agriculture. London 1774)。——117, 234。
- 《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A prize essay on the comparative merit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London 1834)。——333, 451。
- 伊登, 弗·莫·《贫民的状况, 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三卷集)1797年伦敦版第1卷(Eden, F. M.: The state of the poor; or, an history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England, from the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period; ... with a large app. In 3 vol. Vol. 1. London 1797)。——249, 639, 656, 657、

723, 778, 782, 821。

《英属印度古今历史概述》(三卷集), 休·默里[等]编著, 1832年爱丁堡版第2卷(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British India, from the most remote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By Hugh Murray [u. a.]. In 3 vol. Vol. 2. Edinburgh 1832)。——354。

尤尔, 安·《工厂哲学, 或加工棉、毛、麻、丝的工业经济学。附英国各工厂使用的各种机器的描述》(两卷集), 译文经著者审定, 1836年巴黎版(Ure, A.: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de la fabrication du coton, de la laine, du lin et de la soie, avec la description des diverses machines employées dans les ateliers anglais. Trad. sous les yeux de l'auteur et augm. d'un chapitre inédit sur l'industrie cotonnière française, etc. T. 1. 2. Paris 1836)。——311, 365, 384, 396, 421, 438, 443, 452, 453, 457—459, 583, 588, 592。

Z

詹诺韦西, 安·《市民经济学讲义》, 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 [彼·库斯托第编,] 1803年米兰版第8卷(Genovesi, A.: Lezioni di economia civile.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Hrsg. P. Custodi.] Parte moderna. T. 8. Milano 1803)。——150。

《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 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Reasons for the late increase of the poor-rates; or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price of labour and provisions, humbly addressed to the considerations of the legislature. London 1777)。——605, 723。

法律、法令、文件

A

《埃森、韦尔登和克特维格商会 1862 年年度报告》1863 年埃森版(Jahresbericht der Handelskammer für Essen, Werden und Kettwig pro 1862. Essen 1863)。——406。

《爱尔兰农业统计。1860 年各郡各省农作物的种植亩数和牲畜存栏数概况》

1860年都柏林版(Agricultural statistics, Ireland. General abstracts showing the acreage under the several crops and the number of live stock, in each county and province, for the year 1860. Also, the emigration from Irish ports from 1st January to 1st September, 1860.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Dublin 1860)。——753。

《爱尔兰农业统计。1865年平均产量估计表》1866年都柏林版(Agricultural statistics, Ireland. Tables showing the estimated average produce of the crops for the year 1865; and the emigration from Irish ports, from 1st January to 31st December, 1865; Also, the number of mills for scutching flax in each county and province.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Dublin 1866)。——753。

D

《大不列颠所有矿山状况调查委员的报告》1864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ondition of all mines in Great Britain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the act 23 & 24 Vict. cap. 151 do not app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persons employed in such mines; with app.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4)。——715。

《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及其人民、宗教、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著述》，卡·阿贝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1852—1857年圣彼得堡俄文版，1858年柏林版第1卷(Arbeiten der Kaiserlich Rus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Peking über China, sein Volk, seine Religion, seine Institutionen, socialen Verhältnisse etc. Aus dem Russ. nach dem in St. Petersburg 1852—1857 veröff. Orig. von C. Abel und F. A. Mecklenburg, Bd. 1. Berlin 1858)。——121—122。

《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和法令》(Kaiserliche Privilegien und Sanctionen für Schlesien)。——799。

《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1864年2月8日的质询》[1864年伦敦版](East India(Bullion).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8 February 1864.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6 March 1864. [London 1864])。——129。

F

- 《法律(维多利亚十六和十七年通过的第 99 章,二十和二十一年通过的 第 3 章) 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第 1 卷《正文与附录》,第 2 卷《证词记录》,1863 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s <16 and 17 Vict. c. 99 and 20 and 21 Vict. c. 3> relating to transportation and penal servitude. Vol. 1; Report and appendix. Vol. 2; Minutes of evidence. Presented to both House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3)。——729。
- 《防止饮食品掺假的法令。(1860 年 8 月 6 日)》。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62 年伦敦版(An act for preventing the adulteration of articles of food or drink. <6th August 1860.> Nach: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 London 1862)。——255。
- 《〈佛来米人,前进!〉协会告一切拥护真诚实现 1830 年国民大会通过的比利时宪法的人的呼吁书》1860 年布鲁塞尔版(Manifest der Maatschappij de Vlamingen Vooruit! Gerigt tot alle de voorstanders van de eerlijke en regtzinnige uitvoering der Belgische Grondwet, gestemd door het National Congres van 1830. Brussel 1860)。——722。

G

- 《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 1861 年 4 月 24 日的质询》,根据下院决定于 1862 年 2 月 11 日刊印,[1862 年伦敦版](Factories.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24 April 1861.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1 February 1862. [London 1862])。——433, 439, 500。
-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 1 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 1833 年 6 月 28 日刊印,[1833 年伦敦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 1848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1849 年伦敦版(Factories inquiry commission. First report of the central Board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8 June 1833. [London 1833.] 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 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8 ... London 1849)。——287。

《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1859年伦敦版](Factories regulation act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9. August 1859. [London 1859])。——246, 306。

《工厂法扩充条例。(1864年7月25日)》，载于《维多利亚女王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第十八届议会第六次会议》1864年伦敦版(An act for the extension of the factory acts. <25th July 1864.> In: 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twenty-seventh and twenty-eighth years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being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64)。——502。

《工厂法扩充条例。(1867年8月15日)》，载于《法律报告。维多利亚女王三十至三十一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附地方法规和私法条例一览表》1867年伦敦版第2卷(An act for the extension of the factory acts. <15th August 1867.> In: The law reports.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with a list of the local and private acts, passed in the thirtieth and thirty-first years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 Vol. 2. London 1867)。——520, 521。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45, 518。

—《截至1841年12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2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the 31st December 1841. [London 1842])。——286。

—《截至1843年9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引自[安·]阿什利《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th September, 1843. Nach: Ashley, [A.]: Ten hours' factory bill. The speech ...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riday, March 15th, 1844. London 1844)。——420。

—《截至1844年9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和1844年10月1日—1845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45年伦敦版(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th September, 1844; and from 1st October, 1844, to 30th April, 1845.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45)。——291, 292, 303。

429、430、432。

- 《截至184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7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6 ... London 1847)。——304。
- 《截至1848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48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48 ... London 1848)。——296、576。
- 《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8 ... London 1849)。——232、290、293—296、298、301、309、313、551、578。
- 《截至1849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49 ... London 1849)。——299—301、323、324。
- 《截至1849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9 ... London 1850)。——289、300。
- 《截至185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0 ... London 1850)。——302、313。
- 《截至1852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2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2 ... London 1852)。——303。
- 《截至1853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3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3 ... London 1853)。——305。
- 《截至185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4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3 ... London 1854)。——175、276。
- 《截至1855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5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5 ... London 1855)。——232。
- 《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5 ... London 1856)。——276、285、417、446、550。
- 《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 London 1857)。——246、248、395、418、433、434、453、471、473。
- 《截至1857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7 ... London 1857)。——417、418。
- 《截至1857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7 ... London 1857)。——306、419。
- 《截至1858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 30th April 1858 ... London 1858)。——246,247,584,587。
- 《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8 ... London 1858)。——409,412,418,434,452。
- 《截至1859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9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9 ... London 1859)。——581。
- 《截至1859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9 ... London 1860)。——290,314。
- 《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0 ... London 1860)。——249,287,305,393,434,576。
- 《截至1860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0 ... London 1860)。——247,581。
- 《截至1861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1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1 ... London 1861)。——247。
- 《截至1861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2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1 ... London 1862)。——304,312,435。
- 《截至1862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3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2 ... London 1863)。——247,306—308,312,416,423,432,435,437,471,479,505。
- 《截至1863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3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3 ... London 1863)。——308,313,445,483,576。
- 《截至186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4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3 ... London 1864)。——247,440,446,454,480,481,576,683。
- 《截至1864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4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4 ... London 1864)。——481。
- 《截至1864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5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4 ... London 1865)。——310,313。
- 《截至186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6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5 ... London 1866)。——428,471,482,484,500—503,508—510,517。
- 《截至186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7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6 ... London 1867)。——441,446,594,688,763。

-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Public health. [Reports])。——379、411、416、489、749。
- 《第3号报告。1860年》，根据下院决定于1861年4月15日刊印，〔1861年伦敦版〕(Third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1860. <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liament.>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5. April 1861. [London 1861])。——250、251。
- 《第4号报告。1861年。附附录》，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4月11日刊印，〔1862年伦敦版〕(Fourth report ... with app. 1861. <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liament.>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1. April 1862. [London 1862])。——489。
- 《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Sixth report ... with app. 1863. 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liament. London 1864)。——175、277、414—416、489、490、576、704—706、731。
- 《第7号报告。1864年。附附录》1865年伦敦版(Seventh report ... with app. 1864. 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liament. London 1865)。——613、707、714—717、729、733、735—737、744、777。
- 《第8号报告。1865年。附附录》1866年伦敦版(Eighth report ... with app. 1865. 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liament. London 1866)。——488、707—713。
- 《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证词》——见《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
- 《谷物、粮食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2月18日的质询》〔1867年伦敦版〕(Corn, grain, and meal. Return to an order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18 February 1867. [London 1867])。——475。
- 《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1871年6月29日)》，载于《法律报告。维多利亚女王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1871年伦敦版第6卷(An act to amend the criminal law relating to violence, threats, and molestation. <29th June 1871.> In: The law reports.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thirty-fourth and thirty-fifth years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 Vol. 6. London 1871)。——800。
- 《关于惩治流浪者和救济贫弱人员的法令。〔1547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for the punishment of vagabonds,

- and for the relieve of the poor and impotent persons, [1547.] Nach; F. M. 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 Vol. 1. London 1797)。——794。
- 《关于惩治流浪者和救济贫弱人员的法令。[1572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for the punishment of vagabonds, and for relief of the poor and impotent. [1572.] Nach; F. M. 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 Vol. 1. London 1797)。——795。
- 《关于惩治流氓、流浪者和强壮乞丐的法令。[1597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for punishment of rogues, vagabonds, and sturdy beggars. [1597.] Nach; F. M. 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 Vol. 1. London 1797)。——795。
- 《关于惩治身强体壮的流浪者和乞丐的法令。[1535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for punishment of sturdy vagabonds and beggars [1535.] Nach; F. M. 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 Vol. 1. London 1797)。——793。
- 《关于反对拆毁市镇和房舍的法令。[1488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against pulling down of towns and houses. [1488.] Nach; F. M. 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 Vol. 1. London 1797)。——775。
- 《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44年6月6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44年(维多利亚七至八年)》1844年伦敦版(An act to amend the laws relating to labour in factories, <6th June 1844.>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7 & 8 Victoria, 1844. London 1844)。——290, 296, 302, 303。
- 《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50年8月5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50年(维多利亚十三至十四年)》1850年伦敦版(An act to amend the acts relating to labour in factories, <5th August 1850.>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3 & 14 Victoria, 1850. London 1850)。——245, 303, 305。
- 《关于工联法的修正法令。(1871年6月29日)》,载于《法律报告。维多利亚女王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1871年伦敦版第6卷(An act to amend the law relating to Trades Unions. <29th June 1871.> In: The law reports.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thirty-fourth and thirty-

fifth years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 Vol. 6. London 1871)。——800。

《关于谷物和谷物法的报告：上院委员会受命研究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第1、2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11月23日刊印，[1814年伦敦版]（Reports respecting grain, and the corn laws; viz: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from The Lords Committees, appointed to enquire into the state of the growth, commerce, and consumption of grain, and all laws relating thereto; ...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3 November 1814. [London 1814]）。——586。

《关于雇用童工的法令》，载于《修订条例的补充。马萨诸塞州普通法》1854年波士顿版第1卷。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An act concerning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in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In: Supplements to the revised statutes. General law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 Vol. 1. Boston 1854. Nach: 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irst report ... London 1863）。——279。

《关于规定工场童工、青工和女工工作日的长度及有关事宜的法令。（1867年8月21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67年（维多利亚三十至三十一年）》1867年伦敦版（An act for regulating the hours of labour for 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women employed in workshop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relating thereto. <21st August 1867.>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30 & 31 Victoria, 1867. London 1867）。——520、521。

《关于规定联合王国工厂童工与青工劳动强度的法令。（1833年8月29日）》，载于《威廉四世国王三至四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1833年》1833年伦敦版（An act to regulate the labour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in the mills and factor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29th August 1833.> In: 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is Majesty King William the Fourth, 1833. London 1833）。——287。

《关于规定印染厂童工、青工和女工劳动强度的法令。（1845年6月30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45年（维多利亚八至九年）》1845年伦敦版（An act to regulate the labour of children, young persons, and women, in print works. <30th June 1845.>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

- 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8 & 9 Victoria, 1845. London 1845)。
——306。
- 《关于花边厂应依据工厂法条例雇用女工、青工和童工的法令。(1861年8月6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61年(维多利亚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61年伦敦版(An act to place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young persons, youths, and children in lace factories under the regulations of the factories acts, <6th August 1861.>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4 & 25 Victoria, 1861. London 1861)。
——491。
- 《关于技工、劳工、农耕人员和学徒工不同条例的法令。[1562年]》，载于《英格兰和大不列颠法规大全，从大宪章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联盟》(二十卷集)1811年伦敦版第4卷(An act touching divers orders for artificers, labourers, servants of husbandry and apprentices. [1562.] In: The statutes at large, of England and of Great Britain; from Magna Carta to the Union of the Kingdom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In 20 vol. Vol. 4, London 1811)。
——280, 798, 799。
- 《关于加强施行煤矿等矿业管理条例的修正法令。(1872年8月10日)》，载于《维多利亚女王三十五至三十六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1872年伦敦版(An act to consolidate and amend the acts relating to the regulation of coal mines and certain other mines. <10th August 1872.>In: The public general acts passed in the thirty-fifth and thirty-sixth years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 London 1872)。
——528。
- 《关于进一步管理工厂雇用童工的法令。(1853年8月20日)》，载于《维多利亚女王十六至十七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第十六届议会第一次会议》1853年伦敦版(An act further to regulate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in factories, <20th August 1853.>In: 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being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ixteenth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53)。
——305。
- 《关于禁止雇用女工和童工在夜间进行某些与室外漂白工序相关的作业的法令。(1862年4月11日)》，载于《维多利亚女王二十五至二十六年通过的公

- 共普通法汇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第十八届议会第四次会议》1862年伦敦版(An act to prevent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and children during the night in certain operations connected with bleaching by the open-air process. <11th April 1862.> In: 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twenty-fifth and twenty-sixth years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being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62)。——307。
- 《关于禁止矿业和煤矿雇用女工和女童、规范对男童的雇用以及制定其他与此做工人员相关的规定的法令。(1842年8月10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42年(维多利亚五至六年)》1842年伦敦版(An act to prohibit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and girls in mines and collieries, to regulate the employment of boys, and to make other provisions relating to persons working therein. <10th August 1842.>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 & 6 Victoria, 1842, London 1842)。——522。
- 《关于农场与羊群的法令。[1533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concerning farms and sheep. [1533.] Nach: F. M. 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 Vol. 1. London 1797)。——775。
- 《关于漂白厂和染厂应依据工厂法条例雇用女工、青工和童工的法令。(1860年8月6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60年(维多利亚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60年伦敦版(An act to place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young persons, and children in bleaching works and dyeing works under the regulations of the factories acts. <6th August 1860.>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3 & 24 Victoria, 1860, London 1860)。——307。
- 《关于如何整顿被迫靠救济为生的老弱贫人员和如何惩治流浪者和乞丐的法令。[1530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directing how aged, poor, and impotent persons, compelled to live by alms, shall be ordered; and how vagabonds and beggars shall be punished. [1530.] Nach: F. M. 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 Vol. 1. London 1797)。——793。
- 《关于授权治安法官在其各自管辖权内规定和管理丝厂雇佣人员工资的法令。[1773年]》。引自《论行业联合》1834年伦敦新版(An act to empower the

- magistrates therein mentioned to settle and regulate the wages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silk manufacture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1773.] Nach: On Combinations of trades, New ed. London 1834)。——799。
- 《关于同行业工人和手工业者集会的法令。1791年6月14—17日》第1、4条，载于1791年《巴黎革命》第3年卷第8季刊第101期(Décret relatif aux assemblées d'ouvriers et artisans de même état et profession, 14—17 juin 1791, Art. 1, 4. In: Révolutions de Paris, Paris, 3, année, 8, trimestre, 1791, Nr. 101)。——801。
- 《关于限制工厂青工和女工工作日的长度的法令。(1847年6月8日)》，载于《维多利亚女王十至十一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第十四届议会第七次会议》1847年伦敦版(An act to limit the hours of labour of young persons and females in factories. <8th June 1847.> In: 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being the seventh session of the fourteenth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47)。——292。
- 《关于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和禁止雇用十岁以下童工的法令。1851年3月18日通过》，载于《新泽西州议会第75号法案》1851年特伦顿版。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An act to limit the hours of labour, and to prevent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in factories under ten years of age. Approved March 18, 1851. In: Acts of the seventy-fifth legislature of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Trenton 1851. Nach: 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irst report ... London 1863)。——279。
- 《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1834年〔威廉四世四至五年〕第76章》，载于《威廉四世四至五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1834年伦敦版(An act for the amendment and better administration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poor in England and Wales, [4 and 5 William IV. Cap. 76], 1834. In: 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fourth and fif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is Majesty King William the Fourth, London 1834)。——451。
- 《国际统计大会纲要。1855年9月10日于巴黎》。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Programm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Statistique, tenu à Paris le 10 Septembre 1855. 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 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5 ... London 1856)。——311。

H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3年伦敦版第66卷(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third series, commencing with the accession of William IV. Vol. 66. Comprising the period from the second day of February, to the twenty-seventh day of February, 1843. London 1843)。——700。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4号报告》1860年伦敦版(Fourt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inland revenue on the inland revenue.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0)。——698。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Tent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inland revenue on the inland revenue.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6)。——697、698、754。

《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Royal commission on railway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7)。——453、592。

J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Reports from poor law inspectors on the wages of agricultural labourers in Ireland.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Dublin 1870)。——758—762。

《剑桥大学委员会。皇家委员调查剑桥大学和各院的状况、纪律、课程和收入的报告。附证词和附录》1852年伦敦版(Cambridge university commission. Report of Her Majesty's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state, discipline, studies, and revenu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of Cambridge; together with the evidence, and an app.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2)。——658。

- 《就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团的信函往来》1867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with Her Majesty's missions abroad, regarding industrial questions and Trades Unions.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1867. London 1867)。——19。
-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附证词》1862年伦敦版(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with app. of evidence.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2)。——174、175、256—258、579。
-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第2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Second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an bakers.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3)。——256。

K

- 《矿山管理与视察法。(1860年8月28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60年(维多利亚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60年伦敦版(An act for the regulation and inspection of mines, <28th August 1860.>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3 & 24 Victoria, 1860. London 1860)。——522、527、528。
- 《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66年7月23日刊印，[1866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mine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3 July 1866. [London 1866])。——522。

L

- 《劳工法。[1349年]》，载于《英格兰和大不列颠法规大全：从大宪章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联盟》(二十卷集)1811年伦敦版第1、2卷(Statutum de servientibus, <The statutes of labourers.> [1349.] In: The statutes at large, of England and of Great-Britain; from Magna Carta to the Union of the

- Kingdom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In 20 vol. Vol. 1, 2. London 1811)。
——279, 798。
- 《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六部分)》1866年伦敦版(Miscellaneous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Kingdom<Part VI>.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6)。
——701。
- 《联合王国最近十五年历年简要统计一览》(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in each of the last fifteen years ...)
——《1846—1860年》1861年伦敦版第8卷(No.8; From 1846 to 1860. London. 1861)。
——437。
- 《1851—1865年》1866年伦敦版第13卷(No.13; From 1851 to 1865. London. 1866)。
——437。
- 《1853—1867年》1868年伦敦版第15卷(No.15; From 1853 to 1867. London. 1868)。
——455。
- 《罗得岛州和普罗维登斯殖民地的修订条例》1857年普罗维登斯版。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The revised statutes of the state of Rhode Island and Providence plantations; to which are prefixed,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state. Providence 1857. Nach; 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1862>. First report ... London 1863)。
——279。

M

- 《面包房管理法。(1863年7月13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63年(维多利亚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863年伦敦版(An act for the regulation of bakehouses. <13th July 1863.>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6 & 27 Victoria, 1863. London 1863)。
——256, 307。
- 《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
——《学说汇纂》(Digesta)。
——85。

N

-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6号(Reports by Her Majesty's secretaries of embassy and legation, on the

manufactures, commerce, &c.,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reside. No. 6. London 1863)。——357—358。

Q

《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总结报告》1863年爱丁堡—伦敦版(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port of proceedings at the seventh annual congress, held in Edinburgh, October 1863, Edinburgh, London 1863)。——509。

S

《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The Master Spinners' & Manufacturers' Defence Fund,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for the receipt and apportionment of this fund, to the Central Association of Master Spinners and Manufacturers. Manchester 1854. 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 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443。

《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一度遍及商业界的危机的原因以及随时能兑现的银行券发行管理法对该阶级的影响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7月28日刊印,(1857年重印,)[1857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cre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of the distress which has for some time prevailed among the commercial classes, and how far it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laws for regulating the issue of bank notes payable on demand.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n app.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8 July 1848. <Reprinted 1857.> [London 1857])。——122。

《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年》。引自《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officer of health of St. Martin's-in-the-Fields, 1865. Nach: Public health. Eighth report ... London 1866)。——708。

《食物等掺假调查特别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55年7月27日刊印,[1855年伦敦版](First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adulteration of food, etc.;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 Or-

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7 July 1855. [London 1855]。——175。

T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报告] (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Reports])。——245, 310, 411, 412, 445, 467, 504。

—《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With app.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3)。——250—254, 278, 445, 495, 575, 584。

—《第2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 (Second report ... London 1864)。——445, 486, 491—494, 496, 498—500, 502, 575, 583。

—《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 (Third report ... London 1864)。——175, 264, 413, 445, 483, 489, 490, 503, 519, 577, 578, 584。

—《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 (Fourth report ... London 1865)。——264—268, 270, 271, 273, 364, 419, 445, 456, 504, 505。

—《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 (Fifth report ... London 1866)。——266, 413, 445, 453, 477, 487, 489, 506, 508, 510—512, 517—519, 576。

—《第6号报告》1867年伦敦版 (Sixth report ... London 1867)。——737, 745—750。

W

《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 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 [1814年伦敦版]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petitions relating to the corn laws of this Kingdom;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n app. of account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6 July 1814. [London 1814])。——586。

Y

《1861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第2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baking trade in Ireland for 1861. Nach: Second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an bakers ... London 1863)。
——259。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1857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57, Pt. 1; Report and evidence. [London 1857])。——129。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8年7月1日刊印，[1858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 July 1858, Pt. 1; Report and evidence. [London 1858])。——135。

《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1年》1863年伦敦版(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 London 1863)。——465、673、674、689、698、700、728。

《英国户籍总署署长关于出生、死亡、婚姻的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伦敦版。引自《每一政府都有自己的传统》，载于1861年11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082号(Twen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rar-General of births, deaths, and marriages in England.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1. Nach: Every government has its traditions ...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082.5, November 1861)。——277。

Z

《在爱丁堡社会科学会议上的报告。1863年10月》(Report of the Social Congress at Edinburgh, October 1863)。——410。

文学著作

A

阿泰纳奥斯《哲人宴》。——95、127。

B

比彻·斯托,哈·《汤姆叔叔的小屋》。——789。

D

狄德罗,德·《1767年的沙龙》。——129。

笛福,丹·《鲁滨逊漂流记》。——70。

杜邦,皮·《工人之歌》。——745。

G

歌德《短诗·问答》。——768。

歌德《浮士德》悲剧第1部。——80,630。

H

荷马《奥德赛》。——381。

L

勒萨日,阿·勒·《山梯良那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764。

M

莫里哀《伪君子》。——634。

S

莎士比亚《无事生非》。——77。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127。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102。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127。

Y

伊索克拉底《布西里士》。——383。

圣经。——658,779。

报 刊 索 引

B

- 《巴黎革命。献给全国及佩蒂·奥古斯坦区》(Révolutions de Paris, dédiées à la Nation et au district des Petits Augustins)——法国的一家周报,1789年7月12日—1794年2月28日由路·玛·普律多姆在巴黎出版,1790年以前主编是埃·路斯达洛。——801。
- 《贝里卫报》(The Bury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日报,1857年在兰开夏郡贝里创办。——275。

C

-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报纸还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The Evening Star)。——262、567、718。

D

-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马克思和阿·卢格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刊物,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该杂志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而停刊。——69、149、163、681。

F

- 《法国革命和布拉班特革命》(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法国的

一家周报,1789—1791年在巴黎出版;卡·德穆兰任编辑。——801。

G

《格拉斯哥每日邮报》(The Glasgow Daily Mail)。——323。

《工程学》(The Engineering)——在伦敦出版。——664。

《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man's Advocate)——英国的工人报纸,1865年9月—1866年2月在伦敦出版,每周一期。报纸最初的名称为《不列颠矿工和新闻记者总汇报》(British Miner and General Newsman),于1862年9月13日创刊,1863年3月7日改名为《矿工报》(Miner),1863年6月13日又改名为《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 Miner and Workman's Advocate),编辑为约·托尔斯(1862年9月13日—1865年8月5日)和约·贝·莱诺(1865年8月),1865年7月底报纸为莱诺所有,他把报纸交给国际总委员会掌握,9月8日起改名为《工人辩护士报》,编辑为莱诺(1865年9月—1866年1月)和约·格·埃卡留斯(1866年1—2月),从1865年9月25日起成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1865年11月起报纸归工业报股份公司所有。马克思是工业报股份公司理事会理事(1865年8月22日—1866年6月9日)。报纸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刊登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1866年2月,由于编辑部内改良派的势力增强,报纸再度进行改组,并更名为《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259。

《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英国的一家丛刊,简称《公文集》(Portfolio),主要刊登外交公文和现代史方面的材料,1835—1837年由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1843—1845年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出版;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德文版,德文名称是《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德文版主编是爱·费舍。——789。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英国最老的一家星期期刊;1791年在伦敦创刊。——134。

J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4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50年代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

保守党的机关报。——726。

《技艺协会和联合会机关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英国的一家周报,1852年在伦敦创办,主要刊登技艺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435。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233、623、685、726、791。

《经济学家杂志。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每月评论》(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Revue mensuelle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s questions agricoles, manufacturières et commerciales)——法国资产阶级的月刊,1841—1943年在巴黎出版。——845。

L

《雷诺新闻。政治、历史、文学和一般知识周报》(Reynolds's Newspaper. A Weekly Journal of Politics, History, Literature, and General Intelligence)——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1850年8月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乔·威·麦·雷诺在伦敦创刊,原名《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 Weekly Newspaper);1871年报纸维护巴黎公社的利益,后来成为合作社运动的刊物。——260、718。

M

《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英国的一家周报,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刊物,1859年由达·马松创办,1859—1907年在伦敦出版。——262。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英国的一家日报,1855—1937年在伦敦出版;起初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后来从19世纪80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250。

《孟加拉公报。大陆新闻摘要双月刊》(The Bengal Hurkaru. Bi-Monthly Overland Summary of News)——印度的一家日报,1795—1866年在加尔各答出版。——341。

《米卢斯产业协会会报》(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de Mulhouse)。——412、414。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和托·麦克拉思等人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40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供稿,一直到1862年3月,持续了十余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美国内战爆发后,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加强,报纸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789。

O

《欧洲通报。历史、政治和文学杂志》(Вѣстникъ Европы. Журналъ исторіи, полит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俄国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月刊,1866—1908年由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在圣彼得堡创办和出版,1909—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19世纪90年代初期该杂志经常刊登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845。

P

《派尔-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 Pall Mall Gazette. An Evening Newspaper and Review)——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每日一次,为晚刊;编辑为弗·格林伍德(1865—1880)、威·托·斯特德(1883—1889);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

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703。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的一家自由派周报，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后来成为保守派的刊物。——345。

Q

《旗帜报》(The Standar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年—约1917年在伦敦出版，1857—1905年曾出版晚刊《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1905年起将晚刊更名为《旗帜晚报和时代新闻》(Evening Standard and Times Gazette)。——262、589、718。

S

《社会科学评论》(The Social Science Review)——英国的一家周报，在伦敦出版。——261。

《实证哲学。评论》(La Philosophie Positive, Revue)——法国的一家哲学杂志，1867年7月1日—1883年由埃·利特雷和格·尼·威士博夫在巴黎出版。——845。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先后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19世纪先后任编辑的有：主编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19世纪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19世纪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210、262、277、306、421、497、528、609、611、612、638、700、703、763、790。

W

《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英国的一家政治、国民经济、宗教和文学的自由派刊物,1824年由耶·边沁和约·包令在伦敦创办,1824—1887年为季刊,1887—1914年为月刊;后由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主持。——55。

X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约·亨·毕尔格尔斯等。报纸编辑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积蓄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613,831。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新莱茵报》(1848—1849)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1850年11月,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加上资金缺乏,杂志被迫停刊。——302,314。

名 目 索 引

A

- 阿西恩托条约——822。
- 埃及——241, 347, 348, 354, 383, 537, 538。
- 爱尔兰
- 概述——258, 259, 750—766。
- 工业——486, 507, 756, 758, 820。
- 农业——751—755, 757—766。
- 人口的减少——276, 466, 750, 755—757, 760, 762—766。
- 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压迫——466, 755, 765—766, 820。
- 1845—1847年的饥荒——750, 757, 759—760, 766。
- 奥地利——285, 848。
- 澳大利亚——276, 474, 839—840。

B

- 八小时工作制——312—313, 436。
- 巴西——31。
- 罢工——175, 239, 445, 456—458, 478, 576, 585, 638, 699, 800。
- 拜物教
- 概述——76。

- 商品拜物教——49, 64—69, 76, 77, 601。
- 货币拜物教——49, 76, 85—87, 128。
- 资本拜物教——76, 147, 148, 829, 830。
- 并见异化、神秘化。

半成品

- 概述——184—185, 359, 360, 466, 467, 496。
- 中间制品——369。
- 帮伙工人——415, 713, 714, 745—749。
- 保护关税制度——305, 595, 780—781, 810, 814, 820, 830。

保险公司——206。

报刊

- 资产阶级报刊的作用——262, 293, 345, 567, 638, 685, 703, 726, 749。

暴力

- 概述——240。
- 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768。
- 暴力在资本主义形成中的作用——450, 769—770, 773—793, 796, 814, 826。

——在平等的权力之间的决定作用
——240。

——暴力是每一个临产的旧社会的助产婆——814。

——超经济的暴力——797。

——作为国家权力——448,797,814。

——作为经济力——814。

悖论——425。

本质和现象

——概述——38,39,41—42,49—53,56,64,66,74,85,89,99,115,131,152,218,226—227,242,319,329,345,349,558,559,564—570,601—603,661,831,833。

——假象(外观)——68,69,76,77,87,110,111,220,329,463,558,567,579,580,618,646。

并见**抽象**、**社会规律**。

比利时

——概述——310,638,720,722。

——劳动时间——285。

——资本主义的发展——310,773。

——政党——285。

比例性和比例失调——371,372。

必然性

——概述——82,131,328。

——历史必然性——349,381,512,515—517,628,632,811。

——自然必然性——33,75,371,538,555,827。

——技术上的必然性——375,402。

——和偶然——55,68—69,82,102,371。

——和规律——319,371,622。

并见**社会规律**。

必要劳动

——定义——219—220,235—236。

——作为雇佣工人的有酬劳动——231,407,559,567。

——和剩余劳动——219—220,226,234,239—244,317—319,320—321,325—329,365,424,534—540,551—559,573,574。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必要劳动——555。

必要劳动时间

——概述——170,219,234,236,325—330,534—539,555。

——和剩余劳动时间——219,220,234,236,240—243,325—328,331,332,334,365,386,534,535。

辩护

——概述——74,86,87,109,567,594,595,648—652,823—824,829,830,834,843,844。

——为资本辩护——109,233,311,334,372,633—635,646,647,829,830。

——“补偿理论”——459—463。

——为工厂制度辩护——372,438—443,457—458。

辩证法

——作为认识的方法——845,846、

- 847—848。
——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847—848。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72—73、309、398、473—474、485、486、496、497、514、515、529—531、665、666、823—828、846、847—848。
辩证法的规律——见否定的否定、质和量、矛盾。
波兰——73。
剥夺
——剥夺直接生产者的土地——770、792、803、806—811、825、826、833。
——资本家剥夺资本家——667—669、827。
——剥夺剥夺者——827、828。
 并见资本的原始积累。
剥削
——剥削的客观条件——240。
——奴隶制的剥削——240、241、567、694、784。
——封建剥削——70—71、240—243、567、602。
——封建剥削转变为资本主义剥削——770。
——资本主义剥削——196、237、241、242、272、273、322—324、343—345、380—381、411—414、495、496、517、518。
——外延方面和内涵方面的剥削——327、328、427、433、434、468、616、659、682。
——剥削的方法——245—248、259、260、263—267、272、273、289、301、302、326—333、426—430、479—481、495、497、498、584、714—717、745、746—747。
——剥削的程度——见剩余价值率。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剥削的掩盖——558、559。
 并见劳动力、雇佣劳动和资本、雇佣工人、剩余价值。
补偿理论——459—464、686。
不变资本
——概述——212、215—218、263、319、343、651。
——作为客观的劳动条件——202—203、205—207、210—212、218。
——它的组成部分——212、216、229、337—338、422、472、643。
——不变资本的价值和使用价值——202—218、338、422、423。
——和可变资本——212—215、217、318—320、375、424、459—460、472—473、625、686、797。
——和价值形成过程——202—212、215—218。
——它的再生产——641—645。
——不变资本的节约——187、198、270、301、302、338。
——它的价值丧失——213、423、643、644。

- 不变资本在农业中的特殊性——
643。
并见**资本的构成**。
簿记(意大利式簿记)——628。

C

财富

- 概述——23、24、127、128、380、
467、628、629、642、666、667、
693—695、812、813、815—820。
——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532、
605、630、642、700。
——物质财富——24、33、36、70、127。
——自然财富——537。
——价值是财富的资本主义形式——
150—151。
——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
——23、127—128。
——货币是财富的社会表现——125、
126。
——货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
128、139。
——一切财富的源泉——532。
——资产阶级财富的概念——128、
452、469、648—651、773、774。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
321、555、605、622、623、660、668、
678、687、691、697、700—702、
764。
——和资本家的挥霍——463、630—
632、634、706。
——资本主义条件下贫和富的对立

- 691—696、700—702、713、
718—719、722—723、763—766、
782、830、837。

采矿业

- 概述——183、488、584、607、691、
839。
——从业人数——465、468、469。
——工人的状况——310、311、526、
527、715—717。
——女工——264、409、522、525、526、
529。
——童工——409、522、523、524、529。
——金矿中的劳动——240、241、813。
——矿业立法——521—524、527、
528。

产品

- 概述——183—186。
——作为劳动过程的前提和结果——
183—188、533。
——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条件——31、
53、58、65—68、81—84、100—
103、169、367。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中的产品
——33、53、72—73、81、82、242、
243、355、367、372—373、635—
636。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品——53、
170、369—370。
并见**使用价值**、**社会总产品**、**商品**。
产品价值——202、209—213、215—
217、227、318、644。

产业革命——见工业革命(产业革命)。

产业后备军

——概述——462、463、514、671、675—687、712。

——产业后备军的职能——496、676—683、685、686。

——产业后备军的增减——676—679、681—686。

——和工资——684、685、797。

——和季节劳动——504。

产业资本——见工业资本(产业资本)。

超额(额外)剩余价值

——概述——329。

——资本家的直接动机——329—331。

——作为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330、331、423—424。

——它的暂时性——331—332、423—424。

——和相对剩余价值——329—333、423、424。

——和机器——423、473。

城市

——中世纪的城市——449、770、771、773、797、798、812、813。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392—393、531、706、707—713。

城市和乡村——367、531、689。

惩治流浪者的法律——793—796。

赤贫(需要救济的贫民)——200、284、

451、468、498、554、689—692、701—703、718—720、724、729、733、744、777、778、793。

并见济贫法、济贫院。

抽象

——概述——17、28、29、40、59、67、165、186、218、388、676。

——抽象的客观内容——69、138、165。

——经济学的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69、138。

——抽象和具体——109、179。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36、76、103、109、121、132、133、162、163、179、186、329、579、598、637、692。

——对资产阶级抽象方法的批判——64、109、388、548。

并见一般、特殊和个别、内容(实质)和形式、逻辑的和历史的、本质和现象。

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

——概述——37、41、49—50。

——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29、32、34—37、67、74、81、109、199、202、204、209、568。

——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是政治经济学的枢纽——32。

——抽象劳动——29、34—37、41、42、49—51、55、56、59、66、67、74、104、138、191、197。

——具体劳动——29、32—37、42、49、50、55、56、59、65、191、192、196—

- 199, 202—204, 231。
- 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实体——
29—31, 34—37, 50, 51, 59, 66,
164, 563。
- 抽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形式——
50, 51, 59, 67, 68, 69, 73。
- 储备——624。
- 传统——380, 441。
- 从属、从属关系
- 人的从属——71—73, 608, 609,
826。
- 物的从属——65—69, 72, 73,
102, 107, 108, 167, 174, 313, 347,
441, 601, 602, 608, 612—613,
654—661, 797, 802, 834—837。
- 存在——41, 59, 123, 138。

D

大工业、现代工业

- 概述——286, 287, 391, 393,
397—401, 468, 490, 500, 505,
506, 510—518, 681, 843。
- 起点——377, 386, 410。
- 机器是它的技术基础——380,
397—398, 442, 452, 473, 486,
487, 514。
- 城市是它生产集中的地点——
392—393。
- 它的科学基础——513—515。
- 它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514。
- 和分工——397—400, 485, 511,
512, 513, 514。
- 和劳动生产率——401, 402,
423—424, 465—468。
- 和农业——415, 416, 474, 475,
485, 530—532, 810。
- 大规模生产——400, 484, 496, 665,
669, 670, 674。
- 德国
- 概述——19, 322, 390, 408, 592。
- 历史——65, 390, 784, 792, 799,
844—845。
-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17,
406, 842, 844—845, 848。
- 工人阶级——844—845。
- 农业和农民——772—773, 784,
792, 807。
- 圈地——792。
- 农奴制——772。
- 普鲁士工厂工人的状况——276。
- 童工——281。
- 降低工资的法令——799。
- 士兵身高的降低——244。
- 等价交换——156—158, 162, 165,
166, 176, 197, 562, 618—622。
- 等价形式——见价值形式。
- 笛卡儿哲学——405, 406。
- 地产——见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
地产)。
- 地理环境——537—540。
- 地主——见土地所有者(地主)。
- 地租
- 概述——136, 290, 534, 548, 598,
746, 804。

- 实物地租——242, 373。
- 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136。
- 城市地租——708。
- 剩余价值的形式——559, 598。
- 电报——402, 468, 504, 507。
- 东印度公司——478, 815, 816。
- 度(哲学上的)——66, 68, 71, 72, 74, 88, 101, 122。
- 对抗——17, 130。
并见矛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矛盾。
- 对立
 - 概述——53, 60, 61, 99, 134。
 -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239—240, 272—274, 276, 277, 313, 314, 375—377, 380, 384, 430, 486, 605, 608—610, 659—662, 801。
 -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31, 37, 41—44, 47—48, 53, 59, 78—84, 99—102, 106, 108—111, 115, 124, 128, 129—133。
 - 商品和货币的对立——81, 99, 105, 106, 111, 123, 129—135。
 - 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对立——323, 442, 692。
 -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50, 88, 101, 109。
 - 买和卖的对立——108, 109, 124, 130—134。
 - 贫和富的对立——692—696、

- 700—702, 706, 707, 713, 718—719, 763—766, 830, 837。
- 工业资本和大地产的对立——290—292, 725, 843。
-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377, 378, 442。
- 城乡对立——367, 531。
- 和矛盾——53, 60, 61, 99, 108—109, 133, 134, 239, 452。
并见矛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矛盾。
- 对外贸易
 - 概述——136, 241, 513, 615, 680。
 - 和世界货币——138—141。
 - 和贵金属——125。
- 对象化——29, 35, 37, 42, 47, 50, 51, 55, 59, 68, 84, 87, 156, 183, 191—192, 195—196, 318, 319, 335, 424, 442, 443, 561—563, 646, 647, 692。
并见物化。
- 多瑙河两公国——241—244。

E

- 俄国——242—243, 264, 271, 304, 593, 780。
- 儿童劳动(童工)
 - 概述——232, 247, 249, 264—269, 271, 275—276, 286—291, 296, 297, 303—306, 409—419, 435, 438, 440, 445, 452, 453, 485—489, 490—497, 500—501、

506, 507, 509 — 512, 516 — 524, 528, 529, 554, 688, 745 — 748, 820, 821, 822。

—— 17 世纪的儿童劳动 —— 281。

—— 关于儿童劳动的法律 —— 278 — 279, 284 — 293, 296 — 298, 302 — 306, 412, 416 — 419, 520 — 522, 822。

二律背反 —— 80, 165, 239。

F

发明

—— 发明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 396 — 402。

—— 发明运用于生产 —— 396 — 402, 407, 447, 448, 456, 457, 484。

——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的发明 —— 363, 389, 447, 448, 810。

——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明 —— 387, 392, 393, 396 — 397, 399, 401, 408, 447, 448, 516, 664。

—— 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 447, 448, 456, 457。

发展

—— 社会发展 —— 18, 19, 72, 73, 169, 170, 366, 367, 380, 399, 449 — 451, 513 — 518, 536 — 538, 825 — 827, 846 — 847。

—— 形式和内容的变化 —— 39, 515 — 517, 846 — 848。

并见质和量, 矛盾。

罚款(对工厂工人的罚款) —— 444,

445, 480。

法国

—— 概述 —— 19, 91, 813, 814, 843, 844。

—— 历史 —— 126, 133, 140, 363, 368, 448, 796, 801, 805, 817。

—— 人口 —— 745。

—— 工人的状况 —— 285, 311, 638, 745, 801。

—— 儿童死亡率 —— 414。

—— 农民 —— 136, 756, 776, 805。

—— 资产阶级 —— 294, 311, 440, 801, 844。

—— 资本主义的发展 —— 322, 351, 368, 745, 778, 801, 844。

—— 农业 —— 745, 803, 805, 843。

—— 劳动时间 —— 284, 285, 311。

—— 立法 —— 778, 798, 801。

—— 工厂立法 —— 284 — 286, 311, 312。

—— 血腥立法 —— 796。

—— 劳工法 —— 278, 586, 796。

—— 士兵身高不断下降 —— 244。

—— 1789 — 1795 年法国革命 —— 83, 801。

—— 1830 年七月革命 —— 633。

—— 1848 — 1849 年革命 —— 284, 285。

—— 1848 年二月革命 —— 311。

——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 —— 294。

法和权

—— 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 —— 78、

- 131、132、176、657。
- 商品生产的法的关系——78。
- 资产阶级的法——176、240、568、657、781。
- 资本家的所有权(财产权)——240、372、508、609、619、620、621。
- 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权利——303、413—414、518、519。
- 并见立法、资产阶级立法。
- 法律——121、657、800。
- 并见立法、资产阶级立法、工厂立法。
- 法院(法庭)
- 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庭——260、299、444、445、526。
- 英国的法庭——258、260、296、299—302、307、445、522、526、794、796、799、800。
- 封建社会的法庭——346、805。
- 反谷物法运动——302。
- 反雅各宾战争——586、641、724、813。
- 反映
- 概述——67、131、139、180。
- 客观关系的颠倒反映——49—51、66—67、69、72、73、84—87、110—111、139、227—232、323、556—559、564、567—570、579、580、646、648、650、683—686。
- 并见本质和现象。
- 方法
- 思维方法——17、405、412。
-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388、845、846、847。
- 黑格尔的方法——847、848。
- 解决矛盾的方法——80—82、98—99、109、132—133。
- 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之间的区别——845、847。
- 经济学辩护论者的方法——109。
- 并见抽象、唯物主义历史观。
- 非生产费用——342、346、358、691。
- 非洲——274、466、813、822。
- 肥料——255、642、664、727、804。
- 分工
- 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353—355、375、377。
- 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365、380。
- 作为资本的生产力——380。
- 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366。
- 自然分工——366、367。
- 地域分工——368。
- 国际分工——474。
-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366—379、533。
- 工业和农业的分工——474、530、531。
- 分工的发展——101、366—369、379—381、397、466—467、514。
- 和大工业——397—400、485、510、511、514。
- 和城乡分离——367。

- 和人口——367,368。
- 和需要——67,70,72,101,372,373。
- 旧分工的扬弃——384,385,497,515—516。
- 古代思想家论分工——382,383。
-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论分工——378,381,554。

分配

- 概述——72。
-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配——72,371。
- 剩余价值的分配——223,598,632,633。
-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分配——72。
- 并见竞争。

分析

- 概述——16,17,50,69,201,217—219,329,338,564,597,598。
- 商品分析——16,17,23,64,69,80,169,199。
- 价值分析——16,35,39,41,50,51,73,74。
- 货币分析——17,39,83—87。
- 资本分析——162,597,598。
- 剩余价值分析——217,218,221,222,426,594,595,692,693。
- 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形式主义的批判——64—75,85—86,207,534,548,564,565,624—627,645—646。

- 对庸俗经济学分析方式的批判——47,52—53,64,74,84—85,229—232,564,565。
- 并见抽象。

芬尼社社员——766。

封建主义(封建制度)

- 概述——71,131,567,612,770,771,772,773,805。
- 阶级——240—243。
- 手工业——335,348,374,380。
- 商业和手工制造业——449。
- 土地所有制——770—777。
- 司法——346,805。
- 它的解体和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449,450,769—774,778,779。
- 剩余劳动——240—244,567,602。
- 德国的封建主义——784,792。
- 多瑙河两公国的封建主义——241—244。
- 英国的封建主义——612,728,770—777,779,803。
- 法国的封建主义——136,803,805。
- 意大利的封建主义——771,803。
- 并见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地产)、徭役劳动、农奴制。

- 否定——53—59,81—82,98—99,119,123,128,133,136—137,143,148,152—153,165,197,208,209,349,385,393—396,

- 401, 483, 599, 615, 616, 617 —
622, 668, 768, 770。
- 否定的否定——59—62, 86—89,
825—828, 848。
- 服务——194—196。
- 辅助材料——184, 206, 212, 643, 664。
- 辅助工人——383, 438—440, 584。
- 妇女劳动——261, 262, 264, 290, 307,
308, 410, 412, 414—416, 419,
420, 438, 452, 453, 485—489,
490—494, 495—497, 507, 517—
519, 522, 525, 526, 554, 576, 731,
745—749。
- 复本位制——138。
- 复杂劳动——见简单劳动和复杂劳
动。
- 赋税、税收制度
- 概述——136, 546, 595, 779, 792,
819, 820。
- 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136,
792。
-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税收——697,
698, 699。
- 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
814, 820。
- 税收和剩余价值——546—547。
- 罗马帝国的赋税——136。
- 法国的赋税——136。
- 亚洲的赋税——136。
- 英国的济贫税——777。

G

盖尔人——786—791。

高利贷资本

- 作为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
143, 162, 163, 812, 813。
- 路德论高利贷——194, 629。

革命

- 革命的客观必然性——826, 827,
828。
- 和工人阶级——18, 19, 515, 516,
844。
- 工厂制度是革命的起点——529。
- 政治革命——450。

个别——见一般、特殊和个别。

个别价值——330, 332, 424。

个人

- 共产主义条件下个人的全面和自
由的发展——510。
- 生产劳动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对个
人全面发展的作用——510, 515—
517, 555。

工厂

- 概述——17, 285, 392—396,
437—446, 483—485。
- 机器是工厂的物质基础——
437—439, 473, 486, 498。
- 和手工工场的区别——439—
442, 486。
- 工厂中的分工——33, 395, 401,
439—442, 484, 486, 511—513。
- 工厂中的协作——394, 395,
438—440。
- 工厂中的总体工人——438。
- 自动工厂——439。

- 工厂的外部分支—— 486。
- “小屋工厂”—— 484。
- 工厂报告—— 18, 232, 245, 294, 379。
- 工厂工人—— 249, 290, 301, 305, 435, 436, 439 — 445, 469 — 472, 477, 478, 482, 483, 486, 511, 530, 610 — 612, 687, 688, 725, 820。
- 工厂劳动—— 246 — 254, 267, 269, 270, 291, 300, 301, 439 — 446。
- 工厂立法
 - 概述—— 233, 515, 516, 517。
 - 作为特殊立法—— 310, 518。
 -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厂立法的必要性—— 18, 244, 291 — 292, 309 — 310, 505 — 509, 518, 529。
 - 扩展到所有工业部门—— 305 — 307, 310, 502 — 503, 518, 519, 528。
 - 工厂主反抗工厂法—— 289, 295 — 305, 444, 445。
 - 违反工厂法—— 246 — 249。
 - 教育条款—— 417 — 419, 509, 515, 523, 524。
 - 卫生条款—— 507。
 - 法国的工厂立法—— 284 — 286, 311, 312。
 - 比利时的工厂立法—— 285。
 - 奥地利的工厂立法—— 285。
 - 瑞士的工厂立法—— 285。
 - 美国的工厂立法—— 279。
 - 英国的工厂立法—— 见英国工厂立法。

- 工厂视察员—— 18, 228, 232, 245, 293, 294, 298, 299, 302, 305, 312, 324, 416, 432, 435, 505, 506, 592。
- 工厂制度
 - 概述—— 287, 310, 372, 420, 433, 436, 443 — 446, 456, 457, 470, 473, 476, 500, 501, 529。
 - 欧文论工厂制度—— 510, 529。
 - 尤尔论工厂制度—— 396, 438, 457, 458。
- 工厂主—— 226, 227, 232, 247, 254, 275 — 278, 288, 289, 293 — 296, 298 — 303, 305, 311, 413, 418, 428, 431, 444 — 446, 480 — 483, 507, 509, 609, 611, 680, 681, 724, 811, 813, 818, 820, 821, 830。
- 工场手工业
 - 概述—— 281, 335, 349, 350, 352, 355, 356, 357, 368, 369, 379, 380, 383 — 385, 393 — 398, 404, 419, 448, 449, 466, 484, 512, 513, 687, 690, 774, 785, 807 — 811, 816, 817。
 - 工场手工业时期—— 350, 355, 362, 363, 374, 379, 380, 383, 390, 391, 392, 396, 399, 447, 449, 513, 586, 799, 809, 817, 820, 822。
 - 作为分工的形式—— 350, 379, 380, 449, 483。
 - 手工劳动是它的起点—— 349 — 353, 362。
 - 双重起源—— 350 — 353。

- 两种基本形式—— 356—358。
- 不同手工业的结合—— 362。
- 中世纪的工场手工业—— 449。
- 它的资本主义性质—— 357、375—377、380、383—385、485—490、504、511—513、799。
- 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 350—354、356—361、363—372、375—380、396、401、439、511—513。
- 工场手工业中的局部工人—— 344、353—358、361、363、364、370、376—378、380、396、398、401。
- 工场手工业中的总体工人—— 353、359、360、363—364、377、401。
- 对工人的影响—— 350—356、359—360、363—365、375—378、383—384。
- 劳动力价值下降—— 365、383。
- 和劳动生产率—— 353—356、358、375、377。
- 技术基础—— 352—353、383、398、439、486、487。
- 与工厂的区别—— 394—396、439—442、486。
- 手工工场中的机器—— 362、363、384、385。
- 为大工业创造前提—— 356、384、386、392、395、397—398。
- 机器使工场手工业革命化—— 483—485、497、499、500、820。
- 过渡到工厂—— 356、388、483、495—500、503、518。
- 现代的工场手工业—— 380、485—490、495—501、504、511。
- ### 工具
- 概述—— 182—183、355—356、386—391、393—395、401—403、439、441。
- 石制工具—— 182。
- ### 工联
- 概述—— 259、456、584。
- 获得法律承认—— 800、801。
- 工人的合作工厂(英格兰)—— 345。
- 工人的联合和结社—— 345、798—802、828。
- 工人贵族—— 346、443、717。
- ### 工人阶级
- 概述—— 797。
- 形成—— 768—774、793、797、803、827。
-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活状况—— 90、167、168、176、177、199、200、258—260、272—273、277、305—307、310—311、313—314、334、346—347、371—372、425、427、439—442、450—451、476、485—488、514、515、530—532、601、602、605—608、654—662、672—693、700—714、720—722、746—749、819、834—837。
-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 171、276—

- 277,606—608,654,834。
-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发展和总人口——468—469。
- 工人一代一代的更替——274—277,689。
- 工人的积聚——531,706,708。
- 社会贫困化——200,451,463,476—478,514,515,531,655—657,684—687,692,693,827。
- 觉悟性和组织性——687,703,827,828。
- 历史使命——515,516,826,827,828。
- 德国工人阶级理论上的阶级意识——844—845。
- 真正革命的阶级——828。
- 资产阶级的掘墓人——828。
- 和革命——18,515,516,828,844。
-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论工人阶级——632。
- 并见**雇佣劳动和资本**、**雇佣工人**、**阶级斗争**、**资产阶级**。
- 工人就业不足**——573,574,586。
- 工人起义**——448,456,457,478,633。
- 工人运动**——244,311—313,447,448,633。
- 工伤事故**——441,445,446,481,508,526—528。
- 工业病理学**——379。
- 工业革命(产业革命)**
- 概述——309,386,387,389,391,399,448,453,495—500。
- 起点——388—391,410。
- 因工厂立法而人为地加快工业革命——500—503,529。
- 工业周期**
- 概述——476,477,504,661,678—680,718。
- 和工人的状况——476—478,482,483,684。
- 和人口过剩——678—680,683,684,687。
- 周期循环性——476,477,678,680,683,703。
- 并见**经济危机**。
- 工业资本(产业资本)**——153,447,809—813。
- 工资**
- 概述——35,173—176,561—570,613,660—662,684。
- 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561,565—568。
- 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表现形式——565—570。
- 作为工人的收入形式——561,565—572,601,602。
- 和工人人口的增长——654,684,685。
- 名义工资——571,572,573,575,577,588,591,723,724,798。
- 实际工资——572,577,588,591,592,799。
- 相对工资——591。

- 计件工资——503,580—590。
- 计时工资——571—575,580—582,584—585,586。
- 日工资和周工资——426,479,480,571—577。
- 工资的最低额——326,633,640,689,690,744,800。
- 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327,408,451,476,550—552,637。
- 工资的相对降低——411,548,551,572—577,585,586,799,804。
- 工资的扣除——280,293,323—324,480,481,582,716。
- 工资提高和降低的原因——497,569—573,654,660,661,683—686,700。
- 工资的国民差异——590—595,638,639,640,839。
- 和可变资本——212,602,603,605。
- 和剩余价值——411,496—497,573,574,578,585,600。
- 和利润——476,477,560,561。
- 和商品价值——578,627。
- 和资本积累——647—652,659—662,683—685。
- 和劳动生产率——337,549,588,589,590,642,643,644。
- 和工作日的长度——305,428—430,569—579,584。
- 和劳动强度——428—430,572,582—584,587,588,590,591。
- 和产业后备军——683,685,797。
- 和过度劳动——253,254,574,575,579,581。
- 工资的法律调节——279,797—800。
- 工资斗争**——449,574,588,589,660,682。
- 工作日**
- 概述——234—238,271,272。
- 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219,220,234—236,325—328,408,534,567。
- 正常工作日——239,240,273,278,287,309,426,427,507,529。
- 它是可变量——234—240。
- 它的最高限度——236—237,424。
- 它的最低限度——236,555。
- 它的道德上的界限——237,272,425。
- 它的身体上的界限——236,237,272,318。
- 结合工作日——336,341,342。
- 工作日的延长——239,242,246—248,258—260,263—265,272,273,285,286,309,317—318,419—421,426,427,438,534,550—554,574—578,584—587。
- 通过法律强制延长工作日——278,279,797,798。

- 工作日的缩短——256、278、284、285、290—293、305—313、334、427—436、550、551、555。
- 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240、278、286、307、310—314、427。
- 十小时工作日运动——227、292、301—302。
- 九小时工作日运动——278。
- 八小时工作日运动——313、436。
- 通过法律限制工作日——243、244、284、286—290、309—312、426—428、500—503、505、506、507、574—576。
- 和绝对剩余价值——220—221、236、263、264、317—322、328、422、551—554。
- 和劳动力——236—240、272—273、315、434—436、503、504、550—553、573—575。
- 和劳动强度——426—432、434—436、550—555。
- 和新机器的采用——421、422。
并见**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工厂立法**。
- 公社(共同体)**
- 概述——73、82、348。
- 公社的形式——82。
- 分工——33、366、367、372—374、382。
- 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82、83、367。
- 古印度公社——33、82、341、348、372—374、539。
- 公有地(公社土地)**
- 概述——242、772、781、782。
- 公有地的侵占——773—774、781—785、804。
- 功利主义**——176、650。
-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 有计划性——72、73。
- 生产——72、510、515、516、531。
- 生产关系——72、73、826、827。
- 生产资料所有制——72、826、827。
- 劳动——72、89、372、510。
- 必要劳动——555。
- 劳动时间的分配——72。
- 社会劳动的组织——72、372。
- 分配——72。
- 教育——510、515。
- 自由人联合体——72、73。
- 每个人的完全和自由的发展——510。
- 资本主义条件下为共产主义创造前提——72、401、443、514—517、529—531、628、826、827。
- 贡赋**——161、618、636。
- 供给和需求**——见**需求和供给**。
- 古巴**——274。
- 古代(古希腊罗马)**——51、52、73—76、85、93、95、126、127、130、136、161、167、170、297、348、363、381、382、425、426、537、784。
- 谷物法(英国)**

- 概述—— 725, 766。
- 谷物法的废除—— 290, 292, 478, 482, 725, 766。
- 股份公司**
- 概述—— 669, 670, 818。
- 作为联合起来的资本家—— 348, 670。
- 股份公司的前驱—— 322。
- 固定资本**—— 646—651。
- 雇佣工人**
- 概述—— 37, 562, 563, 605, 654, 655, 769, 770, 776, 823, 827, 830。
- 雇佣工人的产生—— 167—169, 769—774, 792, 793, 797, 823—826。
- 雇佣工人的前身—— 583。
-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中的雇佣工人—— 631。
- 雇佣工人的双重自由—— 167—169, 770。
- 作为资本的基础—— 170, 220, 348, 450, 531, 605, 606, 830, 831。
- 与奴隶和农奴的区别—— 167, 168, 608, 770。
- 生产的雇佣工人和非生产的雇佣工人—— 468, 469, 533, 534, 607, 608, 683。
- 它的从属关系—— 167, 172—173, 278, 313—314, 347, 371, 376, 441, 504, 600, 601, 608, 609, 654—660, 797, 802, 834—837。
- 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加—— 410, 411, 424—425, 471—473, 477, 654—657, 659—662, 694。
- 雇佣工人受机器统治—— 439—443, 463, 511, 692, 693。
- 雇佣工人能力的片面化—— 273, 277, 352—355, 364—365, 376, 380, 416, 441—443, 462, 692。
- 雇佣工人的技艺和变动性—— 355, 364—365, 515。
- 和生产资料—— 168, 209, 210, 389—390, 447, 452, 531, 604—608, 769—770。
- 和资本家—— 237, 238, 244—255, 261, 286—289, 292, 300, 301, 420, 435—439, 504, 505, 516—519, 600, 601, 602, 716, 718, 724。
- 雇佣工人的营养状况—— 175, 703—706, 729—732。
- 雇佣工人的负债—— 175, 293。
- 雇佣劳动**
- 概述—— 170, 566, 567, 588, 797, 838, 839。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219, 220, 562。
- 作为劳动的一种社会形式—— 170, 220, 562, 563, 566, 567。
- 雇佣劳动的前提—— 166—168。
- 与奴隶劳动和徭役劳动的区别—— 241—244, 567, 602。
- 雇佣劳动和资本**
- 概述—— 168, 187, 306, 343, 344,

- 585, 588, 613, 654, 820。
-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交换——167—168, 173—176, 195—196, 237—239, 307, 308, 313, 346—347, 412, 413, 558, 559, 562, 566—569, 601, 602, 605, 608—610, 769。
-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239—240, 272—274, 276, 277, 313, 314, 375—377, 380, 384, 430, 486, 606, 608—610, 659—662, 801。
-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矛盾——302, 344—345, 442, 450—452, 456, 688, 692, 693。
- 寡头政治——780, 823。
- 观念的和现实的——72—73, 89, 90, 94—99, 103, 104, 112, 123, 124, 131—133。
- 官房学——842。
- “光荣革命”(1688—1689年)——780。
- 诡辩——844, 845。
- 贵金属——69, 83, 85, 88—91, 93—95, 117—119, 128, 818。
- 并见金、银。
- 贵族——297, 376, 390, 774。
- 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9月)——313。
- 国际工人协会
- 为限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而斗争——312, 313。
- 国家、国家权力
- 概述——373, 539, 595, 779, 780, 781。
- 国家权力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95, 96, 124, 242, 322, 595, 797, 798, 814, 818—820, 838。
- 和货币制度——85, 91, 93—96, 116, 119—122, 124, 136—141。
- 国家支出——347。
- 各种国家形式——76, 85, 279, 284, 312, 347, 363, 373, 383, 771, 772, 774, 810, 816, 817, 839。
- 国内市场——119, 758, 808, 811。
- 国债制度
- 概述——817—820。
- 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814, 817—819。
- 过度劳动
- 概述——248, 253, 254, 259—264, 267, 274, 300, 301, 418, 487, 488, 503, 504, 574, 594, 682—683, 747, 758。
- 和工资——254, 574, 575, 576, 580。

H

行会、行会制度

- 概述——354, 374, 380, 797, 813。
- 规章——321, 368, 374, 513。
- 阻碍资本主义发展——321, 374, 769, 813。
- 行会师傅——335, 374, 449, 812。
- 帮工——374。

并见手工业(手工业者)。

航运业

- 概述——815—817。
- 航运业和季节劳动——504—506。

荷兰(尼德兰)

- 概述——390、408、447、448、538、813、814。
- 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814、819。
- 荷兰殖民经济史——814—815、816—817。
- 童工——281。
- 劳工法——278。
- 血腥立法——796。
- 织机梭的制造——468。

化学

- 概述——41、218、322。
- 化学在生产中的应用——396、485、514、644。
- 生产的脉管系统的作用——182。
- 在化学工业中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之间的区别消失——184。

换班制度——263—271、288—291、298—303、323、324、440、500。

并见夜间劳动(夜工)。

挥霍

- 概述——631。
- 封建主的挥霍——630。
- 资本家的挥霍——630—632、706。
- 劳动力的滥用——261—262、271—273、276、277、304、410、

446、486、515、555。

汇率——140。

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直接劳动和过去劳动)

- 概述——183、185、190—192、197、198、202—204、209—211、217、237、423、549、563、601、647。
- 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相互关系——195、319、424—425、647。
- 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对立——323、442、692。

货币

- 概述——39、81、84、85、100、123—125、137、140—141、169。
- 它在历史上的产生——80—84、91—95、169。
- 作为社会关系——81、85、124—128、131、133。
- 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125、126、137、139。
- 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81。
- 作为价值的独立形式——133、139、151。
- 它的价值——86、92、112、114—115、127、128。
- 它的使用价值——84、99、103、133。
- 作为一般等价物——53、61—64、69、81、83、128、131。
-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中的货币——82—83。
- 和价值——80—97、151、166。

- 和商品——80—99、102—113、122、123、129—135、144—147、151。
- 作为一般商品——84—87、105、131—132。
- 作为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128。
- 它包含的矛盾——128、133、140。
- 它的拜物教性质——49、76、85—87、128。
- 货币的计量单位——91—97。
- 作为价值尺度——88—93、98、104、112、123、131、133、138、201。
- 作为价格标准——92—96、119—120、123、138、139。
- 计算货币——95、133、155、164。
- 作为流通手段——99—124、131—134、156、169。
- 作为购买手段——110、128、131、132、139、166、174、461。
- 作为支付手段——121、129—139、166、169、174、568。
- 作为贮藏手段——124—129、131、140、141、149、169。
- 世界货币——138—141。
- 货币的价值丧失——92、93、112、724、799、804。
- 货币转化为资本——144、148—149、160、164—166、168、196、320—321、597、598、605、767、816、818。
- 货币作为资本——143—149、

151、152、600。

并见金、银、纸币、劳动货币。

货币符号——85、86、122、123。

货币理论

- 概述——83—87、89、94—96、123、139、140。
- 货币理论史——16、87、118—120、140。
- 货币数量论——112—113、115—119、122。
- 通货原理——139。

货币流通

- 概述——84、86、122—124。
- 金属货币流通——91—92、120、129。
- 流通货币量的确定——111—113、116—117、132、134、138、139。
- 货币流通速度——113—117、132—134。
- 和商品流通——110—112、114—116、121—124、129、133、144—147、152。

货币名称——91—96、114、120—124、159。

货币市场——137、144、718。

货币危机——133。

货币贮藏和货币贮藏者

- 概述——124—129、131、137、151、152、194、624、628、630。
- 货币作为贮藏手段——125—128、131、140、149、169。

货币资本——133,813。

货殖(亚里士多德用语)——149、150、163。

J

机器、机器生产

——概述——356、363、387、388、393、447。

——机器和工具的区别——386、388、389、393、439。

——工具机——388—391、393—397、400、401、404、430、439。

——工具机是工业革命的起点——388、390—391。

——传动机构——388、392—394、397、398、404、430。

——动力机——388—394、396、398、400、430、438。

——机器作为科学的体现——401、402、442。

——同种机器的协作——393—396、439。

——机器体系——393—398、401、410、427、438、439、442、456、467。

——自动的机器体系——396、452、457、485、507。

——用机器制造机器——400、405、473。

——机器制造业——388、397、401、453、456、465。

——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386、420—421、423、424、427、

430、435、436、466。

——应用机器的矛盾——424—425、463。

——和商品价值——402—408、420—421、423、461—465。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中的机器——206、207、403。

——机器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424、465、472—473、664、671。

——价值和生产率——402—406、419—421、588、590、644。

——往产品上的价值转移——205—208、213、403—408、420—421、644—647。

——有形损耗(物质磨损)——206、207、273、403—405、421、611。

——无形损耗(精神磨损)——213、421、422、499、611。

——价值丧失——213、421、499。

——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0、386、402—407、419、420、423—

424、427、433—436、441、459—465、483、501—504、513、588、

589、644、645、664。

——和自然力——390、391、402—405、442、463。

——资本主义条件下应用机器的界限——408。

——对劳动力商品价值和工资的影响——386、411、423、441、450—

451。

——和分工——395、397、466—467。

- 和超额剩余价值——423、473。
- 和竞争——456、476、497、499、529。
- 和资本对劳动的技术上的统治——440—443、511、512。
- 作为资本的权力手段——430、452、456—457。
-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410—412、419—421、424—431、433—436、439—446、450—466、476、477、485、496—498、507、511—515、530、531。
- 和妇女劳动及儿童劳动的应用——410—419、438、454、485、486、497、510—512、554、820、821。
- 和工作日的延长——419—427、438、463、553。
- 和劳动强度的提高——426—436。
- 和工人被取代——407—408、425、426、448—454、459—466、470—472、496、499、502、530、554、685、686、688。
- 对工人的排斥和吸引——469—473、477—480、687、689。
- 消灭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439—441、497、510、511。
- 和工厂中再现工场手工业分工——440—441、511、514。
- 和劳动力商品买卖双方权利关系

- 的革命——412、413。
- 和非生产阶层的增加——467—469。
- 和手工业的被排挤——384、385、397、450—453、473、483、496、497、499、500。
- 和手工劳动的被排挤——449—453、464—466、496、497。
- 和工场手工业的革命化——483—485、499、500。
- 和棉纺织工业——399、406、407、474、644。
- 机器应用于农业——392、530、685、727、761。
- 资产阶级的机器观——384、385、403、404、441、442、453、456—464、469、470、588、686。

机器的破坏者——447、448、452。

积聚

- 生产的积聚——393、484、529、667—671。
- 资本的积聚——375、503、529、667—671、675、756、816、827。
- 生产资料的积聚——341—344、371、399、450、456、500、667、668、706、806、807、825—826。
- 工人的积聚——341、342、399、486、500、531、706、807、808。

积累基金

- 概述——627、637、642、648、797。
-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积累基金——555。

积累率——628,661。

基础和上层建筑

——概述——18、75、78、131、182、347—349、374、387、513、514、628。

——基础的决定性作用——75、595、657。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75。

——和地理自然条件——30、31、535—538。

并见社会意识、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国家、社会关系、经济关系。

基督教——73、283。

并见天主教、新教(耶稣教)。

疾病、流行病(作为社会现象)——

244、251、252、379、445、446、480、481、486—491、509、531、713、714。

技术革命

——概述——388—389、410。

——力学和化学革命——399。

技术和工艺学

——概述——30、322—323、328、388、473、503、513、514、529、530、643、644。

——在现代大生产中的作用——453、513、514。

——工艺史——363、387。

技术进步

——概述——387—393、395、397、399、463、513、514、643、644。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328、330—332、388—393、397—

402、421、422、424—425、430—

433、453—459、476、477、500—

503、514—516、611、643—645、664、665、827。

并见工业革命(产业革命)。

技艺和手工业协会——379、391。

季节劳动——504—506、744、746。

济贫措施——451、510、719、724、777、778、784。

济贫法——451、478、695、724、733、766。

济贫院——275、284、413、420、611、612、641、703、709、719—720、729、821、822。

加拿大——787、837。

家庭

——家庭的历史性质——516、517。

——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516、517。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家庭——410、411、425、516、517、518、719—722。

——资本主义制度下旧家庭制度的解体——516、517。

——家庭和分工——71、72、366、367。

——家庭劳动——71、72。

——农民家庭——71、731、807。

——家长制家庭——72、731。

家庭劳动、家庭工业

——概述——310、393。

——现代家庭工业——485、486、490—498、504、505、516—521、529、

- 583,641,690,718,758。
- 过渡到工厂——495,496,499,500。
- 和工厂立法——500—503。
- 在农民经济中的作用——485,807,808。
- 价格**
- 概述——54,63,89,92,93,97—98,103—105,112,119,627。
- 作为价值的货币表现——89,93,96,97,102—103。
- 和价值——88—97,99,103,112,122—123,155—157,159,164,172—173,547,550,552。
- 和价值量——89—92,96—97,101,164,165。
- 和货币贬值——93,112,799,804。
- 供求的影响——564。
- 和竞争——499,577,578。
- 市场价格——165,371,461,462,561,564,565。
- 平均价格——165,223。
- 虚幻的价格形式——97。
- 价格变动**——93,112,113,116—117,371,564,661。
- 价值**
- 概述——29,30,32,34—37,41—42,44,52—54,57—59,61,66—69,73,74,101,151,161—165,172—173,220,335,561—565。
- 作为社会关系——38—39,49,51—52,55,59,66,67,72,76,77,87,564。
- 价值实体——16,29,31,35—36,40,50,51,65,563。
- 作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29,35,37,41,42,47,49—51,55,59,68,84—86,87,156,335,561—564。
- 相对价值——39—40。
- 和使用价值——28,29,31,32,35—37,41—44,47—48,55,57—58,67,78—84,101,115,129—135,155—157,188—190,194—196,205,206,210,381,382。
- 和劳动生产率——30,31,36,37,44—46,204,205,327—333,342—343,420—421,427,545,549,550,588,643—645,667,669。
- 新价值——192,202—206,208—211,319,405,644,645。
- 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29,330,332,383,424。
- 和货币——80—97,151,166。
- 和价格——88—97,99,103,112,122—123,155—157,159,164,172—173,547—548,550,551。
- 和资本——146—149,151,152,166,422,423,604,605。
- 庸俗经济学论价值——46,52—53,156,157,209,564,645—646,

- 647。
——价值理论史——16、73—74。
- 价值产品**——216、217、221、226、318、
332、545、547、550、556、557、566。
- 价值符号**——123、124、205。
- 价值规律**
——概述——30、31、68—69、189、
562。
——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作用——319—320、328—332、
371、550、562。
——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166、167、176、196、237—
239、562、563。
——价值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工作日上的应用——550、591。
- 价值量**
——概述——16、29—31、36—38、
44—47、52、53、55、59、61、64、65、
68、69、73、74、83、87、96、97、164、
561。
——价值量的计量——29—31、36—
37、68。
——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
96、165。
- 价值丧失**
——货币的价值丧失——92、93、112、
724、799、804。
——资本的价值丧失——213、423、
643、644。
——劳动力的价值丧失——365、411、
423、568。
- 价值形式**
——概述——38、46、53、54、69、89、
151。
——价值形式分析——16、38—40、
46、50、51。
——价值形式的发展——49、50、52—
56、60—64、82—83。
——简单的价值形式——39、40、49—
54、57、60、63、81。
——相对价值形式——39—49、54、
60、89、93、96、97。
——等价形式——39、40、42—43、
46—50、54、60、86、87、96—97、
100、107、109—110。
——一般等价形式——59—64、69、
80—84、87、98、101。
——特殊等价形式——56、60—63、
84。
——等价形式的特点——47—50、
86、87。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54—59。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54—
58、60、61、89。
——一般价值形式——56—63、80。
——货币形式——16、39、52、61—
64、80—86、89、96、103—107、
109—111、125、139。
——亚里士多德论价值形式——51、
52。
——贝利论价值形式——38、47、55。
价值增殖过程——151、152、188—189、

- 192, 196 — 199, 208, 211, 320 —
321, 323, 324, 345, 403, 450, 600。
- 价值转移** — 202 — 214, 230, 403,
644, 646。
- 监督和指挥(管理)劳动**
- 概述—— 187, 195, 321, 322, 413,
583。
- 作为雇佣劳动和资本对立的结果
—— 345, 346。
- 作为资本家的职能—— 344 —
346。
- 作为协作劳动过程的生产条件
—— 344, 345。
- 监督(管理)劳动的二重性——
345。
-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 概述—— 35, 191, 199, 200, 331,
355, 394, 424, 452, 453, 457, 485。
- 复杂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
35, 200。
- 简单再生产**
- 概述—— 599 — 608, 612 — 616,
617, 620 — 622。
- 和资本补偿—— 600。
- 健康和劳动保护(资本主义条件下)**
- 247, 251 — 253, 261, 271 —
274, 276, 277, 440, 441, 445, 446,
486, 487, 488, 489, 492, 507 —
509, 527, 716 — 717。
- 交换**
- 概述—— 66, 67, 157 — 159。
- 交换的产生和发展—— 58, 81 —
83, 367。
- 产品交换—— 66, 67, 81 — 83,
100, 101, 107, 147, 367。
- 商品交换的产生—— 58, 66 —
69, 81 — 83, 169, 367。
- 商品交换—— 27, 39, 47, 52, 55,
66 — 69, 78 — 83, 98 — 100, 103,
106, 107, 155, 157 — 167, 173 —
176。
- 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
167 — 168, 173 — 176, 195 — 196,
237 — 239, 307, 308, 313, 346 —
347, 412, 413, 558, 559, 566 —
569, 601, 602, 605, 618 — 622,
769。
- 不等价交换—— 148, 158 — 162。
- 作为社会物质变换—— 99, 100,
106, 115, 133, 139。
- 和生产—— 82。
- 和消费—— 80, 99。
- 和流通—— 106 — 109, 147。
- 和剩余产品—— 81 — 82。
- 和需要—— 67, 79 — 82, 100, 101,
105。
- 和等价形式—— 49, 50, 54, 56 —
63, 80 — 83。
- 和社会分工—— 32 — 33, 67, 101,
105, 367, 369 — 371。
- 交换的矛盾—— 79, 80, 98 — 99,
108 — 109。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交换看作剩
余价值的源泉—— 158。

- 并见**买和卖、价值规律**。
- 交换价值**
- 概述——23—28, 39, 58, 96, 99, 101, 123, 133, 147, 150, 155, 206, 240, 333, 568, 619。
- 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27—29, 39, 46, 47, 52, 58, 63, 146。
- 并见**价值、价值形式**。
- 交通和交通工具**
- 概述——368, 399, 400, 505, 506。
- 资本主义条件下交通工具的发展——399, 400。
- 并见**运输业**。
- 交易所**——133, 193, 818。
- 教会**
- 它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242, 272, 294, 658, 659, 690, 694, 726, 816。
- 中世纪的教会——71, 777, 779。
- 英国国教会——19。
- 并见**僧侣**。
- 教育**
-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教育——171—172, 266, 378, 379, 416—418, 515。
- 资本主义条件下儿童的教育——266, 416—419, 494, 509—512, 522—524。
- 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509, 510, 516。
- 综合技术教育——510, 522, 526。
- 和工厂立法——416—419, 509, 510, 515, 529。
-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教育——510, 515。
- 欧文的教育观——311, 510。
- 斯密论国民教育——378。
- 阶级**
- 阶级的产生——535, 767—771, 812, 813。
- 和生产资料所有制——240, 769—770, 823—827。
- 和剩余产品及剩余价值的占有——241, 242, 535, 598。
- 封建社会中的阶级——240—243。
-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18, 199, 200, 240, 244, 276, 277, 294, 295, 308, 309, 345, 468—469, 522, 632, 633, 656—657, 722—725, 828, 843。
- 统治阶级、剥削阶级——18, 240—243, 294, 299, 535, 723, 725, 844, 848。
- 被压迫阶级、被剥削阶级——240, 241, 554, 703, 704, 716, 724, 826。
- 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467—469, 535, 632。
- 消灭阶级——845。
- 并见**工人阶级、农民、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地主)、小资产阶级、中等阶级**。
- 阶级斗争**

- 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130。
- 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131。
-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240、278、286、292、302、305—307、310、344—345、419、427、447、478、529、530、633、700、703、800、801、802、827、828、842、843。
- 经济的阶级斗争——313、448、687。
- 政治的阶级斗争——312、313。
- 阶级斗争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703。
- 并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矛盾。
- 节欲理论**——128、193、220、233、630、631、633、634、767、768。
- 节约**
- 作为资本的趋势——328—329、333、334。
- 不变资本的节约——187、198、270、301、302、338。
- 生产资料的节约——338、342、361—362、427、446、486、489、500、555、827。
- 活劳动使用的节约——187、198、246—249、301—302、333、334、364、675。
- 和活劳动的浪费——261、262、269、270、445、446、486、555。
- 支付手段的节约——132。
- 结社法**——477—478、798、800、801。
- 金**
- 概述——83、84、88、89、119、126、129。
- 作为独特的等价商品——49、63、88、89。
- 作为货币商品——49、63、83—91、93、94、98、99、103、104、122—125、134。
- 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125、129、139。
- 作为价格标准——103、112—113、119、120、123。
- 作为流通手段——112、118—123。
- 作为货币贮藏——126、128、140。
- 作为世界货币——138—140。
- 它的价值变动影响它的货币职能——92、93、112。
- 和银的比价——90、94、138。
- 金的生产——240、241。
- 和世界市场——138—140。
- 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113、813、839。
- 作为奢侈品的原料——84、140。
- 禁止结社法**——798—802。
- 经济(经济学)范畴**
- 概述——109、126、176、634。
- 作为现实关系的理论表现——69。
- 它的历史性质——69、109、169。
- 经济范畴的人格化——19、161、599。
- 并见抽象。
- 经济关系**

- 概述——18、52、78、79、102、103、127、278、313、515、516、595、797。
- 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关系的人格化——79。
并见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产方式。
- 经济规律**
- 它的客观性——68、80、99—101、106—107、277、329、332、662。
- 它实现的趋势——17、35、67、68、96—97、101、107—108、133、514、515、661、662。
- 它的一般性——239、846—847。
- 商品交换规律——92、93、122、157、165、196、197、237—240、615—622。
- 货币流通规律——114—117、122、134、137—140。
- 纸币流通规律——122。
- 供求规律——462、682—687、797、834、835、838。
并见价值规律。
- 经济和政治**——75、131、374、810、814、815。
- 经济时代**——182、665。
并见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经济形态。
- 经济危机**
- 概述——109、246、293、688、703、717、718、843、848。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
- 生产过程的强制中断——210。
- 生产和流通过程的阻滞——116。
- 市场停滞——116、499、678。
-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109、848。
- 周期性——476、678、680。
- 与买和卖的脱节——109、133。
- 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246、247、293、454、574、717—720。
- 社会影响——133、134、703。
- 社会危机——129。
- 货币危机——133。
- 商业危机——117、133、134、479、678。
- 生产危机——116、117、133、529。
并见工业周期。
- 经济形态**——220。
并见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经济时代。
- 经验**
- 和意识——380、398、512—515。
- 经验认识——67—70、122、392、512、514。
- 精神、精神的**
- 精神活动——442、555。
- 人的身体的和精神的——167、276、277、377—379、442、531、533。
- 警察**——373、787、803。
- 竞争**
- 概述——101、360、372、500、501、555、574、644、669、680、681、682、

- 758,801,835,839。
- 竞争的强制规律——278,329,332,372,408,628。
- 自由竞争——278。
- 作为资本集中的杠杆——669。
- 和生产资料及劳动力的按比例分配——371—372。
-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278,330—333,476,497,506,578,579,639,669,670。
- 工人之间的竞争——357,440,486,577,583—585,682,687。
- 和机器——456,476,497,499,529。
- 和工资——577—579。
- 国际竞争——476,482,591,680,830。

居住条件

- 概述——488,492—494,612,713,714。
- 城市工人的居住条件——706—713,719—720。
- 矿区的居住条件——715—717。
- 农村的居住条件——732—743。

具体劳动——见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

绝对剩余价值

- 概述——315—319,328,426,534,535。
- 剩余价值的基本形式——534。
- 和工作日的延长——317—322,328,422,534,535,552。

- 和劳动强度——426—427,535。
- 和自然条件——537—538。
- 和相对剩余价值——427,428,534—535。
- 和劳动对资本的从属——322,323,328。
- 军队——244,338,344,346,473,656,776,792。

K

科学

- 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力量——377,692。
- 作为生产力——30,401,402,442,485,513,514,531,643,644,826,827。
- 资本对科学的开发利用——377,402,457—458,692。
- 和生产——401,402,485,513,514,826,827。
- 和机器——401,402,442。
- 科学被有意识的应用于农业——531。
- 科学的再生产——402。
- 并见自然科学。

可变资本

- 概述——212—214,217,218,315—319,600—603,651,654。
- 和不变资本——见不变资本。
- 和劳动力——212,217—221,315—319,343,424,459—461,601,602,606,607,625,626。

- 和工资——212,600,601,605。
- 和剩余价值——209—212,217—222,315—319,344,424。
- 它的再生产——211,217,600—603。
- 和劳动基金——602,603,650,651。
- 可变资本的束缚和游离——459,460。
- 并见资本的构成。
- 可能性和现实性——80—84,95,96,109,120,185,343,539。
- 克兰(氏族)——788,789。
- 客体——见主体和客体。
- 空间和时间——113,114,226—227,340—342,359,500,567。
- 空想社会主义——72,88,311,510,529,633。
- 扩大再生产
- 资本积累是它的资本主义形式——614—618,620—624,628,635,641—648,654—656,660—668。
- 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下的扩大再生产——636。
- 和人口及工人阶级的增长——654—656,661,662,676—679。
- L**
- 劳动
- 概述——32—34,36—37,53,69,170,179,180,185,186,206。
- 作为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33,37,180,186。
- 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33,180—184,186,533,642。
- 劳动的自然条件——72,537—540。
- 劳动的社会形式——50,59,65—76,88,89,109,128,189,220,322,323,441,442,561—563。
- 社会总劳动——66,67,69。
- 对人的发展的作用——38,180。
- 作为财富的源泉——34,180,183,209。
- 劳动本身没有价值——42,563,566,568。
- 直接社会劳动——50,59,71,87,88,109,344,401。
- 劳动的质量——582,583。
- 劳动的变换是大工业的要求——514。
- 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38,322,323,338,345,347,376—377,440—443,450—452,531,532,599—602,604,605,608,645—648,660,662,687,693,827。
-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72,89,372,510。
- 并见劳动过程、换班制度、农业劳动、工厂劳动、妇女劳动、徭役劳动、手工劳动、儿童劳动(童工)、雇佣劳动、夜间劳动(夜工)、过度

劳动,强制劳动。

劳动不足——293、479、480、573、574、586、680。

劳动对象(劳动材料)

- 概述——181、533—534、642。
- 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180—186、533。
- 作为资本的要素——192、198、202—207、212。
- 土地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181。

并见生产资料。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

- 概述——309。
- 形式上的从属——187、255、322、323、797。
- 实际上的从属——187。
- 和绝对剩余价值——322、323、328。
- 和相对剩余价值——328。
- 和劳动过程——187、328、349、371—372、376。
- 和简单协作——349。

劳动工具

- 概述——182、198、199。
- 劳动工具的分化——355—357、368。
- 劳动工具的专门化——355—357、380。
- 劳动工具的发展——355—356、513。
- 劳动工具的革命——380、514。

并见劳动资料。

劳动过程

- 概述——170—186、191、197、202—212、533。
 - 作为对象化过程——183、191、192。
 - 作为占有——180、183、186。
 - 它的简单要素——180—181、186、202。
 - 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180—182、185、186、209、533。
 - 个人的劳动过程和协作的劳动过程——335—341、344、369—372、401、533—534。
 - 它的主观因素——186、187、211、212、665。
 - 它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183、184—187、202—214、328、337—338、616、665。
 - 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物质内容——180、186、187。
 - 和价值形成过程——188—192、197—206。
 - 和价值增殖过程——195—200、206—207、403、442、597、598、599、600。
 - 它的技术性质——218。
 - 和劳动对资本的从属——187、328、349、371—372、376。
- 并见劳动对象(劳动材料)、劳动力、劳动资料。
- 劳动货币**——89、90。

- 劳动基金**——601—602、603、648—652、681。
- 劳动纪律**
- 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的劳动纪律——291、428、443—446、796。
- 劳动力**
- 概述——29、35—38、42、59、66、67、167、170—173、211、218、219、565、566、642、643。
- 作为商品——166—170、172—176、187、238、239、346—347、412、450、563、564、661、794。
- 它的使用价值——166—167、170—171、173—176、179、187、195、196、238、450、568、580、581。
- 它的价值——170—173、192、195—196、199、200、211、235、273、315、325—329、335—338、383、411、450、544—553、564—570、575、590。
- 劳动力价值规定中的历史要素和道德要素——171。
- 教育费用——172、365、383、590。
- 单个劳动力和社会的全部劳动力——29、36、37、370、371。
-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额——173。
- 劳动力的价格——173—176、544、547—548、550、552、559—561、564—570。
- 劳动力价值降低——365、411、423、495。
- 劳动力的再生产——见再生产。
- 劳动力的买和卖——166—169、173—176、195—196、346、347、411、412、568、612、618—622、768—770。
- 作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187、211、212、665。
- 和劳动生产率——327—328、331—332、424、427、441、531、532、544—550、552—555、643。
- 劳动力的寿命——238—239、272—277、552、688。
- 劳动力的损耗——238、272、550、551、575。
- 并见雇佣工人。
- 劳动契约**——167、173—176、313、412、413、457、800。
- 劳动强度**
- 概述——355、360、426、427、529、544、545、548—552。
- 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30、198、545、549。
- 劳动强度的程度——427、550、584。
- 劳动强度的国家差别——550、590、591。
- 和劳动生产率——355、426—436、465、588、589、682。
- 和工作日的长度——426—432、434—436、549—555。
- 和绝对剩余价值——426。
- 和相对剩余价值——427、553。
- 和机器——426—436。

——和工资——428—429、572、581—585、590、591。

——提高劳动强度的手段——428—430、583、584。

劳动权利——312。

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

——概述——30、31、664—667、674。

——涉及的是具体劳动——37。

——劳动生产率的自然条件——30、535—539、663、664。

——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因素——30、535—539、664—667。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328、337—342、353—356、358、377、402、419、427、430、433—436、510、555、643、667、806。

——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发展——327—332、334、349、353、358、375、380、402、419、420、424、427、433—435、441、453、465—467、483、484、531、532、642—645、664—671、674、675、679—682、692、693、827。

——和使用价值——见使用价值。

——和价值——见价值。

——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工资——327—328、332、424、427、441、544—554、643。

——和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状况——380、419—420、423—424、426—429、441、460—465、531、532、547、548、645、673—

675、679、682、683、687、692、693。

——和剩余价值——见剩余价值。

——和剩余劳动——见剩余劳动。

——和剩余产品——643、666。

——和相对剩余价值——328、331—333、380、423—424、427、428、535、545—551、553。

——和资本有机构成——375、424、664—671、672—675、678。

——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636、642—645、663、672—675、679、681。

——和机器——386、402—407、419、420、423—424、427、433—436、441、459—465、483、501—504、513、590、643—647、664—666。

——和劳动强度——355、426—436、465、587、588、682。

——和相对人口过剩——676—679、691、693。

劳动时间

——作为价值的尺度——29、31、37—38、42、44、45、75、86—90、96—97、427、563。

——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时间的作用——72。

——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227—233。

劳动市场——144、167—170、198、275、276、313、411、413、449、563、608、684—686、770、773、834、838、839。

劳动资料

——概述——181—183、204、206—207、386、394、401、403、441—443、641、642。

——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180—186。

——它的社会性——338、401、827。

——判断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指示器——182。

——土地作为劳动资料——182、183。

——和人——180—183、401、420、441、442、514、531、692、693。

——劳动资料的损耗——205、206、403、643、644、646。

并见**劳动工具,生产资料**。

劳工法——278、279、586、797—801。

类比(类似)

——概述——43、49、66、78、97—99、344、369、480、618、693。

——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的类比——28、41、48、49、61、65—69、97、181、329、386、517、680、689—690。

李嘉图,大卫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地位——64、74、561、843。

——对他的体系的一般评价——595。

——科学的客观性——459。

——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64、70、74、546、548、554。

——论价值——64、74、77、165、207。

——论货币——139。

——论剩余价值——540、541、546、548。

——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548。

——论雇佣劳动和资本——608、677。

——论机器——403、408、409、425、450、452。

——论机器排挤工人——425、452、459。

——论劳动的价值和工资——561。

——论资本积累——625、626、637、645、655。

——否定不变资本——403、625、626、645。

——论总收入和纯收入——234、677。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他的批判——46、55、77、207、562、637、646。

并见**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

——概述——61、843。

——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199。

——论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622—623。

——论工人技能的积累——353、608。

——论资本和资本家——623、812—813。

——论财富——812—813。

李嘉图学派——118、209、320、541、633。

理论和实践

- 概述——52、68、69、169、363、392、396、398、567、595、844。
-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227、338、595。
- 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310、311、454、529。
- 对唯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观的批判——405、406。
- 理想和现实**——78、79、285。
- 力学(机械学)**
- 概述——363、386、387、399、402、513、514。
- 力学规律——392。
- 力学应用于生产——396、485。
- 历史**
- 人类历史的起点——71、182、183。
- 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区别——169、388。
- 经济史——367。
- 人类史的各个时代像地球史一样不能划出严格的界限——386。
- 历史的**——见逻辑的和历史的。
- 立法、资产阶级立法**
- 关于劳动契约的立法——167、797—800。
- 惩治流浪者的立法——793—796。
- 立法的阶级性——17—18、285—287、299、302、307、308、417、608、710、797—802。
- 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278、291—292、313。
- 法国的革命立法——284、285、311、312。
- 并见工厂立法、谷物法、十小时工作日法令。
- 利润**
- 概述——218、242、477、598、627、660、661、824。
- 作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473、548、559、598。
- 超额利润——246—248、473、481。
- 和工资——476、477、660、661。
- 和资本积累——473、633、635。
- 利润率**
- 概述——219、423。
- 和剩余价值率——221、542、548—549。
- 利息**
- 概述——233、405、627。
- 作为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559、598、623。
- 亚里士多德论利息——163。
- 利益**
- 概述——75、176、843。
- 工人阶级的利益——238—239、801。
- 资产阶级的利益——18、19、232、239、246、269、270、287—299、307、507、518、519、522、608、612、780、781。
- 连续性**
- 劳动的连续性——342、355、360、

- 428, 529。
 ——生产的连续性——355, 360, 396, 397, 529。
 ——和分工——355, 360。
联合(结合)
 ——作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376。
 ——工人的结合——340, 356—359。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30, 319, 514, 529, 531, 811。
流动资本——651。
流氓无产阶级——468, 691。
流通、流通过程
 ——概述——107—110, 112—115, 126, 131, 132, 160—163, 176。
 ——国内流通——119, 124, 138—140。
 ——国际流通——119, 139, 140。
 ——和生产——129—130, 197。
 ——和交换——106—109, 147。
 ——和消费——99, 109—110, 147, 148。
垄断
 ——概述——62, 63, 424, 442, 482, 815。
 ——生产资料的垄断——240。
 ——资本垄断——827。
 ——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477, 482, 554, 595, 696, 819。
鲁德运动(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初期形式)——448。
掠夺式开发——244, 272, 273, 276, 277, 376, 377, 486, 487, 501, 531, 532。

- 伦敦**——138, 252, 413, 489, 490, 703, 708, 709, 710, 718, 719。
罗马(古代)——71, 75, 76, 85, 93, 130, 136, 161, 170, 297, 363, 376, 632, 771, 784, 803。
罗马尼亚——240—244。
逻辑的和历史的
 ——概述——91, 143, 144, 164, 169, 170, 335, 349, 388, 420, 536, 604, 605, 618—622, 668, 669, 767—770。
 ——前提和结果——69, 89, 343—344, 359, 375, 535, 536, 605, 618, 667, 668, 767。
 并见**抽象**。

M

马尔萨斯主义

- 概述——161, 657, 658。
 ——反人民性质——554, 555。
 ——马尔萨斯是剽窃者——367, 532, 657, 658, 694。
 ——论工资——554, 587。
 ——人口理论——532, 554, 657, 658, 681, 694, 756。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532。
 ——为寄生阶层辩护——161, 632。
 ——宣扬非生产消费——632。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它的批判——646。
马力——222, 391, 392, 406, 433。
买和卖

- 概述——144—149、154—157、159—160。
- 商品的买和卖——79、100、102—110、115、124—126、130—132、144、148、154、173—174、370、542、568、569。
- 劳动力的买和卖——166—169、173—176、195—196、346、347、411、412、568、612、618—622、768—770。
- 和等价交换——156、157、165、166。
- 买和卖的分离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109、131、133。
- 买和卖的对立——108、109、124、130—134。
- 矛盾**
- 概述——98、99、130、133。
- 矛盾的客观性质——109、165、424—425、463、529。
- 对立的统一和斗争——31、36、39—64、78—84、89、98—100、102—111、143、145—148、151—152、164、165、191—199、203—204、208—210、233—239、355、371、380—381、384、385、395、396、424—425、514、516、605、606、612、622、666—671、692、693、768、769、825—830。
- 和对立——53、60、61、99、108—109、133、239、452。
- 同一、差别和对立——41—44、53、60、61、97—99、108、166—170、603—606、618—622、825—828。
- 矛盾的发展——53、60、80—81、98—99、516、529。
- 商品的矛盾——31、36、53、80—81、109、115。
- 货币的矛盾——97、128、133、140。
- 矛盾的解决方法——80—82、98—99、108—109。
- 贸易差额**——139。
- 美国**
- 概述——368、370、450、647、819、829。
- 经济发展——341、475、484、839、848。
- 工人运动——312。
- 奴隶制——241、273—274、312、346、466、823。
- 移民——276、757、829、837、839。
- 农业——530、532。
- 对外贸易——475、476。
- 工厂立法——279。
- 童工立法——279。
-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18。
- 美国内战(1861—1865)——18、262、312、370、411、453、454、455、478—479、609、789、839。
- 美洲**
- 概述——276、832、834。

- 南美—— 595。
- 西印度—— 274, 816, 822。
- 并见加拿大、美国。
- 民族(国家)
- 自由民族—— 656。
- 掠夺使国家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 244。
- 一个国家可以而且应该从另一个国家的历史中获得教益—— 18。
- 磨损(损耗)
- 概述—— 421, 422。
- 有形损耗—— 189, 206 — 208, 403 — 405, 421, 611, 643, 646。
- 无形损耗—— 213, 421, 422, 499, 611, 644。
- 劳动力商品的损耗—— 238, 273, 550, 551, 575。
- 墨西哥—— 167, 816。

N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 内容(实质)和形式
- 概述—— 17, 24, 29, 38 — 67, 69, 95, 99 — 100, 105 — 106, 116, 120, 143 — 146, 180, 186, 188, 189, 197, 202 — 204, 220, 241, 242, 322, 323, 343 — 347, 438 — 442, 461, 463, 516, 517, 533, 558, 559, 563 — 567, 571, 580, 582, 618, 636, 831。
- 社会形式—— 17, 24, 50, 59 —

- 67, 69 — 71, 76, 77, 95, 99, 169, 179, 220, 349, 380 — 381, 463, 510, 513 — 517, 529, 599 — 603。
- 形式变换—— 34, 99, 100, 103, 109 — 111, 114 — 116, 124, 125, 151, 152, 156, 183, 565 — 568, 770。
- 对资产阶级见解的批判—— 73 — 77, 346, 570, 637, 650, 831。
- 尼德兰——见荷兰(尼德兰)。
- 农产品—— 728, 805, 806。
- 农村
- 资本主义生产在农村的发展—— 809, 810。
- 农村中的相对人口过剩—— 275, 466, 684, 690, 744, 749。
- 农村副业—— 384, 399, 808, 809。
- 农民
- 概述—— 530, 829。
- 土地开发—— 450, 772, 774 — 792, 819, 820。
- 自由农民—— 242, 772 — 776, 785, 797, 804, 806, 809, 811。
- 自耕农(英国)—— 775, 776, 779, 782。
- 徭役农民—— 602。
- 小农转变为雇佣工人—— 530, 784。
- 农民起义—— 725, 792。
- 农奴、农奴制
- 概述—— 71, 348, 390, 770 — 773, 803, 825。

——农奴劳动作为剩余劳动的一种形式——240—242、567。

——农奴制的产生——242。

——和徭役劳动——242、567。

——农奴制的灭亡——770、778。

并见封建主义(封建制度)。

农业

——概述——183、341、342、450、642、744、745、754、755。

——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特殊性——341、643、644。

——劳动生产率——531、532、727、728、807、808。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中的农业——348、349、372、373、538、539、771、772—773。

——资本主义中的农业——415、416、474、475、530—532、684、721—722、723、725、727、803—804、807。

——和大工业——415、416、474、475、485、530—532、809、810。

——机器的使用——392、530、685、727、761。

——科学的应用——530。

——协作——342、348、349、806。

——土地是农业的劳动资料——182。

——和生态的关系——531—532。

并见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地产)、畜牧业。

农业革命——399、450、475、530、757、760、761、765、766、784、804、805、

806。

农业工人

——概述——281—282、409、466、530—532、722、723、772、780、806、807。

——农业工人的状况——175、259、275、277、283、689、704、722—726、728—746、775、776、781、784、785、837。

——农业工人的报酬——587、639、640、685、689、723—727、784、800。

——农业工人被排斥和吸引——689。

——移居城市——258、478、689、728、743、744、745、760、761、806、807。

——农业工人的人数——468、728。

农业劳动——744、745、806、807。

奴隶贸易

——概述——274、412、466、478、814—817。

——资本原始积累中的奴隶贸易——813、822—824。

奴隶制

——概述——51、75、130、167、198、348、569、635、826。

——奴隶劳动作为剩余劳动的一种形式——220、240、241、567。

——作为剥削的形式——241、567、694、784。

——殖民地的奴隶制——274、833。

——美洲(美国)的奴隶制——241、274、312、346、466、823。

- 奴隶制下的劳动工具——198。
- 亚里士多德论奴隶劳动——75。

O

欧文主义

- 概述——88,89,311,633。
- 欧文论工厂制度——510,529。
- 欧文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88,89。

欧洲——136,473,475,482。

偶然——见必然性。

P

贫困化——见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贫民习艺所(英国)——275,276,284,285,413,420,611,612,641,703,709,718—720,729,821,822。

平等(社会的)

- 人类社会平等的概念——51。
- 资产阶级的平等——176。

平民——130,297。

破产——174,239,669,718。

葡萄牙——814。

蒲鲁东主义

- 概述——61,78。
- 蒲鲁东学派——61。
- 它的空想性质——61。
- 把商品生产理想化——61,78,622。
- 论机器——441。
- 对蒲鲁东主义的“构成价值”理论的批判——564。

普鲁士——见德国。

Q

欺诈——569,581,780,805。

企业内部分工

- 工场手工业是它的典型形式——350。
 - 它的计划性——371。
 - 劳动过程细分为不同的操作——352,358—360,363—365,380。
 - 和劳动生产率——353—355,358,359,375,380。
 - 和生产的连续性——355,360。
 - 和时间节省——353—355,358,359。
 - 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353,362—363,365,381。
 - 和协作——350—354,358—362,393—394,439。
 - 和劳动工具的分化——355—357,368。
 - 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355—357,380。
 - 和工人的密集——367。
 - 手工工场内部的分工——350—361,363—371,375—380,395—396,401,439,511—513。
 - 工厂内的分工——33,395—396,401,439—442,485,511—513。
 - 和社会分工——32—33,101,366—372。
- 启蒙运动、启蒙学派——86。

气候

——概述——537—539。

——和需要——171, 538, 539。

前提和结论——594—595。

强制

——概述——536, 540。

——经济的强制——131, 278, 313—314, 322, 323, 797。

——超经济的强制——278, 797。

——法律的强制——608, 792—799。

并见立法、资产阶级立法、资产阶级国家。

强制劳动——322, 410, 567, 602, 610, 611, 693, 694, 778。

圈地运动——782—783, 784—790, 792。

权力

——私人权力和社会权力——127。

——货币的权力——126, 143。

——资本的权力——261, 348, 442, 444, 678。

R

让渡(商品的)——103, 104, 130, 132。

人

——概述——181—182, 205, 391。

——作为社会存在物——19, 43, 176—177, 339—340, 343, 536。

——人的天赋和才能的发展——97, 180, 376—378, 510, 515, 516, 537, 538。

——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180、

183, 185, 186, 209—210, 533。

——在生产力体系中的地位——180—182, 513—516, 641—643。

——人和自然——33, 65, 73, 180—182, 186, 388, 405, 463, 531—

533, 536—540, 642, 676, 826。

——人和劳动资料——180—183, 401—403, 420, 441, 514, 692, 693。

——社会财富的创造者——532, 605, 631, 642, 700。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34, 37, 51—52, 67, 69—71, 176, 243,

244, 271—273, 276, 277, 346—

347, 369, 375—378, 410, 411,

441, 485, 486, 507, 513—516,

530—532, 555, 557, 612, 642,

659—663, 691—694。

——人的需求——33, 65, 72, 180—182, 186, 236—237, 272, 536—

540, 555。

——富兰克林论人——182, 340。

并见个人。

人道主义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18, 281, 307, 308, 707。

——和共产主义——517。

人格化

——经济范畴的人格化——19, 161。

——经济关系的人格化——79。

——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150, 237, 314, 321, 420, 628, 629。

并见人、个人。

人口

——劳动人口——304、320、537、672—
680、682—685、688—692、700、
834。

——工业人口——277。

——城市人口——531、689、710—
713、737。

——农村人口——450、530、689、737—
742。

——流动人口——713、714。

——人口密度——367—368。

——和分工——367—368。

——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661、
662、676—680、682—685。

——人口理论——见马尔萨斯主义。

人口规律——661、662、676—680、
682—685、847。

人口过剩——见相对人口过剩。

人权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人权观念
的阶级局限性——801。

——剥削阶级国家中劳动人民的无权
地位——302—303、314。

——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
的权利——303。

认识

——概述——17、18。

——作为克服本质和现象之间矛盾的
过程——69。

——经验认识——67—69、122、395、
509、512。

——和社会实践——51—52、68、91。

——和阶级利益——554、555、570。

日本——136、773。

瑞典——781。

瑞士

——工厂立法——285。

——钟表制造业——357。

S

三十年战争——757、792。

僧侣——294、301、468、538、632、658、
659、695、779。

商品

——概述——17、28—29、31、33、37、
52、54、57—58、64—66、169、
199、619—622。

——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
——23、127—128。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
169、188—189、369、370、613、
660。

——独立的互不相关的私人劳动的产
品——33、65—68、82、102—
103。

——商品的二重性——28、32、34、37、
52、65、66、78—81、98—103、
106、109、125—126。

——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
81、88—89、98—99。

——和货币——81—98、102—112、
122—123、130—135、144—147、
151、152。

——拜物教性质——49、64—70、76、

- 77。
- 商品的内在矛盾——36、53、80、81、109、115。
- 商品掺假**——175、255、256、257、258、481、640。
- 商品流通**
- 概述——38、69、109、114、115、128、134—135、143—158、160、169—170、601。
- 简单商品流通——106—111、121、125、131—132、136、143—147、149—153、160、176。
- 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144—147。
- 作为资本的历史前提——143、604。
- 商品流通不是剩余价值的来源——148、154—165、598、615。
- 和货币流通——109—111、113—115、121—124、129—130、133、144—147、152—153。
- 国内和国际商品流通——119。
- 和产品交换的区别——107—109。
- 商品生产**
- 概述——33、66—69、72、88、89、101、125、136、169、328、618、619、621—622。
- 历史条件——81—83。
- 作为资本的历史前提——143、604。
- 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存在条件——32—33、100—102、169、366。
- 各种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下的商品生产——109、169、。
-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生产——51、72—73、78、82、125。
-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33、143、148—153、158、166—176、187、188、197—199、263、272、273、309、313、321—323、331、332、334—337、343—353、356—360、362—363、366、369—372、375—380、383—385、399、405、408—413、419—427、430、438—446、450—454、457—486、490、491、495—519、529—532、534—535、555、562、563、567、568、595、597、599、608、612—622、628、642—648、653—663、665—682、691、693、767—769、803—809。
- 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同的简单商品生产——164、169、188。
- 商品形式**
- 概述——33、52、53、60、61、64、65、97、104—106、152、170。
- 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和最不发达的形式——17、64、76。
- 商品学**——24。
- 商人资本**
- 概述——153。
- 作为资本洪水期前的形式——143、374、812。
- 商业(贸易)**

- 概述——133,158,815—817。
- 零售商业——135。
- 批发商业——135,506。
- 物物交换——108,169。
并见对外贸易、世界贸易、世界市场。
- 商业利润——598。
- 商业危机——117,139,482。
- 商业战争——813,817,820。
- 商业资本
——概述——143,147,162—164。
——作为资本洪水期前的形式——162,164。
- 上层建筑——见基础和上层建筑。
- 上帝、神——43,73,127。
- 奢侈、奢侈品——182,467,616,636。
- 社会
——概述——17—20,127。
——社会的形成和有规律的发展——366,367,536—538。
——阶级对立的社会——71,240,536,537,555。
——和自然——33,73,186,387,388,531,532,539,827。
——资产阶级关于社会的理论——75,176,381。
-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概述——30,37,65,189,198,213,360,581,583。
——和商品价值规定——30,31,35—38,44—46,68—69,96,101,173,189—191,212—213,330,331,556。
——和劳动生产率——30,31,36,44,46,47,327—328,330—331,419。
——和个别劳动时间——29,68,71,102,329—332,336—337。
- 社会存在
——概述——377,378。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51—52,67—76,127—128,510。
- 社会分工
——概述——32,33,67,512,513,538。
——和商品生产——32—33,66—68,100—102,169,219,366,369—372。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中的分工——33,366—367,372—374。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工——368—372,466—467,514。
——和生产部门的分化——101,368,466—467。
——和交换——32—33,67,100,101,105,366—367,369,372—373。
——和市场——101—102,382。
——和资本积累——381,668。
——和人口密度——367—368。
——和企业内部分工——32—33,101,366—372。
- 社会关系
——概述——18,49,52,66—73,85,

- 132, 169, 182, 186, 309, 388, 397, 510, 514, 530, 534, 831, 846。
- 社会关系的物化——49—50, 66—73, 77, 85—87, 103, 107, 831。
- 并见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生产方式。
- 社会规律**
- 概述——17, 68, 69, 514—516, 846—847。
- 它的客观性——17, 68, 69, 80, 277, 278, 846—847。
- 它作为趋势——17, 692, 825—828。
- 社会化**
- 概述——107, 108。
- 和资本主义生产——351, 352, 356—357, 362, 368, 401—402, 443, 464—467, 486—487, 499, 514—518, 529—532, 628, 668—671, 826, 827。
-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826, 827。
- 社会进步**
- 概述——381, 500, 825—827。
-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进步——137, 140, 392, 397—399, 425, 463—464, 472—476, 498—501, 515—518, 529, 827, 828, 829。
- 并见发展。
- 社会经济形态**
- 概述——75, 76, 169。
- 它的发展如同自然史发展过程——19。
- 它们按照剩余劳动的形式互相区别——220, 240—244。
- 劳动资料对于判断社会经济形态具有重要意义——182。
- 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分工——371—375。
- 并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经济时代、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主义(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
- 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一般劳动和个人劳动)**
- 和商品生产——32—33, 50, 59, 66—69, 88, 100—102, 109。
- 社会劳动及其在各生产部门的分布——72, 100—102, 370—371。
- 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对立——50, 88, 101, 109。
- 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50, 65—69, 101, 109。
- 社会生产关系**——71, 309, 397, 514, 831。
- 并见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生产方式。
- 社会形态**——240。
- 并见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经济时代。
- 社会意识**
- 概述——388。
- 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67—76, 127—128, 510。

- 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67、69、72—75、372。
- 意识形态——69。
并见意识形态、反映。
- 社会主义**——见共产主义。
- 社会主义革命**
- 概述——515、516、828。
- 客观必然性——19—20、514—516、529、530、826、827。
- 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514—517、529—531、628、826、827。
- 社会总产品**
- 概述——370、599—602、615、755。
- 社会总产品的分配——599—602、797。
- 共产主义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分配——72。
- 神秘化**——49、64—66、69、73、567、848。
并见异化、拜物教。
- 神圣同盟**——843。
- 生产**
- 概述——33。
- 生产的社会性——101—102、369—372、401、512—516、532、599、666—667、668—670、825—827。
- 生产的历史性——72—73、181—183、512—516、628、631、632、825—827。
- 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64、75、628。
- 物质生产——71、73、376、555。
- 为自己需要而生产——31、71、169、242、372—373、808。
- 和人——33、37、73、530、531、628、825、826。
- 和需要——33、70、72、101、125、183、186、240、241、371、467、536。
- 和再生产——136、599、603—608、612—613。
- 为交换而生产——31、66、67、82。
- 和消费——72、185、186、604、605、606、643、660。
- 和流通——130、197。
- 和科学——402、485、513、514、669、826、827。
- 资本主义生产——见资本主义生产。
-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72、510、516、531。
- 生产方式**
- 概述——66、75、86、109、125、136、174、199、306、309、323、328、331—332、367、397、405、473、567。
-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64、75。
- 它的历史性——69、348、349、676。
- 它的改变和发展——17、18、187、309、321、322、335、539、540、722。
- 陈旧的生产方式的延续——18。
- 和劳动资料——386、397、448—

- 451、498、499、825、826。
- 古代的生产方式——51、73。
-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73。
- 封建的生产方式——75、773、813。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并见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生产力。
- 生产方式(生产技术方式、经营方式)**
- 概述——309—310、322、328、330—332、472、477。
- 一个工业领域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工业领域类似的变革——399。
- 生产费用**
- 概述——403、408。
- 生产费用的节约——430、486、487、501。
- 生产关系**
- 概述——17、64、69、71、75、96、102、510、693。
- 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75。
- 它的历史性——69、169、533、595、756、825—828、830、831。
- 生产关系改变的必然性——826、827、828。
- 和所有制关系——72、167、168、176、604、605、618—622、825—828。
- 和分配关系——72。
- 和国家与法——75、278、279、309—310、595、608、657、794—801、813、814、838。
- 古代的生产关系——51—52、73。
- 封建的生产关系——70—71。
- 亚洲的生产关系——73、136。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72、73、826—827。
- 并见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生产方式。
- 生产过程**
- 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188—192、199。
-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30、319、514、529、531。
- 生产过程的技术规律——360。
- 生产过剩**
- 概述——624、633、676、679、681、685—686。
- 和市场商品充斥——499、624、633、676、679。
-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 古代的非生产劳动——537。
-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193、534、535、623—625。
- 简单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劳动——29、32—36、65、75、179、533、534。

- 协作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劳动——
533, 534。
- 生产力**
- 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73、
181—183, 387, 389—391, 513—
515, 628, 667, 826, 827。
- 它的社会性质——338, 342, 401、
443, 667, 826, 827。
- 社会占有生产力的必然性——
401—402, 529, 628, 826, 827。
- 生产力的要素——180—183、
402, 667。
- 人是重要的生产力——180—
181, 515, 641—643。
- 生产力发展中的矛盾——389—
392, 398—400。
- 社会劳动的生产力——339, 342、
346—349, 376, 380, 402, 628、
645, 646, 666, 825, 826, 830。
- 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
力——346—349, 376, 645。
- 协作作为生产力——339, 342、
348, 402, 666, 826, 827, 830。
- 分工作为生产力——358, 379、
380, 402, 666, 826, 830。
- 科学作为生产力——30, 402、
442, 485, 513, 514, 530, 643, 644、
826, 827。
- 自然力作为生产力——34, 402、
442, 537, 538。
-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中的生产
力——73, 198, 199, 389, 536、
537。
- 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
——306, 327—328, 331—332、
334, 347, 376, 380, 386—387、
398—402, 409, 410, 442, 450—
458, 483—486, 496—498, 514、
515, 531, 532, 628, 642—647、
692, 693, 826。
- 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毁灭
——515。
并见**联合(结合)、机器、人、生产
资料、科学**。
- 生产时间**——130, 168, 170。
- 生产条件**
- 概述——101—102, 130, 136、
327, 473, 628, 769, 770。
- 社会平均生产条件——30, 190、
191。
并见**生产资料**。
- 生产形式**
- 概述——68, 70—75, 89。
- 矛盾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
的改造的唯一历史道路——515—
516。
并见**生产关系**。
- 生产资料**
- 概述——24, 72, 168, 183, 186、
208—214, 337—338, 467, 597、
598, 599。
- 作为劳动过程的物质要素——
185, 186, 192, 202—214, 615、
616, 664。

- 作为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
207、208、211、212、218、319、
323—324、328、615、616、642、
643。
- 天然的生产资料——186、207。
- 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的生产资料
——195—198、202—217、263、
323、324、338。
- 和劳动生产率——30、204、205、
555、644、645、664。
- 和雇佣工人——168、209、337—
338、376、447、452、530、604—
608、769—770。
并见劳动工具、劳动资料、生产资
料所有制、机器、原材料(原料)。
- 生产资料所有制**
- 公有制——772、780—782、785。
- 独立劳动的所有者——72、768、
769、825—832。
- 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原始统一
——768、769、825、826。
- 生产资料同生产者的分离——
498、605、606、612、768—771、
808、823—826。
- 私有制——71、81—82、242、
620、621、780、781、823—827、
832、837、838、840。
- 和阶级——240、768—770、
823—828。
- 独立劳动者所有制转化为资本主
义私有制——825—830。
- 资本主义所有制——187—188、
346、412、463、612、620、667—
669、706、786、792、825—828、
837、840。
- 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客观必然
性——826。
- 社会所有制(人民所有制)——
71、72、348、372、781—783、826、
827、833、837。
-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
72、827、829。
- 资产阶级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论述——829—831。
并见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地
产)。
- 生活方式**——83、367。
- 生活资料**
- 概述——24、171、172、181、185、
186。
-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资料具有
商品形式——461、605、808、809。
- 生活资料的价值——171—173、
219、328—329、545、548。
- 它是可变资本的物质形态——
343、375、460—461、607、615、
616、651、807。
- 和劳动力的再生产——170—
173、211、219、326、327、604—
608。
- 必要的生活资料——170—173、
326、328—330、332、477、548。
- 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便宜化——
328—329、423。

- 生活资料掺假——见商品掺假。
- 生息资本**
- 概述——151—152, 164。
- 资本主义前的形式(高利贷资本)——143, 162, 163, 812, 813。
- 并见高利贷资本。
- 牲畜**
- 概述——182, 354, 387, 405, 690。
- 牲畜用于生产——182, 198, 199, 387, 390—391, 410。
- 牲畜作为货币——58, 83。
- 剩余产品**
- 概述——233, 535, 539, 614—616, 623, 642, 643, 650, 659。
-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中的剩余产品——240—244, 636。
- 和必要产品——234。
- 和剩余价值——223, 233, 614—616, 618, 667。
- 和劳动生产率——467, 643, 667。
- 剩余价值**
- 概述——148, 151, 211, 212, 215—216, 219, 559, 597—598, 600, 604, 613—626。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188—189, 237, 263, 272, 273, 309, 318, 333, 338, 344, 386, 534, 660, 661, 820。
- 它的产生——160, 162, 164, 196—200, 535。
- 和剩余劳动——220, 221, 233, 234, 248, 273, 315—318, 320—321, 428, 539, 553—555。
- 和剩余产品——223, 233, 616, 618, 667。
- 和工资——411, 496—497, 573, 574, 575, 578, 585。
- 和可变资本——208—212, 217—222, 315—320, 344—345, 424。
- 和资本预付——148, 149, 152, 215, 338, 603, 604, 617, 618。
-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614—627。
- 与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相区别的它的一般形式——208, 209, 548, 598。
- 剩余价值的分配——223, 598, 632, 633。
- 剩余价值的实现——333, 594, 597—598。
- 和劳动生产率——386, 423—424, 535, 540—541, 544—554, 643, 667。
- 决定剩余价值大小的规律——545—554。
- 商品流通不是剩余价值的来源——148, 154—165, 597。
- 庸俗经济学论剩余价值——160, 208, 209, 220, 227—233, 546, 633, 634, 635。
- 并见剥削、超额(额外)剩余价值、利润、地租、利息。
- 剩余价值规律**

-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
 - 18—19, 660。
- 剩余价值量**
 - 概述—— 315—319, 424, 637。
 - 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因素—— 315—319, 424, 647。
 - 和人口的增长—— 320。
- 剩余价值率**
 - 概述—— 219—223, 231, 236, 315—318, 325, 332, 335, 424, 535, 548—549, 637。
 - 决定剩余价值率的因素—— 315—318, 329, 332, 424, 535, 542。
 - 和利润率—— 221, 548—549。
 -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557—559。
 - 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 219, 221。
- 剩余劳动**
 - 概述—— 220, 234, 236, 239—242, 325, 326, 411, 534, 555。
 - 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535, 536。
 - 它的自然基础—— 535—539。
 - 古代的剩余劳动—— 240, 241。
 - 奴隶制下的剩余劳动—— 220, 240, 241, 567。
 - 封建制度下的剩余劳动—— 240—244, 567, 602。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220, 237, 241, 535, 555, 566—569, 579。
- 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追求
 - 237, 242—251, 263, 269—273, 309, 420, 431。
 - 和必要劳动—— 见必要劳动。
 - 强迫进行剩余劳动—— 240, 241, 272, 273, 278, 322, 536, 540。
 - 作为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 231, 242, 407, 559, 567, 617, 618。
 - 绝对剩余劳动和相对剩余劳动—— 424。
 - 和剩余价值—— 220, 221, 233, 234, 248, 273, 315—318, 320—321, 428, 539, 553—555。
 - 自由时间的基础—— 535。
 - 和劳动生产率—— 328, 332, 333, 386, 424, 534—537, 540, 553, 554。
 - 危机时期的剩余劳动—— 246, 247。
 - 并见剩余价值。
- 剩余劳动时间**
 - 概述—— 220, 567。
 - 和必要劳动时间—— 见必要劳动时间。
 - 和自由时间—— 272—273, 540。
- 失业**
 - 概述—— 440, 450, 451, 460—462, 478, 574, 609, 655, 679, 688。
 - 失业的原因—— 450, 451, 462, 463, 466, 680—683。
 - 失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425,

- 450, 451, 462, 499, 681, 682, 683, 686, 687, 702, 718—720。
 并见赤贫、产业后备军。
- 十小时工作日法令**——233, 290, 292—295, 298, 301, 302, 306, 314, 431, 551。
- 时代**
 ——概述——182, 386。
 ——历史时代——53, 170, 386, 770, 797。
 ——大工业时代——281, 384, 395, 679。
- 实物工资制**——175, 495, 716。
- 食品**——171, 172, 280, 414, 531, 638—640, 703—706, 729—732, 807。
 并见生活资料。
- 使用价值**
 ——概述——24—29, 32, 33, 35—37, 65, 147, 149, 179, 183—186, 568。
 ——自然界和劳动的结合——31, 33, 35—36, 65, 183—185。
 ——和劳动生产率——36—37, 204, 328, 332, 334, 341, 427, 501, 643, 644。
 ——和价值——28, 29, 31, 32, 35—37, 41—44, 47—48, 55, 57—58, 67, 78—84, 101, 115, 129—135, 155—157, 188—190, 194—196, 205, 206, 210, 381, 382。
 ——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24, 42, 79, 150, 188, 190。
 ——交换过程中的使用价值——28, 29, 78—83, 98—103, 130, 155, 157, 158, 166—167, 196。
 ——作为需求的对象——24, 31, 33, 65, 79—83, 99, 101, 127, 147。
 ——和消费——24, 147, 173—174, 185。
 ——和财富——24, 33, 34, 36, 127, 128。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中的使用价值——82—83, 125。
 ——它的价值丧失——185。
- 世界贸易**——138, 139, 143, 478, 616。
 并见对外贸易。
- 世界史**——170, 451。
- 世界市场**
 ——概述——133, 138, 140, 143, 241, 369, 474—476, 478, 505, 554, 590, 591, 595, 680, 696, 827。
 ——资产阶级建立起世界市场——467。
 ——和金银——112, 119, 138—140。
 ——和需要——812。
 ——世界市场商品充斥——454。
- 市场**
 ——概述——99—102, 119, 130, 176, 615。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143, 473—474, 615, 809。
 ——市场的规模和扩展——482, 497, 679。

- 国内市场——119,758,808,811。
- 资本家夺取市场的斗争——476。
- 和交通工具——473,474,679。
- 市场商品充斥——476—478、679。
- 并见**劳动市场**、**世界市场**。
- 收入**
- 概述——600,621,624—627、643,651。
- 原始收入——598。
- 和资本——600,601,621,624、625,626,654,697—699。
- 资本家的收入——600,615、697—699,754—755。
- 雇佣工人的收入——562,565—567,571,572,601,602,659。
- 工人家庭的收入——572,573、721,722,724。
- 手段和目的**——33,69,150,151,180、195—196,328—331,333,334、432,599,600,618,711,819。
- 手工劳动**
- 手工劳动被机器取代——449—453,464—466,497。
- 手工业(手工业者)**
- 概述——350—355,358,359、365,372—374,377,399,441、512,690,809,811,812。
- 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业(行会手工业)——335,348,349,374,380。
-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手工业——310,357,358,483,484,495—501,516,829。
- 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350—353,388,483—486。
- 手工业被机器排挤——384,385、397,450—453,473,483,496、497,499,500。
- 术语**——16,62,126,148,180,220、363,426,498,531,534,556,623、627,641,655,784—787,812、823。
- 数学**——28,46,48,217,316,319、336。
- 税收制度**——见**赋税**、**税收制度**。
- 私有制**——见**生产资料所有制**。
- 斯密,亚当**
- 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地位——64,363,625—627。
- 他的理论中的矛盾——37,38、625—627。
- 论劳动——37,38。
- 论价值——37,38,64,165。
- 认为利润、地租和工资是独立的价值源泉(“斯密教条”)——627。
- 论货币——117。
- 论资本——559。
- 论资本积累——625,631,655、663,667。
- 论分工——117,363,369,370、378。
- 论“自然价格”——565。
- 论工资——565,569,603。
- 否定不变资本——626。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他的批判
—— 591, 592。

并见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死亡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概述—— 261, 263, 304, 713。

——工人儿童的死亡率—— 414 —
416。

——工厂区和农业区相比的死亡率
—— 304, 414 — 416, 490。

苏格兰

——概述—— 175, 259, 417, 418, 639,
730, 778, 786 — 792, 800。

——历史—— 786, 787, 788。

——农业—— 698 — 699, 764。

——氏族制度—— 786 — 789。

——货币和银行—— 137。

——废除农奴制—— 778。

——移民—— 276, 787。

所得税—— 698, 699, 754。

T

特权—— 283, 303, 304。

特殊—— 见一般、特殊和个别。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概述—— 180, 533。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
377, 378, 442。

天文学—— 538。

天主教—— 75。

铁路

——概述—— 468, 504, 507, 670, 684,
699, 714。

——它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
399 — 400, 839。

——铁路上的超额劳动和事故——
259, 260。

——和季节劳动—— 504。

通货原理和通货学派—— 661。

同一和差别—— 41 — 43, 53, 108 —
109, 148, 151 — 152。

并见对立、矛盾。

同义反复—— 61, 96, 108, 215, 561,
651。

统计

——概述—— 280。

——社会统计—— 18。

——作为资产阶级辩护士的手段——
282, 439, 764。

投机

——概述—— 135, 147, 630。

——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 193,
212 — 213, 277, 630, 708 — 709,
717, 733, 735, 839。

土地

——概述—— 31, 83, 97, 181, 182,
531, 532, 826, 827, 833。

——作为劳动最初的条件—— 181。

——作为劳动资料—— 182, 183。

——作为劳动对象—— 181, 186。

——作为财富的源泉—— 34, 532,
642。

——滥用土地—— 244, 273, 531, 532。

土地肥力

——概述—— 531, 532, 537, 538, 553。

- 自然肥力—— 537。
- 运用科学技术提高土地肥力—— 642、727。
- 土地肥力遭破坏—— 273、531、532。
- 土地贵族**—— 723—725、844。
- 土地所有者(地主)**—— 19、294、450、522、598、632、639、640、656、698、717、723、724、728、733 — 736、744、761、779—783、785 — 788、803、804、805。
- 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地产)**
- 概述—— 143、725、734、772 — 774、776、777、779、780、785、786、806。
- 大地产—— 779、782、843、844。
- 地产的历史—— 76。
-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产生—— 723、792。
- 土耳其**—— 136、810。

W

唯物主义

- 历史唯物主义——见**唯物主义历史观**。
- 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388。
- 唯物主义历史观**—— 16 — 20、64、69 — 76、169、181 — 182、386 — 387、510、512 — 518、529 — 538、657、767—771、827 — 828、846 — 848。

- 文明**—— 94、241、366、656、695、708、711、736、846。

文学

- 古代(古希腊罗马)文学—— 127、255、381、426。
- 资产阶级文学—— 117、248、262、281、514、649、656。

乌得勒支和谈—— 822。

无产阶级——见**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200、451、476 — 478、514、515、531、532、654 — 657、684 — 687、692、693、706 — 711、827。

并见**资本积累**、**失业**、**赤贫**、**产业后备军**、**相对人口过剩**、**过度劳动**。

无产阶级专政—— 515、516、827、828、845。

无神论—— 19。

物化

——社会关系的物化—— 49 — 50、66 — 73、77、85 — 87、103、107、831。

——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 66、67。

——共产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被扬弃—— 72、73。

并见**拜物教**、**对象化**。

物理学

- 物理的一般规律—— 34、48、61。
- 物理运用于生产—— 24、392、501。

——摩擦学说——392。

物质变换

——社会的物质变换——99、100、107、115、139。

——自然的物质变换——185。

——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33、186。

——土地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531、532。

物质基础

——概述——388、510。

——工场手工业的物质基础——352—353、383、397。

——大工业的物质基础——380、397—400、442、473、485、486、498、514、675。

物质生活条件——443—446、450—451。

物质性

——人类实践具体活动的物质性——180、182。

——社会关系的物质性——18、19、39、41—44、49、59、66—73、107、169。

X

西班牙——539、813、814、822。

希腊(古代)——51、75、95、126。

现象——见本质和现象。

现役劳动军——674、682、683、685—686、689—692。

宪章运动——290、292、294。

相对人口过剩

——概述——276、474、676—686、709、749、757、758、762、839。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514、515、676—681、685、686、691、693。

——人口过剩的人为性质——424、675、676、679、680、684、685。

——人口过剩的不同存在形式——686—692。

——作为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结果——408—409、425、450—451、485、554、686—688。

——和资本积累——674—679、681、683—684、687—693、834。

——和工业周期——678—680、683、687。

——和劳动生产率——682、692。

——农村中的相对人口过剩——275、466、677、685、690、744、745、748。
并见赤贫、产业后备军。

相对剩余价值

——概述——328、423、427、534—535。

——作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327—328、331—332、333、380、423—424、427—428、535、545—552、553—554。

——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328—332、334、535、555。

——和劳动强度——427—428、553—554。

- 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 328、332、423、545—552。
- 和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 548。
- 和超额剩余价值—— 329—333、423、424。
- 和绝对剩余价值—— 427、534—535。
- 和劳动对资本的从属—— 328、381、424—425。

消费

- 概述—— 99、147、148。
- 和生产—— 72、185、186、604、605、643、660。
- 和积累—— 620、624—631、659。
- 和流通—— 110、147、148。
- 和交换—— 80、99。
- 和再生产—— 604—608。
- 和使用价值—— 24、147、173—174、185。
- 个人消费—— 72、171、172、186、600、605—608、613、630、631。
- 生产消费—— 72、186、187、198、210、599、604—608、613。
- 对劳动力商品的消费—— 174、176、179、187、197、237、250、251、604—608、619。
- 资本家的消费—— 467、620、623—626、628—632、643。
- 消费资料—— 65。

消费基金

- 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600、601、616、624、627、648。

- 工人的消费基金—— 637、641、797。

- 小生产—— 479、483、484、496、519—521、529、530、825。

- 小先令派—— 237。

小资产阶级

- 概述—— 689。
- 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 479、708、758、829。
- 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破产—— 479、484、503。
- 它的意识形态—— 61、78、81。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 和商品生产—— 61、78、81、88、89、622。
- 关于商品直接交换的空想—— 61、81、88、89。

协作

- 概述—— 335、338—343、350—354、393、483、558、666。
- 协作的前提—— 335、348、349。
- 作为社会生产的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 348、349。
- 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 339、342、347—349、402、666、826、827、830。
- 作为分工的前提—— 350、358、359。
- 简单协作—— 335—342、346—351、360、376、377、394、401、498。
- 工厂中的协作—— 394、438—440。

-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中的协作
—— 347, 348。
- 资本主义协作—— 343—349。
- 简单协作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 338。
- 农业中的协作—— 342, 348, 807。
- 殖民地的协作—— 348。
-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协作—— 827。
并见工厂、联合(结合)、工场手工业。
- 新教(耶稣教)**
- 概述—— 73, 283, 694, 777—779, 816。
- 和人口原理—— 658。
- 信用(信贷)**
- 信用制度—— 134, 135, 630, 669, 670, 817—819。
- 国际信用—— 819。
- 和资本积累—— 669, 670, 679。
- 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信用关系—— 174, 175, 543。
- 公共信用—— 见国债制度。
- 信用货币**—— 121—135, 818。
- 形而上学**—— 845。
- 形式**—— 见内容(实质)和形式。
- 形式和职能**
- 它们的相互作用—— 61, 81, 83, 84, 111, 121, 123, 124, 130, 131, 355, 396—399。
- 形态变化**
- 概述—— 54。
- 商品的形态变化—— 98—100, 102—111, 114—115, 123—125, 129—132, 141, 155, 156, 205。
- 资本的形态变化—— 597, 598, 614, 616, 671。
- 需求和供给**
- 供求规律—— 462, 682—687, 797, 834, 835, 838。
- 供求一致—— 156, 564。
- 和劳动力—— 34, 458, 577, 671—687, 797。
- 和工资—— 317, 564, 569, 654, 684—686。
- 需要**
- 概述—— 23, 24, 33, 538—540。
- 作为历史的产物—— 171, 236—237。
- 它的社会规定性—— 125, 171, 237。
- 和交换—— 67, 79—82, 100, 101, 105。
- 和生产—— 33, 70, 72, 101, 125, 183, 186, 240, 241, 371, 467, 536。
- 和消费—— 147。
- 和劳动生产率—— 536, 537。
- 和分工—— 67, 70, 72, 101, 372, 373。
- 和新需要的产生和得到满足—— 101, 467。
- 需要的体系—— 125, 371。
- 自然需要—— 171, 537。
- 社会需要—— 67, 101, 371。
- 个人需要—— 67, 126, 237。

——雇佣工人的需要——171, 314, 322。

——生产需要——384, 399, 400。

畜牧业——184, 752, 755, 757, 765, 766。

学徒——281, 368, 511, 631, 798, 821。

血汗工资制度——583。

Y

鸦片和鸦片战争——132, 414, 416, 813, 815。

雅典(古代)——75, 381, 382, 383, 537。

亚洲

——概述——161, 347, 348, 472, 473, 478, 482, 539, 540。

——原始社会、古代、中世纪的亚洲——33, 71, 82, 347, 397。

——亚洲资本主义前的地租形式——136。

——货币贮藏——125。

——亚洲国家——347, 372—374。

——和欧洲国家——136, 473, 478, 482。

徭役劳动

——概述——71, 241—243, 567, 602, 792。

——徭役劳动和雇佣劳动——241, 242, 567, 602。

夜间劳动(夜工)——251, 253, 256—259, 263—270, 286, 287, 311, 323, 488, 495, 501, 503, 594, 822。

一般、特殊和个别——53—60, 71, 80—81, 84, 113, 127, 128, 151, 170—173, 179, 366。

并见抽象。

移民

——概述——384, 451, 482, 483, 652, 680, 688, 750, 787, 839。

——工厂工人的移民——482, 483, 609—612。

——来自爱尔兰的移民——750, 757, 764, 765, 766。

——往英国殖民地移民——276, 474, 836, 838, 839。

异化

——原因——67—69。

——和生产资料所有权——345, 605, 612。

——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异化——38, 320—323, 338, 344—347, 376—378, 440—443, 531, 532, 599—602, 605, 608, 645—648, 661, 662, 687, 688, 691—693, 827—828。

——消除异化的条件——827。

并见拜物教、神秘化。

意大利

——资本主义的发展——771。

——热那亚和威尼斯——817, 819。

意识形态

——概述——72—73。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64, 75, 109, 176, 324, 372, 388, 463, 470、

- 829, 848。
——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61, 78, 81。
因果性——83—84, 135, 167, 168, 343—349, 366—369, 411—417, 419—420, 452, 453, 461—463, 465—466, 496—501, 503, 512—517, 529—531, 536, 545, 547—551, 599—602, 612, 613, 618, 619, 620, 628, 636, 656, 657, 659—661, 666—671, 674—680, 689, 690, 767—770, 819, 826, 827—828。
银
——概述——129。
——作为货币商品——49, 83, 84, 90, 93, 94, 120。
——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125, 139。
——作为货币贮藏——125, 126, 129, 140。
——与金的价值对比——90, 91, 93, 94, 138。
——作为世界货币——138—140。
——和世界市场——138—140。
银行
——概述——133。
——国家银行——138, 818。
银行法(1844年)——138, 839。
银行巨头——724, 780, 818, 839。
银行券——134, 138, 140, 818。
印度
——概述——71, 132, 368, 372, 373, 451, 539, 815, 816。
——生产方式——125, 636。
——印度公社——33, 82, 341, 348, 372—374, 539。
——棉花生产——368, 407, 474。
——造纸业——397。
——金和银的输出输入——125, 129。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影响——815, 816。
印加国——82。
英国
——概述——19, 755, 809—811。
——历史——91, 258, 281—282, 384, 392, 448—449, 553, 554, 608, 609, 638—640, 645, 654, 756, 776—779, 813, 814, 822。
——资本主义的起源地和典型国家——17, 18, 245, 310, 696, 814, 848。
——人口——200, 468, 469, 688, 689, 697—700, 772。
——工人的状况——90, 174, 175, 253—254, 260—267, 286—288, 291—295, 300—307, 313, 314, 409—427, 434—435, 451, 454—457, 465—469, 474, 476—483, 485—498, 507—512, 518—520, 523—528, 574—577, 580—581, 608—613, 639, 640, 682, 700—705, 717—737, 742—746, 772—775, 798, 799。

- 资产阶级—— 275、288、289、292—303、306—310、417、443—448、469、477、478、725、780、781、843。
- 阶级和阶级斗争—— 310、311、700、703、725、842—844。
- 工业—— 264、287、307—308、431—436、453—456、465、466、468、470—474、477—479、486、487、700。
- 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工商业垄断—— 477、482、554、595、696、811、819。
- 农业—— 308、415、416、530、612、698、704、721—728、742—749、772—775、779—788、803—810。
- 劳动生产率—— 406、470、471、592、594、684、697。
- 财富的增长—— 630、631、697、702。
- 劳动时间—— 232、244—246、249—257、259—268、278、284—296、300—308、427、430、431、488、574—577。
- 工资—— 276、279—280、293、479—482、495、574、575、586、587、684、689、701、702、723—727、784、797—800。
- 经济危机—— 246、247、293、454、703、717、718、848。
- 货币和银行业—— 91、92、121、122、132、134、138、818、839。
- 对外贸易—— 125、437、474—478、482—485、609、699、815、816。
- 殖民地和殖民政策—— 341、369、451—452、474、482、636、815、816、822、823、833、839—840。
- 政党—— 290、292、294、520、801。
- 立法—— 18、91、244、245、275—281、284、286—311、451、478、516—521、529、586、612、695、724、733、766、774、775、778、780、793—796、797—801。
-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 780。
并见反雅各宾战争、英国工厂立法、谷物法、伦敦。
- 英国工厂立法**
 - 概述—— 18、227、244、245、276、278、284—311、314、412、413、416—419、431—432、435、490、491、508、509、510、516—522、528、529。
 - 人为地加速工业革命—— 500—503、529。
- 英国议会**—— 18、272、284、286—289、291、292、307、413、416、502、516、519—523、612、707、709、775、800、801、816。
- 游离**
 - 资本的游离—— 459、460、462、686。
 - 劳动力的游离—— 408、425、

- 449—452, 460—463, 470—473, 496, 530, 675, 676, 680, 681, 683, 686—688, 744, 745, 757。
- 语言**——24, 43, 62, 68。
- 原材料(原料)**
- 概述——181, 465, 466, 473, 474, 642。
- 作为半成品——184。
- 作为产品的主要实体和辅助材料——184。
- 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原料——189—192, 202—206, 212。
- 作为生产资料——168, 183, 185, 187, 212, 215—216, 599, 642。
- 作为不变资本的要素——192, 212—213, 807。
- 原材料的价值变化和价格变化——204, 212。
- 和劳动生产率——204, 375, 466, 643, 644, 664。
- 原始社会**——82, 180, 366, 367, 372—374, 536, 537, 652。
- 运河**——183, 467, 539。
- 运输业**
- 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400, 474。
- 和世界市场——467。
- 运输工具——399, 400, 679。
- Z**
- 再生产**
- 概述——136。
- 再生产是每个社会存在的条件——599。
-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599, 600, 607, 608。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604—608, 612, 618, 654, 661—663, 769, 770。
- 作为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599。
- 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170—173, 211, 219, 235, 238, 325—329, 331, 601, 602, 604—608, 654, 660。
- 不变资本的再生产——642—644。
- 造船业**——400, 401, 718。
- 债权人和债务人**
- 概述——95, 124, 130—132, 297。
- 古罗马的平民债务人——130, 297。
- 封建社会的债务人——131。
- 债役**——168。
- 占有**
- 对自然的占有——180, 183, 186, 533, 534。
- 通过劳动占有——24, 33, 180—183, 186, 533。
- 和所有权——187—188, 402, 601—604, 617—623。
- 不支付等价物的占有——601, 602, 604, 621, 622, 631, 660。

战争

- 概述——348, 381, 774。
- 对社会和发展的影响——140, 453, 455, 684, 774, 813。
- 兵役状况——244, 784。

爪哇——407, 815。

蒸汽机

- 概述——388 — 393, 396, 397, 400, 406, 430, 433, 456, 499, 511, 516。
- 在大工业中的革命作用——391, 392。

政治和经济——76, 131, 374, 810, 813, 814。

政治经济学

- 作为科学——19, 64, 381, 842。
-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381, 541, 542, 570, 657, 658, 723, 842 — 845。
- 政治经济学的枢纽——32。

殖民——474, 830 — 833, 838。

殖民地

- 概述——348, 687, 814 — 817, 829 — 840。
- 殖民地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成——830。
- 殖民地中的协作——348。
- 殖民地中的奴隶制——274, 833。

殖民地市场——399, 449, 497, 679, 816。

殖民理论——830, 833 — 836, 838, 839。

殖民体系——369, 814 — 817, 820。

纸币

- 概述——121 — 124, 450。
- 纸币的强制流通——121, 123 — 124。
- 纸币流通的规律——122。

质和量

- 概述——24 — 29, 34, 36, 39 — 65, 74, 83, 84, 86 — 89, 95, 102, 112 — 113, 122, 128, 129, 132, 134, 137, 143, 144, 148, 149, 164, 166, 173, 191 — 201, 208 — 210, 230 — 231, 233, 234, 322, 335 — 344, 349 — 352, 355 — 356, 380, 381, 386 — 391, 393 — 397, 399, 400, 477, 599, 600, 615, 616, 618 — 622, 668 — 671, 767 — 771, 825 — 828。
- 量变转变为质变的规律——53 — 64, 322, 335 — 342, 618 — 622, 767 — 771, 825 — 828。
- 和度——30, 65, 68, 69, 71, 72, 74, 88, 89, 122。
- 并见矛盾。

中等阶级——18, 200, 691, 708, 819, 830。

中国

- 概述——121, 125, 788, 813。
- 中国的造纸业——397。

中间人小业主——486, 498, 583。

中介(中间环节、中项)

- 概述——33, 133, 145, 163, 181,

- 183,202,319,818。
——中介运动——87,100,598。
- 中世纪**
——概述——120,405,449,770,773、812,813,817。
——欧洲中世纪的特点——70,71、78,773。
——和天主教——75。
——中世纪的教会——71,777,779。
——中世纪的协作——348,349。
——中世纪的城市——449,797,812、813。
——阶级斗争——131。
——封建债务人的没落——131。
——行会制度——321,374,513,797、813。
——中世纪里昂的转账处——133。
 并见**封建主义(封建制度)**。
- 种姓,种姓制度**——354,383,538。
- 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的功绩——627。
——关于所有非农业劳动都没有生产性的学说——193,534。
——论剩余价值——559。
——论再生产(《魁奈经济表》)——627。
- 重商主义**
——概述——139,153,541,542。
——论价值——52,53。
——论资本——153。
- 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主客体关
- 系——151,152,322,323,395、401,420,438—442,531,532。
- 铸币**
——概述——95,119,120,123,124、140。
——铸造——119,120。
——辅币——120,121,138。
——作为价值符号——120。
——铸币的流通——120—124,129。
——零售商业中的铸币——135。
——铸币的磨损——120,121,140。
——铸币的历史——91,92,120。
——铸币伪造——85,94。
- 专制**
——概述——792。
——资本的专制——345,419,456、457,686,687,693。
——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371。
- 准备金**
——概述——137,242。
——支付手段准备金——137,169。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准备金——555。
- 资本**
——概述——165,423,559,603—605,616,617,618,622,623,825、826,830,831。
——作为社会关系——169,322,558、559,830,831。
——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148、149,151,153,196,237,272,273、320—324,600。

- 作为商品——151、152、196、197。
- 作为货币——132、144—146、149—152、196、197、600。
- 资本的历史——143、812、813。
- 它的历史前提——143、166—170、536、537、604、767—771。
- 它的产生过程——144、145、278、321、535—537、767—771、816、817、819、820。
- 货币是它的第一个表现形式——143、144。
- 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143—156、158—165。
- 资本的最低额——321、322、343、375、669。
- 和价值——146—149、151、152、166、422、423、604、605。
- 和收入——600、601、620、624、625、626、647。
- 个人(单个)资本——343、344、667、668。
- 社会总资本——320、615、649、667—672、674—676、679。
- 它的洪水期前的形式——143、162—164、374、812、813。
- 它的历史性质——143、169—170、276、277、321、767—771、825—828。
- 它的拜物教性质——76、147、148、829、830。
-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论资本——76、150—153、160、186—

- 188、209—211、606、617、622、623、624、831。
- 庸俗经济学家论资本——150、633、634、635。
- 并见资本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构成。

资本的构成

- 概述——670、675、678。
-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水平的表现——465、472—473、663、665。
- 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构成——215、319、375、424、465。
- 价值构成——665、666。
- 技术构成——218、375、653、654、663、665—667、670。
- 有机构成——213、214、375、653、670。
- 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472—473、665、666。
- 可变资本相对减少——424、472—473、665、666、668—676。
- 不变资本相对增加——424、472—473、644、665、666、670、672、673。
- 和劳动生产率——375、424、664—671、679。
- 并见资本积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
- 资本的生产率(资本的生产力)
- 作为劳动生产率的特殊社会形式——347、349、375。
- 资本的原始积累

- 概述——450,603,604,667,767—
828,839。
- 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
768—771,819,820。
- 原始积累的方法——772—792、
813,822—826,839,840。
- 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770、
776,792,797,806,813—820。
- 血腥立法——793—796,798。
- 圈地——775,781—785。
- 资本积聚**——375,503,529,667—
671,675,698,756,816,827。
- 资本积累**
- 概述——614—622,624,628、
635,641—648,653—658,660—
669。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
622,624,632,662。
-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653,654,692,693。
- 资本积累的对抗性质——707、
721。
-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825—
828。
- 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中的积
累——636。
- 和人口增长——673,674,678、
679。
- 资本积累的条件——597,614—
622,624,625,654。
- 资本积累的界限——667。
- 作为持续过程——666,667。
- 和工资——650—655,659—
662,683—686。
- 和劳动生产率——636,642—
645,664—671,673—675,679、
682。
- 和社会分工——381,669。
- 和资本积聚——667—671,675、
698。
- 和资本有机构成——642,665—
671。
- 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637、
642,659,684,686。
- 和工人阶级的状况——653—
659,672—687,692,693,706、
711,834。
- 和工人被排斥和吸引——671—
684,687,688。
- 和消费——620,623—631,660、
706。
- 和信用——669,679。
- 和利润——473,635。
- 和雇佣工人人数的增长——647、
654—656,661,662。
- 和相对人口过剩——674—679、
681,682,683,684,686—693、
834。
- 并见资本的原始积累。
- 资本集中(资本的本来意义的积聚)**
——667—671,827,839。
- 资本家**
- 概述——150,151,320,321、
335—336,597,598,600,677、

- 713,803。
- 作为资本的人格化——150,237、314,321,420,628,629,656。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承担者——19,150,278,628。
- 资本家的职能——187—188、194—198,321,322,344—346、628,629—630。
- 工业资本家——398,522,546、598,633,807。
- 工业资本家的产生——812,813。
- 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活动的目的——150,188—189,237、244—248,270,333,420,424、584,585。
- 资本家的致富欲望——150,481、628—630,654。
- 资本家的挥霍——463,630—632,648,706。
- 资本家所理解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来源——227—232,569。
- 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的区别——151,152,630。
- 资本家的寄生性——346。
- 资本家阶级**——见**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
- 资本流通、资本流通过程**——149、595,597,648。
- 《资本论》(它的结构构成)**
- 概述——16。
- 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590,627。
- 资本的总过程(资本和利润)——218,219,223,338,405,423,425、446,473,507,549,598,627。
- 竞争——329。
- 雇佣劳动(工资)——570。
- 政治经济学史——74,320,363。
- 《资本论》(它的推广传播)**
- 俄文版——14。
- 德文第二版——14,841,848。
- 剥削阶级对《资本论》的反应——845,846。
- 资本输出**——652,834,835。
- 资本预付**
- 概述——211—218,263,315、319,338,343,619—622,625、626。
- 预付可变资本的特点——212、218,219,315—321。
- 预付不变资本的特点——217、218,642。
- 和产品价值——212,215,330—331,591,592,597,598,599。
- 和剩余价值——148,149,152、215,338,603,604,617,618。
- 和剩余价值率——217。
-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473—476、482。
- 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 像自然史一样的规律——554、555。
- 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278、329,332,372,408,482,628。

- 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319、329—332、371、464、550。
- 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18、660。
-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653、654、662、680、692、693。
- 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372。
- 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532。
- 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661、662、676—680、682—685。
- 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规律——667—671、827。
- 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604、605、618—622。
- 资产阶级关于经济规律的观点——683—687、846—847。
- 资本主义生产**
- 概述——176、273、276、321—323、365、372、375—376、379—380、417、442、450、529—532、535、536、562、603—606、660、661、678—680、691、692、749、767、770、771、775、776、834。
- 它的起点——320—323、335、351、604、667、767—771。
- 最初出现于14和15世纪——770、771。
- 生产剩余价值是它的目的——见
- 剩余价值。**
- 它的发展——276—277、344、347、359—360、368、375—376、397—398、402、408—410、414、427、441、442、449、450、470—473、483—486、496—501、516、517、529、530、534—535、639、640、666—671、673—675、678、679。
- 和价值规律——319、328—333、371、550、562。
- 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327—328、332、334、349、353、358、375、380、402、419、420、424、427、433—435、441、453、465—467、483—485、530—532、642—647、663—671、674、675、679—682、692、693、827。
- 和资本积累——614—625、628—633、641—647、663—675、678、679、681、683—686。
- 和社会化——351—352、356—357、362、368、401、443、465—467、486、499、514—518、529—532、628、668—671、826、827。
- 和生态的关系——531—532。
- 周期性——476、678—680、683。并见大规模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69、97、176、372、504、505、515、529、55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概述——16、23、73、97、169、236、369—372、383、508、514、530、555、599、661—663、675—679、832、833、840。

——它的产生和发展——278、281、309、322、335、344、348、349、362—363、368—369、379—380、383—385、397—400、450、473—476、498—500、529、530、535、536—539、629、667—671、674—682、722、723、767—771、797、799、800、803—814、817、819、820、825—827。

——它的历史性质——18、64、69、169、321、514—516、529、530、536、537、542、628、667、767—771、825—827、846、847。

——历史必然性——349、514、515、529、531、628、667、668、826、827。

——内在矛盾——217—218。

——局限性——276—277、408、424—425、441、515、555、827。

——与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的区别——51—52、72—73、241—242、321—322、372、514、628、825、82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17、217—218、319、333、372、424—425、441—443、452、456、463、476、486、511、514—517、529、532、547、548、555、556、595、

688、692、693、706、707、721、749、827、828、843、844、845、848。

——它的世界性——473—47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强迫进行剩余劳动——240、241、272、278、322、536、540。

——征服一切生产部门——309—310、670、671。

——它在农业中的形成——529—532、689、722、723、803、804、805、820。

——它在殖民地的形成——830。

——为共产主义创造前提——73、514—517、529—531、628、826、827、828。

并见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概述——17、67、69、102、176、187、277、309、313、322、344—349、371—372、376—377、534、562、564、595、692、693、756、829、830。

——它的再生产——604—608、612、613、618、660—663、768—771。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概述——176、186、187、321—323、531、532、534、558、559、603—606、648—651。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195—200、345、442。

- 劳动过程是它的物质内容——
179, 186, 187, 345, 600。
- 和再生产过程—— 599 — 607,
612 — 623, 628 — 632, 535, 536,
642 — 648, 659 — 662, 678 — 681,
683, 684。
-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矛盾**
- 概述—— 17 — 18, 318, 319, 333,
463, 529, 558, 688。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19, 333, 424 — 425, 442, 443, 510,
514 — 516, 555, 674 — 682, 827,
848。
-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矛盾—— 303,
344 — 345, 442, 450 — 452, 456,
688, 692, 693。
- 生产和市场的矛盾—— 473 —
476, 478, 700。
- 计划性和无政府状态的矛盾——
371 — 372, 529, 555。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资本转移**—— 514, 685, 686, 711。
并见竞争。
- 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
- 概述—— 162, 467, 725, 814。
- 它的历史作用—— 514, 632, 827。
- 它的阶级利益—— 18, 232, 239,
246 — 249, 269 — 270, 287 — 299,
307, 507, 518, 519, 522, 608 —
613, 780, 781。
- 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237,
238, 244 — 254, 260, 287 — 289,
292, 300, 301, 420, 436 — 438,
504, 505, 516 — 519, 601, 602,
716, 717, 725。
- 它的意识形态—— 64, 75, 109,
176, 324, 372, 388, 463, 470, 829,
848。↓
- 和国家—— 228, 244, 272, 273,
277, 287 — 292, 294 — 295, 298 —
300, 308, 440, 443, 797。
并见工人阶级、阶级斗争。
- 资产阶级道德**—— 127 — 128, 133,
150, 176, 195, 232, 238 — 239,
245 — 248, 254, 255, 259 — 260,
264, 267 — 271, 274 — 277, 281 —
282, 287 — 288, 295 — 304, 306,
372, 409, 412, 417, 443, 445,
457 — 459, 470, 492, 516, 522 —
529, 608 — 613, 638 — 641, 681,
701 — 703, 725, 739, 744, 748,
749, 785, 790, 791, 814 — 817,
820 — 824。
- 资产阶级革命**
- 概述—— 770 — 774, 780。
- 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必然性——
769, 826。
-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 概述—— 64, 645, 646, 676, 677,
843。
- 它的科学成就—— 34, 64, 73, 77,
95, 363, 559, 594 — 595, 625 —
626, 843。
- 它的哲学基础—— 64, 69, 406。

- 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64、73、74、75、319—320、648—649。
- 它的阶级局限性——75、570。
- 它的矛盾——37、38、565。
- 与庸俗经济学的区别——64、74。
- 论劳动力的价值(劳动的价值和价格)——563—566。
- 论生产劳动——534。
- 论分工——378、381、554。

并见李嘉图、斯密。

资产阶级国家

- 概述——520、521、529、656。
 - 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228、244、272、273、277、287—292、294—295、298—300、440、797、798。
 - 国家对工厂制度的干预——277、413。
 - 和劳动时间的调节——244、278—281、285—292、302、303、307、308、426、427、507、521。
 - 和宗教——75、272、658、659。
- 并见工厂立法。

资产阶级立法——见立法、资产阶级立法。

资产阶级社会——17—20、23、24、34、51—52、64、73、83、127—129、137、164、176、348、372、507—508、539、554、622、655、842、848。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 概述——64、74、317、632、633、695、696。
- 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64、74。
- 辩护性和非科学性——64、86、87、109、119、139、150、157、158、334、463、464、554、594—595、645、646、836、844。
- 粗俗的经验主义——64、74、233。
- 剥削性——162、367、532、634、657、658、694。
- 它的方法的根本缺陷——64、209、220、320。
- 自由贸易贩子——53、176、491、595。
- 将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843。
- 把需求和供给等同起来——108、156。
- 掩盖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真实关系——567、633—635。
- 论价值——46、52、53、74、156、209、564、645、646。
- 论货币——86、87、119、120、147、148。
- 论剩余价值——160、208、209、220、227—233、546、547、633—635。
- 论资本——150、151、633—635。
- 论工资——554、637。
- 论机器——403、404、426、459—463。

- 参见节欲理论、辩护、马尔萨斯主义。
-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 概述—— 69, 844。
- 它的哲学基础—— 64, 406, 407。
- 它的辩护性质—— 109, 233, 284, 311, 558, 571, 572, 632, 633, 647—650, 829—832, 834。
- 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 38, 49, 64, 70, 73—77, 84—87, 173, 463, 571, 603, 635—638, 648—649, 694, 707—710, 833, 834, 847。
- 它的拜物教性质—— 76, 77。
-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 95, 118, 119, 139, 365, 378, 515, 586, 624—627, 645—650, 823, 824, 830。
- 历史主义的要素—— 346, 603, 635—636。
- 它的研究方法不完备—— 47, 64, 564, 565。
- 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特点—— 842, 844—845。
- 论价值—— 24, 27, 30, 37, 38, 47, 51—55, 64, 67, 73—77, 156, 157。
- 论货币—— 39, 49, 64, 76, 84—87, 90, 92—96, 115—121, 123—126, 129, 139—141, 147。
- 论剩余价值—— 157—160, 211, 540—543, 681, 682。
- 论雇佣劳动和工资—— 171, 188, 326, 542, 543, 561, 562, 571, 572, 591—592, 601—603, 637, 638, 681, 682。
- 论资本—— 76, 150—153, 159, 160, 186—188, 209—211, 605, 606, 622—623, 830—832。
- 自耕农**—— 775, 776, 779, 782。
- 自然**
- 和人—— 见人。
- 人对自然的统治—— 180—182, 405, 538。
- 和社会—— 33, 73, 186, 387, 388, 531, 532, 539, 827。
- 和劳动—— 33, 34, 180—182, 186, 405。
- 作为劳动的基本条件—— 180—182, 367。
- 劳动生产率的自然条件—— 30, 535—539, 663, 664。
- 参见土地。
- 自然产物**—— 31, 183, 538。
- 自然规律**—— 68, 402, 554。
- 自然经济**—— 71, 125, 808。
- 自然科学**
- 自然科学知识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402, 485, 513。
- 参见科学。
- 自然力**
- 概述—— 388, 401。
- 作为生产力—— 34, 402, 442, 538, 539。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402、647。

——和价值形成——402—403、617。

——自然力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401、402。

——和机器——390、391、402—405、442、463。

自然神论——73。

自由

——概述——61、444。

——和必然性——97。

——资本的自由——287、303、371、802。

——雇佣工人的个人自由——176、412。

——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自由的幻想——176、412。

——压制雇佣工人的个人自由——531。

自由贸易

——概述——245、290、292、507、696、728。

——自由贸易论者——301、305、810。

——对工人阶级的危害——255、256、305、490—491、507—508、713。

自由时间

——作为人发展的基础——272、555。

——和剩余劳动时间——272—273、540。

宗教

——概述——66、72—75、242、373、538、662、767、768。

——它的物质基础——72—75、662。

——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作用——259、266、272、294—295、658、659、694—695。

——宗教的历史——388。

宗教改革——777—779。

总体工人(社会的总体工人)

——概述——340、347、361、401、517、533、534。

——工场手工业中的总体工人——352、358—361、363—364、377、399。

——工厂中的总体工人——438、443。

——社会总体工人构成的改变——425、485。

租地农场

——概述——698。

——租地农场的积聚——728、750、765—766、783。

租地农场主、租地农民

——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115、116、321、415、598、612、640、641、723、724、740—742、746—749、772、777、778、781—783、806、809、812。

——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803—805。

——小租地农民——321、507、757、775—776、779、782—784。

——和土地所有者——612、723、724、728、777—778、804。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

冯文光 李其庆 周思成

参加本卷资料和编辑工作的有：

李楠 周思成 张红 刘洪涛 沈延
闫月梅 胡晓琛 李园园 朱羿 吴海涛
尚月明 张芑爽

全卷译文由冯文光 李其庆审定

